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告别马焦拉

[俄罗斯] 瓦·拉斯普京 著

新平知覺

PDG

外国文学出版社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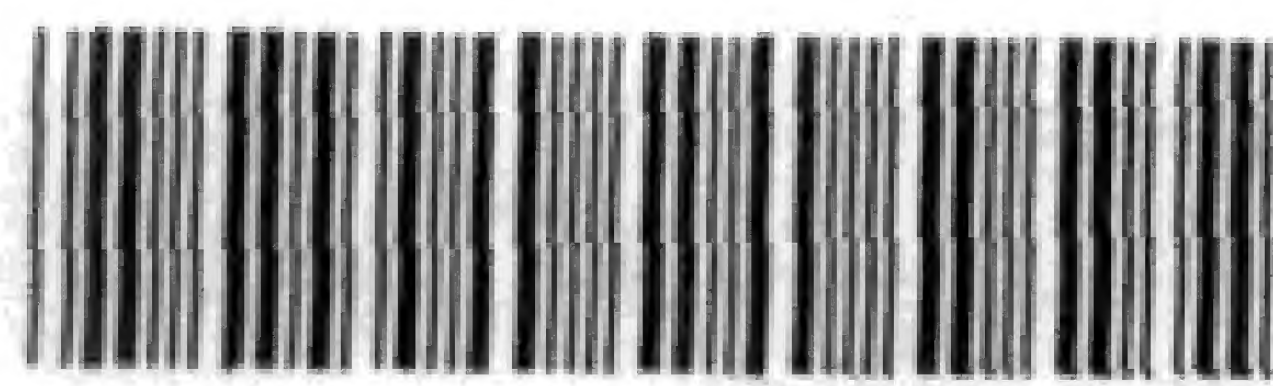
9 787501 601622 >

ISBN 7-5016-0162-3/I · 159

定价：19.20元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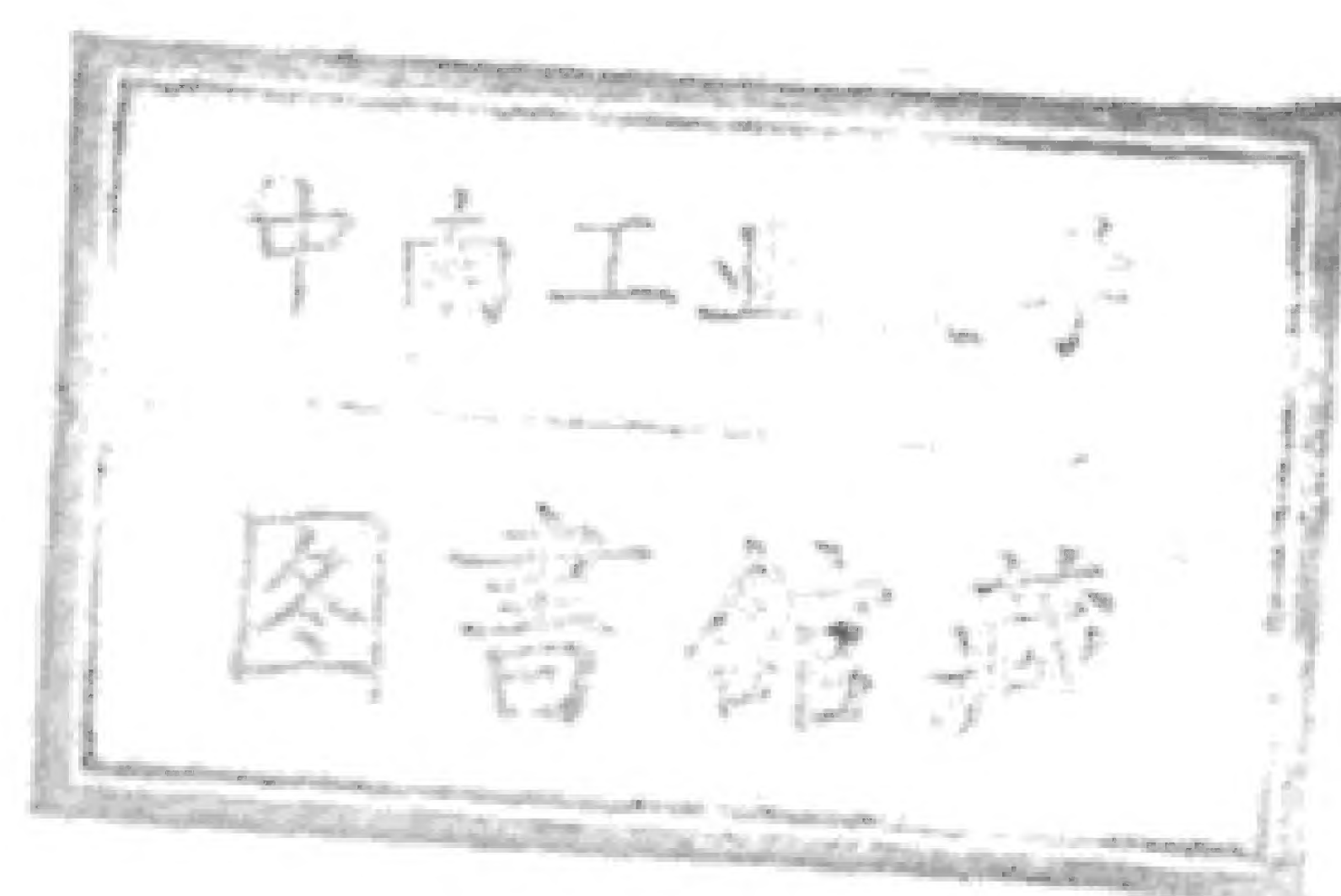


0860600

45.52
45.52
LSP2

告别马焦拉

[俄罗斯] 瓦·拉斯普京 著



45.52
LSP2

文学出版社

LAC53/03

数字图书馆
PDG

(京)新登字 0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马焦拉/(俄罗斯)拉斯普京著;董立武等译. -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9.2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62-3

I. 告… II. ①拉…②董…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087 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37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75 插页 1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9.20 元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前 言

瓦连京·拉斯普京(1937—)六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从一九六七年起陆续发表了《给玛丽娅借钱》(1967)、《最后的期限》(1970)、《活着,可要记住》(1974,获1977年苏联国家奖金)和《告别马焦拉》(1976)四部中篇小说,引起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一九八五年他又发表了中篇小说《火灾》(获1986年苏联国家奖金),从而确立了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他的作品被翻译出版,搬上舞台银幕和列入文学史,在国际上也声誉鹊起。无怪俄罗斯著名作家扎雷金说:“瓦连京·拉斯普京几乎没有起跑,一下子就作为一个真正的语言艺术大师进入了我们的文学”,不谈他的创作,“已不能真正地议论今天俄罗斯的以及全苏联的散文了……”^①

拉斯普京出身于农村,西伯利亚的农村生活,是他创作的主要源泉。但是,拉斯普京不仅限于描写农村日常生活,他首先是个进行精神和道德探索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中篇小说,都是通过所描绘的农村生活,提出当代社会生活中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思考人类生活中的一些永恒的命题。作者的注意力不在所描绘的事件,而在探索这些事件中的精神和道德内涵。作家本人也说:“从道德方面研究人的个性好像才能说明我的创作

^① 扎雷金《瓦连京·拉斯普京》,见《文学的关注》一书,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79年。

和我的农村散文同行的创作特点。”^①

拉斯普京创作上的这种道德探索的倾向,在他的《活着,可要记住》、《告别马焦拉》这两部作品中,得到了更加集中和深刻的体现。如果说作者在《给玛丽娅借钱》和《最后的期限》中揭露的是当今社会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现实,而在其后的这两部作品中突出的却是诸如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以及现代化建设与人们故土感情的冲突、社会发展与道德传统继承等这样一些更具哲理性和更具迫切性的问题。

《活着,可要记住》通过卫国战争中一名逃兵安德烈及其妻子纳斯焦娜的悲剧着力刻画主人公精神道德上的缺陷、蜕变和感受,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安德烈本来是个不错的农村小伙子。在前线他参加过坦克冲锋、滑雪夜袭、“抓舌头”,也有过献身的准备。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个人与战争、生与死的关系问题,他所做的仅仅是因为人皆如此,是因为客观上不允许有偷生的念头。而一离开战场,当他伤愈后走出医院时,苟且偷生的念头就一发而不可抑制,认为他该受的那一份苦已经受完。什么自觉的公民义务意识,什么与人民、祖国共命运的觉悟,一旦单独面对生死选择的时候,他就失去了驾驭自己的能力,全部身心只求跟亲人团聚。

乡情、亲情、友情、爱情,皆是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只是由于摆错了它与爱国之情的位置,才使这些本来美好的感情走向了反面。从热爱土地变为敌视土地,从依恋亲人变为毁坏亲人。怨恨和嫉恨使他的心理扭曲,想到那些坦然生活,不必提心吊胆的人他就气恼,见到磨房就想把它烧掉,见到牛犊就要把它杀死。安德烈在精神上堕落了,过着虽生犹死的生活,学狼嚎成了

^① 拉斯普京《人的净化》,苏联《星期》周刊,1977年第36期。

他这种生活的标志。他是为了见纳斯焦娜而回来的,可他的归来却把纳斯焦娜推上了绝境,使她陷于无穷的精神痛苦之中,渴望已久的幸福也变成了摆脱不掉的沉重包袱。她无颜直面人生,最终只能投入安加拉河以求解脱。作者就是这样,从事件的内因与外因、一般性与偶然性,事物的矛盾转化等诸多方面冷峻而雄辩地向读者揭示着生活的真理。拉斯普京创作中的哲理性在《告别马焦拉》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俄语中,“马焦拉”是“母亲”的意思,“告别马焦拉”其实可以理解为“惜别故土”。单是这一书名,就蕴含着世代为农的劳动人民对土地的多少深情!在叙述马焦拉村因安加拉河下游要建水电站大坝而将淹没的故事中,作者通过年近八旬的达丽娅对生活的思索来阐述社会发展中进步与传统、新与旧的冲突是很有典型意义的。马焦拉在年轻人眼里毫不足惜,甚至早就希望把它扒掉。然而,对达丽娅来说,马焦拉是祖祖辈辈生活劳动的地方,每一条犁沟都洒满了劳动的汗水,这里埋葬着他们的祖先,保留着他们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是她的祖根所在。马焦拉犹如母亲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村民,如今母亲濒临死亡,子女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她思忖着现代化建设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啦?当然,作者提出的并非只是一个马焦拉的问题,而是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当代人如何对待社会进步和道德继承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正如著名作家阿达莫维奇所说:“《告别马焦拉》——这是我们全民跟农民的大西洲的告别,它不仅在我们这里而且正逐渐在全世界消失,消失在科技革命世纪的浪潮中……”^①

达丽娅由马焦拉的命运想到,许多老朽的东西,在它们为人类服务了一世已经用不着了的时候,是不是就该一把火烧了,放

^① 阿达莫维奇《关于战争与和平》,苏联《新世界》杂志,1980年第6期。

水淹掉就了事呢？她还想到，人生一世也不过是这种新旧交替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面对世世代代的前人你能够泰然地认为，生命只是从自己开始，到自己就终止吗？她认为，旧事物是要死亡的，但“死亡总是在生者的心田里播下最有益的丰收的种子，腐朽和神秘之种能结出生命和理解之果”。作者在现实地提出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与继承传统、保留精神价值的关系问题的同时，向人们提示着一个重要的哲理：新取代旧是必然的规律，但新的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旧的也不是毫无价值地逝去，新的要在继承旧的传统基础上才得以生存、发展。这种哲理性构成了他作品的精髓和灵魂，诚如他本人所说：作家有“自己的生活哲学，它不服从于任何常用的教条，有饱经忧患和沧桑而得到的一种主要的真理，缺此就无所谓作家。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像它那样帮助你清楚地想象我们当今的时代在总的时代之中的地位和本质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大量积累起来的偶然事件中寻找出它们的基本倾向。”^①

拉斯普京的几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妇女形象。曾经有人就此问过作者，他回答说：“我经常被一些普通的妇女形象所吸引。她们特别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特别善良，也特别能体谅别人。”^②

用妇女形象来表达作者的道德理想，这也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拉斯普京笔下的妇女形象既继承了过去妇女形象的传统特征，又赋予了独特的时代特征，从而丰富了文学史上妇女形象的画廊。在今天对苏联时期文学的评论中，但凡论及妇女形象，总要提及安娜、达丽娅、纳斯焦娜，而她们那种热爱故乡、热爱土

① 邦达连科《理解现实》，苏联《十月》杂志，1980年第5期。

② 拉斯普京《努力做到独具一格》，苏联《文学问题》杂志，1976年第9期。

地、勤劳善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性格特征也逐渐成了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农村题材作品中许多女主人公共有的特征。

《最后的期限》中的安娜是拉斯普京成功刻画的第一个俄罗斯劳动妇女的形象,在她身上集中了俄罗斯妇女的许多美好品质。她一生勤劳,含辛茹苦,耗尽了自己,养大了子女,但她毫无怨言,更不求子女回报,即使是临终诀别时,她想到的还是要及时死去,免得过多耽搁子女们的时间。

《告别马焦拉》中的达丽娅和安娜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作者也说:“我明白,这样会在人物性格、语言以及生活哲学上出现雷同之虞,但我还是这样做了,因为达丽娅这样一个人物性格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最后的期限》中的安娜在那种情况下来不及对我们这代人说完她想说的。”^①如果说作者在安娜的形象中主要表现了热爱农村生活和对死的思索,那么在达丽娅身上则进一步突出刻画了她与故土的生死之情和对生活哲理的探索。

达丽娅是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在农村度过了一辈子,马焦拉村要被淹没,在她思想深处激起了剧烈的感情波澜。她对为搬迁而兴建的新镇住宅和现代化城市的设施毫无兴趣和好感。她依恋着马焦拉这片热土,为它将被淹没而痛惜;她珍惜在这块土地上的劳动,为子孙们已不习惯这种劳动而感到痛心;她缅怀长眠在这片土地下的祖先;她珍惜出生于此并生活了一辈子的古屋,为它将要被焚烧而郑重地祭别。她把这片土地看作是世代相承的基业,因此每一代人都有维护它的神圣职责。即使因为建设的需要把它淹没,那也要记住它的养育之恩,记住曾经在这里生息的祖先。达丽娅就像马焦拉岛上的树王,深深扎根于这

^① 拉斯普京《往事重视》,《苏联文化报》,1977.12.23。

片故土,对它寄托着无限的深情。她企图寻找出一种真理来解决时刻萦绕在她心头的新与旧的矛盾。她意识到,死亡并不等于一切就此消失。因而悟到没有记忆就没有生活,只顾向前跑而不朝后看,那是不能成为生活的主人的。老安娜弥留之际来不及对子女说的话,想必就是由达丽娅在《告别马焦拉》中提出的记忆问题,在对人生的思考上达丽娅既是安娜的继续,又有她自己独特之处。

拉斯普京选择一个在农村土生土长的老妇作为作品的主人公,用以象征“农村母亲”、“土地母亲”,通过她们来表达对农村、土地的赤子之爱,这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现实的要求。一定的文学形象总是一定时代生活的反映。苏联社会几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人们精神、道德、伦理、审美以及如何对待农村、对待过去等观念上的变化。正是针对这种变化,拉斯普京通过安娜、达丽娅这样的老人形象来提醒人们,要珍惜世代积累起来的传统的精神财富,不要随急速的时代节奏而把它遗忘抛弃。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人类仅仅因为有着老人才能在道德上进步。老人善良、睿智,把他们所经受过的传给下一代。没有这一点,人类就不会前进。”拉斯普京笔下的老人虽已年逾古稀,甚至行将就木,可又非常富有时代感。她们让今天的人们去思考,今后应当怎样生活?后辈们应当怎样生活?

《活着,可要记住》里的女主人公纳斯焦娜的形象与安娜、达丽娅也有相似的地方。勤劳、善良、温顺,她也像安娜、达丽娅一样,国难当头时,把亲人送上前线,自己承担了后方艰巨的劳动任务。她热爱生活,热爱亲人,期待着幸福。她也热爱乡亲,热爱农业劳动,具有许许多多劳动妇女共有的高尚品格。作者把这样一个妇女置于战争的危难之中,而且使她处于一个被迫庇护逃兵丈夫的情境中来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作者首先强调了

纳斯焦娜的自我奉献精神，因此，安德烈一回来，她就立刻意识到了他犯的是什么样的过错。但纳斯焦娜首先想到的是丈夫的处境，怕他经受不了这种过错。她觉得安德烈的罪责中也有自己的责任，丈夫是为了她才走上这条路的。她怪自己没有好好提醒他，因此甘愿与他一起分担不幸。纳斯焦娜虽甘愿把这碗苦酒喝到底，但她内心却接受不了与丈夫在一起苟且偷生的生活。与丈夫的相会从一开始就没有使她感到欢乐，继而更觉得空虚、懊丧、惶恐、自疚，甚至怨恨。可是为了分担丈夫的痛苦，她默默忍受着学着撒谎骗人，她不敢回到人群中去，更无颜分享普天同庆的胜利。她受不了这种双重人格的生活，渴望回到人们中间，但又拗不过安德烈的自私和一意孤行。她终于怀着羞愧难当的心情，放弃了多年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决定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摆脱那如同无法使安加拉河此岸和彼岸合拢在一起一样的矛盾。纳斯焦娜的悲剧形象深刻地向人们揭示了生活在人民之中而背离人民会导致多么可悲的结局，告诫人们，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首先应尽公民的责任。

拉斯普京的作品以深邃的哲理思考和隽永深沉的风格见长。他所描写的都是日常的农村生活，主人公也是极普通的农民或老人，然而却善于从平凡和一般中发掘深奥的内涵。他的作品几乎处处都可听到一种“活着，可要记住”的声音：活着要记住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心帮助，互相信任依赖；活着要记住热爱农村，热爱土地；活着要记住承担公民的义务，与祖国、与人民共命运；活着要记住前辈留下的优良传统和可贵的精神遗产。这声音犹如一股潜在的热流，涓涓注入人们的心田，激励人们追根溯源地去探寻生活的流向。这也正是拉斯普京作品的魅力所在。

拉斯普京的几部小说在情境设置上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

是“最后的期限”。它使主人公始终处于紧迫的焦虑的状态,造成一种悲剧性的沉重氛围,使读者深深地关切主人公的命运和事态的发展。而且这种悲剧性的情境,往往又是用非常简洁而又含蓄的结尾来完成。《最后的期限》中安娜的子女们等不到与她诀别,一个个都走了,当天“夜里老太婆就死了”,这句话俄语中只有三个词,但却有极强的讽刺力量。《活着,可要记住》的结尾是,女人们开了个追悼会,“哭了一阵,都很可怜纳斯焦娜”,含蓄地表达了人们对纳斯焦娜的态度。《告别马焦拉》的结尾则是大雾笼罩、汽艇迷航,留在岛上的人们依稀听到“岛主”的告别声。这样一些结尾留给人们无穷的回味。

拉斯普京作品的含蓄深沉还表现在他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刻画上。作者极力避免人物描写的脸谱化,他说过:“我不善于把这个人写成白脸,把那个人写成黑脸,我认为,不可能只有正面人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他们写成活生生的人。”^①安德烈没有坚持履行公民义务而沦为逃兵,是个反面形象,但他在成为祖国和人民的罪人之前也曾是个不错的农村小伙子。达丽娅老太太那种对故土的依恋、对传统的珍重堪称美德,可是她过多地想到过去,较少朝向未来。他们身上的优点常常同时孕育着弱点,正面和反面的品质常常是相辅相成的。拉斯普京笔下的人物形象还常常具有象征意义。安娜是子女们的母亲,又象征着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子女的母亲——母亲,子女们对母亲的态度也可看成是离开了农村的子女对故土——母亲的态度。《告别马焦拉》中将被淹没的马焦拉本身就是一个故乡母土的象征,是现代化建设中将要被水淹没的农村大西洲的象征,对

^① 拉斯普京在莫斯科大学创作讨论会上的发言,《莫斯科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

待马焦拉的态度成为对待古老传统和时代要求的道德标志。富有生命力的树王,预知一切的岛主也都是富有寓意的形象。

拉斯普京十分重视和擅长心理描写。在他的作品中心理描写占有很大比重。或是主人公大段的内心独白,或是作者对主人公内心世界淋漓尽致的抒发,或是笔墨酣畅的抒情插话,以多种手段充分展示了主人公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和对事物的深刻理解。《活着,可要记住》中,通过对纳斯焦娜在战争胜利之日心理活动的刻画,把一位纯洁善良的妇女既不甘在人们中间落为异己又怜悯丈夫那复杂矛盾的心情展现得活灵活现。《告别马焦拉》里达丽娅对生与死、人生价值的内心思考,更充分显示了这位在马焦拉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对道德的执著追求。这些心理描写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常使读者追随作者的笔触去品味和思索。

拉斯普京是当代俄罗斯的优秀作家,前苏联“农村散文”的重要代表。他的创作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深邃的哲理思想,精湛的艺术功力。关于这位作家及其创作,著名评论家西多罗夫的话也许并不过分:“巨大的希望与拉斯普京的创作联系在一起。……他不是‘就事论事的作家’,不是‘农村作家’,不是日常生活作家。在他的中篇小说里可以感到艺术创作的潜台词,艺术思想的多层含义。熟悉生活,专注于人民性格和拓展社会哲学视野,将会为我们的文学造就一位大作家。”^①

石国雄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① 西多罗夫《走向综合的道路》,苏联《文学问题》杂志,1975年第6期。

目 次

活着,可要记住	1
告别马焦拉	233

活着，可要记住

董立武 译

ВАЛЕНТИН РАСПУТИН
ЖИВИ И ПОМНИ

В. РАСПУТИ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90.

—

一九四五年——战争最后一年年初，正值隆冬，但这一带还不算太冷。可是，和往年一样，到了洗礼节前后，严寒仍然超过零下四十度。一周后，树上的霜挂脱落了，树林被冻僵，地面上的积雪也冷得哆嗦，碎裂，吱吱作响。清晨，空气硬得噎人，很难呼吸。过了些天，天气转暖，后又变冷，接着又一次回暖，但是到了早晨，开阔的旷野上还是一层坚冰。

古西科夫家的浴室，紧靠安加拉河岸，盖在一块低洼的菜地里，就在这寒冷的节气里，那里丢了东西。米赫伊奇·古西科夫一把做工精细的老式木工斧子不见了。在古西科夫家，每当要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不愿让外人看见时，总是往炉灶旁边那块活动地板下面一推。古西科夫老汉记得很清楚，昨晚他剥完烟叶，就把斧子塞到那儿去了。第二天——斧子没啦！到处搜遍，也没有。不过，在浴室里横竖翻了一遍之后，米赫伊奇发现，斧子还不是他惟一的损失。那个毫不客气，在这里以主人自居的人，还从架子上拿走了自种的烟叶，足有一半；摆在脱衣间的一副旧的猎用滑雪板，也被他看中，摸走啦。这时老汉明白了，这个贼来自远处，因为村里人是不会拿这种滑雪板的。他是再也见不到那把斧子了。

晚上下工后，纳斯焦娜才知道丢了东西。米赫伊奇一直在唠叨：现下在打仗，到哪儿去弄到这样的斧子？什么样的也弄不到！可我这把呀，漂亮得像个玩具，锃亮、轻巧、顺手。公公没完没了，骂骂咧咧地唠叨，纳斯焦娜都听累了，心想：这几年家里折

腾得底儿朝上，为那么一块铁，怎么就心疼得死去活来的。直到纳斯焦娜躺在床上，入睡前，在昏沉中感到舒展的肢体丝丝作痛时，突然心跳起来。外人谁能想到掀开地板看呢？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使她喘不过气来，睡意一下子全没了。纳斯焦娜睁着眼睛在昏暗中躺了很久，一动也未敢动，生怕叫别人知道她这个猜想。她时而想赶走这个猜想，时而又把这个猜想的细丝残端拉得更紧。

这一夜纳斯焦娜没睡好。早晨，天刚透亮，她决定自己到浴室去看看。她没有走雪天里被临时踏出来的，牛圈旁边那条小路，而是穿过大家常走的窄巷，下到安加拉河边，再往右拐，就能看到河边高高的陡坡上她家那间用木栏围起来的浴室的屋顶。稍停一会儿，纳斯焦娜踩着已经结冰的台阶，小心翼翼地走上陡坡。怕开篱笆门时带出声响，她跨过栅栏，但不敢贸然进屋。围着浴室又踱又踱地转了一圈之后，才轻轻地去拉那扇低矮的小门。可是门被冻住了，纳斯焦娜不得不使足了劲才拉开，这说明里面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浴室很暗，朝西，面向安加拉河的小窗户，刚刚透进一丝微弱、暗淡的晨光。她在窗边的凳子上坐下，像野兽找食那样灵敏地闻着浴室里的气味，想嗅到一种新的，已经有些淡忘，但早已熟悉的气味。可是，除了发霉而又被冻僵的破烂发出的刺鼻的苦味，什么也没发现。傻瓜，瞎想些什么呀？她责怪自己。站起身来，她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到这里来，又想找到什么？

白天，纳斯焦娜的活儿是从打谷场运干草到农庄的仓院。每次下山坡时，她都着了魔似的往浴室那边看看。尽管她想管住自己，也恼恨自己，但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瞪大眼睛看着那灰暗，又有点歪斜的浴室。干草得用铁叉从雪下一点一点地抠出来，然后再装到雪橇上。不管干什么活，纳斯焦娜一向都很耐

劳,可是这一天,刚运了三趟,她就筋疲力尽,简直要人搀扶啦。看来是夜里失眠闹的。晚上,刚吃过饭,她就像死人似的瘫倒在床上。不知是梦中悟到的,一觉睡过又忘了,还是清醒后脑子里冒出来的主意,反正一醒过来,她就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她起身到仓房挑了最大的一个面包,用干净的麻布包好,悄悄地拿到浴室,放在门后屋角的凳子上。她坐了一会儿,思量着自己神智是否正常,然后才走出来,伴着一声暗含着祈求的叹息,随手关上了小门。

接连两个早晨,纳斯焦娜都去查看过——面包没人动。她又换了一个新烤的,还是放在原来那个显眼的地方。她已经不指望有什么结果了,但是,一种令她不可终日的惶恐,逼迫她非要查出斧子这件事的结果。外人是绝猜不到地板下面有个密室的,那块盖板和别的木板紧紧地拼在一起,即使在上面跳舞,它也不会颤动一下。也许有人偷看过怎么掀开它?面包,面包应该能够揭出这个人是谁,见了面包不动心是很难的。

又过了两天,面包不见了,在原来的地方没有找到,纳斯焦娜害怕了。她浑身瘫软地在凳子上坐下,不断地摇头,不,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可能是公公或婆婆进来过,看到面包,就捎回家了。纳斯焦娜跪下仔细察看,在地板上发现了面包渣。不,这不是公公,也不是婆婆,是别人。接着,她又在炉灶的冷灰里找到了一个烟头。

从此以后,她就像掉了魂似的,心里总在捉摸:还会发生什么事呢?操持家务,去农庄干活,人前纳斯焦娜尽量装得和往常一样,可内心里却一直提心吊胆,身边每个意外的声响都能吓她一跳。她企盼着,但又不知道企盼的是什么。这种煎熬使她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最后她打起浴室的主意。谢苗诺夫娜以天太冷为由,劝她不要去浴室烧水洗澡,纳斯焦娜坚持自己的想法,

表示由她提水、生火、烧水，全包了，两位老人只管去洗就行了。

活儿很简单，她本可以很麻利地把浴室安排好，烧好水，可她却故意不紧不慢地干，劈了一堆木样子，好烧的松木和不好烧的桦木各一半。然后才生炉子，比平时要晚。寒潮刚刚开始减弱，这一天仍然很冷，但天气晴朗，没刮风。每次从安加拉河边提水上坡时，纳斯焦娜都情不自禁地看看房顶上的烟囱，浓黑的桦木烟柱冲得很高，从老远就能看到。她有意多烧了些水，满满一大桶。擦洗了地板和蒸浴床，关小了通烟孔，傍黑时她才去叫公婆，还想着嘱咐他们带点灯用煤油。

纳斯焦娜如在梦中，所有的动作都是下意识的，既不紧张，也不感到一天的劳累，可一切又做得和想的一样，准确无误。等老两口洗完，回到家，她收拾好换洗的内衣要走时，婆婆谢苗诺夫娜问她和谁一起去，她扯谎说和纳季卡。纳斯焦娜去洗澡时，一般总要叫个女邻居作伴：孤自一人，看着自己那发酸的裸体，她会难过、伤心，以至泪水满眶。但是今天她不想带女伴。夜幕初降，星光未启，纳斯焦娜摸黑来到浴室。她以布作帘，从里面遮住小窗，脱掉衣服，只想随便洗洗就行，因为稍后，她所猜想的那个时刻就应该到啦。

纳斯焦娜洗完澡，回到家，点着灯，对着镜子梳好了头发，对老人们说，她想到纳季卡家里去坐坐，好像刚才就是和纳季卡一起去洗过澡似的。纳斯焦娜确实去了纳季卡的家，但没呆多久，本来也没有什么事，只图照个面，然后，赶紧又转头奔浴室。她悄悄摸近房门，担心自己来晚了，在门外侧耳听了听屋里是否有人，然后才蹑手蹑脚地走进去。浴室里还很热，怕出汗，纳斯焦娜坐到门坎上，如果有人来，她也来得及站起来闪开，现在就是等啦。

村里最后的低微的人声和狗吠也消失了，万籁俱寂，偶尔有

沉闷的劈裂声掠过安加拉河的冰面。热气慢慢地散去，浴室里渐渐凉下来。室内很暗，只有小窗口隐约可辨。纳斯焦娜坐在其中，觉得自己像个可怜的冬眠小动物，深更半夜的，在这里干什么？她试着想点什么，回忆点什么，可是不行，对人来说很简单的事，在这里都做不到了。又过了一会儿，从门缝里灌进冷风，她便站起身，坐到凳子上。

显然，她还是打了瞌睡，没有听到脚步声。突然，门开了，不知是什么，带着沙沙的响声，从她身边擦过，闯进了浴室。纳斯焦娜一跃而起。

天哪！是谁？谁？她大声叫喊，吓呆了。

一个高大的黑影，在门后停了一下，就扑到纳斯焦娜跟前。

“别出声，纳斯焦娜，是我，别做声。”

村里的狗狂叫了一阵，就住声了。

二

阿塔曼诺夫卡村是个位于安加拉河右岸的小屯子，只有三十户人家。村名倒是很响亮，其实孤没无闻，早在战前就开始衰落了。如今已有五栋木房，人去屋空，窗户钉死，死气沉沉地戳在那里。这些房子都还结实，不是快要倒塌的破屋。至于战时许多村子都凋敝了，这无需解释，原因都是一样的。而阿塔曼诺夫卡村的人更早就开始外流了，特别是那些尚未成家立业的年轻人，觉得在阿塔曼诺夫卡村没有什么奔头，向往有点发展远景，人多热闹的村镇。这个村子从初建至今，一直是孤零零的。在右岸离它最近的卡尔达村，也在二十俄里以外。阿塔曼诺夫卡村所属的联村苏维埃就设在那里。对岸的雷勃那亚村离得近

些,但那个村里的居民很少过河到阿塔曼诺夫卡来,他们有事总是到下游的村镇去,那里有商店和村、区苏维埃领导机关。来往的轮船,吃力地拍打着水面,在阿塔曼诺夫卡村旁驰过。船上所带的各种新闻,很少能传到村里。它像一座航标,竖在岸边的高岗上,孤寂,寡闻。关于战争爆发的消息,这里也是第二天才知道。

应该说,阿塔曼诺夫卡村并不是一向都是这样默默无闻。阿塔曼诺夫卡这个名字是从它以前更加响亮,也更吓人的名字——拉兹鲍伊尼科沃^①得来的。很久以前,这里的农民并不讨厌干一种虽说不很兴隆,但也算有利可图的副业——“检查”到勒拿河淘金的过往工人。村子所占的地势,对于这一行很有利。一座山岭紧贴着安加拉河绕村而过,没有办法,愿意与否,只有此路一条。紧靠河汊,有一段狭路,一些不顾死活的人,就守候在那里,等着“检查”来自勒拿河的淘金工人。由此,拉兹鲍伊尼科沃这个恶名远扬,长久不衰。开头只是口传,后来就见诸于公文了。直到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乡里有人觉得这个村名实在不够体面,就改为“阿塔曼诺夫卡”^②。原来村名的含义似乎还有,但听起来不那么刺耳了。不过,不知为什么,当地人对这样更名都不认可。直到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了,卡尔达、雷勃那亚和周围其他村里的老人们,好像商量过似的,异口同声地肯定:那个村里的人都干过抢劫,想推到一个头人身上,那可不行,办不到。

是不幸的命运把纳斯焦娜从安加拉上游带到阿塔曼诺夫卡村的。饥荒的一九三三年,在离伊尔库茨克城不远的故乡,纳斯

① 原意是强盗。

② 原意是酋长、首领。

焦娜埋葬了母亲。为了活命，十六岁的纳斯焦娜带着不满八岁的妹妹卡季卡，向安加拉河下游流浪。传说那里灾情轻一些。她们的父亲死得更早。在混乱的农业集体化的第一年，就被打死了。人们说是误杀，当时枪口本是瞄着别人的。可是，是谁这样瞄准开枪的，一直没能查清。这样，两个小姑娘就成了孤儿。整个夏天，纳斯焦娜和卡季卡走东村、串西村，这里干点活，挣顿饭吃，那里得点施舍充饥。这些施舍都是冲着年幼，又讨人喜欢的妹妹给的。若是没有卡季卡，纳斯焦娜可能活不下来。她像个飘忽的幽灵，枯瘦细长，胳膊、腿和脑袋都长得很怪，不是地方，再加上一脸苦相，满目愁云，只因她替代了母亲，要抚养卡季卡，才逼她不得不去打工，去乞讨。

临近秋天，她们姐妹俩才艰难地走到了柳季纳村，纳斯焦娜记得姑妈就住在这里。姑妈叨唠归叨唠，还是收留了她们。纳斯焦娜在家养了些天，缓缓气，就到农庄去出工，卡季卡被送去上学。到了这个节气，境况就好多了，菜园里有菜，地里庄稼也熟了。只要有吃的东西，饿出来的病是不难治的。入冬前纳斯焦娜就渐渐地养好了。第二年，获得特大丰收，再吃不胖，就太愧对这好年景了。纳斯焦娜脸上过早出现的皱纹舒展开了，体态结实、丰满、双颊粉红，两眼炯炯有神，不久前的丑小丫，出落成聘到哪里都不会逊色的标致的少女。过了两年，安德烈·古西科夫在柳季纳村遇上了她。小伙子虽说是外乡人，但人很机灵、仪表堂堂，常用木筏来此地运油料，油库离柳季纳村不远。他们俩很快就谈成了。还有一个原因，也促使纳斯焦娜很快地下了决心——对这种给姑妈家当帮佣，为别人家做苦工的日子已经厌烦了。有一回，安德烈从农机站弄到几桶油，毫不耽搁，立刻搭上顺路的轮船运走。也就是这次，他把纳斯焦娜带回了自己的阿塔曼诺夫卡村。

纳斯焦娜像是纵身一跳跃入水中似的，没有多想就嫁了人：反正要嫁人，女人不出嫁的很少，何必拖着呢？至于在一个新家，一个陌生的村子里生活，会是怎样，也想得很简单。而结果呢，原来是女佣，又再当女佣，只是换了个人家而已，并且家业更大，要求更严。古西科夫家养着两头牛，还有羊、猪和家禽，三口人住一幢大房子。纳斯焦娜来了，就是四口了，家务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她的肩上。谢苗诺夫娜为了使自己能轻松些，早就盼着娶个儿媳妇。可是，等到儿媳妇过门，自己又病倒了，两腿浮肿得很厉害，行走吃力，像鸭子那样左右摇摆。但这家她还要当，这个舵轮谢苗诺夫娜转动了一辈子，如今别人把着舵轮的那双手，她觉得既笨又懒，就是因为那双手不是她自己的。她的性情实在不能算温和，一旦数落起人来，就没完没了，不容解释，更不容反驳；可有时，气极了，又嘴一噤，一句话也不说，只有像纳斯焦娜这样好耐性的人，才不至于和她吵翻。纳斯焦娜能忍气吞声，这是那年夏天，靠乞讨求生时学会的。那时，她带着卡季卡，在安加拉河岸上的村庄里飘荡，什么人都可以无缘无故地对她破口大骂。当然啦，她若是出自本村、本乡，身边有娘家人，遇事能出来为她说话，不让人欺负她，谢苗诺夫娜对她也许会另一种态度。可是这女人来路不明，可怜兮兮的，带来的全部嫁妆就是身上穿的那件不起眼的连衣裙，为了在人前能过得去，只好在这里，也就是在婆家，为她置办。这成了谢苗诺夫娜心里的一个疙瘩，每当她心烦时，就会勾起来，火上加油。

不过，几年过去，谢苗诺夫娜对纳斯焦娜也习惯了，心里承认她得了一个既随和又勤快的儿媳妇，唠叨也就渐渐少了。纳斯焦娜在农庄里从不误工，同时承担了几乎全部家务。男人们只知道割草、打柴，当然，若是房子塌了，他们也会去支起来。至于男人去安加拉河挑担水、清扫一下牲口圈，则被认为是不成体

统,干丢脸的活儿。谢苗诺夫娜拖着一双病腿,干不了什么,家里全靠纳斯焦娜一个人忙活,没她不行。婆婆也不得不服,只有一点她不能原谅——纳斯焦娜没有生孩子。谢苗诺夫娜知道这对任何女人都是最大的痛处,因此嘴上没责怪,但心里梗着。尤其想到她和米赫伊奇只有安德烈这么一个。安德烈算是老大,也可算是老二、老三,他前面的两个女孩都没有活下来。

没有孩子,纳斯焦娜不得不忍受由此而遭受的一切。她从小就听说,空心不孕的女人不能算个女人,只能算半个。她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会有这种怪病。早已知道,女人命中注定要嫁人,当初也就很痛快地结婚了,她为自己一生中这个最大的转折而欣喜。当然,过后也照例,曾为自己的少女时光过短而惋惜。安德烈对她温存体贴,叫她心肝宝贝儿。起初,他们没想要孩子,满足于俩人亲密厮守的甘甜,而孩子可能会妨碍这种幸福。可是后来,不知从何而起的一种担忧,悄然地缠上心头。不生孩子,就有冒犯自古相沿的家规的危险。原先他们躲避、害怕的事,现在反而求之不得了。会生还是不会生?几个月过去了,毫无动静,于是企盼变成了焦急,接着就是惶恐。有一年,安德烈对待纳斯焦娜的态度全变了,变得粗暴,好找茬,挑刺,无缘无故地就臭骂她一顿,后来竟学会了动拳头。纳斯焦娜默默地忍受着。俄罗斯的风俗是,作为女人的一生,只能安排一次,此后不管遭遇到什么都得忍着,何况纳斯焦娜认为,她的不幸怪她自己。只有一次,安德烈责骂她时,说出的话实在叫人受不了,她才很委屈地辩解:到底是谁没用,是他还是她——还很难说,因为她没有和别的男人试过。安德烈气得把她打了个半死。

是的,战争的前一年,他们过得轻松了一些,似乎又重新开始习惯了,也因为心里终于清楚了,彼此可以指望对方的是什么。于是也就顺从了一条老规矩:既然结合了,就得过下去。安

德烈对纳斯焦娜的爱抚依然不多,但她很少耍蛮了。能这样,纳斯焦娜也就很高兴了:他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一切都会随心如愿的。要不是战争,说不定已经和美如初了。战争爆发了,因战争而破灭的,何止这类的期望啊!

战争一开始,安德烈就应征入伍了。纳斯焦娜起初又哭又喊,过了一阵也就安静下来了。遭殃的又不是她一个人,那些带着孩子的女人更难呀。婚后这些年没生孩子这件事,头一次使她感到宽慰,还给了她盼头。她不该抱怨命不好,主宰她的命运是明智的,如今人们遭受的困苦,它早有预见,为她巧做了安排,使她能免受累赘,一身轻地度过眼前的艰难。将来,好时候一到,再生孩子也不晚,只要安德烈能回来。她就是怀着这种信念,熬过了战争期间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可怕岁月。

很长时间安德烈一直顺利地在前线战斗。可是一九四四年夏天,他突然消失了。过了两个月,家里收到他从西伯利亚军医院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负伤了,治好之后,总会给他几天探亲假。这个许诺使纳斯焦娜最终放弃了西伯利亚之行,虽然起初她已收拾好,准备动身去看望丈夫。既然能给假,还是在家里团聚好——这也正是他们所期望的。但是,安德烈估计错了。深秋,他很生气地写来一封短信,说不行了,没有指望了,他马上出院,但要他立即返回前线。

此后,他又消失了。

圣诞节前,村苏维埃主席科诺瓦洛夫和长一脸麻子的地段民警布尔达克——人们背后叫他“酒糟”^①,突然从卡尔达村来到阿塔曼诺夫卡。他们把马车一拐,离开了安加拉河岸,直奔古西科夫家。纳斯焦娜当时不在。

^① 俄语“酒糟”一词的发音与“布尔达克”近似。

“儿子那儿有什么信儿吗？”布尔达克严厉地、审讯似地问米赫伊奇。

米赫伊奇把安德烈最近的几封信拿给他看，布尔达克看完，又给科诺瓦洛夫看了一遍，就把信塞进自己的口袋。

“他再没说别的？”

“没有。”惊慌失措的米赫伊奇终于醒悟过来，“他怎么啦？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我们正想搞清楚呢！你们家的安德烈丢了，一有他的消息，马上向我们报告，明白吗？”

“明白。”

米赫伊奇一点也不明白，不仅是他，谢苗诺夫娜，还有纳斯焦娜也都不明白。

也就在洗礼节这最寒冷的时节，古西科夫家浴室里，藏在地板下的那把斧子不见了。

三

“别出声，纳斯焦娜，是我，别出声。”

两只有力的大手紧紧抓住她的双肩，把她按在板凳上。纳斯焦娜疼痛难忍，恐惧万分，呻吟不止。此人嗓音嘶哑、浑厚，但音质没变，如同从前，纳斯焦娜听出了是谁的声音。

“是你，安德烈，天哪！你从哪儿来？”

“就从那儿，别出声，你跟谁说过我在这里吗？”

“对谁也没讲过，我自己也不知道啊！”

黑暗中，纳斯焦娜看不清他的脸。小窗用布遮着，借着从四角透进来的微光，只见眼前有个高大的、毛茸茸的、黑糊糊的身

影。他像在吃力地奔跑之后，呼呼地急喘。纳斯焦娜也觉得喘不过气来，尽管她早有预感，但这次相会还是这样出乎意料，以致从最初的瞬间，从一开始说话，就像小偷行窃，心惊胆颤。

他终于缩回双手，稍退一步，还是忍不住用走腔颤栗的声音问道：

“有人来找过我吗？”

“不久前民警来过，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卡尔达村的科诺瓦洛夫，他们跟爹谈过话。”

“爹妈猜想过我吗？”

“没有，爹认为是外乡人拿走了斧子。”

“那么你猜到了吧？”

她没来得及回答。

“面包是你拿来的？”

“是我。”

安德烈默然不语。

“瞧，我们又相会了，纳斯焦娜，又相会了，我说。”他呼唤般地又重复了一遍，好像等着纳斯焦娜回应，而又没等着似的。“真不敢相信我是站在自己老婆身边。本来我是不能在任何人面前露面的，可是一个人熬不过冬天啊。是你拿面包把我引诱来啦。”安德烈说着又使劲抓住纳斯焦娜的肩膀。“至少你该明白，我为什么到这儿来，你明白还是不明白？”

“我明白。”

“明白什么？”

“不知道。”纳斯焦娜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不知道，安德烈，别问了。”

“别问……”他又喘起粗气，“我现在就要告诉你，纳斯焦娜，连一条狗也不能叫它知道我在这儿，告诉别人，我就杀了你，我

无所顾惜，~~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不管你跑到哪儿去，我都能抓到你，干这种事，我现在绝不手软，说到做到。”

“天哪，你说些什么呀?!”

“我不想吓唬你，但你要记住我说的话，我不会再重复。现在我无处可去，只能到这儿，在你身边转悠。我就是冲你来的，不冲着爹，不冲着妈，就冲着你。爹也好、妈也好，谁也不能知道我在这里。我过去不在，现在也不在，我失踪了，路上被人打死了，烧啦，灰也扬啦。现在我就听你的，别人谁也别想支配我。你要是不愿意为这事弄脏了自己的手，你现在就明说。”

“你干吗要这样折磨我呀?!”她哀声怨气地说，“我是你什么人，不是你妻子？是外人？”

纳斯焦娜神志恍惚。她像是在一种深度封闭的休眠状态下在说话、在看、在听。所有的感官都麻木了，她仿佛不是靠自己的，而是靠从旁边接上的，用于急救的生命活着似的。人在这种状态下，恐惧、痛苦、惊讶和醒悟都来得迟缓，直到苏醒之前，体内起着保护作用的是冷漠、坚实，并且几乎没有知觉的生理机制。她神志模糊地回答着，同时，连自己也不明白，怎么能用这样一些信口说出的，平淡乏味的话语来应付呢?! 在分别三年半之后，而这三年中的每一天都可能成为末日，又加上这种分别的终止使他们面临的一切，此时此刻，总应该做点什么，分别后第一次见面，起码要拥抱一下几乎夜夜都渴望与之欢聚的丈夫吧，是应该！可是她不明白，自己竟然呆坐着一动不动，如在梦中，对自己她只能旁观，不能驾驭，只好听之任之。而且这次相会在暗夜中，浴室内，鬼鬼祟祟面对面都看不清对方，像两个瞎子，彼此猜摸，痛苦地，几乎是下意识地窃窃私语，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这样的相会太不真实，也太没意思，它本应只出现在天一亮就消失的梦幻中。这种相会不可能持续到明天，到后天，到永

远,以致随之带来另一些同样折磨人的,悲伤的相会。

安德烈伸出沉重的大手,在纳斯焦娜的头上颤颤巍巍地抚摸了一下,也是见面后第一次类似爱抚的触摸。纳斯焦娜哆嗦了一下,瑟缩起来,还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

“你们是怎么过的?”

“等你啊。”她说。

“等到了,等……到了。战斗英雄回来了,欢迎吧,我的妻子,请客人吧,夸耀吧。”

这样的谈话再继续下去,已毫无意义。这么多模糊不清,又必须解决的难题,像千头万绪缠在一起的乱麻,一下子摆在他们面前,不管从那儿下手,都觉得可怕。他们沉默许久,纳斯焦娜才想起来,提议说:

“要不,你先洗个澡?”

“是得洗一洗。”他似乎很高兴,赶忙表示同意,“你是为我烧的水吧,我知道。你说,是为我烧的吧?”

“是为你。”

“我都记不得什么时候洗过澡啦。”

他退到炉边,搅动了一下大桶里的水。

“也许水都凉了吧?”她话里有话地问。

“还行。”

纳斯焦娜听见,他凭记忆摸到门边上的木钩,挂上了短皮大衣,挨着门坎脱下了毡靴,接着脱掉了衣服。然后一个依稀可辨,筋骨嶙嶙的身体走近纳斯焦娜。

“哎,纳斯焦娜,我一个人不行,来,帮我搓搓背。”

他把纳斯焦娜按倒在地。胡须扎着她的脸,不知为什么,还有一股羊膻味,她不得已地一直把脸扭开。一切发生得这么快,纳斯焦娜还没反应过来,就又坐到被布遮挡的窗下那条板凳上

了，满头蓬发，一脸痴呆。而坐在另一条板凳上，那个又做了她丈夫的，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正小声地呼哧，向身上撩水。纳斯焦娜没有任何感觉，没有快慰，也没有痛苦。她只感到一点莫名其妙的惊恐和一种不知因何而起的隐约的羞涩。

安德烈一洗完，就穿衣服。

“该给你带件衬衣来。”纳斯焦娜说。她竭力使自己像个自家人，尽量找话说。

“叫衬衣见鬼去吧。”他回答说，“现在我告诉你，什么才是最需要的。明天你歇一歇，睡足了，在我还没被野兽吃掉之前，后天把我的‘图尔卡’猎枪拿来，还能使吗？”

“能使。”

“枪一定得拿来。再带些火柴和盐，还要一个熬粥煮汤的家伙，还该带些什么，你自己能想到。把爹的枪药抓一些来，只是不能让他发觉了。”

“他要是问起枪来，我怎么说？”

“不知道，随你怎么说，反正你能应付过去……我再一次要你牢记：别说知道，甚至不能让任何人对我有什么猜测，任何人都行。我过去和现在都没回来过。只能你一个人知道。眼下得靠你多少给我送点吃的。只要你把枪拿来，肉我能弄到，可面包用枪是打不着的。后天我还来，不过要晚一点。你也不要早来，别叫人盯上。现在你走吧，前后左右多留神，多留神。”

他语调平静，暖和过来以后的嗓音也柔和多了，但在他的话音中，还是能感觉到一种焦躁不安和一种自外于人的戒备。

“我暖和了，洗了澡，还有运气和自己老婆亲热了一回，该走啦。”

“你上哪儿去？”纳斯焦娜问。

他哼了一声，说：

“到哪儿去……走到哪儿……就算哪儿。找亲兄弟去，找大灰狼去。那就后天见了，你不会忘吧？”

“忘不了。”

“你就在这儿等我，到时候再合计下一步。就这样，我走啦。你再呆一会儿，别马上出去。”

他把短皮大衣抻得沙沙响，不吭声了。

“我能活着回来，你总该高兴吧？”他站在门口，突然发问。

“高兴。”

“这么说，你还没有忘记我是你的什么人。”

“没忘。”

“是什么人。”

“丈夫。”

“对，是丈夫。”他加重语气地肯定一遍，就出去了。

懵里懵懂的纳斯焦娜忽然似有所悟：是丈夫吗？刚才和她在一起的，该不是个会变的怪物吧？黑暗中怎么能看得准。听说有一种怪物变成谁就像谁，大白天也辨不出真假。她不会正确地画十字，就随便地横竖划了两下，又小声念起祷文。这是小时候念过的，早忘了，现在却突然想起来了。心想：他要真是个会变的妖怪，不是更好吗？接着她就被自己这有违贞节的念头惊呆了。

四

安德烈清楚：命运已经把他推进了死胡同。现在还没有撞到墙，前面还有一点路，但是，很明显，这路是不长的。退回去，已经不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退路已断，安德烈也就用不

着费心思去多想了。现在惟一可行的活法是：听天由命。

回到故乡后，在最初的日子里，使他不得安宁的是对三年半以前，从这里出发上前线的情景的不尽回忆。从得知战争爆发，到在伊尔库茨克组建师团，两个星期内的幕幕情景清晰、逼真地浮现在眼前，好像刚刚发生，宛如昨日，甚至当时内心感受也记忆犹新，而现在似乎又在重新体验：和当初一样，他也感到惘然若失，吉凶莫测，没有保障，还有叫人发冷的、阴森的恐惧，许许多多的感受，甚至一些偶然的情绪，都同那时一样。最大的不同是：一切都倒了一个个儿，事实也确实如此。现在他就站在当年出发踏上征途的地方。不过那时是在安加拉河右岸，现在他站在左岸；当时是盛夏，现在是隆冬；那回是出发参战，这回是返回故里；当年是和很多人同行，现在却是只身返回。命运耍了一个坏透了的把戏，颠倒了一切，又把他送回了原地。同当年一样，死神还是清清楚楚地站在他的身边。只是为了保险，不让他跑掉，这次是从他身后逼上来的。他现在也正是在蛰居中走向死亡。不可能知道下一步会迈向哪里。看来，对这一段生活不会有什么回忆了。

安德烈和阿塔曼诺夫卡村其他六个首批应征入伍的农民一起，分乘五辆马车离开村子。送行的人，几乎和上前线的人一样多。但安德烈在家里就和亲人告别了。何必拖长临别的哭泣，多流一些眼泪，叫人心碎呢。反正是要扯断的，就断个干脆。这回到时候（已经为期不远啦）他也会同样干脆地断了自己的性命，而决不抱什么不可靠的指望。在大门口，他拥抱了父亲、母亲和纳斯焦娜，跳上车，便催马上路了。他强忍着，没有回头，直到过了围栏牧场，阿塔曼诺夫卡村已消失到视野之外，他才勒住马缰，等其他人赶上来，以便结队前行。

在卡尔达村，他们正赶上轮船航班，坐上它，去了区中心。

一天后，这艘船再回程载着从全区集中起来的队伍，驰向伊尔库茨克。大清早，轮船要经过阿塔曼诺夫卡村。他们没有睡，等着它出现。从老远就你一声、我一嗓地喊叫起来，主要的是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喊。只有安德烈一声不吭，满脸怒容地望着自己的村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宁愿责怪这个小村子，而不是战争使他被迫离开。几个男人总算没有白喊：一些人出现在岸边的陡坡上，也用喊声回答他们，挥动着头巾、帽子。可惜轮船离岸太远，看不清，也听不准，认不出是谁。安德烈觉得，在这些人当中，他好像看见了纳斯焦娜。他还不能十分肯定就是她，却很生气：干吗，干吗要凑这种谁也不需要的热闹？告别了，彼此该说的都说了——这就够了，战争你是绕不过去的。如果安德烈知道被他当成纳斯焦娜的那个身影真就是纳斯焦娜本人的话，他也许会轻松些。他的怒气正是来自不能肯定那就是她。他下意识地怨恨这里留下的一切；正是这里的一切，使他得离开，得去打仗。这种怨恨很久都没有消散，并且引发了他当时发出的，这些年来一直记在心里的誓言，这次是无意中履行了这个誓言。当然，他不是为了这个才回来的。不是的，但是，这个如今已经实现了的誓言，从开始到现在都不是空话，它隐含着一种神奇而又实实在在的力量，在他古西科夫各种遭遇中一直在帮助他。

轮船逆流而上，走了三昼夜。船上的人，像一群乌合之众，沉溺于喧闹的、苦涩的欢乐中，都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不受约束、也没有危险的日子。安德烈却孤僻独处，没有合群，他还没有养成酗酒的癖好。一个人久久地呆在船舷上，凭栏凝望。时值盛夏，几天来阳光灿烂，安加拉河白浪翻腾，它们的轰响在空中回荡。熟悉的河岸，村庄和岛屿顺流而过，渐渐地消失在远处。一想到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看见眼前的一切，古西科夫觉得心在颤抖。也许下到舱里去，和自己人凑在一起会好些——

烦闷的并不是他一个人，或者脑袋下放个口袋，躺下睡一大觉，在昏睡中忘掉一切，直到听见起床口令。但是他没有走开，继续站在原地凝望、思索、苦闷，用痛苦这个刑具折磨自己的心灵，同时又可怜自己。他凝望的时间越长，就越清楚、真切地觉察到安加拉河平静如常地流淌着，对他漠不关心，两岸也是冷漠无情地从他身边滑过，对他毫不理会。他所有的年华都是在这岸边度过的呀！可是它们竟这样冷淡地溜走，投向另一种生活，另外的人们和那行将顶替他的一切。他感到委屈：怎么能这么快？我还没离开，没走远，就把我做过的，还准备做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彻底埋葬，好像在说，走开，去死吧！对于我们，你是一个没有救的人。难道就真的没有救了吗？他不服气，带着一股恶狠狠的拗劲，大声发誓：

“你们瞎说，我能活下来，你们埋得太早啦，我会活下来，你们挡不住，你们等着瞧吧。”

可是到了前线，他放弃了这个期望。初战他就负了伤，幸好不重，子弹只是打穿了左腿的肌肉。一个月后，他就一瘸一拐地归队了。当时，存有生还的念头是毫无意义的。并非他一个人把这种念头置之脑后，以致对自己也不是总能说清，是否有那种比登天还难做到的，在弹雨中保住自己的念头。看着那么多人在身边死去，就想到自己也难免一死，不在今天，就在明天，不在明天，就在后天，总会轮到他的。在这里，在战场上，谁要碰巧过上几天安宁的日子，就好像得到终生的安宁了。不能想象，安宁的生活，能像树木、山石那样，年复一年地延续几十年。在战场上，时间是按另外的尺度来计量的。

那次轻伤之后，安德烈·古西科夫一直都很走运。只是有一次，在这次离开前线之前，在敌机轰炸中，他隐避不及，严重震伤。爆炸的气浪冲击使他失去了听力。几乎一个星期什么也听

不见。后来才慢慢地能听到声音。这次震伤给他留下了可笑的，也是叫人懊丧的回忆。因耳聋住在行军医院期间，他的食欲大增，像个怎么也吃不饱的野兽，每时每刻都想吃，为了寻找可吃的东西，他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不愉快。他听不见自己的动静，就以为别人也听不见。所以，他每次溜进厨房找吃的时候，都露出马脚。他央告人家多给一份饭菜，那些快要康复的伤员就故意逗他，拿他开心，而他只是一个劲地眨巴眼睛。

三年中，古西科夫先后在滑雪营、侦察连、榴弹炮连战斗过。他什么都经历过：跟随坦克冲锋、猛扑敌人机枪火力点、滑雪夜袭，以及使人身心疲惫，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抓“舌头”。起初，古西科夫不会，也不可能打仗。他很羡慕那些上阵如上班那样从容、镇静的人。他自己也尽最大努力适应了战争，别无选择呀。他没有冲在别人前面，也不曾故意躲在别人背后。“这是自己人”，战士一见着他，就会这样说。在“搜索”行动中，当搜捕小组五六个人扑向德军堑壕时，不能有半点含糊，不成功便成仁，稍有怯懦、畏缩，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大家。在侦察员当中，古西科夫被认为是可靠的伙伴。连那些最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们也都愿意和他结对，以便相互掩护。总之，他和大家一样，不比别人更好，但也不比别人差。战友们都佩服他力大无比，他粗壮、结实。每次都是他把被打昏的，或者被封住嘴的“舌头”往背上一搁，快步地扛回自己的掩体。

在滑雪营时，他活动于莫斯科近郊。春天，在斯摩棱斯克他进了侦察连。被派到榴弹炮连是在斯大林格勒，在震伤以后。这时已转入进攻，又转到远程炮兵部队中，危险小了些。

一九四三年入冬前，战争的结局已清晰在望。战争越临近终点，人们对能够保全自己所抱的希望也越大。这种希望已不再是羞怯的、隐秘的，而是公开的，并使人心烦意乱。他们这些

战争一开始就参战的人，经历了多少次出生入死，都挺过来了。因此，他们乐意相信：既然能活到现在，理应受到命运的赦免，死亡应该远离他们。在战争中仿佛是有这么一个性命考验期，活过了这个考验期，就可以活下去。心情轻松愉快时，古西科夫就深信自己能走运，不会再出什么事，就像目前这样，不再受伤，悄悄地、平稳地熬到历经艰险、付出十倍代价才得来的那一天——宣布战争胜利，送他们各自回家。但是，这种令人幸福愉快的时刻一过，恐惧就悄悄地逼来：成千上万个怀着和他同样希望的人，一天一天地在他眼前牺牲了，他明白了，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也还会有人牺牲。他该怎么办呢，怎么能保证不轮上现在活着的人，他自己和别人呢？能指望什么呢？在这种恐怖心态控制下，他看不到侥幸保全自己的可能，于是小心翼翼地想让自己负伤，当然是轻伤，不伤着要害——只要能挨过这段时间就行。

一九四四年夏季的一天，炮兵连套上炮衣，马上就要转移时，一群德军坦克突然冲到眼前。这次古西科夫伤得着实不轻，一天一夜不省人事。但当他苏醒过来，确信自己还能活下去时，便自己安慰自己：好啦，我的仗打完啦，现在让别人去打吧，他已经打够了，他该受的那份罪都受过了。他的伤不会很快治好，等他完全康复，也该放他回家了。行啦，不管好歹，总算保全下来了。

安德烈·古西科夫在新西伯利亚部队医院里躺了近三个月，为了取出弹片，胸部开过两次刀，伤口很长时间不愈合，长不好。家里人支助他，给他寄来一个包裹，接着又寄来一个。纳斯焦娜恳求让她去医院，可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化路费来一趟，反正他自己很快就能回去。同病房的伤员也都支持他的想法。因为伤员们预先都知道：谁出院后可以复员回家，谁可以短期休假，谁得立即返回前线。他们给古西科夫断定：“会给你十天假，不会

再少。”你们等着吧，纳斯焦娜，等着吧！他不能相信，从前竟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抱怨她。对他来说，世界上没有比纳斯焦娜更好的老婆了。回家以后，他们要开始新的生活，谁也想象不出他们会多么美好。战后，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另一个人间，另一个世界，而他们俩人面前更是这样。战前，他们一起生活，但不懂得相互珍惜、相互珍爱，怎么可以这样？！

他朝思暮盼，焦急地等着出院，为此，他几乎想用舌头去舔好自己的伤口。可是到了十一月，他真的要出院了，听到的却是一声晴天霹雳：回部队去！不是回家，而是回部队。他一下子全懵了。他坚信是能回趟家的，于是断定是搞错了，便挨个去找医生。他论争、发火、喊叫，这些医生们都不听，只有一句话——你可以打仗。帮他揸一揸身上的军装，把士兵身份证和口粮供应证塞到他手里，就送他出院了。走吧！安德烈·古西科夫，去追自己的炮兵连吧，战争还没结束哪。

战争在继续。

他害怕去前线，比这种害怕更强烈的是怨恨和气愤：不让他回家看看，就送回前线。他的全部身心、每一滴血、每一丝思绪都准备好要和亲人——和父亲、和母亲、和纳斯焦娜团聚。他赖以生存、康复，甚至呼吸的都是团聚，他所思所想的只有这个团聚。在飞奔中绝不可向后急转——那会摔得粉身碎骨的。人是不能从自己身上跳过去的。已经到了家门口，到了西伯利亚，怎么能就这样就回部队，又重新回到枪林弹雨中去送死呢？！难道这是正确、公平的吗？能让他在家里哪怕只呆上一天，松松心，再叫他去干什么都行。

还不让纳斯焦娜来呢，这不是傻蛋吗！早知道会是这样，约她这时候来一趟，见一面，心情也会轻松些。她可以给他送行，而有人送行，那就保险多啦。出门远行时，命运的眼睛会记住有

没有你注定要回到他身边的人。可是,现在事事处处都像是同他作对,一切都和他想的相反。照这样下去,他是活不成了,第一仗就得被撂倒。

他觉得医院的长官就像天国的暴君,凡人不能改变他的旨意,就像不能叫风暴停息、冰雹不落一样。至高无上的天主随便做出的决定,别人就得服从。可他是个活人啊,为什么不能替他想想。是啊,谁也没有向他做过许诺,是他自己哄骗了自己。可是,确实有人被放回家了,放回去了。他亲眼看见,准确地知道有人已经放回去了——叫他怎么能不感到失望呢?!

莫非就真的回部队去?离家这么近,等于就在身边啦。管他哪,回家!自己把被人剥夺的再夺回来。以前也有人擅自行动,他听人说过,也没咋样就过去了。他怎么就不能离队?不能离队!可他眼前就是路。他也不是铁打的,仗已经打了三年多,总得有个完啊!

在车站,他放过了一辆又一辆列车,心里很乱,不知如何是好。由于迟疑不决,白白浪费了时间,就更加烦躁。拿着粮卡排队打饭时,他和一个矮小、快活的坦克兵聊起来。这个坦克兵带着盔形帽,弯曲的右腿被厚厚地裹缠着,拄着双拐,是向东,到赤塔去的。

“你去哪儿?”他问安德烈。

安德烈出乎意外地回答说:

“伊尔库茨克。”

“咱们一块走吧。”坦克兵高兴起来。

就这样,在列车开动前的最后一分钟,安德烈把新结识的伙伴扶上车,自己也紧跟着跳上了东去的列车——豁出去了。如果被抓住,就说只想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过了那儿,再说去伊尔库茨克。他决定两三天就返回——没什么可怕的,没事儿。

可有时，一想到自己这是干越轨的事，甚至希望被抓住，被带回部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反而很走运，谁也没拦他。车上人多，很挤，大多是些不好接近的，有点蛮横的军人。

但是，在车上坐了三个多昼夜，到了伊尔库茨克之后，安德烈真的惶恐不安了。继续往前走，一天不够，两天也不一定够——正是冬天啊。半路返回吧，那当初又何必呢，遭这份罪，冒这份险，不顾一切，只是想向谁证明什么吗？再说现在回部队去，是不是也太晚了？他想起一次当众枪毙处决的情景。是在一九四二年春天，他刚到侦察连的时候，在一片宽阔的、广场一样的林中空地上，全团集合以后，押出两个人来：一个四十岁左右，吊着一只胳膊，这是他故意用枪自伤的；另一个年纪很小，还是个孩子，他也是想跑回家去，他家就在五十俄里以外的村子里。只有五十多俄里，而他安德烈是从多远逃回来的呀！不，不会饶过他的，不会只送惩戒营就完事的。他已经不是孩子啦，应该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他还想起在场的士兵们是怎样用憎恨、厌恶的目光看着那个自伤的人。对那个小伙子大家都很怜惜，可对他，是绝不会的。人们只会像当时那样说：“自私鬼！真是个自私鬼！耍花招，想骗过大家！”

他古西科夫哪点比别人强？为什么别人得去打仗，而他就可以闲逛呢？人们会这样议论，这也会是指责他的理由。打仗的时候，人是不能我行我素的，而他却擅自行动。很清楚，为此他是不会受到夸奖的。

安德烈不知所措地在车站上徘徊时，碰到了个双眼凸出的，像是很能钻营的老太婆，她答应安德烈去她家里留宿，把他带到离城很远的郊区。没有任何提示，她就猜到这个当兵的正愁没地方落脚呢。第二天清早，老太婆还把他带到一个哑巴女

人那里,名字叫塔尼娅。这个哑巴已不年轻,但整洁、利落。在塔尼亚家里,他伴着恐惧的心情,呆坐了一整天,可心里总想站起来,走到别处去。他又这样坐过了第二天。然后决定干脆住下来,他想最好还是在这里多呆些日子,直到家里和部队都完全断定他已失踪。

哑巴女人在城郊边上有一间小屋。她在一所军医院当清洁工,每天去两次,早晚各一次。下班回来时,她用块布裹着几片面包,用玻璃罐盛些粥或是汤,随身带回。还有一点很好,无须对她做任何解释,也根本用不着交谈。这个被上帝剥夺了说话权利的女人,好像是专门为他安排在这里的,真是太方便,太合适了。他甚至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每当心神恍惚时,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和怎么到了这里,不明白是什么把他引到这里来的。然后又突然真切地看见自己走向列车的每一步和在车厢里坐着的每一个小时。这些情景抓挠着他的心,使他心碎。他总是不能从所发生的一切中清醒过来,满脸木呆、眼睛盯在一处,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时而又突然起身,大步走动,借以驱除在心中积郁的痛苦。小屋被他的沉重脚步震得微微颤动,可他怎么也不能安静下来,从一个角落向另一个角落走个不停。与此同时,他开始讨厌,甚至怨恨自己,因为他很清楚,在目前这种处境中,不会没有麻烦的。

于是这种感觉,确切地说是自我感觉,这种对待自己的态度久久地困扰着他。

塔尼娅是个少有的温柔,能体贴人的女人。她一点也不因为自己是个哑巴而苦恼,既不怨恨,也不疏远别人。住进来以后,古西科夫从未看见她愁眉苦脸,或者对什么感到不满。虽然她脸上的表情不总是开朗、快活,但安详和善,好像随时都准备露出笑容。哑症对她似乎不是一种惩罚,倒是减轻了她的负担。

从一开始，古西科夫就觉得，塔尼娅知道他的全部底细。她了解他，怜悯他。正如他想象的那样，他住在塔尼娅这里，不是按他自己的意愿，而是一只控制他的铁腕把他引到这里来的。这是为了帮助他，还是想悄悄地、慢慢地毁掉他？

塔尼娅每天下班回到家，就从手袋里掏出各种小罐、小包儿，摆好，自己坐在安德烈对面，专心、好奇又很惬意地看着他吃她带回的东西。吃饱以后，安德烈像对男人那样，拍拍她的肩膀，表示感谢。就是这种不太文雅的爱抚也使塔尼娅感到幸福，受宠若惊，她抓起安德烈的双手，紧贴在自己的脸上，接着又打起手势，而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她一着急，手势打得更快——可是他只摇摇头，转过脸去。为了不使他烦，她不再比画，放弃了对他说点什么的念头，并歉疚地把手伸给他。

渐渐地，塔尼娅还是教会了安德烈明白她的许多手语。她是怀着人们教孩子说话时那种爱心和耐心教他的。但哑人的手语他看着不舒服，他尽量少去看它们。他不想在这里久留。夜里，每当塔尼娅紧紧偎依着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真切地听到了塔尼娅的微弱，催促的絮语——所有女人在这种情况下都说的那些话。于是他屏息细听，结果相信是自己搞错了。但是却怎么也摆脱不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塔尼娅不是哑巴，那是她装的。

可是他现在是什么人，这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的一切都移了位，倒了个，都悬空了。只想回去几天——结果是陷在这里。想的是纳斯焦娜，却呆在塔尼娅这儿。其他的事他根本不敢往下想。吃不了只好自己兜着走，后悔也来不及了。

一个月以后，他再也呆不下去了。即使去死，也得走。一天晚上，趁塔尼娅还在医院清扫，他逃离了她。如今回头路已绝，只剩一条路——回家。

离开伊尔库茨克以后，他不得不时时处处倍加小心。大白

天无论如何不能在村子里露面，随时都可能碰上什么人。他或是藏在远离村落的窝棚里，或者躲在猎人过冬的屋里，或者钻进干草垛，眼睛盯着外面，每个人影都能吓他一跳。他冻得四肢发僵，一会暗中骂娘，一会又骂自己。夜里，一切都寂静下来，他便放开脚步快走。幸好是冬天，白天很短，一晃就过去了。

在一个严寒的冬夜，他终于勉强地走到了阿塔曼诺夫卡村。他在村边的高坡停下，用因雪光的刺激而极度疲惫的目光，扫了一下分列两排的白色屋顶。回到了家乡，见到了自己的村子，他竟没有任何感触——他已不能体验情感了。站了一会，他下坡走向安加拉河，直到从陡岸下面已经看不见村子了，才踏着冰面，蹒跚地走到自家的浴室。进屋后，刚掩上门，他就仰面朝天地倒在地板上，像个死人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

天亮前，他拖着无力的双腿艰难地向安加拉河对岸走去，肩上搭着滑雪板，腰里别着一把斧子。

在安德烈耶夫地段，靠近一条小河汊，有一间很破旧的猎人过冬的房子，安德烈·古西科夫在这里隐藏下来。他好不容易生着了很久没人动过的火炉，用军用水壶烧了开水。这些日子，他过的是野狼般的生活，今天才头一次可以暖和暖和身子。半个小时之后，他忽然剧烈地哆嗦起来，四肢、全身都抖个不停——不知是长久冰冷的身体突然受热过多，还是长期紧张的神经突然放松的缘故；他一路都盼望着，什么时候能放松一下，不用每时每刻都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能够好好地歇一歇。

早在伊尔库茨克，当他盘算要在阿塔曼诺夫卡附近找个落脚的地方时，他选中的正是这间过冬房。它的地势再好不过了，隐在拐向山后的一条深谷里，就是昼夜都生火，外面也见不到烟。另外，没几步远就是一条河汊，踩冰往返，不会留下脚印。

没有法子，现在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个。要图方便，当然是安加拉河对岸。这里，过去就很少有人来，如今更不会有人钻进来。连看浮标的人，在这岛外也没事可干。过往的轮船都是在靠近右岸那条宽河道上行驶的。

阿塔曼诺夫卡村的耕地和牧场自古就分布在村子这一边，并且绰绰有余。打猎、捕鱼，其他的副业也都在本村这一侧进行，靠近勒拿河一带，无论是猎物，还是坚果、浆果都数这里多，因此很少有人到对岸去。和村子隔水相望的岛上，倒是常有人去割草，顺便也采些野果，那岛也就被叫作“割草岛”了。

还在日俄战争以前，移民安德烈·西维带着两个儿子从拉塞雅来到阿塔曼诺夫卡村。他四出察看一番，令村里人吃惊的是，他竟然在安加拉河对岸给自己选了一块创业之地。和大家一样，他把房子盖在村里，但在对岸开荒种地。他无须过多地砍伐挖根，光是容易开垦的林间空地就够他种的了。他用原木搭了两间过冬的小屋，一间在河边，挨着草地，另一间搭在陡峭的山岗上，离第一间大约有两公里。他就这样经营起自己的家业，并且经营有方。

从那时候起，这一片就按着安德烈·西维的名字，被称之为安德烈耶夫地带了。

安德烈·西维本人，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前夕就去世了。一个儿子没能从对德战争^①中回来。另一个儿子在三十年代清除富农期间，和全家一起被赶到外地去了。这样，安德烈·西维就没能在这块新土地上扎下根。

他开出来的地，可想而知，被集体农庄撂荒了。为了几公顷地，值得在春、夏、秋三季都派人，带上工具、用品，去那么远的地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方吗？值得把播种机、收割机运过河到对岸去吗？又值得为此设一个渡口吗？说真的，这值得吗？

因此，安德烈·古西科夫应该感谢那位移民安德烈·西维给他留下了这么一个各方面都很方便，同时又安全的藏身之所。

如果他要是呆下去的话，在低处这个过冬房里，只能住到春末，以后，就得搬到高岗上那间去，以防有打渔的，或者其他什么人，心血来潮拐到这里看看。

于是，他决定明天就到高岗上那间过冬屋去一趟，看看情况。有滑雪板，他可以沿着小河汊一直往前，然后滑雪绕个弯，从另一侧进去。要想活下去，就得想法安排一下，看看有什么，能靠什么开始新的生活。有杆猎枪就好啦。得去找纳斯焦娜，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找。光靠自己，他是活不下去的。

他没精打采地想好了这一切，身体颤抖得不那么厉害了。他给炉子添了柴，就一头倒在板床上，一天一夜没醒过，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

五

傍晚，村里开会认购公债，今年比往年认购得早。纳斯焦娜很气魄地一下子认购了两千卢布。村里只有会计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报的接近这个数。大家都知道，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有钱。人们都叫他英诺肯季·卡尔曼诺维奇^①。可是纳斯焦娜上哪儿和用什么办法去弄这么多钱，连她自己也没想过。米赫伊奇不舒服，也许是托病，没去开会，纳斯焦娜就去了。这次会

^① “卡尔曼”在俄语中为有钱的意思。

的内容，事先也没有讲。会上她愣头愣脑地开口就说：“好，就认这个数。”特派员夸奖了她，可是大家都惊讶，纳斯焦娜也为自己的勇气感到吃惊。可是，话不是麻雀，飞出去了，是抓不回来的。想退也来不及了。她内心有一个理解她心情的声音在安慰她，说她做得对。既然她能这样报了，肯定是有什麼缘由促使她，这不是随便做出来的。也许，她是想用公债券来为自己丈夫赎罪……，她当时或许并没想到安德烈，一定是别的什么人替她想到了。

她回到家里，刚说起公债的事，米赫伊奇立刻问她：

“你报了多少？”

“两千。”

米赫伊奇正坐在板凳上，低着头修理什么东西，听到这话，他抬起头，很不相信地问道：

“你说什么，丫头，你跟我讲笑话？”

“哪能讲这样的笑话……”

“那你是不是疯了？也许你有这么多钱？藏着私房钱？”

“没有。”

“你这次是怎么想的？你打算到哪里去凑这么多钱？也许你是想用我，或者把她去换几个钱吧？”他向躺在火炕上的谢苗诺夫娜摆一下头，“可是谁也不会白花钱要我们。”

“他们说，这是最后一次，为了争取胜利。”

“为了胜利……”

谢苗诺夫娜在炕上挪动了一下，抬起头，问道：

“啥？她说啥？”

“她说，我们大富啦，有很多钱，都不知道怎么花了。”

纳斯焦娜回到用花布拉帘隔起来的自己那半边屋。原来她和安德烈就睡在这里，现在她的床还没动。她知道，米赫伊奇有

火时也能发一通，但是发着发着自己就会平息下来。可是，婆婆发起议论来，就没完没了啦，有的事可以连着唠叨个把月，甚至更长时间。就这样啦！反正我会付清这笔钱的，过后总会想出办法的。何况认购会这也是最后一次。

再说，凭着这次认购，她得到了明天去卡尔达村的权利。认购的这两千卢布成了她手中的王牌。若是不报这两千，那她什么也不可能得到。

这一切她盘算对啦。会后，她看出农庄主席对这次认购很满意，没有办糟，超额完成了下达的指标，于是就以会议中心人物的姿态，走到他跟前，笑嘻嘻地问道：

“涅斯托尔·伊里伊奇，”为了讨他欢喜，她特意把他的父称也加上了，“明天派谁送特派员回卡尔达村？”

涅斯托尔狡猾地眯起眼睛看了看她，就喊起来：

“特派员同志，喂，特派员同志！我们今天的这位突击手表示愿意明天和你一起到卡尔达村走一趟，你看怎么样，不反对吧？”

特派员走过来，这是一个神形虚衰，头发打绺的男人，他盯着纳斯焦娜的眼睛，故做亲昵地说：

“有哪个男人会反对呢？我做梦都没敢想过，会有这么漂亮的人送我。”

涅斯托尔像对哥们儿似的，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只是事后你得放她回来，”他冲着纳斯焦娜挤挤眼，“不要留她太久，我们这儿本来干活的人手就不够！”

明天她就能去卡尔达村了。这件事还得告诉米赫伊奇，还是明天早上说比较好，今天两千卢布的事，已经够他受的了。天晓得，她往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啊？公公会对她怎么样，会怎么样？

……在和安德烈第一次见面时约定的那天夜里，纳斯焦娜就把猎枪交给了他。她找到了几个弹壳，可是米赫伊奇没有枪药了，她好不容易才凑了一些，只够装两三发。这当然太少，安德烈也是这么说。可是她不敢到村里去找，人们会告诉公公，会惊扰他的。村子小，昨天谁到谁那儿抓把盐，有谁在自家开炉前向谁家借过面包，大家都知道。再说，纳斯焦娜已经背着公公，从仓房的墙上摘走了用衣服裹着的猎枪，他一旦发现，追问起来，不知会怎么样呢，对此，眼下她不愿意去想。

安德烈这次在浴室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没有再吓唬她，听到声响也不再发抖了，默默地坐在那里，忧伤、抑郁，什么也说不出来。她非常可怜他，差点没大哭起来。临走时，他坦诚地请求：

“你一定要抽空到我那儿去，到老安德烈在山下那座过冬房去，我就在那儿。”他话音颤抖，“你一定要来，纳斯焦娜，我等你，不过，连狗也不能让有一条看见你。”

为了送特派员，让她使农庄主席涅斯托尔自己用的那匹好马卡尔卡。纳斯焦娜把它套上农庄主席的带后座的大雪橇，在上面铺了些干草，赶着卡尔卡，向涅斯托尔的房子走去，昨晚特派员就在那儿歇夜。到了那里，他们刚开始喝早茶。于是，纳斯焦娜就调转马头，驾着雪橇回家了，她想先收拾好，走前就不用再绕回来了。

清晨，起床后，对纳斯焦娜能得到这次出门的差事，米赫伊奇似乎很高兴。家里煤油没有啦。已有两次，他把自己管的马厩里的煤油倒出一些，装在小玻璃瓶里带回家。纳斯焦娜甚至端着灯找纳季卡要过煤油。火柴也得买了，盐也快用完了，还希望能弄点肥皂，但希望不大，好久没见到肥皂了，大家洗衣服都

用碱。自打二〇年，游击队员加夫里拉·阿法纳西耶维奇把开小铺的女商贩西玛塞进冰窟窿淹死后，在阿塔曼诺夫卡村就连个小钉子也买不到了。无论什么东西，哪怕是很普通的日用品，都得到卡尔达村去买。

特别对她心思的是，米赫伊奇还关照她说：

“丫头，你到猎具店去看看，有没有火药和铅砂。虽说很久没打猎了，但还是需要有点备用的，开春说不定会有孢子钻到菜园里。”

他又从小仓室里拿出装煤油用的铁罐，把自己那件两面都是毛皮的狗皮袄放在纳斯焦娜的跟前，让她带上。

“今天能赶回来吗？”

“说不好，不知道商店……我会尽量往回赶。”

“不用，不用赶，今天来不及，那就明天回来吧。”最后还是忍不住，他又提起公债的事，“昨天你怎么不一大早就跑到别处去呢？那样就不会把两千卢布的债系到我的脖子上了。还是开玩笑吗？嗯？你怎么不吭声，丫头？昨天你最好不说话，或说一半就把舌头缩回去，今天还有个商量。算了，走吧！老天爷保佑，走吧！顺路到村苏维埃去打听一下，有没有安德烈的消息，再去邮局看看，也许会有信或通知单什么的。”

这时，谢苗诺夫娜在炉炕上嘟哝起来：

“要是我，说什么也不会根（跟）一个男人出门瞎跑，唤（还）是在这种年头，更不行。噢！我的向（上）帝啊，不知道跟谁撒娇去呢。”谢苗诺夫娜的舌头是按自己的方式转动的，“要知道，他不会一路向（上）都坐在后边的，他会根（跟）她秋（凑）到一块去的。”

“好啦，好啦，老太婆，别胡思乱想啦。”米赫伊奇打住了她的话，“你躺着，就好好躺着你的，别信口开河，可找到让你担心的

人啦，对纳斯焦娜都不放心了！”

米赫伊奇是个好心肠的人。要不是他，纳斯焦娜这几年就更难了。谢苗诺夫娜一心想把她死死地拴住，除了上工和家务，不许她轻易走出家门一步。其实，在村里能看得上谁呢？全村只剩下一个壮年男子涅斯托尔，是因为有癫痫病未上前线。就是他，也被老婆用四只眼盯着，用六只手管着。米赫伊奇亲自把纳斯焦娜送出院门。“去吧，去吧，丫头，到小姐妹们那里去坐坐，说说笑笑吧。你还年轻，干吗老是和我们这些老人闷在一起呀！”

米赫伊奇是个好心人。可是，看来很快就会和他有隔膜了。他一旦发现猎枪不见了，接着又丢了这、少了那，他就会追问，而纳斯焦娜什么也答不上来，——都推到小偷头上是不行的，张扬出去，人们会议论纷纷、刨根问底、设法追查。更糟的是，有人会有意无意地推测，为什么小偷只偷古西科夫家的东西？会不会是家里人拿去用了？只有自己家里人才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向父亲稍稍暗示一下，安德烈都不准，纳斯焦娜只得自己想法对付。谢苗诺夫娜这几天又发现丢了面包，那是纳斯焦娜和安德烈第二次见面时带去的，只好扯谎说是纳季卡借去了。以后怎么应付？

所以，卡尔达村纳斯焦娜是非去不可。她随身带的包袱里有一件毛线衣，还有一条灰色披肩，很珍贵、漂亮，奥伦堡出品的，这是婚后第一年安德烈给她买的，今天带上，准备用它们去换面粉。万一毛线衣没人看得上，就把披肩拿出来。她已经给安德烈拿去了一桶土豆，而面粉她没敢动，木柜里只剩两盒面了。丈夫要是有了面，就好多了，可以烙些饼，慢慢吃。纳斯焦娜要装成是替疏散到这里来的玛鲁霞换东西。卡尔达是大村子，容易蒙混过去。正好，纳斯焦娜这件毛线衣就是去年冬天从

玛鲁霞那儿换来的。因此，她是替玛鲁霞换，还是为自己，很难搞清楚。何况卡尔达村的人都知道，玛鲁霞和她的孩子就是靠些破旧衣服打发这战争年月。

纳斯焦娜和特派员出发时，清晨已过，太阳裹着霞光已经高高升起。受洗节之后，严寒渐退，早晨还是很凉，但是天气晴朗，凉而不寒，可以感到白天会更暖和。一出村，卡尔卡就轻快地小跑起来，雪橇在压平的雪道上，如同在冰上滑行。雪橇的滑木欢快地轧轧作响。从积雪覆盖的田野上，升腾起淡蓝色的雾气。其中隐约地晃动着淡白色的丝带。几只乌鸦默默地趴在光秃的白桦树上，像母鸡那样，摊开翅膀用尖嘴反复清理。周围的一切，都被晒得暖和过来，正贪婪而又轻松地呼吸。春天到来之前，还有很长，很长一段时光。但春意已经显现，昭示人们春天是一定要来的。

纳斯焦娜把皮袄扔给特派员，让他盖上脚，自己脸朝前跪着赶马。马蹄扬起的雪花扑到她的脸上，她只是眯起眼睛，没有转头躲闪。这扯着疾风的飞驰，这大大早于节气，似乎专门为她而来的春意跃动的日子，使她振奋、急不可耐，渴望去做点既不合众望，自己也认为不该做的事。她像只母鸡，在鸡笼里关得太久啦，够啦，前进，纳斯焦娜！别害怕，纳斯焦娜，前进！现在你的快乐会是特别的，你的忧愁也与众不同。你可不要胆怯：快赶啊！飞奔吧！别回头！

特派员没话找话，说个没完，纳斯焦娜待搭不理地应他几句。有些男人看上去似乎像人样，实际上，除了男人那点邪念，一点男子气都没有。特派员就是这样的人。他只配给娘儿们登记登记公债，说起话来，全是哭腔。那张脸像块洗碎了的破布。这辈子洗过多少次脸，就留下多少个洞，满脸都是坑坑洼洼的。

穿过原野，越过河流，路两旁出现了古老的云杉林。周围一

片死寂，没有一丝风，没有声响，只有卡尔卡的蹄踏声。两旁的尖树梢，缠连在路的上方，偶尔摆动几下，抖落下来的雪花散成白茫茫的烟雾——一派生机，仅此而已。

这时，特派员突然大胆地放肆起来。他坐着坐着，忽然从后面抱住纳斯焦娜的双腿拉向自己的怀里，同时，像猪见到美食那样，嘴里直哼哼。纳斯焦娜灵巧地转过身，一使劲就把他从雪橇上扔到雪地上——她自己也没想到能这样利索。卡尔卡受惊飞奔起来。纳斯焦娜没有管它。让特派员去活动活动筋骨，跑一跑，暖和一下身子吧。虽然她像干柴一样守了三年半的活寡，但从来是不会看上这种人的。何况，她现在身边有丈夫，特派员这号人没法和他相比，他总会给她些爱抚。

特派员张大嘴，倒着气，很吃力地追了上来，而他并没有清醒过来，还以为纳斯焦娜的反抗是同他开玩笑，又挤到纳斯焦娜的身边。纳斯焦娜只好严厉地制止他。他惶恐地眨巴几下眼儿，不吭声了。过了半小时，他似乎转过向来，开始夸起他老婆，又谈到孩子。纳斯焦娜这才放心——早这样，多好！于是抖缰催马，向前奔去。

天黑以前他们就赶到了卡尔达村。幸好商店还没有关门。这回运气不错：有煤油，更重要的是有火药——这下可以瞒过米赫伊奇了。她立刻想好了应付公公的借口：第一天没有煤油，只好等它运来。这个理由是无可反驳的。虽然肥皂没有买到，但火柴和盐都买到了。在商店里她又转了转，发现还有蜡烛，就买了五支。这些蜡烛不知是从哪个教堂里搞来的。纳斯焦娜从不记得乡供销社卖过蜡烛。可是这次像是预订的，就摆在那里，有的还正点着。这些蜡烛显然是陈年旧货，已经发黑，弯曲了。她准备把三支带回家，两支留给安德烈。必要时总得照个亮啊！有了烛光，他们下次见面会更欢快些。

俗话说得好：开头走运，事事走运。傍晚，纳斯焦娜很顺当地用毛衣换了半普特^①面粉，披肩根本就没用拿出来。这使她高兴得想夜里摸黑往回赶。感谢老天爷，后来改变了主意。夜里，她躺着，似睡非睡，隔着墙听着卡尔卡在嚼干草，冷得直抖动，不停地动腿踏蹄。她苦熬着，熬着，终于轻轻地爬起来，套上卡尔卡，往雪橇上放了够马一天吃的干草，没跟留她过夜的女房东——一个熟悉的士兵的妻子——打招呼，就悄悄地出发了。沉睡的村庄里没有一点声响，她穿过街道，狗都没有叫一声。

走过最后一排房，纳斯焦娜拨马向右，拐向安加拉河。而卡尔卡却不解地停住不走了：回家的路是一直走啊！纳斯焦娜气得狠抖一下缰绳。她又像昨天那样急不可耐起来。她浑身发抖，就像发疟疾。她恨不得跳下雪橇，在卡尔卡前面跑。快！快！她知道，过河面时不能催马，万一掉进冰缝，马腿就完了。可她还是使劲赶马，为的是在天亮前通过雷勃那亚村，不被人看见。剧烈的心跳，使她变态、失控，在当作铺垫的皮袄上蹦跳，来回扭动，使劲挥舞着缰绳，嘴里喊着一些难懂、可怕的话，再就是拚命地吆喝：快，快！……

快，再快！为了现在和未来的一切都要快！

冲过了雷勃那亚村以后，她才放松缰绳，让卡尔卡放慢了脚步。现在快到啦。方才的那股燥热一下子消退了，感到心里空荡荡的，胸里苦丝丝的，像是被烟呛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纳斯焦娜自己也不知道。

夜色更昏暗了，她知道，天快亮了。

她坐在雪橇上边走边想：这下可好，纳斯焦娜，你学会了扯谎、偷东西。这仅仅是开始，往后还不知会干出什么！但是她并

^① 普特，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 16.38 公斤。

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也不承认。她只想侧目旁观,看这一切最终会是怎样的结果。

她停住雪橇,牵着卡尔卡,踏着河面上新结的冰层,向直通河岸的山谷走去。这时天已经亮了。

六

“喏,你还好吗?”纳斯焦娜说着,略显拘板地笑了笑。

纳斯焦娜把雪橇停在河边,匆忙把马拴在橇辕上,悄悄走近过冬房。她来得突然,出其不意,安德烈正盖着短皮大衣蒙头大睡呢,他什么也没听见。直到纳斯焦娜打开门,他才像被一股气浪从铺板上掀起来似的,摇摇晃晃,半天站立不稳。他蓬头垢面,傻愣在纳斯焦娜面前,不能相信,这就是她。同时,在纳斯焦娜面前竟显得如此惊慌失态,使他有点厌恶和恼恨自己。

这回纳斯焦娜总算真正看清了安德烈的样子。还是那副骨骼显明,微向右斜的身材,还是那张宽而扁平的,亚洲人式的脸堂,短而上翘的鼻子,脸上的黑胡子长得很长,已经打绺,深陷的双眼机警地、挑衅似地盯着她。脖子上的喉结很尖,像只木梭,来回移动着。人是瘦多了,脸色不好,蜷缩着身子。但是,人并没有散架子,看上去筋骨结实,还有力气。谁要惹他,他还会大吼一声跃起来回击任何打击。这就是他,纳斯焦娜所熟悉、所亲近的人,可现在,总叫她感到陌生、难以捉摸,他已经不是她知道该说什么、问什么的那个人了,不是三年半以前她送走的那个人了。

“瞧。”纳斯焦娜歉疚地微笑着,又开口说,“我来看看你这儿怎么样。你别担心,没人看见我。我是从卡尔达村来的,来时你

还睡着呢。我给你带来点东西，你艰难的时候用。”

“现在我每天都很艰难。”这是他第一次应声。

他只穿着棉裤和毛线袜站在地上。这时纳斯焦娜才看见，他半边脸被冻伤，已结成黑斑。他渐渐地定住了神，把脚伸进毡靴，拨旺了炉火。纳斯焦娜转身向门走去，安德烈叫住了她：

“你去哪儿？”

“得把雪橇上的东西拿进来呀，会冻坏的。”

“那咱们一块儿去吧。”

他们只把煤油罐留在雪橇上，其他的都放到暖和的地方，然后把卡尔卡沿着河边赶到上游拐弯的地方，给它卸了套，喂上干草。他们默默地做着这一切，不说话，好像互不相识，只用“接着”、“递过来”这样一些最必需的话彼此应付着。纳斯焦娜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不知道说什么。至于安德烈，是因为惊慌失态而一直在恼恨自己呢，还是没有下决心立即去拉紧曾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但经过这几年不知是否还保存下来的那份情丝。

等他们把马安置好，屋里也暖和了。纳斯焦娜不得不脱掉外衣，她在铺着冷杉树枝的板铺上刚坐下，就又站起来，不，不能干坐着，要做点什么，使两个人都平静下来，哪怕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也能使两个人亲近起来。她走到门后放着杂物的地方，从皮袄里提起装着面粉的枕套，向他显摆：

“瞧，我在卡尔达村给你弄到些面粉，你可以烙饼啦。”

他只急匆匆地点了点头，算是回答。

“这是怎么啦？”纳斯焦娜很委屈地说，“你为什么对我这样？话也不说一句。可我深更半夜，一路飞跑赶到你这儿来，还以为你会高兴呢。也许，我还是回去的好？”

“我不放你走！”

从他那果断的、恶狠狠的、毫不掩饰的坚定口气中，纳斯焦

娜明白了，他不会让她走的，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的。她凑近安德烈身前，微微地抬起一只颤抖的手，像盲人那样摸摸索索触到他的头部。

安德烈脸色苍白，向她转过头来。

“你真的以为你来我不高兴吗？我高兴！太高兴了！只是不知道你是不是需要这种高兴，该不该表示出我的高兴。”

纳斯焦娜一头扎到他的怀里：

“天哪，你说些什么呀？我又不是外人，咱俩一起过了四年，这还不够吗？”

安德烈没有回答，只是抓住她的双手，然后又默默地放开了。但是纳斯焦娜已经看到，安德烈对她软下来了。他经不住纳斯焦娜的柔情，情不自禁地把头歪向耸起的右肩——这是只有她一个人懂得的征兆，表明这时的安德烈是温和的。从前，她一向就是根据这种征兆来判断安德烈的情绪的。只要他把头一歪，你想说什么就尽管说吧，笑吧，想怎么闹就怎么闹吧，一切他都会饶恕，而且还会陪着闹下去，轻易不肯罢休。不，原来的安德烈没有全变。她面对安德烈抿嘴微笑，带着这种寻求回应的微笑说道：

“要知道，今天我才第一次真正看清楚你，你留着胡子显得很怪。”

“怎么个怪法？”

“有点像……”她刚笑出声，就咬住嘴唇止住了，“像个树精^①，那天在浴室里，我弄不清是和你，还是和妖怪……我还想，一直为丈夫守着，守着，可一下子就和妖怪鬼混到一起了。”

“妖怪怎么样？”

^① 树精是斯拉夫民族传说中的林中妖怪。

“还可以，但不如自己丈夫好。”

“你真滑头，两边都不得罪，下次把剃刀带来，我要把这一脸乱麻刮掉。”

“为什么？”

“为了不像妖怪啊。”他话刚说出口，就变卦了。“要不，算了吧，不刮了，让它撅着吧，这样可以不像自己。像个妖怪更好。”

“天哪！我怎么没给自己的男人做点吃的，”纳斯焦娜忽然想到了，“来到这儿就说个没完。”她在熊熊的情欲中忘了，他们总共也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咳，婆娘嘛！日子久了没挨人收拾过就这样啦。”

安德烈定神看了她一眼，惊疑地哼了一声，问道：

“你是说，谁也没收拾过你？”

“是啊。”

“是不是很寂寞啦？”

“唉！没有人能开导开导我呀。好啦，你坐下，我就来。”

“起码得弄点茶吧。”他也想起来了。

“你弄吧，干么老站着，木头人似的。你这儿没有水还是怎么的？”

纳斯焦娜很喜欢能以女主人的身份指挥指挥安德烈，尽管时间不长。这在以前很难得，今后也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做到。她吩咐他往炉子里填柴，去河边打水。然后，她让安德烈看着她打开包袱，对着亮光拿出一大块黑麦面包和一大块猪油。这猪油是去年秋天谢苗诺夫娜藏起来，专门留给他安德烈的。那时他们正等待他回来休假。假没休成，为欢迎他回家而准备的東西，一直未动——按着老的迷信说法，若是用光了等人的东西，就等不到人了。差不多一个月以前，纳斯焦娜偶然发现了那块用破布包着的猪油，它被藏在仓房阁板上一个很深的角落里。

昨天出发前她切下半块,真是给谁保留的,谁就会用上。此外,大概在什么地方还藏着一个落满灰尘的大玻璃瓶,里面装着自家酿的白酒,也等着安德烈跨进父亲的家门坎呢。那个时刻一到,全家就要为他这个盼望已久的人举杯啦。

那还是在战前。纳斯焦娜有一回在电影(这种怪物她总共只看过三次)中看到一个城里女人很爱自己的丈夫,爱得发疯,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丈夫满意、高兴,就像喂小孩那样,亲手去喂丈夫。纳斯焦娜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忽然产生了过去从未有过,现在却非要试试不可的怪念头。她也决定把猪油一小块,一小块地送到安德烈的嘴里,但是安德烈不让她这样做。她有些难为情,同时也很高兴,似乎她已经克服了细微的羞怯,越过这个内心障碍,下一步她就可以放开了。他们不得不共用一个容器——军用水壶盖喝茶,两个人递来递去地传着喝。安德烈喝过后,纳斯焦娜接过来喝,喝过了再递给他——不知为什么,这也使她很激动。

这里的一切:已被废弃的,没有活气儿的过冬屋,脚下铺的是横七竖八的一劈两半的木头,算是地板,顶棚上的木板有的已经下垂,在那削得不平的四周木墙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陈年蜘蛛网,窗外,没有任何足迹的雪峰,宛如汹涌的波涛,滚滚而下,迎着太阳闪闪发光。身边是安德烈,这在朗朗光天之下已确认无疑,但并未因此就更了解他,而她对自己也莫名其妙,她是怎么,又为了什么跑到这早已被人遗忘的荒凉的过冬屋来?每当在走神的瞬间,在近前看见安德烈,她都大吃一惊,然后,总得经过一番寻思,才能想起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只是在醒悟过来之后,才能理解周围的一切。但这种清醒的状态很不稳定,恍恍惚惚,需要时时注意保持,否则随时可能飘走、消失。对她来说,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似乎是想象出来的,梦中看到的。

纳斯焦娜就像跟自己玩捉迷藏。她一会儿深信目前这一切会有个好的结局，只要耐心地等一等，咬牙忍一忍就行了；一会儿，这已经发生的一切，又像一个突然塌陷在眼前的无底深渊，吓得她喘不上气来。但是她没有露出内心的恐惧，反而装出很快乐的样子。明天会怎么样，她不知道，但今天是她的，几年来，只有今天她才能过一个真正的假日，她的身心都可以得到自由和休息了。

吃饭时，她吃得很少，为的是让安德烈多吃点。身子暖活过来，她就打起哈欠。

“家里人以为我在卡尔达村呢，可我却在这儿，在你身边，”不知道她干么要说这些，“要叫他们知道就糟了。”

安德烈没有搭腔。

纳斯焦娜把皮袄铺到床板上，脱掉毡靴，舒展开双臂，平躺下去。安德烈从桌后瞟了她一眼。为了撩惹安德烈，她闭上眼睛，一声不吭，做出仿佛就要入睡的样子。可是，安德烈刚跨近一步，她便一骨碌飞快地跪起来，身子向前一探，像小姑娘那样，炒爆豆般地叫嚷起来：

“走开！别来蒙哄我，我不认识你。”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我不认识你，走开！别来蒙哄我。”

“你瞧好吧！”

这挑起了安德烈嬉闹的兴致，一跃扑上去，纳斯焦娜一闪，他们就扭缠在一起了，像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婚后第一年常有的那样，耍闹起来。嘿，那时，他们真能胡闹，闹得满屋尘土飞扬。纳斯焦娜不娇不弱，从不轻易服软，安德烈往往要累得筋疲力尽才能制服她，让她求饶。但这一回，不知为什么，纳斯焦娜不想再试试他有多大劲了，自己放开了手。安德烈按着自己的想法

理解了她的这一举动，于是，就像个毛孩子那样忙乱起来。而纳斯焦娜则很温和地——免得委屈他——搂住了他：

“慢点儿，安德烈，别性急，不要这样，我的爱情，像一匹枯瘦的母马，很久没喂过它了，别猛催它，别伤害它。”

安德烈听从了她，对她很温存，体贴地揣摩，并尽心地迎合她的每一个细小的愿望。这是第一次，他们相识以来，从未有过。

休息时，纳斯焦娜有一种很滑稽的不好意思，好像她不是跟自己的丈夫，而是跟别人的丈夫相会，她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这时她已开始产生幻觉，一瞬间，她觉得奇迹般地看见了很久以后的自己，那里情景与这里大不相同，但是，就是在那里，闪现出的也不是她孤独的一个，还有他。可不知道为什么，这第二个人的身影很不稳定，所以，她也不清楚，那是安德烈呢，还是别的什么人。多半是安德烈，因为她从没想过任何别人。

她很想跟安德烈说点什么，说点好事，自己的事，可是，不知从那说起。于是就恳求说：

“让我看看，你伤在哪儿。”

他解开衬衣，露出胸前淡红色的伤疤。纳斯焦娜小心翼翼地抚摸了一下。

“小可怜啊……他们想打死你……倒是全长好啦，还疼吗？”

“现在好些了，还是疼，特别在阴雨天。平时，总觉得这儿凸个包，不得劲，还没完全习惯。”

一个小时以前，她还弄不明白，她是怎么，又为什么来到这里，而现在，她却觉得，一向就呆在这四面墙里，没有去过别的地方。至于在此以前的生活，凡是能回想起来的，像早已忘记的零乱的梦境，都被抛在隐约可见的身后的远处了。难道在什么别

的地方还有人,还有战争、死亡和灾难?这什么时候发生过?这一切真的在什么时候发生过吗?过冬屋里的空气是苦涩的,周围一片非人间的沉寂使她昏昏欲睡,遮住了所有的麻烦和烦恼。她为能这样自由地,单独地生存而陶醉。缓息下来的肢体怡然痛快地伸展开来,她默默地,昏沉沉地躺着,一无所求。

“我要睡着了,你不会生气吧?”纳斯焦娜以低弱而又满含幸福的声调问道。

“睡吧,睡吧。”

他用胳膊肘撑起身子,为的是能看见她,她已经睡着了。纳斯焦娜那张被冬天的太阳晒得暗红的圆脸上,表情温和,在睡梦中泛着自在的微笑。几年下来这张脸变得有些呆板、粗糙了,从前经常挂在脸上的那种少女式的急切和好奇的神情,他还在家时就已开始消退,如今则完全不见了。唉,真有意思,往后又会怎么样呢?神话很快就完结了,奥秘一个个被揭开。即使有时还能碰到什么值得惊奇的事,多半也都是往日里见过的,但由于行色匆匆没有留心,而它又赶上来引起你的注意而已。

纳斯焦娜的贴身棉袄解开了,她的双手放在胸前,随胸起伏,手指不时地动弹几下。安德烈看出来,她的手也变得粗壮了,这是因为总干活。从她那深沉、平稳的呼吸里散出温暖的香甜气味。

他贴紧纳斯焦娜,很小心地抱住她,听到了她的心跳声,清晰而又熟悉,每一声心跳都在他心中引起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态的惶恐,而且越来越慌。他不知道这种惶恐缘何而起,又预示着什么,因此更加不安。他再也躺不住了,起身悄悄地爬下铺板,转过头,看了看睡梦中的纳斯焦娜。“睡吧,睡吧。”不知为什么他小声地这么说,其实,他最希望她能醒来。在她身边,可听不到她的声音,白白地放过这能听她说点什么,看她干点什么的机

会，他实在不甘心，觉得胸中发冷、空荡、憋闷，逼他去活动活动，暖和暖和。

安德烈刚一出门就眯起眼睛，阳光格外强烈刺目。仿佛悬在山顶上的太阳滚到了山下。积雪被照得通红，闪闪发光，在稍许背光的地方则飘起柔软的蓝色光带。融融的春暖，散发着春天的气息。房檐一角的冰柱已开始溶化。在雪少和无雪的地方，水越桔已在舒展自己的身姿。

安德烈大口喘气，好像是在吐出胸中的闷气。他先去饮了马，然后向安加拉河走去，想看看有没有值得注意的情况。他那惶恐不安的心情并没有消失。他觉得现在，就在此刻，他因一时糊涂正在失去对他极为重要，今后也不可能找回的东西。

他回到屋里时，纳斯焦娜还在睡着。他坐立不安，就又紧贴着纳斯焦娜躺下，把头贴在她的胸脯上，贴得太近，他喘不过气，又挪开一些。纳斯焦娜在睡梦中一只手找到他的头，抚摸他的头发，这种触摸使他突然觉得好多了。他闭上眼睛，感觉到纳斯焦娜一只援救的手正搭在他的肩上，想象自己飘飘荡荡地进入了一个温和、空旷的幻境——这向来能帮他入睡——他很快就睡着了。

他们同时醒来。纳斯焦娜睁开眼，看看他，笑了笑，他一抖身子，也醒了。

太阳照射出的光点已从窗下移到远离门口的地方，一天快过去了。

“睡得真香，”纳斯焦娜说，“真不记得，什么时候像这样睡过一整天，这都是因为在你身边。看着你，又不相信这就是你。可是在睡梦中，你瞧，就相信了，全身每一处都松软啦，心也安静极啦。”

睡醒之后，他们好像是再次会面，彼此以惊奇和企盼的目光

看着对方。纳斯焦娜想起来,但被他按住,这正中她意,她开心地笑了。

他们一直拖延着,拖着不想谈起那个话题,尽管他们很清楚,这个话题是回避不了的。

七

“当时要是我回去了,也就会留在那儿,这是真的,多长时间我都挺过来啦,一仗接一仗地打,我从没躲闪,耍猾,可这回却干出这种事来。既然干出这种事,也就别想活了。对这种事,是绝不轻饶的。不饶也没办法,反正事也干了,想改也晚了。”

他闭眼躺着——这样说起来更容易些——他的话音里有一种憋着无处发泄的恼恨,因而断断续续,忽高忽低。

“那你怎么,怎么敢这样呢?”纳斯焦娜脱口冒出这么一句,“这可不是小事啊,你哪来的这么大的决心?”

“不清楚。”他没有立即回答。纳斯焦娜觉得出他并未装相、说假。“实在熬不下去了,想你们想得要死。从那儿,从前线我是不会往回跑的。当时好像家就在旁边了,其实哪儿是旁边呀!走啊,走啊……要是回部队,早就到了。开头我并没想逃跑,可后来看清了,我回去干什么?只能是送死。那最好还是死在这里。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猪总是往烂泥里趴。”

“等战争结束了,也许,他们能原谅你。”纳斯焦娜不很有把握地说。

“不会,这种事是不会原谅的。为这种事,如果说枪毙一次没打死,那会枪毙三次的。为的是叫别人不敢再干。我的命运就这样了,不必为它操心啦。我边走边想,回来看看纳斯焦娜,

请她原谅我，是我毁了她的生活，使她平白地受折磨，本来可以活下去，我却自己找死。可不是吗，有啥过不下去的呢？我们都还年轻，也没啥病，好像有缘分似的，在各方面都合得来。高高兴兴地过吧。可是我却由着自己的性子，不能掌握自己，于是就干出这种傻事。我自己也知道，这是蠢事，我不是傻子，还知道事理，就是不能控制自己。我一直以为我们还来得及，能在一起活个够，相互爱个够，一辈子长着呢。可这么快就走到了这一步。我想，我回来，在纳斯焦娜面前露露面，认个错，别作为一个恶棍留在她的记忆中，从旁边看看父亲、母亲；然后就一头扎进雪堆里。野兽会尽力的，它们会把我收拾掉，会收拾得很干净。我从未指望过，能像现在这样和你在一起，没敢想过。我怎么能有一种福分呢？就为了这个，如果还能让我活下去，我应该把你托在手心里，加倍地珍爱你。”

“瞧你说的，说些什么呀，”纳斯焦娜刚开始说话，就被他打断了：

“等一等，别急，既然说起来了，我就要把话说完。以后也许就没有机会了。我现在不用再掖着，瞒着什么，没有用了，心里有什么就全倒出来。我原来想，回来看看，不呆很长时间，等你谅解了我，就和你们永别。可是，现在我很想能活到夏天，看一看我的最后一个夏天是什么样。就是这么个愿望，打死我，我也不放弃。今天你烘暖了我的心——正是因为高兴而掏心窝子的好时候。”他干咳了一声，把哽在喉中的一团悲痛强咽下去，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不要你为我做很多，你已经做得够多的了。请你再挺几个月，我再躲藏一阵子，到时候，我就消失了。为了我，你已经受了不少折磨，你再忍受这几个月吧。”

纳斯焦娜本想数落和抱怨他几句，但不知为什么她不想动弹，又想到这个叫人沉痛的负担是他们共同的，也就没有开口说

什么。他停了一下，等了一会儿，又继续说：

“咱俩再也不能明着在一起生活了，一天也不行。你什么时候可怜我了，愿意来看看我，你就来。我会为你来做祈祷的。我是不能在人前露面了，就是死到临头也不行。别的我可以不在乎，而这一点我一定要坚持到底。我不想叫人对你和父母指指戳戳，也不想让他们捉摸我藏在哪里，嗅到我的脚印。他们会胡编出各种故事，说我的坏话，造我的谣。”他欠身坐起来，脸苍白，尖瘦。“还有，你在听吗？纳斯焦娜，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你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讲我回来过，对任何人也不能讲。要不我就是死了也会把你的舌头揪下来。”

“你说些什么，安德烈，你说些什么呀？！”纳斯焦娜吓了一跳，从铺板上坐了起来。现在他们膀挨膀地坐着，胳膊肘蹭在一起。她听得见他那粗重的呼吸声，好像是在胸腔里呼呼作响。

“我不是吓唬你，纳斯焦娜，我用得着吓唬你吗？！对于我，你是窗户上的全部光亮。但你要记住，永远记住，不管我是好死还是赖活着，我的事绝不能露出去。等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你再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应该重新安排，你的日子还长，也许将来有一天，你过得很好，为了自己的幸福，想把心中的一切都倒出来。那时你也不能碰我这一段。你是惟一知道我实情的人，别人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去，你不能帮他们。”

“我做错了什么，安德烈，你干么跟我这样讲话？”纳斯焦娜问道。她很惘然，不知说什么好。于是就提出了这个完全是婆娘们常提的那种问题，其中哀求多于抱怨，而且听起来很悲苦。可是安德烈却以为这是对他服从的表示，并为这一切能完全平息下来而感到高兴。

“什么也没做错，别生气，不该生气。我知道，你能明白我的意思，能够正确理解这一切。下次我也许不会讲这些了，但是现

在不能不说。我现在自己也弄不清楚，我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好像不是我在活着，而是别人钻进了我的躯壳，支配着我。我想往右，可他不让，拉我向左。这也没有什么可怕，反正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

“你怎么总说些吓人的话……”

“别怕，我不是吓唬你，而是吓唬自己，其实也用不着吓唬自己：不会有比这可怕的了。我是在你面前说出自己的担心。现在该说的我全说了，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我也都打了招呼，心里松快多啦。现在你说吧。”

“要我说什么呢……”

“母亲怎么样，能走动吗？”

“最近这一年，没怎么下过炕。做饭时才下来，她不让我和面，她自己干。这样我可能一辈子也学不会烤面包了。”

“父亲还在马棚吗？”

“是啊，要不是他呀，马早就都给杀啦。只有他一个人照料着。他太累啦，身子差多啦，呼哧呼哧地喘，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得劲。还有我，前天劈头给了他一下子。”

“怎么回事？”

“前天认购公债，我一时糊涂，顺口报了两千卢布。我想得多简单哪：反正没有钱，也用不着可惜。可他做梦也没想到。当然，他还是很高兴，还夸了我几句。”

纳斯焦娜说完歉疚地笑了笑，瞅了一眼安德烈。

“暂时你还不能扔下老人不管。”他说着，眼神又暗淡下来，默默地思量一会儿又说，“母亲也许拖不了多久啦。我得想法在暗中悄悄地看他们一眼。”

“那以后怎么办呢，安德烈？”纳斯焦娜胆怯地问，自己也被这个问题给愣住了。“他们在等，在盼，相信你会给他们写信，告

诉他们，你在哪儿。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全都指望着你哪。”

“指望，指望……”他跳起来，在过冬房里走来走去。“他们没有任何指望了。完了，没有指望了。这个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至于我在哪儿？我告诉你一件事。在我们的医院里住过一个大尉，院里把他的病治好了，文件交到他的手上，也是他要他回部队。可是第二天发现，这些文件被扔在邮箱里。而大尉，想不起叫什么了，他在哪儿？连上帝也不知道他哪去了。也许有人看上了他的军装，还有钱、那份口粮，眼红，就把他弄死了。也许是他自己灭掉了痕迹。活活一个人，就没啦。问谁去？撒出去多少人也甭想找回大尉。有人在天上、有人在地下、有人在光天化日里苦撑着，有人躲藏着受罪，有人根本就不记得自己是谁，一切都搅成乱麻，理不出个头绪。我不也是这样吗！可以说有我这么个人，也可以说没有。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的老人们等不了多久啦。我们会在阴间相聚的，到那时再好好谈谈。那里可能没有战争。而在这儿，强者也好，弱者也好，只能有一个指望，那就是指望他自己，别人谁也指不上。”

纳斯焦娜还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和他争辩。他沉默了一会儿，稍许平静些，又说：

“还不知道哪样更好些，是让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儿子或者丈夫被打死，埋在什么地方，还是什么也不让他知道。对于妻子来说应该是知道为好，也好安排自己的未来。这是可以理解的，自己活不了，要让她活下去。而对于母亲呢？她们当中会有许多人宁愿不知道，愿意蒙上眼睛活着。她们就是接到了死亡通知书，也不愿相信是真的。就是亲手掩埋她儿子的战友给她写信，告诉她埋在什么地方，她也会认为，这还不足以叫人相信。既然这样，那就让我的两位老人什么消息也不知道吧，废弃的灯塔虽

然不发光,但它能竖在那里。既然我不能变成另一个人去见他们,就让他们对我抱有希望吧。”他转向纳斯焦娜,做了一个劈砍的手势。“好啦,不说这个啦,你过来,咱们喝点茶。你得快走啦。或许,你能留下来?”

“我怎能留下来呢?”

“你还会来吗?”

“我一定来,安德烈,一定来。没有牲口,我自己也能跑来。现在我知道路了。”

“不想来,就别来,这事不能强迫自己。我能熬住,今天这一天够我撑很长时间的啦。”

纳斯焦娜忽然想起来了:

“哎呀,我给你带来些弹药,差点没带回去。”她很轻快地从铺板上跳下,在角落里的一堆东西中掏出两个小麻布袋。一个装的是火药,另一个里面是枪砂。“你倒出一半,另一半我得给父亲带回去,这是他叫买的。”

“我有一半就足够了。”安德烈高兴地忙活起来,解开小布袋。“现在我能活啦,现在就是鬼来了我也不怕。你成全了我,给了我一切。嘿,纳斯焦娜,你真是我的好老婆!”他说着一把抱住纳斯焦娜,把她托起来。她尖声叫着,踢腿,挣脱。他则小心翼翼地放下她,生硬又忧郁地自言自语:“能和这样的老婆堂堂正正地活着,而不是躲藏在这种鬼地方就好了。”

纳斯焦娜没听安德烈说什么,自己却很激动地说:“瞧你,把我吓得心都缩起来了,我已经不习惯人家这样抱我了。”

“你常来,我会让你习惯。”

“我倒是想每天都来。”

“那干么不来呢?”

这长长的、整整一天的,但仍然难舍难分的幽会得结束了。

已近黄昏，角落里散出的霉烂气味更浓烈了。从顶棚垂下来的木板显得更低了。周围的一切叫人觉得不牢靠，使人惶恐不安，也就不怎么想说话了。

他们赶忙喝了点茶。安德烈叫她一定要吃点东西。她闷闷不乐地嚼了几口夹油面包。等她穿好外衣，他默默地递给她一个圆而发亮的东西，上面还有一些像小眼睛的闪光点。纳斯焦娜发出一声很低的惊叫：

“喔唷，这是个什么稀罕物？”

“拿着，纳斯焦娜，这是块表。我亲手从一个德国军官手上摘下来的。是一个活着的军官，不是死人。我是再也用不着了，可对你，还能派上用场。你若是去卖掉，可别太贱了。这是一块好表，瑞士造的，少于两千卢布别卖。”

“老天爷，我连拿在手里都害怕。”

“拿着吧，我再没有什么可给你的啦。”

他把她送到过安加拉河的路口，坐在雪橇里和她拥抱在一起，一声不响地呆了一会儿，然后朝卡尔卡抽了一鞭子，便跳到雪地上。他一动不动，脸上毫无表情，在原地站了很久，直到远去的黑点完全消失，但他心里很乱，这就算……

纳斯焦娜坐在雪橇上边走边哭，心好像被人抓住，并攥得紧紧的。可是为什么心被揪得这样厉害，一时还弄不明白、理不清。在心中诸多痛楚中，没有一种是能判明起因，知道该怎么排解的。一种揪心的惶恐不安死死地缠着她，就像把糖和盐对半地放到茶里，并一口气喝光那样，感到心房紧缩，腹内翻腾，苦甜相交，刚尝到一丝甜意，咸味就把它冲掉，接着痛苦就传遍全身，一直浸渗到骨头。

这些年来，纳斯焦娜一直被拴在村里，拴在家务和劳作上。她安分守己，因为别人也靠她在坚持着，更紧密地聚成一个整

体。现在拴她的绳子一下子松开了，没有脱落，但松开了。行动吧，充分利用你的自由，使出你最大的力气，想干什么，想到哪去，就干，就去吧。可是能上哪儿去，又能干什么呢？她对自己拉的这付套已经习惯了，适应了。即使下决心走，也走不了多远，何况也没有地方可去。怎么能叫人不慌神儿呢？不，看来这套是卸不了的。反而应该把它们拉紧，等着，看下一步会怎么样。她不能摆脱自己的命运。现在还只能顺着原来的圈子转。只是好像不在圈里，而在旁边。看着别人怎么过日子。自己呢，只能心藏秘密，孤零零地活着。要睁大双眼、说话只说半句、干活要加倍、睡觉要减半。还得学会耍弄花招，见风使舵，搪塞扯谎，尽管也知道这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这一切都是因为丈夫提前把自己保存下来啦。

人总会有过失的，要不就不是人了。但有犯这种过失的吗？安德烈承担不了这种过失。很清楚，他挺不住。这种自伤的伤口没法长好，过多少天也长不好。他承担不了这种过失。现在怎么办，离开他，唾弃他？他现在回到这里，也许，她也是有责任的——没有过错，但有责任。是不是主要是她，把他拉回家来的？是不是他因为怕不能跟她说上最后几句话就永远见不着了才回来的？在父母面前他不露面，可对她，什么都说了。也许，就是为了能和她在一起呆一会儿，他才拖着没有去死。既是这样，又怎么能推开他不管？这只有没有心肝，代替心肝的是计量得失的一杆秤的人，才能做得出来。即便是个外人，哪怕是个很不怎样的人，也不好随便地把他轰走，可他是自己的亲人呀……如果不是上帝，那就是生活本身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灾难降临也好，大祸临头也好，他们都不能分离。

人们都在那里活着，而他却在这儿。上帝啊！请你教教我该怎么做吧。

纳斯焦娜内心沉重、不安，同时又空荡荡的，无着无落，恰似一座搬空了的房子。在里面可以随意安排，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这种空荡又让她发冷，迷茫，心神不定。每一个念头都在那光秃秃的四壁上激起很响的、疑惑的回声。、

八

白天，安德烈·古西科夫尽量不呆在过冬房里。未必有人会闯到这里来，但他想还是要谨慎些。每次出去之前，总要把自己那点简单的家什藏到铺底下，把铺上面的树枝堆到一起，每次都仔细地抹去身后留下的脚印，把猎枪往肩上一甩，踏着滑雪板，沿着河边新结的冰层向上游滑去。右边，靠近雷勃那亚村那一带他一般不去，而是向左拐，那里有整整三十俄里的地方无人居住。

在森林里跑不起来，因为雪面不匀。而在林中空地、在雪面冰凌上，如同在冰上，古西科夫就飞滑起来。在旷野上飞快、自由、腾空地滑行使他高兴、振奋，产生一种欢欣快乐的幻觉；前进、前进、奔向广阔的天地、奔向自由，到那遥远的地方去，在那里不需担惊受怕，不用躲躲藏藏，那里的一切都有自己的本色，并按着自己的本色活着。

原始森林矗立在沉甸甸，静卧着的雪原上。雪面上撒满了针叶和从树枝上落下的斑斑点点的雪团。大森林尚未苏醒，还沉浸在朦胧依稀的思绪中。但是松树的枝梢已经向上挺直。躯干裸露的桦树，看上去已有了生机，散发着苦涩的树胶味。冬天，似乎仅有黑白这两种醒目的颜色，连白云杉和白山杨也同样显得黑幽幽的。经过一周的晴天，枝杈都舒展了。每个树结都

显得更鲜明,更清晰,更相似了。寒风徒劳地撕扯着大地,再也掀不起上下翻飞的雪雾了。积雪牢牢地趴在地上,并在原地消融。当然,老天爷还会下雪,而且不止一次、两次,那也只是为了摆摆样子而已。因为雪花一落地就立刻融进原有的积雪中。一些没有挂雪的书墩四周已生出苔藓。

古西科夫在树多林密的斜坡上走了很长时间,才到了另一个狭谷,他沿着狭谷向安加拉河滑去。河道在此向右拐弯,久经冲刷,河岸很宽阔。岸边肥沃的田野上盛产浆果、牧草和蘑菇。传说以前这里曾有一个鞑靼人的村落。后来鞑靼人离开了这块在异乡河流旁边自己选中的宝地,烧毁了房舍,迁走了。至于为什么,早就没有人知道了。实情是不是这样,不得而知。但以往人们在这里留下的劳动痕迹,至今仍然看得清楚:这里有伐木场、耕地和割草场。

古西科夫又沿着河岸走,不是走,而是在岸边的冰凌上向安加拉河上游滑去。

在这里还是要注意隐蔽,但不用太害怕。这是一块区间互不搭界的三不管地带。而划归不同行政区域的人们之间,很少交往、互不相识。一有枪响,四处都能听到,枪声也像来自四方:上游的人认为是下游在打枪,而下游的人又会认为是上游在开枪。古西科夫嘱咐自己,在这里,只能在这里打猎。

近两天他一直站在岸边观察山羊的动向,并两次看见它们穿过石岛,越过安加拉河。第三天,他来到岛上,并在缓坡上的一个岬角后面搭了一个掩体。这里是山羊常来的地方,从这里还能清楚地看到两岸的情况,靠左岸近一些,离右岸远些。从便于观察这一点来说,这是个好地方,只是不挡风,顺河刮起的大风向这里猛灌。为了避风,古西科夫向岛上的石堆走去。这些石头堆在岛的中央,活像一个大坟丘。在石缝中他意外地发现

了一个大斜坑，像个岩洞，洞里还有生过火的痕迹。他仔细看过之后，心中暗喜，接着竟嘿嘿地笑出声来。他还没想好，怎么利用这个石洞和用来做什么，但他确信，这肯定对他有用。

他生着火，烤暖了身子，就决定，如果今天打不着什么，不回过冬房去了，就在这儿过夜。这么远的路，何必来回折腾，两头跑呢。现在，在这岛上也有了藏身之地，而且是多么好的藏身之地啊！夜里，当然会凉一些，生着火就不怕了。过去也有人在这儿躲藏过，不知是躲避风雨，还是躲避人，多半是躲人，不然光是遇上坏天气，为什么非得躲到这儿来？瞧，烧出这么多灰，灰都发黑变硬了。很清楚，这个人在这里不是过一夜，而是藏了很久。看来，在这个人的生活中有过一段很长的风雨交加的日子。

安德烈此前为什么就没想到来岛上呢？就在近旁，可他却像一只小船，多少次飘然而过，瞪大眼睛望着岩壁，却从未上岛。他觉得这个岛看上去怪里怪气，不会是个舒适的地方，岸边很陡，岛上尽是石头和落叶松。大概，其他人跟他一样，也不会认为它是什么好地方。

安德烈在岛上的石洞里过了一夜，体验到一种幸灾乐祸的满足感，因为在石洞里就像睡在石头心儿里一样，怎么也无法够到他。傍晚，他点着一堆干枝，烘烤了身下的垫木，睡得暖和，安宁，没有习以为常的紧张，也没有那种即使在梦中也不能放松的提心吊胆的感觉。

早上，他很晚才走到岬角：要先把水烧开，茶得慢慢喝，用军用水壶喝，很烫，强迫自己起身，爬出寒冷的洞，都得费些工夫。来自下游的强风停息了，却又扯起无声、平稳的小北风。这是一个晦暗的早晨，这种时候不仅是野兽，就是人也会小心谨慎起来。在这种没有把握、多变的天气里，山羊大概不会走远。也许，应该沿着崖岭往回走，那样或许能碰上猎物，见到一只松鼠

也好啊。

他边走边想该怎么办，同时转向左岸，正准备走过去，突然看见三只山羊曲着前腿，一蹶一蹶地从陡岸上向下跑来。就是它们，就是它们，多可爱。他躲到落叶松树的后面。摘下猎枪。野山羊踏着硬邦邦的雪地，深一脚，浅一脚，连蹶带蹦地过了河汊，一直向他跑来。真弄不明白，是什么吸引它们都上这儿来？可能，再次走上开阔而又空旷的危险地带之前，它们想先到林子里躲一会儿，为的是压住自己的恐惧。

野山羊一只跟着一只走，离他越来越近。安德烈已经能够听到它们那好像发自五脏六腑的，咕咕的呼吸声。走到离岬角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山羊不知为什么警觉起来，领头的那只突然转身向岛下跑去。安德烈跃起紧追，双筒齐射，走在最后那只山羊，蜷曲一下身子，瘫软下去，接着又向上猛蹶起很高，但已不是向前，而是歪向一边歪倒下去。

安德烈走到近前时，那只山羊还活着。它呼哧呼哧地喘气，蹬踹着蹄腿，扒着身下的积雪，两眼血红，头昂起又垂下。按常理，应该把受伤的羊立即打死，可是他没有动手，而是站在一旁盯着它，力求不放过这个动物临死之前的每一个动作，看它所受的折磨，看它停而又起的痉挛和头在雪地上的抽动。直到马上要断气时，他才把羊拎起一点，看它的眼睛——那双眼睛睁得大大的，也在望着他。在飘忽的眼底深处，他看到了跟自己一样的，蓬乱而令人厌恶的鬼脸。

他等着山羊死前最后的一次抽动，想记住这最后一动在山羊眼睛里的反映，但是未能看到。他觉得，山羊这一刻的目光是在回视自身。

有时他也回到上游的过冬房去。这里比下游的那间结实，宽敞。它是用落叶松在陡峭的山岗上盖起来的，准备长期使用，

不是简易搭成的。周围的田地早已撂荒，上面花草树藤，什么都长。可是在旁边，在稀稀拉拉的一排白杨树后面，有一块叫人心旷神怡的圆形林中空地。一次，古西科夫想着想着，突发念头，很想将来能把他埋在白杨树和空地之间。这里干爽，叫人感到亲切，会有落叶覆地，花香鸟语。而野兽见到过冬房是不敢靠近的。

过冬房里没有炉子，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收拾过这里，不怕辛苦，把炉子拖到河里去了，这样也许更好。不然他万一忍不住生起火来，阿塔曼诺夫卡村那边就能看到山上冒烟。过一阵，当他不得不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天也暖和了，用不着生炉子了。眼下他只是白天来这里，冷了，就活动活动，不生火也能暖和过来。再说，连着几天都是大太阳，天气也转暖了。身穿短皮袄都有点碍事了。

很快河水就会哗哗地流动起来，可他既没有皮鞋，也没有毛衣。

安德烈发觉，在这里不知为什么自己变蠢了，自我感觉和在下游过冬房里完全不一样。在那里，他比较安心，也比较习惯，想的也很简单，每天活着，只考虑怎么活下去：该做什么，明天上哪儿去……怎样弄到一两样东西，用什么来解饿？不往远处想，也尽量忘掉久远的从前。脑子里经常闪现的，都是来这儿以后的事。目前这种只求吃饱、活着的单调生活对他很合适。可是在这里，他完全垮了，好像害了大病，一些多余的，捋也捋不清，卷也卷不拢的思绪滚滚而来，而他最忌讳的，就像用了十把锁紧锁在心底的，自知为时已晚的懊悔，更叫他痛苦得呻吟不止。

其实有什么可回想，可寻思的，不就是折磨自己吗？胳膊肘虽近，但你咬不着。

想到这句俗话，他竟用一只手抓住另一只胳膊肘，用最大力

气用牙去够它，能否碰巧咬着呢？——可是把脖子都扭痛了，还是没咬着。他满意地笑了，俗话说得真对。看来在他之前是有人试过的，当然不是在这种场合。

在这里，他恼恨自己，也害怕自己，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更狠地责骂自己，怎么才能叫自己比现在更难受。于是，出自内疚，他威吓自己：等着吧，有收拾你的时候，丧钟会敲响的！接着又很害怕地醒悟过来：是啊，那种时候会来的！那是怎么个收拾法呀！没等你醒过来，就动不了啦。

他弄不清楚，在这里是什么使他产生这么坏的心情，是这间可供长久居住的过冬房，还是过冬房周围那片叫人感到亲切，又生机勃勃的山野？再有，透过稀疏的林丛，可以看到安加拉河的冰面，再远一点，可以望见对岸阿塔曼诺夫卡村边的房舍，也许还有什么别的——真是说不清。但撞上了，就会被死死缠住，怎么也甩不开。

正是这个说不清的原因，把他拉到这里，像是来寻求一种轻松愉快的犯罪。

在猎获第一只山羊的一周后，还是在那个石岛上，他又打到了第二只。他把羊绑在滑雪板上拖回下游的过冬房，摸黑剥了皮，天亮前把肉扔到棚顶上。

大清早，他刚一开门想出去，就愣住了：一只大灰狗从门边猛蹿出来，龇牙咧嘴地对他怒目而视。安德烈没有马上想到这是只狼。狼的身腰很长，很瘦，一身乱毛，像是在换毛期那样，打成绺，向上翘。他一把操起猎枪，但马上想到这里不行，没有开枪。这原来是一只有经验的老狼，闪身躲开对准它的枪口，向山里跑去。当它没有听见后边有枪声，就停下嗥叫起来。

从那以后，一到晚上，这只狼就到过冬房来，正是它教会了古西科夫狼嗥。

这只狼竟在过冬房后住下了。它时常扯起尖嗓子，一口气唱起很长的，叫人惊心动魄的怪调。这像是一把利刃，闪着刺眼的寒光，直戳咽喉，使世上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古西科夫没法把狼赶走，很恼火。有一天，他把门打开一个小缝，摹仿狼的声音，恶狠狠地朝狼嗥起来。他一边嗥，一边吃惊自己叫得和狼那么相似。这也没什么，不过是从原本的意义证实了一个真理：和狼为伍——就得学狼叫。“这倒可以吓唬那些好心人。”安德烈幸灾乐祸地想着，并为能对人报复而得意。

他留心听着狼叫，自己也常带着一种痛快，激动和急不可耐的心情嗥叫起来。而狼听了之后还纠正他不准确的音调。夜复一夜，古西科夫终于摸到了门道：按住喉咙、头向后仰，这样就可以去掉嗓子里多余的嘶哑声。他终于学会了又高又尖的，纯粹的狼嗥，让这种嗥叫声在天空中回荡。

最终还是狼没能坚持住，离开了过冬房。安德烈现在没有它也行了。每当特别烦闷的时候，他就打开门，向原始森林的上空，像狼那样悲怨、乞求地哀嗥起来，似乎想以此来为自己开心解闷。同时，他也仔细听着，周围很远的地方都在他的嗥声中沉寂下去，凝固起来。

九

三月中旬，战士马克西姆·沃洛格任第一个从前线回到了阿塔曼诺夫卡村。不过，要是把彼得·卢科夫尼科夫算上，他就不是第一个了。那还是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彼得就被放回来了，但那是为了能让他死在家里。他在病床上发高烧，苦熬了两个月，几乎没出过家门，刚过了圣母节，地和菜园都收拾完了，他就悄

悄地去世了。还算好，基地在老家，不在外乡。

马克西姆虽然受了伤，但回来了，彻底地回来了，回来继续活下去。阿塔曼诺夫卡村振奋起来了。既然放伤员回家，说明战争真的快结束了，就是说，在他之后，别人也会跟着回来的。重要的是有人回来了，随后也就会有别的人回来。不过，说真的，能回来的也不会很多。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对什么都喜欢做出准确的计算，他列出了阿塔曼诺夫卡村男人的伤亡数字：对芬兰的战争中有两个人没回来，这次战争开始以来，全村共有十八人上了前线，截止今天，一人确实活着（马克西姆·沃洛格任），一人确实死了躺在坟墓里（彼得·卢科夫尼科夫），有十张死亡通知书在女人们手里，其余的还在打仗。这是很简单的算术，村子小，掰手指头也能数清。

那一天，纳斯焦娜、纳季卡和莉萨·沃洛格任娜正在粮库旁边用鼓风机扬麦种。午饭后，涅斯托尔骑着他那匹叫卡尔卡的马飞奔而来，到了她们跟前，一勒缰绳，马前蹄腾空，站住了。他大声喊道：

“喂，莉萨维塔，跳上来，快跳上我的马，快！告诉你，马克西姆回来了。”

莉萨急忙闪开，脸色煞白，惊叫一声，就拼命喊着向村里跑去。这时阿塔曼诺夫卡早已欢腾起来了。从粮库所在的山岗上就能看见一群孩子，还有几只狗正向坡上，朝沃洛格任家跑去。向那里奔去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一边走，一边激动地议论着。涅斯托尔又飞驰而过，不知跑向哪里，路上不断鸣枪，使村子里更加惊慌、忙乱。街上人人都急忙躲闪，给他让路，他胯下的卡尔卡被枪声惊得直蹦，直呼哧。涅斯托尔连连放枪，在村子的两头来回奔驰，谁也别想拦住他。

“好一位将军，”纳季卡气愤地说，“要能这样去打仗就好

了！”

她在装大麦种的袋子上坐下，仍然是满腔忧愁得绝望时才有的那种恼恨，又说：

“我的那个害人精没能活下来……你干吗这样看着我，我说得不对吗？”她冲着正以惊异的眼光望着她的纳斯焦娜大叫起来。“捣弄出一堆孩子，完了就……‘英勇牺牲’了，我拿他这个‘英勇牺牲’现在能干什么？能用来喂孩子吗？”说着她向自家房子那边点点头，她的三个孩子都在家里呢，接着就放声大哭起来，不断地用手在满是尘土的脸上抹着泪水。“我拖着这么一大群，现在谁会要我啊！可我才刚刚二十七岁呀。二十七岁就完了，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一切都完啦！”

这一天，人们没再干活，收拾起扬过的麦种，就各自回家了，顺路敲了敲女管库员的家门，告诉她去锁库房。

家里，连谢苗诺夫娜都爬下了俄罗斯火炕，抖着精神，拖着浮肿的双腿，一步一蹲地走来走去。米赫伊奇在她身边来回转悠，一派心神不定，六神无主的样子。见到纳斯焦娜，他很高兴地问她：

“听说了吗？马克西姆·沃洛格任回来了？”

“听说啦。”

“你没去他家？”

“没去。”

“该去一趟，也许他能知道安德烈的情况。”

“孬(老)头子，还是你斯(自)己去好。”谢苗诺夫娜哼哼喘喘地说，“你去更有准儿些，她就是去了，也不会仔细打青(听)的。”

“到他那儿还用问吗，有什么可说的，他自己就会说的。”

“唉，你们就瞧着办吧。”

纳斯焦娜注意到，自从安德烈失踪以后，近来米赫伊奇总躲

着人。在养马场,当然是躲避不开人的。可一回到家,就死钉在家里,出去找老头们抽烟聊天时候越来越少了。人家来找他时,他也尽量少说话。他新添了个在别人谈话时连连点头的习惯,好像同意人家说的,其实是为了自己少开口。独自想心思的时候,他也点头。这时他两眼无神,呆板地凝望着前方,脑子里装的是什麼,他暗自在肯定什麼,连他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楚。但他确信:有一件现在还不能完全看清的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正日益逼近,他坚信不疑地等着它的到来。

今年米赫伊奇整六十五岁。在战争开始时,他的两撇胡须还挺精神地翘着,如今却垂落下来,成了铁锈色。米赫伊奇变得疲惫、消沉,睡觉也好,休息也好,都不能帮他恢复元气了。走路时,腰杆还是挺得很直,头向后仰。最近一年,他那条在第一次对德战争中打伤的腿走路更艰难了。一坐下来就低下头、合上眼,接着就是又粗又重的咳嗽声,好像整个胸腔都在颤抖;同时,他那久经烟熏的硕大内脏也被震得呼噜作响。躺在炕上的谢苗诺夫娜实在受不了,就喊,叫他别咳。他不予理睬,咳嗽不止,只好走到院子里,在那里干点什麼,慢慢地才能停息下来,但还要喘很长时间。更多的还是用烟来压咳嗽,这像是服一种长效的麻药,一种长效的、以毒攻毒的办法。可是越这样以毒攻毒,咳嗽越厉害。他嗓音嘶哑,气管憋塞,眼皮好像重得抬不起来,眯缝着眼睛,本来已是皮包骨的脸膛,瘦削得更尖了——仅一年的工夫,米赫伊奇就衰老成这个样子!一想到这些,纳斯焦娜就担心要出事。

“去走一趟吧,丫头,去吧,我还得去马场。”他打发纳斯焦娜。

纳斯焦娜不想一个人去沃洛格任家,就跑去找纳季卡。和往常她去时一样,纳季卡正和孩子们吵。最小的,父亲死后才出

生的莉德卡，坐在地上扯着嗓门儿哭，显然是刚挨过打；彼季卡也在床边抽泣；最大的罗季卡脸对着窗户，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纳季卡在又窄又小的灶间，把锅碗摔打得丁当响，不时地冲孩子嚷一嗓子，叫他们住声。

“一个面包我本想吃上两天的，到家一看，他们全吞下去了。”她对纳斯焦娜连连叫苦。“这不是无底洞，填不满的无底洞吗！瞧瞧这群饭桶，见着吃的，就使劲往下吞，怎么也没噎着你们。这回你们撑足了，三天之内别想再从我这儿得一点面包渣！你还不住声，啊！”她又对莉德卡大喊一声。“你要把我惹急啦，看我有没有办法治你。快把肚子撑破了的是她，哭个没完的还是她，倒是我错了，哎哟哟！你们怎么不死掉？！叫我再拿什么喂你们，拿什么？剩下的面只够发一次的了，就这点儿了。吃完了，只好把你们装进口袋，捆起来，扔到安加拉河里去了。我含着痛苦的眼泪，申请了两次面粉，谁也不会再给我了。他们能懂一点点事也好啊。还有他这个糊涂蛋，不算小啦，”纳季卡指着站在一边的罗季卡说，“该懂点事了，可就是不，只要能吃个痛快，能瞒过妈妈就行。那面包我是为自己藏着，给自己省着吗？不都是为了你们这些填不饱的饭桶吗！好让你们明天还有的可嚼，别饿死。可现在呢，这么不懂事，就是饿死了也没人可怜。”

“河快开化了，我可以去钓鱼。”罗季卡在窗户那儿嘟哝一句。

“你给我住嘴，你还要钓鱼呢！去年我们就没吃到你的鱼，今年可要吃个够啦。我们把鱼刺扔哪儿啦，我怎么想不起来。你站在那儿，别说话，别让我再听见你啰嗦，你他妈的还想当渔夫！你在家的仓库里钓得很好，而不是在河上！”

纳斯焦娜好不容易才打断她的话头。

“纳季卡，走吧，我们去看看马克西姆，看看男人们现在都成

啥样了，看一眼咱们就回来。”

“他有什么可看的？只能叫你伤心，再说，看人家的幸福是看不够的。”

“你是不想去啦？”

“你等一会儿，我去，你得让我多少收拾一下，才能放心地把他们留在家里。你别像个木头人似的站在那儿。”她对罗季卡吼道。“拿劈柴生炉子，别想给我溜掉。咦，发愁啦，又盯上滑雪板想出去，你记住，整个晚上都在家呆着。谁往外探个头也不行。”

莉德卡知道妈妈要出去，就苦苦哀求：

“我想跟你去，带我去，带我去吧！”

母亲在灶边拿起煎锅的活把，对她点了一下，莉德卡懂啦，不再做声。

“看见啦，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不要动。她还想跟我去，我不想和他们一起到别人家去丢人现眼。人家的孩子都像个孩子样，而这些糊涂蛋像什么，真是活受罪呀，我该拿他们怎么办，拿他们怎么办，要是有人能告诉我就好了。”

纳斯焦娜从地上抱起莉德卡，放到床上，孩子轻得几乎感觉不到她的重量。小姑娘立即蜷缩成一团，哽咽起来，小身子抽噎得颤抖不止。她闭上了眼睛。她清楚，今天别想得好啦，不如一觉睡到新的一天到来。纳斯焦娜抚摩着她的头，这种抚爱使莉德卡全身抖得更厉害，纳斯焦娜只好躲开。

对纳季卡的这种嚷嚷，当然不能称赞，但也难以指责。战前纳季卡就是个爱吵爱闹的女人。难怪她和婆婆处不到一块，婆婆不喜欢她那执拗的性情，因此婚后她很快就和维佳另立门户，单过了。纳季卡的娘家在勒拿河边上什么地方，她在这里算是外来的，外乡人。嫁给维佳是她的福分。他勤快，稳当，心眼好，无论纳季卡怎么在他面前大喊大叫，他总是一缕浅发飘在额前，

笑嘻嘻地看着她。实在听厌了，他就一把把她使劲抱住，用他那像铁板似的大手，在她身上抓一把，她就高兴了。纳季卡按本性也不是个爱惹事生非的人，就是喜欢热闹。哪里有她，那里就会吵吵嚷嚷，相互取笑，在这当中，被捉弄的多半是她，可是没有她，也没人能挑得起来。要不是战争，她守着孩子，守着维佳，她会慢慢地变得温和、安静些，战争开始前那一段，已经有这种迹象。可是战争和战争爆发的当年冬天维佳的牺牲把她击昏了，使她变得更加暴躁、倔犟。维佳的死使她悲痛欲绝。因长时间地大声哭喊，全身血管好像都凝固了。当时她刚分娩不久，大家只好把她拽回家，给小女儿喂奶。她一会钻进树林，一会又登上岸边的山岗。阿塔曼诺夫卡村里的人都担心她会去寻死。还好，这种事总算没有发生。纳季卡慢慢地消停下来了。为了养活孩子，她又出工了，拼命地干活。纳季卡没人可以指望，婆婆不得意她，由此，对孩子们也很冷淡。不管纳季卡怎么忙活、张罗，总是月月接不上下个月。烈属应得的补助粮，入冬时她就领了，后来就一天天地对付，但还不行，吃、穿都很紧巴。孩子们都像维佳：淡白色的头发，寡言少语，战争，再加上纳季卡的火爆脾气，使他们更加胆小、温顺，好像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能够活下去。三个孩子总是一起出门，站在街上张望，等候妈妈回来。对这三个受难的遗孤，好心人都因可怜他们而心疼。有人把罗季卡叫去，塞给他点东西，可他还不要呢。纳斯焦娜也尽自己所能，时不时地给孩子们点吃的，特别是对小女孩更加关怀。可是最近几个星期，自己这儿出了祸，几乎把孩子们忘了，因此，当她把正哭着的莉德卡抱上床时，感到很内疚。

她等纳季卡收拾的工夫，天已经黑了，在暖和的白天融化得有点发黑的积雪，又结上了冰茬，在脚下发出悦耳的咯吱声。在下坡的半个村子，好像空无人烟，没有人声，没有响动，只有几家

农舍透出微弱的灯光。连狗也都聚集在沃洛格任家的周围，在那里，它们欢快地瞎叫一气，从那还传来了孩子们哄闹的叫嚷声。纳斯焦娜和罗季卡怀着现在全村人共有的喜庆的激动，默默地、兴冲冲地照直走去。第一个从战场上、从艰险的战斗回来，并留下不走的人作为信使，所有上前线的男人的报信人回来了：快啦，婆娘们，快啦。很快就会完全清楚了：失去最后期望的，会号啕大哭，另一些人会喜笑颜开，然后大家共同开始新的生活。

沃洛格任家去了很多人，很热闹。两盏有十根灯芯的灯，挂在大堂屋的棚顶下，把桌子周围照得通亮。马克西姆坐在首席，人瘦了，也变黑了，头发剃得像个囚犯，很短，眼睛很大，右臂缠着绷带，用纱布吊在脖子上，一副因幸福而显得很懒倦的神态。在左侧，他两个女儿中小的那个，跪坐在他身边，丁当响地摆弄着父亲军装上的奖章。纳季卡先走上去，跟马克西姆握手问候：

“祝贺你回来！”

纳斯焦娜紧跟着重复说：

“祝贺你回来！”

老人和妇女围着两张并拢起来的桌子，坐在长凳上。右首，是大块头的涅斯托尔，他自称是“你的朋友加兄弟”，挤开马克西姆的父亲叶菲姆爷爷，紧挨着马克西姆，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右首另一个位置是留给莉萨的，可是，她在灶间和堂屋之间来回跑，忙得不可开交。莉萨喜气洋洋，一扫平素脸上的苍白和忧郁，容光焕发，两眼泪花闪闪。天蓝色短上衣下面隆起的乳胸也在闪烁，一切，她整个人都在闪烁，耀眼地闪烁。她安排纳斯焦娜和纳季卡坐下，克制不住自己，激动地拥抱她俩，抱得很紧，小声耳语：

“头午还什么也不知道，咱们还一起扬大麦，大麦……”她哽

咽一下，又笑着跑了。

马克西姆笑容满面地望着她们，望着纳斯焦娜和纳季卡。她俩正好面对着他，坐在桌子的另一头。纳斯焦娜耷拉下眼皮，听到马克西姆问她：

“哎，纳斯焦娜，你什么时候迎接你那一位呀？”

纳斯焦娜身子一缩，脸也红了。她没有马上抬头，尽量镇静地回答说：

“我都不相信还能迎到他，我那口子丢了……”

“谁，安德烈失踪啦？”

“他住了院，也负伤了，出院后让他回前线，”纳斯焦娜一面说着，同时强烈感到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正用关切，探询的目光盯着她。“从那以后，没有一点消息。我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噢，会找到的。”

“这是真的，真的失踪了，来人调查过，问过，看来，名单里没有他，是下落不明。”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插嘴解释，同时眼睛瞄着纳斯焦娜。

“半路上把他截到别的部队去啦，这种事多得很。再说，现在不是每封信都能寄到。”马克西姆很有把握地说。由于他这样有把握地断定，纳斯焦娜不知道为什么，立刻觉得轻松多了，好像她真的不知道安德烈的情况似的。

不知莉萨从哪里端出这么多东西：她好像并没有指望，没有等呀，可桌子上一下子就摆满了。母鸡嘛，好理解，是今天宰的，可鲑鱼是夏天就腌上了，看来是专门为今天这个日子保留的。家酿的白酒也是这样，在酒罐里封存不是一年，也不是两年了。别的女人，凡是还在等自家人回来的，也都是这样：她们宁肯自己挨饿，不给孩子吃饱，也要为迎接亲人把食品积攒下来。她们

当中有多少人最终是泪流满面地把这些东西端出来的啊！去年秋天，阿加菲娅·索莫娃接到儿子阵亡通知书，痛哭了几天后，把女人们请到家，摆出白酒，战争期间，人们都忘记了还有白酒这东西，摊了薄饼，冲了果羹，还做了些下酒的菜，那白酒就用在追念宴会上。不只阿加菲娅一个等到的结果是这样，还有其他人，这谁也没有忘记。不知道命运还准备叫谁摊上这种事。到目前，只有莉萨一个人没有等错。

莉萨轮番斟酒，饭桌上，人们都放开嗓门大声喧闹起来。涅斯托尔总想领大家唱个歌，可没人应和，人们不知为什么，并不把他当回事。老头当中，有人已离开餐桌，蹲到墙边，抽起烟来。他们蹲着接过莉萨敬上的酒杯，互相碰杯。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凑到马克西姆身边，和他谈起一个严肃而又艰深的话题——有关美国参战的情况以及美国何时才能爆发革命的问题。马克西姆回答得很勉强。看来，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知道得更多些，特别是关于革命。薇尔卡坐在爸爸腿上打起瞌睡，莉萨想抱她到床上去睡，孩子抱着父亲，大叫着不肯离去，只好随她了。有人又问一路来的情况，马克西姆把他大概已经讲了不少一次的情况又讲了一遍：医院本想截掉他的胳膊，他没让截。要是左手倒也算了，可偏偏是要紧的右手。没有它，就完全残废了。可是留下了，就得一直小心照看下去。纳季卡干了一杯白酒，关切地问道：

“那这只胳膊，能向旁边挪吗？”

“往哪边挪，干吗要挪？”

“哎，那夜里它不碍事吗？”

马克西姆笑了，他说：

“要是碍事，莉萨会砍掉它。”

“纳季卡，你竟说出这种话，我要把你赶出集体农庄。”涅斯

托尔很得意地说。

“坐在那儿呆着你的吧，我不是那么好赶的。你还是当心自己别被轰走吧。”纳季卡发火了，但并不恼恨，只是想把他顶回去。“男人们很快就都回来了，你就一边歇着去吧，你爬到我们老娘儿们头上作威作福，发号施令够啦，好景不长啦。”

“我爬到你们头上作威作福？”涅斯托尔很委屈地说，“婆娘们，啊！我作威作福？”

女人们没有吭声。

“你听她说的，”出来为涅斯托尔打抱不平的是瓦西莉萨·罗戈娃，村里人都叫她普列穆德拉娅^①。这个女人很胖，胖得干什么慢腾腾的，嗓门很粗，战争期间也一点没瘦。

“听见又怎么啦？！怎么啦？！难道说得不对吗？”

“纳季日达^②，你舌根儿底下压着的话，不是当众都可以说的。”瓦西莉萨一本正经地教训道：“今天从前线回来的这个战士还没来得及走进家门，你就对他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什么不三不四的话？按你这么说，他今夜的头等大事，就是整宿地听咱俩给他讲故事，而把莉萨忘在一边。他八成只是一只胳膊打伤啦，别的什么都还好好吧！”

马克西姆又笑了，老头们也跟着他边咳边笑起来。

“我知道，”纳季卡转入进攻，“瓦西莉萨，你是怕我的，怕吧、怕吧，你的加弗里拉一回来，我很快就会让他上钩，我比你年轻，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对加弗里拉我一百个放心。”瓦西莉萨嘲笑说。

“你怎么对他这么放心？有意思，他是个大圣人吗？”

① 寓随机应变、八面玲珑的女人之意。

② 纳季日达是纳季卡的爱称。

“是不是圣人，他都不会和你沾边的，他干吗舍了好鸟要爱个喜鹊？你就是只喜鹊，就会喳喳叫的喜鹊！”

“哎哟，瞧，她比的多好！”纳季卡很快地回应道：“行，我就是喜鹊，那么你又是什么好鸟呢？你不就是那种一身黑毛，飞来飞去，张口只会叫个“呱”的好鸟儿吗？”

“噢，不，纳季日达，”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翘着棕色胡子，带点狡猾的样子，微笑着说，“瓦西莉萨的墙角你是挖不动的，那儿的墙基很深。加弗里拉从前线寄回来的包裹不是给你的吧。有多少，光今年就有五次了吧？”他转脸问瓦西莉萨，“或许还要多？”

瓦西莉萨说不准，只说：

“我也没数过。”

“她甚至还没有打开过，”纳季卡挖苦说，“她当板凳坐着，保存着呢！”

“我怎么保存，就用不着你管啦。”

纳季卡那股劲一上来，轻易拦不住。

“莉萨，你那个红军战士给你寄来过几个包裹？”

“一个也没有。”

“要是我，他这样，我就不让他进家门，你也像只坏鸟，还高兴呢，什么都不懂！”

“我不要什么包裹。”莉萨幸福地笑了，“今天我说，把奶牛宰了吧，接风嘛，要像个接风的样，可他说我疯了。我又说，把鸡全宰了，我不愿意再看见它们，可鸡，他们也舍不得。上帝保佑，只要我们能在一起，什么都能挣来，我一个人会死的，活不下去，我会伤心死的，不死，我也会自杀。”

“这么说，你会去死？”纳季卡拖长话音，用手指着莉萨，追问道。

“会死的，会死的。”

“要不你就会自杀？”

“嗯。”

“莉萨，你在说些什么呀？”她很温和地说，由于委屈，忍不住嗓音抖了一下，接着就开始倾吐，“这是什么意思，这么说，我，卡捷琳娜，薇拉和卡比托丽娜，全都得去自杀，是这样吗？你是不是以为，你爱他，等他，胜过所有的人？你以为是我们自己丢掉了男人吗？莉萨，你没有落到我们这个地步，你就别说啦。我要自杀，很容易，孩子们怎么办？他在这世上就留下几个孩子，能把他们也毁掉吗？我的心都烧成炭了，再也不感到痛苦了，烧焦了的，也都散落没啦，冷空啦……你现在又能过女人和妻子的日子了，你们能搂抱，亲热。我可不行，我只是一个派去干什么都行的劳力，是个奶妈，一个供吃喝的人。我自己的一切都完了，早知道会是这样，我就该早点享乐呀，日后也好有的可回忆。可那时候，我总是把什么都留给以后，还打算过很长的好日子——现在留到头啦。现在记得的，就是这场战争，这是怎么也抹不掉的。别的都冲走了，或是枯干了，全没啦。”

莉萨很温和地道歉：

“哎哟，别怪我，小媳妇们，我不是这个意思。”

“怪你什么，你既然这么走运，就替我们大家好好过下去。不过要当心，你不会过得很消停，我会第一个挖你的墙角。我们的男人倒在那儿啦，这不是我们的罪过。是吧，马克西姆穆什卡^①，我们没有罪，你说说。”

“没有罪！”

“就是吗，我们有理由抱怨命运，到死我们都要怨恨它。可

^① 马克西姆的爱称。

是你，莉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你们现在就是高高兴兴地过日子，一切都看你们自己啦。如果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莉萨，在责备我们之前，要想到，如果命运能够可怜我们，我们的男人能回来，那么我，她，她，都可能碰到这种事情。现在我们是不能了，也不愿意看见你遇到这种事情。懂吗？”

砰地一声，门打开了。一群孩子闯了进来。莉萨赶忙跑过去撵他们走。孩子们却齐声叫嚷道：

“还没给他，还没给这个人。”

“他刚来。”

“马克西姆叔叔，还没给他饼。”

孩子们把罗季卡推到桌子跟前。纳季卡一见到他，就发火吼叫起来。

“你从哪儿跑来的，我告诉你什么来着，我怎么跟你说的？还不快点滚出去！”

罗季卡站着没动，睁大眼睛，以贪求的，叫人难受的目光，眼巴巴地望着马克西姆。马克西姆刚一触及这种目光，就把小女儿轻轻地放在地上，站起身来说：

“你是罗季昂吧^①，对吗？”他问的时候嗓音低沉，哽塞。

罗季卡连忙点头。

“噢，你好吧？”马克西姆走到男孩跟前，把那只好手伸给他。“瞧，都长这么大了，地道的男子汉了，真棒，你怎么这么晚才来？”他从阁板上拿下一张给过所有孩子的那种刻花饼，递给了罗季卡。罗季卡接了。“就这么点小礼物，没有什么别的了，甜甜嘴吧，老弟，吃着玩吧，明天白天，有空你来，咱们聊聊。今天，你看见啦，不行啦，明天来好吗？”

^① 对罗季卡的一种庄重的称呼。

罗季卡又点点头，然后就退向门口。孩子们挤成一团跟在他的身后，吵吵闹闹地拥出门去。

“瞧，长这么大了。”马克西姆感伤地重复说，坐回位子上。

“他们都在长。”总是忍不住要抢话头的涅斯托尔兴冲冲地给予肯定，“战争他们也满不在乎。”

“快打完了吧，这战争？”莉萨突然发问，“马克西穆什卡，你从前线来，你给我们说说，还得等很久吗？”

“对你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纳季卡的话音很轻，可是莉萨还是听见了。生气了。

“为什么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你以为，只要他在这里，就没有我的事啦，瞧你说的，我不是那种冰冷无情的人，不管大家受苦，只求自己享受，我不是住在独家村，除了自己眼皮底下，别的什么也看不见，我是和大伙儿住在一起。”

“快啦，嫂子们，快啦。”马克西姆回答说，“你们都知道了，我们的人已经打到德国了，快把他们踩死啦。”

“他们不会再打回来吧？德国人不也到过莫斯科城下吗，当然，他们被赶跑啦。”

“打回来？”马克西姆眯起眼睛，绷起脸，向前探着身子，仿佛凝视着那只有他才知道的远方。他的面部轻微抽动，有点变形。“不，不会让他们打回来的，莉萨，即使剩下一只手，我也要回到前线，剩下一条腿的，成了残废的，都会再上前线。他们打不退我们了，够了；绝不能再让他们打回来了。我们绝不答应。他们找错了人。”

“都打四年了，还不够长吗？”瓦西莉萨深深地一低头，“我们都老啦！”

纳季卡抓住不放。

“真看不出你老了。”

“哎呀，纳季日达……有谁能把你的舌头剪短些，人家说正经事，你总是打岔儿。”

“我们也都受够了罪，”莉萨接上话头说，“姐妹们，是受够了罪吧？一想起来就难过。农庄的活儿，没的说，那是我们分内的事。可收完地里的粮食，天就下雪了，就得去伐木头，我到进棺材时，也忘不了这伐木头。没有路，马也累得不行啦，还往前拉，不干吧，不行，这是劳动战线，是支援我们的男人，头两年丢下小小孩也得去……没有孩子和孩子大一点的，那就总得去。纳斯焦娜就是没有一个冬天不去的。我把孩子扔给爹，也去了两次。你得一立米一立米地装。雪橇上总得带上撬杠，没有撬杠寸步难行。一会儿陷进雪坑，一会儿又有什么别的事——雪橇翻了，得把它翻过来。你就挣命地撬吧，姐妹们，有时翻过来啦，有时怎么也翻不过来。纳斯焦娜可以证明，我没有说谎。前年冬天，我那匹牡马在山下撒欢儿地跑起来，拐弯没拐好，雪橇侧身翻在雪地里，差点没把马撞倒。我想尽办法，拼命地撬呀，撬，怎么也撬不动，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坐在路上哭。一见到纳斯焦娜赶着雪橇从后面来了，我更忍不住了，放声大哭起来，眼泪刷刷地流。”说到这里，莉萨的眼睛里涌出泪水，“她帮了我，她帮了我，我们就一起往回赶，可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一路上不停地哭呀，嚎呀，”莉萨越想越难过，禁不住抽泣起来，“我哭呀，嚎啊，怎么也止不住，一点办法没有。”

“莉萨，莉萨！”马克西姆叫她，不让她再说下去了。

“我不说了，马克西穆什卡，不说了，都怪我糊里糊涂地说个没完，你们聊吧，我不说了。”她去了灶间，很快又回到桌边原来的位子，“还有那公债怎么样？”提起公债她显得很激动，惶惶不安，非得说说不行。“春天，为了交够认购的公债，连最后一点土豆都拿到卡尔达村的木材厂卖了。心想，只要能为前线出点力，

能叫他们在前线多少好过些，干什么都行，我们这儿怎么也能对付。挨不着子弹，不会被打死。该死的德国鬼子，到阴间也不能叫他们得安宁。他们让我们遭了多少罪呀！真该碎尸万段！”

“真不懂，今天是我还是你等到了男人？”纳季卡转脸问莉萨。

“是我，纳季卡，是我，我不说了。”

“我们这一切好像都倒了个儿。”喝得两眼发直的涅斯托尔瓮声瓮气地抱怨说：“你们这些人哪，当年你们唱着歌送男人上前线，现在欢迎男人回来，倒像送葬似的。纳季卡的话我们听够了，我们唱支歌吧！”

纳季卡动了一下，但没有急辩，莉萨在纳斯焦娜身后，以饱满，因激动和流泪而发颤的嗓音，唱起了《卡秋莎》。在座的人们应和着唱起来。首先跟着唱的人当中，就有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只有老头们蹲在墙跟小声说话。瓦西莉萨唱了，马克西姆唱了，涅斯托尔挥动双手打着拍子。随后纳季卡也加入了合唱，但突然又停住，趴到桌子上，浑身战栗，失声痛哭。莉萨从身后搂住她的双肩，把《卡秋莎》唱得更加高昂。甚至当薇拉·奥尔洛娃跟着纳季卡也痛哭起来的时候，这歌声也没中断。纳季卡猛然从桌子上抬起头来，拿起纳斯焦娜面前的一杯家酿白酒，一口喝干，泪也不抹，又跟着唱起来。

纳斯焦娜不露声色，一言不发。她既不能说话，也不能痛哭，更不能和大家一起喝酒。她从来没有像现在，在这里这样明白：这儿每样事她都做不得——她没有资格。不管她做什么，总归是欺骗，是虚伪。她要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听人家说什么，看人家做什么，同时，不暴露自己的心事，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她有点后悔到这里来。现在走吧，又不合适。大家在这里说的，

做的，都是自我真实的表露：莉萨幸福、容光焕发。马克西姆，在温馨的四壁和亲人面孔的围拥下，神晕目眩。涅斯托尔一天张狂下来，现在显得惘然若失，低声低气。农庄会计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机智多谋，识文断字，事事都要比别人早知道。瓦西莉萨自信、坚定地走着自己的生活之路。纳季卡单纯，好寻衅惹事。但个个都光明磊落。要说他们隐瞒了什么——这任何人活着都难免——那也都是些小事，出于必要，而且隐瞒的也是自己的私事。可是，她纳斯焦娜隐瞒的是关系大家，危害大家的事。它既危害纳季卡，也危害瓦西莉萨，甚至也危害莉萨。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会怀着类似的隐秘来参加今天这个晚宴的。在纳斯焦娜心中，正是这个隐秘把他们大家联合在一起，而把她自己排除在外了。他们大家仍然习惯地把她当成自己人，其实她已经成了异己，成了外人，没有权力同他们同悲同乐，没有权力应和他们的谈话和歌唱。

纳季卡竭力想说明，不是她丢掉了维佳，而是他自己中了敌人的子弹身亡的。她之所以这样表白，并且这样发问，正是她因为心虚，感到自己有罪，但罪在何处，一无所知。她不知道，怎样可以帮助维佳，但她觉得自己有罪，并因此而痛苦。是她祈祷得太少？还是对他苦苦思念不够？为什么莉萨等到了丈夫，而她没有？为什么战争还没结束，瓦西莉萨·普列穆德拉娅就深信，她的加弗里拉一定能完整无损地回来呢？他也真的一定能回来，像瓦西莉萨和加弗里拉这样的人，是不会出事的，别人都被打死，都死绝了，而他们却会双双活下来，平平安安地过他们的日子！怎么会是这样呢？不，这里边总有点奥秘，并且也取决于女人。大概从古至今，女人都受着这个谜的折磨，不计成败地努力，想揭开这个秘密。世世代代的女人们，每人都是凭自己的感觉，靠着盲目热诚而又迟疑的祈祷打发日子的，如若无济于

事，也还是怪罪自己，忍受痛苦的煎熬。

对这种罪过，纳斯焦娜也认账，她总觉得，自从安德烈离家以后，他的命运也受到她的一些影响。对此，她既相信又害怕，她大概一直只为自己活着，只想着自己，等待安德烈也只是为了自己。瞧，总算等到了，喏，纳斯焦娜，领走吧，只是别给任何人看见，在人们中间你是孤独的，完全孤独的：你不能跟任何人倾心交谈，不能哭泣，一切都得藏在心里。往后，往后怎么办哪！怎么才能把他从这种灾难中解救出来，怎么过下去，才能保证不出岔子，不遭难，怎么帮他？现在他出了什么事，她都要负责。

纳斯焦娜悄悄地抽身离开桌子，溜到门外。夜深了，那些孩子，还有那些狗，都各自回家了。村子坡下这一块，一片漆黑、寂静。在沃洛格任家灯火通明的窗前，伴着从中飞出来的歌声，纳斯焦娜站了一会儿，就拐进小巷，向安加拉河走去。路上没有人，她心情松快了一些。她点着头，心里数落自己：看！你到了这一步，以前想消愁解闷儿，就往人群里扎，如今相反，得逃避人群。内心的痛苦已经因麻木而缓和了许多，但是她的呼吸却带出哀怨、痛苦的呻吟。她挺胸深吸了一口气，把不由自主的呻吟压了下去，然后顺着河岸，踩着冰碴，偶尔看见并绕过冰窟，往下游走去。她边走边向对岸张望，望着小岛后边那个荒芜的角落——安德烈就躲在那里。信不信由你，他可确实就在那儿，就在身边。瞬间，在她神志恍惚而失控的瞬间，她突然觉得，一分钟前的一切，都是她想象出来的：什么马克西姆回来啦，安德烈偷跑回来啦，都是她空想出来的。她想象事情可能会是这样，也就信以为真了，这时，她就是去了安德烈那里也找不到任何人的。可是这种幻觉一下子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懊丧。眼前更加逼真，更加无情的现实是，什么都不是她空想出来的，一切都是真的。

纳斯焦娜登上自己这一侧的陡岸，最后朝安德烈那边看了一眼，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家了。她还得向米赫伊奇报告，关于安德烈，马克西姆什么情况也不知道。除了她，谁也不知道。可是，这件事，就是她被逼疯了，也不能漏嘴说出去。

十

上午纳斯焦娜没打算出门。快到中午时，漫天卷起暴风雪。她猛然想到装水的木桶已经见底了，得趁天气还没有完全撒起野来，去安加拉河担水。河上的狂风刮得更猛，赶着湿黏的，混浊的雪流冲向下游。纳斯焦娜习惯地看了一眼隐没在暴风和茫茫雪尘中的对岸，心想，要是现在去那儿，谁也不会看见。这不过是一个闪念，没有认真去想，但她的心却挂住了这个提示，狂跳起来。真的，干吗不去一趟？甭管它，去一趟？啥时候还能等到这么好的机会啊？她克制着急切的心情，赶忙担水回家。她知道，她会去的。这个当机立断的决定，激起了她一阵张皇的欣喜和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现在谁也不能阻挡她，她会瞒过所有的人去那里。

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人在阻挡她：米赫伊奇在马场，婆婆和往常一样，在炕上打盹。纳斯焦娜很快从地窖里拿出一桶土豆，把上面的推到铁锅里，如果老人们晚上想煮，省得现捣腾。她把桶里剩下的，全倒进一个帆布袋里，又跑到仓房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小袋豌豆，切了半个掺豆面的面包。全村现在几乎成了响彻着豌豆狂舞曲的豌豆王国。不久前，农庄大方起来，把十公担豌豆分发给了庄员。现在全村人吃的是豌豆面包，喝的是豌豆粥，嘴里嚼的也是豌豆粒。

纳斯焦娜很快收拾好了，脱下早上穿的短鞣皮鞋，换上了毡靴，把棉袄换成长毛绒短上衣，顺便还羞羞答答地照了照镜子。过安加拉河穿棉袄可能更合适些，可是纳斯焦娜想在丈夫面前打扮得整齐一些。他可能不会注意她穿的怎样，在他那儿能把她和谁比较？但她自己，穿上出门的衣服，觉得整洁，心情愉快。换上衣服就像是卸去了劳动重担，卸下了拉车用的套包和辕鞍，不再受活儿支配。干活的时候，你往往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是不是个女人，也忘记了自己还年轻，忘记了心中积存的一切，只有一个念头：快干！快干！因此，每当傍晚，干完活以后，尽管时间不长，她总要换上干净衣服，顿时就感到自己年轻、漂亮，这可是一笔丰富多彩、奇妙无穷的财富，你把它隐藏得越深，想得越少，它消失得也越快。换了衣服，纳斯焦娜走起路来，都倍加小心，深怕自己身上受到什么损伤。笑起来也更加温柔可亲，似乎又在守护着与她自己有关的秘密，而揭开这个秘密的时候还未来到。每当这种时刻，她显得并没有被战争、穷困和孤独折服，而是珍惜自己，尽力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好准备。纳斯焦娜知道，人人都会随着岁月变老，但心灵也许会比年龄凉得更早，这也是她最担心的。有多少健康、强壮的人，并不能把他们自己的，上帝赋予他们个人的情感和一般的，尘世的情感分辨清楚。他们就是上床，所体验到的也只是很实际的，随处可得的那种愉快，和上餐桌一样，能吃饱喝足就好。他们也大哭，大笑，同时却观察周围，人们是否听见、看见了他们在哭、在笑，眼泪是不是白流了。等他们这一套表演完了，你用特别的方式触动他们一下，他们不会理解，也没有回应，没有一根心弦能灵敏地颤动一下。晚啦，心田已经荒芜，冷漠了。他们自己也从不真情地去触动别人。这一切都是因为年轻时不会，或者不愿意和自己独处，从而忘却，失落了自我，如今记不起，也找不到了。

纳斯焦娜收拾要带的东西，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可是由于心情急切，她感觉好像过了一个小时。她终于拿起布袋，跑到街上，停下看看四周，也是为了适应一下劲吹的狂风。小心点总不是多余的。她故意穿过牛栏，万一有人撞见，她总会说出点去浴室的理由的，尽管在这该咒骂的暴风雪天气里。浴室周围，旋风卷着雪雾，连近处的农舍也模模糊糊看不清。她已定下神，不那么害怕了，顺冰往下滑，又朝右拐，那边有条路通往河岸。这时，她才意识到，路可能被雪埋上——那就得瞎闯了，可在这种时候瞎闯是很危险的：在这样的暴风雪中很快就会迷路，找不到河岸，不知会被刮到何处，风可以把人掀倒，使你没法把握方向。幸好，路还能勉强看清，在隆起的冰坨前面，一段路被封埋了，但雪流大多从两侧掠过。

为了在粘湿的雪雾中能喘上气来，纳斯焦娜不得不弓着身子，藏着脸。风刮得强劲，匀速，没有间歇，像一股激流在管筒中通过，发出猛烈冗长的轰响。透过这种轰响，还清楚地听到另一种声音——大雪飞泻的咝咝声。三步以外什么也看不清。尽管四周天色还亮，但这是一种淡白色的，恰如雾中，不透明，在跃动中破碎、断续、隐约闪烁的光亮。光滑凸起的冰坨发出清脆的吱吱声，飞雪向它们猛扑，撞散旁落，又被风卷起，向前飞舞。

从哪儿来的这么一场雪？纳斯焦娜记得，过去在这个季节，从没有过这么大的暴风雪。阳春三月已经在山下游荡，春天怎么就这样呀！

纳斯焦娜有几次看不清路了，但又都找到了，每次都在左侧找到的。尽管她撑着身子，使劲顶住风，还是被刮得向下游偏去。可以想象，真迷了路，还不知会被刮到哪儿去呢。雪橇的旧辙印，越来越难以辨清，辙印的雪垄已漫得很宽，几乎连成一片。纳斯焦娜在路边寻找已被冻脆的干草棍，这是当时从波科斯草

地运干草时掉落的，还有化冻后已长出蘑菇的马粪，她就按着这些标记往前走。起初，她走累了，还不顾一切地拼命往前赶，很快就精疲力尽了。沉甸甸的口袋把手都拎疼了，风呛得她喘不过气来，两只脚每步都深陷进雪里，毡靴上粘满了泥雪，毛绒上衣和披肩已经湿透。要说刮的倒也不是冷风，是南风，所以并不很冷，但很湿，粘糊糊的。而哪种风更好些，不好说。

纳斯焦娜仔细地看看左边，想找到河心那个小岛，要能蹭到那儿就好了，那儿好走些，那里有一条很窄的河汊，可以照直走过去。她倒不担心走不到岛上，一定能走到的，它跑不了，只是想走出去以后，能离峡谷近点，别等到了岸边，还得东找西找。冒着这样大的暴风雪出来，她一点也不后悔。也许，正是因为她须要到对岸去，天气才变坏了，以便为她遮人耳目。不知为什么，她此时无法相信，真会有一个干爽暖和的地方，她可以脱下靴子，伸直酸疼的两条腿，舒舒服服地合上眼睛躺下。这离眼前的一切实在太遥远了，几乎是神话。

纳斯焦娜终于迷路了，这回再也没找着。脚下是游动着的乱糟糟的一片。她决定顶着风走。只要能撞上河岸，就能准确地知道河道在右边。但她还是为迷路而懊恼，竟抽泣起来，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由于恼恨，加上极度的疲劳，又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安德烈。这要是叫别人听到她的喊声，那可真是太傻啦——她的声音一下子就被风雪裹卷着，抛向下游。

她又走了很久，自己也难以弄清楚是往哪走。一次，她抬起头，突然发现，已经不用藏着脸走啦。风力好像减弱了。她停下来，回头看见身后的风暴仍在飞驰狂啸，但到这里，她站的地方，好像被什么挡了一下，绕了一个弯。纳斯焦娜又往前走了不远，就看见了河岸。这里不是小岛，已经走过了小岛，她并没看见，这儿已是陆地了。谢天谢地，她走过了安加拉河，现在要找的该

是安德烈那个地方了。根据折弯的河岸,她知道在小岛的后面左侧,就是被树林拥围着的岬角,看来是它挡住了暴风。正像她原来想的,现在要沿着河岸往下游走。咳,总算走到啦,不远啦。清晰、沉闷的松涛声响彻群山,拐直了的河岸上是一片不大的草地,长在那里的白桦和白松随风摇晃。纳斯焦娜尽量不转身,风雪仍在逞狂,从背后推她,来不及捌脚,只好踉跄地往前走,还摔倒了一回,两个土豆从布袋里掉到雪地上,不知为什么,她有点恼火,不想去捡,让它们冻着去吧!

纳斯焦娜只顾往前走,差点错过小河汉。当大雪从她身子的一侧猛泻过来时,她及时发觉了,立刻停了下来。要不,再往前走,就到雷勃那亚村去了。她弄不清楚今天算走运,还是不走运:过安加拉河该算顺利,没迷路,没倒下,虽然看不清,但也没走冤枉路,若是别人,会高兴的,因为一切都顺利。可是她,不知为什么,觉得完全相反,不该这么走。这不单是因为上路不久就筋疲力尽了,还有不知是什么使她心情压抑,而她不敢想这个“什么”就是不祥的,而又不会错的预感。

过了一会儿,她已登上岸边的山岗,向过冬小屋走去。

安德烈在这里。从屋顶上的烟囱冒出的烟,马上被刮散了。若是她这样艰难地赶到这里扑个空,屋里没有人,那可就糟啦。她记得上一次把丈夫吓了一跳,就没有直接进门,先站下喘口气,用手抹了一把湿糊糊的脸,然后才轻轻地敲敲小窗户。

“安德烈,是我呀,安德烈!”

他听见啦,蹿出来,抱住她的双肩,嘴里说着什么,扶着她进屋。她不知怎么一下子就瘫软了,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过门坎时她绊了一下,差点跌倒。她本来就要哭了,经这一绊,心里一急,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安德烈慌了神,只在她身旁前后转悠,不知所措,他好像还不能相信,这真的是她。

“你可以来接我一下嘛，”她泪汪汪地使性子，气冲冲地说，“路上我想我走不到啦，我想我要倒下起不来了。你倒挺消停地坐在这儿，一点也不动心。”

“我哪里知道你今天来？”

“哪里知道，你本该知道！还从哪儿知道呢！”

他总算醒悟过来，帮她脱下毛绒上衣和披肩。她自己很厌恶地脱掉毡靴，它们被雪水泡胀，足有一普特重。安德烈捡起毡靴，用手掂掂，惊奇得直摇头，赶快放到炉子上去烘烤。因为生了火，过冬屋里很暖和、安静。炉子里的劈柴烧得噼啪直响，使屋子里有了舒适的家庭气氛。小窗的玻璃上时时敲起清脆的响声，惟有这种声音才叫人想到外面的暴风雪。

安德烈紧挨着纳斯焦娜坐在铺上，轻声问道：

“怎么跑来啦？没出什么事吧？”

“‘怎么跑来啦’？”她气呼呼地重复着安德烈的话，“我找你来啦，就这么来了！还问呢！”但接着就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没出什么事。”

“你真是不顾死活，连我都不知道你是这样天不怕地不怕。今天这天儿连野兽都轰不出窝，你还敢出来。”

“你本来就什么也不知道，像只活在黑洞里的地老鼠，连自己老婆都看不清。”

“是像地老鼠。”他表示同意。他不愿意破坏这几乎令他窒息的，高兴和幸福的情绪。接着他便问：“你饿了吧？咱们吃午饭吧？还是快吃晚饭啦？我完全搞糊涂了。”

“我倒想知道，你给我吃什么呀？”他一提到吃饭，纳斯焦娜真觉得饿了，从早晨起就没吃过东西，现在已经快到晚上了。再说，看得出安德烈很想对她有所表示，很想拿出点叫人惊喜的东西，借以显示一下他这个主人。因此，她更不好拒绝了。

“炖鱼汤吧，我在这儿还凑合着抓点鱼。”

“我可不再到外面去了。”

“我自己去。”

安德烈稍开个门缝，没有迈出门坎，只探出身子，伸手从上边取下一条大冻鱼，是条江鳕，足有三公斤，啪一声摔在桌子上。

“我看，你在这儿比我们过得还好。”纳斯焦娜惊讶地说。

“昨天天气还行，好像特意为你抓到的，说明你是个走运的人。”

“是啊，我还会不走运！”纳斯焦娜以一种弦外有音，同时又很克制的声调回敬了一句。

他是怎么学会打鱼的，只字未提，对她实在说不出口。不久前他还想都不敢想，自己会对别人的东西眼红，可如今却滑到了这种地步。有个雷勃那亚村人，在离村很远的上游，在靠近小岛满是淤泥的静悄悄的河汊岸边，放了几根鱼竿。一天夜里安德烈偶然发现了它们，手就痒痒啦。他知道谁也不会每天都把冰镗带回村、第二天再拿来，结果真的在树丛中找到了冰镗，还有一把短把的板锹。看得出这是个干什么都很精细的渔夫。一般都是早晨察看鱼竿，安德烈就在晚上傍黑时来。这样，被他镗开的冰面，夜里还会冻上。他先后已经捞到四条鳕鱼了。这活儿他干得干净利索，没留下一点痕迹，不会引起渔夫的怀疑。何况，深夜里可能是鱼最容易咬钩的时候，渔夫还有这种机会！

说得好听，“干活儿”。以前安德烈自己也称这种“活儿”是伤天害理的勾当。

他还没有难到掐脖的地步，逼他非得去干这种肮脏的行当。他还存些肉，纳斯焦娜时不时地带点什么给他。虽说贮备不会撑破口袋，但他干这种事，更多的是出自隐藏在内心的懊丧，受这种心情的支配、唆使，他慢慢地产生了强烈的，又从各方面加

以掩饰和伪装的欲望——叫那些跟他不一样生活的人，那些生活坦然、走路不用躲躲闪闪、提心吊胆的人也懊丧，哪怕在一件事上，他跑到他们前头也好，这可以使他感到自己和他们的命运有关连：有他是一个样，没他是另一个样。让他们看不见，听不着，也想不到他好了，但有他这么个人，他的存在就应当对别人产生影响，不然他就是个死人、幻影、幽灵。他这样干，并没有给他带来愉快，要想愉快，得敢于承认自己的所做所为。不过，他也从中得到少得可怜的满足，精神得到点支撑。他不愿去深想究竟得到了什么，不一定要知道，是什么使他感到轻松，只要能轻松些就好。

鱼汤在很旺的炉火上很快就咕嘟起来了，他们喝起来。为纳斯焦娜还单独准备了一个木勺，这是安德烈专门为这样的欢聚而削刻的。他慢慢地备制了一些家什。已不用小军用水壶，而在三公升的铁锅里煮东西了。这口锅是上次在浴室里会面时，纳斯焦娜连同毛衣一起交给他的。

那次，和往常一样，是摸摸索索地在浴室里会面。几次之后，纳斯焦娜对这样不明不白、不干不净的会面开始感到厌恶。她总觉得是在偷汉子，在欺骗。她当然也清楚，根本没有什么偷汉子的事儿，可她总是不能习惯，不能安心。她听着安德烈讲话，都怀疑是不是他的声音。她在安德烈的习惯动作中寻找她从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当然，要找总是能找到的，这使她害怕，也把自己完全弄糊涂了。另外，躺在那张高得要四肢全动才能爬上去的蒸浴床上，冷冰冰，滑溜溜的，还有从蒸浴树枝上发出的霉湿的树叶味，都令人很不舒服。纳斯焦娜觉着全身马上会长出叫人嫌恶的兽毛，如果她愿意，还能像野兽那样吼叫。

在这里却完全不同。在这里可以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从他脸上她就能捉摸出他在想什么。他俩在这里亲热，是从前家

庭生活堂堂正正的延续。同时,在这样陌生,也很简陋的环境里亲热,给纳斯焦娜增添了一种未曾有过,叫她心慌意乱,又是她渴望的激情,这种感觉大大超越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常有的,“干事儿”的感觉。

他们夫妻俩只能偷偷地、偶尔地相聚,因这种痛苦的处境而产生的懊恼,促使纳斯焦娜想在聚会当中找到补偿,她竭力在每次相会中都浓缩进去数年的生活,使它们充满特殊的意义,特殊的力量,特殊的温情。怎样才能做到,她当然还不清楚,只是在怀着对明天的恐惧、苦恼的同时,她想望有更大的,可望又可及的幸福,期望能有这种幸福,不叫她失望。

一次,她不记得是哪一次相会了,好像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为此她也恼恨自己:我是不是失去了知觉?麻木了?怎么连这都没有察觉?说真的,纳斯焦娜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有太多的迹象表明,是的,她所渴望的真的来了,所以她今天很激动、心慌。

纳斯焦娜从桌旁站起身来,拖着累得酸疼的双腿,一瘸一拐地爬上铺板躺下了。现在她可以告诉他,她为什么来的了。

“安德烈,你知道吗?”

“什么?”

但她改变了主意。

“算啦,过会儿再说。”

纳斯焦娜想等他挨到她身边时再说,他还坐着吃呢。她发现安德烈吃得很慢,显然是最近养成的习惯,因为没有什么要赶忙的。他终于站起来了,但吃出了汗,打开门想吹吹风、凉快凉快。一股冷风直扑纳斯焦娜,她叫喊起来:

“快关上门!”

“关上了,关上了,风好像小点了。”

“嗯,是小点了。”

他走近她身边坐下。

“你还没暖和过来吗？”

“暖和了，可一想很快就得往回跑，浑身就发抖，我来这一路上，就累得要死了。”

“你多呆一会儿，好好歇歇。你一个人不能走，我送你。”

“怎么能多呆一会儿？安德烈，我是偷着跑出来的，一句，半句也没对家里人说。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发现我不在了。我深更半夜才跑回家，谁不烦呀！本来我就是爱晚上出去闲逛，今儿再晚回去，老人们会想，瞧这媳妇……”一想到又得深夜去敲已经上锁的门，纳斯焦娜就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问起过这方面的事吗？”

“还没问过，一直不吭声。我真不明白，他怎么到现在还没发现猎枪不在啦。你看着吧，很快会一件接一件地露馅的。”

“你想好了没有，他要问起来，你怎么跟他说呢？”

“想倒是想好了……”纳斯焦娜说着皱皱眉头。

“你想怎么说？”

“我干吗要把自己的谎话说给你听，我不想说，你不用管，我自己想法对付吧。”

“你很苦吧，纳斯焦娜？”

“噢，不。”她睁开眼睛，笑了。那被暴风锉过似的脸膛，暖和过来以后，变得和马林草一样通红，笑容反而显得很淡。“我就是心疼你，”她没有，也不想说出自己的全部感受，“我自己会怎么样？我很结实，跑多少趟，我都行。你以为，没有你我就会松快了吗？我每天都发愣，总惦记着你，今天是不是还活着。到这里总能知道你活着。”

“要不咱们暂时先不见面，你好歇歇、缓缓，我什么都有，能活下去。”

“你怎么这样？总说歇一歇，你先问问我，愿不愿歇歇。安加拉河很快要开化了，现在还能走过来，等冰排一摆开，有的是休息的时候。要是连你都见不到，那我还有什么啦？你什么也不懂。”纳斯焦娜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便下定了决心。她缓缓地、很谨慎地、拖长了语调，以满不在乎的语气说：“安德烈，我好像怀孕了。”

“什么?!”他喊出来的不是“什么”，而是“啊，什么”。安德烈坐不住了，蹿起来问她：“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吗？”

“还说不准。不过从来没有这样过，看来是真的。”她说得还是很慢、很谨慎，好像故意拖长时间，以便弄清楚他对这件事的态度。

“你怎么没说？”他开始还有点迟疑，可一旦他说出了这句来到嘴边上的话，就被打动了，一下子理解了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于是一股热流从头到脚贯穿了他的全身。“纳斯—焦—娜！”他低沉庄重地叫出了这个名字，便瘫软地坐了下去，抓住纳斯焦娜一只手说：“真是好样的！真了不起！现在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你明白吗？纳斯焦娜，你明白吗？原来是这样，是这样啊……我明白，现在我明白啦。纳斯焦娜，我没白回来，没有白回来。这是命运，是命运催我回来的，都是命运安排好的。我知道，我知道，你明白吗？我感觉到了。可我这个傻瓜还总是担心呢，担心的就是这个……”他没有喊叫，这些话是他边咳边笑，用冒着烟似的干哑嗓子一口气说出来的，说时他两眼放光，透过墙壁，望着远处；他对着纳斯焦娜，可又好像没看见她，没注意到她，他是在对自己说，在说服自己。“这就够了，不需要任何辩解，这比什么辩解都强。现在爱怎么就怎么的吧，哪怕明天我就入土也行，只要这是真的，只要我死后他能活下来……，我的血统传下去了，它没有断，没有干枯。我曾以为，以为我是最后一

个，绝种了。可他会活下去，他会扯起这条线，传下去。瞧，结果会是这样，啊！会是这样！纳斯焦娜，你是我的圣母！”他扑到铺上，紧贴着纳斯焦娜，搂住她，嘴里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摇晃着他那头发蓬乱的大脑袋。

起初纳斯焦娜见他高兴，自己也高兴，可是，听着听着就觉得委屈和不安了。他怎么只想到自己？那么她呢？给她留下什么位置？在哪儿？

委屈和不安她原本就有，所以才能来得这么快。一星期前，当她第一次猜疑自己体内开始产生一个新的生命时，向心头涌来的是一种几乎使她窒息的感受：深深埋在心底的，因早已不被指望而产生的屈辱，如今得到解脱，并证实自己是冤枉的。上帝呀，难道这是真的？莫非她也和正常的女人一样，也能做母亲？莫非上帝真的可怜她，才赐给她这种幸福？莫非在经过多年夫妻生活，多少枉然地期盼，徒劳的追求和祈祷之后，原以为没有任何希望了，它却奇迹般地出现了？这是怎么回事？她已准备上床，并且吹了灯，这些个“莫非”使她震惊。稍微平静之后，她在自己的大木床边坐下，喘了喘气，站起来，把隔帘拉得严严实实，脱去衣服，像个刚出生的婴儿，完全裸露着身子，站在窗口那好像故意低垂下来的，又圆又亮的月亮下。她怀着急切的心情，仔细地察看自己的身体，想在自己身上看出点变化来。她身体结实、健壮，体态丰满，但匀称得没有一点是多余的，肌肤温暖、白净、有光泽，整个身体因激动和神情专注而微微颤抖。但她在自己身上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时她看到窗格的阴森影子，像个十字架印在她的胸脯上，吓了一跳，赶忙躲开，躺到床上，躺在被子上面，两臂摊开，双眼微闭，屏住呼吸，以便不受任何细微的干扰。她聚精会神地细听体内深处的一个点，她找到了，找到了这个点，并能把它和别的部位区分开。她用手去触摸，这个点也给

她极轻微,但清晰可辨的回应:有啦。这是她的想象、幻觉,但从那一刻起,她的身体真的像怀了孕。是真的有了吗?她不会搞错吧?要是有了,怎么办,以后该怎么办呀?

是啊,该怎么办?幸福倒真是幸福,而且是很大的幸福!可若是它来得最不是时候,有了这种幸福又能怎么样?以前它在哪里,为什么一盼再盼,始终在盼,可它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她不是寡妇,也不能算有夫之妇,不知道今天算个什么人,也不清楚明天又会成为什么人。对纳斯焦娜来说,一切都乱了套,一切都错了位,头朝下,脚朝上。她自己还不清楚,除了自己丈夫以外,她从未和别人在一起过。但村里人不知道这些,只知道她近四年没有见过丈夫了。这种幸福从哪儿来,难道是风刮来的?要真能推到风的头上,那倒很好,可是行不通,总得找个活人啊!可是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干吗要去找,干么要把罪过归咎于一个无辜的人?而这个人真的是谁,又不能讲出来。

一切都搞乱了,往后会更乱!

也许什么事也没有,是她胡思乱思,瞎折腾!这种情况女人们遇到的还少吗!一次又一次的,看上去肯定无疑了,结果还是没有。她怎么就心慌意乱起来了,过去不曾怀上,现在也没怀上,今后也不会怀上。

可是,究竟怎么更好,是现在怀孕好,还是根本不孕好呢?如果非得选择的话,怎么更好,怀上好,还是永久等不到好?

她来找安德烈,就是想和他商量一下这件事,拿个主意,也好安下心来。但直到最后一分钟,她还拿不定主意,值不值得讲出来,还是等有了把握时再说,先暖和一下,依在他身边呆一会儿,耐下心来,鼓足了劲再说。她要求的不多,只想在和自己同命相连的人身边坐坐,这个人好像在带她离开人群,越来越远,而把她只留给自己。不靠他,不在他这儿找点安慰,又能去找

谁呢？

但是，当她讲出来，听了他因为高兴而前言不搭后语，没完没了的絮叨之后，后悔了，她没料到他把这件事看得这么重。

“那我呢？”纳斯焦娜从铺上欠起身，问道，“我该怎么办？难道你忘了，啊？我是在人们中间过日子，叫我怎么对他们说？又怎么对你的父母说呀？他们肯定会问的，他们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么明显而又迫切的问题，安德烈不知怎么竟没想到。他站直了身子，又坐下来，惊慌失措地盯着她。

“不知道。”他耸耸肩膀说，“咱们不管这些。”

“你可以不理这些，这儿就你一个人。”

“你这是怎么说，纳斯焦娜？是不是连你自己也不高兴？”

“我高兴，可是如今该怎么办？我能藏到哪儿去，这事很快就会很显眼，露馅的。”

“你可记得，这可是咱们千等万盼的呀！”他的话音里隐含着一种委屈，他还和刚才一样，不愿意去多想。

“记得……我怎么能不记得呢？你干么这样，安德烈？还用得着你劝我？那时整宿地祷告，祈求给你生个孩子的，不是我吗。我什么也不求，只求生个孩子。我不是总担心，怕是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吗？不能生育的罪过只会落到我的头上，不会是别人。你不是也怨我吗？我的处境比你糟得多，我在人家眼里是个骗子，小偷。公婆生了你，指望我也能生养，你娶了我，也指望我，可我呢——瞧瞧吧，她只是个太平鸟。我好像是占了别人的位置，偷享了别人的幸福。你不知道，我暗中骂过自己多少回。当初要有可能，我早就悄悄地走了，再不，就跳进安加拉河了，好让你摆脱我。是你自己不放我走的。后来，就是这场战争。可是你还问：‘还记得吗？’我不记得，还有谁能记得？！现在

高兴得又想唱、又想跳的还能是谁呀？我也许是再生了，老天爷呀！可是你不在呀，不在家、不在家呀，安德烈！”纳斯焦娜停下，哼哼一阵，挥着手，像要从身边赶走那个蓬头垢面，又蠢又笨的幽灵。“你不让我对任何人说你在这里。好，不在，就是不在，我现在不说以后也不说，这个我懂。可是，要真的有了，到时候孩子出生了，可又不是你的。说是谁的都行，就不能说是你的，因为你不在家，也不知你是死了还是活着。你不在，我却用裙子裹着孩子送给你父母，也许，他们会对我说声谢谢吧？也许，人们会可怜我？是啊，要是他们以为你死了，倒好些，那样即使有人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也不会一下子就上来责骂我。可是，现在人家都认为你随时会从前线回来，回到我身边。可我，我又能做什么？叫我怎么等你回来。到时候连最没皮没脸的人都会对我指指戳戳：‘瞧，你干的什么。’他们这么做也没错。可我腆个大肚子，要避人耳目是很难的，安德烈，我怕我应付不了啊！”

安德烈一声不吭，心情沉重，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一个角落。他沉默很长时间，纳斯焦娜起初有些尴尬，后来就为自己这番话感到害怕了。因为这说明是她不想要孩子。可是现在突然碰到这个点儿上：果刚结上，可以让它长下去，也可以摘掉它，摘掉它，也就没有什么事了，一切都取决于她。只是要也不好，不要也不好。不要吧，她不愿意，不能不要。放弃自己多年的期望，这事太大，她承受不了，也太可怕。她只求这事别再由她拿主意，只求这既成的事实已不可做任何改变。

“安德烈，我不知道怎么办。”她歉疚地又对他说了一句，期望得到他的支持。“我不知该怎么办，心里很乱。”

“命中注定，谁也逃脱不了。”他终于说话啦。“你想充硬汉，跟它对着干，但总是拗不过它的。”他阴沉地，非常肯定地微微一笑，似乎他比别人更懂得这一点。他沉默一会儿，捋了捋自己的

胡子,接着就更自信,更凶地说道:“这是命运,是它把我从战场上撤下,又送到这里的。也许,是它拗着我的劲,在我死之前安排咱们相聚。你以为我像森林野兽一样躲在这里,好受吗?啊?好受吗?当人们都在前线打仗,我也应该在那里,而不是这儿,我的日子好过吗?我憋得学会了狼嚎,要不要我给你表演一下?”没等纳斯焦娜同意,他就站起身来,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门口,把门大敞开,探出身子,没有马上开始。他先哽噎几下,像是先憋足了气,逼尖嗓音,接着从胸腔里发出尖细得刺耳,叫人心颤的,长长的凄怨的叫声。纳斯焦娜吓得一下子蹿起,跪在铺板上,两手抓着胸口。安德烈突然停止了这非人的嚎叫,关上门,咳了几声,转过身来问:“还像吗?”接着自己做了回答:“很像,你要知道,当你听到狼的叫声,那就是我在叫,这里的狼早给我吓跑了,大概都跑到你们对岸去了。瞧,我找到了一个多么开心的事。你以为这是因为没事可干,闲得无聊吗?不……纳斯焦娜,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因为过得太快活了。你干吗要把我最后的希望也夺走,叫我白回来一趟呢?这不是叫我白受耻辱吗?你说出了,使我有了希望,可你又要把它夺走,那我就更痛苦了。你把孩子生下来,我也对得起自己,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说这是最后的希望,因为这对我就是一切,是我一生的全部。人家知不知道没关系,可我的骨肉会知道,他是我的,将来只有我们的骨肉会记得我们。”

“还不一定真有呢。”纳斯焦娜很温和地反驳说,“我说了,还不能肯定,还得等等看。”

“没有就算啦,如果有了,就留下,别毁掉。就算救救我的魂灵吧。我可能明天就不在了,也不会再打扰你了,你可以另做打算,随你……”

“我才不要你死呢!你说些什么呀?!”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好也罢，坏也罢，是在一起过的。接着是四年战争。尽管相隔几千里，总还是拴在一根绳儿上的。难道这都是空的，白过了？难道我们共同的生活什么也不会留下？你还要活下去，你还年轻、漂亮，但那些是过去了，拉不回来了。不管你今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儿，在你的生活中总有过我这么个人，你能把我搁到哪儿去？多少女人是拖着一大群孩子经历战争的，可你连一个都不想要。若是孩子在战前就有了，你会怎么办？”

“难道我不想要孩子，安德烈？！难道我不想要？！我想要，你干吗尽劝我？你干么这样说？”

“你看到我不是从正道回来的，可你没拒绝我，没有赶我，没有出卖我，帮我活了下来，要是没有你，我早就完了。你也知道这副担子有多重，你还是担起来了，没有害怕。现在我们也不成为一个家了，这算个什么家？一分两半！可是谁能想到，就是现在这样，我头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尽了做丈夫的本分。我这辈子也算没有完全白活。怎么说呢？！你原来只顾一面就行，这就是安加拉河右岸的人们，现在要顾两面：那边的人和我。又不能把两边拢在一起，除非安加拉河干涸了。当然，我这么说说容易，不是要我拖个大肚子。我就在这里躲藏着，一直到死吧。”

“别说了，安德烈！够啦，别这样。”

安德烈的冲动劲过去了，他坐到铺上，又仰着躺下，让急促的呼吸平缓下来。但他言犹未尽，心中的余痛未消，只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起来了，但已经比较平静，比较轻松了，因为主要的已经说了。

“你是怕别人风言风语吧……有什么可怕的，能把你怎么样！人嘛，就和狗一样，看见谁在那儿不怎么对劲地动一下，它们就会嚷嚷，狂叫一阵，就不做声了。接着就又等着别的什么人

再出点错。当然，别人会数落你，臭骂你，这是免不了的。会有人嚼舌头，会很卖劲的。只要让他们去张扬你的大肚子，他们都能忘记吃饭。就让他们去张扬吧，让他们去挠自己的痒痒吧，这是人们身上的疥疮，一种瘙痒症。总有人喜欢议论别人是非，他们不这样不行。你知道了，也别吭声，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理他们——很快就会安静下去的。等到他们议论下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和大家一伙的了。这种事是第一次吗？还是为同一件事，为此他们曾大骂过你的那件事，他们会转过来夸奖你。人哪……若是他们自己遭到这种事，不知会怎么样。不要听别人的，凡事要自己拿主意。孩子吗，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孩子的父亲是你的丈夫，你在谁面前都没有错。你要用这个理儿来保护自己，解脱自己。是啊，以后你的日子不好过，可现在就好过吗？”

“我也没抱怨嘛。”

“是抱怨，这看得出来。”

他们没觉察窗户上那块小玻璃已不再晃荡，过冬小屋起初还算亮堂，现在已完全沉浸在宁静的黄昏中。狂风已经过去，只有被挡回的几缕小旋风，一会儿在这边墙上，一会儿又到那边墙上乱窜。炉火已经烧透，发暗了。

安德烈中止了谈话，用风挡关上了烟筒口，不让热气往外跑。他看看窗外，从山上刮过来的雪，几乎堆到玻璃窗那么高，湿雪粘糊在树干上，低垂的天空下，一切都平息了，只有轻风还在吹赶着片片零散的乌云。

纳斯焦娜转过身，看着安德烈。安德烈走过来，又挨着她躺下，和原来一样。但是，安德烈这次不很必要的从床上起来，意味着他们俩除了已经说过的以外，目前不用再说什么了。是的，也真得等等看。不要弄成和有的女人那样，一边哭，一边数落：

哎哟，我要是有个孩子，要是他生病了……该说的，安德烈都说了，纳斯焦娜也都听了，这就行啦。要有耐心，过几天，一切就完全清楚了。

纳斯焦娜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暗自小心地伸直了身子，想抻平身上起的疙瘩，只要稍有紧张，她这个病就复发。就像从体内生发出来的小包，有点疼，叫人不舒服，一旦起来，就不容易退，消得很慢。

纳斯焦娜一直提防着，怕安德烈忘了他们之间那个不很牢靠的默契，要破坏它。

安德烈动了一下，纳斯焦娜一愣。

“很久以前，前年夏天我梦见了一次。”安德烈突然说起来。为了让纳斯焦娜跟上这个改换了的话题，他起头讲得很慢。“梦中见到的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样：我们的驻地，和我一起打仗的人，都和我们睡觉时周围的情景一样。我刚睡着，一个姑娘从白桦树下向我走来，白桦林离我们很近。我好像不认识她。她穿一件破连衣裙，又饿又累，光着脚，一点都不像你。但不知为什么，我认定那就是你。”

“那就是我。”纳斯焦娜惊奇地表示肯定。“我认识你以前就是那个样子，头发剪得很短，像男孩那样，是不是？”

“是剪的短发。”

“那就是我。”

“怎么会呢？既然我没有见过你那种模样，你怎么会不走样地出现在我的梦里呢？”

“不知道。也许我给你讲过。那是我从前的样子，是我。”

“我是说，不知为什么，我就认定那是你。那个姑娘走近跟前对我说：‘你干吗耗在这里？我在家带孩子可累苦啦，你一点都不心疼。’我问她：‘你有什么孩子？你哪儿来的孩子？你要干

么？你回家去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孩子。’她听完就走啦。”

“就走啦？”

“她好像很听话似地走了。可过了一会儿又站在我面前了。和第一次一样，呆头呆脑地说：‘我在家里带孩子可累苦啦……’这回我严厉地对她说：‘走开，别再来缠我，你根本就没有孩子。’她好像懂了，想了想，就往回走了。这个梦非常清楚，在梦中我好像也想睡觉，就是睡不着：合上眼，从眼缝中还是看到她从白桦树那边走来，一次接一次，总是这样。她整整搅了我一夜。”

纳斯焦娜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欠起身，还没弄清楚是什么促使她要对这件事刨根问底儿，就急忙追问：

“那后来呢？最后你对她说了什么，最后一次说了什么？”

“不记得了，大概还是那些话，我又能说什么呢？”

“那你也可怜可怜她呀，别顶她呀。”她很泄气，又很无奈地回答说。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看她求了你那么多次呗。”纳斯焦娜凝神盯着跟前，好像是对眼睛看着的东西说：“你们那儿还有大炮，洼地里停着汽车，我就是从洼地上去，走到你们那儿的，汽车很大，绿色的。你睡在毡鞍垫上，军大衣上面还盖着雨布。你睡在边上，挨着睡的还有三四个你的战友，我正好是从你睡的那边走上去的。”

他撑着胳膊抬起身，盯着她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也做了这个梦。不过是从我自己这面做的，你说怪不怪？！”纳斯焦娜惊恐地愣着，倾听着，想听到来自体内的暗示，告诉她这种事可不可以讲出来。两口子做同样的梦，她活了这么大，还没听说过。两个人做同样的梦，这一定是个不平常的，预

示吉凶的梦。这个梦不用猜，它的意思很清楚。她很小心地回忆梦中的细节，一旦觉得不妥，就准备停下来。“是一位老大娘指点了我，长得什么样，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她对我说，去找他吧，跟他说说孩子的事。如果他承认了，认可了，那就好，就真的会有孩子，如果他拒绝了，你就还是老样子。听了她的话，我就去找你了。你是怎么也不肯承认。我走啦，又转回，又走了，又转回。可你怎么也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想暗示你，但我不能。你生我的气，赶我走。最后一次是怎么样，我记不得了。只记得离开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姑娘时的模样，而是我现在这个样子了，为的是对你能起点吸引作用。我也以这副样子去找过你吧？”

“是的，来过。”

“你对我说了什么？”

“不知道，不记得了。”

“你总该说点话吧？”

“可能是说了话的。”

“瞧，连最主要的都没猜出来。”纳斯焦娜再也忍不住，责备道：“你当时表示认可了，或者至少不吭声，对你有什么大不了的？那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不是所有的梦都可信。”他不是很有把握地反驳说。

“你自己也看见了，这是什么样的梦嘛！俩人在同一个夜里，做了同样的梦。可能，是我的魂灵去探望你啦，一切才都对得上。”纳斯焦娜还不死心，又接着追问：“从那以后，你再也没有梦见我和孩子吗，一次也没有吗？你好好想想。”

“没有，一次也没有。”

“也许是你忘了呢？这场战争……把一切都打得粉碎，把什么都糟踏了。”

“不会的，这种事我不会忘的。你那次梦里来看我，都过去

两年了,我还记得。”

“就是那一次你也把末了给忘了吧,现在还怎么能猜出末了是怎么样的吗?”

“那个梦也许就没有末了。命运有意地把末了留给了我们,让它在咱俩的生活中显现,而不是在梦中。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总会出现的。”

“你怎么老是讲命运,过去我好像没听你讲过。”

“你也会讲的……”他点点头,苦笑一下。“你也会的,还抱怨我呢。当命运就守在你身边,绊着你的脚,寸步不离,把你乖乖地拴住,要把你怎么样,就把你怎么样,那时你也会讲它的。”

“我根本没想过要抱怨你,只是随便说说。”

安德烈示意纳斯焦娜往脚下看看。

“现在命运拿着鞭赶你,把你套在我的车上。”安德烈像是吓唬,又像是怜惜地说:“我看你这回怎么逃出命运的手心?”

“我干么要逃出去,我要和你在一起,已经是这样了,就让我们在一块。”

十一

纳斯焦娜心情总算轻松些,心里舒坦些了。但是重担并没有卸掉,反而越来越重了,也根本不能指望卸掉。但是她的心情开朗多了,如同在身陷迷途,精疲力尽的情况下,纳斯焦娜忽然辨清了自己身在何处,虽然身在远地,比所期望的要遥远得多,现在她已经知道怎么从这里走出去了。至于有没有足够的力气走出去,能不能通过各种艰难险阻,那是另一回事。不过该往哪里走,沿着哪边走,她已经看清楚了。

这对纳斯焦娜来说,就是不要折腾,接受已有的事实,不和命运抗争。以后会怎么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虽然她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但是她明白,只能这样了。看来,这杯苦酒她得喝下去了。后退已经晚了,她也不想后退,那等于她否定自己。她跟安德烈争执,是想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支持的话。她还能从谁那里得到支持呢?她给了他一线希望,他不能不狠狠地抓住。目前,这对他来说就是空气。因此,他会说什么,是不难预料的。

既然事情来了,也就顺其自然吧,走不通再说。那么她是该喜,还是该忧呢?这事是怎么来的,是福,是祸呢?

这些以后再说吧,来得及,总会有办法的。

事情说清楚了,心头的慌乱也就平静下来了。豁出去了,该咋咋的吧:她纳斯焦娜走得太远啦,要怕的事太多了,所以干脆什么也不用怕,照直走自己的路。纳斯焦娜觉得她是被命运或是更神威的什么给瞄上了,并且盯住不放。要不怎么会有这么多麻烦一下落到她的头上。这得很显眼,引人注目才会这样。是啊,她眼下是很难,但老是像过去那样,窝窝囊囊地活着,在那条又短,又没出路,又无指望的小路上磨鞋底就痛快吗?人们不会不宽恕她的,必要时还会帮她的,看着吧,为了她忍受的苦难,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她、抬举她哪——什么也不能白得。她要忍得住,挺得住。窝窝囊囊地当个没用的婆娘,说什么她也不干,那还不如不活的好。

和所有活着的人一样,纳斯焦娜从小就想望自己的幸福,想望和亲人分享自己的幸福。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幸福的想象也不断地变幻。在她当姑娘的时候,她的幸福之神也是轻盈游荡,自由自在,随时随地都会降临,四面八方畅行无阻。纳斯焦娜确实梦见到,她站在中央,幸福一会儿从左,一会儿从右向她

飞来，逗弄她，触摸她，这触摸温柔可亲，让她感到舒服，同时又是稍触即逝，像是在挑逗她，召唤她，直到留下许诺才飞走。幸福是那么丰富多彩，含有那么多的叫人心碎的，从未体验过的快乐、爱和满足，叫人恨不得马上投身进去，并沉浸在幸福之中，每时每刻都能享有幸福，不再成为不幸的孤儿。同时，对幸福的期待是这样愉快和甜蜜，致使她又想推迟和幸福相会的时刻，反正，幸福早晚总要来的。纳斯焦娜出嫁时也没有认真想到，她给幸福可只留下她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了。不过这条路还算宽广，足以使她既错过更好的运气，也能躲开不幸。婚后的家庭生活，在她看来，是安定的，但也是很操劳的。夫妻生活称心、愉快。平时日子过得很快，节日就更加欢乐了。当然，过日子吗，难免有时也会磕磕碰碰，完全顺心如意是不可能的。但事后总是和好如初，又恩爱和睦地过下去。何况，从一开始纳斯焦娜就打算付出比她获得的要更多的爱和体贴——使共同的生活祥和温馨，这是她做女人的本分。正因为她是女人，才赋予她一种惊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愈是充分地发挥，她就愈加温柔可亲，多姿多采。纳斯焦娜相信她确实有这种力量。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大概，她没有错。可是这幸福……幸福，最初曾经在这处闪现过，并激起她希望的幸福，后来因为没有孩子，就退到未来去了，在未来还能和它相逢。但是现在，通往幸福这条路，虽然还能看清，但比以前路窄了一多半，实际上只是一条荆棘丛生的小道。

纳斯焦娜对做过的事情从不后悔，从不回头往后看，从不琢磨过去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事应该怎么，不应该怎样。生活不是衣服，不能比量十次才穿上，它是什么样，你都得过，躲不开，哪怕是糟透了的日子。她和安德烈之间，也有过很不痛快的时候，但她从未想过改变自己的命运。该纠正的，她事先纠正了。做好的衣服从未改裁过，让自己身边出现另一个男人也从

未想过。因为那样,就得把自己也变成另外一个人。那怎么行!别人愿意怎样,是别人的事,她要有始有终地过下去,绝不朝三暮四。她要等到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的。

据说幸福没有那么多,不是所有人都能分享到,有人走运,有人倒霉,而纳斯焦娜这个人在世上就这么一个,无人能替代。那为什么偏偏是她得不到幸福呢?是谁这样安排的?她是为了获得幸福而生的。既然她可能得不到幸福,那干么还给了她生命?她的生命只存在在她的心上,在她的灵魂和躯体中,其他的一切,哪怕离得再近,也是身外之物,都是由于她而存在的。那为什么幸福好像有意从她身边绕过,落到别人身上呢?不行,不能对人这样。如果她能再活第二次、第三次,补回错过的幸福,那敢情好。可是不可能再活第二次,也补不回来已经失去的幸福。想在离开这个世界走的时候,把自己的一切都带走,不留下点什么,那是不可能的。

战争长时间地阻碍了纳斯焦娜的幸福,但就是在战争期间,纳斯焦娜也一直相信幸福会有的。战争结束,和平降临,安德烈就会回来,这些年里停住的一切,又会启动起来。不然,她就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了。可是安德烈提前回来了,在胜利之前就回来了。这把一切都搞乱,搅混了,出了格——这是纳斯焦娜万万没料到的。眼下要想的不是幸福,而是别的了。幸福被吓得不知躲哪儿去了,消失了。看来,它再也不能回来,再也没有希望了。

越往后,越糟糕。

难道就一直这样下去,再也得不到幸福了吗?纳斯焦娜从来还没有落到这么可怕的地步。前面看不见一点光亮,一片漆黑。真是这样,越往后越糟,今天不好,明天也不会好。可这“糟糕”的事,却是孩子,她朝思暮盼,非常想要的孩子。正是这孩子

断送了她的幸福。可孩子却是她一心渴望得到的幸福。这是不是意味着幸福已来到她身边,只是从相反的方向,从她背后来,或者是她从背后走近了?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能相会,不错过就行啊。

可是,眼下这幸福给她带来的是什么呢?

不,总该发生点什么,改变她的生活,否则,很快她会发疯的。现在终于发生了。怀了孩子,说明老天有眼,不让她就这样完了。要是有了孩子,那她还需要什么呢?!孩子一定会有的,会有的,他正在动,正在走来。

现在纳斯焦娜知道该怎么办了——什么办法也不想,也不做,听其自然。她自己命中注定的幸福,因为经受了太多的磨难,和她分开了,不在一起,但它一定在远处或近处什么地方等着她呢。

她继续躺着。这时小圆面包也越滚越远了。^①

他俩躺在铺上,说些投合对方的话,好像都想用些温柔体贴的废话,把刚才说的那些主要的,但又不坚固、易碎的,不牢靠、脆弱的精心包装一下似的。这种话躺着说方便:可以闭上眼睛,说些面对面不好说的话。也可沉默一会儿,不会为此感到拘束,也可各想心事,然后再说到一起。

天渐渐黑了,他们没点灯。尽管没有月亮,因为下了大雪,小窗上还是映出一片凄迷的寒光。在这种光线中,安德烈和纳斯焦娜显得脸色苍白,神志滞呆,他们的动作好像是被别人牵动的,说话的声音也像从别处传来的。在这寂静的时刻,安德烈和纳斯焦娜彼此看到的都不像他们本人,显得很陌生——这本应

① 出自俄国民间童话。有个小圆面包到处滚动、漫游,最后遇到小狐狸,被吃掉了。这里喻指纳斯焦娜的幸福越来越远。

是紧张、激烈的一天，竟能在如此心平气和，周围的一切都很融洽的气氛中过去了，最后达到了彼此完全谅解。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他们低声细语，像似说悄悄话地交谈着。他们的谈话轻松、随意，没有什么要特别着重说的。话题像钟摆一样来回摇晃，一会儿在这边停得时间长点，在另一边停得短些，有时又干脆停下来不动，然后又重新晃动起来。就在一次这样的停摆之后，安德烈突然莫名其妙地问道：

“纳斯焦娜，你要我做点什么？”

“怎么，我要你做什么？”她没有明白安德烈的意思。

“我可知道我要你做什么，这你也知道。今天我们谈了的，我不打算再从头说起。但除了那些，我还需要你为我做很多，你得供我吃，供我穿，我这里的一切都是你弄来的。我已经不好意思总是伸手要，没完没了地拿，却不能给你一点什么。看来，我多少还有点良心。我完全靠你养活。这还不仅仅是个普通白吃饭靠人养活的人，他一个人要连累十个人，不止十个，还更多！因为他，你现在怕见人。我不敢见人，是活该，可你又为什么？你为啥要跟人世隔绝呀？我知道，你可怜我。今天咱们说的事，你也是可怜我。你就是这么个人，你瞧着吧，你不会不要这个孩子的，我不是故意拿话刺你，不是的，是我了解你。你也许想过不要，但你不会，不会不要，纳斯焦娜，你记住我这个话吧。我把全部担子都推给了你，推给你，而我自己只能在边上看着。只能靠你自己苦撑着。你说得对，我能干什么？能干什么？我很想帮你一把，我不习惯赌现成的。只要能做点什么，我使出吃奶的劲都行。你倒是说说，要我干点什么？”

“要干什么？什么也不用。”

“瞧，什么也不要。”他早有所料地接茬说，似乎也没想得到别的回答。“你瞧，我需要你帮助，而你却不要我帮助，看我落到

了什么地步啦,都不指望我会有什么用处啦。这个我自己也知道,可还是想做点什么,心想,万一要我做点什么呢?可没有。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呢?也没有。就是说,我只能带来痛苦,带来害处,再没别的了。很明显,我成了不可救药的人,我对所有人都是个没有用的人——可我想,不是为了你,我会走这条路吗?我又想,你能不宽恕我,在心中给我一块哪怕是很小的地方吗?”尽管他感到钻心的刺痛,还是说得很镇静,不慌不忙,好像挖苦自己,忍受痛苦反而使他快乐似的。“结果你只是可怜我,现在这对我,当然,也是一种解救。可只靠可怜是撑不了多久的,怜悯这根绳太细,随时都会断的。”

“你这是怎么啦,安德烈,你怎么啦?”纳斯焦娜惊恐地打断了他。“我以为你是顺便问问,我也就随便跟你那么一说,瞧你想到哪儿去啦!你怎么这样,干吗要这样?你一个急拐弯,就把我从爬犁上甩下去了。你可不要甩下我,别这样。你看着吧,我对你是有用的。只要你愿意,我马上就可以给你找很多事干。”

“什么事?你说说看。”

“先不说这些为好。过不了多久,我的日子就真的不好过了,要是连你都不相信我,我还有什么啦?”

“没有我,当然会好得多。”

“什么?是啊,会好一些。”她回应道,“要是连我自己也没有,那就更好了。什么也不知道,看不见,听不着,不用操心,没有烦恼,那该有多好,多清静啊!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是成了这么一个人,我把自己往哪儿塞呀?你干么说要是没有你更好?我不愿意听这种话!你不要把我和你分开,不要分开。”纳斯焦娜缓和了一下口气,又接着说:“让我们一起担着吧,既然你在外边犯了罪,那我和你一样有罪,我们就一起来承担吧。要不是为了我,你也许不会干出这种事。你别把罪过都往自己身上揽。”

我一直跟你在一块，难道你不知道？你在哪儿，我也在哪儿。你呢，也是一直和我在一起。我们连梦都做一样的，这会是平白无故的吗？唉，安德烈，不是白做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到处都是在一起的。一半在这儿，一半在前线。你以为怎么，要是当了英雄回来，就没有我的份儿吗？我不能和你一起高兴吗？就是要高兴吗！我会把自己看成是比你更英雄的英雄。我的男人是英雄，不是别人的。我会扬眉吐气，大摇大摆地在村里走走：瞧啊，娘儿们，羡慕我吧，这是我啊，看我多风光啊！”

“你别再提这些了，别这么比啦……”

“怎么啦？为什么不能比？你落得个另外的样子，那怪我没有好好提醒你。你没在前线钉到底，那不是你信不过我，就是我对你的惦念不够，或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你别想抹去我的罪过。我自己知道。比方说，我没有等你，扔掉这一切，跟别人跑啦，你能认为这是我一个人的错吗？”

“那还有谁的错？”

“不，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这里你也有份。怎么能没有你的事呢？也许，还在很久以前，我们自己都忘了的时候就定了，是咱们一块定的，我一个人没有这个胆子。天哪，我说些什么，我什么时候也不敢这样想，我们也没有理由要分开，干吗要分你我。我和你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共同生活。一切顺当的时候，在一起过容易，无忧无虑，日子像做梦似的就过去了。更需要的是，倒霉的时候要在一起——人们正是为了这个才结为夫妻的。我不能生孩子，你没有赶走我，你认定了我这样一个人，没有想去找更好的女人。那么谁能允许我现在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你。那样，我以后也会被痛苦折磨死，我会把自己撕碎的。”

“倒霉和倒霉也不都一样，纳斯焦娜，我是罪犯，要制裁我的是法律，干吗还拉着你和我一块儿当罪犯呢？”

“现在再问这个已经晚了，当初，你走这一步之前就该想到这个。既然已经走了——也就把我带上了。别的我做不出来。你自己也说，我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也正是这么回事。你相信我吧，相信吧，要不咱俩都不好过，咱们自己折磨自己。”纳斯焦娜停下，等着安德烈的回答。可他半天也不吱声。她想了一下又说：“也许，我也想自己有另一种命运，可另外一种那就是别人的。而我的命就是这样，我也不后悔。”纳斯焦娜又停一下，又接着说：“一切都会对付过去的，安德烈，会过去的，你看着吧。”

他一直没有说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样也很好。你记住，我不需要很多，我和你在一起——这就挺好。其他的都隔得太远，太远了。我不想记住过去的事，也不想看到将来的事，我甚至不相信，将来还会有什么事。也许，一辈子就这样下去了——我和你，咱们在一起。我只要你把大胡子刮掉，带着它你像个生人，我不能习惯。就这些，其他的随你吧。”

纳斯焦娜欠起一点身子，朝他转过脸去。他没有看她，仅从她呼吸的变化中感觉到她在微笑。他俩一直不动地躺着，都是面向顶棚，似乎没有过话，两个人都是自言自语，安德烈从头到尾都是闭着眼睛说话，这样讲起来确实轻松些，但为了回应纳斯焦娜的微笑，他睁开了眼睛，正好对上她那专注而又柔顺的眼神，他受不了，移开了自己的目光。

“为什么咱们过去一次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谈谈，交交心呢？”安德烈怀着平静的，无可奈何的遗憾心情摇摇头，以此确认自己说的是实情。“那一切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也许，只是觉得可能，鬼知道！但是，没这么谈过，这是肯定的，没谈过。谈的都是谁该干什么等鸡毛蒜皮的事，每天说的都是这些。四年里有的是时间好好谈谈，彼此更深地问问，都在想些什么。可见

我并没有真正了解你。我认得你的脸,知道你的外表,有你这个人,就得啦。至于你这个人怎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妻子,就不清楚了。真不敢想:我还对你动过手。”

“你没有对我动过手。”

“没有动过?”

“没有。”

“你这是不想跟我记仇。好,没有就没有吧。其实,你要真记我的仇,我可能会好受些。我怎么配得上你呀?我会欠你很多,可你自己也看见了,我没什么可回报你的。哎,纳斯焦娜,纳斯焦娜!你不应跟我,该去跟别人。你别以为我只是这么说说,不,我是认真的。你是多好的一个人啊!怎么就倒霉地碰上我了呢?我真不明白。”

“我不要别人,跟你就很好,我已经说过了。不用你替我拿主意。”

“还能比跟我更糟吗……”

“安德烈,你什么都不懂。”纳斯焦娜满含着委屈和懊丧,近似呻吟地低声说,把头又靠到床头的短上衣上。“你倒说说,你到哪儿去了,怎么连我过得好不好都不知道?”他没有回答,估摸她也不需要回答。“你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一切都是生疏的,一切。可以说,我是闭着眼睛跟你来的。你领我上哪儿就上哪儿。就连你,我几乎也是不了解的,就像玩儿似的见了两三次面,又像玩儿似的,半开玩笑地就谈成了亲。我一直不相信,你会真来娶我。这够可怕的吧?整个生活要从头开始,从前,当姑娘时候的一切都无影无踪了,只有我一个人,我还是不是我,都弄不清了。你可能还记得,我从轮船上下来,连眼睛都不敢抬,走平地还跌跌撞撞的,你还记得吗?就是那样!我们登那个陡岸时,我两腿相绊,把自己绊倒,引得大家哈

哈哈大笑。更叫我心烦的是，连脚下的地我都看不清。你看起来啦，我是害怕，就搀着我走。我们一到家，你就说：‘就是她，我的妻子。’父亲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娜斯佳。’他随口改成‘纳斯焦娜’，从那以后就叫开了，纳斯焦娜，纳斯焦娜。母亲看着，不说话。我看得出，我不完全中她的意，她盼望的儿媳妇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你也觉察到了，就说‘她在这里就一个人，没有人袒护她，咱们不要欺负她。’这是指我。你轻声笑着说，好像是在开玩笑。可这是怎样的玩笑啊？当时我就相信，跟着你，不会错。尽管自己也不知道拚命地往哪儿奔，但是我相信，我跟着你会好的。”

“就在当天晚上，你带我去串门。你还记得吗？咱们去了维佳·别寥兹金，马克西姆·沃洛格任家，还去别人家。我忘了告诉你，马克西姆前两天回来了，他说一只胳膊残废了，现在还缠着绷带呢。”安德烈屏息听着，对这一消息没有任何反映。纳斯焦娜又接着说：“你倒不是拿我去显摆，是想叫我快点和大家认识，不要在他们当中像个外人。还真是这样，第二天早晨我见到纳季卡·维吉娜，眼珠都快瞪出来了。心想，这里怎么会有我的熟人呢？因为我见过这个人，是见过的，可是在哪儿见过，她是谁，怎么也想不起来。过后想起来了，上帝呀，就是前一天见过的。我的记性不好，脑子里全搞乱了。她呀，可高兴啦，像见到亲人似的。我记得，起初咱们睡在仓房里，是你愿意的。就在那里搭了一个铺。开始我还觉得有点怪。仓房倒是收拾得很整齐、干净，就是那间靠院子边上的小仓房。就是没窗户，很暗，很暗。也是这样放的铺板，后来那些铺板到哪去了，是谁拆走啦？啊，对啦，是你，就是你拆的，说用那地方圈个粮囤。可惜呀，多么平整的铺板哪！仓房很暗，就像在地下，散着木头和刨花味。咱们住进去以前，父亲在那儿做木工活，是吧？你身上也有刨花味，

我到现在还记得。你问我害不害怕，我说不害怕，有你在一起，我就不怕。这时隔壁鸡架上的一只公鸡好像偷听了我们的话，想试试我们，拼命地叫起来！我一下子就蹦起来了！”说到这，纳斯焦娜又笑了。她的笑声温柔亲切。她停下来，不笑了，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早晨，我半天才找到门，不知它在那一边。你一直睡到中午，把自己的新娘都给忘了。我去了安加拉河边，看了菜园，看了一个又一个。没有你，我不上餐桌，等着你。我记得，全家——父亲，母亲，你和我，一起喝了茶，吃了小白面包。你还悄悄地贴近我胡闹，好像我一宿都不在你身边似的。喝完了茶，你说：‘走吧。’‘上哪儿？’你说，‘到山上去走走吧。’你真的把我拖上了山和荒原。你指给我看了田地和撂荒地，把周围的一切都讲给我听，我们一直走到晚上。回到家，你的许多朋友坐在屋里。大伙儿说：‘娶媳妇了，把好酒拿出来吧！’维佳也在场，还有马克西姆，维佳给打死了，你大概知道。你知道，我信上写了。他死后，纳季卡又生了一个女孩。不记得我写信告诉你没有。如今她拖着三个孩，够苦的了，真够苦的，可又有什么法子呢？”

纳斯焦娜向躺在左边的安德烈瞄了一眼，只见他一脸呆板，呼吸都没有变化，毫无表情。这时她一下子想起来了，并感到后悔，不该说起维佳——他和维佳是好朋友。但纳斯焦娜也不愿意赶忙改变话题，去说别的，就是愿意，大概也未必能做到。回忆中的情境栩栩如生，欢乐、激动地在眼前晃动，好像在乞求她不要离开，继续下去。方才回忆出的那些场景涌到近前，似乎想拉她进去，让她在其中感到充实，然后再送她前行。身处重现的往事中果真很好，叫人感到幸福、愉快，给人很多希望！纳斯焦娜还是忍住了，不往下回忆了，够了。满怀新的憧憬和新的心境，她笑着问道：

“你还记得吗？你在培训班学习，我怎么去区里找你吗？”

那是在他们婚后的第二个冬天，集体农庄派安德烈去上会计培训班。他念了六年书，总算有点文化，因此村里说服他放弃一心想当拖拉机手的愿望，送他进了会计培训班。这一行虽然没有开拖拉机那么风光，但也是一种受人尊敬的，受重视的工作，又总坐在屋里，有固定的地方。可一旦和农机站挂上，就得一连几个月在外村的地上干活，和外村人打交道。就因为这个，安德烈在最后下决心时，选择了去培训班。

元旦安德烈回来过年，在家住到圣诞节，他走了不久，到了二月，纳斯焦娜就整装上路去看。到区中心要走七十俄里，在路上得过一夜。纳斯焦娜、英诺肯季·伊凡诺维奇，还有不知为什么着急去医院的瓦西莉萨·普列穆德拉娅，三个人挤在一辆不大的雪橇上。为了消磨时间，英诺肯季·伊凡诺维奇和纳斯焦娜谈东说西，一路聊着，他爱说话。瓦西莉萨可是一语千金，从不轻易开口。第二天傍晚才赶到。约好一天把事办完，就各走各的。纳斯焦娜要办的事就是探望安德烈。这种事给多少天也总是不够的。

安德烈住在一座又小又暗的木屋里，离安加拉河口不远，紧靠河边。纳斯焦娜不喜欢女房东，更不喜欢和安德烈同屋的那个人——上了年纪，阴沉着脸，一脸麻子，戴着一副像马遮眼的眼镜，两个镜片还不是一个颜色，一片比另一片深好些。他就躺在那里看书，既没有起身，也没说上一句欢迎的话。安德烈忙乱一番，带着纳斯焦娜到庄员之家去住了。

还在出发之前，纳斯焦娜就抱着一个希望，对这个希望她自己小心翼翼，怕把它吓没了，只是偷偷地想想。至于跟安德烈就更不能说了。她似乎觉得，她在家里不能怀孕，也许在这里就能怀上。在家里他们已经相互习惯，习以为常了。这里的一切都

叫人感到新鲜,而这一点肯定会起作用的。

俗话说,墙外寻欢,最易得子。这样的孩子就是要等父母不再盼望他们的时候才出世,得,当爸爸的只好祝贺吧! 纳斯焦娜当然不是想婚外求欢,她一向恪守贞操,忠于爱情。这次和以往所不同的,就是离家远了,也就是说离开了那个总也碰不上运气的地方。她并不相信,她这个臆想会有什么结果,可是越不相信,这个希望却越是急切,越想验证一下。

“还记得吗,那天上午你没去班上学习,跑来找我啦,咱们去了茶馆,很近,在街的对面。茶馆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特大的茶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茶炊的龙头有毛病,直漏水,漏得很厉害,龙头下面放着一个很深的盘子接水。不知道,干吗不把龙头焊一焊。一个大婶过来,从那个盘子里一下子给你倒了一满杯。你看见了,就说,‘这不行,我们要茶炊里的。’她争着说,‘这就是茶炊里的水呀。’你说,‘不,这是漏在盘子里的水,不能喝,是涮碗水。’‘这不是涮碗水!’‘是涮碗水!’她最后总算让步了,从茶炊给咱们倒了茶。我还记得,你买了纸包的糖果,我有滋有味地嚼着就茶,代替了砂糖。那糖是加了蜜的,很香,能拉出很长的丝。吃了以后,很长时间还是满口香味。”纳斯焦娜说着还咂咂嘴,舔舔嘴唇,好像是在回味那难忘的美味的糖果。

“我们在那儿吃饱喝足了,又回到了你的住处。你那个戴着两色眼镜的老家伙不在,可老太婆在家。她不是学会计的,一直盯着我们,看我们要干什么。不知趣的老太婆,她看出来了,我们等着她走开,可她就是故意不走。你只好想办法把她支走。你给她几个钱,请她到商店去打瓶酒。后来你跟我说,她喜欢亲自去打酒,这种事她对谁都不放心。老太婆临走时说:‘打酒,说好了,我走一趟,不过,再哪儿我也不想动了。’别着急,你说,慢点走,来得及。她回答说:‘我呀,来得及,可你呀,最好把钥匙插

在门锁里,这样我好能有礼貌地回到自己家来。’”

纳斯焦娜说着又笑起来,笑得温和,含蓄,身子都没有颤动。她的笑声像一个小巧的凸轮在水上轻轻滑过一样。

“后来,我们走啊,逛啊,玩了一整天,什么地方没去啊!”她压低了嗓门,拖长音调说:“我去了,咱们在一起,你高兴得不得了,我看得出,你非常高兴。而我,我也高兴得没法说,尽管是冬天,很冷,我高兴得浑身发热。走在路上我觉得脸热得发烧,手发抖。开始我还担心你会问我:‘你来干吗?’是啊,干吗?这怎么能说得清楚呀?我找你一点正事也没有,可就是来啦!我突然跑去,对你可是一件好事啊!我玩呀,逛啊,耽误了丈夫的学习。还看了电影!”突然她高兴地叫起来,几乎是喊着说:“你记得吗?我们还看了电影!瞧,差点忘了。脑子变得完全像个窄胡同,这么重要的事都没存住。第二天,我们往回走的路上,坐在雪橇里,我给他们讲电影里的故事,连瓦西莉萨都跟着唠起来啦。看电影时,我们坐在最后一排,正在放映口的下面。电影快放完时,你靠着我小声地说:‘要不你明天别走,再呆一天。’我摇头,但眼泪却下来了,流个不停。因为不是我,是你自己要留我,是你自己啊,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后来,后来,你记得吗?安德烈,后来,可笑死了。你送我回庄员之家前,我们又去了你的住处。我们知道,这次老太婆会和气些。我们一到,她说:‘亲爱的,再给点,我去打一瓶酒,你们就住在这吧,在我的小灶间里。’又说‘我嘛,到女伴家住一宿,我和她围着酒瓶子,一块暖和暖和。’你给了她钱。干吗不给老太婆面子呢。她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可我们还没来得及想好,要不要躺下,她又回来了。她说,‘商店关门了,商店关了就没有必要去女伴家了。’你自己出去跑了一趟,弄到了一瓶。总算把老太婆打发走了。后来,和你同屋,那个总绷着脸的老家伙

也没回来。不知到哪混去了。这样，就咱俩，美美地过了一整夜。啊，安德——烈啊！你还问，‘我跟了你好不好？’你说些啥呀？！你自己想想，我还要什么呀！”

安德烈既没听见，也没理会她说了什么。他听着纳斯焦娜的回忆，从一开始就感到一种甜甜的隐痛袭上他的心头，越来越强烈。让他痛苦的是，这一切确实是过去有过的，而他也还记得的事。可是他记得的这些事，却是那么枯燥、模糊、乏味和匆忙，这一切好像不是他的，而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而这个人又把自己的记忆传给了他。如今，他不知道对这些记忆该怎么办。这个记忆很活跃，爱寻根探底，除了痛苦，别的什么也不能带给他。这个记忆和他本人的记忆完全合不来，也不想相互理解。但它们竟能在他这一个脑壳里各占一方，互不混和，又从不越线。但是，他自己的记忆更凶、更强些，只要它想，总能占上风。

这次也是一样。纳斯焦娜稍显激动地回忆着，他不回应，只是听着，时而跟得上，时而又跟不上，停留在自己的一些细微末节上。尽管他跟着纳斯焦娜走在已经铺好，踩平的路上，他还是走不稳，跌跌撞撞，左顾右盼，担心她会把他带向哪里。当他自己的回忆赶上来时，他也不惊奇，因为本该如此，他似乎在等它。该受的就得受着，只盼早点受完折磨，再跟上纳斯焦娜。

他自己的回忆是从一根很细的蛛丝开始的。他不小心把蛛丝往前一擦，在他眼前就出现了画面，然后又闪出另一幅。这幅画面上的情景离今天很近。安德烈想挡住它，但没有这个力量。有关战争最后一段的回忆，总是来得很突然，一切细节都很清晰，牢牢地控制住他，久久不肯离去，令他恐惧，令他颤栗。安德烈不由自主地一次又一次地体验这种折磨。其实，每次都始于那件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的那件事：开始他住进了医院，然后，从那儿直接回来了。

……一个暖和的夏天的傍晚，他们在发射掩体完成了炮火准备之后，正准备向新的地方转移。和观察员的通讯联络早已停止。右邻的炮连已经撤走，左翼的炮连还在收拾，上级也没紧催。安德烈所在的炮班，已经卸下榴弹炮的瞄准具，折起并固定了炮架，正在套炮衣。阵地后面是一个怪里怪气的陡坡，稀稀拉拉地长着些小树。这时，从那里传来了牵引车的马达声，两辆汽车晃动着车身，吱吱嘎嘎地开到了大炮跟前。

看来，正是这牵引车的马达声盖过了坦克的隆隆声。转移前的忙乱，人们注意力的涣散，使他们对危险的警觉也变得迟钝了。他们也许听见了，也辨别出了异常的隆隆声，但是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德军的坦克爬上了前面的山头，稍停了一下，克服了瞬间的惊恐，向山下冲来。这简直是怪事，它们从哪儿钻出来的，前面是自己人啊！坦克打哪儿冒出来的？两个炮连里都有人喊叫，各炮班忙乱起来：扯下炮衣、竖起炮架，放下炮筒并转动着瞄准。当安德烈（他是装弹手）扑向弹箱时，被震昏了，倒在地上。往下摔倒时，他好像闭着眼睛看见了旁边一门炮车的轮子缓慢地飘起来，旋转着上升，然后又落下。这使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便向前一跃而起，抓住弹箱。

坦克一共是五辆。左侧的一连已经击中其中一辆，它中弹起火了。安德烈所在的二连还一炮未放。连长扯着嘶哑的嗓子喊叫着，其实，这种时候，该干什么，谁都清楚。坦克冲下山来，分成两路，两辆冲向一连，另外两辆奔二连开过来。它们很狡猾地插向二个连的中间地带，想迫使两个连相互向对方射击。但当时没有时间考虑这些。

由安德烈装填的，连里主力榴弹炮刚打出一发，他身边就是嘎巴一声巨响，接着就是金属的破碎声。他被掀起，翻倒在一边。

从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了纳斯焦娜亲热而又拖长的声音。她的声调使他直打冷颤。他听不清纳斯焦娜说什么，耳边是钢铁与钢铁的猛烈撞击声，短促，可怕。在那里，人好像没有用了。眼前重复地闪现出战斗的场面，腥臭扑鼻。从一团团浓烟烈火中传出喊叫声，一座炮架的驻锄没有固定住，滑动中划出一条黑土带。牵引车仓皇地退回掩体。一个名叫科罗季科的火炮瞄准手，微微抬起头来，看看自己被弹片扎成模糊一片的腹部和被气浪掀到半空的炮筒皮套。这一切都发生在越来越响，越来越可怕的履带的碾压声中。

纳斯焦娜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安德烈还没有从最后一次战斗的回忆中醒过神来。他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去，在纳斯焦娜的眼睛里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神情——她被自己的回忆所激动，双眼满含温情。安德烈再也忍受不住了，一头扎到她的怀里，呻吟起来。

“安德烈，你怎么啦？怎么啦？你这是怎么啦？”她惊讶地问道。

他差点没哭出声来，但忍住了。

“没什么，没什么，纳斯焦娜，你在这里，你和我在一起。”

但是，他仍害怕，害怕他方才在梦幻中看见的那场战斗还在进行，他不停地四下张望。

“你想什么啦？”纳斯焦娜双手抚摩着他的头，但还说自己的：“你真是个傻瓜，没有比你更傻的了。瞎想些什么呀。也许你和我在一起不得劲，那就别提我。可我跟你在一起顶好，向来都好，你记住这一点。我都不敢想，没有你我怎么能活。怎么能没有你啊？这些年我一直等你，等的就是你，不是别的什么人。每天我不先和你说会儿话，就不能躺下睡觉。早晨，不够着你，确信真的和你在一起之前，就没起过床。我想象中真的见到了

你。开始一个人也没有，只听见像是刮风的声音，后来就静下来了，越来越静。想必离你那儿不远了。接着就看到了，那不就是你吗！不知为啥，你总是一个人，一身士兵服，不是站着，就是坐着，一脸愁相，愁得不得了似的。你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我凑前看看，活着，我就往回走啦：因为不能在你那里停留，也不能和你说话。我就强撑着，一天一天地过。也许我盼你盼得太邪乎了，使你心烦，妨碍你打仗。我上哪儿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做了我能做的，就这样，没人教我，也没有人指点，连你也不说。唉，安德烈呀，安德烈……”

他双手抱住头，使劲地摇晃，似乎想甩掉难以承受的重负，呻吟着说：“天哪！我干的什么事呀？！干的什么事呀，纳斯焦娜？！”他放下手，转过脸，对着纳斯焦娜。“别再到我这儿来，以后别来了，听见了吗？我得走啦，不回来啦。不能这样下去，够了。不能折磨自己又折磨你。我不能这样啊！”

纳斯焦娜张皇失措地呆住了。

“这不行，”她拦住了他的话。“你要走，那我呢？叫我怎么办，你想过吗？我带着自己这罪孽能到哪儿去？能把这罪过推给别人吗？既然已经这样，我们就一起撑着吧。等等看，安德烈，等等看，别着急。也许会挺过去的，会过去的。我母亲早就说过：没有不能饶恕的过错。他们不也是人吗？等战争结束了，再看看。也许可以去认个错，或是想个别的办法。现在只有忍着，别走。你一个人活不下去的。我也会完蛋，那还不如先叫我死。现在我不管怎么还知道你在哪儿。要是真有孩子呢？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是你的孩子，不是别人的。我还能和谁去说说话，松松心呢……现在对大家来说，我是个外人了。你说，你还走吗？”

他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摇了一下头。

“这就对啦，这就对啦，不要走。”她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转脸看窗户。“天黑了，很黑了。我都忘了该走啦。安德烈，快起来。咱们走吧，你说了要送我的。走吧，这样，咱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可以多一些。不要再瞎想了。你不是一个人，你要是一个人，你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说已经泪流满面，只是在黑暗中看不见。

十二

这次会面后，过了三天，暴风刮来的浮雪慢慢地融化了，露出原来的硬雪壳，安德烈·古西科夫要去阿塔曼诺夫卡村。他早就想到村边走走，但一直克制着，生怕不慎，出什么意外，暴露自己。但是，在和纳斯焦娜的长谈中了解了情况之后，他再也忍不住了。真是怪事：这时他自信多了，好像突然得到了回到这里的特权，不再那么害怕，不再那么顾虑随时可能遇到危险。另外，天气暖和了，春天正全力奔来。对他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时机了。稍一犹豫，稍一耽搁，就晚啦。

晴朗的夜空，闪闪的繁星，变暗了。就在天快亮之前，安德烈·古西科夫穿过安加拉河，从低洼的一面，绕过村子，登上了山岗。他回到到现在，还没有从这一侧看过他的阿塔曼诺夫卡村呢。他觉得村子比原来小了。他望着那些不是立在，而是趴在街道两旁的矮小的农舍，那些各式各样的窗户（有的带护窗板，有的没有），看上去像一块块补丁；房檐几乎触到了地面。篱笆东歪西斜，没有整齐的，勉勉强强能看清。谁家的房子在哪儿，安德烈过去是一清二楚的。可是现在每栋房子他都不能肯定，觉得又像又不像，看地点，像是谁家的，可是看样子，又难说。这

或许是天还没亮，一切都模模糊糊，看不清楚？还是因为战争，没有男人照管，村子破旧了？

安德烈故意放过自己家的房屋，久久不去看它，为的是先熟悉一下村子，唤起对它的亲切感，确信自己看到的不是回忆中的景象，而是真的在眼前。可是这亲切感并未立刻到来：在他不在这里的几年中，特别是在他回到村边，又命令自己不去想阿塔曼诺夫卡村的几个月中，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和它脱离了关系。没办法：村子就在这儿，可他只能在别处流浪，他活着不能回去，死了也不能埋在那里——也就不必折磨自己，伤心难过，自找烦恼了。每当他的目光偶然碰上安加拉河对岸隐约可见的阿塔曼诺夫卡村时，他都懒洋洋地，漫不经心地，甚至带几分自嘲的心情寻思：他在那里想得到什么？当初他确实想得到，可到底是什么，想不起来了。

他在里面出生、长大，人世间他最亲近的人住的那座房屋，恰好就在对面，在街道低坡的一段上。安德烈准备好啦，聚精会神地把目光移向自家的房子。还是那三个窗户，对着他站着的山岗；左边靠前的屋角依旧歪斜着（父亲说过，这房像主人，有点瘸）；那间宽敞结实，用原木后盖的外门间也还是老样子，在它那一面坡的房顶上，放着各种破烂东西。房子本来是挺结实的，能住几辈子。可是，因为没精心照看，一个房角下沉了，就在战争爆发那年的夏天，原打算在割草大忙之后，找些人来“帮忙”，不挖地，加垫，一下子把屋角撑直。正像唱的那样“一鼓劲，就弄直了”！可是，现在老头连想都不能想了。房子只能这样歪斜着，直到完全塌倒，也许能等来一个好主人，为什么？父母挺不了多久啦，而纳斯焦娜……纳斯焦娜不一定能在这里呆下去，若是她留在这里，那也不会是她一个人了。

古西科夫使劲盯着那些窗户，似乎想透过它们看到里面有

什么动静。最右边的那扇窗户是炉灶间的。窗外贴墙是鸡窝，对着窗户的是俄罗斯火炉，近几年母亲白天黑夜都窝在火炉上面的暖炕上。炉子还没生火，没有冒出烟来。就要起床了，过一会儿母亲就会叫醒纳斯焦娜，纳斯焦娜就会去拿劈柴。纳斯焦娜的窗子在最左边，挨着那个歪斜的屋角。这时是她在梦乡的最后时分。她两腿伸直仰卧着，双手捧着肚子——这个习惯，若是这次真怀上了，对她还是满合适的。原来，人对自己体内要发生的事，是提前很久，提前许多年就做准备的。早在战前，没有什么真正的缘由，可能只是出自一种古怪的念头，纳斯焦娜就养成了捧腹的习惯。如今还真的乞求到了，抚摸着了。安德烈今天就可以准确地知道，他的希望是不是破灭、是不是落空——纳斯焦娜会给他一个信号。如果没有什么变化，晚上她会升着浴室里的炉子。但是，她不知道，安德烈此刻就在这里，就在附近。今晚她也不会去浴室等他。因为他说过，他要到安加拉河上去等信号。

安德烈想象纳斯焦娜现在躺在被窝里的样子：她把衬衣团在腹部，两腿叉开，暖洋洋的，睡得死死的；头发蓬乱，一夜睡下来，脸有点肿，显得苍白，还不时地轻轻抽动着，好像正尽力想起什么。安德烈一想到晨梦中的纳斯焦娜，就呆住了，好像有个小气泡在喉咙里哼了一声，破碎了。安德烈叹了一口气，把目光移到左边那排仓房上。纳斯焦娜在回忆他们新婚第一夜住过的那间仓房，在院子的最边上，从这里看不见。但纳斯焦娜回忆时，没有讲全，——她没说吓了她一跳的那声鸡叫，当时被她认为是不祥之兆，事后好长时间都没有改变这种想法，一再说：“不吉利，不吉利呀。”安德烈想方设法为她排解：“你就听那些公鸡的吧，就信它们的吧，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叫。”

清晨终于从黎明前的幽暗中挣脱出来，天大亮了，村子从地

上欠起身来,显得更近了。家家的烟囱相继冒出炊烟。能隐约地听见村里传来的各种微弱的,睡意朦胧的声响。纳斯焦娜也起来了,最右边那扇对着火炉的窗户上,闪动着通红的火光。门一闪动,半开了,有人走出来,但有篱笆挡着,看不清,是谁呢?是纳斯焦娜,还是父亲?纳斯焦娜该挤奶了。但在挤奶前,也许父亲要给牲口添些草料呢,说不定这活儿现在也归纳斯焦娜了,谁知道他们怎么安排的。突然,母亲被一种不安的感觉触动,使出全身的力气,咬牙挣扎着走出来了,站在那里,等着。是什么把她召唤出来,又是什么推着她,往哪儿推呢?难道母亲根本没有,一点也没感觉到他就在这里,在她身边吗?

他站着,看着,想着,但不知为什么,一直很轻松,既不激动,也不痛苦——不是激动和痛苦还没有醒来,还没有动起来;就是已经被他掐死了。对这种平静如水的心境,他自己都感到惊奇:四年来,这是第一次站在家乡的村子面前,他站着,也知道,也许再也没有机会站在这里啦,可竟然一点也不动情。在前线吃尽了千辛万苦,甘愿付出一切,只求能再看一次,最后一次看一眼自己的阿塔曼诺夫卡村。可以说,他就是为了这个回来的。现在回是回来了,但心里空啦。莫非真的一切都干枯了吗?

为了检验自己,他把目光移到和他同龄的好朋友维佳·别廖兹金家的房子上。维佳永远留在莫斯科城下了。这栋他熟悉的房顶上,也冒着炊烟。如今那里只剩下纳季卡带着几个孩子了。当初维佳和母亲分开另立门户时,是安德烈帮他从村子的坡上搬到这里来的。嗨,有什么好搬的呢?他们套上马,把两三个包袱,一张铁床,还有一张大木床,往车上一扔,全部家产就搬完了。桌子、板凳都是搬家后,在这里打的,工具也是安德烈从家里带去的。有一样做得不对纳季卡的心思,为此她没完没了地唠叨。于是他和维佳两个人,不管纳季卡怎么尖叫,蹬踹,把她

举起来，撂到房顶上，笑着听她向全村大喊大叫。帮她下来的条件是一瓶好酒，他们得逞啦，纳季卡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因为她不敢往下跳，可又没有梯子。

检验的结果也是很轻松，轻松又生动，所以首先回忆起的是刚才那个场景。但是，他警觉到，维佳的一切：面庞、嗓音、步态、手势都那样真切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好像方才他就站在自己身边，过一会儿还回来似的。安德烈心想：“他已经不在了，可我看见他的样子，听见他的声音，跟他活着的时候一样。这是谁设法做到的呢？是维佳，还是我的记忆呢？有没有人能这样清楚地看我呢？我活着，应该被人看得更清楚，活人看活人吗！不，这也许是另一码事。”他打住了自己这个想法。“维佳是善始善终，坚持到底的。他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可你怎么啦，谁都不清楚。如今人们都避免提到你，你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回忆从何而来呢。你虽然活着，但对他们来说，你已经消失了，像去年的残雪一样融化了。再说，人们记着一个人，是因为这个人有值得记住的价值。而关于你的记忆却永远是可耻的，人们回避想起你，就像你现在躲避见人一样。别指望了，什么也别指望了，毫无希望了。”

他思索时也很平静，想什么也不往心里去。没有希望就没有吧。等他死了，人们要说他什么，反正要说的。那时说什么，他的尸骨也不会痛苦的，人死了都一样，就不分高低上下了。安德烈始终聚精会神地盯着自己家的房屋，不放过任何动静。他一下子就认出了父亲。似乎还听见了院门打开的声音。父亲随手掩上柴门，停了一会儿，向安德烈站着的山岗上张望一下，好像猜到了他就在那里。然后，和往常一样，一瘸一拐地向右边街上走去，是嘴里哈出的热气，还是边走边抽烟，离得远，看不太清。“就是他——我的父亲，”安德烈带着这种冷静而又迟钝的

思绪呆在那里。“是他。”他看着父亲的后背，父亲不肯服老弯腰，腰背挺得很直。安德烈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惘然和空虚。在半路上，父亲停下，弯下腰，脑袋不停地抖动，——他显然是在咳嗽。安德烈又觉得他听见了咳嗽声，沉闷、吃力的咳嗽声他听得很清楚。父亲抬头看看路，又一瘸一瘸地往前走，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村阅览室的墙角后面了。

安德烈又站了一会儿，茫然地望着眼前的山地。忽然，他像猛醒过来似的，快步，几乎是跑步冲上山去，直到看不见村子。他向右一拐，快步穿过了树林，上了大路，顺路下了坡，一片云杉幼林使大路绕了一个弯，而他离开大路朝直走，穿出云杉幼林，看见了房舍，他才停下。他眼前是马棚。马棚院子在坡上的一段栅栏紧靠树林。在这里安德烈能更近地看到父亲。

安德烈和父亲的关系一向平平常常，不坏，也不特别好。可以说是各活各的。他小时候，也照管过他，但不过就是照看而已，几乎没有过问过他的学习和他的心事。让孩子吃饱穿暖——父亲该做的都做到了，也就行啦，至于学会怎样生活，那就靠他自己了，父亲不是给了他一个脑袋和一双手吗？他没有教训过，也没有教育过儿子，他也不懂什么是教育，怎么个教育法儿；他认为生活能调教任何人，是个什么材料，就能把他调教成什么样的人。起褶子了，该抻就抻他一下，用不着抻，就甭管他。每当安德烈问他什么，他都给讲讲，而且讲得详细，很清楚。儿子想知道什么，他又能指点，讲解，这使他很高兴。要是他看见儿子对什么有用的正事上心了，他就任随他去，并且留心观察，看儿子能干什么。但他从不硬逼着儿子去干，他没有这个习惯。一切都要自己去领会透，那样学问才能扎实。安德烈记得只有一次，父亲帮他弄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次他弄坏了东西，却把过错推给邻居米什卡，父亲从挂钩上摘下皮缰绳，教训

了他一顿，一句话也没说。就是这么一次。

因此，他觉得和父亲相处很轻松。父亲对他既不亲热，也不斥责，不像母亲那样动不动就发火。母亲的心情变化无常，今天一个样，明天就另一样。任何时候去找父亲，安德烈都没有顾忌。但找母亲就得留点神，得先看看她这会儿是阴是晴。母亲来自安加拉河下游，勃腊茨克市郊。那里的人口齿不清：“牛来(奶)罐在夏(架)子上”，“我们那儿虚(树)很多，冬天很扔(冷)。”安加拉河沿岸，只有几个村子有这种口音。村里的人，像精选过似的，个个身材高大，勤快能干，特别是妇女。他们出自哪个血统，谁也不清楚。这几个村的上游和下游，人们说话都正常，就这几个村的口音怎么也改不了，他们的舌头好像用什么特别的法子吊起来了似的。外乡人当然听不懂，觉得怪声怪气的，得慢慢地习惯才行。阿塔曼诺夫卡村的人，直到母亲都老了，还取笑她，学她。母亲就生气，她又不会假装不生气，因此就躲着人，尽量独来独往。此外，还有别的事，使母亲心里经常是火烧火燎的：国内战争中她娘家人都死绝了。父亲、母亲、三个兄弟，全死了。小弟弟是高尔察克的部下，为了逃避游击队的追捕，跑到阿塔曼诺夫卡村投奔姐姐，但在这里还是被抓住了。这看来就是安德烈最早的，能回忆起来的事情了。这回忆很模糊、零碎，当时他只有五岁。但他能回忆起舅舅是怎样被一些大胡子外乡人从地窖里拖出来，带走的。事后母亲一辈子都埋怨父亲，埋怨他没有站出来袒护她弟弟。父亲只是不吭声：他自己就是在对德战争中被打成残废回来的。他学聪明了，不再给任何人扛枪打仗。从加入集体农庄第一天起，他就进了马厩。

父亲喜欢马。安德烈不知道还有谁，能像他父亲那样爱惜和看重这种牲口。从自家院里把三匹马——其中有一匹白驹——送到集体农庄时，可能是交给别人看管不放心，就自告奋

勇,要求到马厩养马。平时父亲总是心平气和的,甚至有点发蔫,但只要是跟马沾边的事,他是谁也不饶的。一次,那是在集体农庄刚成立的时候,他当着大家的面,把现任农庄主席用马肚带狠抽了一顿。原因是涅斯托尔把一匹名叫响雷的公马赶回马厩时,那马一身大汗,嘴唇撕裂,直流鲜血,马被疯赶坏了。父亲抽打涅斯托尔时,没人敢上前拦阻。这匹马在交给集体农庄之前,原主是涅斯托尔的哥哥——在芬兰战争中被打死的乌利扬。也许涅斯托尔因此就认为马是自己的,想怎么赶,就怎赶。父亲可不管这一切。他对那些嫌恶吃马肉的人也很生气。总是向人说明,在所有牲畜中,马是最干净的。但他自己也不吃马肉,他吃不下去。出于对马的偏爱和对马,包括被打死的马的怜惜,他不忍心吃。父亲说过:“叫我死,行,叫我吃马肉和人肉,不干。”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用马肉充饥时,他常常想起父亲这些话,他得出的结论是,父亲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处境,否则他说这种话时会谨慎些。那时候,他们有一次把死马剁成块,煮吃了,吃得挺高兴——那匹死马还是冒着中弹的危险拖回来的。

安德烈隐藏在云杉林子里,等着父亲从马棚里出来。在院中间的老地方,架着两个原本做的长马槽。旁边停着一辆水车,车上的水桶,像大炮似的仰首对着安加拉河。靠近左边的篱笆并排放着几辆夏天用的大板车和挂车,上面装些白桦木和曲杉,右边篱笆外面是露天畜栏,能看见几匹马背在那里晃晃悠悠。几年来这里没有变化,也许破旧了一些。院子里满地都是干草末,一片褐黄,踩上去软乎乎的。从大清早起,透过寒气,院子里就散发着霉味和臭气。安德烈闻着这股气味,有点不习惯了,感到胸闷气喘,但他闷得舒服,喘得畅快,很愿意就这样被熏死。

一匹周岁的小马驹,乌黑漂亮,身子两侧在同样的地方各有一块白斑,很像两只鸟,独自在院子里游逛。它很壮实,蹄腿轻

快，背部乌黑发亮，看得出，是被精心照料的：脸上的刘海和脖子上的鬃毛修剪得整整齐齐。安德烈欣赏了一阵，并断定它不会被糟蹋，套上去干活，会被留做种马的——真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家伙。它还很好奇：可能是嗅到了安德烈，走到栅栏跟前，从栏缝里探出头来，以探究的目光久久地盯着安德烈。安德烈吓唬它一下，它一跳躲开，回头看看马圈——是不是在自己家里，然后又转脸看看那个陌生的，可疑的人。就这样，它一直也没忘他：在地上刨几下，抬头看看他，又刨几下，又抬头看看他。

安德烈陷入徘徊不定，茫然失措，神思恍惚的状态中：一会儿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藏在树林里，这时他只要向前跨几步，翻过栏杆，就能走到人世，拿定主意就走出去，还等什么？一会儿又醒悟过来——无论如何不能出去。相反，他还弄不明白，如果他早已属于另一个世界，那么，摆在他眼前的，已经结束了的，过去生活中他很熟悉的一个角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从哪儿？是幻觉，是给自己画的符？何必呢？这有谁需要？这两个世界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他怎么到这儿啦？

安德烈没有看见父亲是什么时候从马圈里走出来的，突然看见他正把一匹牝马牵出圈门。牝马怀驹快足月了，两侧鼓胀，肚子下垂，迈步很吃力，很小心。安德烈首先注意的是牝马，最使他吃惊的，也是牝马。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许是他很久没见过怀驹的牝马，忘了它们的神态，甚至忘了世上还有怀驹的牝马，或许是高兴没有马上睁大眼睛看见父亲，先看见个侧影，使他能先适应一下，对和父亲相见做好充分的准备。父亲把牝马牵到院里，绕它转了一圈，大概是在考虑要不要遛遛它，接着拉着缰绳往前走了。他牵着马，沿着低坡上的栅栏走到拐角，拐弯上了山，直朝安德烈站的地方走来。安德烈慌神啦，不知是躲到树林深处去好呢，还是原地不动。最后还是站着没动，指望树的

枝杈能把他遮住,但还是蹲下了,以防万一。

送他上前线那天,在最后告别时,父亲问旁边一个人:“我们父子还能见面吗,还有缘相见吗?”他当时想到无非是两个可能:他们还能相见,或者不能相见。至于第三种可能,即他见得着你,你见不着他,父亲是根本没想到的,对此,他的头脑是太简单了,是想不到的。可是,这种情况现在就真的发生了。父亲越走越近。他穿着带绗道的棉袄,腰间扎着皮带,头戴家制的棉帽,帽耳翻在上面,脚上是一双软底便鞋。他走得很慢,样子很疲惫:双手无力地向下耷拉着,抬腿迈步都很吃力,后脚跟前脚取齐之后,才能再迈一步,一瘸一拐,东摇西晃,整个身子软塌塌的。这时他活像一只被猎人打伤的野兽,被迫得挺不住了,只靠惯力往前移动。安德烈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父亲越来越近了。他离得越近,安德烈越失去警觉,把身子抬得越高,挺得越直。他慢慢站起来,好像完全呆住了,意识和眼睛都变得模糊了。快到栅栏时,父亲咳嗽起来,停住了,牝马从背后,以聪明,体谅的目光看着他。他咳了很久,声音嘶哑,咳得很费劲,两手捂着胸口,脸歪向一边,等咳完了,他才抬起头,直对着安德烈的那个方向,往前看了看。他们之间相距不到二十步远。安德烈惊呆了,如果父亲再盯着看下去,他会忍不住,走出去的。但是父亲垂下眼睛,扯起缰绳。父亲那直逼安德烈的目光,令他头晕目眩。他没有看清父亲的脸膛,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变化。只看见父亲脸上挂着花白的胡须,仅此而已。只是后来,当他目送着越走越远的父亲的背影时,他才觉得,一种特殊的,能抓住一切细微末节的注意力,在他身上苏醒过来,但它醒得太晚了。父亲牵着牝马通过边门,进了马棚,看不见了。几分钟后,安德烈又看见一次父亲,他举着一大叉子干草,一闪而过。接着听见有人喊了父亲一声。安德烈这才想到,他该走了。

十三

安德烈来到路上，不慌不忙，也不躲躲闪闪地向山上走去。上哪儿去？他没想，只是为了离人远一点，离刚才他所体验的一切远一点。但他并不后悔去了马厩，他没料到，他去的目的地竟然达到了。可是谁又知道，他本来就指望：说不定碰巧能看见父亲——就像刚才那样，所以才穿过安加拉河跑过来。很明显，他是冒了险的，但是他那颗几乎被烤焦，严重损伤的心灵，因此得到锤炼，又淬了一遍火，变得更坚硬了——这是有好处的。

这值得！——他总算看到了父亲，亲生的父亲。到时候，他会得到回报的。他还了一笔债，以后他会活得轻松些，他是应该见父亲一面的。会有一种精灵，在他临死前转告父亲：你儿子在今天早晨曾站在你的面前，请求宽恕。一定会有这种精灵。父亲也会宽恕他。可是父亲怎么没有发现他呢？不是瞪着眼睛看着他吗？也许他看见了，不想认他，就装着没看见。不，没发现他，不然他会问的。“要是父亲真的问了，你又怎么回答呢？这以后你怎么办呢，到哪儿去呢？别拉别人来分担你的重负了，自己驮着吧。纳斯焦娜不是一直在帮你吗，结果是负担又加重了一倍。看来，得想法儿把纳斯焦娜慢慢解脱出去。由他一个人撑着。什么？不靠纳斯焦娜？瞎说，没有纳斯焦娜，你也就没命了。是纳斯焦娜使你活下来的，可能还会活到很久很久的将来，直到你死去。”

他没有觉察，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他来到高坡上的林中空地，伐道把树林分成几块，射进来的阳光刺目，他不由得眯起眼

睛。周围的一切，一下子都动起来了，尽管还很微弱，谨慎，但很有朝气。看来，这将是多彩、喧闹的一天。天空晴朗、开阔，阳光烤暖了空气，路上的冰层蒙上一层水汽。林中积雪未消，但到处都在融化，都在塌陷，滴滴水珠在雪面上流淌。去年的草儿冲破松软的雪层，冒出头来，好像是最近才生长出来的。有些地方雪已化光，露出了地面。树林虽未完全苏醒，但已经暖和过来了，枝杈开始舒展，微微颤抖着。昨天融雪的水汽，一夜之间，还未来得及蒸发到高空，空气有些苦涩，阳光掠过大地，虽然还未触及地面，但越来越低了。

安德烈本应赶快离开村子，但他不想快走，迈着迟缓的步子，懒洋洋地向前移动。和父亲的会面对他不是毫无影响，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感到心灰意冷，一切都无所谓了。他到哪儿来啦？为了什么？他想在这儿找到什么？呆在自己那个窝里，对什么也不管不问，不是更好吗？他在那里已经平静下来，已经开始习惯了，而到这里来，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往伤口上撒盐。不，他还是应该来一趟，应该，以后心里可以松快些。在你没有看见还有家畜存在之前，是不会体会到自己已经成了野兽的；不割断与过去生活之间的脐带，新的生活是无法继续下去的。可是，这根脐带，不管安德烈怎样遮掩，却总在搅和，让人不得安宁。他需要回来一趟，以便在近处亲眼看清楚：他再也不能走进家门，再也不能和父母说话，再也不能耕种这片土地了。因而，他这次回来，就是指望用古传的老法子——以毒攻毒，以便一了百了。现在他彻底领悟了：他回家的路，永远断了。他只能自受其苦了，这是他一直想甩开，但怎么也摆脱不了的痛苦。

和父亲会面的情景，似乎隐藏在他的心里，等待时机，随时跳出来，更残酷地折磨他。他觉得自己对这次会面投入太小。这次会面的情景，此时像梦境浮现在他眼前。这梦境悄悄钻进

他的脑子,但还未安顿下来,而是戳在那里,既妨碍他走路,又妨碍他思索。他时不时地回想起这次会面,一时惊得发呆,因为离那么近看见了父亲,一会儿又吓得发抖,后怕当时父亲发现他。他回忆得很小心,沾边就躲,生怕引发出会面的全景,带来更大的痛苦。现在这对他是没有必要的:他身在异乡。异乡?安德烈冷笑一声,认可了。对,是在异乡。在这里要处处提防,不能心慈手软,否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不知为什么,他无缘无故地想起了哑巴塔尼娅,在伊尔库茨克就藏在她家。她的面孔,微微颤动,似有所问的双唇,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这时,他忽然想再回到塔尼娅的身边,然后带上她奔向天涯海角,那里没有人烟,自己也可以变得不会说话。为了解恨和取乐,他可以尽情地侮辱塔尼娅,侮辱完再可怜她,可怜完了再侮辱。她都会逆来顺受的,只要有一点点好,她就感到幸福了。哑巴脸上的表情还是很有趣的:他们微笑时,只有嘴唇动,眼神冷漠,其他部位紧绷着,一动不动。当然,他是连塔尼娅也配不上的,但他愿意承担这份罪责,因为塔尼娅已经备受屈辱,所以可以继续屈辱她。“请说明一下,你为什么要欺侮她呢?”安德烈自问,然后又自答:因为罪恶要求再生罪恶,堕落灵魂总要追求更深的堕落。大概,他也不能例外。他一直需要得到证据,借以能够证明,他确实变成了现在这样了。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更自信了。

安德烈走进田野,又向右拐,朝远处的荒原走去。他将在那里呆上一整天。在这个季节里,那里没事可干;好年景时,人们都不往那里送粪,如今,路又这么难走,更不会送了。偶尔也有手脚闲不住的人,窜到这里来,那都是为了在村边就近弄点木头什么的。如果真有人来,也没什么可怕的。让别人害怕他吧,他今天不准备怕别人。要是有人想靠近他,认出他是

谁，那可不行。但从远处，随你怎么看，猜想他是谁，他都不在乎。他有权作为主人在这里走来走去，他在这里干的活不比别人少。即使现在他也能说出，战前哪块地是多少，哪里种了什么，种了多少，收成是多少。这些地至今没有撂荒，还打粮食，这里也洒有他的汗水。他在这里不是外人，不是！他现在站在这里，正要走过去，田地认出了他，都愣起神来，一动不动了。如今他只相信这土地的记性。人们不会彼此长期记住，他们被时光带走得太快了，而土地却缅怀着在它上面生活过的人们。大地无从得知，他安德烈出了什么事，对大地来说，他还是个清白的人。

太阳越升越高，烤热了大地。路上的水珠，闪闪烁烁，有的地方，已能看见最初由它们汇聚而成的，短短的细流。路边的积雪泛着蓝光，既暄又沉。由于吸吮了水汽，空气也变得发沉。安德烈脚穿一双毡靴（他身边没有别的鞋。最后一次会面时，纳斯焦娜答应找找他那双旧软底靴）。眼下这双毡靴让他伤透脑筋。他觉得这双鞋使他露出马脚，使他不能冒充自己人。毡靴已经过时，穿在脚上很可笑了，不能再穿了。这双毡靴好像还把他和他脚下踏着的大地分开了。这时穿着毡靴走路已经很吃力了，他不能想象，再过三四个小时，遍地都晒化了，他怎么走路。看来，得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在最边上的一块荒地上，挨着小溪，有一个过冬屋，可以到那儿歇歇。不，今天他可不想躲进什么过冬屋——腻烦了。他不是为了这个才到这里来的。那么，就最好脱掉靴子，光脚走吧。凡是能到的地方，都去散散自己的气味，以后也许就没有机会了。

对往事的回忆，从四面八方蜂拥般向他袭来。这些回忆来自田间，来自田间的土埂，来自那棵戳在田间的，弯曲多结的老落叶松，来自那片小树林中一棵枞树下冒出的泉水，甚至来自那

像一幅无与伦比的画面，高悬在森林背后的天空。可是，安德烈害怕这些回忆，总是推开，甩掉它们。因此，这些回忆刚开始就被打断，散落。要是被它们缠住，就别想再挣脱。既然什么也改变不了啦，这些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何苦受这份折磨呢！遗憾的是，记忆不懂这些。可不是吗，他已经变成两个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可记忆还是一个，怎么也不能把它平分开。要是能和过去的一切一刀两断，忘得干干净净，那就松快多了。可就是不行：原来的他还活着，而且尽管灰心丧气，不由自主，还得活很久，怎么也躲不开他。他，安德烈注定得不到安宁，得不到解救，只能四处流荡，直到自己的末日。

他发现，他心里在默认这个结论的同时，还违拗地抱着希望。这丝希望隐秘地埋在他心里，连他自己也不是总能意识到它。可是这一丝希望确实活着，在呼吸，他有时还能觉察到它那谨慎的，小心翼翼的颤动。但是，没有什么可指望了，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他的处境的真相，好像第一次这样逼真地摆在他的眼前，没有怜惜，毫无保留，他的肉体好像都感觉到了这种真相的实情，它似乎从头到脚透过了他的全身。这个真相散发的寒气，令他发抖。是什么引出了这个真相呢，他不知道。不早不晚，正当他来到家乡这些最贴心的土地，真相就出现了，难道这是对他的判处？安德烈向四周扫了一眼，冷静下来，恶狠狠地狞笑一声，心想：等着瞧吧，一会儿就会飞来一只鸟儿，说人话，告诉他，这正是那些他刚去过的最贴心的土地对他的判处。安德烈抖起精神。但他心里又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令人不快的念头。他的脚步乱了，尽管他想迈大步，想快走，呼吸又粗又急。“鸟儿……”他意外地跳出了这个念头，“我自己不也活得和天上的鸟一样吗？还需要什么？还要什么？”

接着，他觉得自己挣脱了一切锁链和禁律，不由自主地飞奔

起来,停不下来,也没法使自己平静下来。

“要不是战争,要不是它,这该死的战争,”他为自己辩解,“我不还是那样活着,那样干活吗,我才多大岁数,三十,半辈子都不到,不到半辈子就完了。世上有那么多人,怎么偏偏让我摊上?我怎么得罪了命运,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怎么它了?”他悲叹不已,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他想找个地方坐下歇歇。前面不远横着一块原木,又脏、又湿,他只好将就了。“像原来那样,我不会比别人活得差。”他抓住刚才的思绪不放。“活儿我会干得很好,我是一把好手,这谁都知道。现在就好比我是出来办事,也是这样走,这样坐下歇会儿,抽口烟,然后办完事,就回村子……”他觉得这完全是可能的,很自然,以致都发呆,走神了。他努力寻找答案,这一切是不是实际情况,他是不是该办完要办的事,就回村去。不,世道没有变,一切还和过去一样。这不是美梦把他唤醒了,而是再一次想证实自己的处境。他天天都在证实,已经证实很多次了,但这次却使他格外痛苦和可怕。好不容易筑起的防线,瞬间就荡然无存了,他无以自卫。他身心瘫软,连对自己呵斥一声都做不到。为什么他甘心于这种软弱,甘心于不能对付这种软弱。“这都是因为战争,都怪它。”他又为自己辩解和咒骂。“死了多少人,残废了多少人,还嫌少,还得搞出一些像我这样的人。它是从哪儿掉下来的?一下子就砸到所有人头上!把我扔进了这个火坑,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去就是几年。哪有那么大劲再挺下去,能熬的,我都熬了。我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我是出过力的,做过好事的。为什么把我和那些恶贯满盈的坏蛋们一样看待呢,为什么我要和他们受到同样惩罚呢?那些坏蛋甚至更轻松,因为他们至少心灵上没有痛苦,可我得等心肠完全硬结了,才能无动于衷……如今我回到这里,心已经被折磨得不行了,枯干,虚弱了……可我并不是跟自己人作对的弗

拉索夫分子^① 呀！我只是死里逃生，难道不是吗？”死里逃生，他为找到这个恰当的说法而高兴，所以又重复了一遍。于是突然叹息起来：“这场可怕的战争啊！可我逃出来了，这得会干才行哪——了不起！”

他仰起脸，目光扫过刚刚走过的田野，大笑起来，寻衅地，大声笑起来。

他又坐了好一会儿，来回叨咕着那些话，一会儿又陷入瘫软的状态，被内心痛苦折磨得痴呆呆的。这时他真想像狗那样嚎叫一阵。挨过一阵痛苦之后，接着又是一阵病态的、刻毒的狂喜，直到再次陷入痛苦的深渊。

后来他断定，这痛苦的折磨，全是因为他坐着不动，什么事也不干引起的。于是他站起身，把坐过的那块原木推到路上——让别人来挪开吧，他看了看四周，便动身往前走去。这时他心里冰冷，苦闷，但加快了脚步不容他多想，那些令人痛苦的思绪也就会被甩在后边了。

早晨被阳光烘暖了。丝丝溪水无声、吃力地流淌起来，从靠山那边田野的上空，涌来一片雾气。在阳光下，后面的树林被染成一条白色的飘带。从村里传来了公鸡的啼鸣，它们刚被放出笼，叫得喜气洋洋，兴高采烈。一只乌鸦痉挛地、刺耳地叫着，从头顶上飞过。地面上的微风飘忽不定，卷着气流，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地吹拂，旋舞着。安德烈感到脸上有点刺痒，那不是风，而是日晒的。在过冬屋旁是个打谷场，一群羽毛蓬乱、满身泥土的脏麻雀在谷糠堆噉噉喳喳。两只野鸽子，见安德烈走近，丢下吃食儿，一声尖叫，飞走了。

①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苏军中将弗拉索夫被德军俘虏后，组织叛军与苏军作战。该叛军成员后被称为弗拉索夫分子。

安德烈在打谷场边停住，观赏那群麻雀。他住的那个过冬屋，离人家太远，没有麻雀。他自问，麻雀能活多少年呢，一面想，在这群饿疯了的麻雀中，会不会有几只，他原来在这里干活的时候，就曾在这儿飞来飞去呢。可他并不知道麻雀的寿命，过去他从不屑这些闲事，这又勾起他的懊丧。他吓跑了麻雀，走近过冬屋，费很大劲才打开已经冻住的门。屋里很冷，空荡荡的，他四处搜寻，想找到点吃的，可是一无所获，就又走出屋外。他觉得有些困乏，是想吃，还是想睡，自己也不清楚。他随身带了点吃的，可得留着，晚点再吃。不知为什么，他总想在这里就地找着点吃的，尽管根本无处可找。总不能进村去要吧，而村外，在这个季节，是什么也不长，什么也不存的。

他在原地转悠很久，不知道干什么好。后来就想给自己找个能呆的地方，他拐过过冬屋的房角，在一根原木上坐下，背靠墙，面对从山上射下来的阳光。在一九三三年那次饥荒之后，他曾开垦过这片荒地，眼前就是他种过的那两公顷半地，下边一块，雪已化光，露出黑土和麦茬。安德烈胆怯地看了看，生怕勾起多余的回忆。可是田地却相反，像是在欢迎他，安慰他。他被太阳晒得暖洋洋，软绵绵的，真的打起盹来。只有一双眼睛，不时地抬起沉重的眼皮，身上其他地方一动不动，这双眼睛习惯地观察着，有没有可疑的身影在什么地方出现。周围一切都很宁静。

安德烈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一个接一个地做了些短梦，它们断断续续、互不相关、杂乱无章，一会儿是侦察连长列别杰夫大尉，在派他们排去执行侦察任务时，不知为什么警告他安德烈：要是他跑过去投降德寇，就用一个将军把他换回来，但不枪毙他。不枪毙——哪会有这样好事！而是要收拾他三天三夜，哎，那是怎么个收拾法呀！一会儿又梦见在中间地带，也在斯摩

棱斯克州境内,突然冒出来阿塔曼诺夫卡村的磨坊,磨坊工人就是他。敌我双方都不惜弹药从两面向他射击。这时战争之所以还在继续,就是因为他。双方谁能把他打中,谁就是胜利者。接着又梦见自己在新西伯利亚军医院。一个大胡子中校军医把他叫到自己的诊疗室,请他喝酒精,喝完之后,提出要他去冒名顶替一位刚刚去世的、职位很高的上校。忽而又回到了前线,在榴弹炮部队,他丢了装着瞄准具的匣子,被送上军事法庭。又梦见耀眼的探照灯光,在田野里照出一条条狭长的光带,光柱越来越强烈,像发蓝的火舌。他就走在这田野上,热得气喘吁吁。

他醒了,但坐在那儿好久没动。这些飞来飘去的噩梦蜇得他心痛,沮丧。这些梦里一点真的也没有。从来没有人怀疑他会干坏事,可这最后一步败坏了他一生,连梦都改变了态度,连他自己脑子里做出的梦都和他作对,其他的还用问吗?

梦中见到的磨房引发了安德烈到那儿走一趟的念头。路可不近,但对他来说,这一天才刚刚开始,现在磨房里多半没有人,不是开磨的时候。他再次把突然叫他讨厌的麻雀从谷糠堆上轰走,顺着地边往下走,到了地头,一直拐向小河。在寒冷的云杉林中,积雪几乎一点没化。树林中的阳光,即使在没有树林遮挡的地方,也比田野上的弱。好像压印出来的树影,整齐地铺展在片片林中空地上。安德烈脚下的毡靴在这里踏得很稳,他又振奋起来。他感到了早年那种激动。当年他爱去磨房。有谁不乐意去呢?磨面——这是节庆似的、快乐的、收场的活儿。农忙过后,人们拥到这里排队,高兴在这里过夜,上岁数的抽烟聊天,光棍小伙子们扎在一起说笑打闹,姑娘们在树丛中尖声地相互叫唤。人们想尽各种办法消遣取乐。火烧得很旺,茶水开了一壶又一壶。磨盘不停地转呀转,好像因为吃得太饱而发出嗡嗡的响声。磨出的面粉不停地落到挂在钩子上的口袋里,热气腾

腾的。

这些回忆使他心里敞亮多了，他面露笑容，心里感到温暖、舒畅，但时间不长。当他接近磨房时，不由自主地警惕起来，浑身紧张。他弓起腰，探身向前，走走停停，不时提醒自己要留神，还悄悄地舔舔嘴唇。磨房里面不像有人。上下门都锁着，踏着往上扛粮食的板梯上满是积雪。安德烈克制着自己不要心急，又等了一会儿，才离开柳树丛，向门口走去。门上的锁和过去一样，是做样子的，他一拽，锁就开了。他做对了，不然他得撬锁环，或是卸窗框，反正不会罢休的。

磨房里面很冷，到处是灰尘，地上还留着一些白色的毡靴印。安德烈先去看了磨房工人的小屋，发现架板上摆着一个大搪瓷杯，两头蒜，半包盐，墙上还挂着一把刀锯，他把这些东西都装进了长凳下面的粗席包里。接着他又搜查了整个磨房，上楼两次，查遍了边边角角，除了又找到一个口袋和几本撕掉封皮的书外，再没发现其他有用的东西，这两样他也带上了：会有用的。

他走出磨房，把锁挂回门上，看了看周围，心里突然涌起一个压不下去的凶恶念头：烧掉磨房。用不了多大一会儿，地上堆起了桦树皮，火柴他有，房子老了，干透了，一点就着。但他还清醒，知道不能放火，说到底，他不敢放火。非常想叫人们对他留下炽热的记忆，这个可怕的诱惑是那样强烈，以致他不相信能管住自己，只好撒腿快跑，离开磨房，免得惹祸。一直走到蓄水池边上，他才停下一会儿。绿莹莹的冰面，清澈如镜，冰层下面的水流，徐缓轻微，叫人留连。他想象着一块块烧焦的木头，飞落到冰上，吱吱冒烟，弄脏冰面。这时，他心里又冒出了制造这种场面的强烈愿望。但是他走开了，又上了山，进了田野。

一整天他都在荒野上徘徊游荡。一会儿出现在开阔地上，一会儿又躲进树林；有时他急不可耐地想见着人，也想让别人看

见他。让人看见他时大吃一惊——他是什么人？可是接着就是一阵毫无原由的恐惧，使他停住，站着很久一动不动。阳光晒热了大地，溪水淙淙，雾气腾腾，苦涩的气味叫人头晕。不知是由于这种气味，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安德烈脑袋发昏，饭后两三个小时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回想这段时间里去过哪里，干了什么，都答不上来，只记得从村里传出来的叫人心酸的鸡叫声，还有潺潺的水声。他的毡靴湿得能挤出水来，一迈步，脚在靴里直吧嗒，很痒痒，但是他没有停下，还是走啊，走，不看路，也不找干的、硬的地方走。

傍晚，他没计算好时间，就下坡向村子走去。这时天已经很昏暗了，但景物和房屋还能分辨。他看到了自家的浴室，可不见房顶上冒烟，他的心一下子凉了。一整天他都深信，一定能看到浴室房顶上冒烟的。甚至很有把握地计算着：这会儿纳斯焦娜该担水了，这会儿她该生炉子了……难道是吹了？安德烈从过上流浪生活以来，似乎这是头一次祷告上帝：“上帝呀，别抛弃我呀，上帝呀，让浴室生起炉火吧，上帝呀，您能做到，现在还不晚，只求您保佑我这一回，往后随您怎么处治，我都心甘情愿哪！”他突然神经质地，剧烈地颤抖起来。抖了一阵，似乎得到了什么启示，又突然停住不抖了，这时他才觉出浑身酸软。他在旁边的一个树墩上坐下，等着黑夜到来。

阵阵的狗叫声，人们活动的声响，偶尔还有说话声不时地传过来。而这一切，不知为什么，听起来就像浪花溅到耳朵上那样零碎，微弱。这时，他和早晨一样，很冷静，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叫他揪心：纳斯焦娜怎么样？但是，那窗户上的灯光，还是使他有些激动，他能想象出桌子上的茶炊、烧热的壁炉，墙上的灯影，床上松软的枕头，光着脚在上面走的长条地毯，这一切都散发着家里的亲切气氛，叫人感到香甜，又引起一阵无望的心酸。他好

像有所醒悟，转过身去，避开自家的灯光，闭上眼睛。些刻他很像一根戳在黑暗中的木橛子。

后来，村子里静下来了，他在早已盘算好的一刹那，猛地站起来，不用手，而是用头画了一个十字，向安加拉河走去。他踩着冰茬走近了浴室，爬上了陡岸，在木障子跟前他屏住呼吸，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这与其说是出于谨慎，不如说是因为下面的一刻太重要了——然后猫腰从木障子的横竿下面钻了进去。刚到门口，他就感到了浴室冒出的热气。

他走进浴室，随手掩上门，不急不慌地脱掉那双又沉又湿，一天下来叫他厌烦透了的毡靴。把自己收拾利索了，才得胜似的拼命地咯咯大笑起来。他勉强克制住自己，才没有大喊、大叫、大唱，没有尽情地欢庆一番，才没有惊动四周。

他在这里，在纳斯焦娜身边的地方，竟然没想到纳斯焦娜，有这热气腾腾的浴室，对他就足够了。

十四

麻烦终于开始了。不管纳斯焦娜怎样提防，怎样有所准备，事情还是来得很意外。

四月，雪刚刚化完，米赫伊奇和纳斯焦娜便出去收拾柴禾。他们砍柴的地方离村子不远，选在这里，是因为凑上两人有空就跑来干上一、两个小时，能锯多少算多少，完了就回家。砍柴么，多半都是米赫伊奇一个人去，然后纳斯焦娜再抽空跑去垛起来。要锯木头呢，就得两人了，而且锯得很慢，米赫伊奇从来没有像如今这么快地就累了，锯一段，就得歇歇喘喘。没有劈柴，以前也是过不了冬的。下个冬天，从眼下看，还得靠这些木柴。

打柴时米赫伊奇没有带猎枪，在这离村一俄里的地方，带枪没用，但是，总在林子里干活儿，看来，还是勾起了米赫伊奇打猎的念头。他准备了枪弹，擦亮了自己的猎枪。一次，他正要出去砍柴，刚关上仓房门——他在那里忙活了半天——忽然问道：

“姑娘，你没看见安德烈的‘图拉’枪吗？哪儿都找遍了，它像钻到地底下去了。”

站在当院，提着锯，等着和公公一起出去的纳斯焦娜，听了一愣。她一直害怕听到这个问题，也早就想好了怎么对付。但这个问题还是弄得她措手不及。最好别现在和公公解释，唉，不是现在，换个时候多好啊，现在说这个，可太不是时候了。

“见过，”纳斯焦娜面带惊慌的微笑，承认了。为了说话声音不要太大，她走到米赫伊奇跟前才说：“爹，我把枪卖了。”在特别的时候，她像安德烈那样，叫他爹。

“卖了，啥时候卖的，卖给谁了？”

“早就卖了。我一直不敢对你说，怕你骂我。那回我送特派员去卡尔达村……当时你为公债的事对我发火。我想了想，也是啊，到哪去弄那么多钱啊？我一时糊涂，随口就说出去了，可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呀！是那个人自己要看看我的枪，被他看上了，就盯着我说：卖了吧，卖了吧，我就卖了，是他劝我卖的。”

“丫头，你扯些什么呀，谁看了看？是谁劝你卖的？我一点也没明白。”

“是卡尔达村的一个男人，我不认识他，只记得他身上穿着军大衣，赫雷斯托夫的儿媳妇卡佳·赫雷斯托娃和他认识，和他讲话跟自己人一样，我没好意思打听他是什么人。我讲妥了，就卖给他了。”

“你干吗随身带着猎枪去？”

“我是随身带去的，是想，回来路上天就黑了，怪害怕的。”

“带去就卖了？”

“卖了。”

在他那皱纹深陷的脸上，由于紧张，表情僵硬，显得有些难看。他张大嘴巴，头向前伸，对着纳斯焦娜，迷惑不解地眨巴着眼睛。米赫伊奇一直站在仓房门口的平台上，他站在这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一直没动地方。

“纳斯焦娜，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你说的是真的？”他还是不愿相信。

“是真的，本该回来马上告诉你，我一直拖着，我不敢说。”

“你是怎么想的？你把枪卖了，等安德烈回来，他会对你说声谢谢吗？还是会怎么说呢？”

“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攒够了钱，我当时只是想解眼下的急，我不是为我自己。”

“攒够了钱……”米赫伊奇微微点一下头，重复了这句话。其实他并不是同意纳斯焦娜，而是断定自己的一个不愉快的想法。他沉默了一会儿，直到完全肯定了自己的想法，才想起来问纳斯焦娜，他把头歪向一边，以便能听清楚她的回答：

“噢，那……你卖了多少钱？”

这件事到了最有意思的微妙时刻。

“我就来，”纳斯焦娜说着就进了屋里，从架子上取下不久前安德烈给她的那块用破布包着的表。她出来时，米赫伊奇已下了平台，坐在台阶上。“诺。”纳斯焦娜把表递给公公。可他没有接，急忙躲开，站了起来。

“这……这是什么？”他慌神了，太出乎意外了，由于过分紧张，他的脸又皱皱起来。

“表，这是表。”纳斯焦娜赶忙解释，“我没有要钱，拿了这个，算是交换吧，这表很容易卖掉。那人说，这表不是一般的，是块

外国表，人们都很稀罕。你看，这表有三根针。”纳斯焦娜很快地上了弦，看上去她不是第一次拧这表把儿了，接着就把表塞到米赫伊奇手里。“你瞧，这根长的细针走的时候，看得多清楚，一蹦一蹦的，这么好的表，我生来还没见过。想得多巧，多漂亮……走得一直很准，没不准过。”米赫伊奇像手捧炸弹似的，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拿着表的手，把表翻动一下，立刻就还给了她。“在暗地方这表还能发亮呢，这些小点点能亮出白光。看得清清楚楚的。”纳斯焦娜高兴得要命，又补充了一句，就不做声了。

“拿枪换这么个小玩意儿，”公公醒悟过来说，“好啊，好啊！”

“表容易卖……枪，咱们这儿谁都有，表嘛，就不是都有了，还是这么一块好表，只要一拿出去，人家会抢着买的。”

“丫头，为这件事，倒真该剋剋你，好叫你动点脑子，别不顾好歹地到处瞎撞。这表你卖给谁去，谁要？不是有太阳嘛！什么‘在暗处能发亮’！”他气呼呼地说，一想到纳斯焦娜为表打出这张王牌，便啐了一口唾沫，“亮光，对我有什么用？能用它照着捉虱子吗？”

“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就会买。”纳斯焦娜不服气地说，“我知道，他一定会看上这块表，他喜欢这种东西，只要拿给他看，他保管会要。我送走的那个特派员，他还肯出两千呢。”为了可信，她又插上这么一句，“再三恳求我……”

“他出多少钱，多少？”

“两千。”

“真有这种傻瓜，你干吗不卖给他？”

“这表，可能值更多的钱呢。”

“那你就去找肯出更大价钱的人吧。我倒要看看你到哪儿去找。两千……你那个特派员他是在和你玩‘傻瓜’牌，你就当真了，行啦，”米赫伊奇打住了，“咱们走吧，为了你这块表白搭了

这么多工夫。得，你算叫我高兴一场，够啦！你把它从我眼前拿走，行行好，拿走吧！”

他们出门走了。但纳斯焦娜能感觉到这场谈话并没有完，米赫伊奇忍不住，还会提起这个话茬的，今天他们要在一起呆很长时间。既然触动了这个叫人心痛的话题，再改题儿去谈别的，可不那么容易。她一直提心吊胆，尽管今天最可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但纳斯焦娜知道，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口咬定，不改口，继续装糊涂。随时等着被查问的日子是很累人，很难熬的，终于等来了。丢枪的事好歹对付过去了，以后，只要一切还能这样遮掩下去，日子会轻松些，直到下一个关口，那时就不是对付丢东西的事，而是要追查了，追查出她肚里的孩子是从哪儿来的了……但到这一天，还早着呢，虽然已经肯定会有这一天。

他们到了打柴的地方，一点也没耽搁，立刻开始去锯一棵早已选好的松树。米赫伊奇先在向阳面上砍了几下，然后两人就从另一面锯起来。这棵树并不太粗，他们都是挑容易锯的，但不知为什么，锯起来很涩，很吃力。米赫伊奇很快就累得气喘吁吁，咳嗽不止，纳斯焦娜蹲在地上，等他缓过气来。突然她发现在隔年的草丛中一棵嫩绿的幼苗闪现一下，就消失了。她俯身找到了它，接着又找到了几棵。她摘下一棵草苗，放在手上轻轻地抚摸着，像是想到了什么。她觉得一个重要的，能给她带来希望，但又很缥缈的念头，仿佛正涌上她的心头。可是这个念头只是逗弄她，没有让她逮住，最后从她身边溜掉了。米赫伊奇咳嗽完了，向她走过来。纳斯焦娜把草苗举给他看：

“你看，新草儿都长出来了，今年还是第一次看见。”

他没有吭声，把锯拉到自己一边。纳斯焦娜后悔说了这些，好像她在讨好公公，想用这嫩草抹去自己的过错似的。

这一天，天气晴而不朗，四周安静，甚至有些沉寂、灰蒙，尽

管太阳当空。太阳似乎变薄变小了，微弱的阳光似乎悬在空中，没有照到地上来。不知在什么地方，有只花鼠发出呼哨声，远处的山上一条狗在吠叫，一棵老树也吱吱作响。所有这些声响，都没有打破这里的宁静，只是消除了多余的沉闷。老天爷今天似乎故意要摆出这幅悄然静寂的样子，以便草苗能放心大胆地从黑土里钻出来，树木抽出自己的幼芽。

松树终于被锯得发出断裂声，树盖抖了一下，又停住，拼命挣扎着想站稳，挺住，最终还是没撑住，往下倒去，连和树根残连在一起的木丝也断开了。米赫伊奇和纳斯焦娜赶忙闪到一边。树干下端在树墩上扭动起来，树身一摇晃，轰隆一声倒下了。折断的树枝向空中蹿得很高。旁边的树丛被震得发抖，河对岸响起了回声。米赫伊奇抄起柴垛边上的斧头，去砍树枝，纳斯焦娜和往常一样，把树枝拖在一起，堆成堆。

后来，他们把松树架好，锯开分段之前，先坐下歇会儿。这时米赫伊奇突然发问：

“纳斯焦娜，你真的不知道安德烈在哪儿吗？”

这一问，她可真没料到，什么都料到了就是这个没有，着实吓了一跳。

“安德烈？”她喊叫了一声。这惊讶的一叫遮掩了她的恐惧。“我打哪儿知道？你怎么问我这个？”

“这么说，你是不知道啰？”

“什么也不知道，我知道的，你都知道，我从哪儿能知道更多，咱们不是住在一个家里吗？”

米赫伊奇叫人难受地盯着她，不是看着她，而是用目光在拷问她，想从她的样子，从她的举止中了解到她知道的情况。

“我是想你也许还知道些别的什么，也许你是不愿意说，纳斯焦娜，你把这……说出来吧，就跟我一个人说，别掖藏着！”

“让我说什么呀！”她完全转过向来了，口气也更肯定了，我有什么可说的？要是有我能不跟你说吗？你知道多少，我也就知道多少。”

“我只是问问……觉得你最近有点不一样，我才问问。”

“怎么不一样？”纳斯焦娜小心翼翼，以打探的口气惊奇地问道。

“你好像心神不定，也许，让人感觉是这样……不过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不打招呼就把枪换了块什么表，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看来，丫头，除了枪，你还瞒着什么吧？你老是心虚害怕，慌里慌张的……也许你要离开我们？”

“不——不，我上哪儿去呀？只要你们不赶我，我就在这儿一直过下去。”她真诚地，以藏在内心的全部真诚回答说，“等着吧，战争快结束了，总会有消息的。”

“他到底在哪儿？”

“我说了，我不知他在哪儿？”

“嘻，丫头，我这已不是问你了。”

他们锯起树来，纳斯焦娜前推后拉，推过去，拉回来，使劲地锯，不时偷看公公几眼，她想断定一下，他是不是相信了她的话。他怀疑她独自知道安德烈的情况，单是这件事就不是好兆头。从今天起，可以料想，他会特别留心她的一举一动，就算他现在相信了，也会不由自主地盯着她，因为一个人的疑心是不会轻易消除的。怀疑一旦产生，就会不由自主地保持下去，往后就不是人去支使它，而是它支使人了。如今，可得多加两倍、三倍的小心，每走一步都得想好才行。可是再过两个月，肚子大了，再怎么谨慎小心，也不可能像枪那样搪塞过去了——这块表是走得很响，又不肯停下的。她不能想象，往后她会遭什么难，她做出的各种设想，都不足以应付这个劫难，没有一件事能和它相比。

在她肚子里这个秘密暴露在人们面前，在人们向她戳手指头，责问她之前，她无法预先防备，只能听天由命地等着。到那时，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撑着往前爬啦，谁也不会来帮她，只能靠自己，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救活三个人。她的力量够吗，她不清楚，也不愿事先多想，总指望自己不是那种软包。但同时她担心，除了力量和耐性之外，还需要些别的，而这些又是她没有的。她可以忍受任何耻辱，但能一下子骗过所有的人吗，骗过世上一切人吗？能使任何人永远都不明真相吗？对付这种事，不管怎么机智灵活，怎么善于随机应变，一个人是不是也难以胜任？她背负的罪孽是不是太重了些？重得超出了她自身的承受能力，用她全部余生也不足以赎清。

她曾想找个合适的时候把怀孕的事向公公说穿，以求在被揭穿之前，先过了这最难、最可怕的一关，反正就那么回事了。只要公公能容下这件事，即使不是一下子轻易地，但只要最终能容忍下来的话，那可就安稳多啦。其他的她都可以承受。可是，纳斯焦娜很可怜米赫伊奇。她预先就能看见，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呆的样子：耷拉着脑袋，阴沉，痛苦，很想问问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要问的，但又不敢问。算了，今天为猎枪的事已经够他受的了，刚才那番谈话她自己也就够受了。别弄成那样：她承认怀孕更加重了公公的疑心，使他对眼下只是猜测的事更加深信不疑了。纳斯焦娜担心，米赫伊奇比谁都了解她，不会相信她胡诌出来的假话。那时，一件件事就会被连起来，最后统统归结到安德烈身上。她没有权利这样做，任何暗示，任何疏忽都是不允许的。

他们锯完松树，准备走了。时间不早了，太阳已斜下到天边；太阳和月亮悬在一片天空的两侧；弯月像一把窄细、锋利的镰刀，在惨淡的阳光下闪烁得咄咄逼人。纳斯焦娜每次看见它们在一起，总是有点害怕，而且不理解，它们像注定似的不能分

离。现在她更觉得不自在。她瞪大眼睛，一点也不眯地望着太阳，但是她觉得刺到身上的却是凉得透骨的月光。

临走前米赫伊奇在一段木头上坐下来。纳斯焦娜提心吊胆，生怕他再提起安德烈的事。但她不想一个人先走，别让他以为她在躲着他。他点着了烟，抽了两口，就站起身来。纳斯焦娜想起来了，他不喜欢边走边抽烟。一路上，两人都因为那场没有说透的不愉快的谈话而沉默着，回到了村里。

这天晚上，纳斯焦娜忙着做家务时，不只一次惊慌地想到一个人。这个人今天想糊弄米赫伊奇，可又没糊弄了，反而更使他警觉了。这个人叫人不敢想，不敢想他会怎么样，他故意一个接一个地做蠢事，想毁掉自个儿，他的生活几个月之后就会被断送，现在就已经散成碎块，互不相连——这个人正是她自己。她感到恐惧，这是一种慢吞吞的，好像要拖得很长的磨人的恐惧，同时又很随和听话，它会随你的意愿退走，好像要表明还不到它该来的时候，然后又转回来，又离去，每次都留下特别折磨人的惶恐。眼下这种惶恐就没有减退，对它，纳斯焦娜完全不能克制。她看到她的生活今天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转向了那终究也回避不了的下场。那只能由她掌握的秘密，今天在别人眼前暴光了，这使她无法平静下来。纳斯焦娜责备自己：她想的还不够周到，也不该那样讲，她未能隐藏住那需要特别用心的事，她未能使米赫伊奇相信，她还和以前一样，是个坦诚，顺从的人。

纳斯焦娜坐立不安地等着公公干完活儿回来，想看看他对她是个什么态度，他会说什么。她必须在公公身边，即便是事情暴露了，情况很糟，和公公在一起也比这心烦意乱，不明不白地担惊受怕要好受些，有底一些。她指望米赫伊奇憋不住，会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即使不说，也会有所表露。她知道他不是那种有话不说，只动心眼的人，他喜欢有啥说啥，一捅到底。

但是，纳斯焦娜也知道，米赫伊奇很晚，天黑时才能从马厩回来。为了给自己找个地方，找点事干，免得白白地在家熬着，收拾完家务后，她就上纳季卡家里去了。

纳季卡一家人吃晚饭了，准确地说，是坐下来要吃晚饭。桌子上按年龄大小每人面前放着一堆土豆：莉德卡最小，面前是四个土豆，彼季卡五个，罗季卡和妈妈每人六个，外加每人一片面包。他们请纳斯焦娜坐下吃点，她谢绝了。她倒了一碗茶，坐到莉德卡身边。看着莉德卡吃饭的样子，真叫人痛心。她几口吞下面包，又赶忙吃土豆，时不时地很眼馋地扫几眼哥哥们的面包。纳季卡大声冲她嚷嚷，怕她噎着。看着莉德卡，一种早已习以为常的沉痛的思绪使她感到心力交瘁：这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什么时候才能止住外来的残暴，挣脱炼狱般的煎熬，过上正常的，由人自己做主的日子呢？什么时候才能让孩子们吃饱肚子？他们有什么罪过！

莉德卡同样飞快地吃完了土豆。当她发现自己面前什么也没剩了，惊奇地呐呐起来，张开两手，转动着一双饥饿，搜寻的眼睛。谁也不愿去看她那茫然若失的神色。为此妈妈才把食物分好，每个人只能吃自己的那一份。

“喝点水，就睡觉去。”妈妈轻轻地推了她一下说，小女孩乖乖地端起了茶杯。

纳斯焦娜实在看不下去，走进灶间，看见手巾下面盖着一个准备明天吃的圆面包。虽然她想到纳季卡可能会嚷嚷，她还是不怕冒险，从边上切下一小点面包，给了莉德卡，尽管还是不能吃饱，但多少解解饿也好啊。别让饥饿这根弦绷得太紧，会断的。纳季卡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当纳斯焦娜把莉德卡抱在自己腿上，紧贴着她那瘦小的、颤颤巍巍的小身子时，纳季卡又像抱怨，又像挑逗地说：

“你不想领养个孩子吗？”

“干吗我要领你的孩子，我自己可能很快就要生了，你还不知道呐。”

纳斯焦娜回答完，又后悔了：她怎么张口就说？等纳季卡发现她身子有些不对劲时，会想起这些话，这些话正好能让她比别人更早地看出我身子不对劲。就是现在，从我的声调，从这么自信，并带有寻衅口气的回答中，是不是已经觉察出，这不是一般的搪塞，而是多少含着实情。

“那你以前干么不生？”纳季卡很有道理地问。

“以前不想生。”

“瞧你说的：不想生。是想熬过这战争再生，是这样吗？我瞧你们都够滑头的。是啊，要是早有人给我打个招呼，说要打仗了，我也不会生出这么一大群来，我也会捺着点儿。”

纳斯焦娜笑了，她是在想，纳季卡怎么能在战前等五年，战争中又等四年，直到战争结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无论是维佳还是别人，不让任何人粘身呢。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纳季卡，纳季卡也哈哈大笑起来。

“我怎么行啊。”她同意说，“这得有多大的忍劲啊；要是由着我，每年我都能生一个，还能给第二个留下三个月。我是块肥地，下种就发芽。我什么时候都行，不像有些人。”她没忍住，刺了纳斯焦娜一下，“我要不勒着点，早生出一个幼儿园啦，只要来得及接生，顾得上喂。那个皇帝的后宫也赶不上我。你听说过后宫的事吗？维佳看过那种书，给我讲过。那是些什么女人呀？怎么一个男人得要那么多？他一个人在她们面前走来走去，摆出一副好斗公鸡的架式。想要——就挑一个；不想要——就让她们去呆着发愁。要是他敢在我身上扎煞翅膀，我就把他的鸡冠子拧掉，杀去他的威风，叫这个开娘儿们店的资本家尝尝我的

厉害。不过，说真的，这算什么女人啊！养她们一大群，就为了生那么几个孩子，我一个人都比她们强。”纳季卡取笑自己，作践自己，取笑中也有自豪：她完成了女人的职责，这是抹不掉的。要是在过去，纳季卡的夸口可能会刺疼纳斯焦娜，可是现在她听着竟很高兴。

莉德卡偎依在纳斯焦娜怀里睡着了。抱着入睡的小女孩使纳斯焦娜感到愉快。她觉得腹中胎儿似乎有所反应，有点嫉妒，这时正加快生长，比什么时候都快。

纳斯焦娜回到家，看到了出乎她意外的情景：米赫伊奇正在教谢苗诺夫娜拄着两根拐杖走路。拐杖是米赫伊奇早就做好的，但是谢苗诺夫娜说什么也不肯用这种撑棍儿。今天不知米赫伊奇用什么妙招实现了自己的主张。谢苗诺夫娜折腾着，拐杖撑在腋下，不知为什么，她的两腿像被拌住似的，把两根拐杖同时往前撑，为了不摔倒，连忙挪动瘫软无力的那双病腿，同时两手乱抓挠，想抓住点什么，一边唉声叹气，一边数落着哭泣。

“两脚替换，替换着走！”米赫伊奇教她。“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别跳啦，跳累啦，够啦，没有腿的，拄着也能走，你的两条腿还有知觉嘛，总能借点力嘛，你得先学会拄着它们迈步子，完了再想快。”

“向(上)帝！”谢苗诺夫娜哼哼着说，“我干么老了还受这中(种)罪呀？你多少可怜可怜我吧，最申(神)圣的圣母，你开导开导这个劳(老)傻瓜吧，没有他的鬼(拐)杖我也能走到坟坑。你可别把这鬼(拐)杖放进我的坟里。”她唠唠叨叨地责怪米赫伊奇，“别让我到那里去丢秋(丑)，干么要把我从活(火)炕上赶下来，什么走动、走动，往拉(哪)走，走到拉(哪)里去？”

“好了，你坐坐，坐一会儿吧。”他扶她在木床上坐下。“累了，就歇一会儿，脚疼吗？”

“怎么不疼？怎么能不疼，脚烧得像两团火，向（上）帝呀……他还说不疼呢！”

纳斯焦娜把茶炊放在火炉旁边，把烟筒的拐脖儿转向出烟口，接着刚想点灯，米赫伊奇不让，他说煤油快没啦，要省着点。他点着了壁炉。纳斯焦娜有点委屈。她想，就是这会儿她不去点，过一会儿公公也会去点着的，这是故意跟她过不去。自从白天放长了，有个把月没生壁炉了；他现在又想起它了，又出去取来树胶。他不声不响，但绝无商量。这时想起生壁炉，是不是故意找茬呀？

茶炊咝咝作响，壁炉也呼呼地着得很旺，炉火的反光，像一幅奇妙的占卜图，映在墙壁上。屋里暖和了，气氛也缓和了，谢苗诺夫娜满脸拒不理人的表情，双手无力地揉搓着大腿。

“哎，老太婆，怎么样，是不是再走走？”

“你相（想）逼死我呀？”谢苗诺夫娜带着哭腔反问了一句。

“是啊。”

“那你就逼吧，别可怜我了。”

她咬咬牙，以不顾死活的决心，开始站起来，开头还像坐着那样，双腿蜷曲着，慢慢欠身离开了床铺，两手按着膝盖，一点一点地挺直了身子。米赫伊奇赶快把拐杖塞到她的腋下，纳斯焦娜从另一侧走上去，想扶婆婆一把。但是谢苗诺夫娜却很麻利地迈出了她这重新走路的第一步，快得惊人，她撑在一根拐杖上，猛地把第二根拐杖向前一拄，紧跟着把身体也依上去。

“噤，躲开，别扶我，我极（自）己走。”她说这些话的声音，像初学走路的孩子那样，满含着淘气、急切和自豪的心情。

她从堂屋的一头走向另一头，来回走了很久，转累了，又回到大床铺上，坐在那里高兴得直哼哼。米赫伊奇含笑望着她，肩膀和胡子微微抖动。谢苗诺夫娜不看他，很疲乏地同意说：

“是啊，不促(错)，两条脚还能买(迈)步，多走走，它们就能走了。”

“是嘛！”米赫伊奇高兴地说，“要不咱俩就靠我这一条腿，能走多远儿？现在治好了你的两条腿，就有三条好腿，还可留一条作备份。”

“哎哟，安德留什卡^① 要是看见我拄拐杖走路，一定会笑的……唉，真是有人遭灾，有人乐祸呀！”

“老太婆，咱们不能总窝在炉炕上啊，”米赫伊奇这些话说得很温和，但含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因此，使纳斯焦娜感到非同寻常。“就是拄着拐杖也得活动啊。”

纳斯焦娜觉出了公公这些话隐含的意思，并和今天白天那番谈话联想起来。不，对公公来说，那番谈话不是说说而已，他心里已经明了，并做出了决定。所以他才毫不拖延地扶起谢苗诺夫娜，让她学拄着拐杖走路。他是不是叫她做好准备，很快就不能指望纳斯焦娜了。可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

“到了夏天，你瞧吧，你的脚受点热，你就能跑了。”他给老太婆鼓劲。

“快点好了吧，唉，完圈(全)好了该多好啊。”

“记得吧，从前你是怎么在大家伙前面，第一个爬上高坡的。”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费奥多尔^② 你别提过去了，别刺我啦。”

纳斯焦娜打了一个寒噤。老两口彼此很久没有称呼名字了。她都忘了公公叫费奥多尔。这名字像是从他们遥远的、响

① 安德留什卡是安德烈的爱称。

② 费奥多尔是米赫伊奇的名字。

亮的青春偶然传来的回声。纳斯焦娜向老人们看了一眼，他们正沉默不语地沉浸在回忆之中。

忽然间，一种不由自主的，隐约的委屈，使她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独，这样无援的不幸，自己就这样白白地给毁掉了，被欺骗了，被当成外人。喉咙里像是塞进了一团东西，直想哭，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但她忍住了，不能哭，这种想哭的心情也不能表露出来。她抓住米赫伊奇走进灶间这个时机，紧跟在他身后，轻声地问：

“爹，你是不是为枪的事生我的气了？是生气了吧？”

“为枪的事？”他心里正想着别的，没有立刻听懂她说什么，“噢，不，丫头，我没生气，这时候提枪干吗……”

这没有讲完的话，使她本已惶恐的心更加不安了。

十五

安德烈最后一次去浴室是在四月中旬，河上的冰层已经不是很结实，开始断裂了。在搁板底下他摸到了一个大口袋，拿回过冬房。口袋里有：一些土豆、几个葱头、两个萝卜，还有和上次一样用枕头套装的豌豆粉，豆粉里埋有十个鸡蛋。口袋里还装着一个用麻布包着的圆面包，一双软底鞋，用麻布裹着，这麻布是用来包脚的，鞋里塞满了修鞋用的皮条、麻线和缝针。除了这些，口袋里还有一件深色衬衣，一把生锈的羊毛剪刀，一小截铅笔头，一些食盐和烟叶，一块已经发黑的肥皂，使安德烈感到惊奇的是，还有一小瓶家酿白酒。他不知道靠这些能支撑多久，但至少得维持一个月，直到河开了，纳斯焦娜才能划船过来。他从口袋里掏出这些东西时，觉得真不少，很充裕。可过了三天，就

不得不算计每个土豆和每一把面了。他把烟叶和青苔皮对半掺在一起。可就是这种破烂烟，每天只准自己卷三支大炮，后来只能抽两支，早上一支，晚上一支。

安加拉河失去了冬日的景象，显得萧索冷落，冰面变成了病态般的青色；岸边，不仅在岸边，布满了冰窟窿，横穿河面的冰道，已经变黑，两侧开始融化，几只乌鸦在上面走来走去，发出不满的叫声。岛上的落叶松林，弯弯曲曲，在春天的清新空气中，显得浊暗无神，好像有人出于恶意，故意把它们扭曲得很难看。这不难理解，树木在经常遭到疾风吹打的情况，树干和枝条很难长得匀称，舒展。其实，在任何地方，任何树林中，哪怕是在明亮的桦树林中，从积雪开化到大地返青这一段时间里，都是一幅凄凉，残破的景象，这是尽人皆知的。这时，人们心里往往感到烦闷，心情饥荒，厌恶这种又潮又霉的气味和黑乎乎的空荡，而这在秋天是没有的。

安德烈终于脱下了毡靴，换上了轻便的软底鞋，他走路很多。走路——对他是最好，最愉快的状态，只要走，活动，去哪儿都行。走路的时候，思绪比较简单，还会被路上看到的一切所分散。他带着猎枪，但没有开过枪，也没有什么可打，四五月份里动物特别小心隐蔽，附近又没有发情的松鸡群的聚集地，没有耕地，就在平时，也很少有鸟到这里来。

天气越变暖，夏天越临近，安德烈越想看看冬天的残迹——雪，在一些偏僻阴暗的角落里还能找到。他找到了雪，停立在肮脏、平滑而又潮湿的雪团面前，怀着呆滞的，沉重的心绪和它们告别，相信自己是看不到来年的雪了。他要使自己做好准备，他在走一生最后的一圈，而这一圈很快就要合封了：他已经活过最后一个秋天，最后一个冬天，正在度过最后一个春天，前面是最后一个夏天。望着融雪，他感到自己和它们有一种莫名的亲缘

关系,和它们一起度过了共同的时光。也只有冰雪是他能送走的,而其他的一切,在他死后会继续存在下去,他还给自己定下了最后的转折点,说最后,是因为在此之后,他能生存的时间就不长了。这个转折点就是等安加拉河河开,他搬到上游过冬房去住的那一天。为此,他已作了些准备,把眼下用不着的一些衣物搬过去了。在床铺上他放了些云杉枝条,让它枯干着,这样,外人就看不出是什么时候砍下的了。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安德烈不让自己去想搬迁的事。他要在安加拉河开,河畔万物复苏的欢乐时日,才走进自己最后的藏身之所,立刻就能兴高采烈地从高处俯瞰一河春水,也就达到了他当初逃回这里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曾是那么遥远,可这么快就实现了!别的目的,他没想出来。他本以为夏天来到之前还有一大段日子,可是这日子被一天天拖走、消失了,夏天就要到了。然后干什么?他将拿出纳斯焦娜偷着给他的那一小瓶家酿白酒,看着他实现宿愿的见证者——解冻后汹涌奔腾的安加拉河,一气喝光。喝了酒,他就会进入孤苦的醉态,他会借着酒劲把痛苦和耻辱、平静和期望、悲观和恐惧统统搅和在一起,去燎烤自己的心灵,使他产生一种独一无二的,天真的,像小窗口那样明亮的感觉:我还在,还活着,不管明天怎样,但在今天,现在,我还活着。他已经预料到会是这样的。对这一天他有着既害怕又高兴的预感,怀着冷漠的惊奇等着,这一天必定会到来。

现在他睡得不实,断断续续。月夜使他感到不安,他经常在痛苦和无缘无故的惊恐中醒来,并走出过冬房。在这种时候,他受过伤的胸部疼得比往常厉害。月光越亮,他越感到不安和憋闷。他想象自己已在另一个世界,他看见的月亮是圆圆的,悬在像天花板那样低矮而又光滑的天空,一动不动,从不升起,也从不下落,不知为什么,还冒着烟雾。

夜间，他一般总是到安加拉河岸上去，在夜幕中坐下来，久久地望着河面上的冰层。冰层徒劳的坚硬，让他羡慕，让他振作。就是在夜里，在上冻的时候，冰层也在耗损：下面的流水冲刷它，不断有冰块散落下来，加入浮冰群，或结冰溜。冰缝不停地扩大，不时发出短促的崩裂声。漂浮在冰窟窿里的冰碴无奈地叹息着。安德烈屏息静气时，能像野兽那样敏锐地觉察到每一个声音和每一丝呼吸。他学会了使所有的感觉受控于一个感觉，从而能觉察一般人不能感知的东西：他感觉他听到了月光在冰上缓慢地反复地吟唱着悠长，轻松而又清脆的曲调。有时，他聚精会神，借着暗蓝的冰光，竟能看到安加拉河冰下的巨流。他还能在水中找一个标记，过一会儿又在别处看到它。在这些深夜时分，他只靠嗅觉活着，其他什么也不想，天亮前，也是嗅觉把他领回过冬房，并进入梦乡。

他已学会白天在阳光下、在树林里补觉。先是抬头仰望，过不了几分钟，阳光闪耀，空旷无际的天空就会使他浑身瘫软，迷昏过去。等他醒来，又冷又饿，不满地看看四周：现在上哪去？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他又多半回答不了。晃悠吧，晃悠到哪儿算哪儿。

他一边走，一边辨别着气味，四处张望。有时他装着暗中潜守一个人，想从这连孩子都不会干的胡闹中找到乐趣。他时而像跟踪什么人，时而相反，好像是在逃避追捕，步步小心，绕过空地，躲进云杉树林。玩够了，就嘲笑自己，大声地傻笑。在这种时候，他的记忆好像被隔断了，他不相信自己参加过战争，曾经生活在人们中间，而似乎始终就是这样一个人闲逛，什么事也不干，什么义务也没有，似乎从一开始他命中注定就得这样。

他总想吃，觉得周围的一切也和他一样——饥饿，贪吃，连空气都死气白赖地缠着他，像尖利的吸管，在他身上吸吮，而这

里一个人能摊到的空气实在太多了。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感到过分急促的呼吸，把他最后一点力气也耗掉了。

五月初，他想到安加拉河上游走一趟，那里还可以开枪打猎。他认真地装备起来，除了猎枪，还带上一把斧子和一个口袋，晚上在外面过夜，这两样东西都用得上。他估算了一下，走这一趟一天是不够的。他想到有人家的地方转转，而从这里到村子得走整整三十俄里。去不去那里，他还没有准谱，但很想去。他觉得浑身痒痒，止不住急于想让人们撩惹一下自己，而他，如果能行，也惊动惊动别人。或者，谁也不去惊动，只在一旁看看，听听人的讲话声，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靠什么活着，以此来填充自己内心那难以平静的，渴求急切的空虚，然后就回来。雷勃那亚村，他决定不去。在那里被人看见，会被认出来的。最好到一个不熟悉的村子去。保不住会出什么事？！

一大早，天刚亮，他就出来了。午前他已走到石岛对面的河岸上了，冬天他曾在那里打过山羊。在阳光照射和河水的冲刷下，冰层变薄了，泛着蓝光，突露的石岛这时显得特别光秃，难看。可安德烈不愿耽搁，想立刻上岛，主要是想看看那个石洞。打猎时他曾在那里过夜，石洞还帮他获得成功。那次要不是藏在石洞里，还不一定有那么好的运气呢！那个石洞有一种隐含的，禁止触动的力量，这适合他，因而也强烈地吸引着他。这个洞也是个处理秘密的好地方，秘密可以在这里展现，也可掩藏。安德烈至今仍相信，石洞出现在他的眼前绝不是偶然，他能发现石洞一定是命运的安排。总之，近来凡是僻静的地方——只有在树林中才能找到的地方，哪怕是很小，没用的僻静之处，对他都有吸引力。他常常突然停在一些老鼠洞前，用棍子往里捅捅，好像是估量它们会有什么用处。有时，看到一个小坑，他也会下去，蹲下试试，看能不能藏人；有时站在一个深坑边，因为有积

水,上面还飘着雪花,不能下去,但也要目测一下深度,久久地欣赏着很陡的坑壁;一会儿又往已经倒覆的树底下看看,有没有空熊窝。他最喜欢走山沟,走着走着会突然下意识地躲到树后边,观察四周,然后又钻进密林中去。他好像要把自己分成几部分,再把每个部分分别藏起来,时而藏这儿,时而藏那儿,希望能变成一个隐身人。他踏着沙粒,雪花,在这个荒芜的岛上找来找去,还是看中了这个石洞,对于藏身来说,它再好不过。

和岛相对的河岸开阔、裸露,已经阴干了。刚刚破土而出的小草,闪着淡绿的莹光。伴着安加拉河上闷哑的崩裂声,冰层在松动。快了,很快,在几天之内,冰就会完全裂开,向下漂游去。周围的一切都让人感到,河上的冰层最后完全崩裂的时刻迫近了,一切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很明显,安加拉河要解冻了——紧跟着就是夏天,转眼就到,一点就着,气势汹汹,不可阻挡,毫不迟疑,也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命运的一个新的转折也突然而来。安德烈忽然感到内心的焦躁:应该想点办法,赶紧找个地方,干点什么。他急匆匆地吃了些东西,又从冰窟窿里舀了点水喝,就继续往前走。

路上他打了一只星鸦。用弹药打只鸟是有点可惜,但安德烈知道,到傍晚他会累得够呛的,明天还得走路,得吃得好点。

日落之前,在安加拉河打弯的地方,他看见了一个村子。但他没有走近它,而是转头上了山。再累、再乏,他也强使自己离人家远点。野兽他早就不怕了,但是不想让人发现他的踪迹。早晨他向人家走去时,是先沿山绕了个大圈,然后从高的一侧绕过了村子。

他又听到了公鸡的啼鸣,还有回荡在每个居民点上空的那种连续不断,时起时伏,含混不清的嗡嗡声。有趣的是,这里的公鸡打鸣和阿塔曼诺夫卡村的不一样。这里的公鸡确实是在

鸣、在唱，不像他自己村里的公鸡，只是扯起嗓子叫唤。外地是不同于本乡啊。在西部前线的路上，他也听说过公鸡啼鸣，总觉得，那里公鸡的叫声比较弱，叫得比较克制，不使那么大的劲儿，也许比安加拉河一带的公鸡更有心眼。可今天他发现，就是安加拉河一带的公鸡，叫得也不一样。

安德烈下山时碰上了一个牧场。牧场高处的篱笆满是洞豁，歪歪扭扭、参差不齐地伸进桦树林。这篱笆像是妇女在战争期间围起来的，做得很马虎。有的地方埋了桩子，有的栏杆就钉在或绑在树上，悬着。还没顾得上修整呢！播种时，就不得不修了。安德烈伸着脖子往左看，村边上的一座房子离他只有一俄里，或许稍远一点，于是他就琢磨怎么走近村子，看看村里的情况。他既害怕，又很想去，禁不住想冒冒险，想干点什么，既吓唬一下自己，也吓唬一下别人。早就积结在心里的恶念烧起来了，一些还不明确，但要来点逆的心气也上来了。他不明白，为啥走了三十俄里路到这儿来——不是只为了在这篱笆边上站一会儿，就转身回去吧！不，得找到他这趟出来想要得到的东西。

不远的地方，一根树枝折断，发出清脆的声音，安德烈哆嗦了一下。这时他才看见在牧场的稠李林丛后面有一头大母牛，毛色黑白各半，斑斑块块。母牛站在黑白相间的桦树叶下，而他在桦树林的后面，一下子没有分辨出来。母牛身边还有一头小牛犊，和它妈妈一样，也是满身的黑白花斑，不到一岁口，也就三四个月的样子。安德烈高兴了，有事可干了，就观察起这两头牛。这个季节草还没长出来，硬要找青草吃，也只能舔到点露水而已，尽管这样，母牛还是低着头，在地上耷摸。小牛好像比妈妈更清楚现在没草可吃，它就去吮妈妈的奶头，母牛不让，跨过小牛，走开了。小牛又跟上去，要吃奶，母牛只好转过身，用没角的额头把它顶开。

安德烈聚精会神地盯着这两头牛，一个月前，在马圈观看父亲那次，他也是这样盯着马驹看，而这次观察得更敏锐，更集中。看来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似乎觉得，今后不可能再和帮人的家畜打交道了。可是，越是应该远离家畜，他却越想去接近它。当然，和其他损失相比，不能再和家畜打交道这个损失，不是最重要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对此他总有一种病态的，莫名的不甘心。

当然，母牛把牛犊从圈里带出来是偶然的：任何一个女主人也不会在这种时候把还在吃奶的幼畜放出来。不管母牛怎么躲着牛犊，它今天回棚时不会有奶了。安德烈满意地笑了。他觉得不是别人，正是他安排了这次出逃，他要不来，小牛犊可能还呆在棚里呢。如今既然出来了，就别放弃机会，去吮母牛的奶头，吮吧，把它的奶汁全吸干——它的主人晚上就有的可说了。

该悄悄地去村子了，那里有事等着他，什么事暂时还不清楚，可他是为这事儿来的。要说呢，他应该等白天过去，然后再钻到那没人请他去的地方。但他不想等，焦急的心情，和往常一样，搅缠着他，催他，使他变得很躁，很凶。但是，安德烈知道，他不会去踩夹子，不会去干使自己最后完蛋的傻事。他是指望，不管出什么事，他都来得及溜掉。赤手空拳是抓不住他的。

他沿着篱笆小心地挪动脚步，不时停下来看看四周，不一会儿，就看到了村子的边缘，从那里传来了手风琴的声音。安德烈猛然想起，今天不是一般的日子，是“五一”节。瞧，人们是在过节呢。管它战争不战争，人们照样庆祝，娱乐，挂起红旗，拿出精心保存的手风琴。傍晚，人们还会成群结队地从一家走到另一家，唱啊，跳啊，尽情地开怀欢庆。看来，什么也不能使人们灰心丧气。在阿塔曼诺夫卡村，现在人们也在娱乐。安德烈既不绝望，也不抱怨，这种时候能抱怨什么呢？他感到一种难以置信的

惊讶：人们庆祝节日！和战前一样，好像没有什么战争似的。他在村子附近转悠，人们毫不在意，好像他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现在他明白了，小牛犊是怎么钻出栅栏的，——人们都在娱乐。所有的小事今天都可放下，过节嘛！安德烈回头看看：母牛已经走近桦树林，离他刚才站的地方不远了。他往前走了一段，又回头，怀着突然产生的残忍的念头注视着小牛犊。小牛好像被扎了一下，撩起蹶子，跳到一边，很快就安静下来，懒洋洋地摇动着尾巴。这时，安德烈回过头看着村子，通往牧场的路上，空无一人。于是，他断然地原路转回了。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一种像是来自太阳的轻松、快乐的声响，浸在炎夏清新的空气中和山野的寂静中。村庄刚一消失，手风琴也就沉默了，所有的声音汇成了辽阔、自由而又无止境的巨流。为了阻止自己，他在篱笆桩子旁边停了一下，他本打算从这儿爬过去的。他再次向四周看看，听听，这时他很怕自己改变主意，急忙地翻过了低矮的篱笆，路上捡了一根木棍，从下坡绕到母牛身后。母牛发觉了，转过头，睁大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来人。母牛那水汪汪的眼睛和毫无恶意的眼神使安德烈的泪水涌上眼眶。他挥舞木棍，将母牛从豁口处赶出篱笆，往山上驱赶，母牛顺从地走了。长着一对钝角的小公牛，紧贴着母亲。一出牧场，母牛突然向左一拐，朝村子走去。幸好在桦树林里，它跑不起来，安德烈赶上去轰了回来。母牛停住不肯走，怒气冲冲地大声叫起来，小公牛也跟着哞哞地叫。这使安德烈发慌，赶得更急了。

他赶着牛向一条小河走去。早上他就是从那儿过来的，知道那里僻静，今天不会有人去。可是，母牛就是不愿意往那儿走，一会儿冲向左边，一会儿又奔向右边。想摆脱往回转。小牛也觉得不对劲，紧跟在母牛身边。母牛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两

肋鼓胀，嘴上全是白沫。安德烈也累得喘不过气，背上的猎枪很碍事，他取下，拿在手里，这样他和两头牛在林子里折腾了近半个小时，可是离河边还很远。

他和母牛每次试图骗过对方而又没有得逞之后，就停下来，站在那里仇目相对。母牛困兽般地吼叫着，沿着它身上白色的斑纹浸出了汗水。

安德烈累得不行了，这时他才想到用别的办法。他从身上解下皮带，不去碰母牛，去套小牛。干这种事，最好离村子远点，但现在没有别的招数可使了。小牛呢，也不屈从，在快要套上那一刻，抱起蹶子，跑掉了。安德烈紧跟不舍，向小牛抛出皮带圈，没套着。这时他已由气愤变成愤怒，恨不得扣动扳机，一下子结束这拖泥带水的，活受罪的狩猎，只因怕暴露自己才忍住了。

他总还算走运：终于把小牛赶进一片浓密的林丛，趁小牛在灌木丛中乱转时，把皮带圈套在它脖子上。小牛一下跪倒在地，接着又一跃而起，蹦跳，挣蹶，想挣脱跑掉。在这种情况下，安德烈知道怎么制服它。他用另一只手抓住牛尾，缠牢，硬把小牛拖出了灌木丛。小牛既怨恨又恐惧，大声惨叫。不等小牛醒过腔来，安德烈拉着它向小河跑去。母牛惨叫跟着跟在后面。这时小牛的叫声很凄惨，从它那被皮套勒住的喉咙里只能发出嘶哑的，像猫叫一样的哽咽声。

在小河边上安德烈停下来歇歇，他已经喘不上气来了。他把小牛拴在一棵白杨树上，并试着把母牛赶走。但它不走，只躲开几步就停下，安德烈稍一离开，它就凑上去，不住地闻小牛，舔它，用头推它，好像对它说，现在挣脱，跳掉还不晚。在母亲执著而又惊惶的爱抚下，小牛身体直抖，只能低沉地呻吟两声：它已精疲力尽，而且受了内伤，它的记性，知觉和嗅觉，以及它身上的一切都受了伤。

安德烈喘喘气，又抓起皮带往前拖，他决定拖小牛过河，指望河上的冰能挡住母牛。结果没有挡住，母牛一点也没迟疑，跟着他们走到冰上。在冰上它的腿就不灵活了，四蹄滑向两边，尽管挣扎着挪动，最后还是滑倒了，折腾半天也爬不起来，索性用膝盖往前爬，也不是爬，而是滑向对岸。安德烈不放它过来，用猎枪托打它，母牛不顾一切地向前一纵，扑到了岸上。

现在他们离村子至少有三俄里了。为了防备万一，安德烈把小牛又向山上拖了一段，找了一块不太湿，也比较背静的地方，又把小牛拴在树上。母牛站在远处，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安德烈突然大怒，从腰间抽出斧子，扑向母牛。母牛吓得大声吼叫，撞断树枝，一瘸一拐地逃跑。可是，只要安德烈一停下，它也就停住不动了。看来，赶走它是不可能了。等他转回来，看见小牛躺在地上。它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站不住了。小牛转头以恐惧的目光望着走近它的人。安德烈迅速、准确，用斧背一下子猛击在小牛的额头上，它只低微地哼了一声，头就垂下，耷拉在皮带上。这时，母牛在后边惨叫了一声。野性大发的安德烈又向母牛走去，决心把它也弄死。可是，当他看到母牛并没有躲开他，停住了：他今天已经开了一次杀戒，够了，再杀下去，可能会招来灾祸。

安德烈剥小牛皮时，母牛一直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时地低微地呻吟几声，逼得安德烈不得不畏惧地盯着它。刚宰的牛肉的生膻味熏得他吐了起来。他从死牛身上砍下两条大腿，又劈下一块肉，一起装进袋子里，其余的，像熊那样用枯树叶盖上，又撒些土、石块等压好。临走前，安德烈又最后看了看母牛，它低着头，一动不动地死盯着他，眼睛里闪动着一种不是母牛能有的威胁的目光。安德烈赶忙走开了。

返回途中，他在石岛对面的密林里过了一夜。这个地方仍

然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强烈的诱惑力。傍晚,他为了能赶到这里,使出了最后一点力气。夜里,他几次被安加拉河上传来的响声惊醒——河上的冰层在断裂。对此,安德烈既不惊讶,也不高兴。看来,袋子里的东西在折磨着他,掏空了他的所有感情,直到现在,他还是没弄明白,他宰杀小牛仅仅是为了弄点肉吃,还是为了满足这些天牢实扎在心里,能够支配他的欲望——触动一下别人,让人们也知道他的存在。

一个星期以后,安德烈搬到上游那间过冬屋。一天中午,他听到从阿塔曼诺夫卡村那边传来枪声,密集而无序,他猜到了:战争结束了。

十六

战争结束了。

一名快递信使从卡尔达村策马奔来,大声喊着这句话,像是一声渴盼已久的春雷震撼着村子,全村顿时欢腾起来。

和往常一样,第一个抓起枪向天鸣放的是涅斯托尔,接着全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这在阿塔曼诺夫卡是从来没有过的。女人们奔走相告,大声呼喊,边哭边诉,瞬间完全失去了已给她们造成内伤的耐性,把幸福和苦水在人前一下子倾倒出来。孩子们被这一消息震晕了,它超出了他们有生以来的全部体验,他们的身心难以容下,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往哪里传送,只是东跑西窜地忙乱起来。连成年人也不知所措了,他们已经习惯的那些一般的感情,已不足以反映眼前这一重大事件。人们在最初的震动之后,就哭泣,喊叫,相互拥抱,好像经受不了这巨大的幸福,一个个变得疯疯癫癫,到处瞎撞。人群散了又聚,他们倾听

着，等待着，等候着什么口令。涅斯托尔赶到了，他下令挂旗。尽管涅斯托尔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下命令，一个月前他已把主席的职位交给了马克西姆·沃洛格任了，但大家还是服从他，奔回去找红布了，有的找到了，有的人没找到，村子尽其所能地打扮了一番。人们把藏了多年的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穿在身上，孩子们这一杆那一杆地把家制的红旗插在大门上，插在房顶。阿加菲娅·索莫娃把去年秋天已成为孤儿的儿子的一件红布衫绑在一根杆子上，权当旗子，布衫还结实，也没退色。涅斯托尔赶来，大声喊着让她取下，但阿加菲娅不想听他的。为了防止别人趁她不在把布衫摘下，索性站在门口看着。

从早晨起一直显得郁闷的天气也变得兴高采烈了，云烟尽散，太阳用它那喜气洋洋的光芒炽热地，昂扬地照耀着天下万物。

当村里响起一片枪声时，纳斯焦娜正和瓦西莉萨·普烈穆德拉娅在近处一块地里，她们一前一后，在一垄地种豌豆。瓦西莉萨·普烈穆德拉娅首先想到出了什么事，赶忙去卸马，纳斯焦娜紧跟着她。正当阿塔曼诺夫卡村忙乱成一团时，她们纵马跑进村里。纳斯焦娜在大门前才下马，浑身燥热，气喘吁吁，飞跑进屋，把两个老人吓了一跳：坐在长凳上的谢苗诺夫娜惊恐地迎着她欠起身来，对窗站着的米赫伊奇也猛然转过头来。他们已被这个喜讯冲得惶惶不安，正等着另一个喜讯临门。这时站在门坎里的纳斯焦娜一下子冷静下来了：她干吗拼命往回跑，她想告诉他们什么？

“我们听见放枪了，”她开始解释本来就很清楚的事儿。接着又像是被什么打断了话头似的，很不自然地，盲目地要把话说完“我们猜到了。”

“向(上)帝呀！”谢苗诺夫娜祷告起来，同时对着圣像在胸前

画了个十字。“真的等到时候了？这回想必该能爽(说)清楚我家的安德留什卡到底在哪儿了吧？”

“能说清了，老太婆，能说清楚了。”米赫伊奇回应着，同时偷偷地看了一眼纳斯焦娜。

“这回要方(放)打(大)家回家了，方(放)他们回到老娘和老婆身边。”

“不能一下子全放。”

“畏(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难免会出什么事，没有军队不行。”

“可上回打仗，就没人说过打外(完)了。”谢苗诺夫娜沉默一会儿之后又接茬说，“谁也不知道，是打外(完)了，还是没打外(完)……德国人赶跑了，己(自)个儿人又打起己(自)个人来了，叫人更厌烦。尼(你)看，不是一直也没有消停吗！保卫公社，打仗，保卫集体农庄，也打仗，真是一天也没安兴(生)过。”

纳斯焦娜走进她住的旁间，换下干活衣服。在地里她的心就欢腾狂喜起来了，直到现在仍很激动，很想到大伙中间去。可是一个话音拦住了她，说这不是她的节日，不是她的胜利，她和胜利没有任何关系，最差的人都有欢庆的份儿，而她没有。她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就在床边上躺下，习惯地摸摸肚子。这种触摸不带任何情感，仅是不知所措，下意识的举动，只是两只手找到适当的地方，就停在那里，仅此而已。从街上传来不断的喊声，有人挥舞着鞭子，纵马飞驰。一个陌生男人的嗓音断断续续地唱着歌：

我们驾着铁马，

跑遍田野——

耕地，播种，收庄稼。

纳斯焦娜从床上跃起，看着窗外，心想：莫非有人赶上今天从前线回来啦？在街心，一群孩子围着一个她不认识的外乡男人，那人高个儿，干瘦，没戴帽子，短上衣敞着，趑趄着走过来。纳斯焦娜听见米赫伊奇在正屋给谢苗诺夫娜解释说：

“从卡尔达村来的……是送信的，人们高兴，把他灌醉了，他不能不醉，他不能，这是什么时候呀。”

“乡——亲——们！”这个男人突然大吼一声，停下脚步，为了站稳，把双手伸向两边。“都出来参加——游——行！希特勒完蛋了！”喊声未落，他又狠狠地追骂了一句，然后把头一甩，就像要甩掉自己的喊声，摇摇晃晃地走起来，又接着唱道：

我们迈着坚定的步伐，
敌人永远休想，
在我国土上随意溜达。

这喊声，这突如其来的，对今天这个日子有点过时的歌声，却更深地刺痛了她的心，更紧地绷起她的心弦；这颗心尽管焦躁，疼痛，难受，但却跃跃欲动，在向往、在追寻。她走到院里，向围栅外面一探身，就看见了从坡上街口处走来一群人，为了不去辨认谁在里面，她没有细看，转身回屋了。在一闪念中她想起了安德烈，是带着出乎意外的怨恨想到他的：都怪他，就是受他的连累，她才无权和大伙一样地欢庆胜利。纳斯焦娜又一想，安德烈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时，肯定会更难过，为他自己难过。想到这儿，纳斯焦娜平静了许多，心也软下来了，尽管恼恨未消，她可怜起安德烈，突然想去找他，和他在一起。他们今天也应该在一起：两只鞋凑在一起，才是一双。所有人都在参加普天同庆，只有他俩是局外人。“一点也不是外人，”她拒不承认，为自己辩护，把自己归为大伙中的一员。“怎么，战争期间我没干活，没卖

力气吗？为了这一天我出力比别人少吗？不，我现在就出去，现在就去参加庆祝。”纳斯焦娜心里在催促自己，可又坐着不动，好像在等有人能猛推她一把，使她站起来，并推进人群。

她还真的等着了。刚听见马蹄响，已经“吁”地一声停在窗下，还是那个风风火火、声大气粗的涅斯托尔，人在马上，弯下身子，敲打窗上的玻璃，大声喊道：

“嗨，活着的，死了的，都到阅览室去开会！开庆——祝——会！米赫伊奇，你在哪儿？纳斯焦娜！”

“噢，噢，”米赫伊奇放下手上的活儿，不慌不忙地走近窗户，“干么这么大喊大叫的？”

“去开庆祝会，庆祝胜利！这是紧急命令。有什么吃的喝的都带到阅览室去，要聚餐，马奶酒要带去，米赫伊奇，别心疼。我说马奶酒，一定要带去，懂了吧？”

“懂啦，懂啦，”米赫伊奇嘟囔着，“就要马奶酒，别的什么也不要？用马奶酒能顶一切。”

但是涅斯托尔已经疾驰而去，听不见了。

“真处(粗)野呀，”谢苗诺夫娜吓得连连咂舌，直摇头，“这许(些)当差的都爱大声嚷嚷，这个么，就更坏。”

“去吧，纳斯焦娜，”米赫伊奇说道，透过下垂的长须露出的笑容，显得忧郁，另有心事，“有马奶酒，你拿着去吧。”他又仰起头，更加果断地重复道，“等一会儿我也过去看看。今儿个不应呆在家里。马奶酒在地窑右首木板后面，去拿吧，叫大家都乐一乐，你也去乐一乐，去吧。”

“你把马来(奶)酒拿出去，等安德留什卡回来，你还有什么东西？”谢苗诺夫娜干涉了。

“安德留什卡回来，会有东西的，再说那要到什么时候。可今天过去就不会再有了。纳斯焦娜，下去拿酒。”

其实这就是普通的家酿白酒，用战前打下的好粮食做的。不过自古以来，这里就按布里亚特语叫它“塔拉松”^①。纳斯焦娜知道这酒放在哪儿。开春时，有一天她扒开一堆土豆，先看见一个像灯芯的塞子，她一摸，下面是个大玻璃瓶子。瓶子藏在这里，倒也不是为了瞒着纳斯焦娜，或者别的什么人。埋起来，只是为了不到时候就别看见它，免得心里痒痒。此后，纳斯焦娜曾经倒出一些，装在一个四两的小瓶子里，并把瓶子塞进带给安德烈的袋子里，使丈夫高兴一两个小时，给他提提神，暂时忘掉眼前的一切，还有什么能帮他排解，为他消愁解闷的呢？他孤单一一人，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可她现在却要到人群中去了。她没有资格吗？不可能说她没资格。

遵照谢苗诺夫娜一再坚持的主意，纳斯焦娜从那本来就不满的大瓶里，把一半酒倒进一个罐里，收藏起来。为了不要因为瓶大酒少而叫人见怪，纳斯焦娜把另一半酒装进一个小奶桶里。她提奶桶走出家门，停了一下，再一次下定决心，然后像老太婆出门似的，把街上的前后左右都看了个遍。

街上很久没有这样喧哗了。阅览室在村子中间，和米赫伊奇家只隔三个院。老远就能听见那里人们激昂、兴奋的高声谈话，看见缕缕的炊烟。看到人们的忙乱，狗也昏头昏脑地叫个不停，跑来跑去。公鸡扇动着翅膀，高声啼鸣，母鸡也咕咕不休。猪舍里的叫声尖利刺耳，还有开、关各家屋门，院门的响声，孩子们成群奔跑的脚步声。就在这嘈杂的喧嚷声的上空，却回荡着另外一种独特的，清脆婉转的声音。这甜美、纯正、欢畅的音调本是纳斯焦娜非常熟悉的，而如今却像是已经淡忘，或者说是失去了。她举目四望，搜寻这音调的来处——看见板棚顶上并排

^① 即马奶酒。

站着三只燕子,是它们正在抑扬顿挫地歌唱,不早,不晚,正好赶在今天回来了。飞回来了,可爱的小家伙,回到故乡度夏、筑巢、产卵、育雏来了。和平生活曾像根小草一样,从这片土地上被一把揪走,今天重返家园了,尽管它满身伤痕,蓬乱折损,然而这也许真的是和平生活来临了。有点难以相信:对和平生活已经生疏了,在苦难和恐惧中熬得太久了。燕子仍在认真地啁啾呢喃,宛如它们自己敲打出的清亮、圆润的祈祷前的钟声,又似唱着赞歌,拜谢神主,许愿报恩。至于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想必它们还不知道,也许已经知道了,为此才特意匆匆赶来,让人们听到它们的歌声,举目仰望,从而恍然大悟:到头啦,今天是苦海的尽头了。

从这一瞬间开始,纳斯焦娜就像掉了魂儿,全身感到一种幸福的怠倦,一种痴醉中的敏感,使她对什么都感到惊奇,对燕子更是如此。而此时她更希望的是表明自己不比别人差,她问心无愧,无所畏惧。

村阅览室前面是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家的有两居室房子、高大、敞亮、房顶陡峭。一间是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和老伴多姆娜二位老人住着,另一间原来是养子(他们没有亲生儿女)瓦西卡住的。自从长大了的瓦西卡应征上了前线之后,这间屋子已经空了两个春天了。空着是空着,但并未失去住人的样子,冬天总是生火,一直受到精心的照料:窗台上摆着花盆,窗户两侧挂着幔帘。因此,也根本弄不清楚,他们二老现在住的是哪一间。他们家很少有人去,英诺肯季不好客,尽管他过得很富裕,有吃有喝,出去有穿戴。他向来很富裕,也就是为过这种富裕的日子而生的,别的生活对他不合适,就像小孩子的衣帽,不适合一个高大的成年人一样。

纳斯焦娜路过这里时,门闷响了一下,门开了,英诺肯季·伊

万诺维奇走了出来。他人变得年轻了，打扮得也漂亮。深蓝色上衣的金属纽扣闪闪发光，颈部露出斜领衬衫的花纹，新裤子也是深蓝的，裤管塞进牛犊皮靴，靴子虽已穿旧，但还很结实，涂在靴子上的很厚一层松焦油散发着香味。见到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纳斯焦娜像见了亲人一样高兴，赶忙迎上去几步，笑着端详他那仪表堂堂的样子。

“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盼到了！”她高声喊道。

“盼到了，”他很庄重地回答说，又问，“你那位有消息吗？”

“没有。”她哈哈大笑，并毫不拘束地看着他的眼睛，回答说：“没有啊，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半点消息也没有。”

想了想，她又补充说：

“也许你知道他在哪儿，快说说。”

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连忙躲到一边。

“我怎么能知道？”他惊讶地说，“你这个小媳妇，真能开玩笑。”

“要是知道了什么，就说，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别瞒着我。”接着，她还是令人可疑地哈哈大笑，一面又补充一句：“我要是知道了，一定告诉你，放心吧，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一定告诉你。”

村阅览室的院子里柴火已旺，两口大锅里汤水滚沸。原来，新任农庄主席马克西姆·沃洛格任为了庆祝胜利特许宰了一只集体农庄的羊。女人们都坐在原木上削土豆，人挤成一团，多得不得了，全村都来了。屋里许多桌子一字排开，谁带来什么，就摆在上面，每份量都不大，但花样不少：有腌白菜、大碗大碗的酸黄瓜、一罐罐的奶渣、奶酒、刚抓到的活鱼、萝卜丝、花样面包、奶渣饼、鸡蛋、稠李馅包子，家里有的，什么都舍得拿来。孩子们被分成两拨：一拨小点的被派去采桦树叶汁，万一送来的不够，人

们也好有的可喝。另一拨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去安加拉河捕鱼，抓到的有宽鳞鱼、鲑鱼，更多的是茴鱼。每抓到一条，立即跑来送到餐桌上，鱼在桌上乱蹦乱跳，一会儿蹦进碗里，一会儿又摔到地下。窗户全部打开，窗台上，一架留声机扯着嗓门放着乐曲，纳季卡的小女儿莉德卡站在近旁，胸脯紧贴着留声机上弦的把手。纳季卡也在削土豆，纳斯焦娜走到她跟前，对着她蹲下，拉住她的双手。

“盼到了，是吧，纳季卡？”她很感伤，但不很得体地嘿嘿笑着问道。纳季卡没有回应，转脸避开了。

纳斯焦娜找到莉萨·沃洛格任娜，拥抱了她。

莉萨正在锅旁忙活着，灶火把她的脸映得通红，但神色安详，她转向纳斯焦娜小声问道：

“你这是怎么啦，纳斯焦娜，你怎么啦？是高兴的吧？”

“是高兴。”

“等你的安德烈吧？”

“等着呢。”

纳斯焦娜当众搂住马克西姆的脖子，亲了他一下。马克西姆有点难为情，但很高兴，大声喊道：

“谁还来？趁着莉萨还和善，快过来！”

“你等着吧，我和善！”莉萨半开玩笑，半发怒地说。“我只许纳斯焦娜这样干，也只是借账，安德烈回来就得还，别人谁也不行。”

纳斯焦娜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低声细语，嗓音发颤，满脸笑容，带着惶恐和愧疚，有时又像精神失常似地嘿嘿傻笑。嘴里就那么一句话，既不是发问，也不是提醒：“盼到了吧？”别的什么也说不出。不过她的这些表现，在这个日子里也还得体。她拥抱别人，别人也拥抱她，她掉泪，别人也陪着流泪，她要是笑起

来,别人也跟着笑。她被这少有的,心灵的亲密无间震惊了,似乎不能自己了。几年来,狂烈的震颤起伏使她时而哭,时而笑,时而高兴,时而吓得惊呆,她那只适应简单明了生活的情感,早已颓丧疲惫了,而今天则更是惘然若失,消竭耗尽,完全不受她的控制,使她这个一向拘谨、稳重,近来又特别小心,只应答、不提问的人,竟顺从地任凭摆布了。她都没想到去帮帮女伴们,就坐下吃现成的,事后她为此感到很不好意思。她还记得,她当时只觉得那是她能和大家聚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明天她只能是孤零一人,在暗无天日的荒漠中完全孤零一人。

大家围桌入席了,马克西姆·沃洛格任既来自前线,又是农庄主席,照理坐了首席。紧挨他坐着的,一边当然是涅斯托尔,另一边是卡尔达村来的信使。那信使一会儿闭上眼睛,垂下头,一会儿又硬挺着抬起头。马克西姆伴着胸前奖章丁当的响声,从坐位上站了起来。

“乡亲们!”他以哽在内腔的尖嗓门开始讲话了,室内一下子静得鸦雀无声。“乡亲们,讲话我不在行,这时候最好听别人讲讲。要说什么呢!我们胜利啦,还说什么!这种时候该说的,我们还没来得及想好。我们顶住了,挺过来了,我们冲上去敲断了凶恶的野兽——该死的希特勒的脊梁骨。我到过前线,知道那里的情况。说起来心里就翻腾……”马克西姆鼓起胸膛,满满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颤抖着呼了出来。“这一切你们也知道。现在我的所有战友都是一门心思,凡是活下来的,都急着回家,好把咱们的生活推动向前。我们的损失很大。哪里打过仗,那里就新坟一片,地面就高出一层。地显得多了,可人手少啦。这怎么说呀?!要是没有你们这些人,我们是坚持不住的。男人在前方打仗,靠女人们来供吃供穿。对敌人的仇恨把男人的心力都耗尽了,炼硬了,千里之外的女人和全家烘暖着他们的心,让他

们没有牵挂。要是没有你们，我们什么也干不成啊，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一天。我们的国家很大，很大，但没有我们这小阿塔曼诺夫卡也不行。我们在前线打了仗，你们在这里也尽了力。请大家抬起头，乡亲们，让我们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今天，永远记住今天。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战争，当然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胜利。我们来举杯庆祝吧，乡亲们。”

大家站了起来，酒杯碰得丁当作响，一口气干到底，又默默地坐下。纳斯焦娜凑过去想和坐在她旁边的纳季卡碰杯，但纳季卡却比谁都快，早喝干了。纳季卡今天令人吃惊地不爱说话，默默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好像不能理解，那折磨人的，但已经习惯了的生活秩序，为什么突然中断了。和任何人的生活一样，她的生活也需要和平。可是，眼下，当和平真地来到了，她却惊恐地意识到，一些人的幸福和另一些人的不幸，如今更鲜明，更突出，更无情地显示出来了。

卡尔达村的信使喝多了，又扯着嗓门儿唱起来：

我们迈着坚定的步伐，
敌人永远休想，
在我们国土上随意溜达。

有人很温和地数落他一句：

“咳呀，好样的！看他怎么回家？”

“他唱的这个……该不是他编的吧？战争已经结束了呀！像他这样的醉汉，说实在的，什么怪念头都可能有……”

“我瞎编的？！”信使听见别人的议论，马上起身，很吃力地站了起来，眼睛闪出了泪花，问道：“我编的？！”用祈求而又愤慨的目光盯着大家，“你们说什么？你们这是怎么啦？！”他嗓门儿更高了，喘了一口气，未能马上接着喊出来，“谁敢瞎编？你们想

想,你们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骑马奔来给你们送信儿,离开了自己的乡亲,得,谢谢啦……谁那么可恶,会瞎编? 你们这是怎么啦?!”

大家赶忙上前去安慰他:

“不是的,不是,不是瞎编,这还看不出来吗?”

“就是嘛,谁会干这种事呀!”

“他刚到时没醉,八成是在这里,为了庆祝胜利,向他敬酒了。”

“干吗没完没了地数叨人家,人家跑了二十多俄里呀,容易吗?”

“给他满上,让他干一杯,叫人家原谅咱们这些没良心的,可不是吗,没良心的……”

信使喝下一杯,火就消了,开始讲起他怎么亲耳听到胜利的消息,又怎么答应来阿塔曼诺夫卡报信。

“咱们村是不是人人都知道啦?”马克西姆大声问道,因为屋里嚷嚷得厉害。

“都知道啦,怎么会不都知道!”

“那阵排子枪一放,死人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可老爷爷呢?”莉萨突然想起什么,追问一句,“斯捷潘爷爷呢? 他从昨儿就在磨房修理什么,老爷爷还不知道呢!”

“枪声那么大,他总能听见吧?”

“他听到什么呀,他两耳都聋。”

“哎呀,老爷爷会以为还在打仗呢!”

“该派人去叫他呀,不叫他多不好。”

信使又动起来了,争着要去磨房。为了“履行职责,通知到所有的人,也通知到老爷爷”,大家按他坐下,劝他留下。涅斯托尔蹿出屋门,骑上跑了一天的马,这匹马一直没卸鞍,拴在院子

里。另外两个小伙子也跟着涅斯托尔奔出去，女人们探向窗口，追喊道：

“到那儿别跟他说什么。把他驮到这儿来。”

“先绑起来再驮。”

“可不能绑，会要他命的。”

又重新入座，倒满了酒杯。这回喝的是麦芽酒，现从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家里取来的。他与众不同，不把酒随身带来，而是看准火候才当众宣告，他家里有麦芽酒，为的是叫大家知道，喝的是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的麦芽酒。不过酒确实是好酒，又黏又甜，有一股醉人的香味。女人们哎哟哎哟地叫好，摇头咂嘴地细品起来，接着就回想起战前自家酿麦芽酒的情形，回想那时的年节是多么丰盛，回想哪年从哪家开始的欢宴。

“我们要乐个够啊，嫂子们，要乐个够。”脸色绯红，兴高采烈的马克西姆抬起他那只受伤的胳膊高声说道，“这回豁出去了，反正一切还会有的，男人们眼看着就回来了。”

“都是谁要回来呀？”这话问得声音不高，但很清楚，谁都能听见。发问的是带着孤儿的年轻寡妇维拉·奥尔洛娃。

“呶……”马克西姆很为难地说不下去，“总有人回来吗！”

“根据我的统计，”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站起报告说，“该回来的有六个人。”他的眼睛在席间找到了纳斯焦娜，“其中包括已经失踪的安德烈·古西科夫。”

“还有谁呀，还有谁？”

“我们不知道都有谁呀？还问什么！”

然而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却一个一个地数了一遍。他刚数完，纳季卡严厉、恶狠狠地劈头就问：

“我们家的那位你为什么不算上？还是往下你不会数了？你这位大会计！”

“因为你接到通知书了。”要把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问倒不容易，他知道该怎么回答。

“接到了又怎么样？你把他算上，他会回来的，我说：他一定会回来。”纳季卡激动起来，就像向所有在坐的人挑战似的。“你们瞧着吧，别指望他不回来，他一定回来，他会打破你这个计算的，所以你现在就加上，不是六个，而是七个，你就这么说。”

“那我的那个也会回来。”维拉·奥尔洛娃谁也不看，小声地说了一句。

“你的那位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的那个反正要回来。”

女人们有点尴尬地议论起来。

“倒也是，什么事儿都会有，卡尔达村的那个媒婆，纳斯达西亚家的不就是吗……”

“听人说，布拉茨克城里有户收到两张丈夫的阵亡通知书，说的又不一样，可正说着呢，这个人就进家门了……那些通知书叫人怎么信？”

这时看磨房的斯捷潘老爷爷被带来了。他双手被反绑着，由涅斯托尔持枪押进门来。这不知是谁信口那么一说，一时糊涂的涅斯托尔还真照办了。老爷爷被门坎绊了一下，浓眉下他那双小眼睛，毫无表情地向会场扫了一眼，他既不惊慌，也不害怕，完全没事儿似的，好像这里的一切，正是他想看到的。

涅斯托尔昂起头，面向大家，但更多的是面向墙上那些肖像，高声报告：

“漏网分子奉命带到，他藏在磨房里。”

“你真糊涂，涅斯托尔，”纳季卡第一个醒过腔来，“我们跟这样的糊涂虫在一起，不倒霉才怪呢？”

“老爷爷！”大家异口同声地喊他。

人们拥上去，解开绑绳，把他抬起来，安放到座位上，你推我

挤地凑到老爷爷耳边，争抢着向他喊叫：

“老爷爷，战争打完啦！”

“老爷爷，亲爱的，你到哪儿去啦？”

“我们这里就少你，把你给忘了，你别生气啊，都乐疯了。”

“我们坐着，觉得少个人，少了谁呢？少了老爷爷。天哪！”

老爷爷来回转动着蓬头散发的大脑袋，默默地，不慌不忙地频频点头，表示他明白了，谅解了。望着老爷爷，那些好流泪的妇女放声大哭起来。阿塔曼诺夫卡的村民们，直到这时——最后一个活着的人也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发生的事，他们自己也才终于确信：战争结束了。

十七

各家的船都已下水，也都试着划过，只有米赫伊奇好像故意拖着，他的小船还未沾过水，底朝上，孤零零地趴在岸边。纳斯焦娜等得焦急不安，但又不敢去催公公，怕叫他看出，她要小船是有自己的用场。但是，她不知道安德烈近来的情况，而去他那里的水路已经通了，再不行动，坐着干等，她又忍不住。她感到，战争结束了，安德烈的命运，也就是她的命运里总该有什么要定下来了。因此，她必须立即去见丈夫，弄清楚他有何打算，再往哪儿躲。在他们没有见面的这几周里，纳斯焦娜度日如年，不止一次想插翅飞到他的身边，去安抚他，也安抚自己。纳斯焦娜总在想，现在，夏日的美景正充分展现，新草破土而出，树林披上绿装，安加拉河冲破了冰封，诱人的蓝波滚滚，叫人神往的时候，人的心灵比在任何别的季节都敏感、多情，乐于回应。安德烈也可能挺不住，对自己干出什么来。她净做些解不开、猜不透的噩

梦：一会儿好像有人胳肢她，那人素不相识，又不显形，她笑得东倒西歪，飞跑上床，急着藏进被窝；一会儿又梦见跟母牛说话，母牛玛伊卡很机敏，有条有理地回答她；一会儿，她这个成年的已婚妇女，又和住在伊尔库茨克城郊的小时候的自己在一起，教她在安加拉河里游泳。一会儿又梦见什么别的。从这些梦中醒来，她心怦怦直跳，久久地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想啊，想啊，带着悲苦而又关切的爱，思念着安德烈。她对安德烈的爱中有怜，怜中有爱，这两种感情紧密地融在一起，她对自己毫无办法。她责怪安德烈，特别是现在，当战争已经结束，当他本可以像所有生还者一样，平安地活下来的时候，更加责怪他。她的责怪有时到了气愤，到了怨恨，甚至绝望的程度，可在绝望中她又回心转意了——她毕竟是他的妻子呀。既然这样，要不就跟他一刀两断，站出来跟大家说：他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没有我的错，要不就跟他一起走到底，哪怕是上断头台。常言说得好：和谁成了亲，生死不能分。再说，安德烈要比她苦千倍，他时时都面对着可悲可耻的死亡的威胁，而又想不让任何人，任何一只眼睛看到自己，免得死后留下恶名。谁说他无罪，他有罪。可事到如今，到哪里能找到一种力量，把他送回原来的地方，也就是他最初迈出不该迈出这一步的地方，如果能找到这种力量，他会情愿付出一切的，可是到哪去找呀？

不行，得尽快去看看安德烈，弄清楚他脑子里想些什么。

纳斯焦娜的肚子起来了，夜里自己把它露出来看时，一座小山似的，很明显了。她屏住气息，呆呆看着，轻柔地抚摩着它。她仿佛在起跳板上喘口气之后，更加神凝情呆了。于是她无声无息地飘然直上，进入一个奇妙的，能够透视自身的孤独境界。在寂静的灵境中，她忘掉了尘世上的一切，自己身上的每一细肌末脉她都看得清、感觉得到。就连那个正逐渐成形儿的胎儿，她

也看见了。她的感觉触摸到胎儿,给她描绘出他是怎样躺着,怎样懒洋洋,又无休止地吮吸着她那母亲的汁液。正如安德烈所希望的,是个男孩,但这也叫纳斯焦娜有些担心:要是个女孩,还可以指望她生儿育女,生出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而男孩就有可能是独根。不过,这些都是她后来想的,因为她已从方才既敏感又恍惚,好似从旁审视自己的那种状态清醒过来,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现实处境和遭遇了。她怕露出身孕,怕是怕,但又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到那时就用不着紧腰藏肚,不用左顾右盼,看是不是有人发现她已不是轻身,肚子怀上了孩子。这一天叫纳斯焦娜等得疲惫不堪。凭她一向丰满的腰身,个把月内还不至于被发现。可这以后人们就惊叫了。她越来越经常地感到,她正被猛劲地吸进一个狭窄的通道,只要她还有口气,就猛吸不止,直到她被紧紧挤住,奄奄一息,半死不活的时候,才会松开,把她随便一丢。这种新的生活,她怎么也无法看清,它是那样的阴暗、隐秘,就像那死寂的阴间一样。

得想办法到安加拉河对岸去一趟,为此,纳斯焦娜去找看守航标的马特维爷爷。他的看守棚在上游那一头,离村半俄里,搭在红色崖石的陡岸上。马特维爷爷是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的亲哥哥,但兄弟俩很少来往。对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人们都用尊称。他常出头露面,有文化,懂政治,战前不止一次地离村外出,去过很远的地方,见过世面;而马特维老爷爷,虽说在弟兄中排行老大,但没有人费唇舌称他的父名,可见他是一个多么朴实、普通的人。马特维老爷爷离村最远只去过卡尔达村。他离开农庄自己单过。但农忙时他总是回来帮忙的,特别喜欢收豌豆,这是男人们一般不愿意干的活儿。垛草时,他喜欢站在垛顶上干。

纳斯焦娜去找马特维爷爷,是因为她想起老人昨天曾向马

克西姆·沃洛格任要个助手，帮他一天，把几个浮标运到河面上装好，供夏季导航用。

“如今一点劲儿也没啦，”马特维爷爷解释说，“我一个人对付不了啦。眼下正播种，不问一声，就拐个人走，好像不合适。要是在割草季节，上帝做主，我拉上谁都行，跟我不会出事儿的。”

他们之间的谈话，当时纳斯焦娜只当耳旁风，现在可后悔了：就该报名跟马特维爷爷去呀，到了那里总能想出办法呀，她怎么没马上想到呢？不错，因为不会水，她怕在河面上干活。不就是一天吗，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再说，她现在该怕的，是这点小事吗？

傍晚，她来到了看守棚。这时，太阳已落到安加拉河对岸，正沉向镶嵌在地平线上的一片林中空地，那就是“安德烈呆的地方”。一半的河面已经蒙上浅淡的暗影，那里的水流比仍沐浴着夕阳的另一半，看上去要急得多。阳光下河水波光粼粼，令人目眩，好像流动中仍在徘徊、留连。鱼儿们带着它们自己才能理解的欣喜、欢腾地漂游着。那些最小的，鼓足了劲，连续猛跳，跃出水面，卷起水花，留下条条花样的涟漪。一些大鱼，带着怡然自得的咂嘴声，稳稳当当地溯流游荡。陡岸下面的残冰，千疮百孔、满身芒刺，滴下的污水，穿过沙面和崖缝，汇成涓涓细流。一群鸟在岸上飞奔，它们的尾巴又细又长，在纳斯焦娜生长的地方，称它们鹈鹕，而这里叫波里斯卡。这种鸟动作敏捷，闲不住，好忙活。还有一群群小鱼，靠近岸边游动，在故乡直称鱼崽，而这里叫小鲑鱼，好像以此向产于贝加尔湖的名贵的鲑鱼表示敬意，因为安加拉河里不产鲑鱼。纳斯焦娜的脚步声惊动了它们，小鲑鱼们轰然而散，搅起一片水花，钻入深水，转一个弯，等她走过，又顺着水流，重新集结到岸边。雨燕鸣叫着掠过纳斯焦娜的

头顶，湿气噎人，无风自涌的波涛，轻轻激荡；天空寂静无声，像是昏昏欲睡，只是从远处，从割草岛的突岬传来湍急的流水声。夜幕在降临，肉眼都能看见它在徐徐而落；太阳刚一落山，就刮起一阵微风，好像专来扯起夜幕，接着就停息了。这时，从此岸到对岸，安加拉的满槽河水流得更快了。纳斯焦娜从小就相信，水在暗处要比在亮处更急，更汹。

马特维爷爷正在船上忙活，作为浮标看守人，他有四条小船，都是他亲手造的。浮标竖在石头上，新漆耀眼，三红两白，已备好待运。踏着削土而成，又铺上木头的台阶，纳斯焦娜走下河岸，先向马特维爷爷问好，接着就兴致勃勃地看起浮标来。

“怎么定的，爷爷，”她开门见山地问，“马克西姆派谁来帮你？”

“还说派谁呢……”老爷爷不慌不忙地在河水里涮涮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跨步下了船。“马克西姆这小子啊，很滑头。说什么你能说动谁，就叫谁去吧。还说为这种活儿挑人，他也没资格呀。”老爷爷在脚下找什么东西，弯下身子，呼呼直喘。“一根灯捻，姑娘，不知丢哪儿去了。”他解释说，“你来找找，你眼神儿好使。这种宽灯捻再也没有啦，哪儿也买不到。刚才还在手里攥着，它能掉到哪儿去呢？”

灯捻在船上的坐板下边找到了。老爷爷把它藏进口袋。

“就两个浮标要人帮忙，别的我自己能放好。那两个没人搭手搬不动。一个要竖在岛下面，那儿的水急得很，停不住。另一个也是白的，要放在村后对岸那个秃岬边上。去年是放在哪儿的，你也该记得吧！那三个红的，我一个人能慢慢运走。我得去招呼个人啦，小汽艇不出明后天就会来查，不想叫人说咱干得最差。”

“爷爷，带我去吧，我能帮你。”纳斯焦娜说着又瞅了瞅浮标，

特意有点害怕地看了看那两个白色难搬的东西。

“哦，”老爷爷很谨慎地应了一声，心里嘀咕着纳斯焦娜的话可不可信。“只要你不是说着玩的，那怎么不能带你去？还能去找谁呀？你真想去？”

“是真的，爷爷，只是活儿干完了，晚上你得把船给我用一会儿。我想去岛上砍点儿柳条儿。我们家的船还干晒着呢。”

“柳条我可以帮你去割，这事好办！”

“不，不，爷爷，”纳斯焦娜大吃一惊，“我自己就行，也不着急。”怕老爷爷发觉她的惊慌，又加了一句“到时候看看再说……”

“随你，这事儿不难。可是，姑娘，老天爷从哪儿把你派来的？”马特维爷爷没想到这么顺利地得到了帮手，高兴地眯起淡白色的眼睛，眉毛和睫毛也和眼睛一样，已退色变白。他满意地哼着鼻息，“我还正发愁呢，求谁去？谁都有自己的活儿。既然要去，咱们就早点走，少睡会儿。你一定来吧，不会骗我？”

“一定来，一定来，太阳出来前我就赶到，还能更早。你别跟马克西姆说是我央求的，就说你劝我去的。我不想明天还去耕地，腻烦了，总得喘口气呀！”

“好，好啊，那当然了，你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次日，一整天纳斯焦娜都是在河面上度过的。天刚放亮，她已整装待发。清晨，凉气袭人，一切都在寂静的酣睡中，只能听见远处浅滩传来的湍流响声，近处的水流隐隐约约，低吟而过。安加拉河显得又浓又暗，岸边涟漪粼粼，中流波澜壮阔，油光闪亮。他们用的船又大又稳当，像只五角浮运船，拖着一个笨重的浮标，要划动它，还真得费点劲儿。他们先拉纤绳，逆水把船拖了一段，然后纳斯焦娜上船划桨，马特维爷爷操船尾的单桨。离岸后，纳斯焦娜就竭力不看水面，只看自己脚下，不敢设想很快

就得在船上站直身子，帮马特维爷爷干活。

竖第一个浮标，把他们累得够呛。船划过了头，偏下游了。他们几次试着逆水划回哪怕一小段，但都没成功。这个打算本来就是可笑的：这里水急浪大，河水奔腾咆哮，浪花不断地溅到船上。马特维爷爷抱怨自己无能，服软了。他们把船划向岸边，靠近的已是左岸了。到这对岸来原是纳斯焦娜求之不得的，但不是这样和老爷爷一起，还拖着浮标。尽管如此，当船接近岸边时，她还是打算想方设法留下来，说服老爷爷傍晚再来接她，那时他们再竖这个该死的浮标。但是，她知道，这不行。歇了一会儿，他们逆水往上拖，有意多拖了一段，好有余地。然后把船往回一顺，提前推下石座，用手提着，让水把它冲到地方。纳斯焦娜的任务就是划船，按着老爷爷的口令控制船的进退。等按要求竖稳了浮标，老爷爷才松了一口气，抽起烟来。

“这个是最重的，”他肯定地说，“我划船来点灯，熄灯比别人都早，你瞧这水，多凶多恶。只要这浮标一折腾，别想按住它。”

的确，第二个浮标竖起来就容易多了。纳斯焦娜提出竖第三个，因为时间还早，但老爷爷不肯，他叫纳斯焦娜走。

能竖起这两个浮标，老爷爷就心满意足了。听纳斯焦娜说还想干，就更高兴了。他说：“够啦，讲好是两个就竖两个，那些我就不发愁了。明天我自己能慢慢地竖好。趁天还没黑，想上哪儿，就去吧，要帮忙不？”

“我自己就行，爷爷。”

“呶，那好吧。”

老爷爷想给她一条轻快的小船，可纳斯焦娜还是用大船，划了一天，顺手了，不那么害怕了。那小船小风小浪里都摇摇晃晃的，坐在上面挺吓人的，万一再碰上河口灌来的海风或别的什么，那她就完啦，慢不怕，别出差错。人可能死在床上，路上或意

外地暴死，不管怎样，总得死在地上，死的时候总得双脚着地，肺里有气儿。纳斯焦娜只有一回，那是战前很久的事，看见过一个淹死的人，直到如今，一想起来，她还怕得不得了。

纳斯焦娜把老爷爷送到看守棚前，让他上了岸，谢绝了喝茶，立马掉头过河。现在，就她一个人的时候，当她连真带假（哪有什么真？只有假！）费尽心机只求能和安德烈会面，在两个来月的分离之后，这一会面终于临近时，她却顾虑重重，犹豫起来，很想推后，维持现状。她这次去能告诉安德烈什么呢？说战争结束了，又回来一个前线战士，老游击队员卢卡·斯莫林。他岁数不小啦，一向寡言少语，起初被征入骑兵，整个战争期都摆弄马，当驭手。三天前米赫伊奇逼着她给民警侦讯处写了一封信，探问安德烈的境况，并亲自把信交给了邮差。说谢苗诺夫娜走路好多了，已丢掉双拐，是不是暖和的天气帮了忙？婆婆能走路好倒是好，可纳斯焦娜对此却心有疑虑，觉得这对自己是个特殊的不祥之兆。还有什么可说？肚子……这安德烈自己也会看得出来。对，还有，不久前，她终于壮着胆子，把那块表卖给了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不用说，是贱卖了。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给的钱，她付了公债款，交款的期限到啦，是躲不掉的。

而安德烈能告诉她什么呢？他有什么好说的呢？她只要看他一眼，就全能明白：没见面的这些日子他过得怎样，他心里想些什么。他不能长期这样下去。得拿个主意，找个安身的地方。可又能去哪儿？……快了，快受惩罚了，不管是别人惩罚，还是自我惩罚，反正快了，世上哪有犯罪不受罚的便宜事。

太阳还很高，可是北风徐徐，河面上已有凉意。纳斯焦娜总是奇怪不解，夏天怎么能逆流刮北风，宽阔汹涌的河水，应该扯着空气顺流而下呀。

纳斯焦娜虽说划得不快，但那双她从未使过的船桨一天下

来还是给了她点眼色：因不断地重复一个动作，抻得她两臂酸痛，后背发麻。船过河面，泛起浪纹，沙沙作响，轻柔悦耳，宛如小小铃铛在向水中散落。另外还有双桨很吃力地吱呀吱呀划出的流水声。身在河心，如在空中，能看得很远，很远，一切似乎都在摇晃、在飘动：村舍、树林、天空、山坡上的田地、河岸，一切都显得不结实，模糊，虚弱。在安加拉河上方，一个黑点在高高地飘动，那是一只鸱鹰正在窥视，在打什么主意。纳斯焦娜平生第一次可怜起这种害鸟来：它打食也不易呀。近来，纳斯焦娜一直觉得她对什么——对人、对兽、对鸟，无论对什么，她都无权指责，因为他们的生活都是不由自主的，但又无力改变。

她贴着小岛下游的一侧，逆水向村里看不见的那一面划了几下，把船顺在岸边，再划过一个河汊就到了，只剩下三分之一的航程了。她停下来不是因为累了，而是心气不足，她心乱如麻，摘不开，理不顺。她又高兴，又害怕。马上要见到安德烈了，她高兴，同时又害怕，害怕见到至今尚在暗中隐含着的一切。

得调调弦，定定神，再往前去。纳斯焦娜茫然地望着河水，脸上强做出微笑，想借此平静自己的心绪，让心境像油那样，变稠些，平缓下来。可是，烦乱不消，无法平静。这时纳斯焦娜脸上挂着的已不是满面笑容，而是一副苦相。于是她回忆起把表卖给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的情景。还能有什么办法，可这个回忆也帮不了她解忧去烦。

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把表放在手上，摆弄半天，又紧贴耳朵听，举到眼前细看，不时地用锐利、探询的目光瞄一眼纳斯焦娜。表，他显然是看上了，但比起把表弄到手，他更急于想知道这块表的来历，这表是怎样，又是通过谁手转到这里的。他又一次把表举到眼前，想看看有什么可能提供的线索，显露实情的铭文，标志之类的痕迹。可什么也没有。他等了一会儿，隐去急切

的神情，又使自己和纳斯焦娜都很难堪地停了一阵之后，像似很随便地问道：

“你这表是从哪来的？是安德烈寄来的？”

纳斯焦娜的回答是早有准备的，她也故意和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捉起迷藏来，说道：

“什么安德烈寄来的……这就是给他买的，去年在卡尔达村给他买的，现在不得不卖了，没有钱交出债款哪。等他回来自己挣钱再买吧。真后悔买了这块表。”

“多少钱买的？”

“两千卢布。”

她不敢对他也像对米赫伊奇那样讲，说这表是猎枪换来的。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这人，你向他露一点口，他就要刨根问底。

“唉，我可没有这么多钱。”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摇摇头说，“瞧这阔劲，可你们家还老是装穷呢。两千就跟两个卢布似的，一掏就给出去了。卡尔达村是谁卖给你的？”

“我自己也不清楚，像是个当兵的，穿着军大衣。一看这表，我挺喜欢，赶忙就要了。卖了上衣、披肩，才凑够了钱。”纳斯焦娜满嘴谎话，但脸不变色，心不跳，直盯盯地看着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要是现在我还会买它吗？”

“两千我可没有，我可不是你这样的大财主。”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一面试探，一面装样，同时还是盯着纳斯焦娜察颜观色。“一千嘛，也许还能勉强凑一凑，再多就不行啦。”

纳斯焦娜想了想，叹了一口气，说道：

“行，一千就一千吧。在这儿我还能卖给谁呢？去卡尔达村得一天，弄不好得化上两天，眼下没这工夫。”

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数出一千卢布，但他并不相信纳斯焦娜讲的是真话。纳斯焦娜也看出来他没信。本不该来找他，但

确实再没有可找的人了。在阿塔曼诺夫卡村，只有他有钱。促使纳斯焦娜违心地来找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太爱探听别人的事，什么事都想比别人知道得多，知道得早。那好吧，我就给你送一块炸得香喷喷的好吃的，让你伸长鼻子闻个够，不久我还给你送来一块，我才不怕呢。

咳，倒是应该有所怕，你不是天使。不管你做什么，总不是那么回事。

十八

纳斯焦娜记得，安德烈现在该搬到上边那间过冬房去了，但她不知把船往哪儿放：顺到下游那个河汊里藏起来，还是直奔对岸，停在岸边，从村里也看不见，可要是有人上岛也就看见了，倒不如不藏。过安加拉河，理由多着呢！那里柳条很多，去砍些给公公编筐。米赫伊奇还真提过一回：上岛砍些树条也不错。对，就说上岛了，没去别的地方，反正路程差不多。回去跟米赫伊奇说她上岛去砍树条了，他会吃惊，但也说不出什么，本来就是他自己出的主意，纳斯焦娜只是出了力，再说，她做的是好事，干吗要反对。她总觉得人们在怀疑她，暗中盯着她，甚至在没有人的地方，也有这种感觉。

但这次不是感觉，是真的被人盯上了。纳斯焦娜划过来，把船头拖上岸，顺便四下看了一眼，刚要抬腿登上那不太陡的河岸时，从灌木丛中，从低垂在河面上的枝叶丛中，走出一个人来。纳斯焦娜没有看见他是怎么出来的，只听见身后有卵石的吱吱声，惊恐地一转身才看见。那人正弯着腰，一下一下地使劲把船拉上碎石滩。纳斯焦娜大叫一声。

“你怎么能这样放？会冲走的。”说着这人就弓着腰向她走来。

这人是安德烈。纳斯焦娜又惊又喜，心房狂跳，全身颤抖，惊呼着扑向他。安德烈没让她拥抱，急着把她扶到树丛后面，从岛上看不见他们的地方。在那儿安德烈自己先拥抱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呼呼直喘，仔细地盯着她的脸看。

“我就知道你今天要来，早晨就知道了。”因目光离她太近，安德烈只得眯起眼，喘着粗气说，“早晨听见河汊里有人说话，听出了你的声音，我就断定你会来的，在这里守候了一整天，后来看见你划过来了。”

他把她抱得更紧了。

“轻点，你这狗熊，”她推开安德烈，挺出了肚子，“会挤死的，你看不见呀？”

“有啦？”他高兴得像喝醉似的，急切地问道。

“你以为我是粥喝多了吗？”

由于很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他笑得很不自然，就像在断断续续地吼叫。他伸出像爪子似的宽大的手掌，小心翼翼地触摸她的肚子，试探有无弹性。他的抚摩使纳斯焦娜很快慰，她深长而又舒坦地松了一口气。

“还摸不太清楚呢。”他说。

“瞧你，还摸不清楚……”

她拉过安德烈的手，贴到被胎儿身体顶得凸起来的地方。

“摸着了吗？”

“好像是有点什么。”

“好像……你自己才好像呢。不光是有了，我还知道，是个小伙子。”

“我知道，”安德烈哼了一声，“你怎么知道是男孩？”

“我们打赌怎么样？赌生男孩，不是女孩。”

“你先生下来吧。”

“我要生，怎么会不生？哪有孩子总留在肚里不出生的。”这些话把她自己也逗笑了。

但是，当她细看安德烈时，心就凉了。由于没料到能这么快地提前相会而引起的幸福的激动，这时也消退了。他脸盘尖瘦、干瘪，透过掩面的胡须，也能看清两颊耷拉下垂。胡子看上去已不是黑色，变得花白了，很脏，成绺打卷，更显得邋遢不堪。他的头总是向前探着，好像无时不在朝前注视和细听着什么——也确实曾有过什么。不久前，他把头发撩起来，摸着剪过，长短不齐，一头蓬乱。眼睛，最使纳斯焦娜感到可怕的是他那双眼睛。从上次会面以来，他的眼神变化之大，变得如此滞呆，除了留神戒备之外，就没有任何表情了……安德烈发现纳斯焦娜很凄苦地看着他，便猛凑过去。

“怎么，不喜欢我这个样？”

“安德烈……”纳斯焦娜一头扎进他的怀里，为了避开这个问题，把头憋在他怀里，用发哽的低声说出一句她认为是顶重要的话：“安德烈，你还不知道，战争结束了。”

“我知道。”他很平静地说。

纳斯焦娜身子向后退，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我听见你们庆祝胜利的枪声了。”

“是的，放枪了……是的。”

“现在我的眼睛、耳朵变得特尖，能看得很远，听得很远。”不知他是想以此转移话题，还是真想夸耀一番。“我自己都认为很难得。早上你在安加拉河面上划船时，我就知道：有人在划船。我从山上，从过冬房那里就听见了。等你们划进小河汊，我就断

定是你了。”

“我可没给你带来什么东西。”她缓慢，淡漠地说，心里想着别的。“只带来点面包和几个鸡蛋，拿多了，怕人看出来。”

“我也不需要，现在我活得下去，大森林能养活我。只是得有一顶帐子，眼看蚊子就要嗡嗡起来了，没有帐子，我会被它们咬死的。”

“对啊，帐子……我怎么把帐子给忘了。”

“下次你再带来吧。”

“我带来……”

纳斯焦娜开始寻思到哪儿去弄到蚊帐。他安德烈那顶旧马鬃蚊帐早就用破了，家里也没有空余的，到哪儿去找呢？蚊子可比野兽还厉害，这里就丈夫他一个人，蚊子都会盯上他的。

他们一直站在原地，彼此围着对方原地踏步。和他们齐肩而立的是一片小白桦林，已长出皱巴的新叶，还很小，带着很深的皱纹，在阳光下显得浅淡。

透过白桦树枝叶之间的空隙能看见安加拉河，而阿塔曼诺夫卡村被石岛挡住了。太阳西坠，光柱斜着撒向对岸。这里的河岸宽阔秀丽，稠李、白桦疏疏落落地亭立在岸边的草地上；河岸以稍可觉察的坡度徐缓地斜向水边，寂静无声，好像一直是隐而不露，或是从无人迹似的。一群嗓音细弱的小鸟正在草地上忙活着，背上有花鼠那样的条纹，长着很高的头缨。只是从这一岸边的远处，一只杜鹃叫得早就让人讨厌，喋喋不休地招人听它算命。在安加拉河河面上划船时，纳斯焦娜就想试试，但又害怕，要不这时能算到二百来岁了——我才不愿活那么长呢。

“呶，咱们到过冬屋去吧，好不好？”安德烈问道，同时不知为什么向四下张望。

“那还得走很远，”纳斯焦娜有点犹豫。“我把船扔下……别

叫人给划跑了。”

“谁到这儿来……”

纳斯焦娜走到船边，从船头上取下一小包食物。他们还是没去过冬屋。在寻找能坐下的地方时，他们发现一块僻静的圆形林中空地。正中间横着一段短粗的木头，又白又硬，像根骨头，把空地隔成两半。他们就在上面坐下来。纳斯焦娜把小包递给安德烈，他眼看远处，不慌不忙地打开小包，一见有面包，就急不可耐了，拿起来就咬了一口。纳斯焦娜尽量不看安德烈那贪吃相，便从木头上溜下来，坐在地上，很舒服地伸直了两条腿。——在船上蜷得太久，已经麻木了，同时也禁不住抬头偷偷地看他一眼。令她惊讶的既不是安德烈，也不是他的饥饿，而是眼前这个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人，这个正在从胡须缝里抠食面包渣的人，就是让她夜里失眠，用尽心思，全力奔到他这里来的人。天哪，人的感情是多么变幻不定！又是多么固执和难以捉摸！她划船来找的就是这个人吗？她苦苦思念的就是他吗？对她拥有可怕的，而又是她所期望的支配权的，就是这个人吗？真难以相信。但是，纳斯焦娜制止了自己：从前线回来第一次见面时，他不就是这样问的吗——我为谁跑回来的？为谁做了这蠢事？他这可不是随便过了一趟安加拉河，比这要严重得多。想到这里，无可奈何的愁苦，使她的心紧缩起来：人一点也不了解自己，自己不相信自己，自己害怕自己。

杜鹃声调不变，咕咕叫个不停，一直在算着谁能长寿？——是树木、河流、还是岩石。岛前的水流哗哗作响，在低垂的夕阳下，最早结起的片片蛛网在林中闪光。视野之内，枝叶新绿，液汁日满，如纱似雾，景色迷离。空气中弥漫着湿润浓郁的清香。气息一出口就被凉却了。一只蝴蝶从高处落在林中空地上，在密集林丛撞来撞去，很久未能飞走。透过枝叶还能看见安加拉

河和在岸边翘起的船尾。纳斯焦娜不时地往那里看看，她倒不完全是担心船，更令她担心的是下面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

安德烈吃完了，为了不扯得太远，纳斯焦娜直接问道：

“战争结束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安德烈？”

“不知道。”他耸耸肩膀说。纳斯焦娜听着很不顺耳，她觉得安德烈这个“不知道”说得过分轻松，他这是什么也不想知道。

“我们不知道谁知道？应当想想法子，安德烈。”

“你要我想什么法子？”

“为什么是我要……不是我……怎么着？什么法子也不想？你说呀。”

他转过脸对着纳斯焦娜，沉默了一会儿，找好了开头的词儿，坚定地说：

“怎么办？你生孩子，就这么办。死也要生出来，我们就为这个活着。随你怎么办，但要把孩子生出来，你要做好准备。”他刚刚果断，甚至残酷地说起来，就失音没声了。纳斯焦娜也发现，他的声调变化无常，有时不该严厉而严厉起来，紧接着又是近似哀怨的哭腔。这可能是因为长时间不说话，因为孤独，也许还因为别的什么。安德烈清清嗓子又继续说：“我呢？我怎么办？你大概不止一次想过，我就是留在前线也不一定就出事。你别不承认，我知道。我自己也这么想，现在仗打完了，更这么想了。可能我在前线真的什么事也没出，活着回来了。”他俯身把脸凑近纳斯焦娜，比平时更紧地眯缝起眼睛，用一种可怕的，沙哑的低声说道：“可要是出事了，我现在就不能和你坐在一起了！谁也不知道，可我在这儿坐着呢，你也不用问，也不要赶着我去做什么，我能做的只有一样。”安德烈挺直了身子，又一只手向下一甩。“等等，别打断我，我知道，也相信你。当初我怎么说的：要活到夏天。现在夏天已经到了。你顶着风雪来看我，不就

是不久以前的事吗？可今天你已经能划船过来了。死掉，不算什么，纳斯焦娜，反正是躲不开的。这四个月我等于活了四十年，再加上自己的三十岁，够了。所以我说死掉不算什么，但是我该知道，不能白白死掉。我愿意相信，我对你还有用，我知道你跑来，不是为我，而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自己能够松快些。”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为谁跑来的。”纳斯焦娜老实地说。

“你什么也甭管，一切都忘掉，只管生孩子，孩子是咱们的惟一生路。我这件事给你抹了不少黑。可你是个有良心的人，总是为我心神不安。生下孩子就会松快些。孩子可以免除你的灾祸，在这人世间，能因为养活他——我们的孩子而犯罪吗？没有这种罪过，纳斯焦娜，你就认准这个吧。我等你，每时每刻都在等着跟你说：要做好准备，要横下心来，什么也甭去想，把耳朵塞上，随他们怎么说你，甭听。我知道，你得受煎熬，忍忍吧，纳斯焦娜，可就是别伤了孩子。实在不行了，你就往这儿跑，到这儿来吧，我会等你。我要活下去就是为了你。此外，这世上没有我的什么事。要是他们逼得你没法活了，我就把他们都干掉，烧死，亲娘也不留情。”

他那两只发疯似的眼睛直盯着安加拉河对岸，抽搐地缩起脖子。

“安德烈！安德烈！”纳斯焦娜惊恐地叫他。

安德烈视而不见地看了她一眼，从她身边走开，方才突然冒起的那股怒气，虽然貌似平和，却能把人憋死，为了排解，他沉默了很久。纳斯焦娜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个似乎是别人的，故意嘲笑她的念头闪过，她忽然想起，她说来砍柳条，却没有工具，既没带砍刀，也没带斧子。这时，她觉得每堆树丛中都隐藏着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他们七手八脚地从四面八方撕扯他，把他撕成几块，直到把他拉进坟墓。而他，这个可怜的人还说什么

别人的心思都摸不透,对自己的心倒像有几分了解。

纳斯焦娜觉得地上凉了,起身坐到木头上。安德烈凑近她,没有像纳斯焦娜所防备的那样拥抱她,而是坐在那里像钟摆似的前后晃动。阳光已移出这片林中空地,移到水边去了。一只小鸟翘着尾巴在船尾跳来跳去,一会儿飞起来,不见踪影,一会儿又马上飞回来,敏捷地低头点水。在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扯起条条轻薄的白色云带,纳斯焦娜担心起来,可别变天哪!

“我也许要到勒拿河去一趟。”安德烈突然说道。

“去勒拿河?”纳斯焦娜很惊奇,“去干什么?”

“有个好朋友是那里人,一起打过仗。叫科利亚·吉洪诺夫。”他哽了一下,好像嗓眼儿里进去了什么东西。接着又重复说:“科利亚·吉洪诺夫。我们不在一个排,我在一排,他在三排。各排是轮流出去执行侦察任务的,所以不常见面,可多少走点运,就能碰到一起。他还是个单身汉,但他能成为一个好丈夫。他善良、老实,手又巧,什么都会干。他最后一件衬衫也会脱给你穿,最后一份口粮也会让给你吃。他脸上有一小块伤疤,可伤的正是地方——像个酒窝。是小时候打架叫人用叉子扎的。我和他约好:我们中间要有一个被打死,另一个就回到家去送个信。他家靠勒拿河,我家靠安加拉河,是同乡,不用走很远。他这人有点怪。我当时说,要是两个人都打死了呢?他说,不可能两个人都被打死。除非安加拉河和勒拿河流到一块去。”安德烈哼了一声,又长长地叹了口气。“我也向他吹了一通自己的学问。我说,它们最后就是流到一起了,流入大海了。他却说:一流入大海,它们就没啦,就死啦,就是说死后我们也要会合。一天清早,我们搜索回来,有人对我说:科利亚死了,被抬了回来。要不我去他家一趟,送个信,说说情况。”安德烈不停地说,“我知道,也记得他埋在哪里,掩埋他时,我自己也参加了。说好的事,

就得办哪……”

“那你怎么去呀？”纳斯焦娜小心地问他。

“我装做是从远处去的，他那个村很小。坐坐，说说，我就回来。埋他的时候，我没哭，在前线不兴这个。可是不久前我一回想起来就流泪。我不是个无情无义，麻木不仁的人，纳斯焦娜，要是那样倒好了，我可以轻松些。想着，想着，这心就跟针扎，蜂蜇似的疼……我也想，要不就去自首——自做自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判得越重越好，罪有应得，那就自食苦果吧。总比自己动手杀自己强，会派人把我埋了，我犯的事，到我的死也就为止了。他们不用折腾再找了，我也消停了。”纳斯焦娜屏息静气地听着，竭力不放过每一句话。但他却抬起头来，坚定地摇摇头说：“不，我不去自首。我倒不是为自己害怕——枪毙了，也许对我是可喜的事，那里总会有人把我埋了，可这里，连把我遮盖一下的人都没有。要是他们再知道了你是和我生的孩子，会把你骂死。我不愿给你们抹黑。我就认了，我有罪，可你怎么啦，犯了什么？还有，你生下孩子，孩子也得背上骂名，痛苦一辈子。不，我不去自首。你问我：‘怎么办？’我何尝没问过自己：怎么办？我们再等等看吧，总会想出办法的。可能我还到勒拿河那边去一趟。也许我一害怕，就不去了。离你远了我就害怕，纳斯焦娜，在你身边我才能活。早晨起来，我就想：纳斯焦娜起床了没有；白天走着也想：纳斯焦娜在哪儿，她用什么话叨念我呢？我也说：要忍住，纳斯焦娜，要忍住，别说出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出去。你已经不是我的妻子，和妻子应该住在家里，你对我就是整个世界。一切都在你这儿连在一起，合在一块儿，拆不散，扯不断。”

“别这么说，安德烈，你干吗要说这些？”她偎依到他的怀里，像一个迷路的人看到彩霞，但又不知道是朝霞，还是晚霞，既尴尬

又高兴。

“我很久没说话了，想说个够。你还记得吗，雷神节那天咱俩去河那边沼泽地里割草的事吗？嫌自己草场上长得少，就去那儿了。天很热，到处是蜘蛛网，烦死人啦。长把镰刀抡不起来，尽是小土包，没有平坦的地儿。更恼人的是，不知道该不该割。是个节日呀！乡亲们倒也没搞什么娱乐，但也没干活。雷神节嘛，那天也闷雷滚滚，随时都要炸响似的。你记得吗？”

“我记得，怎么能不记得。那是战前最后一个夏天，你就是那个夏天不当会计的，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接了你的位子。”

“对，咱俩一边干着，一边互相赌气。可为什么赌气，哪儿来的那么大的火儿，自己也不知道。我看着你，心里想，说句什么话能叫你哭起来呢，你一哭，我就可以说，我把你一肚子苦水全倒出来了吧！可我看你，还在紧咬着嘴唇，似乎是让我猜透你的意思是：去它的吧，咱们别干这活了，回村里去吧。可是两人都气鼓鼓的，直喘粗气，但不吭声。雷雨没来，却突然飘起蒙蒙细雨，轻柔，温和。这雨来得有点怪，天上一块云彩也没有，干净得像面镜子，后来，下雨了，也阴下来。我们停下活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你记得吗？当时我们的心情变得那么好，那么快活：多好的小雨，只有我们俩，我们没有吵起来，好像刚才在这里不是咱俩，而是别人。咱俩刚刚才见面。不是一个人心情变了，你我两个人心情都变好啦。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小雨下的，还是因为不用再干那活了？”

“接着咱们就去豌豆地了……”

“豌豆地是后来才去的。先是你把镰刀扔到我跟前，我把镰刀扔到你跟前。那小雨好像不是湿的，倒像雾，像光，下着下着，在半空中就化了。也许，我们真的是被它迷住了。你叫我去豌豆地，那时候，你叫我上哪儿去，我都会跟你走。瞧，想起了什么

呀……”

“那现在是咱们坐在这里吗，安德烈？还是别人，是当年割草的那两个人？”

安德烈歪着头，思绪很痛苦地陷入久远的往事。

“我不知道。八成不是咱俩，也不是从前割草的人，而是另外的，第三对人。发生了战争，什么事都有过。不，”他突然猛地一抖，“这是我们，现在这就是我们，纳斯焦娜。要不我就想不起这些了。这是我们。这些还没有全忘。我们过去的事不全是坏的，也有好的，是吧？”

“坏事记它干吗？”

“什么都要记住，纳斯焦娜，什么都得记着，只是坏事跟身上那个见不得人的地方一样，没有必要时不要给人看。”

“那你记得吗？”

这些亲切、甜美的回忆，使她陶然欲醉，神飞魂荡。尽管安德烈衣衫破烂，蓬头垢面，她全不在意。她只知道，眼前是她的亲人安德烈，与她共尝过生活中无比欢乐的人，而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呀。当纳斯焦娜清醒过来时，落日的余晖已平射到森林的背后，空气更潮了，青葱色的草木变得幽暗，苍凉。不知从何而来的一根落叶松枝，在纳斯焦娜眼前轻轻颤动，从那些难看的，结结疤疤长得像树瘤的芽蕾中，露出整齐的小嫩叶。坐在身边的安德烈，正低声打鼾。她惊叫起来：

“老天呀，没有柳条我回家没法照面呀，你带着小刀吗？”

“带着呢。”

“快走。”

纳斯焦娜当时没有在意，后来她才明白，为什么安德烈送她时问道：

“告诉我，纳斯焦娜，从我回来以后，村里没有人被打死吧？”

来过阵亡通知书吗？”

“从你回来以后？”

“嗯。”

“好像没有，没有，没有过。最后一个死的是沃洛佳·索莫夫，那是去年秋天。”

“噢，噢。”

他是想减轻自己的罪过。她却思量起来：干什么，为了啥？只为他自己，还是盘算别的什么？

十九

几天之后，纳斯焦娜又划船来了。这次划的是自家的小船，米赫伊奇最终还是把小船推下了水。从早起雨就下个不停，雨点不大，但下得很急，很凉。地里的活儿干不了啦。她想到自家菜园里干点活，那儿刚刚收拾好一畦地，准备种黄瓜。可是因为下雨，也没干成，白挨了雨淋，心里很不痛快。为了不白过一天，她决定划船去丈夫那儿一趟。把勉强弄到的一顶蚊帐送去，顺便再带上一小瓶防蚊的松节油，了却一桩心事。她很高兴米赫伊奇当时不在家，免得跟他讲了。而对谢苗诺夫娜只说出去逮点鱼就行。这些天谢苗诺夫娜一直在嚷嚷：“家家都在打鱼，我们这两位，到今儿连条鱼尾巴也没从安加拉河里捞上来。”说“出去一趟”，是为了含混不清，她步行和划船，都可以说“出去一趟”。谢苗诺夫娜还没来得及答话，既没来得及阻拦，也没来得及说行，纳斯焦娜已经出了家门，快步向安加拉河走去。船桨和缠在两根木杠上的旧鱼网都放在浴室的穿堂间里，纳斯焦娜提起它们，急忙下到水边，推船下水，划走了。本该逆水往上划，她

却猛划几下让小船顺流而下。五分钟过后,隔着飘忽忽,雾蒙蒙的雨幕,就看不见村子了。这时她才掉转船头往上划。

雨好像在低声细语,刷刷地洒进安加拉河,河面上朦朦胧胧,一片银灰。河心岛被冲得像一块漂浮起来的肮脏的黑斑,也像低悬的乌云。天也被冲蹋了,更确切地说,天根本不存在了,恰似落日,不知沉落到何方,只留下苍茫的暮色。纳斯焦娜记起,今年三月她就曾迎着潮湿的暴风雪的冷刃,在这一带踏冰跑过安加拉河;节季在变换,可她却没有任何改变,不论冬天,还是夏天,都得找最坏的天气,为了同一个人到同一个地方去。纳斯焦娜上衣外面披着一件胶皮雨衣,但它早已磨破,不能遮雨了。雨水在背上越积越多,越来越暖,于是一道道暖流顺着背沟而下,让人讨厌:湿透了的上衣,紧紧黏着肩膀,也很烦人。纳斯焦娜常常皱着眉头,耸耸背,把湿衣服抻开。这时,船桨也就停下来。

纳斯焦娜过了安加拉河,找到小河汊,把船划进去,又把它往上游推了好远,才把船放在一棵枝杈低垂在河面上的白桦树下,免得被别人看见,同时船上也可以少淋些雨。她随手拿走一张渔网,另一张留在船上。她上得岸来,虽然疲惫不堪,但松了口气:总算逃出来了,到了,好像一转眼就到了。她所以要带上渔网,因为她知道还得回家。如今她和安德烈的一切都颠倒了:人天生就是沿原路回去比往前走轻快,可他们却不是。安德烈还能回到当初改变他生活道路的地方去吗?她还能还原成半年前的那个纳斯焦娜吗?就是今天她划船回去将会多么艰难啊:还是那条安加拉河,可她会觉得宽了五倍,还是那两把桨,她会觉得重多了,还是一样的河水,她会觉得更深,更可怕了。还不如不回去,留在自己该留下的地方,跟着自己该跟的人,再也不用装假、耍滑、说谎,可以自己做主,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纳斯焦娜转身回到河边，站在多石的岸上把网捋开，这段河水湍急，水流很直。她带的这种网，只能这个时候用，再过两个星期，河水变清，恢复原样，它就不中用了。去年解冻之后，纳斯焦娜就曾在村前的岸边下网，逮回家的又是鲟鱼，又是茴鱼。米赫伊奇按着老年人的习惯，捕鱼只用篓子，别的方法一概拒绝。纳斯焦娜她今天只要抓住一条哪怕很细的小鲟鱼，就能蒙混过去。主要的是得有的可说，打个掩护，至于公婆信不信，都没关系。反正一切都要到头了。在一个黑土的深沟里，有一些横七竖八的树根，纳斯焦娜踩着疏松的泥土下去，拔出些乱树根，翻出不少蚯蚓，把它们挂到一个个钩上，握着石坠把网撒到河里。上钩吧，大鱼小鱼，都上钩吧。走开时，她想，即使什么也没捕到，只要鱼钩还有剩下的蚯蚓就行，就能证明她确实上过鱼饵，确实去逮鱼了，而不是干了什么别的。米赫伊奇那脑子，厉害着呢，什么都能想到。

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落到地上的声音，纳斯焦娜听起来好像连续不断的，吃力的哼唷声。茸嫩的小草默默地忍着雨淋，树叶也在冷雨中瑟缩。安加拉河上空飘着类似秋天才有的濛濛的雨雾。天上的云层似乎在移动，莫非这是她的幻觉？因为人的眼睛总是喜欢看见点什么。山上边的过冬房纳斯焦娜从未去过，只好猜摸着走。起初她走的是岸边一条早已荒芜的小路，还剩有一条条的秃地没有长草，因此还能辨认，随后她就拐弯进山了。她本以为，很快就能找到过去干过活的地方。可是，山坡上的荒地一块接一块，弄不清哪块本来就是生荒地，哪块是因弃耕而变荒的。她走过一片片荒地，越爬越高，可就是看不到房子。雨中眼睛看不远，她只好又瞎走了一阵，碰到一股泉水，才转过向来，顺着泉流往下走不远，就看见了正前方，一片稀疏的白杨树林后面那间过冬房用板条搭成的房顶。房子有年头了，加上

风吹雨淋，已经发黑。和已往一样，纳斯焦娜先敲敲窗，同时喊了一声，让安德烈听出是她，别吓着。安德烈也是一跃而起，扶她进屋，帮着脱下一身湿衣服。但是，这次谈话，和她上次划船过来，他们在岸边的那番交谈不同了。

这次要怪纳斯焦娜。她听从，也相信安德烈说的，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他在这里藏着，她在那里瞒着——咬紧牙关，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挺着一天一天地熬下去，就像在挤过一个长有锋牙利爪的崖石缝隙，走向渺茫的，能够得救的出口。但是，一旦她只身独处，就感到绝望，惶恐不安，心惊肉跳。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干什么？指望着什么呢？要是她真的能像个幼芽，钻出石缝，在安加拉河心，水流最急最深的地方，成为一棵会说话的树，挺出水面，那任何力量都别想遮盖住她。安德烈是不是去认个错更好？在天堂里，听一个回头浪子的悔过，比听十个严守教规的信徒的忏悔更叫人高兴。人们都是相信这条教义的。再说，一个犯了这么大罪的人，他也造不出别的孽了。可是一看到眼前的安德烈：两腮蹋陷，须发蓬乱，像一脸青苔，还有那极度疲惫、饱含痛苦，但还不失机敏的深深凹进去的双眼，一身衣服又脏又破，躯体前躬，一副戒备的姿态；在着雨之后，又走进这潮湿、昏暗、霉味呛人的过冬屋——看到和感受到这一切之后，纳斯焦娜更加痛苦得发抖了。

“你这儿不生火，是吗？”她压不住火，破口逼问。

“没有火柴呀。”安德烈觉察到她心情不好，很小心地回答道。

在这猛然涌起的愁苦中，纳斯焦娜浑身轻飘飘、空荡荡，脑袋里嗡嗡叫，她呻吟般地说道：

“安德烈，也许，不必这样，啊？要不咱们别这样苦熬了，咱们走出去？到哪儿我都跟着你，去服苦役都行，你到哪儿，我跟

到哪儿。这样下去我受不了啦，你也不行，看看你自己，都成什么样了，你怎么折磨成这个样子？谁说要枪毙，仗打完了……就是不枪毙死的人还少吗？……”

她正急着说，就看见安德烈背过脸去，目瞪口呆，一阵眼斜嘴歪的狞笑之后，他说：

“想甩掉我？好，好啊，请吧。”

“安德烈！”她惊叫一声。

“甩吧，纳斯焦娜，甩掉我吧。”他弯下腰，压着嗓门，用几乎是安慰的口吻接着说：“也是啊，你累了，要拖到多会儿啊？我也该知趣，我自己该明白。甩掉我吧，纳斯焦娜，但不会像你想的那样。你说跟我走？”他冷笑一声，笑得更加叫人恶心，扯开嗓说：“你知道，你不会和我一起被推到墙根枪毙。他们会可怜你，而我会被枪毙。起码看你那个大肚子，他们也会放过你。这样，宝贝，你就可以一个人走啦，你就可以心安理得了，瞧，多圆满啊。”

“住嘴，安德烈，马上住嘴，你这样说不害羞吗？”

“纳斯焦娜，我自己把你甩掉。快啦，等不了多久。我不想连累你一辈子。明天也行，要走这一步，现在就行，安加拉河不就在眼前嘛。用不着埋，用不着张罗。我连绳子都准备下了，我踩着冰去了一趟磨房，从那里带回绳子。很结实，五个人也经得住。我就从你的船上往下一跳，你看好，别让我浮上来。你反正得划过河，路上把我投下去就行了，前半段，我还可以替你划。”

纳斯焦娜双手按胸，像是在自我防护，她不想听，也不想懂他的话，使劲地摇头，央告说：

“你干吗要这样折磨我，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我只是想怎么办好……我也没逼你嘛，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想到哪儿，就说出来了，可你说了些什么？你干吗

这样？”

“用不着推我，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我第一天就跟你说了，这不行。你不能把我掉转回去，别费劲啦，没有用！”他已不能克制自己，向纳斯焦娜大声发火，把她吓呆了。“瞧，多好的心肠！想为我好，我知道你想干什么，想法儿怎么把我打发了，多半一宿没睡，尽想了吧，想出这么个主意，真是再好不过了！连蚊帐都带来了，等我手脚都被绑起来，叫蚊子咬不着我。我过得去，没有你的蚊帐我也能凑合。以后我也不需要什么了，总劳你往这儿送，也够累的了。够啦，你做得够多了，该歇歇啦。你别再来了，来了也看不见我了。你说得对，我骑在老婆的脖子上，靠老婆养活，是够难受的！不过，我要再一次请你记住：你要对谁说出我回来过，我一定抓到你，死了也要回来找你算账，记住吧，纳斯焦娜。”

纳斯焦娜一步跨到他的跟前，想阻止他说下去。但是安德烈却很快地摆出一副厌恶的脸色，皱着眉，撇着嘴，缩起脖子。

“你看着我，安德烈。”纳斯焦娜温和，但很坚定地请求他，“看着我，不，你看着我，别扭过脸去，看着我。你说说，我是像你所说的那种人吗？你怎么啦？安德烈，你怎么想得出来？你说，我像吗？”

“怎么，我还得向你认错？给你下跪，说我糟蹋你了，你还要我干什么？”

“不用认错，我情愿给你跪下，只求你别这么说。别相信你自已说的那些话，别骗自己。你怎么想得出来，说我会变着法儿坑你呢？你怎么啦？安德烈，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安德烈，怎么啦？别这样，呸，别……你好好看看我，看看我，我是你说的那种人吗？你还看不清吗？”

纳斯焦娜两眼盯着安德烈，咬紧嘴唇，强忍着，别放声大哭

起来，憋得她浑身直抖。

“别相信自己，而要相信她……真妙！”他嘟囔了一句，对周围的一切怀着盲目的无法发泄的愤恨。

他们沉默了很长时间。纳斯焦娜起身走了，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没有送她。

纳斯焦娜没能想多久，只有三天。抓住一个机会，没有跟任何人打任何招呼，把船推下水，就划着去了。安德烈还在这里吗？还活着吗？这些情况不明，她实在坐不住。夜里，当纳斯焦娜摸黑敲响小窗户，他就出来了。她一下子搂住他的脖子，高兴得不能自持，什么委屈、恼恨，都忘得一干二净，只要看见他还在，还活着。安德烈爱抚着纳斯焦娜，为这样的相会差点哭出声来。他悔恨，骂自己是混蛋，哀求她别生气，别对他那些胡说八道当真；还说，要是纳斯焦娜不来，他也要偷只小船去等候她，求她饶恕。这一切使纳斯焦娜更加魂荡神迷，发誓说：

“你要对自己干出什么来，我也去死，你记住这一点。”

二十

此后，一切就急转直下了，而且是沿着陡坡直滚而下。

星期六，纳斯焦娜在浴室里把水浇热，关上门窗，知道谢苗诺夫娜不喜欢开头的烫水和热气，自己就先去洗了。她刚在头上打上肥皂（莉萨·沃洛格任娜不知从哪弄来的黑皂，给了她半块），就有人来了，一进来就在过道脱衣服。纳斯焦娜屏息一听，听出这是婆婆那熟悉的喉喘声。她立马想去冲头，等谢苗诺夫娜一进来，她就赶快出去，说洗完了。但很快又改变了主意，收住了脚步。因为她知道，婆婆既然是一个人来的，就怎么也不会

放她先走。该着的，是躲不过去的。老太太怎么这时闯来了，从来没有一起洗过澡呀！像是故意的，像是知道别人不会料到她来，才故意来的。也许真是故意的，真的已经知道了；早就看出来，抓住这个机会来证实一下。要真是这样，可就有热闹可看了。纳斯焦娜赶忙缩到角落里，用木盆挡住身子，紧缩肚子。可是肚子已经鼓起来了，往哪儿缩，往哪儿藏呀？不管怎么使劲缩，反正看得出来，很明显。

也奇怪，这次还真躲过去了。谢苗诺夫娜也许是没有看出来，也许是看见了，但不相信，而把媳妇的发胖归到别的原因上了。但是，两人一起洗澡时，纳斯焦娜两三次都发现，婆婆正用琢磨的目光盯着她；每次她都弯下腰，把全身蜷缩成一团，由于使劲过大，连颧骨都被扯动了。过后，当纳斯焦娜穿好衣服，走出浴室的时候，又后悔了，干吗要掖着藏着？这可是最简便，最合适的机会呀。相反，应该把美妙的身孕好好给她看看；婆婆要问，就告诉她有了。这件事婆婆听她纳斯焦娜亲口说，总比她从别人那儿听说更好些吧！她总不会用开水浇儿媳妇吧，至于大喊大叫，大发雷霆，就由她去吧。那样，她就不用再时时戒备应付被人觉察，也就可以摆脱这越来越难以忍受的恐惧了。

但是，对于纳斯焦娜，这次洗澡并没有白白地过去。谢苗诺夫娜从那以后总是用她那特有的目光，像射击时瞄准那样，眯缝起一只眼睛，仔细地观察纳斯焦娜。纳斯焦娜知道，这目光对她绝不是什么好兆头。就是说老太太嗅到了什么，肯定是。真正的捕猎开始了：婆婆每天二十几次挺起身子盯着她，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目光是指向哪里。纳斯焦娜总是躲躲闪闪，不是侧身溜边，就是穿上安德烈的肥大上衣，走路时用两手遮着身子，再不就弓背弯腰。可是肚子就像发面一样，越胀越大，用什么花招也遮不住了。

一天傍晚，只有纳斯焦娜和谢苗诺夫娜两人在家，各自忙活着手里的家务。纳斯焦娜多半是收拾院子，而谢苗诺夫娜干屋里的活。忽然，婆婆像第一次看见纳斯焦娜的肚子，直截了当地问道：

“丫头，你是不是怀上啦。是什么胀得鼓鼓的？”

纳斯焦娜心中一怔：完了，到时候了，走到通往绝路的门坎了，迈过去吧，纳斯焦娜，没法可躲，无处可藏了。于是她和婆婆用了同一个字眼，并且说得还坚决，她回答说：

“就是怀上了。”

“哎哟一哟一哟！”谢苗诺夫娜拖着长音儿，似乎带着几分高兴地惊叫一声，因为这说明她不是瞎猜。突然，她撑着两条病腿，一下子逼到媳妇跟前。她狂怒得浑身发抖，用压低了的嗓音嘶叫了一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一个劲地摇晃脑袋。

“母够(狗)！”接着她就大声骂起来。纳斯焦娜没有马上听明白，不知这“母够”是什么意思，婆婆从未说过骂人的话。“母够(狗)！哎一哟一哟一哟！”婆婆揪着自己的头发，大声哭叫起来。“不要眼(脸)，真不要眼(脸)呀！向(上)帝呀，姓(圣)母呀！惩罚她吧，就地惩罚她吧。她跟人私奔啦！等不了啦！和人搞上了，她倒很消停，真是一条母够(狗)啊！安德烈很快就要回来了，可她却要下崽了……，你要不要眼(脸)呀？你有没有眼(脸)呀？你把眼(脸)掖到哪儿去啦？叫你肚子里生大蛆吧，一辈子也拉不出来，那才好呢！那才好呢！”谢苗诺夫娜骂得自己都害怕了，住了嘴，干咳了几声，抱着最后一点希望问道：“也许你是说谎？也许四(什)么也没有？”

“是有啦。”纳斯焦娜知道非这样回答不可，便呆板地，有气无力地答了一句，还情不自禁地向前腆了一下肚子。

“有啦，”谢苗诺夫娜呻吟道，“有啦，瞧她说得多轻松，好像

就应该有似的，臊也该臊死，可你还不害臊呢！你是只母猫？是到处拉屎，卖臊解馋的母猫？”她找到了‘猫’这个新词，于是就像轰猫那样，手指门口，“滚，从我家里滚出去！你这贱货，别叫我再闻着你那臊味，现在就滚！你在哪儿卖的臊，你就到那儿去吧。安德留什卡回来，我们对他说四（什）么呀？我们养了一个四（什）么人呀！收养了一个给我们丢脸的人！全村人都会知道的，都会知道的——天哪！你这小婊子，第一天我就看透了，你就看出你是个四（什）么东西。跑出去勾野汉子，揣回野种！滚！别等我用炉叉把你撅出去。家里不能再闻你那臊味了。”

纳斯焦娜穿着干活的衣服就出来了。从台阶上拎起水桶，放在长凳上，那是她刚才用它饮牛犊，忙乱中忘在那儿的。屋子里仍然骂声不止。纳斯焦娜停下站了一会儿，还没有完全清醒，仍不相信，这些骂声是冲着她的，不相信她真的被赶出家门了。她面带迟疑，若有所期，犹豫不决地打开了院门。在不远的空地上，孩子们正在玩打拐子，罗季卡也在里面。纳斯焦娜问他妈妈在不在家，他回答说，八成在家，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纳斯焦娜去了纳季卡家。

纳斯焦娜不抱怨谢苗诺夫娜，真的，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这本该料到的。可纳斯焦娜却一直指望，既然她是清白的，天理总得管点事儿，保护她，不受这种惩治。她倒不是要求公正，眼下也说不清什么公正，什么不公正，她自己也早就辨不清了，但希望得到婆婆一点点同情，希望婆婆能暗自猜出，她不能容忍的这个孩子，对她不是外人。难道自己的血脉什么也没有给她提醒，没有引起她寻根问底的念头？那么，对外人还能指望什么呢？就是这个脓疱，很长时间一直在化脓，耗掉了她多少耐心和精力。现在，终于胀破了，可又无药可敷。为了熬到有个结果的时候，还得经受多少苦难啊！光靠自我诅咒，自我安慰能管多大用

呀！可又会有什么好结果呢？不会有的，没有什么可等的，没有。

纳斯焦娜的心沉下去了，也没再提上来，只在腹下微微地颤动着，是不是她只靠腹内胎儿在活着？她为自己什么也不想了，只想保住孩子。不让自己所受的苦难伤害着他，完好无恙地怀到他出世的那一天。当他也能睁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见到他，会怜惜他，接受他，不致于像她纳斯焦娜现在这样被赶出家门。这个家确实成了她自己的家了，她在这里操劳了八年。她不是为落到这个地步而感到委屈，不是委屈，而是害羞；她不是为自己的所做所为害羞，她自己走的路她自己知道，是她认可的。使她害羞的是眼下的处境——她不得不去求人收留她过夜。离开这里吧，不行，她的手脚都带着双重枷锁，再说也无处可去。只剩她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

她来到纳季卡家，瘫软地依在门框上。没说妥之前，她不敢进门。谁知道，纳季卡会不会拒绝呢。如今对每个人都得重新看，你一旦离开了为人熟悉的位置，那和你有关的一切也要变，对你的称呼都会改变。纳季卡正在拨弄生着的火炉。

“怎么，累垮啦？”

“留我住一段，行吗？”纳斯焦娜已经没有劲再拖延，再琢磨怎么说好了，开口就问。

“留谁，你？”

“留我。”

纳季卡本没在意，不想理睬，这时才注意地看看她，问：

“出什么祸了？”

“被赶出来了。”

“把你赶出来了？”

纳斯焦娜指指肚子说：

“看见了吗？”

“这一——这，”纳季卡嗓门都变了，随后就惊叫似地问道：

“这是真的？这大肚子是从哪儿弄来的？等等，别动。”纳季卡蹿到纳斯焦娜跟前，扶她坐到木床上，自己弯着腰站在她面前。“这光天化日的，怎么能瞒得住呀，真的，看得出来了。可谁也没……你这是跑哪儿去弄大的？瞧，还真搞出名堂了！这小东西会唧唧喳喳叫的，会叫唤的。不错，这是谁给你弄的？”

“圣灵。”这会儿，要什么纳斯焦娜都会答应，只求别再追问她，缠着她，磨她，她心烦。

“圣灵，是圣灵，”纳季卡又逼上来，“那我倒想知道知道。当然啦，要是秘密就算了。好像没见过你身边有男人呀。不，你还是直说吧，别兜圈子，也许我自己还想和这位圣灵去试验试验呢。”

“你追不上，纳季卡，”纳斯焦娜知道，只要讲给纳季卡一个人，那就够了，就不用再向任何人做任何解释了。她拿定了主意。这听起来叫人嫌恶，可有什么办法，总得有个说法呀！这不是第一次，现在看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作孽。“记得吗，来过一个特派员？推销公债的那个？”她问纳季卡。

“是吗？”

“就是！”纳斯焦娜有点生气地说。“套上牲口，赶着就去了，我……也就怀上了。老手干这种事，还要多长时间？”

“不用多大工夫，不用多大工夫，我知道，”纳季卡赶忙表示同意。“可这事儿以后折腾起来就得工夫了。咳，纳斯焦娜，你一直装着规规矩矩的，见人就脸红。你这个守规矩的，可倒好！往后你怎么打算？要是安德烈回来呢？他还不打死你？”

“打死就打死呗，你怎么只问怎么办？怎么办？我怎么知道？！你最好先说说，我能不能在你家先挤一阵？你收不？”

“行啊，行。还能把你塞到哪儿去。有什么事咱们一块对付。你家的老太太当然不会可怜你，你让她白捡了一个孙子，她怎么受得了，她现在恨你恨得浑身骨头都咔咔响。”纳季卡说到这儿，忍不住嘿嘿笑起来。“怪不得她一直盯着你呢，可怎么看得住一个娘儿们呢，女人只能骗过自个儿，骗不过别人。谁能想到你会干出这种事，啊！纳斯焦娜！你真敢冒险，真敢冒险呀，你要遭罪的。没关系，苦也好，穷也好，咱们都在一起，我已经熬惯了。你就这样空手出来了？什么也没拿？要不我去一趟，收拾一下你的东西？”

“不用，过后我自己去。”

“自己，你‘自己’得够多啦，别灰心，能活下去，还有比这更糟的。狗和狼同窝，古时候就有过。咱们能过下去，何况咱们连名称都一样——女人。不，孩子你要生出来，要生出来，生出来再说。他总得有名有姓吧？”

“你说谁呀？”

“谁……还有谁？——就是你那个，让你认购他的公债的那个，真够滑的了。他的姓名你总问过吧？”

“没问。”

“姓名都没问？你真糊涂啊，纳斯焦娜，那你怎么给孩子起名呀，也难怪，你没生过孩子。出生证上要写上的，人家要问的。不过，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编一个也行。过一段才能出生呢，趁这工夫咱们给他找一个爸爸，找个最好的爸爸。”

纳季卡又坐着叹息了一阵，就悄悄地溜出了家门。反正早晚全村都会知道，那干吗放过这第一个讲出这件事的机会呢！屋里只有纳斯焦娜一个人，她躺在木床上，闭着眼睛，火烧火燎般的剧痛，使她喘不上气来。她想哭，想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一场，把这浑身上下都感受到的剧痛全吐出去。但又怕眼泪会伤

着孩子。她只好拉长声音，哼哼着在床上翻滚，一会儿立起来，一会儿又倒下去，折腾了很长时间，也一点没觉得松快，心被折磨得麻木了，既感不到宁静，也不觉得疲乏。

夜晚，米赫伊奇来了。他让纳季卡把纳斯焦娜叫到院子里，自己在一根节节疤疤，满是斧印的木头上坐下来，纳斯焦娜一直站着。站着，她也是强撑着，但她根本不能坐下，坐着不动，她特别难受，站着还能换换腿，活动活动。米赫伊奇哆嗦着大骨节手指，把烟斗塞满，磕了几下火石才点着，抽起来。刚抽一口就呛着啦，咳嗽起来。他转过身去，弯下腰，憋住气了，嗓子里拉风匣似的抽了半天，才缓过气来。纳斯焦娜站在那儿等着。米赫伊奇喘过气来，又接着吸了几口，定定神之后，才抬起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望着纳斯焦娜，有气无力地，但却带着强求的口气说道：

“他在这里，纳斯焦娜，你别不说，我知道。对谁也别，就告诉我一个人，告诉我，纳斯焦娜，可怜可怜我吧，我可是他父亲呀。”

纳斯焦娜摇摇头。

“就让我见他最后一面吧，我求你啦，让我见他一面吧。你要是连我也瞒着，就说不过去了……我想问问他，他还指望什么，啊？他没跟你说过？我们这一族出过各式各样的人，像他这号可恶的人，还没有过。闹到这个分上……领我去见他，纳斯焦娜！”他几乎是威胁地要求她，接着又哀求说：“我求你啦，领我去吧，得把他拽回来，趁他还没有坏透。你自己知道，这样闹得下去吗？够啦。纳斯焦娜，可怜可怜我吧，算你帮我啦。这样你也能松快点。”

尽管米赫伊奇的央求打动了她，可是她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说：

“爹，你说些什么呀？要我告诉你啥呀？我没啥能告诉你

的。没有谁在这儿，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没有在这儿。”

“纳斯焦娜，别说谎话啦！”米赫伊奇站起来，在鞋底上磕磕烟斗。“你跟谁说谎？我本想和你好好说，可你，你这大肚子就是他弄……还能是谁？！以为我不了解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编的那些，跟你婆婆和女人家说去，别跟我说。那杆猎枪你拿走给他送去了，还送去了很多别的。这些都是证据。”他指指戳戳地说着，手中的烟斗差点儿没碰到纳斯焦娜的肚子，便赶忙把手缩回来。“我问你！你把他藏到哪儿去了，藏在哪儿？”

纳斯焦娜明白，不该再谈这件事，可又找不到话，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她想赶快结束，快点打断这个话头，快点走开，回屋躺到床上去，于是就拿出了那张很能压住对方，但做过手脚的假王牌：

“我和你家的安德烈一起过了四年，一次也没怀上，可你还说什么‘证据’。”

他一下子呆住了，看着她，直眨巴眼睛，随后转过身，蹒跚地向院门走去。这时街上可能有人路过，米赫伊奇刚打开门，又缩了回来，站着又给自己鼓了鼓气，才走出去。

二十一

纳斯焦娜假装睡着了，在床上躺了很久。等纳季卡和孩子们都入睡了，她才披上衣服坐起来，但没有动，怕万一有谁没有睡死，又呆了一会儿，才悄悄起身下床，拿起连衣裙，绒衣和靴子，蹑着赤脚走了出去。在台阶上，靠着墙把衣服、靴子全穿好，就没扎头巾。她站在最上边的台阶上拿主意，她掂量着要不要按原来的打算去做，还是哪儿也不去，回屋钻进被窝，哪怕能睡

上一小会儿，得到久已离开，但非常渴望的安宁，怎么更好呢？

夜色有些可怕，死寂、漆黑。昨夜一场雨后，从清晨起，断断续续，稀稀拉拉掉些大雨点，就像阵风把树上和乌云上残留的雨水吹洒到地上。虽然整天都愁云低垂，但雨，一直没下起来，只是更加阴沉了。村里的房舍都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隐没了，要凝神细看，才能隐约地分辨出近处的房子，很可能也不是辨认出，而是根据早已熟知的位子估摸出来的。浓云低沉，叫人都能感到它带来的那种与地面上不同的阴冷的潮气，还有打旋的气流。只要纳斯焦娜不怕这种不祥的，在安加拉河会显得更加可怕的浓暗，这种黑夜是最能掩人耳目的了。

她下了台阶，就奔安加拉河去了。她早已盘算好，她要想躲开人们的耳目出村，只能在这种阴雨天的夜里。为了别绊着什么，碰伤自己，她迈着小碎步，走过了牛犊棚，进了三天前还认为是她自家的浴室，在过道上摸起双桨和撑篙。单手操作的划桨她没拿，还没有学会使用它。如今，她已不住在米赫伊奇家了，未经允许就用他家的船，有点像偷了。可是她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到别人家去借吧？人家会放出狗咬她，或者想出更厉害的办法对付她，现在这样已经够她受的了。好像知道她害怕被察觉似的，村当间儿一条狗突然莫名其妙地叫起来，接着就有第二条跟着凑趣。纳斯焦娜一惊，赶忙停住，在篱笆旁边蹲下，心惊肉跳地等到狗不再吭声。这天夜里，她什么都怕：本来正合她心意的黑暗，她怕；这异常的，使得很小的声音都能显得很响的寂静，她也怕；那几声狗叫，本不必在意，那不过是它在半睡不醒时犯糊涂，乱嚷嚷几嗓子，很快也就住嘴了。可纳斯焦娜觉得这一切都是预谋的，为了暗算她，都是不祥之兆。她小心翼翼，几乎是爬行，每步都紧蹭着地面走，好不容易下了岸边的陡坡。脚下卵石的吱吱声，推船下水时，船底的沙沙声，她都觉得

响得震天。使劲一撑，船离岸边，她跨进船舱，就猫下身子，一动不动，让小船随波逐流，离开了村界。

在这里，在安加拉河上，片片灰色的亮光，濛濛闪烁，时明时暗，水流也随之时隐时现，时而躬身而起，时而消落无踪。离河面稍高一点，隔着薄薄的一层晦暗，又可见到条条光带，不知是从何而来，只是更灰蒙，更微弱。再上面，就是一片漆黑了。纳斯焦娜瞪眼寻找航标上的灯光，就是她帮助马特维爷爷竖起的第二座航标，是白色的。幸好航标还在，没有被冲走，没有丢失，灯还亮着。这使她心里松快了些。浅滩上的流水声，夜里显得更低沉，平稳，那雄浑、悠扬，夹着哨声的吟唱，此时听起来格外好听。拂晓的轻风，徐徐吹着，时急时缓，时上时下……

该划桨了，虽然是阴天，下着毛毛雨，但夏夜毕竟短。纳斯焦娜本想赶在天亮前把船送回原地，看来是不行了。在床上躺的时间，在台阶上坐的时间，都太长了。后来偷着去拿桨，上了船，怕出响声，不动桨，顺流漂荡，又花了很多工夫——时间不等人。能在天刚亮，村里人还没起床，没人到河边的时候赶回去，就好了，靠岸时不叫人看见，免得招来闲话。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划船了，以后用不着了。不能再去碰运气了，够了。就这样，她好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已经失算过，她让人家知道得太多了，可又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盘算错了什么呢？现在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什么也不用指望了！只求能来得及跟安得烈打个招呼，跟他合计合计，然后该咋就咋吧。她感觉太累了，撑不住了，她都想再划得远点，然后收起桨，躺在船上，闭上眼，任河水把她冲到哪里，那样也不一定比现在更糟。

她被谢苗诺夫娜从家里赶出来，已经三天了。可纳斯焦娜却一直不愿相信：她现在借宿在别人家，她不能像从前那样回到自己的屋里，换换衣服，在木床上坐下，睡前羞答答地抚摩一会

儿肚子。现在用不着遮着盖着了,只要愿意,谁都可以乐滋滋地瞄着她的肚子,把这个公开的秘密当作新鲜事儿。她对胎儿那种柔情,那种战战兢兢的敏感也减弱了。使她害怕的只有一件事:别人会怎么对待孩子?总是忍着人们责难的,好奇的,猜疑的,甚至是恶意的目光——是很不容易的:正像纳斯焦娜对自己所遭受到的一切不能理解一样,别人也确实不能相信她就是他们很了解的那个纳斯焦娜,所以听到传闻后都想证实:她那肚子还那么大吗?没瘪下去?没消下去?谁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甚至莉萨·沃洛格任娜也没有给她鼓鼓气,没有说一句宽慰她的话,比如:要挺住,别管别人说什么,你生的孩子,是你的,不是别的什么人的,你就要保护他,过一阵也就没人再提这事儿了。如果在月数上贴边,搞不好莉萨还会跑来找她呢,疑心会不会是马克西姆……也许莉萨现在就正在琢磨,掰着手指头算计哪。谁能知道呢?还有卡捷琳娜,涅斯托尔的老婆,总是疑心很重地膘着她,心里直嘀咕,可又不好来找她,不好说出口呀。放心吧,你的涅斯托尔和这毫无干系。

并不是谁都相信她和特派员的故事,本来也该是这样。她用这个故事来搪塞,也没使心里松快多少。女人们好办,能对付得过去。她知道,在她们面前她没有什么错,她们凭猜疑加在她身上的那种罪过也没有。因此,她能毫无愧色地面对她们。更糟的是,有人溜着边地点到实情。纳斯焦娜的丑事暴露之后,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头一次见到她时,就眯起狡猾阴险的一双小眼睛,晃着头,摆出一副了解底细的样子,旁敲侧击地打探道:

“还得弄弄清楚,大嫂,是谁授给你这样一个奖章呀,啊?”

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浑身上下都绷紧弦儿,用锐利、审讯的目光盯着纳斯焦娜,看她有没有哪根神经在颤动,会不会无意中露出蛛丝马迹。

“弄清楚吧，弄清楚吧，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纳斯焦娜近来一直跟他顶牛儿，于是不甘示弱地回答说：“我可以悄悄地先告诉你，这孩子吗，一定会像你。”

“呸，真是个祸害！”他啐了一口就走开了。还一边威胁说：“不要紧，他像谁，我们会弄清楚的。”

这就更可怕了。可该怎么办呢，她不知道。她压根儿就没想过该怎么办，她已经不能动脑子想什么，拿什么主意了。从被谢苗诺夫娜臭骂一顿那天起，她就麻木了，至今也没缓过来。周围的一切，她都觉得不称心，格格不入，都跟她过不去，她每一步都有人盯着，每个念头都有人瞄着。她还动弹，只是为了不让浑身完全僵硬了。她在地里干活时，别人问她什么，她也答话，可她说了什么，干了什么，去过什么地方，一转眼就忘了。她整宿整宿睡不着，非常痛苦地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想不出招儿来。白天她也分不清是早晨还是晚上。整天迷迷糊糊，走路踉踉跄跄。纳季卡总冲她喊叫，一会儿催她吃饭，一会儿叫她上床睡觉，一会儿又喊她出工干活。叫她干什么，她就顺从地去干，两眼直勾勾地瞪着，又什么都没看见，木呆呆的，没了魂儿似的。她一直等着马上就要开始的割草季节。不知为什么，纳斯焦娜相信，在这个以前她很喜欢的、快乐的夏忙期，她眼下所受的像在泥塘里挣扎似的折磨，会有所改变，该到一个头了。够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今天她没有打算去找安德烈，可晚上纳季卡串门回来告诉她说：

“听我告诉你，纳斯焦娜，外边说你什么……说你的肚子是和自己的男人搞大的，不是跟别人。”

纳斯焦娜立刻觉得脸上一阵发烧。

“自己的男人，我到哪儿去找他呀？”她故意地哼了一声，表示惊异，“四年哪，怀了四年肚子才起来，是不是太长了？”

“我想这是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胡诌出来的，准是从他那儿造出来的。”纳季卡解释说。“这个老家伙闲不住，他自己对女人是个不中用的人，只能拨弄点是非，瞎编些听着有点那个意思的事。”

“跟自己的男人，就算是跟自己的男人吧。”纳斯焦娜认可了，想以此来表明，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我不在乎。

可是话说完了，她又怕得不得了。这个老滑头会揪住不放，揪住不放的。像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这号人，天下找不出第二个。他会一查到底，直到真相大白。被他抓住了，他是不会撒手的。他会到区里去找特派员，递个眼色，叫到一边，对他说，阿塔曼诺夫卡村很快就要喜迎他的贵子了。特派员肯定不会认这个账，会气得跳起来。玩笑过后，他们就会一起很认真地琢磨这件事。不行，安德烈得离开这里，去哪儿都行，去什么地方都行，但必须走。要不就出来投降，自首，得到宽恕的希望总会大些。一根绳子不管搓多久，总会有个头的。他惹出多大的麻烦，多大的麻烦呀……多大的麻烦……何苦呢！即使安德烈能走掉，永远不被发现，就像压根就没有过他这么个人似的，那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骂名还是会落到孩子头上，尽管这是安德烈最想避免的。到时候人们会说，当年他父亲是个逃兵。这个臭名怎么也去不掉的。人都是这样，你跟他说某人是魔鬼的儿子，不管他信不信，可魔鬼他不会忘，甚至还能找出一百个证据，来证明是那么回事儿，是魔鬼的孩子。这就是说，孩子一生下来就被蒙上耻辱。而且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不会像他们幻想的那样，很容易就能蒙过去，不可能的。父母的罪名，人们严厉地大声咒骂的罪名，要落到孩子头上。他可怎么活呀？！他是不会原谅，也会诅咒父母的，说他们真该死。

昏暗，周围一片漆黑，黑极啦！夜空沉甸甸地垂下来，看不

见两边的河岸，只有河水，它随时可以张开大口，把你吞咽下去再闭合起来，继续奔流不停。航标上那微弱的小灯，忽而一闪，忽而消失，判不清它是亮着，还是已经熄灭。深夜，河面上没有一点活气儿，像被冲毁的荒坟地上那样阴森，还有一股霉烂发酸的气味呛得喉咙发痒，而心躲在角落里瑟缩，竭力要避开那含混不清的招呼声。她觉得在河水深处，马上会响起一个声音，告诉她一定要发生的灾祸，使她听了之后再也不想往前划了。

纳斯焦娜轻轻放桨，尽量不带出一点水声，小心翼翼地往前划。她一面不出声响地——她自己觉得是这样——向前划，一面警觉地留心细听每一点响动，琢磨这是河水的响声，还是来自阴间呢？对一切她都得提防、戒备。岸上响起像是木头撞木头的短促磕碰声，她立刻就听见了，吓了一跳。紧接着又听见在碎石上推船下水时，蹭出的咯吱声，入水时的扑通声，稍停一会儿，传来了单手桨轻轻划水的匀称的吧唧声。

可以肯定：有人划船跟着她。也就是说早就盯上她了，等她的船一离岸，就追上来了。是谁呢？是米赫伊奇，还是别人？也在那段陡岸下，离她这只船不远，还有两条船，一条是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家的，另一条是阿加菲娅·索莫娃的，两条都没锁，都可以用。纳斯焦娜停住桨，一动不动。船被水冲得掉转了头，顺水漂动，船桨撑开，漂浮在船的两侧，划起道道波纹。甬想再往前划了，她听见了别人，别人也就能听见她，再说她已经划着转了一趟，可能早被觉察了。得赶快回去，要是米赫伊奇就好了，还不那么可怕，要是别人呢？不管是谁，都知道了她是在河里，划着船。

那只船摸不准纳斯焦娜的去向，也停了下来，稍后尾桨又轻轻地划起。纳斯焦娜一下子想到，可以和着那只船的桨声，划向岸边。这里离河岸不是很近，但下游稍远的地方，有个河汊，有

很多石头、河水击石的响声很大，只要能对付到那里，就可以大胆地划了，只要不出船或桨撞上石头的响声就行了。那条船的桨声节奏分明，隐约可闻，赶上并超过了纳斯焦娜，向前面划去。走了不远，它又停桨守候了一会儿，等纳斯焦娜自己上钩，但没有等到，又往前划去。

纳斯焦娜觉着天要亮了。空中扯起条条铁锈色的云带，天亮前起了风，来自下游，在河面吹起层层涟漪。纳斯焦娜一直小心翼翼，最后总算进了河汊，用篙杆撑船靠了岸。现在不用提防了，可以敲，可以喊，叫那个跟着她的人知道：她没打算过安加拉河，只不过是睡不着，想划船兜兜风、消愁解闷罢了，又靠在村子这一边。她累了，这没完没了的折磨，使她累得不行了。快点结束吧，不管怎么了结，也比这样活着好。很想睡一觉，但她知道，安德烈那里没去成，她是睡不着的。没去成，还坏了事，叫人家知道了她想过安加拉河。

她靠了岸，下了船以后，不知为什么，爬上了岸边的崖顶。没错，天是放亮了。山那边昏暗的天空中已透出闪闪的亮光。夜色减退了，像是在挪动。也许，这阴沉的铁一般的夜幕，天亮前能被扯掉。真是一个阴森的不祥的黑夜。在这种黑夜里，连心地清白的人也会感到压抑、痛苦，何况她，纳斯焦娜，她那伤痕累累、历经磨难的心灵已经破碎，只有揪心的疼痛和无望的怨诉。

纳斯焦娜忽然惊叫一声，一脚踩空，跌倒了，手里抓住一个斜戳着的木头十字架。天哪，我这是到了哪儿啦，到了哪儿啦？！埋在这里的，全是淹死的人呀。她吓得直打寒噤，两腿瘫软，不听使唤了。纳斯焦娜从塌陷的坟坑里爬上来，顺坡溜下来，滑到船边。上帝呀，发发慈悲吧！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怎么回事？她自己可怕的事还少吗？她顾不上别人会不会听见了，操起篙

杆就拼命往上游撑，她要赶快离开这可怕的鬼地方。这块坟地是雇农米什卡用一个夏天弄起来的。战争初期，米什卡从保育院出来，到了阿塔曼诺夫卡村，当时他还是个孩子，现在快长成大小伙子了。

河里漂来的淹死人的尸体，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多。这是为什么？战争结束了，要说该更有奔头了。莫不是生活之舟转弯过急，不是人人都能站稳，软弱的人就掉进安加拉河了？谁知道呢……米什卡刚来时靠打零工糊口，人们就给他个绰号：雇农米什卡。他一点不嫌恶，把尸体从河里捞上来埋掉。每一个坟堆，他可从村苏维埃领到十个卢布。对这份工钱他很满意，整天呆在河边，瞪着一双鹰眼，灵敏地搜寻猎物。在下游的牧场上他已经堆起四座新坟了。埋得都很马虎，反正只要农庄确信已经埋了，村苏维埃就付钱。

纳斯焦娜慌慌张张撑船逃离这个地方，一路上心里直打颤。她记得很清楚，白天她总是老远地绕开这个地方，连往那儿看都不敢看一眼。可这回竟在夜里闯进去，还掉进坟坑里，这是怎么搞的？！她唉声叹气，又怕，又觉得恶心，直打哆嗦。她为自己担心：被玷污了。事后，她洗呀洗，洗她那抓过黏糊糊的坟坑土的两只手，总觉得手上有一股发酵的味。

尽管如此，她也并没忘记查看清楚：追她的那个人划的是阿加菲娅·索莫娃家的船。

二十二

早晨起来，纳斯焦娜并没有出工。纳季卡也没去，倒不是出了什么事，只因明天就要去割草了。出发前一天，谁觉得有必

要，都可以在家里收拾收拾，准备准备。纳斯焦娜终于等到了这割草季节，她怀着在这个季节里能够得到解救的特别的期望，尽管眼下还不很清楚，它到底能帮她什么忙。但这毕竟是割草季节呀……每到这个时候她都觉得心里敞亮，舒坦，凡是割草的活儿，干什么都喜欢。她特别喜欢日出前踏着朝露出去干活儿，先站在地头上，伸出长把大镰，试割一刀，刀过草伏，接着就一下接一下地挥舞起来。被割倒的青草散出的蒸腾的露汁落满全身。她也喜欢午后割草时听到那种匀长的，略带哀怨的碎裂声。这时燥热未消，人们歇过后硬撑着懒洋洋地散开，可一散开就兴奋起来，着了迷似地挥动镰刀，他们似乎不是在干活儿，而是在娱乐，消遣，涌起一股叫人快乐得心里直痒痒的激情，只顾顽皮地，忘乎所以地挥镰往前走，好像一步一步地逼近，深入那早已忘却的、隐秘起来的童幻世界。她也喜欢在酷晒的阳光下搂草，听各种草的又干又脆的簌簌声，喜欢趁黄昏未到，天时尚早，草还在打蔫时，干净利索地把草垛起来，她喜欢大家拥挤在草垛周围，七手八脚，忙忙碌碌的场景，一句话，割草季节中的一切，从开始到结束，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她都喜欢。

然而那是过去的纳斯焦娜，现在可是另一个纳斯焦娜了。如今这个纳斯焦娜却比从前那个更急不可耐地怀着冲动不已的渴望，期待着割草季节的到来，并且盲目地相信，似乎割草季节一到，她的整个命运就能定下来。她觉得在割草的日子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她该在哪儿，和谁生活在一起，该怨恨谁，宠爱谁。她多么想再能在日出前独自出去，站到蒿草齐腰的地埂上，挥起大草镰，不停地、固执地、像故意跟草过不去似地挥舞下去，铺出一条草路，直到一垄的尽头。那时再才回头看看，轻松地舒一口气。人们常说劳累伤人，这话不无道理，但是人死之前正是劳动养活了他，保护了他。重要的是保护了他。

可这也是昨天的事了，而今天，当昨夜没让她过去河和安德烈会面之后，她真的坐卧不宁了。疲倦已化成本是期望的，转而对她报复的绝望。她已没有任何渴求，不抱任何期望，只有空虚和厌倦重重地压在心头。昨天还认为有可能，很有希望的事，今天却全完了。她一宿没有合眼，头疼，其实已经不是疼痛，而是没完没了的折磨。腹内胎儿所在的部位有一种挤压感，隐隐作痛，不知是本该如此呢，还是她已经伤了孩子。“瞧你，想得倒好！”她凄楚地责备自己，更加心灰意冷，“活该。”

她什么事也不做，什么活儿也不干，只是垂头丧气地在屋里转来转去，一会儿走出屋外，又转回来。她好像是在寻找什么，等待着什么，可是又什么也没找到，什么也没等来。她不时地抓住小莉德卡，搂住她，吻她，弄得莉德卡很厌烦，开始躲避她。

“你疯了还是怎么的？”纳季卡大声呵斥她，“夜里到哪儿逛去了？”

纳斯焦娜听了既没吃惊，也没害怕，本来也是出去逛了，还能不让人家问？

“本想偷偷地到丈夫那儿去，可又改变了主意，不想去了。”她回答说。说真话时，人们倒不轻易相信了，可她自己心里松快。骗人都骗腻了。一切都令她腻烦。

“真疯了。”纳季卡断定了，“你连人话都听不懂了，还跟你说什么。你就快点把孩子生下来吧，别作践自己了，你要生的是孩子，不是小狗。”

得谢谢纳季卡，至少纳季卡不赶她走。她再没有别人可依靠了。这能怪别人吗？是她自己抛弃了大家，就连一直对她真诚坦率的纳季卡，也被她当成是会背叛的仇敌，因而对纳季卡也只说谎话。纳季卡傻头傻脑的，把她的假话都当真。等有朝一日，纳季卡会发现受了骗，不会轻饶她的。她觉得眼前一片迷

茫，无路可走。

午饭前，米赫伊奇从小巷子走过来，把纳斯焦娜叫到院子里，他很急，见面就说，脸上没一丁点儿的温和或怜惜的劲儿，眼睛盯着纳斯焦娜，斩钉截铁地说：

“听着，丫头，要是他在这儿，趁还没被抓住，叫他赶快走，要不就想别的办法。村里好像有人打算查了，有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给他们出主意，涅斯托尔今儿个去了卡尔达村。这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纳斯焦娜听了一声没吭。米赫伊奇转身要走时，又用他那干巴巴的脆裂的嗓音加了一句：

“丫头，我本想骂你一顿，你不让我和他见上一面，等着吧，会有人骂你的。这罪名会落到你的头上，你是推不掉的。”最后，老人还是悲伤地承认道：“他也是个混蛋，都不敢跟父亲说说。去你们的吧……”

说完，米赫伊奇一甩手，吃力地抬着瘸腿，怪模怪样地走出了木院墙。

纳斯焦娜木然地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她竭力在想办法，拿主意，现在这很重要，也必须，可是转了半天脑筋，只闪过一些模糊的念头，什么主意也没想出来。一切都烧光了，烧成灰了，而灰是不能再点着的。再说啦，现在还有什么好想的？太晚啦。

纳斯焦娜对什么都不相信了，也不相信任何人，什么米赫伊奇来过，昨晚在安加拉河上有人跟着她，她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都是她那有病的脑子空想出来的，想出来，又忘了。从前在烦闷的时候，她也喜欢想象自己在经历着各式各样有趣的事情，有时自己也闹不清是真是假。现在可能也是这样。头痛得要裂开似的，她真想把头皮撕下一层。她尽量少想事，多走动，可她没啥可想，也没处走去。够了。

晚上纳季卡带回来新消息：警察布尔达克来了。纳斯焦娜暗自怀疑，可能来了，也许并没来。没人知道准确的消息。不能有人说就相信。就算他真来了，又能怎么的？他要来阿塔曼诺夫卡理由还少吗？比如，抓点鱼，催催没有交税的人等等。阿塔曼诺夫卡是他的管片，他哪天都可以来溜达一趟，来就来呗，有什么稀奇？

尽管纳季卡的孩子们还在耍闹，纳斯焦娜早早就上了床，很快地睡着了，但睡得很轻。正好在预想的那个时辰，好像有人一把把她推醒了。一觉之后，她觉得有了精神，脑子也冷静了。墙上挂钟的钟锤耷拉着，没有响声，她不知道夜过去多少了。但不知为什么她相信起来得不晚，别人还来不及抢在她前面。她大大方方地穿好了衣服，走出来，关好门。你不躲不藏，反倒顺利，而今夜是否顺利，可太重要啦。

直到现在，她才发现天不作美，有点放晴了。透过淡薄的云层星光闪烁，夜很静，黑魑魑的，但在微弱，却很均匀的光线中，周围一切的轮廓还相当清晰。而在安加拉河这条又长又宽的走廊里就显得更加分明了。纳斯焦娜把船从岸上拖下水，刚一离岸就操桨急划起来。得按时赶到，得给丈夫报个信，要和他告别一下，是永远的告别，还是一时的分别——不知道。

羞愧……为什么在安德烈面前，在别人、在自己面前这样无以自容地羞愧？是什么原因使她这样羞愧？

幸运时活着，是多么轻松自如，不幸时活着，又是多么痛苦！人为什么不能分别储备一些幸运和不幸，以便日后利用一方来减轻另一方所带来的重负呢？为什么两者之间总是有一条鸿沟呢？人啊，当初决定你命运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你做什么去了？为什么你接受了这样的命运？为什么当你最需要翅膀，正当要求你不能爬行，而要疾飞以逃避灾难的时候，你竟毫不犹豫

让人砍掉了你的翅膀？

纳斯焦娜划着船，怀着屈从、平静的心情，默认了她所遭受的一切，看来，本该这样，是她自作自受……一个晕头晕脑的人，活了一辈子之后，即使再给他一次生命，他也还是学不会生活。空中多么平静、安宁！可昨夜却非常可怕，在黑暗中眼睛什么也分辨不清，叫人提心吊胆，觉得随时都会出事似的。人说，星星从高处往下看，可以看见很远很远的未来，真是这样吗？它们能看到今夜之后的她，纳斯焦娜，在哪儿吗？它们能预见到什么呢？今夜星光这样微弱，怎么能看得很远。

她一边划桨，一边被一些不曾有过的，也是难以实现的无聊念头所困扰，同时她又惊奇地感到，心里却在竭力应和这些念头。

心情不知为啥又喜又悲，像在听一首悠长的古老歌曲，听着，听着，就感到茫然：这是谁的嗓音，是现在还活着的人，还是一百年前，二百年前古人在歌唱。一曲合唱刚停下，另一合唱又起……跟着第三拨又接着吟唱……

不，活着是多么快乐；活着又多么可怕；活着多么可耻。

忽然，另一种声音，绝不是唱歌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她吃惊地转身，看见岸上有人。

“她在那儿，她在那儿！”涅斯托尔大声喊着。谁说话，说什么，在河面上听得清清楚楚。涅斯托尔又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脏话，纳斯焦娜听出来了，这是冲她：“这个钻裤裆的，想赶在我们前面溜掉，跑不了，小亲家，你跑不了，我们追得上。”

“放第二条船！”这是英诺肯季·伊万诺维奇的话音，“快，快点，磨蹭什么！”

“追得上！”

纳斯焦娜吓得拼命地划船想跑掉，但立刻又把桨放下了。

往哪儿跑？为什么？她已经划得够远啦，再划也没有用。

她累啦。有谁知道她有多么累，多么想歇一歇呀！不用害怕，不用羞愧，不用心惊胆颤地盼着明天，可以永远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了。她将忘掉自己，忘掉别人，把平生所遭受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瞧，期盼已久、历经磨难才得到的幸福，终于就在眼前了。为什么她以前没有相信这是幸福呢？她一直在寻求什么，想得到什么？一切都是白费力气，白费力气。

羞愧啊！……当别人处在你的境况下活得比你好的时候，你活得是多么羞愧，这一点人人都能理解吗？今后还怎么有脸见人……可是，连这羞愧也要消失了，也要被忘掉了，让她自由了……

她在船上站起来，挺直了身子，往安德烈躲藏的地方望了一眼，那里完全被笼罩在黑暗之中……

几只船越来越近。眼看就要晚了，就要来不及了。

纳斯焦娜走到船尾，看着河水。在很深很深的水下，宛如一个惊心动魄的美丽的童话世界，条条荧光在闪烁——那是映射在水中的天空在荡漾，在颤栗。多少人已经决然地投入其中，又有多少人正在下定决心！

一条宽厚的黑影横着漂过了安加拉河：夜色在移动，耳边响起波浪的拍溅声，这声音清晰，柔和，有一股促动的力量。在这拍浪声中有上十、上百到上千的小铃铛在齐鸣，就像在召唤什么人去欢庆佳节。纳斯焦娜觉得她要入梦长眠了。她跪在船帮上，压得船帮越来越低。她全神贯注，以全副的，用于注视未来长久岁月的视力，望着水下深处，她看见，在安加拉河底，一根火柴突然迸发出火焰。

“纳斯焦娜，你不能这样，纳斯—焦—娜！”她听到了马克西姆·沃洛格任那绝望的喊声。这也是她听到的最后一个人的声

音,此后便小心谨慎地翻过船帮,扑入水中。

受到拍击的安加拉河,发出一阵溅水的响声,小船摇晃,在夜里微弱的光线中,荡起一圈圈的波纹。但安加拉河水猛力一冲,就把它们挤碎、吞没了。流水如初,没留下任何痕迹。

到了第四天,纳斯焦娜才被冲到卡尔达村附近的岸边。那里的人通知了阿塔曼诺夫卡村。可这时米赫伊奇躺在床上已经病体垂危。只好派雇农米什卡去收纳斯焦娜的尸体。他划小船把纳斯焦娜运了回来。一运回来,就自己做主,要把纳斯焦娜埋到溺死者坟地去。女人们不答应。她们把纳斯焦娜埋进了本村人的墓地,只是稍微靠边些,在歪斜的栅栏旁边。

下葬之后,女人们聚在纳季卡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悼念餐宴,哭了一阵:都很可怜纳斯焦娜。

告别马焦拉

王乃倬

沈 治 译

石国雄

ВАЛЕНТИН РАСПУТИН
ПРОЩАНИЕ С МАТЁРОЙ

В. РАСПУТИ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90.

春去春来无穷尽，春天又来了。但是，对于有着同一个名字的岛和村——马焦拉岛和马焦拉村——来说，这却是最后一个春天了。解冻的冰又一次在岸边乱纷纷堆起巨大的冰块，随即轰轰地响着，急速漂流而去。安加拉河挣脱了冰甲，展开了浩荡闪光的洪流。马焦拉岛靠上游的岬角边，河水又活跃喧闹起来，它冲上滩头，又向两旁横溢开去。大地和树木又喷吐出绿芽，又已洒下了几场春雨，飞来了雨燕和家燕，每到傍晚，沼泽地里苏醒了青蛙就咯咯地叫起来，表达着对生活的爱恋。这一切反复过许多次了，马焦拉也许多次经受大自然的变化了，它一天也不落后于时令，也从不超越时令。是的，现在菜园里又栽种了蔬菜，但已不是所有的菜园了：有三户人家秋天就已搬走，分别进了不同的城市；另有三家则离开村子更早，在证明传闻属实之后的头几年就走了。和往年一样，现在也播下了种子，但也不是所有的耕地上都播种了：河那边的耕地上没播，仅仅在这边，在岛上播了，离得近一点。今年大家在菜园里种土豆、胡萝卜，也不是同时动手的，而是谁碰上什么时候有空儿就什么时候种。许多人现在有两个家，一家人也分成了两半，隔山隔水的相距整整十五公里。马焦拉还是那个马焦拉，但也不同以往了：房屋都仍在原地，只有一座小木房和一处澡堂拆掉当柴烧了；一切暂时还都活着，还都动着呢，依然有鸡啼、牛叫、犬吠。然而村子却凋零了，显然像一棵被贴根砍断的树一般凋零了，断了根了，村子脱离了习惯的轨道。一切都在原地，可一切又已面目全非：荨麻更稠密、更放肆地蔓延开来，那些空屋上的窗户死气沉沉的，而且

院门大敞着——遵照风俗，人们一次次地关好，但有什么魔鬼却又一次次地把它们打开，让风更强劲地穿过院落，刮得东西吱吱扭扭，乒乒乓乓。处处的板墙和篱笆都歪了，畜栏、谷仓、凉棚变黑了，东倒西歪的，木杆木板无谓地横七竖八——主人那勤于料理，好让东西经久耐用的双手，再也不去碰它们了。许多屋子都不再粉刷，不再收拾，里边东西少了一半。有些已经运到新居去了，因而露出了幽暗空空的屋角；有些还留着用呢，因为还有人得到这里来，也还有人得在这里磨蹭。现在经常留在马焦拉村的只有些老头和老太太，他们看守菜园和家宅，照料家畜，看管孩子，使一切都保持着生气，他们保护着村庄，使它不致过分地荒凉。傍晚一到，他们就聚在一起，轻声叙谈——说来说去一套话：总离不开将要发生的事。他们叙谈着，频频地、沉痛地叹息着，不时提心吊胆地放眼眺望安加拉河彼岸，那边建设起一个大型的新镇。各种各样的传闻就是从那儿源源而来的。

三百多年前决意来岛定居的第一个男人，是个有眼力、有心计的人，他看得很准：他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土地了。这座岛连绵五俄里多，但不是狭长如带，却好像一只熨斗。上面既可以开荒种地，也可以植树造林，还有生着青蛙的沼泽。在下游方向，在一条水浅弯曲的小河汊对面，与马焦拉岛隔水为邻的是另一座岛，既称波德莫加岛，又叫波德诺加岛。波德莫加^①——含义是明白的：自己的地上缺什么，就上这儿来拿；但为什么叫波德诺加呢——任何人都解释不了，现在就更解释不清了。不知是谁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这个名字，就传开了。众所周知，话说得越希奇，就越是听来顺耳。在这段历史上还有一个不知从哪儿取

^① 在俄语里意为“帮助，援助”。

来的名字——鲍戈杜尔。大家给一个从异乡跑到这儿来的老头起了这么个绰号，用乌克兰腔来讲就是鲍霍杜尔。这里倒可以猜测一下这绰号的来历。那个冒充波兰人的老头喜欢俄罗斯的骂娘话，大概有教养的外来人中有人听到他骂娘，一气之下便说了声：鲍戈胡尔^①；村里人要么没弄清楚，要么故意嚼舌，就歪曲成鲍戈杜尔了。到底是不是这样，也说不准。不过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这样的联想。

马焦拉一生饱经沧桑。古时候，大胡子的哥萨克们沿安加拉河乘船经过村边溯流而上，去建造伊尔库茨克城堡；往来经商的人赶到村里住宿；沿河运送囚犯的人看见眼前就有适于居住的河岸，便也划船靠岸，燃起篝火，用现捕来的鱼熬汤；盘踞该岛的高尔察克匪帮和乘船从两岸夹攻的游击队在这里轰轰隆隆地整整鏖战了两天。高尔察克匪帮遗留在马焦拉村的，是他们在村子靠上游一端光秃秃的岬角旁搭起的一处营棚。近几年来每到美好温暖的夏季，鲍戈杜尔就像一只蟑螂似的住在里边。村子也曾屡经洪水泛滥，总是半个岛都淹没在水中；而在波德莫加岛上——因岛面较为平缓——则遍岛翻滚可怕的漩涡。马焦拉村还遭受过火灾、饥荒、抢劫。

村子里有一座小教堂。它照例建在一处清洁的高地上，从两面水边远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有集体农庄的时候，这小教堂用作仓库。不错，因为没有神甫，教堂里早在那以前就不做礼拜了。但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依然留着，老太太们每天早晨都向它顶礼祈祷。后来，十字架也被打掉了。在村子靠上游一端的岸畔有一座磨坊，岸下流过的一条小河流好像是专门为磨坊开出来似的。磨坊的磨粉方法虽说不佳，却不用求人，磨本村

① 在俄语里意为骂神。

的粮食够用的了。近几年来,飞机每星期有两次降落在老牧场上,人们到城里或区里去,已经习惯于腾空飞行了。

马焦拉村就这样马马虎虎地生活着,在左岸的陡崖上守着自己的地盘,迎来送去流水一般的岁月。村民们是在水上跟别地的居民进行交往的,自古以来是在水边觅食为生的。看来,就像奔腾的河水无尽无头一样,村子也将永生永世存在下去:一些人进了坟墓,一些人生了出来;老房子倒了,新房子盖起来。村子就这样熬过各式各样的时代与磨难,度过了三百多个年头。在靠上游的岬角处大概有半俄里的土地,是这三百多年间冲积而成的。可是有一天忽然听到传说,村子的寿命不长了,存在不多久了。安加拉河下游正在建造水电站大坝,大河小溪水位都将被提高,因而溢出两岸,要淹没许多土地。首当其冲的自然马焦拉岛,纵然一个叠一个摞上五个这样的岛,也仍然会没顶。往后也不会标明,哪里曾经住过人。不得不搬家了。简直难以相信事情将真的会这样,真难以相信,曾经用以恫吓愚昧无知人民的那种天涯绝境,现在对马焦拉村来说,竟真的近在眼前了。听到最初的传闻后过了一年,估价委员们乘汽艇来了,开始确定房屋的损坏情况,定出折价费。马焦拉的命运用不着再怀疑了,它在苟延着最后的岁月。右岸某地已为国营农场建起了新镇,那个农场是由所有附近的,乃至并非附近的集体农庄合并而成的。而那些旧村子呢,则决定都放火烧掉,免得再为倒腾那些破烂费事。

然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夏天了:秋天水位就要提高了。

二

三个老太太坐在茶炊旁，有时默不作声，倒茶，用茶碟小口小口地喝茶；有时又像厌倦了似的，慢腾腾地搭讪几句有气无力的话。她们这是坐在达丽娅家，她是老太太中最年长的。老太太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因为确切的年龄在洗礼时留在教堂记事簿上了，记事簿后来不知被运到哪儿去，无影无踪了。讲到年龄，老太太们便这么说：

“我背上背着兄弟瓦西卡的时候，妹子，你才出世，”达丽娅对纳斯塔霞这样说。“我那时候已经记事了，我记得。”

“可是你只比我大三岁呀。”

“怎么，大三岁！我出嫁那会儿，你怎么样——瞧瞧吧！你还光着屁股到处跑呢。我出嫁，你大概记得吧。”

“我记得。”

“这就对了。你怎么能跟我比呢？比起我来你还年轻得很呢。”

第三个老太太西玛，不能参加如此久远的回忆。她是外来户，将近十年以前，一股偶然的风把她刮到了马焦拉村。以前她住在安加拉河畔的波德沃洛奇纳亚村，再早，她是从图拉市附近的什么地方到波德沃洛奇纳亚村去的。她说她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先后两次见过莫斯科。村里照自古以来的习惯，是不太相信无法检验的事的，对此也就抱嘲笑的态度。既然他们中间谁也没见过莫斯科，西玛这个糊里糊涂的老太婆又怎么会见过呢？即使她就住在莫斯科附近，又怎么样？——那大概也不会让所有的人不断去莫斯科的。西玛则默不作声，既不生气，也不坚

持；过后又说起那回事，为此混到一个“莫斯科迷”的外号。这对她正合适：西玛是个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人，有点文化，还有一本歌曲集。心情好的时候，就拖长了声音，哼歌本里那些歌唱痛苦命运的忧郁而缓慢的歌。她的命运，看来真不那么甜蜜，遭受过那么多的磨难：战争期间离开了在那里长大成人的故乡，生下了唯一的女儿，还是个哑巴；现在老了，还得拖着一个外孙，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他抚养大呢。但就是现在，西玛也并未丢掉找个老伴儿的希望，有了老伴儿，她就能得到温暖，也就能伺候老伴儿——洗衣煮饭，端菜递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当初才来到了马焦拉村：听说马克西姆大叔成了孤老头，为了顾全体面，她等到一个适当时机，就离开当时居住的波德沃洛奇纳亚村，上岛来寻找幸福了。但没能如愿以偿：马克西姆大叔执意不肯，不太了解西玛的大婶们又没帮忙——她们任何人也没想要这个大叔，不过本村本庄的，把他放在外人的身边总有点叫人过意不去。多半是西玛的哑巴女儿瓦莉卡把马克西姆大叔吓坏了。那时瓦莉卡已经长得很大了，总是那么特别令人不快地大声哼哼哈哈的，似乎总是在跟人要什么，脾气暴躁。由于西玛求嫁未遂，村里人就讥笑说：“西玛，西玛，求也白搭。”但西玛并不见怪。她没有回波德沃洛奇纳亚，就这样留在马焦拉村了，住在村子下首一间废弃了的小屋子里。她开了菜地，安了织布机，用破布条织那长条地毯，聊以糊口。瓦莉卡呢，在她跟母亲一起度日的时候，就在集体农庄里干活。

现在西玛身旁偎依着四岁多的小外孙柯利卡，他是瓦莉卡难得的小宝贝。这小孩不像母亲，不是哑巴，但说话很少，说得也不清楚；他很腼腆，又胆怯，寸步不离姥姥——不像男孩，倒像女孩。老太太们可怜他，爱抚他，他却更用劲儿地紧贴住西玛，以一种非孩童所能有的、痛苦而温顺的目光，很懂事地望着

她们。

“你是什么人，老这么看着我？”达丽娅惊奇地说，“你看见我后面有什么——我的死神吗？没你我也知道。瞧这哑巴，像根钉子似的死盯住人。”

“他不是哑巴，”西玛嗔怪地说，一边把柯利卡搂得紧紧的。

“不是哑巴，却不说话。”

她们又中断了谈话。由于喝了茶，加上从朝西的窗口射进灿烂的夕阳，她们暖融融、懒洋洋的。达丽娅大娘身高力壮，比坐在旁边的西玛高出一头。她那张严肃、塌腮、没有血色的脸朝着桌子，此刻正对着什么和谐地频频点头。尽管上了年纪，达丽娅大娘目前还腿脚利落，手听使唤，操持着力所能及却又并不算轻的家务。现在儿子和媳妇住在新镇，每星期来一次，有时还来得更少，整个庭院里、菜园里的事务都落在她身上了。院子里有母牛、母牛犊、去年冬天才生的小公牛、猪、鸡、狗。他们虽然也嘱咐过她，要是忙不过来或者病了，就请邻居维拉帮忙，但情况还没到那个地步。达丽娅亲自料理着一切。

六月刚刚来临，阳光普照的晴日接连不断，仅仅间隔着短暂的朦胧之夜。岛上因为四面环水，没有酷暑。黄昏一到，微风拂煦，晒热的大地上散出温暖的蒸气，于是四周是那么美好，那么安谧和宁静。绿树青草是那样茂密而清新，令人赏心悦目；这葱郁的绿茵把岛衬托得似乎更加高耸于水面之上了。安加拉河滚滚流荡，拍击着岸石，铿锵作响，是那样的清脆、欢畅。一切都显得那样的稳固、那样的永恒，因而无论是搬迁，还是水淹，或是离别——都一概难以令人置信。这时节，田野上菜园里一片新苗整整齐齐，天又及时降雨，及时送暖，这样风调雨顺，真是少有的丰年吉兆。夏天正从容不迫、如人所愿地向人间步步深入呢……

“早晨，一起来就会想起……哎，心都要停住不跳了，”纳斯塔霞大婶说，“上帝呀！……叶戈尔总是哭啊，哭。我对他说：‘你别哭了，叶戈尔，别哭了’，可他说：‘我怎么能不哭，纳斯塔霞，我怎么能不哭呢？’我就狠狠心走开，走开。走着，走着，就看见，达丽娅走过来了，维拉走过来了，还有多姆妮达，这就好像心里轻松一点儿了，习惯起来了。我想：也许只是想吓唬吓唬我们，不会真那么干的。”

“那干吗无缘无故地吓唬我们？”达丽娅问。

“希望不再有无动于衷的人。”

全家只剩下纳斯塔霞和叶戈尔两个人了（两个儿子上了战场没回来，第三个儿子连人带拖拉机跌进冰窟窿淹死了，女儿在城里死于癌症）。打那以后，纳斯塔霞变得有点古怪起来，尽说自己老伴儿的坏话，而且尽是些诉苦的、疯疯癫癫的话：一会儿说他似乎叫煤气熏得要死，她也差一点儿，一会儿又说他喊了一宿，因为有人堵住他胸口要闷死他，一会儿又说他哭个不停（“都快两天了，还哭呢，哭得成了个泪人儿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叶戈尔大叔是不会轻易掉泪的。起先叶戈尔数落她，吓唬她，试着开导她，但无济于事，他也就不再理她了。她这个人别的方面都是挺正常挺健全的，就是这一样，她就像颗螺丝钉似的，螺纹磨坏了，松动起来，说转就转——舌头一转，顺口就讲些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事。好心人竭力不去理会纳斯塔霞这种无损于人的疯癫，坏心眼儿的人则喜欢问：

“今天叶戈尔怎么样——活着还是死了？”

“哎哟！”纳斯塔霞高兴地想起来了，“叶戈尔呀，叶戈尔呀……今天差点没死了。老头子胡涂了，抓着胡子就揪，血都淌光了，淌了整整一盆。”

“那这会儿怎么样了——止住了吗？”

“全淌光了，也就止住了。他只剩一口气了。哎，老头真可怜。我跑回去看看他怎么样了。”

叶戈尔此时正从街的另一边一瘸一拐走过，他狠狠地却又无可奈何地瞟着纳斯塔霞：这个疯子，又在讲他的故事了，让她舌头上长疮。

他们即将先于别人最早最快地跟马焦拉告别。当开始安排谁往哪儿搬的时候，叶戈尔大叔出于怨恨或是由于无所适从，便登记去城里，就是正在建水电站的那个城市。那里正在建造两幢大楼，专让他们这些来自水淹地区的孤独、不幸的人去住。交换的条件是：他们的房子被烧掉，一戈比的折价费也不拿，为此拨给他们一套城市住宅。后来叶戈尔大叔——自然也迫于纳斯塔霞的催促和埋怨——变卦了，想不去城市，去农场，那儿既给房住，又付折价费。但结果太迟了，不许换了。

“农场分住宅给工作人员，你算什么工作人员，”村苏维埃主席沃龙措夫劝他。

“我一生都献给了农庄。”

“农庄是另一回事。也不会有农庄了。”

区里已经两次催叶戈尔搬家，拨给他和纳斯塔霞的住房已经准备好，等他们去。但老两口一直拖着，就像临终前尽量要多吸一点故乡的空气似的。纳斯塔霞种了菜，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不过是拖拖时间骗骗自己而已。区里最近来人，一本正经地呵斥、吓唬他们说，房子要给别人占了，他们就会落得一场空了。于是叶戈尔大叔下了决心：既然反正得走，那就走吧。他便斩钉截铁地对纳斯塔霞说：

“三一节前你要准备好。”

到三一节总共只剩两个星期了。

“到那儿你就一点也不用劳神了，”达丽娅对纳斯塔霞说，不

知是在安慰她，还是在嘲笑她，“我每回在城里女儿家作客，总觉得奇怪：在那儿你一步不动，安加拉河水呀，树林子呀，厕所浴室呀，样样都在身边，一年不上街也行，水龙头就像茶炊一样，一拧——水就来了，一边龙头是冷水，另一边龙头是热水。炉子也不用添柴，也是有开关的——一按，火就来了，煮吧，蒸吧。这有多方便哪！女人都要娇惯坏了。那面包也不用烤，用不着烤，可以买。我不习惯，看着希罕，就对着这些开关龙头直叹气——他们就笑我少见多怪。还有更奇怪的呢，浴室和厕所，像在那些没良心的人家里那样，是在一个小屋子里，靠着厨房。这也真不像话。你坐下去，急得要命，可是又哆嗦着，憋着，生怕让吃饭的人听见了。再说澡盆吧……那算什么澡盆呀，简直可笑，只能给吃奶的孩子凑合着洗洗。可他们还弄得水咕嘟咕嘟直响，浑身湿淋淋地爬出来呢。纳斯塔霞，这下你也能像个太太一样躺着了，呆在家里，样样都有，手都不用抬。还有什么……电话可打，它会叫你：丁零零，丁零零，你又对着它说：喂，喂，说一会儿，就又去睡觉了。”

“哎呀，你别伤我心了！”纳斯塔霞听了发呆，把筋肉松弛的双手紧贴在胸前，闭起眼睛，说，“我在那儿一个星期就得愁死。死在外乡人里边！一棵老树谁还去挪它？”

“咱们大伙儿都得挪一挪，妹子，不光你一个人。如今大家都是这条路。还是快点儿吧，上帝呀，把我们收回去吧。”

纳斯塔霞不同意，连连摇头说：

“你跟我一样，达丽娅，不一样。你们大伙儿都能在一个地方，可我孤单单的。你们从马焦拉到了那边，一个个聚在一块儿，高高兴兴的，像在家里一样。我呢？哎，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们大伙儿，有几个人？”达丽娅审慎地回答着，“一个也不会留下。你看看：阿加菲娅被带走了，瓦西莉萨被带走了，有人

在勾引莉扎去区里。卡捷琳娜的儿子到如今还不选个落脚点，不停地东奔西跑。酒不喝完了，又哪儿有时间选地方呢。纳塔莉娅说，她也许到勒拿河边上女儿家里去……”

“塔吉雅娜，多姆妮达，玛妮娅，你，通古斯卡……找的是邻近的好地方。我没有这个福分。”

“这就是马焦拉全村的人！上帝呀！”

“我可不说自己的事。不——说，不说。”西玛忧伤地应声说，又把柯利卡拉到自己身边，“我和柯利卡坐上船，一离岸，就任它随便漂到哪儿去，漂到大海大洋里去……”

西玛没有家产，也没有亲戚，她只有一条路——去养老院。但是已经得知，这条路上也有障碍，这便是她非常爱怜的柯利卡。带着个孩子，养老院不大想收。西玛的哑巴女儿瓦莉卡呢，放荡起来，下落不明了。她年龄一到，尝到了男人的滋味，一个，两个，三个，玩上了瘾，就那么喜欢这种事，自己没羞没臊了，死乞白赖地要玩这种夜间的游戏，很快就玩出了柯利卡。西玛拿了棍子追她，大婶、大娘们狠狠地骂她，瓦莉卡凶狂起来，就跑掉了，至今有一年多杳无音讯。有人教西玛求民警侦讯处代找，但现在安加拉河上这样乱七八糟，动荡不安，加上瓦莉卡是个哑巴，又没有登记领取过公民证，要找她不容易。

“就说找到了，我怎么也不能把柯利卡给她，”西玛说，“我和柯利卡就是爬，也要在一根绳子上爬。”

“你干吗不教他好好儿说话？”达丽娅责备说，“他长大了，不会说你好的。”

“我是教啊。他能说。我们的柯利卡话不多就是了。”

“害了孩子。他什么事都懂。”

“是害了。”

达丽娅问也没问纳斯塔霞就拿起她的茶杯，从壶里咕嘟咕

嘟倒水进去，又放到茶炊下边——这是一只商人用的大茶炊，是老货，纯铜闪着红光，底部是别出心裁的筛状，里边炭火闪亮，茶炊腿儿短而粗，弯弯的，挺好看。龙头里注下缓慢而均匀、不喷不溅的水流——看来开水还很充足——激动不安的茶炊发出咝咝的喘息声。然后达丽娅给西玛倒茶，又给自己添了点儿——她们歇口气，安排停当，擦去沁出的汗珠，就又谈起新的话题，低下头来，呼哧呼哧地吹着茶，小心翼翼地嘬着嘴，小口小口喝着。

“我这可是第四杯了，”纳斯塔霞盘算了一下说。

“喝吧，妹子，趁着还有真正的茶喝。那边是不用茶炊的，你只能在炉子上用锅煮。”

“为什么用锅呢？我用茶壶嘛。”

“不用茶炊反正就不像茶了。只能说有水喝就是了，一点滋味儿也没有。简直是饮牲口的。”

达丽娅想起来了，国营农场的住房盖得也跟城里一样，她的生活条件也注定要跟纳斯塔霞一样了，她便苦笑了一下，她何苦吓唬纳斯塔霞呢——还不知道她自己今后是否能用茶炊烧茶呢。不，她决不放弃用茶炊，即使放在床上也要用，别的事吗——那再另说。这时，她忘记刚才大伙儿讲的是什么是了，没头没脑地突然愤愤地说：

“要轮到我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哪儿也不去。要淹，让他们来淹吧。”

“非淹不可，”西玛应声说道。

“让他们淹吧，一样是死——还有什么好怕的？！”

“哎哟，我可不想当个淹死鬼，”纳斯塔霞大惊失色地声明说，“得了吧，那可是造孽，最好还是入土为安。死在我们前头的都入土了，我们也得到那儿去。”

“那些人都要浮起来的。”

“是要浮起来。这可是真话，”纳斯塔霞冷淡而又谨慎地表示同意。

达丽娅为了岔开她引起的这个话题，便提醒说：

“鲍戈杜尔今天不知怎么没来。”

“也许正在路上走着呢。鲍戈杜尔有时会错过时间的。”

“跟他呆在一块儿是造孽。少了他可又闷得慌。”

“嘿，可不是，鲍戈杜尔！好好的一个人儿，就是老骂娘。”

“画个十字吧，纳斯塔霞。”

“原谅我吧，上帝！”纳斯塔霞恭顺地向屋角的圣像画了个十字，呜咽着难堪地叹了口气。她从茶碟里呷了口茶，而后不仅再次画个十字，而且还低声祈祷请罪。

茶炊里的炭灰散发出一股甜丝丝的煤气。一道阳光懒洋洋地斜悬在桌子上方，阳光里浮动着的密密的尘埃。一只公鸡在院子里振翅长啼。它神气活现地迈着那像缠了裹腿似的强健的双脚，走到窗下，两只红眼睛放肆地向窗内窥视。从另一面窗户望出去，看得见安加拉河左边的支流和它那在阳光下晒热的、金光闪耀的流水，看得见草地上点缀着白桦树和叶色火红的稠李树各一株的彼岸。晒热的木踏板发出的枯朽气味扑进敞开的街门。一只母鸡跳上门槛，伸长了颈毛掉得半光的难看的脖子，望着老太太们寻思：活人还是死人？柯利卡朝母鸡一跺脚，母鸡跌下门槛，吓呆了，慌张地咕哒咕哒叫起来。它没跑远，就留在台阶上。突然，它乱窜起来，躲进穿堂间，不停地跳着撞到墙上，撞掉了木桶上的勺子，最后走投无路，飞进了屋子，蹲下来，情愿挨上一刀。一个蓬头赤脚的老头跟在母鸡后面走进来，用拐杖将母鸡一挑，扔进了穿堂间。这以后他才挺起身，抬起周围长满毛的小眼睛，看着老太太们，大声叫道：

“婊——子！”

“瞧他来啦，拄着拐杖的圣灵，”达丽娅平静如常地说，随即站起来取茶杯。“你倒没有不好意思来。我们正说着呢，鲍戈杜尔怎么没来。坐吧，趁茶炊还没太凉。”

“婊——子！”老头又大喊了一声，像乌鸦叫一般，“茶——炊！有人盗尸！还茶——炊呢！”

“盗什么？你胡说些什么？！”达丽娅警觉起来，她虽然倒了茶，却没把茶杯从龙头下端起来。现在这种时候，有的事无法相信而又必须相信；要是有人说，似乎岛被搬掉了，像木片一样冲走了——你就得跑出去看看，是否真的冲走了。不久前还觉得是万古长存、坚如磐石的一切，竟如此轻易地就往地狱里飞跑起来了——最好眼不见为净。

“在砍十字架，在锯坟桩！”鲍戈杜尔喊着，一边用拐杖戳着地板。

“什么地方——在坟地上，是吗？讲清楚点儿。”

“是在那儿。”

“是谁呀？你别折磨人了，”达丽娅站起身，离开桌子，“谁在砍？”

“外来人，婊——子！”

“哎哟，这是些个什么人哪！”纳斯塔霞叹了口气，说。

达丽娅急忙系紧喝茶时松开的头巾，一声令下：

“走，妹子们。他要不是疯了，讲的就是真的。”

三

坟地在村外去磨坊的路旁，干燥的沙土高地上，白桦、青松之间。从那儿向四周举目远眺，可以看到安加拉河及它的两岸。

达丽娅走在头里。她身子有力地向前倾着，并且伸出双手，像是要抢东西似的；她严峻地双唇紧闭，显出了那张没牙的瘪嘴。纳斯塔霞在她后面吃力地赶着，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张口吸气，频频点头。西玛拉着外孙的手，迈着碎步匆匆地走在后头。鲍戈杜尔跑去惊动全村，所以他落在后面，光是几个老太太冲进了坟地。

那里的人把事情已经快干完了，正把锯下的坟桩、栏杆、十字架拖到一起堆起来，准备一把火烧了。一个体壮如熊的汉子身穿绿色帆布上衣和裤子，正奔走于各个坟墓之间，抱着那些已成朽木的墓物。这时，达丽娅使出浑身力气冲上前去，用拣起来的棍子从侧面朝那人手上一击。这一击并不重，但那汉子一慌之下，把手里的东西都掉到地上了。他慌忙问道：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大妈？！”

“滚，从这儿滚开，恶鬼！”达丽娅惊恐愤怒得气喘吁吁，她喊起来，又挥了一棍，那汉子跳开了。

“噢，噢，大妈。你这是……你别动手。我替你把它们捆起来。你……你们……”他用那赤褐色的大眼睛扫视了一下老太太们，“你们从哪儿冒出来的？从坟墓里吗？”

“滚——听见没有！”达丽娅向那汉子逼过去，那汉子后退了，达丽娅那副可怕的、不顾一切的样子使他大为震惊。“你马上离开这儿，你这可恶的东西！掘人家祖坟……”达丽娅号叫起来，“你在这儿埋葬过他们吗？你爹娘躺在这儿吗？孩子躺在这儿吗？你这个坏蛋没爹没娘，你不是人。什么人才干得出这种事？！”她看了一眼乱扔在一起的十字架和坟桩，更愤恨地号叫起来，“啊——啊——啊！上帝呀！你打雷把他劈死在这儿吧，不能可怜他，不能可怜他！不能！”她又冲向那汉子。“你不能就这么离开这儿。你得负责，你要对全世界负责。”

“你放开，大妈！”那人吼叫起来，“你才要负责呢。命令我干，我才干的。我要你们的死人有什么用。”

“谁下的命令？谁下的命令？”西玛斜着身子朝他跳过去，却没放开柯利卡的小手。这男孩哽咽着，往后拽她，想离这个怒气冲冲的大个子叔叔远一点儿。于是西玛依了他，后退着，但继续叫喊着，“在你们眼里天底下一块神圣的地方也没有了，恶鬼！”

听到吵闹声，从灌木丛中走出了第二个男人。这人个子小些，年轻些，穿得整齐些，但也穿着绿色帆布工作服，也是个死不回头的家伙。他手里拿着斧子走出来，停了步，眯起了眼睛。

“你瞧，”熊汉子对他的到来感到高兴，“他们在跟我找茬儿，知道吗，还挥棍子呢。”

“怎么回事，水淹地区的公民们？”第二个男人煞有介事地问。“我们是防疫队，在清理地面。这是执行卫生防疫站的命令。”

纳斯塔霞觉得有个莫名其妙的字眼儿是侮辱性的。

“哪儿有什么味腥黄鱼站？挖苦老太婆！”她马上就提高了嗓门儿，“你自己就是恶鬼！你们两个都是贪心不足的恶鬼！你们不得好报。你别用斧头来吓唬我，别吓唬人，把斧头扔了。”

“嘿，真想不到！”那人把斧子砍在身边的一棵松树上，说道。

“别眯起眼来。瞧，眯着两只贼眼。你直眼看看我们。你们干出了什么事，恶鬼？”

“干出了什么事？！干出了什么事？！”达丽娅附和着哭诉起来。她竭力想要理解毁坟的事，却反而越来越糊涂。她痛苦不堪地望着那些孤零零、光秃秃的坟墓，它们现在变成一样忍气吞声的小土堆了。墓地这一片面目全非的景象使她更加恼火。达丽娅气愤若狂，又拿着棍子朝那站在近旁的熊汉子冲过去，但他

抓住了棍子，夺了过去。达丽娅跪倒在地，她无力马上站起来，但她听到西玛和男孩发狂地叫喊着，那两个男人也喊着什么进行回答。继而有许多人跟着喊起来，于是喊声一片，四下传开。不知是谁把达丽娅扶起来，达丽娅便看见人们从村里跑来了。卡捷琳娜、塔吉雅娜、莉扎、小孩们、维拉、叶戈尔大叔、通古斯卡、鲍戈杜尔，还有别的人。人声鼎沸。那两个男人被围起来了，他们无法回嘴。鲍戈杜尔拿起砍在松树上的那把斧子，他一只手用一根尖而多疤节的棍子顶住熊汉子的胸，另一只手往后一甩，像正待砍人似的，摇晃着斧子。叶戈尔大叔默然而无神地一会儿望望那些十字架和坟桩上拆下来的星，一会儿望望干出了这一切的那两个男人。维拉·诺萨列娃是个健壮无畏的女人。她在一根坟桩上看见了母亲的相片，便怒气冲冲地向那两个男人扑过去，使他们真的大吃一惊，急忙一跳避开。吵闹声更厉害起来了。

“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凭这个事就该在这儿把他们干掉。这个地方最合适。”

“让他们知道点厉害，恶鬼！”

“何必弄脏了这个地方？把他们扔进安加拉河。”

“手别烂掉！哪儿来的这号人！”

“就像拔萝卜一样……这可真不得了！”

“把他们从地上除掉。这地也会说谢谢的。”

“婊——子们！”

第二个，年轻些的男人像公鸡似的昂着头，在一边转来转去，竭力喊着想压过人们的声音：

“我们算什么？我们算什么？你们应该知道，有人给我们指示，把我们送到这里的，不是我们自己要这样。”

“扯谎！”人们打断他。“你们是偷偷来的。”

“让我说完嘛，”那人坚持道，“不是偷偷来的，跟我们一起来的有个代表，是他把我们带来的。你们的沃龙措夫也在这儿呢。”

“不可能的事！”

“把我们带到村里去，到那儿就弄清楚了。他们在那儿。”

“对，到村里去。”

“你们这是白费心思：在哪儿惹下的事，就得在哪儿负责。”

“到哪儿去也逃不出我们的手心儿，走。”

于是这两个男人被赶进村里去。他们轻松、愉快地急步向前走着，老太太们赶不上他们，就要他们步子跨小些。鲍戈杜尔像是绊了腿似的，连蹦带跳地走着。他仍不放过那个大个子，继续用棍子戳着他的背。那人转过身，大喊着——鲍戈杜尔则龇牙咧嘴地报以得意的冷笑，还亮亮手中的斧子。这乱哄哄、怒冲冲、气昂昂的一行人由孩子们领先，也是由孩子们殿后；中间是一群散乱、愤懑的老头老太太，把那两个男人团团围住。老人们弯腰驼背，迈着碎步，激昂地齐声叫喊着，闹得路上尘土飞扬。这一群人进入村口时，遇到了急匆匆迎面而来的两个人：一个是村苏维埃主席沃龙措夫，现在是新镇的镇苏维埃主席，另一个人不认识，一副干部模样，有一张茨冈人的脸，头戴一顶细毡帽。

“怎么回事？你们发生什么事了？”沃龙措夫走过来，老远就问。

老太太们顿时吵叫起来，七嘴八舌，挥舞着手臂，指着那两个男人——他们俩此刻则胆大起来，挣脱了包围圈，朝那个有茨冈脸型的人挤了过去。

“我们，就是说，正在做该做的事，可他们就扑上来了，”年轻的男人开始向他解释。

“像一群狗，”大个子附和着，一边转动着眼睛，在人群中搜

寻鲍戈杜尔。“我给你点……你这个稻草人……”

他没说完，沃龙措夫就打断了他以及听到“狗”字便忿然喧闹起来的老太太们。

“静一静——！”他拖长了声音命令着，“是要听讲话还是要瞎喊？是要了解情况还是要干什么？……”沃龙措夫朝那两个男人点了点头说，“他们是来打扫坟地的，规定不论哪儿都要这么做。你们明白吗？不论哪儿都要搞。有规定。这位是茹克同志，他是从水淹地区指挥部来的。这事归他管，让他给你们解释解释。茹克同志是政府派来的。”

“既然他是个大人物，就让他回答大伙儿。我们觉得他们在撒谎，可是他，瞧他，还是个大人物呢。是谁吩咐把我们的坟地当成平地？那里躺着的是人，不是畜生。他们怎么敢糟蹋坟墓？让他回答我们。死人还要亲自问呢。”

“这种勾当不能白白地就放过去。”

“圣母啊！我们活到什么田地了！还是投河死了的好，免得受辱！”

“是要听讲话，还是要干什么？……”沃龙措夫口气更加凌厉地重复说。

茹克泰然地，甚至像是习惯地等着人们平静下来。他那样子显得劳累不堪、精疲力尽，黑黑的茨冈型的脸无精打采的。看来，这个差事不那么简单，还可以想见，对当地居民做这种解释工作他不是第一次了。但他还是从容不迫充满信心地，甚至宽大为怀地开始说：

“同志们！你们误会了。有一项专门的决议，”茹克知道“决定、决议、指示”这些字眼儿的力量，哪怕说得很委婉，“关于水库库底卫生清理有一项专门的决议，也包括坟地……放水前应该在水淹地区作整理，清理好地面……”

叶戈尔大叔忍不住说：

“你别东拉西扯了。你说，到底凭什么把十字架砍了？”

“我就解答，”茹克猛地一探身，气得说话急促起来，“你们知道，这个地方要变成大海，要开大轮船，要有人来……国内国外的旅游者要到这儿来。可这儿却还漂着你们的十字架。十字架要被水冲倒，要漂起来，它们是不会规规矩矩地在水下呆在坟墓上的。也得想想这个。”

“你们想到过我们吗？”维拉·诺萨列娃喊起来。“我们是活人，我们眼下还住在这里。你们先急着去想旅游者，在你的这些猪猡来过以后，我刚才在地上捡到了妈妈的照片，这怎么说？现在我到哪儿去找她的墓，谁指给我看？开轮船……到那个时候开你的轮船，可我现在怎么在这里呆下去？去你的旅游者吧……”维拉说得喘不上气来了。“现在我还在这里住，我还站在这块地上，你们就别在这地上耍无赖。可以到最后再搞这种清理嘛，免得叫我们看见……”

“什么时候算最后？我们有七十个点要拆迁，到处都有坟地。不了解情况就别乱说，”茹克的口气显然硬起来了。“有八处坟地正在彻底搬迁。这就是最后。再也不能拖延了。”

“你别骗人了。”村里人都知道，叶戈尔大叔这个人，很难叫他动肝火，但他要是发起火来，那就当心吧，什么也阻止不了。现在正是大叔火气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吧，”他打发他们走开。“坟地不许你们再去碰，要不然我就拿枪来。我不管你是不是大人物。大人物就应该知道尊重人，而不是光知道戴细毡帽。瞧，你们来了，干的好事！这样的事要是在以前哪……”

“他们怎么啦？！”茹克面色苍白，转脸求救于沃龙措夫了，“他们好像不明白……不想明白。他们怎么啦？是不知道我们

在搞什么吗？”

“婊——子！”鲍戈杜尔探出身子说。

沃龙措夫挺起胸膛叫喊起来：

“你们在这儿吵什么？吵什么？！这可不是你们的市场！”

“那你，沃龙措夫，别对我们横声恶气的，”叶戈尔大叔挤近一点，打断了他的话说。“你自己到这儿没多久。你自己是旅游者……只是在这里变成海以前才荡到这儿来。对你来说，不管在哪儿生活——在我们这儿还是在别处——都一个样。可我生在马焦拉，我爸爸也生在马焦拉，爷爷也是。我是这儿的主人。我还在这儿，你就别对我撒野，”叶戈尔大叔伸出一根关节粗大的黑手指，指着沃龙措夫的鼻子威胁着说，“你别侮辱我。我一辈子也不许你来侮辱。”

“卡尔波夫，你别扰乱人心。要求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用不着问你。”

“去你的吧！……”叶戈尔大叔逼着沃龙措夫，让他走开。

“这是另一回事，”沃龙措夫同意说。“咱们记住好了。”

“你记住吧。我才不怕呢。”

“真碰上了卫道者。”

“你们这种人才多呢！……”

“滚吧，趁着还没有作孽。”

老太太们又暴怒起来，喊叫起来。她们把沃龙措夫、茹克和那两个男人围得更紧了。维拉把母亲的相片一直举到茹克的鼻子底下，茹克避开了，并且厌恶地皱了皱眉。达丽娅和纳斯塔霞从另一边向他扑上来。他的帽子一歪，露出了黑色卷发，这样就更像茨冈人了。看来，他马上就要克制不住，就要像茨冈人那样大声喊叫着跳起来，开始向左向右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冲出包围圈。卡捷琳娜大婶冲上去训斥沃龙措夫，反反复复地说着：“没

有这样的权利，没有这样的权利！”当沃龙措夫试图避开时，通古斯卡却挡在他面前。她一直在一言不发地吸着烟斗，一言不发地示意沃龙措夫，让他听卡捷琳娜讲话。叶戈尔大叔瓮声瓮气地用男低音讲着话，这是这片音响中的主调。在这片越来越激烈的吵闹声中，沃龙措夫和茹克勉强地交谈了几句话，艰难地从人群中挣脱出来，向村里走去了。大个子试图从鲍戈杜尔手里夺回斧子，但鲍戈杜尔猛吼一声，扬起了斧子。碰巧站在旁边的叶戈尔大叔就劝大个子：

“你呀，小伙子，别对他太那个了。他是流放到我们这儿来的，就因为也是这么一斧背抹了一个……”

“是刑事犯，对吗？”大个子饶有兴趣地问。

“嗯——嗯。”

“也许，我自己就是刑事犯呢。”

“嘿，那就试试看吧，我们瞧瞧。”

但是大个子难堪地迟疑了一会儿，又朝那正在用一只可怕的、仿佛在冒火的红眼睛盯住他的鲍戈杜尔瞟了一眼，便跑去赶自己人了。一小时后，这四个人乘船离开了马焦拉岛。

……老太太们在坟地里把十字架、坟桩重新竖起来，插好，一直折腾到深夜。

四

很少有人记得，鲍戈杜尔最初是什么时候出现在马焦拉村的。现在人们觉得，仿佛他是一直在这里游手好闲的，仿佛是因为村子造了孽或者还因为别的缘故，鲍戈杜尔才脱离过去那些成群结队死去的人，而被作为礼物留在这儿了。人们光记得有

过一个时期,鲍戈杜尔只是在沿着河岸串乡途中,顺路渡河拐到马焦拉村来。那时候知道他是个货郎,以货易物。对,他买上一袋子线、针、茶缸、调羹、钮扣、肥皂、带扣、纸张,来换鸡蛋、奶油、面包,换得最多的是鸡蛋。谁都知道,不是所有的村子里都有商店,家里需要什么,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可是鲍戈杜尔来了,敲门了:要不要这个,要不要那个?要,怎么不要!于是就把鲍戈杜尔让进屋来,请喝茶,谈定货,十个鸡蛋之外再饶上两三个,要不就五个鸡蛋全饶上,好在家家都有老母鸡。鲍戈杜尔回头就将这些鸡蛋交到消费合作社,然后再去周转。靠这种周转,他显然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可以混饱吃喝,在腿脚利落的时候,好像一直混得还不错。

也许是马焦拉村民对鲍戈杜尔招待得较为殷勤,也许是别的原因使他看上了这座岛,反正到了要找栖身之处时,他就选中了马焦拉。他像往常一样又来了——就再也没走,扎下根来了。有时夏天还离开一阵子——看来,是过流浪生活的习惯使然,这习惯驱使他外出,要求他外出。但是冬天他就不出门儿了:在一个老太太家住一个星期,在另一个老太太家又住上一星期,不然就在澡房里生起火炉后溜进去过夜——在那里大概要混到来年春天,一到春暖,他就再回到自己的“住处”——高尔察克营棚去。

许多年前,人们就知道鲍戈杜尔是个年迈的老头。许多年过去了,他却没有变样,依然是初来时那副模样,好像上帝立意使一个人度过几代人的时光似的。他还能走动,走起路来迈步缓慢却一跨好远,步态沉重吃力,驼着背,昂着那个头发蓬乱得足以供麻雀筑巢的大脑袋。他那汗毛浓密的脸上,仅露出一只多肉又多疙瘩的鼻子和一对闪烁充血的红眼睛。除了下雪季节,鲍戈杜尔总是光着脚啪嗒啪嗒走来走去,无论是石头还是痰

藜他都在所不顾；他那两只脚宽大黝黑，看不见皮肤，这双脚变得那样坚硬，甚至像是成了骨头，仿佛在老骨头上又增生出新的来了似的。孩子们一度学会了抓蛇：他们用弹弓把蛇按在地上，抓住蛇头就跑去吓唬女孩子和女人。有一次鲍戈杜尔看见一条偶然脱手，趴在路上的这东西，一群孩子正在它旁边蹦蹦跳跳的。鲍戈杜尔想了一下，便伸出光脚掌去捣它——蛇咬了一口，但咬不动，像是碰到了石头一样。那件事以后，男孩们就找到新的乐趣了：把所有抓到的蛇都送到鲍戈杜尔这儿来，他则坐在营棚前的大圆石上，双手将一只脚微微抬起，戏弄这些蛇，同时像有人胳肢他一般嘻嘻地笑着。当一条蛇突然蹿起来想咬穿他的硬脚板时，他却怡然自得地说一声：

“婊——子！”

这一个字眼儿为鲍戈杜尔代替了上千个任何人都无法不用的字眼儿。他能出色地以一当千。他是不是波兰人，不知道；不过他很少讲俄语，他甚至不是在讲话，而是在必要时做点简单的解释，并且频繁地点缀上那个“婊子”和类似的字眼儿。男人们骂起娘来往往会骂得千奇百怪，但无论谁也不会骂得这样津津有味：他的骂娘话不随便出口，而总是精心炮制，配好音调，加足作料，掺上点亲热或怨恨的味道。别人冲口而出的无足轻重、习以为常的骂人话，还没有传到听者的耳边，半路上就消失了；可是这种骂人话一到了鲍戈杜尔嘴里，那含意就样样俱全了：对不对呀，好不好呀，表达出他对谈话内容的全部明确态度。鲍戈杜尔尽管难得与老太太们畅谈，但毕竟也有这种时候。虽然也是左一个婊子右一个婊子，接连不断地用婊子表达着意思，但那终究还是连贯易懂的谈话，即使局外人也可以听得懂的。

老太太们喜欢鲍戈杜尔。不知他有什么地方迷住了她们，降服了她们。只要他在达丽娅家门口一出现，达丽娅便什么活

计都要停下来，连忙去迎接他，殷勤地招待他。

“你好啊，达丽娅！”他用嘶哑的、破锣似的嗓子瓮声瓮气地说。

“你好，”她抑制着兴奋回答着，“你来了？”

“和上帝一样，”接着便是一声骂娘。

达丽娅对着圣像不住地画十字，祈求上帝原谅鲍戈杜尔已经说出口和即将说出口的一切，便急忙去烧茶了。

“纳斯塔霞！来喝茶吧，鲍戈杜尔来了，”她隔着篱笆喊着，“在那儿喊一声塔吉雅娜，让她也来。”

既然老太婆们喜欢他，明摆着的事，老头子们便不喜欢他。一个外来户，而且是个乖僻的家伙，只晓得吃吃喝喝，怎么也跟他聊不起来，什么底细也探听不出来——鬼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这个老妖精。达丽娅对自己最亲的人都会忘了倒茶，对鲍戈杜尔却不然；在她看来，他这个骗子竟真的像是终于降临到受苦受难的人间，乔装成罪恶的乞丐模样来试探人心的上帝了。老头子们嘀咕着说：

“是个流刑犯（曾有传说，当初鲍戈杜尔是因杀人获罪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老头们嘀咕着，但又忍耐着：最好别跟老太婆们纠缠上，再说他好歹是人，不是狗，纵然是世上难找的无益而凶险的人。

近几年来，先是有传闻，接着就开始忙着搬迁。跟这一切仿佛毫不相干的人只有鲍戈杜尔——或许是他估计到那时自己会死掉，也许是打算像在这里一样，到了新地方也就寄身于老太太们身边。对于他们来说，现在全部生活的内容就是这一件事，无论谈起什么，无论何时交谈，无论讲到谁，最后总是以这一件事告终——马焦拉临近淹没了，很快就要搬家了。鲍戈杜尔坐在这里，搔着自己那两条极其粗糙的腿，像是石头蹭石头似的，弄

出沙沙响声；或者于茶后粗声叹气，吃力地喘息，继而忧郁地嗓音沙哑地说：

“他们没有权——利。”

“他们有就是有，怎么会没有呢？”老太太们烦恼而又怀着希望七嘴八舌地问他，“难道会来问问我们不成？”

“没有权利。发大水……婊——子……来淹人……没有权利。我懂法律。”

他威吓地把一根手指举过头顶，凶相逼人地注视着它。

“你呀，可怜的，往哪儿跑呢？”老太太们怜悯地问。

“哪儿也不去！”鲍戈杜尔叫了起来，“日本上帝！他们没有权——利。我还活着，婊——子！”

“要是他们把大水放过来，光靠你一个人也挡不住。他们把你一收拾，就给送走了。”

“我还活着……婊——子！”他执拗地说。

坟地事件发生后第二天，鲍戈杜尔不再像平常傍晚才蹒跚着到达丽娅家来，而是一早就来了。达丽娅没有起身迎他，也没有讲话。她在木床上坐着不动，漠然地俯着身子，那双干瘪、瘦骨嶙峋、久经劳动磨炼的手交叉着放在膝间。鲍戈杜尔鸭鸣似地嘎嘎叫了几声，一边在门旁的长凳上坐下——从商店里买来的新家具，达丽娅的儿子巴维尔早在冰封河面的时节，就运到国营农场的住所去了，这里所剩是旧的。鲍戈杜尔嘎嘎地叫了一阵，不满地咕哝了句什么，便住了口，等达丽娅开口搭腔。但无论聊天或喝茶的兴趣，达丽娅都没有表露，她一直沉默着，不时沉痛地叹气，又同样沉痛地、迟缓地向鲍戈杜尔抬起她那双视而不见，不知在透视何方的眼睛，好像是她认不出鲍戈杜尔来了，又好像是不明白，他为什么，有什么必要到这里来。

早晨静悄悄的，已经很迟了，太阳高高升起来，照得明晃晃

的,却没力量,不逼人,它在抑制着自己的热。甚至在屋里也可以感觉到:窗外的阳光软弱无力。周围各种音响,好像并不往这边一个地方集中给人听见,而是散向四面八方。未生火的屋里温度适中,正好是既不热也不凉——像在睡梦中一般根本感觉不出来。苍蝇在窗外倦怠而烦人地嗡嗡叫着,撞击着玻璃;铁桶里给家畜煮好而没有提出去的饲料,发出酸溜溜的气味;桌上昨晚没有收拾,昨天给鲍戈杜尔斟满的一杯茶,依然原封未动。此刻鲍戈杜尔看见了这茶杯,走过去,一饮而尽。达丽娅这才动弹了一下,便问:

“要烧新茶吗?”

鲍戈杜尔摇摇头:不用。但达丽娅还是下床去烧茶了。她一拿起活儿来,便一件件地干下去了:她把饲料提出去;她给母鸡撒食,群鸡便惊慌、喧闹地扑食;她收拾桌子;等到穿堂间里茶炊发出响声时,她把两小撮黑色的砖茶放进瓷壶,将壶坐在茶托上;她端进茶炊沏上茶,等茶慢慢泡好。直到这时,达丽娅才终于开口了——没有抱怨,口气也很平常,就像谈话刚才一时中断,此刻继续说下去似的:

“昨天放过了,没给牛挤奶,奶总是变酸,真讨厌死了。拿它做奶油吧,奶油也变酸。所有的奶壶都盛满了。巴维尔他来了,就从挤奶桶里舀出一罐儿来喝,喝完就又上船,走了。我呢,喝得少极了。就这也不是想喝,是心疼奶,就喝它一杯,免得浪费。不要紧,很快就不会再浪费了。以后你就是想在这茶里加牛奶,也没的加了,再也不会有牛奶了。”

她斟了茶,把鲍戈杜尔的茶杯挪到他面前,又从自己的杯里倒一些在茶碟里,喝了一口。她抬起头屏息不动了,仿佛在倾听什么,捕捉什么;接着,在捕捉到了以后,她又低下头去,将茶碟举到像包了一层蛇皮似的、干瘪的嘴唇边,再呷一口茶。她猛然

转换话题说：

“今天我想，他们是会来向我问罪的。他们会问：你怎么敢那样不负责任，心思用到哪儿去了？他们会说，我们都指望着你呀，可你呢？问得我无言答对。我在这儿呀，我有责任留神看着啊。要遭大水淹，好像也是我的罪。我以后死了入土跟他们不在一块儿也是罪。不让我活到如今才好呢——上帝呀，那该多好啊！不——真想不到，会落在我头上。落在我头上了，我作了什么孽？”达丽娅瞥了一眼圣像，但没抬手去画十字。“大伙儿都在一起：爹、妈、兄弟、小儿子——就我一个要埋到外地去。我死后也要遭水淹的，看来是要淹的。那样一来，我的骨头也就要东漂西散，也就不会在一起了。追都追不上……

“爹说过……我爹疼我——他说：只要能活着，达丽娅，就活下去。好也罢，赖也罢，要活下去，让你生下来就是要你活着嘛。你会受苦受难，精疲力尽，想要到我们这里来——不，要活着，要干，好使我们跟人世连得更紧，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上扎下根子。爹还说：无论谁到我们这儿来都没有害怕过，没有过也不会有这种窝囊废。他还认为不会有呢，偏偏我就害怕了。我早点下定决心多好，我早就不是这个世上的人了……我是那边的人，那个世界的人了。我活在上，早就好像不是自己人了，早就成了外人了。到哪儿去，为什么去？——我什么也弄不懂了。可是还活着。如今世界裂成两半了：瞧搞成什么样子了！在我们老字辈上裂成两半了……叫人进退两难。真不得了！也许，从我们身上还能看到一点从前的人们是什么样的，要知道，现在是谁也不回头看的。全都拼命往前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步一跌的——但还是跑……哪儿还回头看……连自己脚底下也没工夫看一眼……像是有人在追赶似的。”

“日本上帝！”鲍戈杜尔表示同意了。

达丽娅从茶炊里将茶倒进茶杯，又从杯里倒进茶碟，然后温雅小心地呷着茶。她并不立即将茶咽下去，而是含在嘴里品味着，一本正经地舔舔嘴唇。然后，她就不慌不忙、心不在焉地说个没完，似乎是信口说来，说到哪儿是哪儿，什么话题都不长谈，忽而扯到东，忽而扯到西。

“不喝茶就难过，”喝了茶她感到称心，便由衷地说道，“好像舒服点了。早晨胸口闷得就像上了箍似的，那么难受……浑身没劲。硬撑着去挤了牛奶，不然那牛怪可怜的，哞哞叫得好苦。等我把牛一放——我一下子连窗户也看不见了，眼前一片黑。我想，得坐茶炊烧点茶。自己也讨厌自己：你还要什么茶炊？你一直守着茶炊喝茶闲扯，你这没良心的，把对爹妈的最后一点纪念都忘光了。你再也不会有什么茶炊，别想要了。我一想起他们，一想起他们……心马上就要不跳了，发僵了——不行。我摇了一下身子——心好像跳了一两下，停一会儿就又……好像碰到了记忆……就又不跳了。嘿，我想，他们要把我弄到哪儿去，藏到什么地方去呢？莱卡·谢尔基娜的小孩死时，为了埋他，找了三天找到半俄丈的一块地，准备开一块新的坟地，可是后来坟地到底给定在别处了。他这可怜的孩子躺得不是地方，孤单单地躺在一边……据说离坟地很远，躺在一边。他这孩子呆在野兽出没的树林子里，如今怎么样了呢？为了这个，以后他会对爹妈说声谢谢吗？

“我爹我妈差不多是同时去世的，要是跟我现在相比，那时他们年纪还不算大。先是妈去世，无缘无故的，死神就突然把她抓走了。早晨还走动呢，还收拾家务呢，后来躺到床上想歇一歇，躺了一会儿，就狂叫起来：‘哎哟，死神，死神来掐我了！’她自己却在用手掐脖子，抓胸口呢。我们跑过去看，可怎么办呢？谁也不知道，只是手忙脚乱地连声大喊：‘什么呀，妈，在哪儿啊，什

么呀?’我们眼看着她脸色发青,起了斑点,嗓音哑了……我们扶她欠起身来,让她坐好,其实应该放她躺下。脖子上好像就留下了印子,似乎是死神掐过的……就这样掐出了印子。爹后来说:‘死神这是对着我来的,是我叫它来的,它却看错了目标抓错了人。’我爹病得时间很长,病了七年光景。磨坊里安新磨盘,他被压在下边了……腿压伤了,磨盘正好压在他身上。怎么还能活!他就吐血了,受了内伤。他要是保重一点儿,也许能多支撑些时候,可他就是怎么也不会保重,硬要干这个活儿,像个壮实人一样,不顾惜自己。我妈是在冬天圣诞节前下葬的,葬我爹差不多是现在这个时候,是在三一节后。就在妈的棺材旁边挖开了坟,那棺材居然一点儿也没变黑,像是昨天才埋下去似的。就在旁边把爹的棺材放下去了。祝你们进天堂吧!活着的时候在一起,到那边也在一起,谁也不会见怪了。

“我们岛上有一座坟墓……现在人们也不去照料它了。那坟墓在我们村子下面岸边的山岗上。我还记得呢,是个小小的坟头。传说坟里埋的是个商人。他当初在安加拉河上行船运货。有一次他运货路过,看见了马焦拉,就吩咐划过来。他是那么喜欢我们的马焦拉……他来找当时的男人们,来了就说:‘我是什么人什么人,我想死了以后葬在你们岛上高高的岸顶上。为了报答,我给你们盖一座基督教堂。’男人们不是傻瓜,同意了。他就真的给了一笔钱。这个商人,看来是个有钱人……成千上万地给——给了不是一万就是两万。还派了他的一个大掌柜来盖教堂。我们的教堂就这样盖起来了。还举行了神圣的仪式,那商人自己也来参加仪式了。过了不久,人们就遵照他的遗嘱把他运到这里来安息了。老人们是这么说的,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可是你看,他们干吗要无中生有呢……

“爹是死了,可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以前他老是讲我……

他说：‘达丽娅，你别多揽事——那会累死你的。最要紧的是得有良心，不能昧良心。’从前良心是看得一清二楚的，要是谁想昧良心，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大家生活在一起，彼此都看得见。当然，人也是各式各样都有的，有的人本来也很乐意讲良心，但要是良心没陪着他生下来，又到什么地方去拿呢？钱又买不到。谁要是过分讲良心，那也换不到快乐。人家要脱他最后一件衬衫了，他就会将衬衫脱给人家，还要说谢谢他们扒了衣服。我们的亲家伊凡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个人世间最讨人喜欢的炉匠。百里以外的人都来请他去砌炉子。他有求必应，谁请都去，干了活儿却不好意思收钱，差不多是白干。亲家母就怪罪他说：‘你走一个星期，谁替你到地里去干活儿？谁在家里干活儿？你是个胡涂虫，不是人。’他也真是个胡涂虫，总是说：‘人家求嘛’……这样一来自己的家业可就荒废了……‘人家求嘛’——那就是走遍世界也干。这时候农庄成立了——他就入了农庄……”达丽娅拉长声调把这最后几个字说完，她的思路又跳回眼前，她回忆说：“昨天晚上我没头没脑地……去看亲家伊凡的坟。天都黑了，弄不清谁躺在什么地方。难道这个坟也挪走了？那坟上有一颗涂了漆的星，是儿子从城里带来一根铁柱，柱顶上有颗星，像落着一只小鸟一样。今天得去检查一下。上帝呀，求你把这些恶棍追回来，替我们惩罚他们吧。既然人世间有罪孽，还用去找什么罪孽呢？”为避免再触动伤心事，达丽娅谨慎地摇摇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起来走进灶间，从里边拿来彩纸包装的五块巧克力糖，三块递给鲍戈杜尔，两块留给自己。“甜甜嘴吧，我知道你喜欢吃。你看，我记得，战争年月饭也吃不上，你不知从哪儿给每人拿来一块糖，叫我们尝尝。要是我们给孩子们留下，你会生气得不得了，你逼着大伙儿自己咯吱咯吱嚼着吃了。比那更甜的糖我没吃过。不知是不是真那么甜。”

“酒——嗨！”鲍戈杜尔喊道，还把头一扭，表示他非常讨厌酒，并且一向非常讨厌。

“酒让鬼去喝吧，”达丽娅同意说，一边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讲亲家伊凡讲到哪儿了？一点儿记性也没有了，不中用了。啊，讲到良心。从前良心看得见：要么有，要么没有。谁有，就是有良心的人，谁没有，就是没良心的人。如今鬼才分得清楚，青红皂白——全都混在一起了。现在人们无缘无故地张口良心闭口良心，怪可怜的，它都给嚼烂了，浑身皮开肉绽的。人们好像是不会用良心似的了。哎呀呀！人比以前多得多了，可良心看来还是那么多——就一个人分上一小片，那也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需要，够做做样子就行了。也许是干起大事来，忘了小事，干大事的时候良心都是铁打的，你怎么也啃不动。我们的良心是老了，成了老太婆了，谁也不理它了。噢，上帝呀！既然搞成这个样子，还讲良心干吗？

“昨天出了事以后，夜里我睡不着，老在想啊，想……各种各样的胡思乱想都钻到脑袋里来了。我生来什么也不怕，这回却害怕起来了：好像觉得马上就要遭灾了，马上就要遭灾了。弄得我好紧张啊——我受不了了……我走出屋去，走到院子正中站住了——不知是天要打雷劈死我们，说我们不是人，还是怎么着。我害怕得真想回到屋里去，可还站着不动。我听见门响，那边砰的一声，这边砰的一声——这么说，不是我一个人心神不安。我抬眼看天，数不清的星星亮晶晶的，缀满了天空，没有一块空地方。星星又是那么大，那么烫——简直可怕！它们越来越低，离我越来越近……星星照得我头晕起来……我好像昏过去了，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什么都不记得了。也许是我的魂儿飞了。等我醒过来，周围看得见东西了，亮起来了，星星又回到天上去了，可我浑身发冷，哆哆嗦嗦。我就觉得心里

那么痛快,那么舒坦,好像灵魂洗干净了。‘因为什么?’我想,‘出了什么事?’又痛快,又痛苦,又痛快,又不自在。我就回想,我是不是看见了什么,好像是看见了。好像听到过一个声音。‘去睡吧,达丽娅,等着吧,人人都要问罪的,’——好像听到过这么个声音。我回屋去了。睡倒没睡稳,可心里轻松点儿了,受得住了。但那是什么声音,从哪儿传来的,我却不知道,说不出了。

“我们这里的男人自古以来差不多都是本地人,马焦拉人。外乡男人是不大收留的。我记得有个奥尔利克倒扎下根来了,这个奥尔利克可是个机灵鬼。只要他愿意,就是在光溜溜的水面上他也能安家,还连脚都湿不了。他顺嘴胡诌荒唐事,吹得天花乱坠,舌头滴溜溜转个不停,像个脱粒机。看来男人们把他留下,就是让他给自己开开心,逗逗乐。我们本地没生过这号人。人们聚在一起哈哈大笑,笑得全马焦拉都听得见。他坐在那儿——一头黄红的头发,一副强盗嘴脸,一脸麻子,牙齿稀少。一点不错,牙齿稀少——怪不得人家说:牙齿少,谎话多,什么瞎话都能穿过牙缝跳出来。他还老洗自己那几个稀牙呢。洗牙——哪儿学来的!他直逗得男人们乐得躺到地下。但他也是个能干活儿的人,哎呀,真能干!不论种什么,都能丰收。对了,根卡·普列斯尼亚科夫的妻子杜妮卡,是他留下来的,是他的女儿。嘿,那个女儿生得可不像她爹:不会吹,也不能干活儿。他还有两个儿子,那两个可就滑头了,两片嘴皮子可能说了。嘿,一个被当作德国的密探抓走了,免得叫他尖嘴薄舌的,另一个忍气吞声离开了马焦拉岛。他到哪儿去了,现在是不是还活着,我不知道。我自己都把他忘了,忘了有过他这么个人了。不然不是随时可以跟杜妮卡打听一下吗?

“嗯,我们这儿男的是本地人,女人却都喜欢从外地娶来。不知怎么兴起来的。我们这里还没出嫁的姑娘,人家也是驾船

渡水的抢着来娶，人人都乐意跟马焦拉攀亲。自古以来我们日子就过得挺富裕。我们这儿的男人娶亲以后，生下来的姑娘个个都是好样的，是好样的——就留不了多久。谁是马焦拉种，直到如今也看得出来。我妈也是爹从布里亚特族那边什么地方娶来的。他常逗她：哎一哟一哟。就是因为这个哎一哟一哟呢，还是他另外怎么弄的，妈就嫁给他了。她们家乡那边要么根本就没水，要么只有条一步就跨得过的小溪，反正我妈直到死还怕水。爹常说，妈一靠近河岸就先闭眼，免得看见水。可是往哪儿躲呀，四面都是安加拉河，到波德莫加岛上去也得渡河，我们的割草场都在波德莫加岛上。妈一直到死也不习惯。我们常取笑她，在我们眼里安加拉河是自己的河，从小就在河边长大，妈却说：‘哎呀，我要遭灾了，要遭灾了，不然干吗老是提心吊胆呢。’可是我们家谁也没有淹死，说到河水不老实，冲上岸来，那也不是我们一家遭殃，是家家有份的。直到现在妈的害怕才应验，她当初害怕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个时候害怕……现在……”达丽娅茫然地啜嚅起来，压低了嗓音，隐约可闻地、惆怅地把话说完：“原来是这——样：这水到底还是要把妈给追上。我可真想不到。原来是这——样……”

这意外的奇事本来早就该被发现了，但它却躲了起来，直到如今才从记忆中跳出来。这件奇事使达丽娅大为震惊，她茶也不喝了，心不在焉、漫无目标地用眼光在面前搜寻起来，仿佛想找到什么东西，找到一种毫无用处、令人沉痛的东西。傍晚的太阳更加模糊不清了，它那光线暗淡而无力。这阳光照到刷白而石灰剥落的墙上，照到木纹磨擦成深沟的地板上，照到裂开的窗台上——这阳光所照之处，无不显得孤寂而寒酸，一片老朽不堪的景象。房间中央，鲍戈杜尔的背后，一只蜘蛛——这里的叫法是筛子匠——在空中灵巧地从天花板上滑下来——一时停在半

空,轻轻地晃动着,歇一歇或者看一看周围的情况,便又往下滑去。对着窗口的安加拉河面上,一只摩托艇像甲虫一般突突地开过,掀起一阵浪花;从另一扇窗口望出去,板墙上方是一片塌陷下来的白蒙蒙的天空。达丽娅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可又什么也看不见,分不清;她看得越久,就越觉得心神不安,就越发懊恼:她又做错了,又像昨天一样守着茶炊喝茶了……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斥责着她,压抑着她,不准她喘气儿,使她忐忑不安。

她站起身来,像是到哪儿去走迟了似的,急匆匆地对鲍戈杜尔说:

“好了,咱们喝够了,喝够了——再多装不下了。你要走,现在就走吧,要不你留下,我走。坐得太久了,坐着聊得太久了,有什么好聊呢……咱们的话就像麦糠——又没分量又没用场,不过是对谷粒的追忆。从前……”

“达丽娅,去哪儿?”鲍戈杜尔抬起头严肃地问。

她迟疑了一下便拒绝了:

“不,不,我一个人去。你留下吧。我一个人到那儿去。”

“到那儿去——究意是到哪儿去?”她也不很清楚,走出大门,沉思着在门旁停了一会儿,便举步朝安加拉河走去;但她事先意识到会拐弯的,她便拐了弯,贴着菜园出了村——信步向坟地走去。但坟地她也没有走到,她觉得,没有必要犹犹豫豫地到那儿去,那只能扰乱死人的安宁,昨天那场大战已经扰乱了他们的安宁。她无法让他们听到预言——没有这种预言,也想不出来,他们也就不会应声答话。达丽娅极度茫然不知所措,便颓然坐在那干燥而野草萋萋的山岗上,正好面对着下游。她举目四望,想用目光找到使她得到安慰的东西。她一次、两次、三次地张望着。

从这里,从岛的最高处望过去,那安加拉河、那遥遥的彼岸、

那自己的马焦拉岛，都了如指掌——马焦拉岛在松林地带之外，与波德莫加岛连成一片，因此岛上的土地几乎延伸到地平线，直到贴近地平线的地方才有一带河水闪闪发亮。右边那道宽阔的支流，好像在转弯处膨胀起来，冲击着低矮的彼岸，一度冲上岸去，随即又收缩得平稳而规则起来，笔直地流向远方。左边一道支流较为平静而靠近马焦拉村，像是属于它似的，依傍着村边的陡岸流着，此时在温和的阳光下仿佛静止不动了。马焦拉村民就称它为“自己的安加拉河”。村子面向这边，船从这里下水，人从这里担水，孩子们初次总是从这里放眼世界，这里的一切，直到每颗小石子，他们都了如指掌而铭记在心。过去有集体农庄时，他们还在这支流的对面种有土地呢，不过现在那地已经弃而不种了。

岛子，尤其是命运所亲自指定的这故乡的土地，沉寂、宁静地横卧着。它界限分明，界限之外就不是土地而是水流了。但是岛上从这端到那端，从水边到水边，有足够的平原、财富、美景、野趣、各种各样的人——虽然它身离大陆，却是一切都应有尽有——不是正因为这样，才有马焦拉这个响亮的名字吗？马焦拉岛就这样静静地、无声无息地横卧着，养蓄着初夏的精华。达丽娅坐在山岗上，她的右前方，茂密的秋播作物一片青翠；更远处，是芽苞初绽的嫩绿的树林，林中夹杂着墨绿的枞树和松树；一条道路由高而低穿过树林，通向波德莫加岛。道路左侧靠近树林有一片牧场，两面围着篱笆，朝着“自己的安加拉河”及村子的那两面则都敞着——一群母牛正在牧场上溜溜达达，有一头牛颈上的项铃发出如汨汨流水般的尖细的叮咚声。就在那里，像树中之王一样，耸立着一棵粗大的三人环抱的古松（这棵落叶松被老人们尊称为“他”）。它那同样强劲的枝杈横着伸张开来，树顶则在一次大雷雨中被削掉了。离它不远处有一棵白

桦树，似曾向它靠拢却终于未得靠拢，不知是因为害怕它那威严的仪容呢，还是因为痛苦而致呆若木鸡了。达丽娅清楚地记得这棵白桦树当初嫩弱时的模样，记得那棵小白桦树的模样，但而今它那弯曲粗糙的树干裂成两半，树皮僵硬了，不断地剥落着，沉重的枝杈垂挂下来，摇摇欲坠。——这就是牧场上的一切了，别的全给牲畜啃光、踏毁了。

但是达丽娅也看见了，也看见了树林背后的一切——长着密集的高高白杨树的田野，长满柳丛和醋栗的倾斜湿润的右岸，以及靠近波德莫加岛的一片沼泽地。沼泽地里的一处处土丘上长着畸形的小白桦树，因为水不好它们总是过早地枯萎，一棵棵光秃秃地站在那儿，只能骗人：你一伸手去抓它支撑身子，它就披裂了，折断了。高高的左岸上那些白桦就完全不同了——它们高耸，纯洁，茂盛，用手一摸便留下淡淡的白粉。它们三四棵一伙，自在而欢畅地耸立着，好像是四散开来做什么游戏似的。这片草地自古以来就被年轻人选作歌舞嬉戏之地了。这里不止一次地举行过订婚典礼，也不止一个姑娘在这块草地上名传四方——她离开这里时尽管衣衫依旧，但是姑娘的身子却已不是原封未动的了。有时候全村人出动，套上马车，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到这里欢度节日；有时候，小伙子们从峻峭的河岸上跳进苍绿的水中。有一个传说，很久以前一年夏天，有个叫普罗尼亚的小伙子就再没有爬上岸来，从那以后许多年来，每到夜晚他就在这儿徘徊，像个人鱼似的，胆怯而含糊地呼唤着什么人。

达丽娅为了留念，又继续远眺——道路两旁又是田野，田野上东一棵西一棵地长着些孤零零的老树，大多是枯树，这是过去单干时地界的标志。树上懒洋洋、默不作声地落着一些乌鸦，黯然失色的太阳与不合时宜的寂静，使它们感到难堪。道路拐向旧日的打谷场，那儿一堆有麦粒发芽的麦糠里，麻雀正忙着觅食

呢，发黑的麦秸像粪肥似的层层叠叠地堆在那里——真的，周围有多少老朽的东西，它们辛劳一世，已经用不着了，却仍在迟迟不甘彻底腐朽呀。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呢？这里倒好办，这里全都要放火烧掉，放水淹掉，那别的地方怎么办呢？达丽娅觉得：无论是什么，树也罢，人也罢，活到没用的时候，活到成为累赘的时候还活着——世上再没有比这更伤天害理的事了；在天降于人间要人求饶要人自赎的许许多多罪孽中，这一罪孽是十恶不赦的。树木还不错，它可以倒下，腐烂，给大地作肥料。那么人呢？他能派这个用场吗？如果他除了给人造成麻烦和苦恼之外，什么也不能提供了，那何必又要老而苟活呢？既然全部真理就是：你现在没用了，往后也不会再有用，你生到人间想干的事早已干完，而今全部职能却仅在使人烦恼——既然到了这步田地，又何必还去寻找什么特殊的天理和天职呢？“对不对？对不对？”达丽娅惶恐地追问着，她不知道答案，确切点说，她知道只有一个答案，于是她惆怅而抑郁地默不作声了。

瞧，那边是马焦拉岛宽阔的一端，是面对波德莫加岛或波德诺加岛的满是淤泥的河岸，以及从那儿蹚水登上波德莫加岛或波德诺加岛的浅滩。在滩水清浅的时节，人们放心地把牲畜赶过去，——农庄的畜群每年就在那里过夏天；可是一旦河水上涨，狂暴起来，即使坐船过去也要当心呢。波德莫加的鼻子伸进安加拉河，稍稍插到马焦拉岛背后，似乎这地处下游的岛从前打算绕过面前靠上游的岛，并且已经加快了脚步，拐了弯，但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卡住了。于是马焦拉岛就不得不拖曳波德莫加岛：人们在浅滩上横空拉起了一条大索，以便在河水放荡时有东西可抓。栖息在“自己的安加拉河”岸畔的雨燕喜欢落在大索上面，此刻它们就正落在那里呢，一个个抖动着尾巴，时而低头下望，好像一只只鱼漂。

弄不清阳光依然照耀着岛子，还是已经没有太阳了。太阳还挂在天上呢，空中和地上都有一点光辉，但是微弱、清淡，照不出阴影。四周是一片睡意和隐忍的气氛，四周的一切都噤若寒蝉——左边静卧着古老的村庄，村舍的小窗幽暗无光，像戴了牛眼罩似的。头顶被削的“树王”凝然矗立在牧场上，纵情地向四下展开巨大的枝杈；绿油油的田野显得苍白了，死气沉沉了；树林显得稀疏了，显得树叶不茂树干不直了。旁边另一个村庄当然也是默默无言的，它破败而严峻，它不泄露真情；这个村庄是比较富裕的，但现在它已停止接纳新户——这村庄就是那片坟地，那世代先辈们的归宿……

快了，很快一切都要完结了。

达丽娅想要解决而又未能解决一个非她所能解决的难题：也许理当如此？她避开了这个问题，试图为一个较为容易的问题找到答案：什么“理当如此”？她所想的是什麼？所追求的是什麼？但这些她也不知道。度过这漫长而苦难的一生，使她终于承认：她这辈子什么也没弄明白。就在她渐近老境的时候，她的生命也朝着一个方向急速飞去了。现在且让别人来追她吧，可是他们也是追不上的。他们只是觉得赶得上她——不，他们也注定只能心酸力竭地望着她的背影，就像她现在望着前人的背影一样。

背后安加拉河的主流上一艘轮船大吼几声，一只乌鸦从田野里一棵孤树上腾空而起。“在汪洋大海上，在布扬岛上……”达丽娅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这古老而可怕的咒语。

五

傍晚巴维尔来了。达丽娅听到柴门的响声，抬头望去，只见巴维尔走进了院子，从肩上摘下了背囊，这是一只城市派头的背包。凭这她就猜到了：是来拿土豆的。当巴维尔走进屋时，她便问：

“土豆都吃光啦？”

“都吃光了。”

“我说过：多拿点去，放在浮运船上运走。可是连半袋也不肯拿——你们挺能吃的，会吃长了吗！”

“拿多了会坏的，”巴维尔边答边坐到长凳上，以便脱下笨重的厚油布高筒靴。

“会坏？”达丽娅感到奇怪，“你说过那边有地窖啊。”

“有是有，”巴维尔使劲脱着那粘在腿上的筒靴，抱怨地说，“地窖倒是有。就是我们得像淘井一样从里面往外淘水。里面有水呀，用抽水机抽才好呢。”

“咦——！那为什么要盖在有水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分给的是什么房子？”

“那儿好好看不好好看都一样……家家都有水。打水用不着下安加拉河。”

“这搞的是个什么名堂啊？为什么要这样盖房呢？为什么不先用铁锹挖挖，看看地下究竟怎么样？”

“就因为那是别的爷儿们盖的。就这么盖成了。”

“又是一件怪事！……”

达丽娅于是不作声了：怪事一件接一件。真的，怎么能解释

明白这个不用任何解释,本身就是答案的问题呢?只有孩子才会问:为什么粮食叫粮食,房子叫房子?因为粮食和房子都有本身自古相沿的名称,并由它们派生出许多别的词儿来。即使有谁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又会产生什么变化呢?——照样有粮食,有房子,就是没有闭着眼睛给人家盖房子的事。

她看见巴维尔累了。巴维尔吃力地脱下了靴子,拿到穿堂间去,免得有臭味,然后赤脚走到临门的屋角,坐在木床上,竭力把那双白皙松软脚收拢在自己面前。今年春天复活节前不久,巴维尔满五十岁了。他现在是达丽娅的长子,但照排行他是次子,战争夺去了达丽娅的第一个儿子。战争期间她还失去了另一个儿子——他当时因年幼留在家里,可是他也在离马焦拉三十公里外的伐木地上碰到了死神。人家将他装进棺材一盖,运回家就葬了,也没给母亲看。拒绝给她看的理由是:棺材里没什么可看的。这真是多么简单而可怕呀,让人百思不解:是她生的,她喂的,她养大的,儿子也顶个男子汉用了,又近在身旁,就因为一棵树莫名其妙地一倒,转眼间什么也没给留下,甚至连尸首也没有了。是谁手指一伸点上了他,为什么点他呢?达丽娅不相信这种事是因为一时没有看清:没看见树向谁倒去——人就倒下了。不,这是有预谋的,是看准了目标的,事先就知道要害谁。还有,还有一个难以理解的可怕的事实:达丽娅三个死去的孩子个个都已长大成人,独立为生了——一个能打仗,另一个能工作,第三个是大女儿,她曾为料理自己的家庭尽心竭力,在生二胎时死在波德沃洛奇纳亚村。死在波德沃洛奇纳亚村,这就是说,也要被水淹没。只有那个跟许多人一起埋在异乡的公墓里的儿子,也许还将留在地下——谁知那里的地和水情况怎样呢,活人对地和水需要得更多了。

达丽娅活下来的孩子也是三个:一个女儿在伊尔库茨克,一

个儿子原先在远方的一处老林场工作，不久前转到一个刚开办，离马焦拉较近的新林场来了，再一个就是巴维尔了。责备他们可是罪过，看来个个都敬重母亲：在外地的两个写信来请她去作客，巴维尔本人从未对她讲过一句粗话，也不许妻子讲。不是任何人到老了都能有这样的命运——真的，还要怎么样呢？现在谁也不会再挨饿受冻，那么亲人对老人的态度，对老人来说就是头等重要的事了。

巴维尔昏然沉思地望着地板，沉默着坐了一会儿，大概因为发现地没有扫，便问：

“你在这儿忙得过来吗？维拉不来吗？”

“什么时候维拉来了，我就说，不用。我自己能拾掇。我刚才才是没管地板。昨天连牛奶也没挤，全都糟蹋了。”

“病了吗？”

“他们干的什么事呀，巴维尔？！干的什么事？！简直想不到！”开头她语调很平静，后来便忍不住哭了起来，一手掩面，频频点着头，呜呜号啕恸哭着。巴维尔不问也不催，只是等候着。母亲稍为平静一点以后，就讲了昨天的事，特别强调了沃龙措夫和茹克的话——说对坟地那么处理，那是应该的。即使听完这些，巴维尔也一言未发，但他却更明显地感到疲倦和不能动弹了，双手像老头似的放在膝间，深深地弯下身去，陷入艰难的、徒劳无益的凝思之中。达丽娅没有等到他的回答，便哀求起来：

“要不，哪怕就把你爷爷和奶奶的坟迁走也好……啊，巴维尔？柯利佐夫家把自己的人……两口棺材，已经运走了。还有安菲莎，也把小孩刨出，迁到别的地方去了。挪动死人当然是罪过……但是扔了不管就更有罪啦。瞧他们干的是什么事呀！要是再一放水……”

“现在顾不上那个，妈，”巴维尔答道，“就这样已经忙得我精

疲力竭了——喘口气都没空儿。等空一点儿咱们再迁吧。这事我想过了。我再跟哪个人商量一下,免得一个人单干,我们一起来迁。”

达丽娅尽管不知道这件事她讲了并且讲妥了是否应该高兴,但毕竟还是有令她高兴的地方,有令她振奋的地方,于是她便问别的事了:

“今年你们打算割草不?”

“我不知道啊,妈。眼前我什么也不知道。”

她很心疼巴维尔,就不再刨根问底了。

然而她可不是随便讲起割草的事的:已经是该决定养不养牛的时候了。不仅他们面临着这个问题,所有往国营农场搬的人都面临着这一问题。从国营农场的新镇那边传来的新闻,一个比一个怪。人家说,还不光是说,而是知道,是确实看到的:这个新镇汇集着来自十二个村子的人,有附近的,也有不是近处的。那里一幢房子住两家,当然是有单独的过道和单独的住房的,而分给每家的住房都是两层,上楼下楼靠一个陡立垂直的梯子,就这样——毫无例外,家家都一样。那陡立的梯子,不仅年迈的老太太,而且一般身体不好的人都不能上下自如,有事实为证,已经有人吃到苦头了:喝醉了的“茶炊”——人们这样称呼性急、大肚子的农庄会计——夜里在梯子上急匆匆地上上下下,飞跑着数梯级,就数掉了两根肋骨,躺在医院里呢;另一个村的一个小姑娘也滚下梯子,跌破了头。嘿,可不是吗——习惯走平地的人,要改掉这个习惯,还得需要时间呢。达丽娅立刻暗自拿定主意,如果轮到她去住这种房子,爬楼梯去找死,她可不干。可是有人吹嘘说,住房很漂亮,壁上都糊着花糊墙纸,厨房像城里一样,里边用的不是烧柴烧炭的俄式火炉,而是带开关的电炉;

不用出门，隔壁便是厕所；而楼上呢，如果谁上楼去住的话，那儿有两个大房间，里边有各式各样的小柜和小门，可以永远像过节一样地过日子了。

这是说住房。就在房子旁边，小院子里紧靠着墙是百分之一点五俄丈的菜地。要种点什么，还得往上面运土，因为它是在石头和黏土上弄出来的。这也是怪事：为什么要这样颠倒过来——不是菜地在土上，而是把土弄到菜地上。这算什么菜地！百分之一点五俄丈——连母鸡都要发笑了！说起来母鸡倒有个窝，猪也有个窝，牛棚却没有，就连叫牛站着的地方也没有。据说，有个茨冈人想出了点子，终于把牛放在什么地方了，但镇苏维埃来说：“不行，轰走，这儿可不是你们茨冈人的乐园，这是城镇，一切都得整齐划一。达丽娅不大相信：茨冈人打哪儿来的牛？他们是从从来不养这种牲口的，甚至连偷牛也厌弃，他们总是养马。茨冈人不当牛倌儿，就像狼不当牧童一样。但不知为什么说的恰恰是茨冈人。当达丽娅问巴维尔，不许搭牲口棚是否当真时，巴维尔皱起眉，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地岔开了：

“许可的……问题不在牲口棚……”

很明显，最成问题的是干草：新地方既没有割草场，又没有放牧场。在那儿，不仅是自养的牲口，甚至公家的牲口用什么来喂，一概谁也不知道。人们一直在开垦荒地；几十俄里的原始森林一片机器轰鸣，还没功夫顾及草地呢。要在一块地上弃旧种新得要好多年。第一个冬天的饲草，当然可以在老地方割，这个短暂而不可靠的“可以”就最使人伤心和为难：过一个冬天可以，往后呢？往后怎么办？马上就不再养岂不更好吗？但既然已经习惯了养牛，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都是靠它吃靠它喝，既然反正还有这个再养一冬的“可以”，那么又怎能马上就放弃养牛呢？可以是可以的，但另一方面，这可行之路上会有多少极易使人跌落

的各种各样的陷阱啊：怎么抽出时间来割草——这可不是集体农庄，家家都有养牛问题，并且都能谅解；割了草，又怎么趁安加拉河还没泛滥就把干草运过河去？又怎么送上山去？就算你终于想出办法，割了草，运过了河，送上了山，运回来了——又往哪儿放？牛又往哪儿拴？这桩桩件件的事，使人不禁感到束手无策：真烦死人。

不，这最后的，转折的一年是可怕的。特别可怕而无理的是，这一年像往年一样正按部就班地，以习惯的速度一天天地逼近将要发生的事，无论什么都不能延缓那“将要发生的事”。以后，当将要发生的事发生了的时候，当他们已经置身于新生活，已经决定他们要做什么人——是做农民，却又不是现在这样的农民而变成另一种农民呢，还是做世袭贵族——的时候，大概会轻松起来的。然而暂时一切还都是在前途上等着他们，使他们忐忑不安呢。他们觉得前途上的一切都是异己的，不牢靠的，险峻的。倒不是对任何人都如此，就譬如这些楼梯吧，有的人上楼轻而易举，有的人却不然。年轻人觉得简单，单腿跳着都能跑上去——所以年轻人才容易跟马焦拉分手啊。克拉芙卡·斯特丽古诺娃就这样说过：

“早就该淹了。没一点活气……都不像人了，都成了臭虫和蟑螂。真找到好地方过日子了——在水中间儿……就像蛤蟆一样。”

她一直等着，却未能等到时机点火烧自己那祖传的房子，从而领到一笔折价费。她本来早就要放火把房子烧了，头也不回地一走了事，可是克拉芙卡的房子两面都连着还住着人的房子，人家还没离去。一点火就会延烧到左邻右舍。因此人们制止了克拉芙卡，她就咒骂马焦拉村和那些死抱着村子不放的马焦拉村人，对他们劈头盖脸地大发雷霆。

“我就要点火烧了，”她从国营农场回来威胁说，“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你们不想离开，想烧死，那就烧死吧。我可不想陪着你们遭殃。”

卡捷琳娜老太太的儿子彼得鲁哈感到牵肠挂肚的，也是同样的事——怎么才能快点得到应得的另一半房产折价费。但是另一桩倒霉的事捆住了他的手脚。早在两年以前，有一些人跑遍了马焦拉岛，敲打、察看了几乎所有的建筑物，他们在彼得鲁哈家的房子上钉上了白铁片，上写：“木结构文物。科院财产。”他们对彼得鲁哈说，将要把他的房子运到博物馆去。他起初十分得意：被人另眼看待并作上记号的，正是彼得鲁哈的房子，而不是别人的房子；人们只要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房子，窗框上刻的花边，手艺是多么希罕多么精细，隔扇上的壁画多有意思，屋里又有怎样的木板吊床，房子是用什么样的原木造的——那就得付钱。虽然磨坊和商店的房子上也挂着这种铁片，但那是磨坊和商店，可这是住人的房子，难道可以相比吗？目前这是临时的铁片，到了博物馆那边就要另写了：“马焦拉村农民彼得鲁哈·佐托夫的木房……”，或者不那么写，而写成：“……马焦拉村农民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佐托夫”。大家都会来读，来羡慕彼得鲁哈——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佐托夫的。他生下来的时候真是起名儿叫尼基塔，而且那样登记了。长大以后因为傻头傻脑，马马虎虎，低能无用，就另取名为彼得鲁哈^①。现在人们已经不记得他就是尼基塔了，亲生母亲也叫他彼得鲁哈。就连他自己，也只有在幻想人们把他当作一个特殊的、有名的人物而加以奖励和赞扬时，才偷偷地把自己的合法名字拿出来签上，而在平日的生活中用彼得鲁哈就够了。但是在小木牌儿上，在题名

① 与俄罗斯民间傀儡戏中主要丑角的名字彼得鲁什卡谐音会意。

时,那可照例都要原原本本地写出他的尊姓大名。

然而月复一月,那些看中彼得鲁哈家木房的人却杳无音信,彼得鲁哈就不安起来。预付的一半房子折价费早就吃光喝光了,要等彼得鲁哈这座木房离开原地的時候,才能付给他另一半钱。最近一年里他多次写信要求“科院”把自己的财产运走。谁也没有给他答复。他对博物馆也已经不感兴趣了——让牌儿上那永恒而响亮的题名见鬼去吧——拿钱要紧。集体农庄取消以后,彼得鲁哈没在任何地方定居,也没在任何地方工作,想个法子弄点钱就凑合着花花,和母亲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就在这时,在某单位的一份报表上,他的名下却有一大笔款项——一千卢布,整整一笔钱财。要想拿钱问题不大——把房子一收拾就行了。要不是这个“科院”,他转眼间就收拾好了:彼得鲁哈家的宅院是独立的,因此可以不必为四邻担忧。但“科院财产”一时还束缚着他的手脚。钉上了印刷体的字句:那不是他彼得鲁哈的财产了——可别自找倒霉。原来如此:是彼得鲁哈的木房,却不是彼得鲁哈的财产——你去琢磨琢磨究竟谁是房主吧。既不还给他,又不来弄走。

“我让他们等着瞧吧!”彼得鲁哈朝安加拉河上游远方一摆手,威胁说。“木头不是铁,它自己也会烧起来的。以后再问这是谁的财产吧。让他们等着瞧吧。”

就是他们,克拉芙卡和彼得鲁哈,大概还有那么几个已经离去和尚未离去的年轻人,对眼前的变迁感到高兴,并且也不隐讳这种高兴。其他人则都怕变,感到前途未卜。在这边一切都是熟悉的,是过惯的日子走熟的路。在这边,在自己人中间就是死了以后,人们怎么哭,棺材往哪儿抬,埋在谁旁边——也都能亲眼看得清清楚楚。但在那边呢——人间也罢,阴间也罢,一概是漆黑一团。因此每当巴维尔从国营农场回家呆一阵,达丽娅向

他问长问短时，他回答起来总是勉勉强强，好像问心有愧，仿佛怕她害怕，怕她的旧脑筋装不进新事物。

“你说大伙儿用一个澡堂？”她惊叹着，竭力想象出那澡堂的模样，“更不像话了！那么多人用一个？……自己弄一个不许，还是怎么着！”

“在那边哪儿有地方弄啊？……”

“上帝呀！看来我宁可身上脏死，也不能到那个鬼地方去洗。”

还有一件新鲜事呢：地下室里有水。既然今年有水，明年也会有——今年就是夏天也不潮湿嘛。这么说，地下室要是有可能加高，就应该把它加高，把它弄成一个衬上木板的圆洞。这样一个圆洞，存放百分之一一点五俄丈大的菜园上种出来的东西，大概也就够了。菜地不大——松土、收菜的事，几只母鸡就干得了。

那可真叫你想啊，想马焦拉……

六

当夜幕降临，马焦拉入睡之后，从紧靠磨坊的小河岸下跳出一只略大于猫，任何其它动物都不像的小动物——“岛主”。如果各家都有家神的话，那么这岛也有岛主。无论谁都从来没看见过它，没碰到过它，但它在这儿却认识所有的人，在这块四面环水、高出水面的孤独的土地上，从此端到彼端，从水边到水边所发生的事，它样样都知道。它之所以成其为“岛主”，是由于它看见一切，知道一切，又不妨碍一切。任何人也不曾碰到过它，任何人也不曾想到有它存在——唯其如此，它才能不失为

“岛主”。

早在夜幕降临之前，当它从紧靠磨坊的河岸上它那久已有之的藏身之洞里向外窥察时，它就看见，黄昏一到，就升起了繁星，但随即又消逝了。也许它们此刻仍挂在什么地方，因为上空洒下了一片灰暗的朦胧之光，这光之源应该就是那些星星吧。但就连“岛主”那双敏锐的眼睛也看不清那些星星。何况它又不喜欢仰望天空，因为天空会使它陷入一种隐隐约约的、无端的不安，苍穹那森严的高深莫测，也使它望而生畏。让人去仰望、去寻求慰藉吧！但他们认为是幻想的东西，不过是往事的回忆，即使是最遥远最美妙的画境一般的遐想——也只是回忆。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幻想的。

夜温暖而静谧，在别的地方夜大概是黑暗的。但在这里，在这俯临大河的浩瀚的天空下，夜间却是可以看得见的，透亮儿的。周围静悄悄，但在这睡意蒙眬而充满活力的、河水般流动不息的寂静中，那上游近处岛岬边的潺潺流水声，那左面远远对岸的滩头风吹树响般的、模糊不定的哗哗水声，那晚来戏水的鱼儿偶尔弄出的短促的拍溅声——都清晰可闻。这是上游传来，容易听到的声音，安加拉河上的声音。若能听清、辨明这些声音，也就可以听清岛上的种种音响了：牧场上那棵老松树发出的沉重吃力的嘎吱嘎吱的响声，在那里吃草的一些母牛那低沉的蹄声，那响成一片的津津有味的反刍声，以及村里栖身户外的动物——母鸡、狗、牲口那不停的骚动声。但就是这些声音在“岛主”听来，却是很响很粗的了。它特别满意、特别敏感地倾听着地下和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出猎之鼠的沙沙活动声，在窝里孵蛋的小鸟压低了的唧唧喳喳声，夜栖的鸟儿觉得不舒适而动弹，树枝摇而复止时的窸窣声，草儿破土而出时的喘息声。

“岛主”从洞里跳出来，倾听了一会儿，习惯地意识到周围发

生的一切，然后，就同样习惯地流露着从容和关切的神态，开始在岛上巡行了。它不固定走一条路，今天可以从左边跑过去，明天就从右边跑过去；可以跑到陆地当腰松林跟前就向后转，也可以直跑到岛的尽头，或者甚至渡水登上波德莫加岛，在那边呆上几个小时，也检查一番那里的生活情况。但它从来也不绕过村子。它应该知道的各种变化，多半都发生在村里。尽管“岛主”预感到、意识到马上就要爆发一场剧变，那它也就当不成“岛主”了，就什么也当不成了，但它对此却听天由命。在劫难逃嘛。它之所以听天由命还因为，在它以后这里再也不会有任何主人，快没什么可主宰的了。它是末代“岛主”。然而眼前这岛还在，“岛主”还是它。

它跑上了山岗，旁边是达丽娅大娘白天坐过的地方。它抬起头来环顾四野。马焦拉岛安然不动地静卧着：一片片树林黑黝黝的，遍地的嫩草闪着淡淡的银光，村子黑乎乎的，仿佛是很多影影绰绰的大黑斑连成一片。村中没有一点叮叮当当的声响，不过似乎就要响起这叮当之声了。白昼的温暖冷却了，大地上冒出一股略带苦味的清凉的气息。不知从哪儿拂来一阵软弱无力的风，叹息了一声便敛翅落地了，就像一片波浪被吸进了沙土一般。但是那棵老松树却更悠长更惊慌地嘎吱嘎吱响了一阵。母牛似乎是蒙眬中无缘无故盲目地哞的一声叫，好像猫叫一样。远处岸畔的灌木丛中，一丛醋栗本来被另一丛压住了，此刻终于摆脱了压抑，摇摇晃晃地挺起身来。河水忽然一声呜咽——许是从傍晚起就漂浮着的一只水泡崩裂了，或者是一条鱼垂死时发出了挣扎声。一片骤来的涟漪狭长如带，掠过了草地。直到这时，牧场上松树旁边的那棵白桦，才飘下了最后一片隔年的残叶。

“岛主”向村里跑去。

它一如既往，是从光秃秃的岬角上鲍戈杜尔所住的营棚开始巡视村庄的。这长而低的营棚像一只驳船，它早就在散发着荒废腐烂的臭味了，鲍戈杜尔住在这里也丝毫没有使它改观。造得匆忙就破得快嘛。马焦拉村有许多建筑物已经有二百年或二百多年了，至今仍未走样，而这座营棚才用了半个世纪。这全是因为它没有一个主人，每个在里边住过的人都只是一时在这里躲寒避雨，总想尽快搬到更像样的地方去。鲍戈杜尔更谈不上是主人了，尽管他根本无处可搬。

鲍戈杜尔睡在营棚靠村子的一间边屋里。他那一吞一吐，两音交响的粗重鼾声，穿过窗口和墙壁传到户外。“岛主”倾听着这鼾声，对自己那早有的预感再次确信无疑了：死神也终将在这里，在马焦拉村，把鲍戈杜尔抓走；他和“岛主”一样，也是在度着最后一个夏天了。

以前河水在这里原是一股平稳的直流，但在拐弯时从岛的突出部分逐渐冲来好些石头，于是活泼、湍急的流水就被挤到左边，而岬角后面，现在就形成死水一片，在发酵发酸了，里边满是淤泥，摇摆着水草。河水流过一程便恢复了原先的宽度，但在那里又出现了石头和沙土，并且堆积成了陡岸，村子就建在陡岸上。彼得鲁哈·佐托夫的房子首先孤零零地停在岸坡上，仿佛感到疲劳，落在后面，未及登上岸顶似的。“岛主”知道，没有哪个博物馆会来弄走这房子，就像不会弄走作了标记的别的建筑物——商店和打铁铺一样，彼得鲁哈马上就要自行处理自己的房子了。这房子发出一股特别的，只有“岛主”才勉强闻得出而又切不可闻错了的气味——末日将临时才有的那种腐朽发苦的气味。每到深夜，全村处处都冒出这种气味，但在彼得鲁哈的房前这气味更为强烈。在却难逃，大地和大地上那些默默无言的住所，开始提前做准备了。

“岛主”蹲下来，从街上把身子贴在房子那年久而坚固的木墙上。一股暗流咕嘟咕嘟地响着，沿着原木向下流动。“咕嘟——咕嘟——咕嘟，”木房呻吟着，“咕嘟……咕嘟……咕嘟……”“岛主”倾听着，听一会儿之后，安下心来，身子更紧地贴在暖烘烘的木墙上。得有人领头表示最后的虔诚，得从某人开始。世上生存着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服务。而任何服务都有个终了。

它站起来，向大路移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雕饰着漂亮花边框的低低的窗户。那窗户之所以低，并非因为木房下陷了，而是因为年深日久地面升高了。在那窗户里面，彼得鲁哈正昏昏沉沉地睡着，而在俄式炉炕上则睡着他的母亲卡捷琳娜，虽值盛夏，她却还烤着她那把老骨头。卡捷琳娜呀，卡捷琳娜……有谁能告诉你，为什么有出息的人会生下没出息的孩子？可以自慰的只有一样：你快活到头了。

在村舍开始栉比鳞次连成一片的地方，“岛主”放慢了脚步，时时停下来，嗅一嗅，听一听。它是不害怕的：无论是狗还是猫，都嗅不出它的气味。它不愿疏漏昨夜起这里可能发生的变化。昨天，直到破晓之前它才决定进村，但就在那时，老年人仍旧没有睡，仍在长吁短叹着，苦苦地熬着，他们被坟地事件弄得惊恐不安和疲惫不堪，正怀着希望和恐惧等待着惩罚呢。可是今天，村里好像都平静入睡了。

村子进入了梦乡：狗不再像昨天那样吠叫了，门不再吱扭吱扭地响了，屋里也不再发出微弱的惊慌的声息了。村街上一片灰暗，空旷而寂静。一座座窗口泛白的木房静静地伫立着，不透露一丝的生气；但是，当“岛主”靠近哪一座时，哪一座就放声发出一阵悠长而耐心的叹息，表示它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感觉得到，对什么都准备好了。这些房屋中也有并不算老，二三十年前

才盖的，还没发黑，还没下陷；可是它们也都恭顺地和大家排在一起，也知道自己末日将临，在这个短促的夏夜中又向那末日迈近了一步。这些房屋就将这样石头一般忍气吞声地走向它们当初分别于不同时刻被注定的同一末日，并将同样忍耐着走向刑场，而在永别之际要显示出，它们体内有多少热量和阳光，因为火——就是被吸收、贮存于体内，尔后又被强行提取出来的阳光。

夜越来越深了，但照旧是幽暗的，没有阴影。从近处的水面上，一阵阵波浪似的涌来积存已久的潮气，而当这阵浪似的潮气一落，则又升起一股充满着荒芜和腐烂味道的强烈干燥的气息。“岛主”每当跑近屋宇时就感到，木头白天吸足的热气正在消散，不过今天这热气却散得比较迟缓，比较微弱——对了，明天太阳不出来了。

马焦拉村在沉睡。老太太们在做着一些令人惊慌的乏味的噩梦，这些噩梦已经不是初次光临她们的脑海了，但这一点老太太们却并不知道。只有在夜间，活人才离开尘世之岸，与死者进行交往——有血有肉、言谈生动的死者时常来找他们询问真情，以便把它传得更远，传给那些他们还记得的人。活人在没有知觉、没有约束的状态下讲出许多话，可是一醒就记不得了，于是就为刚刚隐去的那些虚无的幻影寻思些意外的谜底。

此刻，这些梦有如远在天边的闪光，在窗户里面荧荧闪烁着。仅凭这些反光便可得知，哪里有人，哪里没人。这一夜谁也未免做梦：因为老太太们一直在议论着最后的日子，沉痛地怨诉着。

“岛主”从头到尾跑遍了村子，在街尾向左转，朝高耸于水面之上的光秃秃的河岸跑去。站在这里视野更为开阔，放眼苍茫的天地之间，层次分明地闪现着暗淡的远景。在下游的浅滩里，

河水像玻璃一般地闪闪发光，也像玻璃似的叮咚有声。安加拉河滚滚流荡，弦乐一般慢悠悠地淙淙作响；这淙淙水声在岛子中间分成了两股，有如琴弦两根分别悬在两侧水面之上，直到河水重新汇合，它们才又合拢起来。“岛主”喜欢倾听这真切的汨汨流水声，这水声白天被别的嘈杂声所淹没，夜间却显得纯净而清晰。这声音使它飘然进入永恒的境界，进入万古不变的常轨。但“岛主”懂得，这声音不久即将中断，在这荒凉的水面上将只剩下呼呼的风声。想到这里，“岛主”便转身向岛子的中部跑去了。

夜像是停止前进了，它已不再横越安加拉河而漂向归途，却是尽量凝聚起来，在马焦拉岛上空盲目而小心翼翼地盘旋不止。微风忽东忽西地乱窜，但一松劲儿，睡着了，便跌落下来，陷进草丛。草地湿润喷香，“岛主”于是断定，明天傍午将有阵雨。

岛子继续按照常轨生活着：庄稼和青草在长高，地下的根须在伸长，树上的叶子在加宽；正在谢花的稠李树泛出香味儿，草木蒸发出潮湿的热气；右岸的灌木窃窃私语着倾身于水面；夜间活动的小兽和飞鸟正在捕食。

岛子正打算长久地生活下去呢。

七

虽然时光像是没完没了，漫长而过得缓慢，可是叶戈尔大叔预定离开马焦拉的期限来得却是那么快，这最后的两个星期，真是转眼之间就不知什么时候溜到什么地方去了。三一节之后纳斯塔霞又拖了三天，现在这三天也过完了……

出发之日定在星期三。也许，哪一天离开并没有任何差别，可是不知为什么总相信，最好是在一个星期的正中间儿出发，以

求某种好运有朝一日再把他们送回到此岸来。纳斯塔霞比较喜欢星期四,觉得这个日子吉利些;不过星期四更接近周末,也就是说,更接近彼岸,更接近另一种生活,从那儿再回来就更难了。

纳斯塔霞一夜没睡,一直点着油灯——早在春天马焦拉村就断了电,供电的机器被运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马焦拉村民重新点起了煤油灯。况且这最后一夜又怎么能睡呢?哪儿有闲心睡什么觉呢?哪儿来那份闲情逸致酣然入梦呢?她一会儿想起忘了这样,忘了那样,便急着去找,又找不到,就一边哭诉着三番五次地搜遍屋角,搜遍穿堂间和储藏室;她端着蜡烛走进仓房,解开、摊开已经打好的包袱,终于发现了失落的东西,便马上又张罗起别的事来。即使什么也没丢失,也还是走来走去找呀找的,生怕丢下什么少了不行的东西。屋子里空荡荡的,回声很响。纳斯塔霞的脚步像是踏在白铁皮上似的,在四壁之间荡起回声,没有掩上百叶窗的玻璃窗,应着脚步声如怨如诉地一阵阵叮咚作响。还有,不关百叶窗,是为了免得睡过头错过天明,也就是说,免得走迟了。哪里还会睡过头呢?睡过头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更不要说这一夜了!

纳斯塔霞在手忙脚乱中曾不止一次地目瞪口呆:她这是在哪里?在家里还是不在家里?光秃秃的四壁,壁上取下了挂照片的镜框,因而留下一处处白斑,两扇窗户间的墙上,镜子留下了一大块圆痕;光秃秃的隔扇,空荡荡的地板,敞开的大门,炉炕上卸下了幔帐的帐架,空空的衣架,空空的屋角——周围是一片空荡荡、光秃秃、被遗弃的景象。在外室中央堆积如山的,是一只包着铁皮的大木箱,加上旁边的三个大包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产了。只有窗户上还都挂着窗帘。起先纳斯塔霞把它们也摘下来了,但看到房子一丝不挂怪难看的,她受不了,又把窗帘挂上去了。然后又拿出一块旧的长条粗地毯,也在门口儿原地

铺好，一边亲热地说道：“亲爱的，你也要去城里换换生活吗？你原来躺在哪儿，就留在哪儿吧，留在家里吧。你已经用不着我和叶戈尔啦，你应该留在自己家门口儿。就这样吧，你呆在这儿吧，以后谁也不会再碰你一下。你往后就像退休一样了。”接着，她几乎摸到什么，就要对什么说上一大堆话。“你就和我们一起去，一起去吧，不用藏着了。我不会把你留下，少了你我就等于少了双手。你也别求了，我不会留下你。我自己也想留下呀，可是不行”；“哎哟，把你可全给忘了，你也钻进去吧，这里有地方装你。钻进去吧，钻进去吧”；“我倒是很乐意的，可怎么办呢？怎么带你走呢？带走好是好，就是办不到。你留下吧——有什么办法呢！我还回来呢，咱们还能见面呢”。

纳斯塔霞打算九月份回来刨土豆。

叶戈尔大叔时而疑惑地看着老伴儿：从三一节起，她没掉过一滴泪，好像真的终于明白——哭也罢，不哭也罢，反正得走，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而在三一节以前，她总是眼泪汪汪的，老是抽抽搭搭地哭，越是临近离家的日子，越是哭得厉害。她常常会做着做着事就停下手来，望着、盯住叶戈尔——叶戈尔一转过身来，她就说：

“也许，咱们还是别走吧，叶戈尔？也许，还是留这儿？说留下来就留下来才好呢……”

“去你的吧，该死的女人！”他气呼呼地说，“你这啰啰唆唆的有完没完？！谁需要我们在这儿？谁需要？”

“可我们在那边怎么过呀？……”说着她便声泪俱下。过了一两个小时，她又唠叨起这一套来。

一个星期以前，今年夏天第一只给浮标看守人供应商品的售货船靠了岸。叶戈尔大叔一听说便跑了去，买了点马合烟丝和两瓶不烈的酒——红酒。过节时开了一瓶，两口子——也就

是全家——相对而饮了。叶戈尔大叔似乎是在竭力不动声色地提前疏远马焦拉，提前养成过孤独生活的习惯，所以近来开始规避旁人，总是呆在家里不出门。纳斯塔霞喝了酒，变得随和起来，她那毫无顾忌的脑袋里想到了什么，便说：

“叶戈尔，咱们就到那边互相守着过日子去吧。现在还能……往哪儿去呢？”

“早就该明白了，”叶戈尔高兴起来，但不太相信老伴儿的情绪，一边寻思着她这明白能不能持久。

“咱们的孩子们没了……现在还上哪儿去找呢？”她沉思着温顺地说。“咱们俩在一块儿……也许没关系……在那边想必也有人的。不熟悉怕什么？会熟悉的。不——还是两个人过。往后怎么办？……你别哭了，叶戈尔……”

对这些事叶戈尔也就听其自然了：只要离开时心里轻快些就行了。就从这次起，泪珠像是被一刀砍断了似的不再淌了。纳斯塔霞只有在忍不住的时候，才仰起她那浮肿的大脸盘儿来望着老伴儿，咬着不禁颤抖的下唇，反复说道：

“你别哭了，叶戈尔，往后怎么办呢……也许没关系……”

他们在马焦拉村度过的最后一夜过去了。最后一个早晨降临了。纳斯塔霞在黎明时叶戈尔喊她之前，才刚刚把绒衣铺在木箱上，匆匆地躺下，她还没睡着，甚至还没有一点睡意，就又起身了。叶戈尔还躺着。纳斯塔霞走到户外，站在台阶上。她晒着初升的太阳，环顾四周，看着眼前自己的马焦拉，马焦拉村和马焦拉岛，然后叹了口气，想了一想，便抱了一大抱劈柴回到屋里，生起俄式火炉来。叶戈尔听见了，便埋怨起来：

“你这个老婆子，好像是真发疯了吧？”

“不，叶戈尔，应该再最后生一次炉子，”她连忙反对说，“让它暖暖和和地留下吧。只要拨动拨动，它就着透了。还能着很

久吗？这就不管了。怎么能人走留下个冷炉子呀。你怎么搞的，叶戈尔？！”

于是她生了火，热好最后一顿饭，然后把炭扒成一堆。

天气好极了，老两口离别马焦拉岛这天，凑巧风和日丽，晴朗、干燥的长空里没有一粒尘屑，没有一丝云影；太阳明晃晃、暖烘烘的。上游刮来的微风作美，它轻拂而过，未及掀起波浪，就又平息下去，是此刻一片寂静使它倦了；河面上涌起一阵波纹，随即展平了。从清晨起，在明亮夺目的阳光下，周围的一切都铿然作响，光彩熠熠，各种细小的东西都历历在目，一览无余。马焦拉的大地上——树林里，田野间，河岸上——一片繁茂丰盛的景象。岛上郁郁葱葱，安加拉河汹涌奔腾。这正是尽情生活的大好时节呀，放眼四望，正可以赏心悦目，预测丰年——粮食、蔬菜、浆果、磨菇、各种各样有用的野生植物，都丰收在望。于是就盼着割草，然后盼秋收，一边不慌不忙地为割草秋收做准备，一边不慌不忙地捕捕鱼，就这样从容不迫、日复一日地干着活儿，一直到迎来秋收大忙季节——原来人们就是这样生活了许多年，他们却并不懂得，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

他们喝了一会儿茶——是纳斯塔霞最后一次拿茶炊烧的。但这茶喝得很仓促，没有尽兴，因为两口子都急急忙忙的，没时间久坐。纳斯塔霞倒掉喝剩下的开水，抖掉炭灰，把准备带走的茶炊放在靠近门口的地上。叶戈尔从屋檐下推出小车，他俩就去推箱子，使劲拼命一抬，住了手——抬不起来。叶戈尔大叔不知所措，发起狠来——在这里也就罢了，总有人帮忙，到了那边可怎么搬呢？一气之下便吩咐把桌子腾出来，虽然起先打算最后才运它呢。除了这张桌子，他们随身带走的家具有：一张可以拆卸的钢丝床，两只方凳和一个小碗橱。留下的是：鸡笼、板凳、木床、另一张桌子、俄式火炉、地下室、门。仓房里、院子里、平底

大船里、地窖里、畜栏里、草棚里、穿堂间里、木板吊床上，还都留着许多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全都是父辈和祖辈传下来的，在这里时刻都少不了，到那边马上就没用了。炉叉、炒菜锅活把儿、发面桶、搅拌棒、铁锅、树皮篮、陶壶、双耳木桶、直木桶、桶形木杯、钳子、织布机……还有：干草叉、铁锹、耙子、锯子、斧头（四把斧头只带走一把）、磨刀石、铁炉子、小车、雪橇……还有：捕兽器、猎用圈套、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工具。一样样地说起来，真让人心如刀绞！这些东西既卖不出去，也送不出去，家家都是一样发愁：自己的东西怎么处理？扔了可惜，带着这些旧家什又进不了大洋楼，况且带到那边也没用处。纳斯塔霞什么都舍不得，什么都往行李堆上放。叶戈尔大叔就喊起来：

“往哪儿放？往哪儿放啊？我的老太太。”

“不，叶戈尔，你瞧瞧，好好儿的一只木盆，还像新的呢，可以盛水用。”

“哪儿拿来的，扔到哪儿去吧，不许再动它。盛水……你盛水干吗？”

可是他自己却把一枝猎枪——旧的、图拉造、口径十六毫米的——带走了，而且还带着所存的全部弹药，尽管他那么大年纪进了大城市猎枪有没有用，也是值得怀疑的。但猎枪就是猎枪，这可不是木盆，无论什么甜言蜜语都不能使他跟猎枪分手。纳斯塔霞则照样也不想扔下纺车。叶戈尔大叔一见她把纺车拿在手里，又喊起来：“拿到哪儿去？”但纳斯塔霞却断然拒绝说：

“不，叶戈尔……到时候还要纺麻呢……怎么能没有纺车呢？”

“去你的吧，该死的女人！你那个麻无论在纺车上还是在纺车下，往后都是一回事了！你上哪儿弄麻去？”

“不，叶戈尔……”纳斯塔霞固执己见，抱着纺车不放。

她把纺车跟桌子一起放在小车上，第一趟就运走了，纺车上面还压上一个包袱。叶戈尔大叔把小车推到岸边，那里正停着跟浮标看守人借来的一条载重大船。老两口就要乘这条船到波德沃洛奇纳亚靠码头，等傍晚客轮开来，就把船给当地那位浮标看守人留下，换乘客轮继续前进。达丽娅的儿子巴维尔·皮尼金也曾向叶戈尔大叔表示，愿意用小汽艇把他拖到码头，省得他自己划船，但大叔谢绝了：

“过安加拉河嘛，就由你来拖吧，然后我们就自己划了，我们何必着急呢？我们慢慢地划着去换轮船。最后一次多看看安加拉河也好啊。”

叶戈尔大叔刚推走小车，达丽娅就来了。她在院子里停下脚步，怜悯地倾听了一会儿，察看了一番，这才登上台阶，小心翼翼地伸手拉门。

“纳斯塔霞！”她唤了一声，不知纳斯塔霞在不在家。

“没关系，没关系，达丽娅，”纳斯塔霞应声说道。“你进来吧，我和叶戈尔要走了。那边有人……”

“都收拾好了吗？”达丽娅边进屋边问。

“是啊。可叶戈尔总是哭啊哭的，不想去。我说：‘你别哭啦，叶戈尔，别哭啦……’”她的眼睛盯住达丽娅，好像直到此刻才认出她来似的。接着，纳斯塔霞颤栗了一下，便不作声了——这就是说，她完全清醒了。“没什么，达丽娅，”她负疚地低声说道，“你看见了……就这样……”她于是指指地上的包袱，指指光秃秃的墙壁，让人知道，她本来很乐意不变心，但却未能做到。她哀求说：“达丽娅，你可别老想着我的不是……”

“你对我也是一样……”达丽娅喉咙哽了一下，用头巾擦着眼睛，向纳斯塔霞赔了不是，请原谅在她们长期为邻以来自己对不住她的地方。

“我们有过孩子，你记得吧？”

“怎么不记得？！”

“可现在到哪儿去找他们呢？光剩我们俩了。我对叶戈尔说，‘咱们走吧，叶戈尔，没什么盼头了，走吧’，可是他……”

她说不下去了，颓然坐在板凳上。达丽娅走过去，坐在她身边。坐在这空荡荡的、破败的木房里很不自在——坐在这弃而待焚的木房里感到有罪，感到痛心。可帮忙又帮不上，没有法子帮忙。看见墙壁失去光彩，窗口射进再也无人享用的阳光，真令人难受。

纳斯塔霞想起了一件事，说道：

“我有件事想求你，达丽娅，差点没忘了。你把我们的纽尼亚抱过去吧。抱过去吧，达丽娅。”

“还有什么纽尼亚？”

“我们那只猫。你记得我们那只猫吗？”

“噢。”

“它刚才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我们一准备上路，它就跑出去没回来。你就把它抱过去喂着吧，等我回来。”

“我自己就已经有两只了。安菲莎也是扔到这儿一只就走了。我往哪儿搁它们呀？”

“不，达丽娅，纽尼亚可应该收下，”纳斯塔霞焦急起来。“纽尼亚是只温顺的小猫，这样的猫你可没有。我本想把它带走的，依着我，怎么也不扔下它，可叶戈尔却说：不让带上轮船。万一真的不让带——纽尼亚就完了。你一点也用不着为它操心，它什么也不吃，除非你什么时候扔给它一点吃……”

“上帝呀……把自己的纽尼亚送来了……要碰上，我就养着，碰不上——就随它去。跑遍全岛去找它，我可不干。”

“不用找，达丽娅，它自己会回来的。它自己什么都知道。”

那么懂事的一只小猫。你一看见它,就会想起我。它就等于是我留下的纪念品啦。等我以后回来,再把它带走……我不在的时候给喂喂,只要不饿死就行了。”

“你真的还要来?”

“我们没有土豆怎么活着啊?嘿,要是冬天还死不了,怎么能没土豆呢?”纳斯塔霞这话好像是在说给第三者听似的。接着,她嗓音岔了声,呻吟着对达丽娅说道:“哎,到那边还过什么冬天!我看往后一天活路也没有了。哎,达丽娅……”

叶戈尔大叔推着小车辘辘地响着回来了。两个老太太便站起身来。又开始抬箱子,这次已经是三个人合力抬了,又放下了——力气不够。达丽娅只得喊了声巴维尔。他来了,惊奇地扫了一眼那罕见的木箱——这箱子是不适于旅行携带的,从前打好了放在一处便永远不再移动了。不过巴维尔没有吭声,这话没对老人们讲。直到后来他们吃力地将箱子装上车,捆好了,他才劝告说:

“叶戈尔大叔,你到了波德沃洛奇纳亚,立即找米什卡,可别一个人拼命硬搬哪。”

“一个人怎么行……”大叔挥了下手。“累出疝气来也搬不动啊。她东西塞得太多了,傻瓜,”叶戈尔大叔想把搬不动箱子的罪过推到纳斯塔霞头上。

“没关系,叶戈尔,没关系,”她话也没听清就说,一边向什么频频点着她那个大脑袋,四下张望着,似乎还在搜寻什么东西。

巴维尔推着箱子,叶戈尔大叔在一旁走着,抓住箱上的铜环,免得滑下来。巴维尔又帮助运完了其余的东西,全都装上船,然后把船推下水,检查了船的载重能力——足够。他们又把小车推回来,叶戈尔大叔将它停在屋檐下,小心地把车辕放到地上,但想了一想,不知为什么又把它抬了起来,靠到墙上。

已经卖给维拉·诺萨列娃的几只母鸡，咕咕不停地叫着，在院子里漫步。有三只鸡已经宰了：两只早就吃了，一只炖好准备路上吃。这四只羽毛鲜艳的活鸡，维拉花十个卢布买了下来。瞧它们糊里糊涂的，又跑回自己的院子来，不晓得现在这院子已经是人家的，并且只等一死了。那头小母牛一百三十个卢布交售给国营农场了——他们发了财——不然往哪儿搁它呀！小牛放在波德莫加岛上吃草呢，这倒也好，眼不见为净嘛。现在一切都了了。这辈子没游手好闲，总算还有一些家产——都装上船了。连这些东西也要化为灰烬的，只有这条路。

屋子里人多起来了。卡捷琳娜来了，西玛也带着孩子来了。她们坐着，默默无言，神情抑郁，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两眼一直盯着在继续满屋东搜西查的纳斯塔霞。她仿佛老是在找什么东西，神魂不定——下不了走的狠心。当叶戈尔大叔和巴维尔进来时，老太太们惊骇地颤栗了一下，屏息不动了，听候着最后一道命令。但叶戈尔大叔却拿出从售货船上买来的第二瓶酒，跟巴维尔从厨房里抬出桌子，摆在长凳旁边。还不动身呢，这使老太太们感到高兴——她们就又欣然地活动起来，松了一口气。纳斯塔霞比谁都更高兴，她兴高采烈，哈哈一阵大笑，接着就讲起今天俄式火炉最后一次生火的情景。

酒杯仅有两只，领先举杯的是巴维尔和叶戈尔大叔。

“告别酒，是吧？”巴维尔犹豫地问道。他觉得还需要讲点什么，于是补充说：“祝你们长寿，叶戈尔大叔，纳斯塔霞大婶。”

“会活——下去的！”叶戈尔大叔尖声尖气的挤出这句话来。

巴维尔喝完酒就出去备船了。老太太们又沉默起来。她们锁起眉头，像喝茶一般小口小口地喝下这杯酒。这杯酒勾起了痛苦，但这痛苦又为她们压住了另一种痛苦。叶戈尔大叔也站起身，在老太太们的注视下点着了烟，临出屋时提醒说：

“别拖太久了，街坊们，该动身了。”

老太太们开始涕泪交流，纷纷开口在纳斯塔霞面前赔不是，可是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了她，什么地方没得罪她，却不知道——这种捉摸不定的罪过，是尤其需要求饶的。纳斯塔霞既没听见也没明白，却一个劲儿地点头称是；既然什么都已经被浪卷走了，被风刮走了——还有什么必要去数岸上的石头呢，它们都在岸上。

“茶炊你也随身带走吗？”西玛指着门边擦得干干净净、喜气洋洋的茶炊，问道。

“怎么不带走？”纳斯塔霞点着头答道。“又压不死人。我没给叶戈尔用车推走，我要自己端走。离家的时候不能包起来，到船上我再包。”

“为什么不能包？”总该有点讲究，听有人说过的。

“让它看见，要到哪儿去。这是吉兆。”

“对咱们来说，现在什么兆头都不灵了，”达丽娅说。“对他们来说，咱们这些人都是废物。最好有人能灵机一动弄个明白，是不是真会给哪一个女人把茶炊放到棺材里去。到那边我们怎么能没有茶炊呢？”

“到那边你要它干什么？”

“喝茶呗，还能干什么？”

“我和叶戈尔要走了，”纳斯塔霞打断了在她看来是空谈的谈话，说。“也许没关系……马上我们就走了，东西都运到河边上去了。”

叶戈尔大叔像是经过窃听，终于抓住了时机似的，敲起窗户来，表示该动身了。

“好，走了！”纳斯塔霞高兴地慌张起来，带头一跃而离开桌边，“我正说着呢……咱们走吧，走吧，叶戈尔！”她大喊了一声，

好像突然改变了主意，害怕什么似的：“等我一下，叶戈尔，别走。”

她端起茶炊奔到门口，又向老太太们转过身去，无声地恳求着催她们赶上去。达丽娅站起身来，庄重地对着空无所有的屋角划个十字，卡捷琳娜紧跟着她也朝那边画个十字作别。她们止步不前，对纳斯塔霞有所期待，期待她遵照在这种场合下应有的礼仪行事，可是她却全然张皇失措了，什么也没想到，什么表示也没有。她在台阶上把茶炊放到墙边的老地方——它一向是被放在那里烧水的。等老太太们好不容易走出屋来以后，她手忙脚乱地锁门，钥匙半天插不进锁眼儿，终于锁上了，用的是一把挂锁。她转过身来一看——叶戈尔已经快出大门了——便竭尽全力大喊一声：

“叶戈——尔！”

他一时停住了脚步。

“叶戈尔，钥匙放在哪儿？”

“扔进安加拉河，”叶戈尔大叔说着，啐了一口唾沫。

他已不再耽搁，迈步走进一条小巷。就像有的人有时会聚精会神地跨出每一步，并且记住每一步那样，他专心致志地挪动着脚步。纳斯塔霞抱怨地扭过脸去，不解地望着他的背影。

“留在这儿吧，”达丽娅用头巾捂着嘴，免得失声痛哭，从纳斯塔霞手里接过钥匙，紧握在掌心里。“放在我这儿吧，我会常来看看的。”

“你把大门关上吧，”纳斯塔霞没忘这件事，她仿佛是在微笑或是在冷笑。她那张脸像是被遗忘、被遗弃了似的，忽左忽右无精打采地耷拉着。“不然牲畜会跑进来，满地拉屎撒尿的，准会这样。”

“我就住在旁边，我会天天来看的，你别挂念了。”

“那我跟叶戈尔走了……”

……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来，但纳斯塔霞和叶戈尔乘船离开马焦拉岛时，毕竟还是早晨。太阳炽烈地照射着，岛上的绿色清淡了，水底的岩石透过水面五颜六色地闪闪发光。安加拉河在嬉戏着，闪烁着一条条火热夺目的光带。几只雨燕吱吱叫着俯冲下来，扑进这条光带，消失在水面上一片灿烂的金星里。在水流清澈的地方，明朗的高空深深地映入水中，安加拉河浪花腾空，铿然有声（它就是想腾空而起呢，那它就可以得到超升了）。

载着东西的船停在汲水的踏板旁边。老太太们跟在纳斯塔霞后面下岸，走到石滩上。从高高的陡岸下已经看不见村子了，也听不到濒临安加拉河的马焦拉的声音了。纳斯塔霞将茶炊放在船头，又回来跟老太太们惜别。她们已经不禁呜咽起来。西玛的小外孙看见她们哭，也吓得哇哇大哭。纳斯塔霞向老太太们一一伸过手去——她不会以别的方式告别——她抖动着脑袋，反复地说着：

“没关系，没关系……也许没关系……”

叶戈尔大叔在催她了。

纳斯塔霞望着脚下，像是挥开什么似的挥动着一只向后伸去的手。她登上了踏板，再次地匆匆回头看了一眼，便跨上船去。

“叶戈尔哭——了，哭——了……”她指着老伴儿说起来，随即又不作声了。叶戈尔大叔朝岸边转过脸去，对着马焦拉向右、左、中三面深深地三鞠躬。然后迅速地把船一推，就跳上去了。

“纳斯塔霞！纳斯塔霞！”老太太们喊着。

“没关系，没关系，”纳斯塔霞挺身站在船上，双手挥泪，喃喃地说着。突然，她仿佛腰断了似的，倒在包袱上哀号起来。

叶戈尔大叔急忙操桨撑船离岸。巴维尔驾着汽艇正在那边

水深的地方等候他们呢。当流水涌起小船时，叶戈尔大叔把拖索甩给巴维尔，巴维尔就发动了马达——老两口坐的船被猛然一拖，拖走了，它沿着安加拉河顺流而下，越来越快，越走越远。

在转弯的地方，马焦拉村再度显现出来，不一会儿就又隐没了。

八

这一夜，马焦拉岛上这第一个炽热、通明的夜，终于降临了。往后，在临近九月底的时候，这样的夜还多着呢。那时将夜夜火光冲天，安加拉河两岸因而远近通明，仿佛是特意点起漫天大火，欢送着河水流去似的。但这一夜是第一夜，它之降临马焦拉岛，比后来这样的夜要早得多。

这一夜，彼得鲁哈家的房子着火了。彼得鲁哈始终在场。他尽管手忙脚乱，却仍然想到记下了时间，事后告诉村里人说，这幢年久干燥的好房子烧了两个钟头。村里很少有人怀疑，都认为房子突然起火，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彼得鲁哈自愿放火烧的。在这之前，他不知外出上哪儿去过，听到了什么风声，一回来就吩咐母亲卡捷琳娜老太太搬家，似乎一两天内博物馆就要来收他的房子了。搬家，也没啥特别的东西可搬。彼得鲁哈是那样一种阔佬，搬起家来就好比到澡堂去洗澡一样便当。奶牛两年后就卖掉了，最后一头小家畜——一头小猪，四月间家里全然断炊的时候也给宰了。卡捷琳娜老太太拾掇起她那简简单单的什物，抱到了达丽娅家。正好是在失火前那个白天抱去的。那天彼得鲁哈喝醉了，非要她走不可，差不多是硬逼出去的。卡捷琳娜为了免得惹气，免得跟他一块儿丢人现眼，就离开了。达

丽娅早就叫她到自己家去，劝她，说她们俩一块儿打发在马焦拉岛上剩下的日子会感到轻松些。确实，老太太们如此这般地成天价凑在一起围着达丽娅转，心里是感到快活些。达丽娅也跟别人一样，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但她比较沉着，比较严肃，儿子尊重她，儿子在国营农场里是数得着的。等水淹之后，她有地方安身落脚，甚至还有挑选的余地，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此外，达丽娅性子刚强，尽管上了年纪，骨气不减当年。遇上个什么事，不但能为自己，也能为别人挺身而出。我们这儿每一个村子里，一向总是有一两个性子刚强的老太太。那些软弱的、受苦的人都要她们庇护。而且，总是这样的老太太一旦衰老，一旦死去，马上就会有另一个正好上了年纪的老太太，靠她那刚正不阿的性格，在人们中间站稳脚跟，填补前人的空缺。在马焦拉目前这种特殊情况下，达丽娅对老太太们是爱莫能助，但她们还是到她家来，聚在一块儿，为的是跟达丽娅在一起就会感到胆壮一些，安全一些。谁都知道嘛，大伙儿在一起，死也无所惧。倘若有人要她们肩靠肩地同时死去，未必有一个人会走开去考虑考虑——她们会欣然同意领受这最后的乐趣的。

这一夜降临之前，马焦拉早就安静下来了。晚间的活动通常都是青年人的事，可是在马焦拉村，除了国营农场回来的，已经没有青年了。天还亮着，人们就上了床，此时，光明正慢慢地退向安加拉河对岸太阳落山的地方，渐渐地暗淡下去。眼下是个混乱的时期，不像正常人过的日子：一方面，很乐意把夏天留住，延缓那日益迫近的前所未有、前所未见之事的到来，另一方面，却又受不了，希望尽快设法结束这种闷人的生活——这既不像居家，又不像做客；不知是醒着呢，还是在做着漫长的噩梦。人们像往常一样，早早上床了。卡捷琳娜是头一回离开家，虽然早就安排停当，对离家有精神准备，对大搬家之前的这次小搬家

也早有预感,但她仍然感到极度伤心和难过,讲什么话都觉得不合适,不必要。达丽娅理解她,没有说话惹她心烦。薄暮时分,鲍戈杜尔来了,但跟他也没的谈。大伙儿时而骂上几句,时而嘟哝几句,免得总是不吭声。达丽娅把这老头儿给打发走了。她将自己的被子铺在俄式炉炕上边,不论冬夏,她多半是越过炉栏爬到炕上睡觉;卡捷琳娜则睡在临门屋角的木床上。巴维尔回来的话,还有一张木床可睡。

两人上了床,安静下来。卡捷琳娜不知道自己是已经睡着了,还是做着无望的祷念刚要飘然入梦——这时突然有人咚咚地敲窗子,紧接着又敲起门来。鲍戈杜尔(一切不祥的消息都是鲍戈杜尔报告的)在门外拉开嘶哑的嗓门大喊:

“卡捷——琳娜!”接着是习惯的骂娘话,他要不骂娘,嘴里就吐不出一句正经话来。“卡捷——琳娜,着火啦! 婊——子! 彼得——鲁哈!”

两个老太太一跃而起。正对马焦拉村靠上游一端的两扇窗外,无数的火蛇不住地飞舞着。那火看起来那么近,达丽娅一醒顿时惊恐万状:

“上帝呀! 这是我们吗,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卡捷琳娜立刻就明白了。她一边手忙脚乱的穿着衣服,一边暴怒而又无力地声声喊叫着,仿佛正用头撞墙呢,她呼唤道:

“啊,魔鬼呀! 啊,魔鬼呀! 我早料到啦! 我早料到啦! 圣母呀!”她拔腿就往那边飞跑过去——跑回家去,跑回傍晚时还是她的家的地方去。鲍戈杜尔起先匆匆地尾随着她,但在半道上拐了弯,到村子靠下游的一头去唤醒全村的人了。

等卡捷琳娜奔到时,房子已经整个被烈焰吞没。没有一点抢救的可能了,再说也没有这个必要。人们默默地站着,目不转

睛地盯住火。只有彼得鲁哈一个人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竭力想告诉大家他差点儿没被烧死，他“因为肺里呛了烟，头发发烫——头发都吱吱响起来”，这才在紧急关头醒了过来。“要不就完蛋啦，”他反复地讪笑着说，“那会烧得连骨头都剩不下，那我身上就啥也找不到啦，”——他挺着脖子，观察别人的眼色：相信不相信他的话呢？人们像躲避鼠疫患者似的避开他。其实，彼得鲁哈压根儿也不大指望别人相信。他了解村里人，知道村里人也了解他的五脏六腑。正因为这样，他才犯下这种不由自主的罪过。“傍晚我把炕烧热就躺下睡了，”他喋喋不休地作着谁也不需要的解释，“兴许是一块该死的炭火蹦出来惹出的事。”于是，他又从头诉说他是怎样得救的。他本人可能被烧死，只是靠了奇迹才得安然脱险——对他来说，只有这件事才是大事。他对这一点确信无疑，甚至还一边说一边挤出几滴眼泪，嗓音也不住地颤抖——借以造成真实感。这时他把炉炕和炭火的事又忘了，却威胁说：“我要知道是哪个混蛋划的火柴，我就……”他两个拳头相对磨磨擦擦，就跟磨刀似的。要么是这大火使他陶然欲醉，要么是从傍晚起他压根儿就没醒过酒来。总之，他看上去昏昏沉沉的，走路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他头发蓬乱，邈里邈遑，穿着一件背心，背心的一侧从肩上滑落下来；他还穿了一双靴子——穿双靴子抓紧一点毕竟是来得及的。此外，彼得鲁哈还赶着从火里扔出了一些东西。地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一条满是补丁的棉被，一块旧木板和那架外号“山麓”的手风琴。这架手风琴在彼得鲁哈手中只会伴奏一支歌：“你哟山麓，你哟山麓，广阔的大路，谁也不从你这儿走，不管是鸡公还是鸡母……”。彼得鲁哈老是抓起手风琴挪来挪去，躲开火场；围观的人也都时时后退着避开火烤，但并不散去，一双双惊慌不安的眼睛想看个究竟，弄个明白，始终盯住火。

全村留下的人，甚至孩子们，都到这儿来了。但就是孩子们也不再像往常那样吵闹了；他们被火的可怕的威力所慑服，中了魔似的呆立着。老太太们神色严峻而悲哀，她们没有站在一块儿，分别站在不同的地方——从哪边儿跑来就站在哪边儿。她们那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一反常态，在火光下像是泥塑木雕，那长而难看的身影不住地跳跃着，弯曲着。卡捷琳娜一跑过来，就放声大叫，哭诉起来，双手伸向燃烧着的房子，号啕大哭着不住地朝房子弯腰点头。人们回头看她，打听她是谁，凭什么大喊大叫。问清楚了，默默地表示了同情，便又在呆呆的沉思中凝视起火来。达丽娅从黑暗中钻出来，站在卡捷琳娜身旁。于是，别的人因为有达丽娅在旁边心里就踏实了。必要时她会就近拉卡捷琳娜一把，那么他们自己就可以站在原地不动了。但是卡捷琳娜在人们这种可怖而专注的沉默的影响下，也很快就不再吭声了。她抬起头来，目光就此再也没有离开她那所房子，从童年起，这里就是她的家。

人们忘了他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的人。他们彼此失去了联系，此时此刻，他们都互不需要了。事情总是这样：遇到不愉快、令人羞愧的事，不论有多少人在一块儿，每个人都尽量不去注意别人，而使自己保持孤独——这样，事后便可以较容易摆脱羞愧。他们心里很不好受，很不自在，因为他们站在那里而不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在房子还有救的时候根本不想办法抢救。也没有必要想办法了。别人的房子也要遭到同样的下场，而且快了，彼得鲁哈的房子带了头儿。因此他们就看呀，看呀，对眼前的情况一点儿都不忽略，以便预见此后的情况——对于死人，活人也是这样聚精会神地盯住细看，竭力提前想象出自己必将陷入的那同样的处境。

这场火没受任何干扰，清清楚楚地亮明了他们每一个人的

命运,那没人前来共同承受的、近在眼前的命运,以致对身边的人人都难以信任了——这真像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啊。

火焰吞没了房子,盘旋着腾入高空。火势猛烈而均匀。熊熊的烈火通红灼热,吞没了一切:墙壁、屋顶、穿堂间——迸射出一块块烧焦的木头,喷溅着火花,迫使人们不住地后退;玻璃在碎裂着,熔化着;凶悍细长的火舌呼呼地响着,有力地抽打着窜出屋来,活似有人在哗哗地往火上泼油。烈焰腾腾遮蔽了夜空。这炽热不祥的火光照彻远近四方——火光中闪现出附近沿街的木房,这些木房由于有一道道火光满墙滑动,也仿佛是在燃烧;这炽热不祥的火光也照亮了岸下的安加拉河河面,那流水通明的地方,看上去像一大块绽开的伤口血肉突突地搏动不已;大路那边的山岗,随着火光的一明一灭而在黑暗中时隐时现,似乎变成了棕褐色被烧光的一片。在燃烧着的墙壁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塌落,在爆炸似的砰砰作响;通红的炭火飞出窗外,无数的火星儿腾空而起,四散飞舞,消失在繁星之中;火苗在上空滋滋地响着化作一缕轻烟。屋顶上,一块薄木板,黑黑的,烧成了炭,但还在燃烧,突然在火中竖立起来,向村子那边一弯——那儿,那儿也要遭到火烧了,瞧着吧!几乎就在这同一瞬间,屋顶塌了,火焰坠落了,上面燃烧着的原木一根根滚下来——人们突然大喊一声,向后跳开。卡捷琳娜又哽咽着大声痛哭起来,茫然地朝着烧塌的房子频频打躬。房子一时笼罩在浓烟里。火焰喘息了一会儿,休息了一阵,而后又重新猛烈地燃烧起来。俄式炉炕烧裂成碎块,飞舞一般一块块从火中迸了出来。火顺着板墙向院子里蔓延,但这时也没人想把火挡住。房子没了,院子又有什么用呢?脑袋都没有了,谁还会去抢救脚呢?

房顶塌下,房子已不复存在,人们对火的注意力就减弱了。仿佛受什么人指使的,大伙儿都回过头去瞧彼得鲁哈。他们又

望了望啜泣不止的卡捷琳娜，更加可怜她了。但他们的目光停在彼得鲁哈身上。他怎么样了？他在干什么？他现在心情如何？满意还是害怕？彼得鲁哈站着，两只手不停地揪着裸露的胸脯，脑袋不安地哆嗦着，人们那一道道追问的目光惹他恼怒。从母亲跑到这儿来那一刻起一直使他感到痛苦的是，母亲没有到他身边来，没有问他一句，也没有骂他一声，没有羞辱他；她似乎把他全给忘了，不认他了。所以彼得鲁哈总想亲自走过去，让母亲注意到他在这儿，看看母亲会有什么反应。此刻他恼羞成怒了，终于拿定了主意，于是走过去说话——他竟说出这样的话，而且说得这样放肆、粗鲁，连他自己也觉得吃惊：

“妈，给点烟抽。”

她没有听懂，仍然呜咽着仰起脸来看他。

“你是闻鼻烟的，我知道。你有烟。”彼得鲁哈不住口地说。

达丽娅听明白了。

“我马上就给你抽！”她声音不高，可是口气坚定，严厉地威胁说，“我马上拿根烧焦的木头熏你这张丑脸！我要把你这个放火犯拉过去闻一闻那儿是什么味。他还敢捉弄妈妈，他还嫌不够呢！你快给我从这儿滚开，趁我还没动手收拾你！”

“嘿！”彼得鲁哈好不容易才回了一声，就退到黑暗中去了。

但黑暗已经明显地疏散了，收缩了。天空泛出了曙光。现在，火势已经衰落，只有地面上烧剩的木头还在燃烧，发出更加强烈的焦糊味，飘起一缕缕的油烟。飞落在草地里和道路上的焦木冒着烟。谷仓向旁边一歪，不慌不忙、有条有理地燃烧着。随着晨曦逐渐明亮，火色变得浅淡起来。

人们开始散去。他们在离去的时候，疑惧地环顾四周：瞧，马焦拉的秩序被破坏了，村子的一头被烧光，这一头没有屏障了。真的，火将从这儿向远处蔓延，任何东西，任何地方都躲不

开它……

达丽娅安慰卡捷琳娜，挽着她离开火场时，就是这样对她说的。家家都得这样，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卡捷琳娜头一个遭了厄运——往后就轻松了：不必整天等着自家挨烧，因而受痛苦挨折磨了，也不必等到火烧起来，看着心急火燎了。她已经闯过了这一关。

是的，房子烧得时间不长，只有两三个小时，可是烟要许多天冒个不息，没烧透的东西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焦糊味，一种有人在这里居住过的气息久久地不愿消散。

这一夜，“岛主”早就来到附近山岗上事先选好的地方，从这儿可以很方便、很安全地观察火情。它从头到尾都看清了。它看见了第一根火柴的闪光。木房当即敏感地觉察到，这根火柴所爆发的是无益的异常的火星儿：房子绷紧了，痛苦地呻吟一声，沉了下去。“岛主”奔到房前，最后一次在干枯不动的木墙上偎依片刻，表示它在这儿，并且要在这儿坚持到底，随后就转身回去了。

它看见，屋里闪出亮光，起初是断断续续、微弱无力，尔后越来越亮，一直到窗户上罩满了一片飞舞的红光。“岛主”望着，它透过墙壁看到了屋里的情景。火对那结实、平坦、一代代人踩得精光溜滑的地板左抓右抓，怎样也抓不住，它一次次地滑过去，蹭过去——突然间，它看准了，向薄薄的木板隔扇猛扑过去，沿着隔扇轻巧地向上蹿去。墙壁发出噼啪的响声，燃烧起来。不知是由于火烤还是别的原因，朝安加拉河的那扇窗户上，玻璃像洒出来似的轻声一响，炸裂开来。从那儿，像通过灶门似的，呼呼地灌进一股新鲜空气。火，饱吸了一口，呼呼地响着，满屋子游逛起来，收拾着一切烧着的什物，继续烧燎着天花板和墙壁。

“岛主”看见，人们怎样奔跑过来，彼得鲁哈怎样在最先赶到的人们面前窜来窜去，挥舞着双手，指点着被火焰包围了的房子。木头里的全部生机，在这之前早就消耗殆尽，此刻，它虽在燃烧却不觉痛苦了。火焰冲到室外，从两边夹攻木房。屋顶猛然起火，火光冲天。火光也照到了“岛主”，它这时正不得不匍匐前进钻到黑暗中去。

在这座房子熊熊燃烧的时候，“岛主”一直在瞭望全村。在这熊熊大火的映照下它清楚地看到，有许多像描画出来一般、色彩尚淡的火星儿，在一座座生机尚存的木房上空闪烁着——只有它才能看到这些火星儿，而且它已经觉察到，火将按什么顺序去烧掉那些木房。它还看到，那些木房周围有陌生的人——为数很多。“岛主”又往更高处一看，只见马焦拉树林上空飘着烟。尽管没风，这烟却化作无数惜别的烟圈在岛上久久地盘旋。

波德莫加岛在燃烧……

它看见了墓地上的烟，一个月之前因老太太们的阻止而未冒起来的烟……

它又收回目光再看彼得鲁哈家的房子，它看到卡捷琳娜明天将到这儿来，在这儿徘徊到夜晚，寻觅着什么，在热灰中翻寻，在脑海里翻腾；它看到她后天，大后天……再后一天……还会来。

它还看到更往后的事……

九

巴维尔回岛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来了也不耽搁，赶快办完事就回去。这不停的来来去去，每每使他精疲力竭。他上了岸，劳

顿不堪，一言不发。他本来就不是好说话的人，现在更懒得张嘴了。巴维尔在集体农庄当过生产队长，后来又当车库主任，都能胜任。国营农场会给他安排个什么职位，他还不清楚，而且似乎谁也不知道呢。使新领导伤脑筋的难题之一是，这么多原来农庄里的官儿都往哪儿放。这些大、中作业组长都行使过权力，权力虽小可也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学会了发号施令，当然也就失去了在别人指挥下办事的习惯。巴维尔却有所准备，上哪儿都行。他没有奢望。但他看到，那些追逐高位的人成天价东奔西走，互比高低，他们是那样丧魂落魄、扭捏作态地同大大小小的人物谈话，说不知把他们给放到哪儿去，叫他们干这个还是干那个。巴维尔被临时派去搞机修，任命为队长。起初只他一个，但很快他身边又添上第二位队长，现在又加上了第三位。结果就是无人可追究，该追究的事却明摆着：机器，旧的也好，新的也好，因为无人关心都坏了，备用零件一向不足。可是下命令的人却有一大帮，而且常常是下了命令又有人收回命令，收回命令又再下命令。队长们和工人们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工人不知道该听谁的。这不是在工作，而是叫人不知所措。只要国营农场没有完全从安加拉河里拔出脚来，只要全场人员和全场财产没有调配好，只要新生活没有确立、没有安定下来，就别指望情况会有好转。

卡捷琳娜搬到达丽娅家去以后，巴维尔就比较放心了，两位老人在一起总归要方便些，轻松些。他也可以少为母亲操心。卡捷琳娜还能帮助做家务，也还能动动，顺着话题拉呱上几句。当然，巴维尔自己也曾请求准他利用这最后几个月到马焦拉来割草收秋，好随心所欲、当家作主地把岛子收拾好了再让它沉入水下。可他得到的回答总是含含糊糊：“以后再看吧。”他也不大指望人家会同意。他确实也不很坚持非去不可，因为害怕收完

了庄稼又派他顺便干另一项收尾的事——烧房子。以后是总得有人干这件事的，可是巴维尔不堪设想，他怎么能下命令把亲爱的村庄烧掉。过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人们会想起来：“哦，是巴维尔·皮尼金把马焦拉村给烧啦……”他不想留下这样的回忆。

他每次回到马焦拉村时都感到惊讶，时间之幕总是那么愿意在他身后闭合起来：似乎并不存在什么新镇，尽管他刚刚乘船离开那儿来到这儿，似乎他并没有离开马焦拉村到任何地方去过。其实，这个镇子，如果去查找，它确实存在，就在对岸，不过，跟他巴维尔却没有任何关系。跟别人有关，跟他无关。他常上那儿去，常见到它——一个不错的新镇，然而世上这类不错的新镇还少吗？他的家在这儿呢，谁都知道，千好万好不如家里好。——瞧，这就是当巴维尔刚一登上陡岸，当那亲爱的村庄连同他自幼所熟悉、所看到的一切刚一展现在他的眼前时，在他的胸中所涌起的执著的情怀。他一到了这边——一扇看不见的小门就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记忆殷勤地暗示他注意的，只限于同这边的生活有关的东西，而把最近的种种变化都一概挡开、排除了。

变化又怎么样？这些变化是注定的，不可逆转的……躲到哪儿去也躲不开。这既不取决于他，也不取决于任何别人。应该是应该。不过这个“应该”他只明白一半，他明白应该从马焦拉搬走，建造中的水电站是需要的，然而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搬到这个镇上去。这个新镇虽说造得完美漂亮，房屋毗连，街道衔接，可是镇址却选得如此不合常情，毫无道理，只能教人目瞪口呆。男人们想悟出个所以然来，就聚在一起竭力猜测，为什么，究竟由于什么原因，要把这个新镇弄到离此地将要出现的大海五俄里以外的地方去，为什么要建在小山岗北坡的一片黏土和

乱石堆里。可是连一个谜底,哪怕是十分可笑的谜底,也没猜出来。既然建在那儿了,不想搬去也得搬!这就像古老的童话中所讲的一样,随便射出一箭,风把箭吹到哪儿去,人就往哪儿走。道理很简单:不是为自己建的,只顾怎么建更便当,很少想到日后住起来方便不方便。当初决定把这个新镇建在那儿时,满以为委员会里有能维护居民利益的自己人——国营农场场长。可是这个“自己人”是从别处来的,刚签过字表示同意,就突然又消失到别处去了。即便是要建在地底下,他也会照样泰然签字同意的。据说,连承建新镇的“水电站工地”主任去了一看,他在那里开工兴建的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什么城市,他似乎也骂起娘来;并且坦率地说,要是按他的主张,他绝对不会坚持把新镇建在那儿,早就迁到合适的地方去了。可是不行呀,事情已经办了,钱也花了,而且花钱不少,要改变是不可能了。生活,它之所以是生活,就是为了要继续生存下去,它能忍受一切,能到处扎根,哪怕是在光秃秃的岩石上和一踩就陷的泥塘里,如果有必要,就是在水下也行。可究竟为什么毫无必要地来这样忍受这种生活,来替人们制造出谁也不需要的困难呢?为什么照顾了小方便而制造出大的不方便呢?这正是巴维尔所思考、所力图搞懂的东西。但他就是弄不懂。所以他也就不能完全接受这个新镇,尽管他明知无论如何不得不在这个镇上生活,并且生活也终将在那儿得到妥善安排。

应该是应该,但每当想到那即将淹没的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是祖祖辈辈世代代耕耘、施肥,养活了几代人的最肥美的土地,他的心就不禁疑惧地紧缩起来:这代价不太高了吗?会不会得不偿失呢?只有那些没有在这儿生活过、劳动过的人,没有用自己的汗水浇灌过这每一垄土地的人,才不心疼失去这片土地。瞧,开出一公顷新耕地要花一千卢布,而在其贵如金的新地

上,今年播过小麦,可是连麦苗都没出。地面上土是黑的,翻开一看,土是红的,正好开砖瓦厂。不得不改播苜蓿,俗话说:绵羊虽长癣,不无一撮毛。还不知道这苜蓿能不能收到手呢。谁知道得花多少功夫才能使这块贫瘠的林野生荒打出粮食来,得花多少功夫才能使它会干它从来一窍不通的事哟。记得从前,老家的地里打出的粮食,不光供自己吃,还千普特万普特地运往北方,运往东方呢。那是有名的良田沃土啊!

“不行了,我显然是老啦。”巴维尔有自知之明地这样想。“既然我理解不了,那我就是老啦。青年人都理解,他们没有任何怀疑。既然这样做,那就是该这样做。新镇既然建在这儿了,那就是应该建在这儿,这儿就是唯一合适的地点。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准是好事,都会使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幸福。那就活下去吧,用不着回头,用不着犹豫。地里不打粮食吗?粮食会有人给你运来,加工好的,磨成面的——烤熟了的,白面包、黑面包、灰面包,放开肚皮吃吧!没有自产的牛奶吗?牛奶也会有人运来,免得你为养个奶牛忙忙碌碌,免得你钻遍树丛打牛草。土豆、萝卜、洋葱,全都会运来……上哪儿去运,用不着你操心。我们这儿是城市型的新镇,就要跟城里一模一样,一点儿也差不了。开荒花的钱,左播种右播种花的钱,你都可以领到,你拿到这笔钱,需要什么就买什么。瞧,商店安上了多美的玻璃橱窗,真好看。隔壁一家商店也在安呢,那边还有一家等着安……要是觉得这儿不好,那你就去另找好地方,天无绝人之路嘛。”

“我老啦,”他承认,“已经老啦,没什么可说的!我以为母亲抓住旧东西不放是欠思量,可我自己又跟她相差多远呢?母亲这辈子已经过完了,可你还得生活下去,工作下去呀。新事物不能凭空产生,无中生有是办不到的,只有牺牲一些珍贵的、习惯的东西,付出相当多的劳动才能换来——这我难道不明白吗?

这我很明白,而且我懂得,没有技术,没有大规模的技术装备,如今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就寸步难行。这人人都懂。不过该怎样理解,该怎样看待有关新镇的事情呢?为什么要求即将在那儿生活的人白费劳动呢?为了提前一天时间,却又提前损失了多少时间啊!为什么事先不盘算好呢?当然啰,也可以不提出这些问题,可是要生活——怎么生活呢,要航行——怎么航行呢,问题就在这里:干什么事,得知道花多少钱,为了什么,自己得弄个心明眼亮。这你才算个人呀。”

每当回到新镇,走进早已不由自主地住了进去的小院,情绪也就平静下来:日子过得下去。不习惯,不舒服,感到自己像个房客。本来就是房客嘛,因为房子不是你的,住在里边不能像房东那样随便。可是一切都是现成的:劈柴不用劈,炉子不用生……水固然还得挑,但是也会答应把水送到家里来的,还有什么可说呢!——轻松的日子到了。下班回来,洗完了脸,就可以躺一躺,往天花板上吐吐烟圈儿了,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不过,就在这样感到轻松之际,同时不知怎的感到自己身子轻飘飘的,不安稳,不牢靠,仿佛任何一阵恶风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你掀起来刮走——到那时看你去找自己在哪儿吧;一种非常讨厌的迟疑不决的心情,在暗暗地折磨着你,折磨着你:这是你不是你?如果是你,怎么会落到这儿来了?

没什么,这他也会习惯起来的……

巴维尔望着自己的妻子索尼娅,感到惊讶:她刚一进家——现在该说是进寓所,而不是进家了——她刚一进来,就啧啧赞叹。那是因为——她看到了玩具一般闪闪发光的电炉,壁上的花糊墙纸(原来墙都不用粉刷了);她看到了壁橱,还有瓷砖浴室,以及浴室里眼下还没水、还闲着的浴缸;她还看到了那个一侧安满玻璃的绿莹莹、喜洋洋的凉台——她看到这一切时的神

气,就像她一向住在这儿似的。她一天就熟悉了新环境,跑遍左邻右舍了解了情况,于是就开始吩咐,什么东西往什么地方搁,现有家俱中哪些东西运来不显得寒伧,哪些东西非买不行;看好什么地方可以挖个地窖,怎样才能扩大储藏室。她跑来跑去,急急忙忙,心满意足,像是已经准备好在这个寓所里安身立命了。她毕竟也是个农村妇女呀,从来没跟王公贵族打过交道,从来没过过豪华的生活,可是你瞧怪不怪!——一下子就神气起来啦,哪儿来的这股邪气?活像一只烧鸡一头扎在这儿不动了。对女人来说,这里也真是有吸引力:漂亮、整洁,用不着从院里到厨房不住脚地来回奔跑,样样都在眼前,都在手头。再说,索妮娅有两个姐姐在伊尔库茨克,有个姐姐嫁给一个在供应部门工作的机灵走运的人,所以她日子过得像个阔太太,家里什么没有啊。索妮娅可真够羡慕她的,每次得空进城去回来,总是恶狠狠地瞪着炉叉和铁锅。有一次还想鼓动巴维尔也到城里去。城里人对她翻来覆去地说那边多好多好,多文明多讲礼貌,在供应部门工作的姐夫答应也给他巴维尔安插个工作,——索妮娅的心被说活了,被说服了,差点儿没打起行李就出发。巴维尔也险些动了心,因为当时正传说要遭水淹,迟早总得搬到别处去。然而他忍住了。是喜欢城市的人觉得城里好,可是被慈母般的农村养成人并扶持到老的人呢——还是好生呆着别管闲事吧。但结果呢,用不着进城了,城市亲自下乡来了。现在索妮娅也可以安心了,不然想起来就要数落丈夫几句。钻出鸡窝飞进凤凰山了……

生活将不慌不忙、从从容容地走上轨道,人将适应新生活,结果只能如此。以后会在什么地方剩下的老地里划出一块来给种土豆的,不管怎么使劲儿,样样都靠外边运进来办不到。以后也会恍然大悟,不让自养奶牛也有点困难:公家的牛群可以指

望,但自家的奶牛也养着吧——而且,会像送来一份厚礼似的,下达一道许可令:谁需要,谁就养着吧,谁愿意,谁就搭牛棚,割牛草,起早贪黑翻地吧。到那时,定然绝不会人人都愿意这样做了,人们就养成新的习惯了。

他俩比较好办——索妮娅现在就觉得什么也不缺了。他也会习惯起来的。但是巴维尔很清楚,母亲到这儿来了是不可能过得惯的。怎么也习惯不了。在母亲看来,这是别人的天堂。把她接来,她就会缩进屋角不出来,直到憔悴死去。这些变化她受不了。而且,母亲似乎哪儿也不打算去,对新镇的情况几乎连问都没细问过他。而当巴维尔自己无意间漏出一点的时候,她就又叹气又拍手的,就像是嗤笑同她毫不相干的远方的异端邪说似的。在她眼里,这个新镇不亲不近,却远似美洲——传说那儿的人为了不让脚受累,都是用头走路的。巴维尔观察母亲,越发相信,她在议论搬家的时候,从来不想离开马焦拉到任何地方去。总有一天要接母亲离开马焦拉岛的,他害怕这一天的到来。

十

不出所料,彼得鲁哈在大火之后第二天就离去了,一个星期以来音讯全无。他一点面包都没给母亲留下,卡捷琳娜就在达丽娅家吃住。储藏室中剩下的面粉也烧了。屋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等火着完以后她过去一看,这也烧了,那也烧了……最使卡捷琳娜伤心的是茶炊。她在搬往达丽娅家去住的时候,当然没想到要失火,就把茶炊留到第二天再拿,后来她从灰烬中只扒出个熔成一团的铜块。彼得鲁哈没忘他那架音色不佳的手风琴,拿了出来,可是却抛弃了这劳苦功高,把他养育成人的茶炊。

失去了这茶炊，卡捷琳娜就全然孤苦伶仃了。

她依然没有失去希望，希望彼得鲁哈能改邪归正，能找个工作，再把她接了去。她还在为茶炊伤心，心想，家，他们会有的，可是家里却不会再有茶炊了。现在茶炊已经没人生产，哪儿都买不到了。餐桌上如果没有茶炊放在正中，就不成其为餐桌，那就……像鸟兽的食槽，既无乐趣，又不体面。自古以来，公认家有三主：一家之长、俄式炉炕和茶炊。全家都顺从他们，尊敬他们，没有他们在，一天的生活一般说来就不能开始，所有别的事儿也都得听他们指挥才能办。如今，卡捷琳娜一下子全没了，没了家，没了茶炊，没了俄式炉炕（炉炕当然没烧掉，而是烧裂了，耸立在露天瓦砾场上，就像一座纪念碑——莫非要用它来温暖人间吗？）。自父亲死后，卡捷琳娜家就没有什么男主人了。

达丽娅，达丽娅难以理解，怎么能不到时候就把自家的房子烧掉，她一遍又一遍地大骂彼得鲁哈，要求回答：怎么会，怎么会下得了手？卡捷琳娜哑口无言，避而不答，自咎地敛起目光，犹如自己受到了辱骂。等达丽娅紧逼过来，不得不回答时，连忙推托说：

“他没出息嘛，他就……”

在这简短的答话中，对于使她无家可归、无食充饥的儿子，既没有怒，也没有怨，只有袒护和宽恕之意：你看他生来就是这样，拿他有什么办法呢？！

“瞧你，瞧你，”达丽娅激动起来，用手指着数落她，“你一辈子都是这样。你这辈子老纵容他，把他惯得无法无天。现在你可受到报应啦。活该，你活该。他能把好好儿的房子烧掉，也会把你活活儿地埋到地里去。啊不，不是埋到地里，”她懊悔地改口说，“他会把你扔到水里，扔到水里，省得埋葬。你会亲自求他在你脖子上拴块大石头……免得你漂起来。”

“他干得出来的，”卡捷琳娜唉声叹气地说，“他没出息嘛，他就……”

“瞧，没法跟她说话，”达丽娅双手一拍，说道，“我跟她说正经的，可她跟你扯淡……咳，那你就跟彼得鲁哈一块升天吧！瞧，上帝给你的孝子……”

卡捷琳娜没有嫁过人，彼得鲁哈是她和马焦拉本村的一个男人阿廖沙·兹旺尼科夫的私生子。现在阿廖沙早死了，是在战场上被打死的。卡捷琳娜比他小得多。他们俩搭上的时候，阿廖沙已经有四个孩子跑来跑去的了。可是，阿廖沙竟那样迷住了她的心，以致她谁也不嫁，虽然年轻时追求她的人多得很。阿廖沙·兹旺尼科夫也是个相当会胡闹的家伙，彼得鲁哈在这方面倒是受了他不少的熏染。不过阿廖沙·兹旺尼科夫干活儿也是很出色的，而且他还另有某种过人之处：你看，他的发妻居然容了卡捷琳娜；卡捷琳娜自己呢，尽管不抱什么希望，但每当这个有妇之夫深更半夜突然来到身边时，她便喜出望外，如醉如痴！卡捷琳娜至今一想起他，脸上就顿然生色，像喝了酒一样容光焕发，眼睛睁得大大的，幸福地凝望着四十年前的日日夜夜。当年她所经历的一切，直到如今还温暖着她的心。她提起阿廖沙，就像提起自己的男人。她在马焦拉村有这个权利，因为阿廖沙的家属战后就离开这个岛了。

卡捷琳娜和阿廖沙之间的关系是掩盖不住的，村里人人都知道。后来生下了彼得鲁哈，阿廖沙就一点也不再躲躲闪闪了，公然负起照顾这个新家的责任。他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给卡捷琳娜运来劈柴和干草，扶起倒伏的篱笆。就这样维持着两个家庭，生活了三四年，直到战争爆发。马焦拉村民对这事也很快就司空见惯，不再说长道短了。对于阿廖沙你也不会多加议论的，因为任何闲话他都置若罔闻。尽管他也会任意给别人

难堪，嘲弄别人，可是没人敢去碰他。“我可不是好惹的，”他喜欢吹牛，“谁敢惹我呀。”战后，十年过去了，十五年过去了，人们每逢谈起村里好惹事生非的小伙子和男人时，总是说：“嘿，又出了个阿廖沙·兹旺尼科夫。”

单说这机灵乖巧、善于辞令吧，彼得鲁哈从他非法的父亲那儿所学的就绰绰有余。不过，他父亲在这方面并非不讲场合——阿廖沙干活儿时是不讲废话的，他精通的首先是干活儿，其次才是别的。可是，彼得鲁哈却恰好相反，他干起活儿胡来一气，不管干什么，都是马马虎虎，毫不中用。该动手的时候，他双手抄在背后；该显示机灵的时候，却只会手忙脚乱，折腾来折腾去，什么事也干不成。集体农庄派他进拖拉机手训练班，学了半年。拿他当个人看，交给他一部崭新的“白俄罗斯”牌大轮拖拉机，但是他却用这些大轮子碾坏了村里一半的篱笆，撵狗赶猫的，不出一个星期就在自家庭院里和牲口院里碾出一片平川。一喝醉酒，就登上驾驶台，兜起圈子来，直撞得碎木横飞。卡捷琳娜跳起来：

“你干什么，彼得鲁哈？你清醒清醒，你在干什么？上哪儿去？！怎么，这地平平整整的，是给你轧的吗？”

他手一挥，说道：

“老太婆，你啥也不懂，就该这么干哪。这是今天派我干的活儿。”说完又转起来。卡捷琳娜于是躲到一边寻思起来：谁知道呢，也许真的就该这么干，好教拖拉机耕田时走得稳稳当当，不要从犁沟里跳出来吧。

彼得鲁哈被拉下驾驶台，拖拉机被收回去了，免得让他闯祸。但此时他早已被娇惯坏了，啥事也不想干。他挪了好几个地方，工作换来换去，到哪儿都闹不好，处处都想尽快甩开他，就是当着他的面，人们也直言不讳。但他听着别人议论自己，却只

是呵呵地笑着，还激着别人说得更带劲些，更露骨些，似乎这使他感到一种快乐。什么事儿都无法使彼得鲁哈动心。集体农庄在被并入国营农场的时候，它于行将消亡之际可能很满意，因为它终于摆脱了这位劳动能手了。

快四十岁的人了，还是稀里糊涂的，依旧像个毛孩子，既没有成家（他先后两次奇迹般地从河对岸带了娘儿们过来，但两个都是在夏季头一个月上，离开他渡过安加拉河逃之夭夭了），又没长一双能干的手，也没有善于谋生的头脑。一味满不在乎，只要今天过得去，明天怎么办，这就跟他不相干了，他那简单轻狂的头脑想不到这个。他起初报名参加国营农场，但又放弃了，想进城去。后来似乎灵机一动，又说要加入狩猎组，尽管他有生以来只开枪打过酒瓶，而且从来没打中过。近来他老梦见能赚大钱的北方……可是要上北方就得有耐性，彼得鲁哈却一点耐性也没有。

您说说看，这种人的母亲该怎么做呀！卡捷琳娜感到害怕：谁的灵魂造孽，谁就该遭到报应，所以她就亲自为彼得鲁哈的疯狂行径承担罪责。她常说：

“他就是这号人，拿他有什么办法呢？送上断头台？”

“可是你都把他惯得坏到家了，他还能不这样？”达丽娅接过话头说，“他烧了房，你说过他一句吗？”

“你自己说过，终归要烧掉的……”

“可是不兴自己动手哇！他动手划火柴，手怎么不烂掉？！这要铁石心肠才下得了手啊：他生在这屋里，长在这屋里，他倒抢在别人前头把它给烧啦！哼！”

“他也许真不是有意的。”

“唉，善人哪，唉，善人哪！”达丽娅惊叹起来，“那还用说，当然不是有意的啦。他亲自给你盖的房子，挣的家产——你家彼

得鲁哈手可巧着哪。怎么会故意把房子烧掉呢,咳,他们干吗诬赖好人呢。不是有意的,不是有意的……”

卡捷琳娜没有吱声。

“这些人怎么搞的?”她想弄个明白。她已经不是头一遭想弄个明白了。她也知道,她是弄不明白的。即使她跟达丽娅齐心协力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还是不断地问,希望能得到片刻的轻松和自我原谅。“他从小就没出息。你说我把他惯坏了,我惯他什么啦?从来就没特别惯他。我跟他好说歹说,可他生来就是这号人嘛。他从小就什么都不想弄明白。两只眼睛那么一斜,随你怎么对他说,就是一窍不通。你花过很多功夫张罗孩子们吗?”

“我哪儿有功夫张罗他们?从早到晚奔忙不休的。”

“可他们都成人了,一个也没堕落嘛。我就是娇惯他也……顾不上娇惯。真的,他可没受纵容。我下过功夫。我一看克拉芙卡家的孩子们哪……真不如跟后娘过日子好……她是个亲娘,对亲生儿女却不像个娘。不关心,不过问,穿得破破烂烂,可怜巴巴的……那是些多好的孩子啊,温顺、听话……既然她就知道骂架,为什么孩子这么好,怎么回事?难道是她教育出来的吗?”

“哼!”达丽娅哼了一声,她在这方面一点也看不上克拉芙卡。

她们这说的是克拉芙卡·斯特丽古诺娃。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一打打个半死,结果成了人。那个怎么打都没用,生来是强盗,长大还是强盗。这个被娇生惯养——好了,那个被娇生惯养——坏了。这是为什么?生来什么命就是什么命?打他,哪怕你手打断了,为他发愁,哪怕你愁死——他还是死不回头。任你怎么管也管不好。不是这样吗?你

说我不管他。圣母啊！我拼死拼活地管过。现在我确实撇开不管了，我看透了：管也没用。如今只好随他去了。我恨也不恨了……只有可怜，可怜他成了这样的人。总不至于真被送上断头台吧？随他去吧。他得活下去。”

“可你这也不是躺在坟墓里说话呀。你也还得想法活些日子呀。”

“啊——，别提了。”卡捷琳娜把手一挥，“咱们现在活着，怎么也由不得自己咯，是被拖着走呢……拖到哪儿就是哪儿啦。”

“被拖着走……是啊，被拖着走。”达丽娅表示同意。

“等将来他们，克拉芙卡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卡捷琳娜把话说明白之后，又转回原来的话题，“他们会孝顺克拉芙卡的，会弄得她真不知跟孩子们说什么好。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啊——啊，”她拖着凄切而又不以为然的腔调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什么人什么命都是生来注定的。这种事见得还少吗？——有的母亲儿女养大了一打，到老来跟他们一块儿过，比在外人家还难。外人倒不好意思捉弄人，可家里人呢，像生来就有这份权利似的，凶到那般地步……对可恶的敌人还讲点儿怜悯呢。为什么？你还记得阿格拉费娜老太太吗？”

“可别活到那么大年纪。”达丽娅突然无缘无故恶狠狠地说，“要知道自己的寿数。”她又压低了嗓音，因为她明白，人不会知道自己的寿数。“是不是因为人造了什么孽，上帝才让他多活些年呢。哎哟，该犯下天大的罪才会这样……哪儿能造这么多孽呢？人在有用处的时候才应该活着。要是没用处了，就下车吧，你到站了。干吗要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呢？活着的人们……他们应该过日子，不该在家里伺候该死的人，整天给他端便盆儿，我端过的，我知道。我自己也快要叫别人给端便盆了。刚给一个人端完，转眼间又飞跑过去给另一个人端了，我记得。我记

得我的婆婆，记得当时我用什么眼光看她，”达丽娅不知怎么又生起气来，继续说道，“我看着她，心里就想：‘上帝什么时候才召你去呀？你真叫人烦死了。’我跟她还算是和睦的呢。她是个挺随和的人。我也不是太怕脏的人。可是我记得，我到临了儿一往她身边走就那么恶心。我心里好像全明白，她是个好人，没作孽，可不论怎么说，还是管不住自己。我受不了，就是受不了，真想从家里跑出去。我又想，要是我亲妈也这样一动不动直挺挺地躺在炕上，我也会盼着她死吗？我自己支支吾吾的，可又亲耳听见远处飘来一个声音：也会盼着死的。就算不这样，就算更有耐性，可是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心里话想必也会不知不觉说出来的。这可不是我嘴里说出来的呀，这是别处飞来的话。不，卡捷琳娜，千万不该老而不死啊。谁都不该这样。”

“那该怎么样——拴个绳儿上吊，对吗？”

“他们要埋咱们，他们要哭……他们哭的不是被装进棺材的咱们，他们哭的是留在他们记忆里的咱们……哭的是活着的咱们，”她不停地说着。“他们可怜咱们……因为他们可怜自己。他们发现他们也要变老的，一点也不会比咱们好。咱们不在了，他们就老得更快。他们心里早就把咱们给埋了。要是那会儿就看准时机走了多好。可是咱们老想活着。老想活着干吗——只能害自己。年纪小点儿离开人世，他们会更好地记住你，你留下的样子会更好看些。叫人回忆起来会更伤心、更深沉。要是你成了干瘪老太婆再进棺材，那看上去多可怕呀。那么可怕的家伙，原来的怀念一下子就全给吓跑了……”

“可是咱们有什么罪过呢？”

“咱们的罪过，就是咱们习惯了咱们的一套，咱们抱住自己的习惯不放，就像养着一条狗似的，让它对别人汪汪大叫，保护着咱们。要是你在年轻的时候说，你将来会喜欢你如今这副样

子，你一定会马上画个十字认罪，一定会不相信自己的话的。如今浑身一点活东西都没有了，一切都完了，都僵了，嘴里没牙了，头上没角了，什么玩意儿都没了，——不，世上没见过比你更可爱的人了。为什么呢？上帝给了你生命，让你做完了事情，生下了孩子，然后就该入土……好让那土不致减少。现在那边正需要你呢。可是你还老在这边神气活现，碍手碍脚的。饭做好了就靠边儿站吧，别妨碍别人了。让别人快点做好他们的事吧，别浪费他们的时间了。他们的时间也不多呀。”

“干吗这样急急忙忙的？”卡捷琳娜反驳说。“干吗活着匆匆忙忙，死也匆匆忙忙呢？也许下世不能再活着了呢？”

“也许这辈子就不是你在活着……”

“那么谁在活着呢？你说呀，可别胡言乱语的。谁会替我活着呢？”

“也许是别的人，你受了骗，以为是你。如果是你——那你为什么管不了自己的彼得鲁哈呢？为什么不能想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要听别人指挥呢？为什么要一辈子受煎熬呢？不，卡捷琳娜，我自己——求上帝原谅我吧——可不敢说这是我在活着……跟我对不上号的地方太多了……”

……两个人在一块儿，料理家务也好，聊天也好，的确都来得轻松些。白天很长，该做的事，两个老太太样样都来得及做完。如果倦了，午饭后就躺下休息，但并不睡着了，而是躺着闲聊。起身后还是聊，直聊到晚上收拾屋子的时候，收拾完了又是聊——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夏季长长的白昼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从早晨到黄昏一天一天地溜过去了。西玛也带着她那割不断的尾巴——柯利卡凑过来闲聊；鲍戈杜尔也来，他总是呼哧呼哧、骂骂咧咧的，也一个劲儿地想插话；耳背的通古斯卡来了，嘴里叼着烟斗，几乎从不拔出来，因而几乎一言不发；还没离开马焦

拉村的许多其他人,也来喝茶聊天……他们回忆往事,惊叹新事,把新与旧、生与死交织在一起……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这样长谈过。

他们没谈到的东西很少,但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很浅,尽管他们度过了漫长的一生。

望前方,剩下的时日举目可见,这些时日一经消逝,天地就变得愈益宽广自由。前方那空阔的天地里,风儿已在畅游四方了。

十一

在割草季节开始的时候,马焦拉村的生活再度沸腾起来,激起了浪花。新草场上割不到饲草,况且连新草场也没有呢。大伙儿便最后一次到原来的草场上去割草。一个国营农场不得不又分散成许多集体农庄,谁原来住在哪儿,就到哪儿去割。不欣然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回到故乡去最后呆些日子的人是极少的,几乎家家在那儿都有房子、牲畜、菜园、还没干完的事。乡土也没有沉默,在召唤他们——耳不聋眼不瞎的人们——去告别送终呢。凡是耳不聋眼不瞎的,没陷进办公室的,事情并非绝对丢不开的,很少有人不愿前往——人皆有家园故里,人总是依恋乡土的。啊,多么恋恋不舍哟!

半个村子的人都回到了马焦拉。马焦拉村又复活了,这生活纵然不如原先那样井井有条,却毕竟与原先相像;这生活之所以再次回村,仿佛是为了看一看,并且记住往日的景象。从波德莫加岛赶回的马群又嘶鸣起来,每到清晨又是人声四起,干活儿的人们此呼彼应,割草的家什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人们找出了

铁匠炉，升起火，修理马拉机具。长把大镰刀都找出来了。马克西姆大叔也爬下床来，从一堆破烂儿里抽出一把铁锤，又上面拴了一个绳套，免得在锤打时从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你瞧怪不怪，一旦需要，就像过去一样，大镰刀也找到了，马克西姆大叔也显得健壮了。草耙、草叉、驮架都拖到他那儿去，他就配上缺件，打磨锋利，缺齿的地方安上新齿，整旧如新。大叔干着活儿，似乎更精神了，更开心了，虽然前些日子还病得要死呢。他时而挥动着双手，吆喝着，吩咐着。大伙儿则微笑着欣然一一照办。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是这样吆喝他们的。当时是队长，如今又自愿当了队长的巴维尔，也是这样给他们分配工作的……似乎毫无变化。像当时一样，也没用大机器。拖拉机、汽车都在河那边，在那边也一直忙个不停呢。这边只剩下一辆小货车和两部自动联合收割机，停在村外山岗上待命呢。可是那小货车像是因为它留在这边而有意加以惩罚似的，被支来支去当跑腿儿的，不是大热天去拉酸汽水，就是把由于带着牲口来而迟到的妇女赶紧送到草场上去。像样的活儿不交给它。不知是出于什么古怪的念头，人们从平底大船里推出两辆破旧的大车，每天早晨套上马赶到草场去，小货车不敢冲到它们前面去，只好孤苦伶仃慢慢腾腾地跟在后面，看上去比那两辆大车老朽、无用得多了。然而这种行动的确是出于古怪的欲念，是为了寻开心，可是大伙儿都参加了，而且是心甘情愿地参加了。

是的，以后不用机器就不行了。等到需要把一垛垛的干草集中到河边去的时候，就非得从河那边运过一部，甚至不止一部拖拉机来不可——打算把草直接垛到由拖拉机牵引的雪橇上。不过，这是下一步，下一步的事咯……眼下像过去一样，还是用刈草机、马拉耙，还要编那垛草时用的扫帚。

人们干得兴高采烈，热火朝天，很久没有体味这样的情绪

了。他们那样挥舞着长把大镰刀，仿佛想表现一下谁最精通这项活计——这项活计他们不得不连同土地一起永远遗弃在这里了。他们挥舞得尽兴之后，纷纷倒在割倒的草上；干活儿使他们陶然欲醉，心潮激荡，此情此景将不复再来之感蚕食着他们的心；他们提起那真真假假的往事与新事，借以相互激将、挑逗。已到中年的女人们彼此眼看着变得年轻起来，她们知道，这个夏天一过，不，奇迹般地使她们年轻了十岁的这一个月一过，她们立刻就要老上十年。她们像孩子似的吵嚷着，嬉戏着，哄闹着。汗水刚干就尖叫着跳进安加拉河，如果谁不想亲自跳，就一拥而上抓住她，把她穿着衣裳拖下水去；既然周围都是自己人，也就不害臊了。由于克拉芙卡·斯特丽古诺娃带头儿带得好，女人们一个个袒露出乳房，摆出一副放肆、粗野的神态，在人数比她们少的那些男子面前晃来晃去，甚至还去追逐他们，要把他们推下河去。当大家又着手干活儿，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男人们就说：“咳，娘儿们真是疯透啦，胡闹到马焦拉来了。马焦拉八成都不敢相信这是咱们了。”可是在下一次休息的时候，她们又兴高采烈地撒起疯来。

老太太们从村里蹒跚着来到草场上，看着人们干活儿的情景，不禁眼泪直淌。她们走过来问道：

“你们想要什么呀？想要什么，以前有这样的日子过，你们还有啥不满意的？啊？唉，可没人拿鞭子赶你们哪！”

人们若有所思地应道：

“是没人哪。”

连克拉芙卡·斯特丽古诺娃都不做声，都不出来争辩。

傍晚，大伙儿唱着歌回村，连过去不屑于唱这种平淡无奇的歌的男人们，也随声附和起来。留在村里的人——孩子们，老太太们，以及当时外来的许多人，听到歌声都走出来夹道而立。最

近交通频繁起来，一只只汽艇时常突突地响着往返于安加拉河之上。不仅农场有人来，城里的人，边远地区的人，凡是曾经在这儿住过，没完全忘掉马焦拉的人，都纷纷到这儿来了。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节日，但毕竟算得节日：两个人多年不见，已然音书断绝，两相忘怀，突然又重逢了，会面了，彼此迎面扑上去，在街心上拥抱起来，于是呼唤着，号啕痛哭着，以致黯然神伤，两腿瘫软。成了母亲和父亲的，成了祖母和祖父的，都随身带来了儿孙，还把些毫不相干的人邀来，请看看他们早年离别的这片土地，这片以后再也看不见、找不着的土地。似乎半个世界的人都知道马焦拉的命运。村外，靠上游方向地势较高的一带，出现了五颜六色的帐篷。许多人正在岛上闲散着——有的在墓地里徘徊；有的坐在岸边，忧郁地眺望着远方；有的在林中空地上采摘早熟的红色浆果——这浆果是属于自己的，还是人家的，一下子还真不易说得出来呢。

割草的人们收工回村不慌不忙地走着，步态疲倦而骄矜。走在最前头的是拉车的马，它们不约而同地点着头，仿佛是在进村时鞠躬致敬似的，每辆车上坐两三个人，几个骑马的走在两旁，其余的人唱着歌跟在大车后面。一会儿唱这支，一会儿唱那支；一会儿唱支老歌，一会儿唱支新歌，但唱得更多的是那支老歌，永别的葬歌；原来人们都记得、都熟悉的这支歌，似乎正是为了到这个时候来唱，才把它一直藏在心底的……唱歌的人们心里倒轻松些，可是他们唱的歌，像是齐声绝望的哀求，听来令人那样悲痛、难熬，连心都鲜血淋漓了。

七月份过去一半了。天气晴朗、干燥，对割草是再好不过的了。这一块地上在割草，那一块地上在搂草，或者近旁就有一架架刈草机嗒嗒地响着，马拉耙伸着成排的拱形巨齿，叮叮咚咚地跳动着。割下的草一天就晒透风干了。午前，妇女们在刈草机

不便走过的、潮湿不平的地方挥镰把草割倒，午后就操起耙子搂草。男人们举起叉子堆草垛——一个个毛蓬蓬的大草束飘浮在他们的背后，就像一个个自己有脚而能独立行走的动物，向后仰着那奇形怪状的脑袋。白昼将尽时分，人们又如醉如痴起来——既陶醉于干活儿，也陶醉于夕阳，更陶醉于晒透的干草那强烈发涩的浓香。这股香味儿也飘到了村里，村里的人们惬意而深深地吸着，也醉醺醺的了：哎呀，香啊！真香……还有哪儿，还有什么地方能有这样的香味儿呢？！

人们开始提心吊胆地东张西望了：太快，活儿干得太快了，在马焦拉还没呆够呢，眼看就得回去了。真的，来场雨才好呢，那就能再拖些时候，磨蹭磨蹭，多呆些日子。男人们已经在动手安装由拖拉机牵引的雪橇了——确实，结局已经在望，干吗这么急呢？！为了这干草，都顾不上跟马焦拉告别，顾不上看一看他们在哪儿过了一辈子，他们曾经拥有什么，如今正被迫丧失什么。人们早晨一下地，工作就催人快干，人也不拖延工作，相反，他们都拼命猛干。眼前这活儿可不是什么能拖延的活儿，干活儿的人也还没来得及变成懒汉呢。

每天晚上，人们在就寝之前到街上聚在一块儿——游艺会不像游艺会，晚会不像晚会，可是大家总聚在一块儿，知道这样的夜晚所剩无几了，就忘记了疲劳。马焦拉在这样的时刻，便有感于自己的命运而惘然若失。安加拉河彼岸的晚霞欲熄未熄，映红了朝着那边的窗户，头上无垠的苍穹愈益寥廓，近处岸下的流水柔和地汨汨作响。白昼即将告终，周围一天的生活，也正在怀着谢意渐渐消歇。种种音响和色彩溶成一片摇摆起来，令人心旷神怡，昏然欲睡，这摇摆时而强烈，时而缓和；人的感情也合着它的节拍形成一种迷离恍惚的相应的波动。村里的木房似乎偎依得更紧了，它们摇摇晃晃，在风声伴和下，异口同声慢悠悠

地发出心底的呼声。仿佛从哪儿飘来了早已飞逝的旧日炊烟的气息；仿佛岛上的万物都逼近到眼前来了——人工的，天然的，接踵而至，各自从前物背后探头注目，异口同声地悄悄询问着什么。问什么？听不懂，听不清，可是令人觉得，对这种听不懂又听不清的问题，也应该作出回答。

谈话声零零落落，而且是轻声细语的——似乎真的有人在想法回答谁什么。此刻，没人思念已经过去的生活，也没人对那即将发生的一切感到害怕；只有这种犹如昏迷一般、梦魂萦绕的状态才教人珍重，只有这种状态才教人想长留其间。但是，像魔鬼竟也朝圣一样，彼得鲁哈带着他那架偏偏又从火中抢救出来的、其调不佳的手风琴，突然闯过来。他奏起“你哟山麓，你哟山麓……”，因而大杀风景——于是，人们不得不站起身来，不得不又虑及明天会怎么样，不得不回去睡觉了。

彼得鲁哈在离村外出两个星期之后，回到马焦拉来了，他眉飞色舞，穿着一身虽然很新但已相当脏的红条纹浅色西服，戴一顶咖啡色花纹的皮鸭舌帽。他这副打扮更像鸭子了。达丽娅一见他就嚷起来：

“嗨……这个傻小子是打哪儿爬到我们这儿来的？”

“对不起，靠边儿站！”彼得鲁哈愤慨了。他所以愤慨并不是因为叫他“傻小子”，而是因为说他“爬来的”。“我可不是爬来的，我是坐飞机，告诉你吧，飞来的。”

“对不起，靠边儿站”这句话，是他在最近的旅行中不知从哪儿偷来的。他是那样地喜欢这句话，觉得它是那样美妙而恰当，所以他不堪设想，不用这句话怎么能交谈。他到家以后，从因宅院已烧而领到的一大笔钱中，拿出十五个卢布给了母亲，母亲一提钱太少，他回答说：

“对——对不起，靠边儿站。我靠什么活着？我得走，得去

找个地方落户。谁能白白地送我走？你在这儿用不着钱。”

但他还是发了慈悲，又数给她十卢布皱得不能再皱的纸币。

这些钱不停地转手，经过上千次的揉搓，似乎一向是在彼得鲁哈这类人手中转来转去，从不曾落到正经人的手里。——卡捷琳娜看着这些钱，问道：“领了很多吧？”

“这是我的事。你的生活我不管，我的生活你也别管。我在哪儿落了户，就把你的户口迁了去，我们以后一块儿过。眼下——对不起，靠边儿站。”

他在没有商店的马焦拉村闷了两天，就溜到新镇去了。在那儿浪荡了三天，一直没脱他那身不耐脏的西服，浅淡的色调在这三天之后已经深藏不露，红色的条纹则无影无踪了。现在他又出现在马焦拉。没处落脚，走到哪儿睡在哪儿。有时候干脆跟鲍戈杜尔睡在他那高尔察克营棚里——这被看作无家可归、狼狈不堪的标志。但他却继续摆着他那阔气的架子，暗自幻想他正在度着法定的假期，不久就会有人乘汽艇前来接他，把他作为必不可少的人物送到什么地方去。他在缺这少那的“山麓”上拴了根绳子好背在肩上，用彼得鲁哈自己的话说，好日日夜夜地“摆弄”它。有一次他甚至背着它来到草场上，站在一棵小白桦树下，咿咿呀呀地拉起来。可是累得满头大汗、快乐而又厉害的干活的人们把他给轰跑了，彼得鲁哈一向尖嘴薄舌，这回却没还口就撤退了。

……久晴之后的一天夜里，乌云终于遮蔽了天空，下起雨来……

十二

在天降甘霖开始轻飘细洒，滋润田野和菜园的头一天，达丽娅家突然有客临门，巴维尔的小儿子安德烈回家来了。巴维尔命中注定没有女儿。他的妻子索尼娅生过四胎，全是小伙子。其中一个刚睁开眼，便经不起人间的阳光而当即辞世了，只剩下三个。老大，跟一个非俄罗斯族姑娘结婚后，便起程到高加索山区女方的故乡，去看看那儿怎么样，一下被温暖的生活给迷住，就留在那儿了；老二善于学习，在伊尔库茨克学地质，今年该毕业了；安德烈去年秋天从部队复员回来，住在马焦拉村，可是只呆了一个半星期，对搬迁所引起的越来越混乱的局面感到惊扰不堪，就溜进城去，进了工厂。原来现在他这是从工厂辞职，要去别的地方，顺路回家来了。安德烈上国营农场在母亲那儿呆了两天——索尼娅在会计科工作，因而留在新镇呢——先在母亲那儿呆一呆，又到父亲和祖母这儿来了。或许还有人不清楚——巴维尔已经如愿以偿，正在马焦拉领导割草，现在经常呆在这儿，国营农场倒只是偶尔去一趟，就像割草以前偶尔才到马焦拉来一样。

雨下得正是时候，可以从从容容地坐一坐，聊一聊了；人们没敢擅自休息，上帝倒亲自赐给了这休息的权力。安德烈同父亲一样强壮，是一个在工作上没吃过大苦，没受过大累的青年。部队生活对他显然是有益的——参军时还是一副拱肩缩背，两眼盯着地面，无精打采的模样，回来却成了这样昂首挺胸的棒小伙子。在奶奶往桌上端饭上菜的时候，安德烈忍不住从屋里到院里，从院里到屋里，来回穿梭，把那皮鞋在台阶上踏得嘎嘎直

响，他从鞋上所震落的还算不上是泥土，不过是发潮易粘的灰尘。他回忆着、打听村里人的情况，问目前谁在哪儿，谁要搬到哪儿去。此刻他因为没事可干，就亲昵地同达丽娅打趣起来：

“怎么样，奶奶，你也快撤走了吗？”

“走，走，”她居然没有叹气，就平静、顺从地应道。

“大概不高兴离开这儿吧？”

“这怎么会高兴？在自己这块地方，我们这些老婆子还能慢慢地爬来爬去活一阵子，等着瞧吧，一把我们拉到别处去，一下子就会都死光了。”

“真有意思，是谁会让你们死呢？”

“这我们是不会听别人指挥的。我们自己会，”达丽娅不知不觉自己也挖苦起来，“我们还没想到要委派全权代表，让他来下命令呢。人说死就死，没有事先发通知的。”

“奶奶，你可别生气。你生我的气了，是吗？我是说着玩儿呢。”

“我干吗要生你的气？”

“那你生谁的气呢？”

“谁的气也不生。生我自己的气。是你在生我的气，怪我老让你呆在一个地方。把你闷坏啦，看得出来，坐不住，要走啦……”

安德烈笑了。

“奶奶，趁年轻的时候得出去见见世面，到处走走。你在这儿寸步不离的过了一辈子，有什么好的？不该向命运低头，要自己支配命运。”

“支配吧，支配吧……我倒愿意看看你到底怎么支配法。不，孩子，世面那么大，你看也看不完的。哪怕你插上翅膀飞也来不及呀，别指望了。你以为你既然生下来，就什么都能办到

吗？啊，安德烈，别那么想。活着活着你就明白啦……”

“咳，奶奶，你这话我可就不同意了。你这是老呆在马焦拉的缘故，因为你没到过马焦拉以外的地方。因为你什么都没见过。人真是能干，他能干的事数也数不清啊。人现在掌握着这么大的力量，哎呀呀！想办什么事就一定能办到。”

“能办到，能办到……”达丽娅同意地说。

“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正要说不。人又能拆，又能盖……可是死神一到，他就得死。安德留什卡，你别跟我争啦。我见得少，可活得久。我一有机会看什么就看个仔细，不像你走马看花的。只要有马焦拉在，我哪儿也不急着去。人，我是看透啦，他们很小。不管他们站得多近，总是很小。他们很可怜哪。你这会儿不可怜自己，这是因为你年轻。你有使不完的劲儿。你以为你有力气，什么都行。不，孩子，我还没见过不可怜的人呢。尽管有的人脑袋特别灵，远看好像是：嘿，他什么都不怕，连魔鬼都斗得过……神气十足……靠近点儿一看呢，还是跟旁人一样，哪儿也不出奇。你想脱掉自己身上凡人的皮吗？不行啊，安德烈，脱不掉。还没有过这种人呢。只会把皮撕破，平白无故地受伤。事情照样办不成。趁你拼命脱皮的时候，死神就到了，不会放过你。人们忘了自己的地位是在上帝下边——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咱们不比咱们的前人高明。东西咱们不能背得太多。马能拉多少，你就往车上装多少，要不然再运东西就没马可套了。咱们的地位，上帝可没忘，没忘。他看到人变骄傲了，啊，变骄傲啦。你骄傲吗，你就要倒霉了。那骑着树杈砍树杈满不在乎的人，也自以为了不起呀。可是啪地一声摔下来，就把肝摔坏啦——他是跌到地上摔的，不是跌到天上摔的。怎么也离不开大地。没说的——你们现在力量是很大。是啊，很大！……从这儿，从马焦拉就看得

见。可别让它压倒了你们哪，这个力量……它是很大呀，可你们呢，过去很小，现在还是那么小。”

他们在桌边坐了很久。父子俩喝光了安德烈带回的一瓶白酒，没有一点醉意，只是安德烈面容显得更年轻，巴维尔显得更苍老了。达丽娅看着他俩并排坐在自己对面，心里想：“瞧，这就是那根线儿，那根打了许多结子的线儿，一代人一个结子，好像过去多少代啦……这些结子都到哪儿去了？我的结子也眼看着就要给人解开，捋平啦，叫一头下垂，好让人再也看不到……从另一头再打上个新的结子。这根线儿还要继续扯到哪儿去，扯到什么方向去？往后会怎么样？为什么这样想知道往后的事呢？”

外面的雨下得更紧、更密了，玻璃窗上出现了雨痕。大地一片昏暗。屋顶上淌下大股大股的水柱；安加拉河泛着泡沫，隔窗望去，似乎停止流动了。桌旁茶炊冒出的气息越发浓郁宜人，三人共饮着的茶更加香味儿扑鼻，他们一家人的谈话似乎也更加重要、更得体了。

“挣的钱少，是吗？”巴维尔问，他想了解安德烈为什么辞职离厂。

“挣的钱吗，一个人够花啦，”安德烈耸耸肩说。他竭力想跟父亲平等交谈，可又不习惯这平等，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拿不准语调，忽而高，忽而低。“一个人当然够花啦。问题不在这儿。干着没意思。那项工程却闻名世界，打开收音机，没有哪个早上不广播它的消息。专门为它预报天气，转播音乐会。而工厂呢……那种工厂多得很。每一个城市都有。”

“不对工厂预报天气？”

“我就知道你马上要说这个，”安德烈连忙说，“也用不着对工厂，对全城有预报啦。问题不在这儿。工厂吗，永远也跑不

掉。可是那项工程会结束的，它一完工后悔就晚啦。趁还年轻，也想去参加……那样，日后也好有点儿值得回忆的……”

安德烈皱了皱眉头，不满意自己的回答。他回答得太草率，太吞吞吐吐了；那是为了避免说大话，他知道父亲是不爱听大话的。巴维尔若有所待地沉默不语，这种捉摸不定的、似乎意在伪装的沉默，使安德烈激昂起来。

“现在是这样一种时代，不能老呆在一个地方，”不知他这是在议论呢，还是在辩解。“你们就是想呆着不动，也还是有人拉你们站起来，推着你们前进的。现在是一个这样活跃的时代……所谓一切都在运动中。我希望我的劳动成果能叫人看得见，能永世长存。可是工厂里怎么样呢？一个星期都出不了厂门，这还是乘汽车呢。铁块搬来搬去，出这个车间进那个车间，像蚂蚁一样，成天价乱转，东搬西运的，任何一个老头都干得了。工厂，工厂对上年纪的人，对拖家带口的人才合适，将来退休从那儿领养老金。我喜欢满是像我这样年轻人的地方，喜欢事事都另一个样子……都新鲜的地方。等水电站一建成，它就千年不倒了。”

“可是，有点赶不上趟儿啦，”巴维尔若有所思地点着头说。“水电站吗，它还没等你去就建成啦，眼看就要放水淹岛了。”

“嗯，那儿还有那么多工作呢！够我干的。正是最有意思的时候……”

达丽娅警觉起来。

“慢着，你要到安加拉河上筑坝的地方去，是吗？”

“是上那儿去，奶奶。”

“噢，真不得了……”她开了头，却没说完，因为太突然，不知说什么好，目瞪口呆地望着安德烈。

“怎么啦，奶奶？”

“你干吗不找个别的地方呢？”

“我干吗要找别的地方？我想上那儿去。奶奶，马焦拉反正是要放水淹掉的，不管我去不去。这跟我没关系。需要电，奶奶，需要电，”他挺直了强劲脖子，像是开导小孩一样，拿腔作势地给达丽娅解释着。“我们马焦拉要用来发电，它也会给人们带来好处的。”

“这么说，它规规矩矩地呆在这儿，倒是有害的啦，”她低声自语般地回了一句，不愿对这个别人早已背着她们下了结论的问题再作争论了——她回了一句就沉默下来，一言不发，光听着，而且是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们讲什么。她更注意的是观察他们怎样说话，说话时面部表情怎样变化，他们的话难懂不难懂，他们用的是什么语调。但她的观察所得使她不安。因此，她一走神儿又说起话来，仿佛并不是要发问，而是要印证一下自己的猜测——这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那么，是你要去放水来淹我们？噢—噢……瞧瞧吧，这叫什么事！”

“为什么是我呢？”安德烈笑起来。“我还没去呢，那儿就准备好了，单等放水啦。奶奶，你别冤枉人。”

“那你别上那儿去了……”

“怎么样，”巴维尔小心翼翼地接过母亲的话说，“说留下就留在这儿吧。我们正需要司机。你可以开一部新汽车。这儿的活儿够你们全厂干的。”

他说完话，睨视着地面，无望地笑了笑：本来就不必提——儿子不会留下来的。果然，安德烈沉默了一会儿，仿佛考虑了一会儿，摇摇头说：

“不——。我离开城市是上你们这儿来的吗？”

这真叫人生气：他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在这儿成了人，有什么权利这样议论自己的家乡？可是巴维尔没有生气，看来，他之

所以开始这一席谈话，正是为了听听儿子怎么回答，看看他在近几年离家外出独立谋生期间有些什么长进，看看他有什么气派，守什么规矩。不管安德烈等一会儿怎样回答，他都要平心静气地听。真的，为什么就不能在他的话里找一找合理的想法呢，他毕竟是成年人了，而且好像是个不错的人。何况，正是他不久就要在土地上取代父亲，不，最好是别说在土地上，而说在人间。他离别了土地，而且似乎永远不复归来了。如果说巴维尔要将这席谈话继续下去，那可不是为了说服儿子，却是想知道儿子是怎么个回答法。

“你这就不对啦，我们这儿也不那么差，那不是我们所呆的旧村子啦。”巴维尔偷偷看了母亲一眼，生怕无意中惹她伤心。对国营农场的新镇，他自己也没喜欢过，可是对的终归是对的嘛。“我们那儿也要跟城里一样，你到那儿去过，情况你看到了。”

“看到了。当然好得很。可是，你们那儿反正没有意思。”

“你说什么有意思呢？”

“我说过啦……”安德烈微微皱了皱眉，不愿重复说过的想法——这些想法他还没理出头绪，只能使他头晕，因而难于确切表达。“往后我成了家，往后我也许会上这儿来的。趁现在还年轻，没结婚，我愿意到那儿去，到人们所说的第一线去……免得迟了赶不上。青年人都在那儿呢。”

“上第一线——难道是打仗吗？”巴维尔没放过这句话。

“第一线不第一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都这么说的。那儿是最紧张的地方，是最需要的建筑工程。现在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儿。人们从老远的地方都赶去参加，我就在旁边却……不去，有点不好意思，甚至……像躲着似的。将来怕要懊悔一辈子的。对，这个水电站非常需要……报上登了那么多。那么注

意……我哪点不如别人呢？”

“工程一结束,就不再注意啦。到那时候怎么办呢？再找一个大家都注意的地方？要知道,那你们会养成出风头的习惯,会被惯坏的,那就会觉得一个太阳都不够亮啦。你呀,以为能够长期呆在大家都注意的地方吗？”

“以后就清楚了。”安德烈觉得这样回答还不够,于是更急速、更自信地说下去,流露出一种原来没有的伤心而似抱怨的语调。“你们怎么不理解呀？……奶奶不理解,可以原谅,她老啦。可你呢？”安德烈愣了一会儿,因为他不想叫声“父亲”,可又不愿、不肯再用过去那种他觉得幼稚的称呼：“爸爸”。“可你呢,为什么不理解？你自己也开机器,知道现在时代不同了。就像人们常说的,现在搞经济建设,赤手空拳不行。那是没有前途的。只能在马焦拉岛上磨蹭……这个马焦拉岛有多大用处呢？人家造水电站……人家大概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干,不是心血来潮。就是说,眼前,正是眼前迫切需要,不是昨天,也不是前天,就是说,非常需要。我就是想到非常需要的地方去。你们怎么老是只想自己,再说,你们多半是回想,你们回想了一大堆,可人家那儿一下子就想到所有的人。舍不得马焦拉,我也舍不得。它是我们的家乡……就是说,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反正它像现在这样——这样古老,对吧——长期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反正得改变,得过新生活。人怎么也活不过一百岁,下一代人会出世的。你们怎么不理解呢？”

巴维尔仔细而惊讶地看了看儿子,似乎直到这时才真正意识到,他面前确实是一个成年人,而且是个深明事理的人,但却不属于他这一代,而属于另一代,下一代了。

“我们怎么不理解？”他沉吟了片刻,才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们倒也稍微理解一点儿。我不是跟你谈水电站需要不需要。

这不成问题。我是说这儿也要有人工作。”

“不是有你们在这儿工作吗，工作，好像也按年龄分配。哪儿要有新工程，就是说，哪儿最困难，哪儿就要青年人；哪儿容易些，就要别的人……”

“那你为什么认为这儿就容易些呢？”

达丽娅谁也不冲着，谁也不看着，说道：

“古话说得好……一个当妈的，对孩子要是娇惯这个，亏待那个，就是个坏妈。”

“奶奶，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安德烈哼了一声，他这一声哼流露着高兴，因为奶奶打断了父子间这席不投机、不知心、令人难堪的谈话——就像是他们在谈论女人似的。既然年龄相差三十岁，一个血气方刚，另一个却年迈力衰，这怎么能投机得起来呢？

“没什么意思，”达丽娅把薄薄的嘴唇一瘪，绝口不答了。

“这雨下得好大呀，”安德烈望着窗外，打破了沉默；他觉得就该他开口讲话，打破这尴尬、隔膜的僵局。

三个人都瞧起雨来。雨水拍打着地面，在坚实的低处汇成一片片的水洼；谷仓顶上落下的已不是水滴，而是连珠似的水溜。他们听见雨水翻滚的细碎的汩汩声，这汩汩声在心头引起一种愉悦、充盈的宁静之感；他们顿时感到呼吸比较轻松了，空气比较清新了。他们感到这是雨从天上冲下的香气，雨从地下激起的浓香使空气得到了净化，这净化一新的空气也渗入了室内。他们于是感到在桌旁坐得太久，谈得太久了，感到这次谈话只能使他们这三个最亲的亲人离心离德，而这片刻间的无谓的观雨，却使他们重又亲密起来。但是，巴维尔在站起来的时候，又向儿子提出了大概早就需要提出的问题。

“什么时候走？”

“先住几天再说。”安德烈无缘无故地微笑着耸耸肩，表示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急什么？”

“要是再住几天，你也许能帮我割草吧？”父亲突然这样商量说。他也只是此刻刹那间才产生了这个念头，并马上脱口而出的；他还没来得及想好该不该说出来，他动员儿子干的事他自己是不是决意去干。

安德烈欣然同意说：

“行。不然我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当然要帮忙。”

“好啊，”巴维尔拿定了主意，高兴起来，于是更起劲地说下去：“咱们俩给奶牛割草，再养它一冬。有你在这儿，还不好办？我们心里正着急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个人哪儿能……我在上班。你妈在那边。奶奶也帮不上忙。”

“是呀，我也活不了几天啦，”达丽娅点点头说。

可是提到死的这句轻松、取笑的话，却在她心中勾起了最近几乎一直使她惴惴不安的心事，她于是欠起身来，挺直身子，用悲伤的音调恳求起来：

“还有那坟，巴维尔。你答应过的。以后什么时候？……最好顺便……”

“哦，”巴维尔想起来了。“还得把坟迁过去，她早就在求啦。”

安德烈感到惊讶，一扬眉，一时若有所待地默不作声了——他们说的话是不是当真呢——但迁坟的事他也同意了。

十三

雨，一会儿寂静无声，尘土飞扬般地蒙蒙星星，飘浮在潮湿

的空气中；一会儿又急骤起来，更加有力地敲打着地面。四周一切都湿透了，膨胀了，沉重了，水分达到饱和状态，再也吸不进了一——于是雨水便四溢横流，涨啊，涨啊……连草上都浸满了水。久经马车碾、汽车轧，弄得坑坑洼洼的村街好似一条小河，两岸农舍成排，只有顺着这成排的房屋才能走人，要想从街这边到街那边去，还得设法架桥。一连几天都是难得的寂静。高空里，沉重、臃肿的天，有时又颤动起来，仿佛要把洒尽雨水已经没用的乌云推到一边去；低空里，没有一丝微风，只有细雨淋着静止的空气。树枝耷拉下来，枝条上不住地滚落洁白如雪的大水珠；待割的青草也卷起叶梢，低头弯腰，密密层层地趴在地上。雨洒在上面，忽高忽低地发出沙沙的响声。三天后，安加拉河水开始上涨。岛岬边和浅滩上愉快的汨汨拍溅声消失了，沉寂了，乱七八糟的废物被冲走了。汹涌的河水更明显地猛涨起来，泛起泡沫；泡沫涌向岸边，涌向岸上被水淹没的角落，但又汇聚成一股股白花花的清流，扭在一起，机智地、灵巧地转着圈，重新冲进激流，奔腾而去，一路显示着自己的威风。

为了驱散潮气，家家生起了炉子。每到清晨，屋顶上就像在冬天一样冒出烟来，这一根根的烟柱是那样的整齐和威风，它们穿透了浓密的空气。纳斯塔霞家的屋顶上也在冒烟。达丽娅的孙子刚一到家，卡捷琳娜就搬到纳斯塔霞家来了。卡捷琳娜似乎很高兴得到这个迁居的机会，正好也给她的彼得鲁哈找个落脚的地方。彼得鲁哈还依旧在村里东游西荡，无所事事，无牵无挂，像蒲公英似的风乎南北，飘乎东西。一听说安德烈要上水电站去，他就跑去打听了半天那边的待遇：工资多少，生活怎样，有什么“油水”可捞。

“我要一套住房，不要牲口棚，”他跺着脚，讲着价钱，像往常一样阴阳怪气、装腔作势地说。“我带着母亲去，我想让母亲过

上称心的日子。她受苦受累够多啦。当然啦，她当共青团是嫌老了，可你说，那边有共青团……不过会需要她的，甚至还可能很有用哪。比方说，讲讲过去那种悲惨的生活。”彼得鲁哈把“生活”二字讲得清清楚楚，婉转动听。

水电站工地的情况，安德烈什么也说不清楚，他自己也不过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断断续续地听来的。但彼得鲁哈突然跟他泡在一起了，天天上他这儿来谈谈怎么办。彼得鲁哈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干练而顶用的工作人员，还满村散布说，似乎已经找到工作，并且好像都在领工资了。大伙儿都了解彼得鲁哈，就不无挖苦之意地问道：

“都是寄到这儿吧？”

“哪儿——这儿？我们这儿不是连个邮局都没有吗？”他对人们的无知感到吃惊。“是要给我寄，可是我说明了情况，请先给存着，以后等这坏天气一过，我就去一次领回来。”

“既然你还没上班，你大概也不用上税咯？”

“凭什么呀？！”彼得鲁哈在极力主持正义。“要是那样的话，我就自动把钱拨给保育院，我没儿没女嘛。你说我没上班，没上班又怎么样？照样发我工资，怕我跑到别的单位去。想把我拴在他们那儿。根据法律，我就哪儿也去不了啦。法律，这玩意儿可真滑头。法律，对不起，靠边站，啊——啊——啊！法律可碰不得！”

“嗨，说得好！嗨，说得好！”人们赞叹着，当着彼得鲁哈的面赞叹着。见人们无话可说了，彼得鲁哈很得意，自以为是地答道：

“该明白了吧。”

在这些不好干活的日子里，由于烦闷和无事可做，更由于那件依稀可见、日益逼近、令人惶恐不安的事，人们常常聚在一起，

翻来覆去地久谈不散；但这一次次的聚谈也充满着不安，断断续续的，一阵阵长时间的冷场。不知是天气使然，还是大伙儿恍然大悟了：啊，这割草季节和这齐心协力、令人沉醉的割草的活儿，这些歌声，这每晚的聚会，还有这与其说是像天赐，还不如说是像偷来用以告别的日子，这几乎是全体庄员在世居的村中一起过着的日子——统统不过是他们由于心软而陷入幻境的结果。但是现实却是要求必须搬走，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得到那边去安排生活，而不需要再追溯、再探索过去在这儿是靠什么生活的。既然过去不懂是靠什么生活的都生活过来了，干吗要在离去的时候，在即将丢下一片空地而离去的时候，还要弄懂呢？现实不是需要你在日将西沉、天色渐暗之际，当少有的惶恐、爱恋以及对更强烈爱恋的渴望之情交集心头的时刻，在劳动中、在歌唱中、在令人欣慰的哭泣中感慨万端；现实是需要堆起一垛垛的干草。这才是他们到这儿来的目的。不过又暗自生疑：话虽这么说，也不完全是这样吧。这些草垛，他们早晚要装好运走的，开春前，牛会把干草吃得一干二净的。可是劳动后唱的这些歌儿呢，仿佛并不是他们的嘴，而是他们的心同声咏唱出来的——他们是那样虔诚地、始终如一地相信他们所精心唱出的质朴无华的歌词，是那样必恭必敬、和谐一致地放声高唱；再说这一个个夜晚吧，当夜色渐浓之时，面对美妙而可怖的夜景便陷入一种甜蜜而惶惑的茫然状态，这时你真不知你是在哪儿，你是什么物了，你仿佛渐渐觉得，你正静悄悄、飘飘然地在大地上空滑翔，微微地颤动着翅膀，飞向为你敞开的幸福的坦途，敏锐地觉察到身下掠过的一切；还有这不知从何而来的深深的隐痛，你所痛心的是，在这一刹那之前，你竟不了解自己，不知道你是什么物：你，不仅是你身心中所具有的一切，而且是存在于你周围，却并非总能觉察的东西，而失去这些东西有时比失去手或脚更为可

怕。——上述种种，将令人久难忘怀，将一如永不消逝的光明和欢乐，长留于心间。也许，只有这才是永恒的，只有这才像圣灵一样代代相传，父传子，子传孙，激动他们，保佑他们，指引他们，净化他们——只有这才终将把他们带进人们生生世世所追求的境界。这是一种什么东西？是夕照中新生而荒漠的大地上空那普天同唱的轻轻歌声呢，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不，在荒漠的大地上空是不行的。如果让一个婴儿光着小脚，踉踉跄跄在这样的地上行走，他就会哭起来，惊慌地、着魔似地仰望着上空：是哪儿在唱歌？——他便会在低旋于头上的歌声中，在更加炽热起来的晚霞中跌倒了，睡着了，——人哪，你也该获得新生，也该一切从头开始，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你是难于远行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该在临别时对在漫长岁月里、在马焦拉村所度过的生活表示惋惜呢，为什么不该用惊异而悲伤的眼光看看四周存在过什么呢？存在过，但一去不复返了。死亡，似乎是可怕的，但死亡总是在生者的心田里播下最有益的丰收的种子，腐朽和神秘之种能结出生命和理解之果。看看吧，想想吧，您就会发现的！人，不是个体，他身上融合着许多彼此不同的乡亲，他们聚集在同一个躯壳中，同舟共济似的从此岸划向彼岸。真正的人几乎只有在告别和受难的时刻才能显现出来——这才是他呢，请您记住他吧。

可是，为什么心中这样惶恐，这样不安呢？仅仅是由于阴雨连绵，因为活儿一大堆却无法干，还是另有原因？你自己琢磨吧。瞧这片土地，似乎是永恒的，但原来不过似乎而已——它即将不复存在。还在飘着青草的香气，还在飘着树林的香气——阔叶树，针叶树，各有各的味儿，每一丛灌木都发出各自特有的气息；还在飘溢着房屋上木料的气味，还在飘溢着家畜味、住房味、畜栏外的粪堆味、黄瓜秧味、铁匠铺里倒出的积炭的气

味——这一切经过雨淋，喷发出各种酸不溜丢的气味，雨淋得这一切大发其酸了。为什么，为什么当着现在还活着的人们的面，在这块土地上这一切都将荡然无存呢？不早也不晚。无意的吗？合适吗？怎样才能使心灵得到安慰呢？当谈到这个话题时——这些日子，什么话题没谈过，什么事情没追问过呀——达丽娅就像往常一样断然而绝望地挥挥手说：

“唉，现在什么都不心疼咯……”

早晨似乎天要放晴，乌云稀薄透亮，翻滚起来，不知打哪儿飘来一股异样的轻柔的气息。好像眼瞧着太阳就要钻出乌云了，人们信以为真，也就活动起来，都到巴维尔这儿来问干活儿不干活儿。正当他们凑到一块儿议论纷纷时，天又黑将下来，下起雨来。大伙儿都不想散去，坐着不动，又扯起那套老话。达丽娅烧开了茶炊，但不知怎的没人想喝，看来都早在家里喝足了。只有卡捷琳娜端了一杯搁在膝头。门边一条板凳上坐着一个人，背靠着墙，翘起一条腿用手抱着，他叫阿法纳西·柯什金^①，又叫柯特金^②，谁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彼得鲁哈为了寻开心，把这两者合在一块儿，扯开嗓门儿满村大喊：“柯特－柯什金，喂，柯特－柯什金！”阿法纳西生来一向都姓柯什金，但在往国营农场搬家的时候，却合家改姓柯特金了：新，那就一切都新吧；美，那就样样都美吧。大伙儿都拿阿法纳西开心，他则应声憨然一笑，解释说：

“我怕什么？！柯什金，梅什金^③，我都无所谓。我六十岁都出头了，姓了一辈子柯什金，没人笑过。这全是年轻人鼓捣的。”

① 柯什金，俄语意为母猫。

② 柯特金，俄语意为公猫。

③ 梅什金，俄语意为老鼠。

是媳妇们，是她们这些祸根给挑拨的，尤其是加丽卡。她们是无所谓的，这姓，本来就不是她们娘家的，对她们就好像头巾一样，今天戴这条，明天换那条。缠着我不放：改吧，改吧。那回我给灌迷糊啦……我心也就活了。‘姓柯什金，’她们起哄说，‘这就像你在娘儿们脚下转，要姓柯特金呢，娘儿们就在你脚下转啦。’瞧，这些祸根就这么挑的……我心一活，也就说了：‘再拿半升酒来，就随便吧。’真没见过，跑得比兔子还快，一溜烟儿就拿来啦。”

“这么说，为半升酒就把姓给卖啦？”

“是啊，可不是吗。加丽卡到区里去了一趟，给全家改了公民证。可我是自个儿搞的。我自个儿在这个字母上加了个帽子，你倒认认看，是 m 还是 ш^①？真是天衣无缝啊。我签名的时候，故意不写清这个字母，签完了才似是而非地巧加那么一笔。过去姓柯什金，现在还是姓柯什金。他们爱姓什么姓什么。”

“你那瓦西里的名字没一块儿改了吗？”

“没有，眼下还没改，”阿法纳西答道。“不过，要是他们打算搬进城，要知道，在城里……在这儿这个名字就行啦。开个联合收割机，就是叫瓦西卡^② 也不会招人笑话的。”

“早先，老爷们对俗气的姓也不在乎。有个公爵就姓梅什金……”

“梅什金有什么！这也算个姓？战后区里的警察局长姓苏金^③，挎着手枪走来走去。瞧，这才像个姓呢！”

“这个姓没落到阿法纳西头上。不然他会给儿子起名叫

① 柯什金和柯特金，在俄语中两者仅一个字母之差，而且在书写时很容易混同。

② 瓦西里的小名。

③ 意为母狗。

‘生’，合在一块儿就成了苏金生^①啦……”

“那我倒是不害怕，我是不会脱口而出的，”阿法纳西在一片笑声中表示同意。

坐在他旁边的是达丽娅的邻居——住在村子靠下游一头的维拉·诺萨列娃。维拉几次想站起来回家，其实并非回家，是上地里去——维拉目前是真忙，她总是跑到分给她割的那块草场去，不声不响地割草；但此刻她不想离开这暖和的屋子，不想离开大伙儿。何况雨又下大了，像连绵起伏的波涛哗哗直响。克拉芙卡·斯特丽古诺娃坐在木床上，如坐针毡地扭来扭去，不住地瞧着窗外。要不是下雨走不成，她早就溜之大吉了。她感到烦闷，就缠住安德烈，跟他打听城里男人的情况：城里的男人现在喜欢什么样的女人，胖乎乎的还是苗条的？安德烈觉得不好意思，耸了耸肩。大白天的却天昏地暗起来，大雨发狂似的哗哗倾泻着，愉快的谈话不由得索然无味，慢慢地又回到了老话题，又谈起马焦拉，谈起马焦拉的命运和马焦拉人的命运来。这时，达丽娅开口了：

“唉，现在什么都不心疼咯……”

“心疼，那怎么不心疼……”阿法纳西刚开口就又住口了。

“哎，你们这些老家伙，不得好死，”克拉芙卡仿佛被猛抽了一鞭子，撇开安德烈，抓住话头，突然插嘴说。“瞧你们这份伤心劲儿！伤心，伤心……满村都是粪味，你们的马焦拉！叫人喘不过气来。你们在这儿有什么可乐的？周围人家早就过上新生活啦，可你们一个个的像屎壳郎一样，抱住旧生活不放，总到那里面去找蜜吃。你们这不过是自个儿哄自个儿。早该扒掉你们的马焦拉，顺安加拉河打发走啦。”

^① 意为狗崽子。

头一个对答的是阿法纳西，他若有所思地压低了声音，仿佛不是在回答克拉芙卡，而是在回答自己，给自己解除疑团：

“旧生活也好，新生活也好，没粮食都活不了。”

“没粮食我们挨饿来着，还是怎么的？这连喂猪都在用上好的粮食嘛。”

“眼下我们没饿着……”

“咳，你这个大嗓门儿，克拉芙卡！”达丽娅又清醒过来，就开了腔。“咳，你这个大嗓门儿！你这是打哪儿钻出来的，我们马焦拉村早先没这号人。”

“早先没有，现在有了。”

“我看见啦，有，我眼又没瞎。你怎么不跟卡捷琳娜家的彼得鲁哈搭伙儿呢？卡捷琳娜，你别多心，我没跟你说话。你们怎么到现在还分开住呢？他也是这号人哪。一双靴子——天生一对嘛。”

“我要他，连狗都嫌他累赘，”克拉芙卡气得发抖。

“可他倒真需要你呀。”卡捷琳娜也反唇相讥。

“这儿有什么能叫你们心疼的，有什么能叫你们伤心的？”达丽娅进攻了。她独自像主席一样坐在桌边，委屈激动得全身发抖，似乎在不住地点头，褪色的蓝头巾滑到额角，她问：“你们的脚早就痒痒啦——往哪儿跑？在你们眼里马焦拉就好像瘟病……你们没在这儿扎根，在什么地方都扎不了根，你们什么都不会心疼。你们就是这样的……秕糠。”

克拉芙卡一见惹恼了上年纪的人，口气就温和下来，笑着争辩道：

“达丽娅大婶儿，您才是那样的人呢。您自己都快见上帝啦，还在由着性子挑生活。您真行。可生活在前进……为什么您就一点儿也看不到？我在你们这臭烘烘的马焦拉真恶心，河

那边的新镇我觉得可心。您的安德烈呢，他比我年轻，连新镇他都嫌不过瘾了。他要的是城市。对不对呀，安德烈伊卡？你说，对这个村子你没什么舍不得吧？”

安德烈感到疲惫不堪了。

“说呀，说呀，别躲躲闪闪的啦，”克拉芙卡坚持说。

“是舍不得，”安德烈说。

“为什么舍不得呢？”

“我在这儿长到十八岁。我生在这儿。”

“真是个娃娃！既然你的童年已经过去了，它对你还有什么用场？你已经长大啦。瞧这额头长得多高啊！马焦拉也搁不下你啦。把你留在这儿——那怎么行！是你说的，你怕奶奶。你可怜的是奶奶，不是马焦拉。”

“为什么……”

“就为这个。你骗不了我。你奶奶她可怜自己。她没法再年轻起来，她就发狠啦，怕到有生气的地方去。达丽娅大婶儿，你别见怪，我跟你说的全是实话……你也不喜欢不说实话。”

达丽娅并不见怪。

“姑娘啊，这我也想过，”她坦率地说，轻轻点着头，表示她是考虑过，接着给自己斟了一杯茶。“有时候一想，就什么事都跟着想起来啦。嗯，好吧，我想，就算我是这样的人吧……可您是什么人呢？您干吗要这么干？这块地难道只归您一个人？咱们大伙儿今天在，明天就不在啦。大伙儿都像跑江湖卖唱的瞎子。这块地是大家的——咱们的祖先在这儿呆过，咱们的子孙还要到这儿来。咱们在这块地上只能占一小份儿。马焦拉好比那匹为七兄弟耕田的马……可是你一个人就给它把笼头一戴，二十个卢布给茨冈人牵走了。不是你一个人的。前辈把马焦拉交给咱们，只是教咱们用上一阵子……让咱们好好儿的服侍它，靠它

养活咱们。可你们待它怎么样？老一辈把它交给了你们，是让你们活一辈子，然后再把它交给晚辈。他们可要追究你们的责任的。老一辈你们不怕，晚辈可是要追究的。你们干吗要生儿育女？只要一开始这样生活，就得思量思量。我们只活一辈子，我们又算得了什么？”

“是人，大自然的主宰，”安德烈提醒说。

“说得对，主宰。主宰，主宰，伤起心来。”

人们默不作声了。倾盆大雨平息下来，随着最后几个仿佛被抖落的大雨点，下起毛毛细雨。原先那如同夜幕将临似的笼罩马焦拉的满天阴暗，此时已经消散，留下一片灰暗，也已被雨水冲出漏洞了；天空看上去也是同样灰暗而被冲垮了的样子，什么也看不清，只见高空里水气濛濛。屋里也是灰蒙蒙、雾腾腾的。大家一时默然相对，呆若木鸡。

“啊哈，舌头都打了结啦，”阿法纳西清醒过来，讲句俏皮话打破了这沉默，说着站起身来。“给我斟茶吧，达丽娅。今天干活儿吹啦，品茶吧。”

通古斯卡来了。人们聚在哪儿，她也一定蹒跚到哪儿去，一声不吭地找个地方坐下，一声不吭地从怀里掏出烟斗，就吧嗒吧嗒地吸起来。要是你不惹着她，她一天也不说句话，甚至也许别人在说什么她都听不见，始终处于一种睡意蒙眬的沉思状态。如果唤醒她，问她话，她马上会一只手拍着胸脯儿，宣布说：

“俺是通古斯人。”

“你是埃文基人^①，”起初人们想开导她。“通古斯人在沙皇时代是过游牧生活的，现在是埃文基人啦。”

“俺是通古斯人，”她坚持说。“听说过吧：通古斯卡河。是

① 居住在西伯利亚东部的通古斯人。

俺。埃文基人——咦，咦，咦，”她一边说着，一边漫无方向地朝远处挥着手。

通古斯卡——人们就是这样了解了她，也这样喊她的。她在马焦拉村算不上自己人，但现在也不能说是外人，因为她在这儿都快过完第二个夏天了。有时候一来劲儿，她就大发议论——与其说是用言语，倒不如说是用手势——说这儿是她的土地，通古斯人很久以前就到过这儿。也许确有其事吧。但如今这位老太太落到此地却是别有缘由的。国营农场打算兴建养兽场，但目前只有一个负责人，这就是通古斯卡的女儿。去年春天她们刚来时，新镇上一些房子尚未完工，住房不够，于是女儿在别人的建议下，把母亲送到马焦拉村来，当时这儿有房子空了出来。通古斯卡就这样呆在这儿了。她常常坐在河边上，一坐就一天，目不转睛地眺望着下游，眺望着北方。菜地她几乎不管，就那么一两畦，她却给荒得不成样子。她要么是不会管，要么是不想管，没有这个习惯。她靠什么吃饱肚子的，谁也不知道，女儿也不常从新镇来看她。人们叫她坐下喝茶，她就坐下来跟大伙儿一块儿喝，却没人记得她有哪一回拿过一片面包。可是她活着，没有死，不知怎的还总能猜中人们聚在哪儿，马上就赶到。今天她还迟了呢，往常来得更早。

通古斯卡走到临门的屋角，在卡捷琳娜的脚边坐在地板上。对这，大家也司空见惯了，她在地板上一落座，哪怕你使劲儿往座位上拽她，她也不起来。马焦拉村的老年人也常爱坐在地板上抽烟。原来这习惯是从那儿来的——是从古代通古斯人那儿传下来的。

“你来啦？”阿法纳西中止喝茶，问道。

通古斯卡点点头。

“瞧，人也有这么活着的，”阿法纳西用哲学家的口吻说道。

“可是在活着。”

“她是个好人，让她活下去吧，”维拉·诺萨列娃微笑着说。

“让她活下去吧。国营农场你去吗？”阿法纳西像跟聋子讲话似的对通古斯卡大声喊道。

通古斯卡还没来得及发呆呢，便又点点头，这时嘴里已经叼上烟斗了。

“你看，她还打算去呢。她到了那儿，可就真不好受咯。”

“你们倒真忘不了这国营农场啊，”克拉芙卡又气势汹汹地说起来。“简直就像眼中钉。要是明天把你们从国营农场轰出去，那你们就要清醒了，就不会再唱你们这个老调儿了。人真是古怪透了：东西哪怕自己用不着，别人要拿，他却舍不得；要给他的东西好得不得了，可他不要，死也不肯要——这也不顺心，那也不顺眼。给什么就拿什么呗，不好也不会给你。你看别人，人家都欢天喜地的。那边的日子有什么不好过？达丽娅大婶儿倒也罢了，”她朝达丽娅作了个手势，“怪她也没用了。你们还要什么呢？”

维拉·诺萨列娃异乎寻常地不声不响了，她疲倦了，由于没干活儿而心神不定，她听着别人谈话感到莫名其妙，于是沉痛地叹了口气，说道：

“只要让养一头奶牛……让割牛草……这有什么？换一种生活，虽说不习惯，可是会习惯的。那儿有学校，听说要办到十年级呢。可这儿只有四年级，孩子们真苦死了。今年我把伊尔卡送到哪儿去升学？到了那边，她就可以不动地方在我身边升学了。就用不着离开家了。”维拉偷偷地、面带愧色地看看达丽娅，沉浸在大概不止一次浮现在眼前的幻境中，她想把……“这个新镇要是搬到我们马焦拉村来多好啊……”

“瞧你想得倒美！不行，我不同意，”克拉芙卡喊了起来。

“这还是在安加拉河中间儿，在魔鬼的犄角上！哪儿也去不了……像坐牢一样。”

“会习惯的，”阿法纳西仿佛从远方、从海底捞到这么一句经过自己思考的话。“当然会习惯的。过一年，过两年……刚才克拉芙卡难得碰巧说了句大实话……过上一两年要从新镇再往别处搬，也会舍不得新镇的。我们花了劳动，所以……这劳动，它头一样就是能教我们跟地亲。克拉芙卡，你从这儿搬走不难过，那你在那儿也呆不长。你别跳起来，别跳起来，”他止住了克拉芙卡，“我们是知道的。你妈活着的时候，她给你带孩子。你呢，就在商店和阅览室里钻进钻出的……”

“我有文化……”

“我没讲你的文化。我讲的是土地。在那边要想开出地来，得花劳动，啊，啊，得花很多劳动。鬼东西，家里头倒弄得挺舒坦，可除非你不上街，你只要一出门，四下里一看，哎呀，都是工作，工作……干什么好呢……最好找那么一个委员会给安排个好位置，那又可以坐着打盹啦……唉，你妈可就……”

“也许是故意把你赶到那儿去，叫你花更多的劳动，叫你更加习惯吧。”

“也许吧。咱们豁出去了。咱们能应付过去。能磨练出来，能干得很漂亮。有的地方咱们会有点儿顶不住，有的地方咱们会退一退。一个男子汉，只要有力气，又没人拖后腿，就什么难关都闯得过去。巴维尔，我说得对不对？干吗你不说话？”

巴维尔一边抽着烟，一边听着。他不理解自己，恨自己，因而越来越惊慌失措了。母亲说的话，他同意；刚才阿法纳西说的话，他无可反驳，也同意了。“这算怎么回事？”巴维尔问自己。“我的脑袋在哪儿？我有脑袋吗？是不是脑袋里装了一堆沙土，不管别人吐什么水儿，都不挑不拣地往里吸？真理究竟在哪儿，

为什么把它抻得这样宽，这样长，既找不到头，又找不到尾？总该有那么一个根本的真理呀？！为什么我发现不了呢？”

但他感觉到了，他感觉到了，并且暗中早就同意这一切了。如果说他没有为自己取得可以使一切疑虑一扫而光的坚定信念，那不过是与马焦拉告别的痛苦以及搬家的悲伤和忙碌所造成的。他感觉到，在克拉芙卡的话里（即使不是她，那也会有比她远为严肃的人讲出这些话的），在那天他们父子相会，坐在桌边交谈时安德烈所发表的议论里，就都包含着无法逃避的当今的真理。显然，这个真理年轻人认识得更清楚。是啊，所以他们才成其为年轻人哪，他们要活下去。凡是要活下去的人都必须懂得这个真理。安德烈说得对。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却不得不同意他的话：靠自己的两条腿，何况是在古老的马焦拉村，是赶不上今天的生活的。”

“说得对，”巴维尔承认。

“你怎么想，咱们能不能从那边的土地上打出粮食来？”阿法纳西问。

“一定能打出来。科学会帮忙的。要是打不出来，咱们就养猪，或者喂鸡。现在到处兴这个……专业化呀。”

“可是我开着联合收割机干什么呀，给鸡拔毛吗？”

女人们来劲儿了。

“改装一下，你就可以拔鸡毛啦。有什么不好哇？”

“尘土都吃够啦，浑身尘土，弄得人黑不溜秋的。”

“鸡毛一飞起来，就给你掸干净啦。”

达丽娅退出了谈话，她不听别人说话，也不注意别人，只顾聚精会神、一心一意地从捧在手中的小茶碟里慢悠悠地啜茶，同时像往常一样，微微地、和谐地朝什么点着头。

“怎么说，女将们，”阿法纳西发号施令了，“这个会咱们宣布

闭幕吧。时间太长了。达丽娅都快把茶炊喝干啦。咱们通过什么决议？搬，还是怎么说？”

“人家早就背着咱们通过决议咯。”

“走啊！在那儿，在大地方，会更瞧得起咱们。”

“不过最好把臭虫、蟑螂都给抖搂干净了。”

“你怎么样，通古斯卡？一块儿走吗？”

通古斯卡从嘴里拔出烟斗，舔了舔嘴唇，应声抬起骨碌碌乱转的浮肿的眼睛，点了点头。

“你呢，达丽娅，也走吧。你不走，我们也不走。”

但是达丽娅没有答话。

“看哪，”维拉·诺萨列娃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雨好像是停了。咱们坐得太久啦，太久啦……说来说去，还是那么回事。我走啦。巴维尔，有什么事的话，喊一声吧。今天可别喊了。今天我走啦。”

……雨下呀，下呀……但看来也快下完了。雨的间隔长起来，上游的风刮来了，冲击着、摇动着漫天的水汽，终于把它刮走，刮往北方去了。只有顺风飘过的乌云还在继续抛洒着残雨。雨刚要住，又滴滴嗒嗒地下起来；云中的太阳几经周折刚漏下一些淡淡的日光，天又转暗，飘起了细雨——仿佛是居心叵测地不给人以终将彻底放晴的希望。人们不甘俯首听命，恼怒起来，又是咒天骂地，又是自怨自艾——怪自己活在这样的天底下。

在这天气还摇摆不定——不雨不晴，既不能干活儿又不能休息——的日子里，有一天，沃龙措夫领着区里负责水淹区地面清理工作的一位代表来了。人们被召集到一所肮脏潮湿、玻璃窗半数已破的房子里，这里是原农庄办公所。没有板凳，人们都站着；也没有可供来人就座的桌子，他们俩就靠里墙站着，离大伙儿有短短的几步之隔。第一个讲话的是沃龙措夫，他说必须

突击完成割草任务。人们没有打断他,望着他,真疑心他是从月球上掉下来的人:他在说什么?——外面还下着雨呢。果然,雨又倾盆而下,叮叮咚咚地敲响了屋顶。可是沃龙措夫缩在雨衣里,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光顾叽哩呱啦说自己的。那位区代表姓彼先内^①,看上去是个憨里憨气的人,脸色黝黑,颧骨突出,跟本地人一样;一对孩子气的蓝眼睛。他既然姓这个,也许真是歌唱得好吧。这位代表在沃龙措夫作过介绍之后,开始拐弯抹角地讲起来,好像是从目前形势讲起的。但他发现,人们受不了潮湿和穿堂风的侵袭,在不停地跺着脚,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他就中断了讲话。停了一会儿,他说明了来意:马焦拉岛要在九月中之前彻底清理完毕,岛上站着的,长着的,一概不留。国家委员会将于二十日来验收水库库底。

“那我们来不及刨土豆。粮食来不及收。瞧天气这么捣蛋……”有人怯生生地表示不同意。

彼先内摊开双手;沃龙措夫回答说:

“私人的土豆随便,哪怕一点儿不收也行。农场的庄稼我们一定要收。我们也能收回来。万不得已时,城里会来劳动力。”

已经被阴雨连绵弄得萎靡不振的人们,听到宣布故乡覆没的最后期限,不知怎的竟处之泰然。难以置信,既然四周一切都这么湿漉漉的,会有什么东西哪一天要燃烧起来。九月中,此刻觉得就像十二月中一样还远着呢。他们只记住了,今年不得不早点动手刨土豆。顿时又心慌意乱起来:刨土豆吗,行,能刨出来,可是怎么运走呢,往哪儿装呢?上哪儿去弄那么多口袋呢?往年都要刨个七十袋、八十袋的,今年夏天种得也不比往年少。在这儿倒简单,必要时,全部收获可以用一条口袋装来装去,菜

^① 意为歌曲。

园就在身边嘛；可是要往那边运呢，大概就得一次运光。你想：这怎么办呢，如何是好呢？

人们还记得，沃龙措夫在会上指示别等最后那一天，凡是不急需的东西都要陆续烧掉的时候，把彼得鲁哈给马焦拉村民树为榜样，因为他第一个清理了他家那块地方。彼得鲁哈生来没人夸过，于是他就全然自以为英雄了。会后他走到沃龙措夫和彼先内面前攀谈。他们谈了些什么，没人听见，只见沃龙措夫指着彼得鲁哈对彼先内讲了半天，彼先内从衣袋里掏出记事簿，用铅笔在上面划起来。

人们直至各自回到家中，暖和起来以后，才吵嚷起来：九月中，只剩下一个半月啦。总共只剩下一个半月，你不知不觉它就飞过去啦。以后白天来临时，就看不到马焦拉村了——真令人不堪设想，不寒而栗。白昼仍将照旧从东方升起，从岛上横空而过，可是那时岛上已经荒无人烟，荡然无存，再没有人从那儿仰望天空，目测天色早晚，看那鲜红的太阳挂在何方了！接连不断的秋日，将从马焦拉岛上空路过，路过，仔细地观察着：岛上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不再炊烟袅袅，不再人声起伏；直到有一天，在注定的时辰，在那亘古不移的位置上，再也找不到岛子的踪影。

从那以后，白昼路过此处，便将不再驻足，而来去匆匆了。

十四

安德烈因为无事可做，也去开那个会了。他置身于众人之外，像个局外人一样往门框上一靠，也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听听上级带来了什么精神。回家以后，把会上讲的一五一十告诉了达丽娅。达丽娅在墙边的板凳上坐下来，一时垂手默默无言。

后来，宛如打定了什么主意，有了什么盘算，只听说道：

“噢，噢。”

达丽娅的嗓子使安德烈感到惊讶：只用这么一个声音，就能够表现出一种虔诚信仰的庄严性，似乎谁也不信，谁也不懂，只有她一个人信，她一个人懂，而真理是属于她的。但这声音里还有另外一层意味，类似警告的意味：走着瞧吧，要有祸了。说有祸就得有祸，怎么也躲不过去的。但是要有什么祸呢？！所有别处的土地，它们也都要学马焦拉，都烧成一团吗？但达丽娅又比较平静、比较温和地补充道：

“对人也这样就好了。也告诉他什么时候死就好了——真的，要是知道了，就作准备……就不会再去瞎忙了……”

“你怎么啦，奶奶，干吗要知道啊？！”

达丽娅没有回答，也许是同意安德烈的话：这跟人毫不相干。她为自己念咒免罪，可又不愿认罪。但是安德烈已经激动起来，他想象起来了，说道：

“那有多可笑啊。就是说，你是活人，健康的人，可你的公民证上，紧挨着哪年生就写着哪年死。”他笑了起来，笑声很不自然，仿佛是别人在替他笑似的。“你一出示公民证，人家不看你姓什么，却看你还能活几年。这才是最要紧的。谁活不长了，就请走开，干不了活儿；谁活得长，就请过来。比如说想娶媳妇了，就说：拿出来看看，拿出来看看，小宝贝，看你能活多久。姑娘也张嘴就说：喂，你能活……不行，奶奶，”他皱了皱眉，若有所思地表示不同意，“不需要。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你的上帝瞒着这个事不教人知道，不是没有道理的。”

巴维尔回来了，达丽娅就站起来，想摆桌吃饭；但巴维尔说，他先得上草场去看看草垛。傍晚天放晴了，露出了大片的晴空，不再像原先那样时晴时阴的了。天空升高了，斜挂着的云彩状

似层峦叠嶂，四缘开始泛白。凉风飏飏，这是天气彻底转晴的第一个信号。太阳也不时探出头来，忽而投下一条光带铺在河的对岸，忽而在村边闪现，掠过牧场、田野和草地，飞快地向下游滑去。这些天来一直默不作声的公鸡，纷纷引吭高歌——它们也嗅出了放晴的气息，不是随便啼鸣的，各种音响都变得清脆起来了，一俄里之外当的一声，听来犹如响在耳边。巴维尔确信：行了，阴雨天到头了。于是就决定去看看，这雨造了什么孽，割倒的草有没有发黑，草垛有没有发霉，好确定活儿从哪儿干起。

巴维尔脱掉雨衣换上棉背心出去以后，安德烈在自己那起伏的心潮的骚扰和触动下，想起了他到家之日那席谈话：

“奶奶，你那天说你觉得人可怜。人人都可怜。你说过的，记得吗？”

“记得，怎么不记得。”

“你为什么觉得人可怜呢？”

达丽娅在收拾屋子，她找不到小勺儿了，满屋转来转去，用目光搜索着，她随口答道：

“可怜就是可怜呗。可怜巴巴的，怎么能不可怜他呢？又不是外人，看你说的。”

“可我问的是为什么可怜。你说过，人是很小的。就是说，是软弱的，没有力气的，还是怎么的？”

“看把你急的。说过就说过。也许我是这样说过，随便说说。”

“你不是随便说说的。”

达丽娅终于找到了小勺儿，到穿堂间从双耳木桶里舀了点儿水，又回到灶间。她不想再谈下去，可又不行，就在灶间里接着说话，同时手脚不停地忙她的事。

“难道不是很小，还是怎么着？”她问道，同时渐渐地深入谈

话，考虑着能说些什么。“好像没有变大。从前什么样儿，现在还是什么样儿。从前他长的是两只胳膊两条腿，现在也没多长，却把生活弄得紧张透了……他把生活弄得这样紧张，真叫人看着害怕。是他自个儿拼出来的，谁也没逼着他干。他以为他是生活的主人，可是老早啊就不是主人咯。他早就松手放开了生活。生活骑到人头上去啦，想要什么就跟人要什么，用鞭子赶着他。人只得快跑。他最好把生活勒住，停一停，看看周围什么东西还在，什么东西已经叫风刮跑了……可是人不干，不干还不算，还一个劲儿地往前赶啊，赶啊！这么着人要累垮的，拼不了多久就要累垮啦，这有什么可说的！……”

“真有意思，既然有机器，人怎么会累垮呢？干什么都用机器。奶奶，你知道造出了多棒的机器呀。这些机器多能干，你想都想不到。比人强多了。现在没有光靠拼人力的生产啦。他哪儿会累垮呢？你说得不对，奶奶，你说的是生活在一百年前的老八辈子的人。”

达丽娅不满地从铁锅边转过身，直起腰来，说：

“我知道我说的是什麼。一百年……一百年前生活好像是安定的。我跟你说的是你，是你们，现在的事。肚脐你们现在是伤不了的，没有说的！肚脐你们保重得很。可你们把自己的灵魂给丢光了却满不在乎。你总听说过，人，人是有灵魂的吧？”

安德烈莞尔一笑，说：

“据说有这种东西。”

“你别笑，是有的。你们养成习惯了，以为看不到，摸不着，就是没有。孩子，谁身上有灵魂，谁身上就有上帝。不管你多不相信，可上帝就在你身上。不是在天上。他祝福你，保佑你，为你指路。不光这样，他还保你做人。希望你生来是人，永远是人。让你心地善良。谁要是糟蹋了灵魂，谁就不是人了，不是

人！这种人什么事情都敢去干，连头也不回。你们有多少人顾不上一切地丢掉灵魂——没灵魂那多轻松啊。轻轻松松地朝前奔吧。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你身上就没人诉苦，没人喊疼了。就没人问罪了。你说有机器，机器为你们干活儿。唉，唉，早就不是机器为你们干活儿咯，是你们为机器干活儿呢——我没看见，还是怎么着！可为了这机器得费多少东西呀！这不是马，喂点燕麦，再往牧场一轰就行了。机器要榨干你们的血汗，要糟蹋土地。机器干这个可是行家。瞧它们跑得真快，搂得真多呀。你们一见挺希罕，就追上去了。你们就追着机器跑。机器把你们甩在后边，你们又追上去。追还没追上，那些机器又造出了别的机器，不过没用你们帮忙，它们自己制造。要么是自己生出来的。钢铁生钢铁。这些新机器更加灵巧。你们就得更加拼命快跑，免得落后。更顾不上自己，顾不上人啦……你们一路上很快就把自己全都甩光啦。能带着快跑的你们就留下，别的就都不要啦。从前人们也干活儿，没抄着手闲坐着，但那都是踏踏实实地干，可不像现在这样儿。现在干什么都是飞跑。去上工，飞跑，去吃饭，飞跑，干什么都没功夫。这叫什么世道！连生孩子也是飞快的。孩子还没出世，还不会站着，还一句话也没说，也就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他这样有什么用处？”达丽娅停顿了一下，把早上给牛煮好的土豆靠着水桶放在地板上，就又往下说：“我看你爸爸呀，难道他能活到我这个年纪吗？这还是在马焦拉呢，这儿也许还安定些呢。城里我可去过，我一看，哎呀，多少人在乱跑啊！像数不清的蚂蚁，像数不清的虫子！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简直没法转身。你推我挤，你追我赶……千万别到那儿去！你看见那个就会想，他们死后，哪儿去弄那么多地把他们一个个地埋下去呢？没有哪一块地埋得下。可是你也凑上去了：拼命地往一边跑过去，看也没看清楚，就又朝另一边跑过来了。

图的就是千万别停下来。你瞧哪儿浪头高,你就要赶哪儿的浪头。”

“奶奶,瞧你在说些什么呀?拼命地跑,飞快地跑……我们都在生活就是了。谁能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安德烈站在通灶间的门口,听到达丽娅的话感到惊诧,便含着讥讽的笑意注视着她。

“你们在生活……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只要你们喜欢。你们不一定听我的。我们的苦已经受尽啦。不过你呀,安德留什卡,以后等你也精疲力尽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我的。你会说,急急忙忙地干什么去了,你干出了什么成绩?你只是在自己周围添了点儿热气罢了。别的什么也没干成。这就是你带来的好处。你们生活吧……瞧,你们的生活要吃多少供啊:把马焦拉端给它吧,它饿得皮包骨了。光吃一个马焦拉就够啦!它要伸手去抓,哼啊哈的,还要更拼命地要呢。还得再给它。有什么办法呢,你们还得给。不然你们就要倒霉。你们已经给它放松了缰绳,如今就再也勒不住它啦。怨自己吧。”

“奶奶,我不是问你这个。我问的是为什么你觉得人可怜?”

“那我跟你你说的是什么呢?”她感到委屈,讷讷地说,但一转念,对呀,她又是所答非所问,于是叹了一口气。她最好什么也别说了——有什么用处!早宣布过了,庄稼一收完,就烧掉马焦拉。可她不是打起精神来,准备应付那个期限和那个行动,却去议论那不可能说清楚的事情,说起无聊的废话来。啊,多少时间花在这种事上头啦!哑巴总被认为是不幸的,他们不会说话,可是他们长期不停地思索,这也算得上不幸吗?但是安德烈在等待着回答,他不知为什么需要达丽娅的回答。于是,达丽娅又叹了一口气,寻思着从哪儿说起,使用忧郁而十分温顺的嗓音犹犹豫豫地说:“就是可怜嘛……只要看一看人……”达丽娅一边用搅拌

棒在桶里拌着牛食，一边解释起来——她边搅牛食，边琢磨语调，嗓门儿忽而压低，忽而提高，仿佛在把声音拽下来又扔上去，话头忽东忽西地跳跃着——她说道：“人哪，都是荒唐的糊涂虫。把别人弄糊涂了，那好办，找他负责。可是他把自己也弄得那么糊涂，哪边是左，哪边是右，都分不清了。他仿佛有意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不想干的事，他却偏偏在干。这不光我一个人看得出来，不光是我有这个眼光，你要是看一看，也能看得出来。仔细看看，好好看看吧。他一点儿笑的心思都没有，也许应该哭出来，可他却笑啊，笑啊……他说起话来……字字句句都要花腔，说的不是他想说的。话到嘴边上了，却不说，又咽下去。该朝这边走，他却拐到那边去。事后明白过来，就害臊，就生自己的气……既然生自己的气，也就生天下人的气。更讨厌的是横着来，更坏的是斜着来。做人可不该这样，不该捣鬼。生活吗，很简单，为什么不能好好儿的活一辈子，不能想想，人家会对你留下什么记忆。记忆呀，它记得一切，保存一切，点滴不漏。你死后哪怕每一天都在坟头上栽上鲜花，那还是白搭。唉！”达丽娅又叹了一口气，对这一声叹息，安德烈突然产生了过去他怎么也不会产生的怀疑：是这叹息声自然流露出来以减轻郁积的沉痛呢，还是奶奶在巧妙地用叹息声应和自己的谈话。但他并没有打断奶奶的话。奶奶接着说下去：“你以为，卡捷琳娜家那个彼得鲁哈装傻没装腻吗？他呀，这小伙子可不蠢，不蠢。他知道自己是在装疯卖傻，不是在生活。但他已经不会回头了，居心不良，偏不回头。他走上这条路，就要走下去，一走到底。彼得鲁哈又算什么！彼得鲁哈没有责任。看看一本正经的人，似乎他生活得合情合理，那更是在装模作样。他不是自然而然地抛头露面，总是在冒充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他什么地方比你强？为什么你不是什么模样就什么模样，却总想装假呢。亲家母塔

吉雅娜有个女儿嫁给伊凡。古季卡,就是这个妖里妖气的姑娘,还喜欢装斜眼,没羞没臊地翻白眼。这个古季卡,她把锤子藏到厕所的后面。要是有人看到她往那儿去,她马上就抓起锤子敲打起来,好像就是为了钉紧一块木板才上那儿去的。真该问问她:谁不上那儿去呀?有什么害臊的?!瞧,我们人人都是这样的,装模作样钉木板。创造了人,让他生活,可他呢,你瞧,却装成另一个人。糊涂啦,唉,糊涂啦。装假装上瘾来啦。”

“你也是一样吗,奶奶?”

“我又怎么样?我有时也发现自己做得不对头。其实,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很容易。可是就不那么做,该走的路腿不走,该拿的东西手不拿。像鬼使神差似的。这要真是魔鬼干的——趁人们拍着胸脯争吵有没有上帝的功夫,魔鬼早就做尽坏事了。饶恕我吧,仁慈的上帝,饶恕我这个罪人吧,”达丽娅从安德烈身旁朝着门里画了个十字。“我又怎么样?!我不该责怪人们。不过,我眼睛还看得见,耳朵还听得见呢。我特别要告诉你,安德留什卡,你要记住。你以为,人们不懂不该把马焦拉淹掉吗?他们懂,可还是要放水淹。”

“那是没别的办法。必须这样。”

达丽娅从炉边直起腰来,她正准备把劈柴堆进炉膛,留待明天早晨使用,此时转过身,对安德烈说:

“没别的办法,那你们就一下子把马焦拉切下来嘛——既然你们什么都能办到,既然你们什么机器都造出来了……就请你们把马焦拉切下来,搬到有土地的地方,放在旁边。上帝赐给土地时,哪一个人也没多给一丈。你们倒觉得马焦拉岛多余啦。运走吧,留着它吧。你们会用得着它,它也会为你们的子子孙孙出力的。子子孙孙会给你们道谢的。”

“奶奶,没有这样的机器。这样的机器还没想出来呢。”

“要想就能想出来。”

也不知是由于害怕，还是由于对自己说出这种话感到害羞，她一边用木锨把劈柴放进俄式火炉的炉膛，一边以和解而流露着倦意的口气说下去：

“你问为什么要可怜他？怎么能不可怜？要是不顾自尊心——他生下来是小孩，一辈子就总是小孩啦。瞧他疯疯傻傻的——是小孩，瞧他哭哭啼啼的——是小孩。我老是看到有人在偷偷地哭呢。自己管不住自己，什么毛病也没有。有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压在他身上啊，看着真叫人害怕。他就奔来奔去，奔来奔去……而且是平白无故地奔来奔去。可以走的地方，他也跑。还有死……他好好的人，那么怕死！就凭这个就该可怜他。世上没有比他更怕死的了。还不如兔子呢。一害怕，什么事干不出来……”

达丽娅把木锨放在屋角，又转身回来。在安德烈的背后，在外屋里，从朝着安加拉河的一扇窗口射进了阳光。达丽娅的脸亮起来了。

“上帝呀！”达丽娅悔罪般地喃喃低语：“我提起死来……我这老东西一定是疯了。一定是的。”

太阳好不容易才得破云而出，这是真正的太阳，虽然尚嫌苍白无力。落山之前，太阳浮现在云缝间一道狭窄而明净的蓝天上，为了宣告自己获得了解放，它便铿然作响，熠熠闪光，又似乎在对人许诺，它此去不过是下山过夜，明天一早就出来开始工作。

公鸡嘶鸣，家畜乱吼；什么地方传来铁器的撞击声，听来庄严而洪亮。

十五

太阳没有失信,第二天按时升起来了。天空依然飘浮着乌云,那已是干瘪、疲倦、仿佛自感没趣的乌云了。然而早晨的东方却是晴朗的,于是太阳就无阻无拦地冒了出来。随着朝阳冉冉上升,乌云渐渐地稀薄透亮,而且不停地退缩着,退缩着,最后,终于像大块大块的冰凌似地化为乌有了。傍午,天空已经纤尘不染,焕然一新了,它欢喜得仿佛情不自禁地摇摆起来,在大地上空旋转,把那漫天晶莹的光波一层又一层地串连在一起。鸟儿腾空而起,嬉闹起来,翱翔起来,振翅尖叫着陡升陡降,欢庆着自己被赐予飞翔的幸福。潮湿的土地冒出乳白色的水汽,在阳光照射下随即消散。一洼洼的雨水正待发酵变酸,几只母鸡不时地探头仔细地瞧瞧水洼,似乎有意下决心学会游泳;一群猪崽在水洼里蹚来蹚去,可是酷热不到它们是不会躺下去的,不过是试探一番,回头可以在哪里卧倒而已。绿树和青草都灌满了浆汁,变得绿油油的。即使经过一个星期来的连绵阴雨,哪儿的树叶也未见一处黄斑,这意味着夏季必定是漫长的。雨中种种刺鼻而清新的气味,汇合成一股强劲的蒸汽,置身于其间,犹如闷在河水里,捉摸不透这水源头何在,是哪条小溪流来的。

午饭过后,歇了一会儿,巴维尔就带了人去摊草垛,晒那雨淋过的干草。雨,使人们忙上加忙了。不过最伤脑筋的是,它把雨前割草时那股热火朝天的情绪给冲垮冲走了。比方说,自己做过的活儿被退回来返工,总是叫人不大开心的;人们预感到,要等他们把这个活儿补做好之后才能继续前进,这样他们只能为干活儿而干活儿,并无快乐可言。起先他们的确是快乐过的,

此刻就一心希望快点收工，把草垛起来——回家。脚踏两只船的日子过够了：一只脚在这儿，一只脚在那儿，该找一处牢固的河岸定居了。现在，在阳光照耀下，觉得九月中已迫在眉睫，近在咫尺。可是各式各样的心事还有这么多，搬家的麻烦还有这么多——哪儿有那么多力气和时间？瞧，那头奶牛还在牧场上晃来晃去，并无灾难的预感——怎么安置它呢？连原来决心要割草的人这会儿都犹豫了：哪儿有时间？抡起斧子把牛一宰，了却一桩心事，岂不更好吗？

“本来也可以冒雨下地割点草的，”达丽娅埋怨自己和家里的男子汉们，不满地唉声叹气，懊恼人们总是事后聪明。

“本来也可以，”巴维尔眼也不抬，急躁地回答说。“可惜雨没告诉你它哪天下完。草割下来也会烂掉的。”

唯独安德烈没有泄气：

“我们会割个够的，奶奶，你急什么？等天完全转晴之后，我们就放手割好了。让我明天去割也行。一个星期我们能割它三十来垛。三十垛够喂您一头牛的了是吧？”

“要是土豆丰收了，怎么会不够。”

“一定丰收，它还能跑到哪儿去！”

一听安德烈这么有把握，巴维尔也开心了：

“要不，我去跟谁说说合伙干吧。三把镰刀割得快些。眼下农庄里干活收工不晚，”他还在照习惯说“农庄”。

“你们可想着点，坟，巴维尔，坟，”达丽娅念念不忘地说。“你们不把坟迁走，我就不许你们离开马焦拉岛。再不然，我自己也留在这儿。”

安德烈用惊奇而疑惑的目光看看父亲，又看看祖母；看看祖母，又看看父亲：难道真像他们所说的，得刨开坟头，把老早老早以前，他还没出世时就埋葬的那些死者的遗骨给扒出来？图个

什么？行将动手做的这件事叫他害怕，觉得恐怖，不吉利；但同时又惹他的好奇心，令他手痒：怪有趣的。怪有趣的：一个人在土里躺了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以后，会变成什么呢？况且还不是什么外人，而是你本家本族的人——叔父或者曾祖父。这是否能在心里唤起一种特别的，先前不曾体验过的情感呢？日后这一辈子，未必能再有机会亲历这类的事。这是一个特殊的事件，一段特殊的历史，绝对不会重演了。

但是众所周知，人只能打算……第二天，突然一声晴天霹雳：派专人来叫巴维尔火速赶到新镇去了。他所属的一个修理工，由于酗酒或是疏忽大意、玩忽职守，把一只手插进车床，造成了终生残废。汽车开到牧场上去接巴维尔，巴维尔乘车离开牧场，跑进家门只停了一会儿，没有喝茶，没带行装，衣服一换，便匆匆奔向河岸了。达丽娅追着喊着：

“等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不知道，”他跑着把手向后一挥。

这一天安德烈去割草了。皮尼金家的割草场约十五年来一直没挪地方，分布在右岸的远方，在一片耕地和一片满是土丘的草滩边上。安德烈没有忘记到那儿去的路，早上就独自前往了。随身带了一小包吃的，兴许会懒得回家吃午饭呢，还带了一个小饭盒和一块磨刀石，磨大镰刀用。他扛走两把大镰刀：父亲本来傍晚要早点从牧场直接拐弯到那儿去的。可是他没去，关于发生事故的消息，安德烈是摸黑回到家以后才知道的。

“他明早就会坐船回来。”安德烈听祖母讲完情况说；他说得那样有把握，祖母也就相信了。

然而第二天早上巴维尔并没有回来。达丽娅左等右等，等到太阳偏西，忍不住了，就跑到割草场上去找安德烈。草滩里雨后积水一片，绕吧，要绕很远，走很久；她就糊里糊涂照直闯去，

一下陷进没膝深、黏糊糊的冷泥塘，好不容易才爬出来，满身污泥，湿淋淋的，活像个妖怪，到头来被迫还是得去绕。等她跋涉到了地方，已经精疲力竭了。可是安德烈不在那儿。一把大镰刀戳在地上，旁边是一间窝棚——这窝棚已经破旧半塌，还是分到这份地之后头一年用树皮盖的呢，至今在田间休息时或突然下雨时还都用得着。另一把大镰刀则吊在白桦枝头，这儿桦树总共有三株，那间窝棚就栖身于三棵树下。窝棚在树荫里，达丽娅离开它，坐在阳光下割倒的青草上，两条腿怎么也暖和不过来。她脱了鞋，两手搓着脚，打量起周围的情景。

安德烈与其说是割了草，倒不如说是弄乱了草，他显然不会干农活了，把从前的本事忘了，丢了。一个个的长条草堆乱蓬蓬地高耸着；还长在地上的草，从草堆里伸出来。一片片的草茬波浪似的忽高忽低。达丽娅仔细一瞧，发现草堆已经蔫了，干了。这么说安德烈今天根本没有割草，或者总共才割了短短的两三趟。一阵痛心的恶感压在达丽娅的心上：原来想的都实现不了。都实现不了，别指望了。都白搭。

她喊了一声安德烈，接着就喊哪，喊哪，一直喊到安德烈应了声儿。安德烈从离她半俄里以外上游河岸的柳丛里钻出来，手里拿着小饭盒，饭盒里有东西鲜红发亮。达丽娅猜到了：他采酸果子去了。上帝呀，真是个孩子！一不注意，他就钻树丛，找野果……他一个人可怎么过日子哟？

达丽娅到这儿来，是叫安德烈停止割草。一天来她提心吊胆的，听说要派只小船到新镇去办货，立刻就打定主意：让安德烈也去一趟，去打听一下父亲在那边的情况。割草吗，先扔下吧。等巴维尔回来，他们一起儿去割，他不回来，安德烈一个人反正也对付不了。可是达丽娅差不多已经心里有数，今年割草也就到此为止了。说什么今年不今年的！割草的事，她这辈子

算再也见不着了。这种活儿在生活中被取消了。难道就这一种吗？……安德烈想把大镰刀藏进树丛，希望回来接着再割。达丽娅却不理睬他，断然拿起一把大镰刀往肩上一扛，另一把往他手里一搵，就大步往家走；一边走，心里一边想，以后可得腾出时间到这儿来告别呀。马焦拉岛上的土地都是自己的，可这块地呀尤其是自己的：在这块土地上花过多少劳动，流过多少汗水，又收获了，尝到了多少快乐呀！

安德烈一走音讯全无。为了不致因坐等而虚度时光，达丽娅不慌不忙地在菜园里干活儿。雨后杂草丛生，土豆被雨水冲了，土豆秧细细的疯杈直往上蹿。只好把它重新收拢起来。经过一个星期的雨淋，加上日出天暖，黄瓜结得又多又好，一天便可摘上两次。达丽娅一面摘，一面叹息这些黄瓜没人吃，回想起当初自己的儿子们，后来是自己的孙子们，几乎是瞪眼盯住每一根黄瓜，还在架上长着呢，就标好了记号：这根是你的，那根是我的……你以为这是老早以前的事吗？昨天的事。有一回闲谈，安德烈缠着她问长问短，她就说，人生在世没有几天哪。可不是吗，一眨眼一辈子就过去了。就能有三天盼头：昨天，今天，嗯，也许还有一点明天。

现在菜园里有东西可啄了，母鸡往里钻，天上的鸟儿往里落。达丽娅就决定竖个稻草人。她用两根木棍扎成个十字架，把自己一件破破烂烂的上衣套在上边；没找到合适的帽子，就在顶上扎一块肮脏的破布。她往后退去，等土豆秧遮住了插在地上的木桩，她忽然大惊失色：这不就是她吗。是她，是她……就这么往菜畦当中一站，胳膊朝两侧一伸，一只母鸡也不敢靠近，一只鸟儿也不敢飞来。她又自寻自问她像谁……仁慈的上帝呀！——也许命该如此？

直到第四天安德烈才回来，说父亲正被人拉着一个委员会

一个委员会地跑，这个案子一时完不了……他们决定不割草了。可是这会儿，达丽娅心里想的已经不是草，她心惊肉跳起来了：

“这跟他有什么相干？他没在那边儿啊。他在这边儿来着。为什么要拉住他？”

“他是负责安全生产的。”

“那又要把他怎么样呢……为了这个不安全？”达丽娅这辈子早就看透了，人们问罪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伸出手指一点，点上谁就是谁，就判谁的罪。那罪呢也不长眼，叫它粘上就甩不掉。

“没事儿，”安德烈跟平常一样，满有把握地回答说。“拉着他跑一阵子，他揪阵子心，喏，大不了再训他一顿，就完事了。”

“这是他跟你说的？”

“他说的。我自己也知道。明摆着的事。”

安德烈准备动身了，却不知怎的又对达丽娅辩白起来，说不能再拖延了，有个当兵的很快就要从部队里回来，到那时再找工作就难了。但是达丽娅并没有拦他，既没提割草，也没提迁坟——眼前的事态果然如她所料。这天晚上鲍戈杜尔吃力地走来了，坐了好久，摆出一副对安德烈咬牙切齿的神气。安德烈也就斜着眼用挑衅、凶狠的目光回敬那老头子。他们不声不响地喝茶。但安德烈不一会儿就从桌边站起来，打着口哨，哼着小曲，开始收拾手提箱，并不掩盖临行的喜悦。要是从前，达丽娅对这口哨是不能容忍的，会问：“你在吹口哨往外赶谁，你要把谁赶出屋去，没出息的东西？”如今她觉得反正一样了，人人都得被赶出去，一个也剩不下。鲍戈杜尔嘎嘎地发出鸭鸣声表示愤慨，怪她为什么沉默，为什么容忍。可是达丽娅装作没听见，装作不懂这些暗示。

等到鲍戈杜尔对达丽娅心怀不满、怒冲冲地离去之后，安德

烈愤慨地问道：

“奶奶，你干吗招待他？这么个畜生，你怎么不把他轰走？这个东西不是人，是畜生。”

“怎么不是人？”她心里极不乐意地、神情倦怠而哀切地回答说。“他是人。”

“他算什么人？！你倒是仔细瞧瞧他，瞧他那副德行，叫人害怕。他连人话都不会讲，野兽似的连吼带哼的。”

“用不着多说话，我也明白他的心。他也明白我的心。我呀，安德烈，如今正在找跟我一样的人呢，可不能马虎。我自己难道比别人强，还是怎么的？再也没有别人明白我的心了。”

早晨安德烈临上路时，在屋里就要跟达丽娅告别，不想让她送自己上船，这使达丽娅感到伤心。但达丽娅还是去送了。不过达丽娅觉得，比这种伤心更强烈、更痛心的，却是另一种说不出的伤心，因为这是没有合适的字眼儿可以形容的。它使你只能感到痛苦揪心，就像人们苦于相思或害病时那样——说不清是什么疼，什么地方疼。达丽娅清楚地记得，安德烈从昨天到家至今天离家，根本没出过院子。他没有在马焦拉岛上转一转，他没有为再也无缘看到马焦拉而暗自伤心难过一阵，他没有动心……唉，在他出生、长大的这块土地上，总该有点什么叫他最后一次依依不舍的呀；可他箱子一提，抄近道下了岸，就发动了马达。

永别了，安德烈。永别了。上帝有眼，不会让你的生活妥当的。

不久，彼得鲁哈又什么也没说就呼哧呼哧地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卡捷琳娜再次搬到达丽娅家来。

时令已过八月，到了秋熟时节。菜园里，田野上，树林中，样样都在成熟。安加拉河也成熟了，像个女人一样地成熟了，游荡

够了。雷神节一过，像举行过婚礼一样，任何人都断然不在河里洗澡了，因为“鹿撒过尿了”，不能再洗。天空黯然失色，即令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它也露出一副沉重、萎靡相。气候不再变化无常，天气晴朗、干燥。但毕竟可以感觉到时令不同了：夜间冷冰冰的，繁星闪烁着明亮夺目的光辉，时而有星星陨落，一路飞行燃烧着，用那一条条火热的告别的光带划破夜空。仰望着这一颗颗陨星，心里便也像有什么东西惶惶然纷纷坠落起来，于是心里感到孤寂、抑郁。早晨，晴朗异常的夜一过，便涌起灰蒙蒙的大雾，一时间屯集在岸畔，暂不全面笼罩安加拉河河面。分明已经缩短、但尚未丧尽威力的白天，往体内吸足了水分，看来已经满得不能再满，鼓得不能再鼓，已然超过了它的载重能力。

果然，傍晚一到，像是突然发生了阻塞似的，在遥远的天外，就有两三阵雷声愤然发威，不过仅限于发威而已，并不爆发为狂风暴雨。

割草的人们辛苦完了，草场上耸起八个大草垛。为自己大胆割草的，全村只有两户：一户是柯什金家，也就是柯特金家，这个和睦的大家庭倾家而出，轻而易举地为一头奶牛割足了饲草；另一户则是达丽娅的女邻维拉·诺萨列娃家。这个女人有一股惊人的拼命精神：她雨里、夜里不直腰，没有帮忙的，一个人割呀，割呀，割够了一头牛吃的草。搂草、堆草也几乎是她一个人干的，因为那个十一岁多的女儿不大顶用。上垛则是大伙儿干完集体的活儿以后，一拥而上帮她干的——这是出于对维拉那股子犟劲的尊重和惊叹。虽说垛完草后这婆娘端出吃的款待了大家，可是全农庄的人一拥而上帮她垛草，显然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成全她：她不顾一切地、叫他们都自愧弗如地护住了这头牛，为孩子们保住吃自挤的、不花钱买的牛奶的权利。达丽娅望着维拉，自咎地想：她当初也该试试啊，也该再扛起大镰刀去割

草啊。那样一来……那么,大概安德烈就会多住几天,巴维尔也就不会碰上这种麻烦事。也许就因为老是犹豫不决,闲在家里干等晴天才出了事的。真等到了……可她这个老婆子,聪明过头了,在本来可以轰着男人们去干活儿的时候,却天天呆在家里,像是天天做寿似的——为什么就不能冒雨割草呢?青草淋了雨也得不了霍乱的。明白过来了——真了不起。唉,活了八十多岁了,连这点事都弄不明白,还有什么用?!

人们在起劲地刨鲜嫩的土豆,加上一种黄蘑炒来吃。这种黄蘑成群成片地破土而出,数不清采不完,就像是把以后将突然中断的岁月的黄蘑提前一次都长出来似的。哪儿只要有一株小松树或小杉树,哪儿就必定有密密层层黄蘑。白蘑菇,白杨蘑和白桦蘑也都出来了,不过它们的出头露面是从容不迫、慎重其事的,不匆忙,不轻率。总而言之,这最后一个夏天仿佛知道它是最后一个了,所以就带来蘑菇丰收,也带来浆果丰收。继酸果成熟之后,沿岸的醋栗也熟透了。达丽娅有一天去了一趟,转眼间就摘了一大桶,好不容易才提到坟地上,放在亲人们坟边的树丛里。傍晚跟卡捷琳娜一块又去了一趟才拿回家来。女人和孩子们近来纷纷到波德莫加岛去,那儿的水越桔也是要多少有多少。近几年来人们才开始采“乌鸦果”——忍冬果,传说这对治高血压很有效。不过老年人不懂什么叫高血压,也不知道忍冬要跟什么一起吃,所以照旧是不吃这种略带苦味的、似乎真与乌鸦有联系的野果——它喜欢长在砍光树林的地带和堆满废物的地方。忍冬冒充水越桔,却没有干净的模样,单这一点就对它很不利。忍冬这名字也很古怪,不干不净淡而无味的,从前马焦拉岛上的人不认识它。醋栗、稠李或越桔就完全不同了,无论如何不能怀疑它们出身低贱。对,在上述两岛上越桔很少,人们只消张嘴尝上一颗,马上就会过河到烧毁了的那片老林地带去摘。

不过越桔的成熟期还没有到。这才是当之无愧的浆果呢，任何人永远也不敢管它叫乌鸦果、黑熊果的。

达丽娅一直等着儿媳妇索妮娅，心想，索妮娅大概会坐船回来，四处跑跑，采点野果，她达丽娅呢，随后就可以熬出果酱。但是索妮娅连面也没露，可见是在新地方过惯了。她不能总是忙啊……对，日子谁爱怎么过，就得怎么过。巴维尔在他被叫走后第二个星期才回来，甩掉了那个案子，也甩掉了队长的职务。他给老太太们带回点茶叶和砂糖，说他往后要开拖拉机了。他把菜园里各式各样的蔬菜装满船，来了不满一天，就又驾起小汽艇突突地开走了。达丽娅走到村外的岛岬上，久久地目送着船上巴维尔那驼背的、一动不动的身影——那身影仿佛是离开一座陌生的荒岛似的。她于是沉痛、厌倦地思量起来：不，巴维尔自己做不了主。倒也不是索妮娅支配他，这他是不会答应的——他们俩都不过是随波逐流，被往什么地方冲走了，冲走了，头也不许回……而今独立迈步前进的人少有。莫非到二儿子伊凡家去，到林场去？可那儿情况怎么样呢？地方倒不算远，可那是外乡，外乡人，外乡东西，不知儿子是不是也变成外乡的了。要不先去住几天，看看？不行，应该先把马焦拉送走。送走马焦拉，然后最好是到自家人那儿去，到那个自家人比这儿多十倍的地方去。达丽娅凭着飘忽不定的记忆，不由自主地一个个回想起躺在那边儿的人来。她突然想起了她的老头子——米隆。一想起他来，便羞愧得发呆：她已经开始忘掉米隆了，她不常，甚至极少想起他。上帝呀，一个人离别自己的亲人是多么轻而易举呀，儿女以外的一切亲人都忘得多么快呀：妻子忘掉丈夫，丈夫忘掉妻子，姐妹忘掉兄弟，兄弟忘掉姐妹。下葬的时候，一时间难过得揪着自己头发，要死要活，两腿发软站不住；过上一年半载，那个人，那个跟自己朝夕相处了二十年、三十年的人，那个跟自己

生儿育女，彼此分开一天都不可想象的人，就好像根本没有到世上来过似的了。这是怎么回事？——是注定如此，还是人的心肠硬透了？一个人非常想念死在自己前头的儿女，那也不过是因为他感到自己有罪：他有义务保护他们，但是没保住。跟其余一切的人或偶然地，或非偶然地——一个爹妈养的——彼此相聚一时，相处一阵，谈上一谈，亲热一番就散伙——各奔西东。不，野蛮哪，人是野蛮的，连野兽都不会这样。要是母狼死了，公狼就绝不活下去……

达丽娅为自己辩白的理由只有一个——如果硬要辩白的话。她的老头子米隆连个坟头也没有，因而不能在坟前坐一坐，撕心裂肺地悲一阵，哭一场，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再想象一下将来的前景。米隆在秋天渡过“自己的安加拉河”进了原始森林，就失踪了。他一去不复返，像钻进了地缝一样。谁都说不上他出了什么事。当他所带干粮足以维持的时日超过一倍的时候，达丽娅真的慌了，她跑遍全村求救，于是村民们出去寻找米隆。米隆打猎的地方他们虽然知道，却一点踪迹也没找到。跟他一道失踪的还有两条狗，真是不堪设想连人带狗是怎样死去的。米隆当时并不老，达丽娅是按照自己现在的年龄称他“老头子”的；他那时刚过五十，正是个精壮的汉子，大约是巴维尔现在这个岁数。但是又不能拿他跟巴维尔相提并论：父亲要更结实，更活跃，性子更刚强。也许这不过是今天看来如此而已？很多事情由于时光流逝而被冲淡；由于记忆衰退失灵而被忘却，它们八成确实跟今天所回想的不一样吧。你瞧，米隆被回忆起来了，可是回忆者有点平平静静，无动于衷。那颗心冷透了。冷透了，它所挂念的唯有近在眼前，与今日共存亡的东西了，唯有那个马焦拉了……将来活在世上的人们对马焦拉的回忆，难道也会不比对隔年的雪的回忆更深切一些吗？既然连自己的亲人都遗忘

得这样快……

“上帝呀，饶恕我们吧，我们软弱、健忘、心灵空虚，”她想。“对石头不问罪，那是石头，对人是要问罪的。莫非你问累了？为什么你的问话传不到我们的耳边？上帝呀，饶恕我吧，饶恕我对天发问。我不行了。可你又不许我走。我已经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就像吊在天地之间：什么都看得见，却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我责怪人们，但这权利是谁给我的？可见是我脱离了人们，该把我带走了。该了，该了……派人来接我去吧，上帝呀，我求求你。我在这儿对谁都是外人。你把我带到亲人那儿去吧……带到我更亲近的那些亲人那儿去吧。”

安加拉河在阳光照耀下流动着……时光在上游吹来的沙沙轻风的伴和下流动着。身后是那被河流与时流冲刷着的马焦拉岛，苍穹高悬在头顶之上。既然苍天是如此美丽而森严，它笼罩下的大地自然是十分美丽的。人们可以拦住安加拉河，但是时光是不会停止流动的，那看似运动着的统一体的东西，就要分裂了。马焦拉岛即将沉没到水下，但天空却将依旧闪光，并欢度晴朗的白昼和晴朗的黑夜。“天跟马焦拉岛有什么关系？”达丽娅纠正自己道。“这是人的事。马焦拉抓在人们手里，是人们在支配着它。”在达丽娅那一连串疾速而无心的、仿佛从身外袭来冲击着她的论断中，毕竟有些东西正在分裂，那本来完整易懂的东西难以自圆其说了。安加拉河在流动，时光也在流动……这样一个短促而固执的、中断了的念头，不住地跳动着，跳动着。

达丽娅不由得想跟谁辩论，论证自己的主张，尽管已经知道真理不在她那儿。

晚上躺下睡觉时，达丽娅问卡捷琳娜：

“没有人，可是就像有人在跟你说话似的，你经历过这样的事吗？”

“谁说话了？”卡捷琳娜惊慌地说。

“不知道。我今天睡醒时，自己正在大声讲话呢。就像有人呆在我身边似的。他问我，我就跟他说话。”

“是圣母！问什么来着？”

“全都模模糊糊的，叫人难过……也说不上都问过什么了。我兴许是要疯了。要疯那就快点也好……”

十六

这已是最后的时日了，这些日子虽然算不上风平浪静，却也堪称和平，似乎有家庭的气息。后来突然有一大队人马从城里来收割，他们三十个人左右，除去三个年轻而已婚的女人之外，全是男的，也都年轻、强悍。他们一来到马焦拉岛就放纵起来，头一天他们就喝得烂醉，彼此大打出手，结果第二天便有两个不得不被送去就医。也是在第二天他们就吵吵闹闹的，争辩谁是谁非；派出一条小船到店里再去办酒，晚上又喝了一通儿，不过喝得少些了，没有打架。不到一天，就把马焦拉村民吓得魂不附体。没要紧事，很少有人出门，路过这帮人落脚的农庄办公所时，都尽量远远地绕过去。当两个年轻人敲响达丽娅家的门时，她真想当即下跪哀求：可怜可怜吧，别伤害我这个基督的信徒。但两个青年要了点葱，甚至还塞给点葱钱，就走了。日后，达丽娅念念不忘，总把这队人马中的那两位另眼看待。只有妖魔鬼怪全不怕的鲍戈杜尔，故意为难似的溜到农庄办公所，聚精会神、心怀不满地去瞅这些外来人。看来，这些外来人尽管也挑逗、取笑鲍戈杜尔，但也有几分害怕，心想：他不是人，是怪物，这样的怪物什么鬼主意生不出来。他赤脚，披头散发，眼睛通红，

像只猴子一样垂着两条长臂，闪着逼人吓人的目光，他不由得令人望而生畏。而当村里有人提醒说他头上有罪，也许还不止一条人命罪以后，连挑逗鲍戈杜尔的事都少见。不过除了前一个外号，又给他加上了一个——“雪人”。一听到这个外号，他则依照山上下来的雪人的惯例，就龇牙咧嘴地发威，骂娘。

可是这些外来人好歹总算动手干活了，慢腾腾地收割庄稼了。他们是不会正经干的，收割的不是自己的庄稼，受了损失，也不是他们的。反正现在不会没面包吃，反正这片地还能最后打一次粮食。不是可能连今年也打不成粮食的吗——反正一样……不断地有人离去，有人前来换班：一只小船几乎天天都往新镇跑，往商店里跑。今年种的庄稼比往年有集体农庄的时候少多了，本来靠自己人动手就能收回来，不知为什么让这帮人来包办……自己人呢，草一割完，就又过河到新镇去了，到时候刨了土豆就彻底搬家；村里又只剩老太太们看家了。她们出门上街之前，总要从门缝里往外瞧瞧，是否平安无事；走在街上偷偷摸摸的，坐在家里不声不响的，夜晚一来，就把一道道门闩全都插好。

时光流逝，过了一天又一夜，一昼夜就报销了。在这一昼夜之间，秋季更加势不可挡地逼上前来。早上，冰冷的寒潮久久不退，晨露和大雾迟迟不消。太阳升得老高才得露面。农庄办公所那边人声不断，大吵大叫骂骂咧咧的，对骂一阵，哄笑一阵。一辆发动好的汽车在那儿突突地响了老半天，人们这才终于钻进汽车开走。接着，办公所后的厨房前闪出三个女人来，远处难以区分她们的面目。三位个个都腿脚麻利，嗓门儿挺高，穿男式裤子，三位恰如同胞姐妹，都是矮墩墩、胖乎乎的。不过听说有一位的丈夫也一块儿来了，另两位的没来，苦头可就吃的不少。傍晚，一个没出工的小伙子钻出房门，不知是酒醉之后头痛呢还

是生病了，他搔头摸耳哈欠连连，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去解手，一边在思量着下一步怎么办——再去睡呢，还是起来。女人们偷偷地盯住他，冷不防抓住他，不由分说就叫他劈劈柴，从大桶里舀水，在厨房里打下手。于是厨房里便传出了哄闹声、溅水声和嬉笑声。

连日来太阳火辣辣的，阳光晒暖的气流在眼前飘飘悠悠，牧草、庄稼以及带来丰收的一切所蒸发的干燥的成熟气息，使空气略带苦味。田野上传来两台收割机悦耳的、全然不像机器发出的嘟嘟声。收割机的驾驶员，一个是马焦拉本村柯什金家的小伙子，另一个是城里人。在与皮尼金家的割草场毗连、装货方便的右岸；有一只驳船靠了岸。驳船运上岛来的是一台拖拉机和第二辆汽车；有两台收割机正在把粮食倒进那驳船呢。国营农场夏末买了一条快艇，把驳船拖来的就是这快艇。眼下，给外来人运送副食品，往返于马焦拉岛与新镇之间，传递各式各样的信息，全都靠它。由于害怕外来人，女人们就开始搭快艇，偷偷地把母鸡、猪崽、绵羊这些小畜小禽，从村里转移出去。事情就是这样：有个女人一带头，就纷纷照办起来了……天天都有母鸡嘶喊，猪崽尖叫的声音。奶牛暂时还在游荡着。为了运牛，也为了运草，男人们伐了树，正在水上扎着一只两层横梁带立柱、载重量高的大木筏呢。

看来，看来到头了……预定的期限不会推迟了。可是人们也不示弱——看吧，这是哪儿来的，有多少人哪！

另一队人马登上了那座没有农田、只有牧场和树林的波德莫加岛，这是从林场里来的。命令在一天之内把那儿的牲口都赶上马焦拉岛，幸好河汊里的水很浅。于是波德莫加岛燃烧起来了——这是那儿的一些破牲口棚烧了起来，接着一片片树林起了火。下游吹来的风把烟从波德莫加岛刮上马焦拉岛，一阵

一阵地遮天蔽日；太阳时而浮出烟幕，看上去好似一轮惨淡的圆斑。牛都畏缩成群，哞哞直叫。集体农庄留给国营农场的奶牛，惨叫着满岛东奔西突，成群结伙的炮着蹶子跑，口吐白沫。马呢，已经所剩无几，它们倒略微镇静些，但它们也害怕呆在岛上，都缩到水边。马焦拉人愤慨地说：

“这是怎么搞的？怎么搞的？！为什么就不等一等！这么干，马焦拉一会儿也得烧起来。东西都这么干燥……草垛，庄稼。溅上一颗火星儿就完了。”

话音刚落，磨房就被点着了，放火的不是本村人，本村的没人干得了。是谁偷偷一声令下，叫偷偷烧光了事呢，还是并无人下令，却有人蛮干呢：反正是得烧——那就让它烧吧，我们见识见识。干吗要吸别人的烟！我们自己也会冒烟，而且噼啪直响，火星儿乱飞！结果真冒起烟来了。黄昏，达丽娅走上街，看到那冲天的火光已不是来自下游方向，不是来自波德莫加岛，而是来自上游，来自村庄左侧，因而不禁失声惊呼。除磨房外，那边没啥可烧的。达丽娅急忙转身回屋，推醒已经睡觉的卡捷琳娜，说：

“咱们去跟它告别吧。那儿八成都是外乡人。它叫外乡人围着多难过呀，谁也不会说句好话给它听的！走吧，卡捷琳娜。”

“上哪儿！你在说啥呀？”卡捷琳娜给吓坏了。她们近来是无所不怕，听见一点响声就发呆，无心说出句意外的话就发抖——这不会招灾吗，这不会惹祸吗？

“磨房被烧着了。他们嫌它碍事了。它多好啊，给咱们磨过多少面哪！快穿衣裳，咱们哪怕到它那儿露个面也好啊。让咱们最后再看上它一眼也好啊。”

聚在燃烧着的磨房大门口的，确实是一色的外来人。这吞没着磨房的大火又能把人怎么样呢，为什么它会叫他们那样如

醉如痴呢？这些外来人似乎发疯了：他们跳啊，叫啊，朝大火扑过去——看谁能深入火场，久久不退，更有英雄气概——直到受不住了，倒在燎成棕红色的土地上，这才高声呐喊着滚回来。现场有两个女的，当有人为吓唬她们往火里推她们时，她们便尖声大叫，抡起拳头打男的，捶他们的背，就感到挺满意、挺开心、挺幸运了。有个小伙子，年轻轻、傻乎乎的，爬上一棵白桦树，坐下来悠荡着两腿，给火弄疯了似的，在树上大声数起快板来。树下一条狗对着他，就像对着一只野兽汪汪地叫着，这条狗也给周围发生的一切弄得发狂了。人们伸手指指那个青年和这条狗，哈哈大笑起来。狗意会到它讨人喜欢了，就更加卖劲儿。开心哪，开心……白桦树上，叶片旋转着，颤抖着，靠火一侧几个沉甸甸的树杈坠落下来。在耀眼的火光中，白桦树仿佛变成通体无色、透明的了。人们的面孔也仿佛变成透明的、血肉全无的了。

磨房燃烧着，传出恐怖的、发自内心的嗥叫声。高处的火焰被风吹折撕断，一团团浓烟飘向远方。达丽娅和卡捷琳娜靠边站在山墙对面，躲在树丛后避开外来人，只给磨房看见她们。磨房已经完全消失在火中，那火，嬉戏般地把磨房忽而举上去，忽而放下来。似乎这场疯狂的大火会猛然拔地而起，腾空飞去，沿着安加拉河飞行，去威吓万民，去欢庆这魔鬼的盛大喜事。

两位老太太连脚步声也没听到，有个生人已经走到了她们跟前。这也是个外来人，但不是年轻人，身穿方格衬衣，没系纽扣——在一片呼呼作响的火声和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中，她们哪里听得见脚步声呢！那人在一旁站了片刻，便用不无同情的语调问道：

“本来是挺好的一个磨房吧？”

“是挺好的，”达丽娅面无惧色地回答。

“我明白，”那人点点头说。“可不是嘛，它也帮你们出了力

了。”继而拉长了声调缓缓地说：“它走——了！”

“走了”——这个字眼儿达丽娅从此念念不忘，成了她最重要的字眼儿，能够用来解释一切，形容周围发生的一切。一只猪崽被人装进麻袋背上快艇，一路上吱吱尖叫，达丽娅目送着，就想：它走了。国营农场的牲口被赶上安加拉河岸，准备渡河运往新镇所在的彼岸，不进村，放到滨河牧场去——达丽娅便出来送，眼看着人们把那些拼命倒退的牛和牛犊，拖上一个四边围着栏杆，木筏不像木筏，渡船不像渡船的庞然大物，把它们拴在环子上，推它们离开陆地——它们走了。从波德莫加岛随风飘来气味发苦的黑烟，灌满屋子呛得人直咳——达丽娅就想：走了，波德莫加岛走了。克拉芙卡·斯特丽古诺娃把一头小公牛交给国营农场让城里人宰了吃肉——它走了，好端端的……一垛垛的干草被运到岸边——走了！自己的、习惯的东西剩得越来越少，一切都在匆匆离去，到那远离这座险岛的地方去。于是村子落得孤苦伶仃，空空荡荡，毫无生气，它也准备走呢。外乡人在村里说话的声音，就像是从一只大桶里钻出来似的，而本村人的说话声却都消失了，下落不明了。此刻，视线可以穿过全村，极目远眺——马焦拉村空了，无以障目了。

克拉芙卡·斯特丽古诺娃靠杀一头小牛跟城里人挂上了钩以后，就暗中要求他们把她的房子也给烧了——克拉芙卡急着要钱。城里人当然暗自欢喜，二话没说就照办了。还得谢谢呢，他们没有让火延及左邻右舍。可是这下就在村子中心挖出一个直冒烟的黑坑，视线投射过去，无可依托，便跌落下去，仿佛掉在水井里似的，跌进远处宽广的安加拉河。分裂了，马焦拉村分成两半了……

在磨房“走了”的那天晚上，达丽娅和卡捷琳娜摸黑从火场回到家时，在门口碰到西玛带着她的小外孙柯利卡。他们正坐

在上了锁的门边，柯利卡啜泣着，西玛为了安慰他，正苦口婆心地跟他讲话呢。西玛连忙迎着两位老太太站起来，随后，照她往常焦急不安时的惯例，一只手掌抚摸着自已的面颊，恳求道：

“今天让我们到你们家来住吧……我们害怕。他不肯睡，老是哭，我也不能睡。真可怕……真可怕……”

于是就让他们俩留下睡在床上，这张床从此一直没空过：西玛白天还回家，做做家务或到菜园里干活儿，天一黑就到达丽娅家睡觉。她是一次吓破了胆，就再也壮不起胆来了。倒也并非惟独西玛感到害怕。连鲍戈杜尔在达丽娅家穿堂屋里，看见挂在皮袄下的那支单弹步枪时，也高兴起来，说道：

“给我吧。婊——子！我要杀人！”

“你要杀谁？”达丽娅慌了。“这我怎么能给你？你真会打死人的！你这是怎么啦？跟谁发这么大火？”

“他们吓唬人，婊——子！要烧我房——子。我把他们……”他就像开枪射击似的，闭紧嘴唇张口“叭”地一声响。

“可这枪根本不能放。从来没人动过。还是他自己活着的时候……”

然而鲍戈杜尔把枪摘下拿走了，这不过是去吓唬吓唬人而已，因为子弹、火药，他都没有想过。要有子弹，达丽娅也不会把枪给他：他若急中生智，也真能打响的，所以他才成其为鲍戈杜尔啊。现在光靠急智是不行了。想跟他要东西，很难；求她达丽娅给嘛，也要不出多少——因而人们有事总是去找巴维尔。

添了两个借宿人——西玛和小外孙，就不再是两个人，而是四个人合住在一座绣楼里似的了……土豆及各样其他蔬菜都有的是，面粉，以前集体农庄时存的还没吃完，茶叶和盐，巴维尔不是亲自带来，就是托人捎来——他现在开拖拉机，正在刨树开荒，所以活儿不能说停就停。牛奶是自产的，达丽娅很高兴牛奶

终于有人喝了，一早一晚她都给柯利卡倒奶喝，还嘱咐他白天也跑回来喝呢。达丽娅自己睡在炉炕上，卡捷琳娜跟从前一样睡木床，叫西玛带着柯利卡睡大床。安德烈走后，鲍戈杜尔更常来了。这号人，白天倒很少在家，夜里一定要回家睡觉，怕叫人把房子给烧了。为了炫耀那支单弹枪，他几次背着它走过农庄办公所，一边还鸭子一般嘎嘎地叫着，咳着，引人注目。外来人则蜂拥到门口，喊道：

“喂，你呀！游击队员！”

“雪人！”

“土耳其人！”

“要跟谁打仗，啊？是什么式的，你这门大炮？”

“你问问他自己是什么式的吧！没在彼得大帝手下当过差吧？”

“愿不愿意给伊凡雷帝效劳啊？”

“他那门大炮根本放不响。”

鲍戈杜尔一直就在等这句话。

“出来！”他朝旁边一指，从肩上摘下枪来。“出来，婊——子！”

然而，没有人自愿体验一下那枪是否放得响。鲍戈杜尔得胜回朝似的大叫一声，把枪一背，在一阵哗笑声和口哨声中，头也不回，扬长而去了。

十七

在达丽娅的家里，每晚入睡之前，夜话总是经久不息。她们在黄昏时分，灯也不点就躺上床；开头所谈的不外是就寝时的话

题——这时，悠闲的饮茶和一天来最后一些从容不迫的操劳，都刚刚结束。她们照例抱怨着自己那把老骨头，一边拾掇一边哼哧，把铺盖弄得松软些，不让老骨头受屈。这仿佛是在签个字简捷地证明一下：她们曾经了解这一天，曾经置身于这一天，曾经回忆起刚刚逝去的这一天。不过，窗外的天光越来越黯淡微弱，万籁俱寂了，琐碎的忧念遁去了，谈话也变得平和起来，自由起来，变得更深沉、更凄切、更推心置腹了。三位老太太彼此之间已然不见形容，但闻语声。西玛身边的男孩在梦中发出阵阵甜蜜的鼾声，玻璃窗冰一般地微光闪烁。这座木房似乎举世无双，显得十分高大，房内茶炊里欲熄未熄的炭火，还散发着幽微、馋人、酸溜溜的气息。于是心头话语便自然而然地涌到嘴边，记忆也轻捷好使了。她们谈什么呢？她们能谈什么呢？话头扯到哪儿就谈到哪儿，可是她们的话题难得都脱离马焦拉村和她们自己，说来道去万变不离其宗。

这天晚上扯到了彼得鲁哈：话头是从他开始的。到区里去领房钱的克拉芙卡·斯特丽古诺娃，在波德沃洛奇纳亚村的码头上遇见了彼得鲁哈。她说，彼得鲁哈在那儿干事呢：他放火烧那些扔下来的房子。在本村举手干这种事不好意思，这倒可以相信。这个差事对彼得鲁哈来说是熟活儿，干起来轻而易举。克拉芙卡断言，彼得鲁哈每烧一所房子就得一笔钱，得钱好像还不少呢，他没有怨言。“酒足饭饱，鼻孔冒烟”，他似乎对克拉芙卡这样炫耀过。也对，饭饱不饱不知道，但酒足是事实，当时他就跑到轮船上又新买了一瓶。他也曾请克拉芙卡去吃饭，但据说她拒绝了，因为站在彼得鲁哈旁边的那个汉子，她觉得不可靠，她身上带着钱呢。

忍痛失去一座木房的卡捷琳娜，不能饶恕彼得鲁哈，他居然在烧人家的房子。跟克拉芙卡交谈以后，卡捷琳娜一天都在又

羞又怕地唉声叹气：

“哎哟，多丢脸哪！哎哟，多丢脸哪！他莫非真糊涂到家啦？这以后他还想怎么出去见人哪？！他还想怎么活在世上啊？哎——哟——哟！”

达丽娅也对彼得鲁哈感到愤慨，但第二天却连声叫好地说：

“他到底找到称心的差事了。要不然怎么也找不到。对，那你就烧房子吧，别盖房。塞把干草，擦根火柴，就着这根火柴再点上一支香烟，还可以烤烤火呢，这份美差你哪儿找去！波德沃洛奇纳亚是个大村子，从头到尾真有三俄里长呢……那儿的活儿够他干的。”

但是卡捷琳娜却忐忑不安，晚上大伙都躺在床上时，达丽娅听她又哭又诉的，就说：

“你干吗哭哭啼啼的？你干吗这么折磨自己？你还不知道你的彼得鲁哈是个什么样的人？就你们家一个这样，还是怎么的？咱们到磨房去过，难道你没看见那儿有多少？瞧你张口闭口的：丢脸，丢脸……他不烧，那别人也要烧。有神的地方就有鬼——上帝原谅我吧！……”

“让别人烧嘛……让别人烧嘛。他干吗烧？他至死背上一个臭名，洗也洗不掉。”

“他干吗要洗呢？他就背着它，日子过得也不比别人差。他还要卖弄卖弄呢。你呀，卡捷琳娜，别为他多操心了，还是为自己操点儿心吧。他有什么，这差事干完了，总能找到别的事儿做。”

“那我是他的妈不是？他也叫我没脸见人。人家会用手指戳我的脊梁骨……”

“你别瞎想了。谁会用手指戳你的脊梁骨，谁会找你呀？再说人家也不认得你。你打算活多久，活一百岁，还是怎么着？”

听了这番劝慰，卡捷琳娜并不回答，而是小心翼翼地问道：

“也许该到那儿去一趟？叫他住手？就说：你干的什么事？”

达丽娅满意地支持说：

“去吧，去吧。去瞧瞧哪儿的房子烧得旺——是波德沃洛奇纳亚村的呢，还是马焦拉村的？他为了欢迎你去，会给你一连气儿点着两所房子，要不就是三所，哎呀，那该多好看。回头给我们讲讲，太阳把哪个村晒得更暖和。早晨起来就上路吧，别磨蹭。为这个事儿，人们会驾着快艇送你走的。去叫他住手吧。他干吗去烧人家的房子，连自己的还没烧光呢。哎呀，卡捷琳娜，咱们怎么就这么糊涂啊？左活着，右活着，可就是一点聪明也没得着。看孩子们什么样，可咱们呢……啊？”

他们停止了这无谓的谈话，默不作声了。卡捷琳娜知道，她哪儿也去不了，怎么也感动不了、说服不了彼得鲁哈：他过去是彼得鲁哈，往后还是彼得鲁哈。看来，就是一直到死他彼得鲁哈也本性难移，他是这个命；她的命呢，则是做彼得鲁哈的母亲。她应当不声不响地认命，听天由命，什么也不抱怨。人们……卡捷琳娜开始思量，在人们面前，在熟人和生人面前，她该不该自感羞愧，也替彼得鲁哈感到羞愧呢——既然他自己不知羞耻？既然如今儿子，尤其是外人，都不需要她了，仿佛她已不在人间似的——那么她还该不该感到羞愧呢？也许，像她这样活在世上已经完全不行——为良心所不许，为羞耻心所不容。那么，就真的该装作已经不在人间？既然你的羞愧已不为任何人所需要、所期待，向谁负疚请罪，谁都对你的羞愧无动于衷了——你痛苦，你羞愧，还有什么用处呢？有什么用处呢？达丽娅……她什么都明白。达丽娅是不会责怪她的。只好一动不动，孤苦伶仃的了……没有什么活头儿了……

这时达丽娅却在想，她要是处在卡捷琳娜的地位，会作何感

想,会用什么言词为自己开脱。她多半也会产生卡捷琳娜那种感想,也会说出那种话的。卡捷琳娜若处在她达丽娅的地位呢,多半也会像她自己这样去回话。达丽娅头一遭如此深切地思索,一个人的处境、地位在生活中意味着什么。瞧,她用不着为自己的儿子感到羞愧,却取得了要求卡捷琳娜替彼得鲁哈承担罪责的权利,取得了对卡捷琳娜加以教训、近乎兴师问罪的权利。可是达丽娅一旦成了彼得鲁哈的母亲呢,卡捷琳娜便会用同样的方式跟她交谈。如果运气好坏对于人的性格有这样大的主宰作用,那么,人的性格,一个人自己的,有别于任何其他人的天性又何在呢?如果地位为人辩护,人又何在呢?她,达丽娅,假使沦于西玛的处境,寄身于外村,无亲无靠,怀里抱个小外孙——她也会规规矩矩的吧?又有什么办法呢?——她一定会规矩的。如此说来,一个人身上自己的、天赋的东西是多么少,而遭遇加在他身上的东西,他今天所到之处以及他随身所携之物加在他身上的东西,又有多少啊?莫非她真的会成为西玛那样的人吗?——须知她们是全然不同的人哪。

西玛正在对行将入梦的柯利卡轻声絮语。夕阳西下了,一阵短暂的黑暗过后星月放光了;窗户亮起来,雾濛濛的大气被夜空里惨淡的天光穿透,各种物体从暗处摇摇晃晃地浮现出来,投下颤巍巍的淡影。在村子的另一端,有条狗早在汪汪不停地吠着,就像是在敷衍塞责,那叫声懒洋洋的,没有恶意,只是想让人不致把它忘记罢了。从西玛的絮语中,只能听出些不连贯的片言只字,它们是那样地微弱和孤寂,似乎也不过是实际谈话的影子。

卡捷琳娜又低声而悲切地开口了:

“你瞧这要求算高吗……圣母啊,听我说呀。我只求让他这没出息的有个事儿做……让他干点人事。那就是没有马焦拉大

概也能活下去。让他有个住的地方，也许那儿也放得下这么一张木床叫我睡。早晨我就可以叫醒他：起来吧，彼得鲁哈，起来，该干活儿去了。我就给他弄一小包午饭带着。哪怕他就是骂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忍着。我倒也不是说忍着，我得看着他走个正道儿。”

“得给他娶个媳妇，”达丽娅愤愤地说，心想：她又来了，卡捷琳娜又来唠叨彼得鲁哈了。“你要制不伏他呀，就给他讨上这么一个老婆，把他抓在带刺儿的手里头。非这样不行。”

“谁会跟他，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要是他能放聪明点儿，怎么会不跟呢?!”

“他心眼儿可好呢，”卡捷琳娜高兴起来：这么说，连达丽娅也并不认为彼得鲁哈完全不可救药了，也认为他是有救的，哪怕得救的希望是微小的，靠不住的。“彼得鲁哈心可软了……”

达丽娅在炉炕上头哼了一声，说：“怎么不软……没那么软的了。”

“不，是真的。要没那么回事，我是不袒护他的。可这是真的。我们养过一头牛犊……你一不留神，他就把整个的面包一下都喂了小牛，给它切成块，还撒上盐。牛犊倒也知道他的心思：天一黑就跑到大门口来，叫啊，叫啊……这就是在叫他呢。我把它轰回去，可它钻出牛棚又来了，叫得更讨嫌。要是你也伸手递给它一块面包，它吃是吃，可是还不满足，非要他出来不可。他要递上一块呢，真的就走开了。早先还养过一头奶牛……他一见牛把我给的草吃光了，就背着我——怕我骂——再添给它。也是喂得膘肥毛顺的。还有，这小狗儿他养过多少条啊！谁知他打哪儿弄来的呢?！特别是一喝醉了，瞧吧，准得把只小狗儿揣在怀里头。我们家有阵子一下养了四条狗。我喊狗喊破了嗓子。哪条狗不得扔块面包给它吃啊，可这一块又一块的，自己还

不够吃呢。他什么事也不懂。”

“瞧，这心眼儿多好啊！”达丽娅忍不住了，挖苦道。“一帮野狗他养着，他心疼，可把亲娘给甩了。你爱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吧，这他管不着。”

“没出息的东西。我就说他没出息嘛，”卡捷琳娜习惯地应声说道。“他光知道给牛添草，就不想想草够吃到春天不够。我添草是细水长流，他添起来就没个数了。回头没到开春就没了喂了。”

“你干吗又来跟我说牛？你呀，我的好心人，等人家把我们从这儿轰出去，你打算怎么办？要轰出去的呀。你上哪儿去？这你想过吗？你一个劲儿地跟我唠叨牛，没有活一百岁的牛。”

“我是说……”卡捷琳娜无言答对，那口气听起来嘴软心虚。“要是他真能有个事儿做……要是给他一个安身的地方……”

达丽娅高声叹了一口气，满屋都能听见，说道：“唉，要是鲜花儿没有霜打雪压……”

但是看来话题一定，扭转就难了。西玛拍柯利卡入睡以后也插了嘴，她也扯着刚才那个话头说下去。西玛说：

“谁都有个想头儿。就说你吧，卡捷琳娜，你想陪着儿子过日子，为他张罗。还盼着有个大孙子抱抱呢……”

“哎哟，可别说了，西玛，”卡捷琳娜唉声叹气地说，这样的福气她想也不敢想。“可别说了。”

“我也不能靠女儿来帮助。我也不知道何处去安身。我还有个柯利卡。为了他得拼命活着啊。可怎么活下去呢？白天黑夜地想，白天黑夜地想：怎么活下去呢？往哪儿投奔呢？要是找个老伴儿……”

“上帝呀！”达丽娅祷告起来。“亏她想得出来！自己都弯腰驼背的了，还一心想找个老伴儿！哎，你还找个什么老伴儿啊，

说个不好听的，你这新娘子都半截子入土了，骨头架子都要散了。老伴儿还要你干什么呀？”

西玛委屈地一言不发。

“喏，你要他有什么用？你要他干什么？”达丽娅连声追问。“你干吗不说话呀？”

“达丽娅·瓦西里耶芙娜，我不瞒您说，”西玛既然叫她“达丽娅·瓦西里耶芙娜”就是说她当真委屈得要命了。“谁有什么幻想别人管不着——管不着。卡捷琳娜幻想陪着儿子过日子，我也有幻想。我也喜欢有个窝儿。我还不算太老，家务事还能干。要是进了哪家的门，不会叫人家看着可怜。我这也就够了。达丽娅·瓦西里耶芙娜，像我这么大岁数，俩人凑到一块儿不为生儿育女，只图有个伴儿，养老容易些。柯利卡也好长大成人，我惦记柯利卡。我也不胡思乱想。能干什么，就干点儿什么。还能洗个衣裳做个饭的。”

“能，能……”

“要是你没什么可幻想的呢——那……跟我们也没关系。儿子们都成人了，他们不会不让你登门的。我们孤苦伶仃的可就要受罪了……不能整天哭哭啼啼地过日子啊……”

“你还要给老头儿唱歌吗？”

“要碰上可心的老头儿，我是要唱歌的。他是要听听的。”

达丽娅听到“幻想”这个早已忘却的字眼儿目瞪口呆，不做声了。这个字眼儿是西玛该说的吗？是达丽娅该听的吗？女人在出嫁以前才幻想呢，那时节正在准备生活，一点也不懂得生活；一旦嫁了男人成了家，就只剩下希望了。而这希望也是一年比一年缩小，像雪一样地融化，直到化得一干二净，渗进了大地——于是出现在你面前的就不再是希望，而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蒸汽一般的回忆。就说西玛吧，她还有什么可取的？她却异

想天开起来了！说她孤苦伶仃吧，也不能那么说。说她是个自由自在的鸟儿吧，却没个地方落脚，所有树枝都落满了。要飞吧，翅膀又不比当年了。“西玛，西玛，求也白搭”——达丽娅记起了这句讥笑的话，注定是白搭，没有说的。但是达丽娅寻思到这儿，一股愁绪袭上心来：也许西玛说得对，她达丽娅对明天是一无所求了。抱幻想吗，还有什么想头儿！抱希望吗，连最平常的愿望似乎都没有了。全都溜走了。说真的，她还能希望什么呢？希望死吗？这保险有你的份，这可以不必失望。还有什么希望呢？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既然没有什么活头儿了，也就快死了。西玛和卡捷琳娜还要熬上一阵子，多活几年，这可不是因为她们年轻点——她自己也还没精疲力尽嘛——而是因为她们还都有事干：西玛扶养外孙子，卡捷琳娜惦记着彼得鲁哈，盼他浪子回头。她们都有人用得着，因为有人用她们，她们也就活动起来了。可是她呢，任何人都丝毫无求于她了。眼下她还在看家，等大伙儿把家一搬，也就用不着看了。一个人没有事干，没有人用得着她，他是不能活着的。那他就活到头了。更不必说像她这样的人，这么大的岁数，整天价抄着手呆着——不需要了，不中用了。这都有人在睁大眼睛瞧着呢。

月光照进窗来，屋里更加明亮，也更加不安了。一条傻头傻脑的狗狺狺吠个不停，这不祥的吠声简直刺耳钻心。达丽娅为了排遣心里那股无端的闷人的烦躁不安，不禁想爬下炕去。她这心情是如此急迫，觉得非起来不可，所以她明知并无必要，但还是匆匆地把穿着袜子的双脚垂到炕边的踏板上，登着护炉的栏杆下了地，走到窗前。半个院子沐浴着明晃晃的月光，台阶下的踏板上月光如水；另半个院子则笼罩在几间仓房的黑乎乎一片暗影里。“瞧这冷冰冰的”——达丽娅打了个哆嗦，望着月光这样想着，背过脸去。西玛把头从枕上微微抬起来，瞧着达丽

娅。达丽娅没话找话，问道：

“孩子睡着了吧？”

“睡着了，”西玛答道。“早睡着了。你怎么啦？”

“没什么。躺在炕上脊梁叫硬砖头硌麻了。活动活动，看看是你们跟我说话了不是。我就上炕去。”

“谁又跟你说话啦？是我们，不是吧？”

“那谁弄得清？听声音像你们，可那些话呢——又像是年轻人说的。哎呀，我们的纳斯塔霞怎么样了，在睡觉，还是没睡？说不定也在这么躺着念叨我们呢。可她不知道我们如今是睡在一间屋子里呀。哎呀，纳斯塔霞，纳斯塔霞！快点来吧，再看看她，再跟她说说说话儿。要是纳斯塔霞再往我们这儿一躺，那就大团圆了，谁也别再来了。她嘛，一定有的说。她见识多广啊，这辈子什么没见过。为自己，也为我们见得多了。够听到大天亮的。”

达丽娅开始呼哧呼哧地往炕上爬，爬上去，喘口气，就数落起自己来：

“哎呀，瞧这副神气：实在是个妖婆，丑八怪。最坏的是变得好生气了。这就糟糕透了。我从前好像并不好生气呀。到如今这也不顺心，那也不如意了。不，该死了，没有活路了。生气干吗？！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随他们便好了。把我埋了，他们大概会埋的，不会扔在地上，别的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这话对不对，妹子们？”

“妹子们”不知怎么回答是好，就避而不答。

“睡着啦，还是怎么的？要是睡着了，那就睡吧。天也快亮了，天一亮，我们还要出去转转呢。也许活该如此。睡吧，达丽娅，你也睡吧。人家说，你没啥可心疼的了。你干吗还一个劲儿心疼呢？要是只心疼一样东西，也好——那可以补救；要是不止

一样,而是样样都心疼呢?这颗心活活的像架在火上烧啊,烧啊,疼啊,疼啊。一点救也没有了。这么说,是罪孽太深了。我有罪,我知道有罪;可是谁能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我这罪孽深重的,又该认什么罪呀?不认罪怎么行呢?哎呀,快睡吧,睡吧……早晨太阳出来,它会告诉你很多的。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还可以为太阳活着呢。”

十八

庄稼收完了,雨又接连下了三天。但这却是无声的喜雨,它止住了尘土的飞扬,滋润了疲惫板结的土地,它洗净了因久晒而发蔫变暗的树林,催着那错过时令的黄蘑破土而出,它冲淡了一片片火场上的滚滚浓烟和苦臭气味。这透明的雨无声地下着,不壅塞大气,不遮蔽远景,水分也不过量。阳光穿过疏淡渐薄的云层,虽经堵截而弱化,却到底渗透下来了。这三天一直暖暖和和,雨悄然无声,钻进土地,雨后地面上连积水都没有,而且土地很快就干了。地干了,土豆该刨了。

谢天谢地,外来人于收罢庄稼之后撤走了,他们走后,就下了这场净化一切的喜雨。村民感到松心点儿了,平静些了,可以无所畏惧地出门,可以在岛上转一转了。不过外来人的惜别之举却是很热闹的,又是大打出手,喊叫着满街你追我赶。几个女的尖声刺耳地叫个不休,似在安慰某人,实则是起劲地挑拨,恶意地火上烧油。他们疯了似的追奔厮打了一个通宵,闹得全村整夜心惊肉跳。清晨上船之前,离开他们安营扎寨的农庄办公所时,随手将它付之一炬,留个火热的纪念。他们的船刚一离岸,上游岸边的树丛里便钻出一个人来,乃是这支大军的一员。

他两腿叉开一站，邈里邈邈，慌里慌张，身上的衣裳刚撕得破破烂烂，不知为什么溜出了队伍。他远远地一见着了火，就奔进村去。才跑到办公所前，一步不停便飞跑进门，看来他有什么东西落在门后了；接着，在门里只轻巧如神地一转身，就又两手空空地跳了出来。他脚踏热锅似的蹦跳不止，跳了一阵停下来，退到一旁，开始观看那熊熊烈火。

这场火燃烧的时间出奇地长，直到傍晚火焰才落。不过办公所留下的那一大堆余火，在昏暗中还在赤热通红地吞吐着火舌。没有一个人想到该守一守这堆火；等到早上人们醒来时，附近的一处马棚也在燃烧了。这可不该加罪于脱离乌合之众的那个青年，他白天就搭船走了。马棚燃烧起来，积久变硬、被脚踏实的马粪冒出又苦又臭的烟。这时下起雨来，但雨也未能把烟制伏——这烟就此再也没离开马焦拉岛。

小学生们被送到这儿帮助国营农场刨土豆来了。这些吵吵闹闹、东钻西串的人物拥上岸来，头一样就是急着去搜遍鸡窝、墙角找鸡翎。真不得了，一只欢蹦乱跳的母鸡让他们看见，准得被追得精疲力竭，浑身羽毛一扫而光。两个孩子把维拉·诺萨列娃家的公鸡用腿一夹，就收拾起来了。她好不容易才救了公鸡一命，说也奇怪，好端端一只嗓门儿洪亮的公鸡，打这以后就不再喔喔啼了，只能鸭子似的嘎嘎地哀鸣——这场死里逃生的惊吓留下了后遗症。这些童工们把鸡翎插进土豆，猛劲往上一抛，这玩意儿就呼哨着煞是好看地滑翔下来。顶逗人乐的是，如果它看中了目标，就会落在一个人拱起的背上。光扔土豆——那是流氓行为；插根鸡翎——就成了游戏。玩啊——孩子总是孩子嘛！还能要他们怎么样呢？不过，他们一经漫地散开，有时也就弯弯腰，拣一点儿，这所拣的就由一辆汽车运往河岸。带他们来的长者想必也在看管他们，督促他们吧。达丽娅远远地看到

过一回：一些孩子唧唧喳喳地点起几堆篝火，围起来看守着，怕一不留神火堆溜跑了。可是那些干活儿的，前进得可快呢，拔土豆秧活像拔大麻。什么丢在地底下了，只有地知道。从前，这地总是保重自己，爱干干净净地准备献出新的丰收；要是活儿干得不像样子，它就推出去示众。如今它快死了，它也无所谓了。

为了帮助孩子们，从新镇的各行各业里抽调来了妇女。办公室、医院、幼儿园、食堂——凡能抽的地方都抽了。国营农场的领导——自然不无别人授意——认为需要首先把路远、不方便的马焦拉岛收拾干净，所以就把人往这儿轰。收得也确实是快：往年这会儿正是大忙时节，干得正欢，今年呢——全完了，真可以过节庆丰收了。并不追求收多少公担，收多少算多少，只要把地弄干净就行了。谁也不追查收获多少公担。这个新的国营农场已获准在最初几年不必赚钱，可以亏本。何苦还在这片判了死刑、即将淹没的土地上拣麦穗，或者把土豆抠得一个不丢呢？不靠这块地打的粮食也吃得上饭的时候到了。

马焦拉村的妇女，很少有人来刨国营农场的土豆，她们都在忙着刨自己的呢。马焦拉村民最后一次在村里会合。但是现在不同于割草时节了，他们没有凑到一起，没有同声歌唱，没有议论日益逼近的新生活。人们都在忙，人人都在自己家里、自己菜园里一心扑在自己的事情上。马焦拉覆没在即一事用不着议论，它正在把人逼上绝路。孩子们被从学校里拉来，女工们被雇来，每刨四麻袋土豆，就有一袋是你的，但要快点儿，快点儿……人们收获一完，快艇就不再来回拖渡船了。到那时你对着渡口跳吧，叫吧。国营农场的财产已经运走了，牧场外边的农田已经空寂了，马焦拉村越来越光光秃秃，零零落落。这还唱什么歌！——半个村子都烧光了，成排相连的村舍没烧，也都被拆散、扯碎了，它们都被吓得如此魂不附体，趴在地上，显得如此可

怜而衰老，简直令人不解：里边怎么能住人。这还唱什么歌！——马焦拉的树林在燃烧，岛上有时白天浓烟弥漫，从对岸看不见，于是船就冲着烟开。

林场来的放火者烧光了波德莫加岛之后，一刻不停便渡水登上马焦拉岛。他们有时五个一群，有时七个一伙。这些人跟那帮乌合之众不同，都是中年人，老成持重，不吵不闹。他们住进当年高尔察克匪军的营棚，和鲍戈杜尔仅有一墙之隔，马焦拉岛上再无别处可住了。每天早上，他们从村里靠上游的一头穿过村子，走到靠下游的一头，然后继续前进去上工；傍晚又从下游回到上游。他们之所以叫人望而生畏，是他们所干的这份差事，这项最后的、收尾的差事，使马焦拉岛注定永世不能重见天日。他们跟谁也不讲话，对什么都视若无睹，而是怀着主人翁的自信，步伐坚定地走在大路上，默默地大踏步前进着。光是他们的神气，光是他们的存在，就令人不禁手忙脚乱了：快点儿，快点儿，不然脚丫子要被烤焦的。他们是不会等人的。连狗都嗅出这些外来人是何等人物了，一见他们，就夹起尾巴钻进门洞。还有一个传闻，说“放火人”——人们这么称呼他们——除去火烧树林之外，也一并包办烧房子。果然不错，鲍戈杜尔发现沃龙措夫和区上的一位领导走进他们的营棚，为着什么事情谈了好半天。这有什么，他们这才称得起放火人呢。说句公道话，其实恨他们是没有道理的，该干的事就是他们不干，也有别人来干。可是村里谁也不愿跟他们来往，跟他们交谈。他们干他们的，眼一睁就能看见他们罢了。

这最后一茬土豆不仅是普通的大丰收，简直多得成了灾。两棵秧刨一桶，两棵秧刨一桶。并且当然不是买卖人用的桶，是自己的桶。凡是种土豆稍加经心的，只要摆弄了，培土了，爱护了，家家都是这样的丰收。人们眼望着沙土窝里那白白净净、小

肥猪一般的大土豆，哎哟哟地惊叹着。眼望着装满土豆的麻袋，也哎哟哟地惊叹着——这些麻袋在运出岛去之前，就要三番五次地搬上搬下，更不要说最后送到目的地了。从菜地里装上车，要搬；从车上卸到陡峭的河岸下，要搬；从岸上装到渡船或快艇上，要搬。马车呢，要排队等，因为全村只留下一匹母马，其余的全运走了；汽车一辆也没留下。那只渡船也并非老停在岸边等着。苦啊，哎哟，这个丰收弄得人好苦啊！然而最可怕的哎哟却是：运到新镇又往哪儿倒呢？许多人家地下室里的积水，入春以来至今未干，往那儿倒土豆等于倒进安加拉河。不错，为了摆脱困境，国营农场建议大家使用它的菜窖，菜窖才只占用了一半。可是女主人这么一寻思，真不得了：把这些比哪家土豆都要好、都要亲、都要香的自己的土豆，倒进一个公用的大坑，以后拿回来的不定是什么东西呢。再说，你端着锅提着桶老远老远地跑来跑去有个完吗？——管钥匙的鬼东西，不知是就在菜窖门口坐着，还是在家里睡在炕上呢。这有什么好说的！东西不在自己家里，就不是自己的。况且十二个村子一个地窖，任它有多大也不够用啊。

但这是以后，以后的事……现在就该快点儿刨出来运出去，免得被水冲走。

皮尼金家三天就刨完了自己的土豆，第四天只留了个小尾巴。巴维尔请假回来了，索妮娅整个夏天第一次回家来。不过不光她一个人，还带回一个跟她一起在办公室打算盘的女职员——那是个年纪轻轻、头发棕黄、喜欢哈哈大笑的人，名叫米拉^①。这个米拉笑起来，总是将她那生着髻发的高耸的头向后一仰，白眼一翻。瞧吧，既然她几乎是笑个不停，所以两只眼睛

^① 米拉，意为心爱的。

就像生了白翳变成瞎子似的。不管你对她说什么，她都觉得好笑。该在哪儿刷牙，在这儿刷好不好——她一概不懂。因此，达丽娅开头就看不惯她。

“叫什么，你说她叫什么？”她故意地一问再问索妮娅，为的是使客人听见。

“米拉。”

“米拉？还有这样的名字？”

“有，”客人笑着答道。“有，奶奶，有。怎么啦？”

“越来越不像话了！从前小伙子对哪个丫头都兴这么叫。个个都是米尔卡^①。都给她们编了顺口溜啦。你没听人唱过？如今唤母牛犊才这么叫呢。”

“母牛犊？”那女客笑得更欢了。“奶奶，你是想说……那么说，我是母牛犊？我像个母牛犊吗？”

“可不是，像，”达丽娅欣然同意。“那么就真是个米尔卡啦。”

女客刨了两天土豆，而且刨得很卖劲儿。所以，此后达丽娅对她那干着活儿也难得住声的无缘无故的笑，对她那令人发笑的轻浮的名字，就都宽容了。而当她一经细问，知道米拉已经出嫁，并像任何一个正常女人一样也有孩子的时候，她就格外地宽容了。这么说，丈夫是成年累月地容忍着这么个嘎嘎笑的老婆——让他这可怜的安静一会儿吧。到了第二天的末尾，当米拉准备离去的时候，达丽娅对她说：

“你顶好还是跟哪个母牛犊掉换一下吧……它们的名字有的挺好听。记得我们养过一个叫佐伊卡——这有多好啊！那么你这哈哈大笑八成也就会少点了。到底有什么老是叫你觉得可

^① 米尔卡，意为心爱的人。

笑啊？”

米拉搭船走了。在索妮娅往河岸上送她时，只听她一路上笑个不停，活像有个手脚闲不住的人在拽着一根小绳，于是一只小铃铛就丁丁当当地响起来了。达丽娅就想：或许这才好呢，或许就该这样不知忧虑不知悲伤的。有忧伤——笑哈哈；没忧伤——哈哈笑！这样的女人自然也会有忧伤找上门来的，无奈她们不懂什么是痛苦，她们哈哈一笑，笑跑了痛苦，就像是笑跑了追求她们的、不称心的男人似的。任什么愁人的事也缠不住她们的心，她们事事都感到开心，她们活一辈子，开心一辈子。说真的，这有什么不好？怎样才能学会这份本事？

第三天巴维尔运走了土豆。装了十五袋，所有的袋子都用上了，但堆在菜园里的一大堆土豆只少了一个边儿。又有多少还等着刨啊！这就是说，运也来不及运。达丽娅婉转地说，该给卡捷琳娜帮个忙，也把她的土豆运走五袋。彼得鲁哈是靠不上的，还不知他回来不回来呢；可那老太太不管到了哪儿，总要吃啊。

“往哪儿放啊？！”巴维尔耸耸肩说，他并不是拒绝，确实不知土豆该怎么安置。

“那我们自己的往哪儿放？”

“放不下的，只有先倒在凉台上。”

“放不下”——这是指地下室。为这地下室巴维尔受了一个来月的苦了：从安加拉河边运来砂子垫上，又铺了水泥，总算隔断了水（幸而房子是盖在山岗上，别人盖在洼地里的，更难免进水）。可是现在这地下室显然嫌小了，装不了很多。再往四周挖吧，麻烦太多：地下室是水泥的，要是一挖，谁知会不会又汨汨地冒水呢。还是少惹祸吧，别不知足了。

索妮娅弯着腰刨了两天，第三天就跪了下来。西玛和卡捷

琳娜也来给她和达丽娅帮忙了，仿佛是以此表示对借宿之情的报答。在达丽娅家人归来期间，她们到纳斯塔霞家去住了；但索妮娅一走，就又搬了回来。索妮娅是傍晚哼哼着离去的：她坐办公室坐掉了紧张劳动的习惯，看来是努伤了。她在新镇那边经过一个夏天模样大变，达丽娅有时就像看生人一样地端详她：胖了，暄了，剪起城里人的短发，还卷得弯弯曲曲的，因此脸盘显得大了，圆了，眼皮浮肿起来，眼睛似乎眯细变小了。她学会了诊断各种疾病。谈起病来头头是道，能说出病名，知道什么药治什么病。马焦拉村民哪儿有工夫生病，医士们在这儿也呆不住；来了一看，四周都是水，人们都忙个不歇，都没有病，就回去了。

“那儿怎么样？——称心吗？”达丽娅小心地问索妮娅。

“可不像这儿，”她恶狠狠地回答，不加任何解释。怎么个“不像这儿”——更坏，更好？——你自己琢磨去吧。

于是达丽娅想象到，在那儿，对她这个老太婆的态度也会变个样儿。在这儿，她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周围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都散发着她的气息，她被看作一切的主人。哪怕她并不竭力表现自己是主人，但这是自然而然公认的。到了那边呢，索妮娅要当家作主。她也不年轻了，知道也威风不了多久，该出头了，不该要她听别人的，得要别人听她的了。人不能不对别人发号施令，这是人最得意的差事，而且他身居人下的时光越久，那么日后他也就越加以前人之道还治后人一身。

快艇每天都拖着渡船来一次，不然就是两次。土豆得运走，倘若哪家还有牲畜，也得运走，凡是还用得着的东西，都收拾起来。再也无法拖延了：那个被宣布为最后期限的九月中来到了。突然靠岸的一只驳船，帮助许多人摆脱了困境；驳船是来收购土豆的，收购价格是四卢布一袋。巴维尔经过盘算，把最后二十大袋土豆卖掉了。老实说他之所以卖，是因为他倒腾土豆倒腾累

了，腻烦了。此外，他已经运出了三趟，每趟十五袋，实在够了！他劝卡捷琳娜都卖掉，以后吃的，他答应给她，土豆是一样的。可是卡捷琳娜到底还是留下三大袋——这有什么关系！西玛也只卖了二十个卢布的，这老太太根本什么东西都没处放，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可她那片菜地却不吝啬，要它产多少就产了多少，甚至还超产了。事后西玛总是唉声叹气：早该多卖点儿啊，可她舍不得，不知干吗要把一半土豆都留下来，如今堆在门廊里晒着太阳发芽呢。

纳斯塔霞的菜园怎么处理呢——老太太们久久不知所措。纳斯塔霞没回村来。这个菜园达丽娅代管了一个夏天，锄草呀，耙地呀，轰鸡呀——难道这一番劳动和好心就白搭了吗？这是全村最后一片菜地，别的都空了。只是有的地方还长着点儿胡萝卜、甜菜、大萝卜。白菜很少有人种，因为都知道等不到它成熟。篱笆见自己再也没用了，就伏倒在地。秋风阵阵，掠过高高隆起的菜畦，在干细的琉璃苣间飒飒作响，无用的土豆秧被风一吹乱糟糟的。只有维拉·诺萨列娃为了整齐，才像往年一样把土豆秧抱到一起堆成垛；不过她也不把它运走当饲料了，麻烦事多着呢。顾不上土豆秧啦，能把干草运走就不错，就笑得合不上嘴了。

纳斯塔霞没回村来，除了动手收拾她的菜园之外，老太太们已经无事可干。怎么办呢？她们把纳斯塔霞家房子的百叶窗给关上，土豆给倒在地板上了。可是为什么刨呢，为什么倒呢，就叫土豆跟房子一块儿烧光，还是派个什么用场呢——不知道。听说放火的人们在夸耀他们烧树林时拣到的连根烧熟的黄蘑菇呢，说不定土豆也要这样给烧熟的。但是扔在土里不刨也问心有愧，说实话，怎么能够不刨出来呀，那可太造孽了。纳斯塔霞既然答应了，总该来一趟吧，她们在那边没土豆吃怎么行呢？也

许有什么事要迟来一点，也许在她们这儿还没顾得上刨的节骨眼儿上，她会从安加拉河里钻出来。搂到一块儿费不了多少时间，她们会帮她搂的。

土豆刨完了，纳斯塔霞还是没有回来……

牲口都运出岛去了。巴维尔几乎是最后一个来牵牛的。那牛，聪明听话的马伊卡，早被这破产、大火、孤独和忙乱吓得魂不附体，已经几天不出牛棚了。达丽娅要轰马伊卡到草地去，它就哞哞叫着躲进肮脏黑暗的牛棚。只有在夜间它才敢钻出来，而且那也不敢远走，不过到旁边菜地去吃上一些土豆秧就回来。它把头一垂、向门外一探，笔直地一站就是好半天，时刻都神情紧张地有所期待，有所准备。当巴维尔把绳子套在马伊卡脖子上牵走时，它乖乖儿地跟着走了——到哪儿都行，干啥去都行，就是要离开，离开这片可怕的土地。它踩着跳板顺从地登上渡船，任人把它拴好，扭过头去不再看马焦拉，却斜眼远望那遥遥的彼岸。

达丽娅为马伊卡送行时哭起来了。

“怎么样，妈，”巴维尔在家里就对她说，“要不我们把你也一块带走吧？这儿好像没事可干了。”

“不，”达丽娅断然拒绝。“你先别管我。我不是牛，那么随随便便离开马焦拉。是你们在这儿没事可干了。我可还有事呢。”

“马上就要放火了，妈……”

“让他们放好了。”

她虽然明知问也晚了，问也没用了，却终究忍不住，又抱怨又抱屈地问道：

“这么说那坟就扔下不管了？不要祖坟了，咱们这些忘本的？就让水淹了？”

巴维尔头一低，看上去怪可怜的。

“你看，如今情况都变了嘛，”他开始辩解。“本来倒是打算……要不是这个……倒霉的意外……可现在哪儿有时间？我都请人家替了三天工了。多半办不到了，妈。不光咱们一家……”

“要是咱们不要他们了，他们也一定不要咱们的，”她预言道。“哎——哟，咱们真恶呀，没有比咱们更恶的了。怎么能不迁走亲人的坟呢？”

在这番谈话之后，巴维尔一走，达丽娅还没冷静下来，还没定下心来，就到坟地上去了。白昼将尽，夕阳大半个已经落山，燥热正在渐渐消退。一股焦糊气味强烈闷人：牧场后边那片松林，正离开地面腾空而起——一片无色的火焰，宛如幻影，又似一大片顽皮的日影，忽而跳上去忽而落下来。假使不是从那边传来噼啪声和呼呼声，就绝想不到这是松林在燃烧，因为那里的烟与从别处随风飘来、弥漫在安加拉河上的烟，几乎连成一片了。从上游吹来带有煤味的微风，达丽娅感到喉痒头晕，两腿漫无方向地迈着步子。载着马伊卡离去的那只快艇的突突声，依然从右方弯弯的岛岬之外不断地传来。瞧，马伊卡也走了，它发觉这边有灾难，却没有发觉那边也有灾难——那边此刻正在盘算，如何把它养活到寒冬腊月，以免牛肉腐烂呢。

墓园的门敞开着，迎门头一处旷场上就有片烧焦的土地，像块大黑斑似的映入眼帘。达丽娅翘首一望，墓畔的十字架、坟桩、栏杆，统统不见了——初夏时节老太太们出马上阵抵挡外来人，叫他们没有干成的事，而今在一片烈火浓烟中被悄悄地干成了。但现在她既不觉愤慨，也不觉难受，反正全完了。初夏以来她已经见得够多，忍受得够多——心变硬了。这就是说，她也到了这步田地，好吧——既然到了，那就是命里注定的。不许生

气：她这是去见亲人，心慌意乱地到那儿去可不行，那还不如回去。反正，反正完了……

她向左一拐，便在小树林深处找到一座坟墓，下面长眠着父亲和母亲——那两位给了她生命的人。坟头被拔十字架带出的污泥弄脏了。安息在左侧的是母亲，她先去世的；右侧是父亲。在头部，但不是在坟头上，而是在墓畔的小土台上，长着一株山楂树，那是她——达丽娅——从前亲手栽下的，草地上散着一些小鸟啄落的红色浆果。在脚部呢，耸立着一棵松树；当初掘坟的时候没有这棵松树，是以后一颗飞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座墓达丽娅早就觉得过于窄小了，她曾一再想挺直身子躺下来量一量，弄清楚到底是年深日久泥土滑落下来了呢，还是人的身材本来就是这么矮小——但她却忍住了，没去量。山楂树和松树的枝叶在墓顶上相交在一起。她害怕想，不该想，却又乐意这样想：也许，在两棵树儿的生命里，就像在她的生命里一样，也有几分在它们扎根其中赖以生存的地下长眠的那两个人的命运吧。一切，周围的一切都是亲的呀……

达丽娅朝坟头躬身一拜，就跪倒在坟前了。轻风吹不进这一角落，这里静悄悄的，只听草儿发出干燥而钻心的沙沙声。那股异样的、诱人的、甜丝丝的气味，那股只有墓地上才有、仿佛世外之境袭来的气味，还没有被烟吞没呢。

她微闭双目，以便既看不见烟，也看不见被毁的坟墓，昏昏欲睡般地前后晃动着，似乎是在两种境界之间往返弹跳不止，终于陷入没牵没挂的幻境，于是她低声地开口倾诉了：

“是我呀，爹。是我呀，妈。”觉得话音不妥帖、听不清，所以住了口，等合适的语调涌到嘴边了，这才用足以倾诉满腔深情的新语调，把刚才的话重说了一遍。“瞧，我来了，一点牵挂也没有了，连那头牛今天也被拉走了。我该死了。可是爹呀，我不得不

离开马焦拉去死。不能躺在你们身边,怎么也不能了。我本想把你们带走的,好在那边睡在一起,这也办不到了。别怪我吧,我没有罪。啊,我有罪,有罪,是我,是罪过落到我头上了——所以我有罪。看我这糊涂虫,不知该怎么办。爹,你对我说过,要我长寿……听你的话,我一直活着呢。可是干吗活这么大岁数,该找你们来呀,咱们在一起多好啊。瞧如今闹到什么地步啦?我扔下了你们,是在我这辈上,不是在别的辈上,祖根要被砍断,要被冲走了——叫我死都合不上眼哪。哦,要冲走了,要冲走了……我这该死的,要撇开亲骨肉到别处落户去了。这谁能饶我?!爹!妈!我又有什么罪呀?”她一头扑进坟上的荒草,肩头颤抖不止。于是向着荒草,向着地下,悲苦地哭诉起来:“烟——烟气腾腾,我们这儿到处是烟,你们亲眼看见了。我在这儿,你们看见了吗?看,我变成什么样儿了?我是你们的孩儿,你们的孩儿,我要投奔你们……我是你们的后代。我要投奔你们……我再把房子送走了,就到你们这儿来。随便那火,那水……”她昂起头来,理了理头巾。“我们的房子,爹,眼看着也要……也要走了。我要去看。我要走到跟前去,不叫烤得太厉害,我要去看烧得好不好。然后我就来告诉你。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啊?”

忽然间她心有所悟——仿佛从遥远遥远的地方,飘来一阵依稀可闻的低语:“我们的房子你收拾好了?你准备送它了,怎么送呢?就那么拔脚就走,随手把门砰地一关?该收拾好房子,咱们都在里边住过。”达丽娅哆嗦了一下,连忙答应:“我要收拾好,要收拾好。看我怎么给忘了呢?我自己应该懂啊。我要收拾好。”

“还有什么呢?”她问道,期待着回答。“我还有什么事该做呢?怎么办才好呢?”她便聚精会神、浑身紧张地倾听着,想收集到飘过耳畔的微弱的音响。然而没有,什么话也没人对她讲。

最要紧的话没有讲。四周依然寂静一片，树叶儿和草儿的沙沙声没有幻化出回答的细语。她又绝望地追问了一遍，但坟墓默不作声。她据此断定没有受到饶恕。她也活该如此。她凭什么功劳打算求饶呢？自己也不会饶了自己的，还想让他们饶呢——不害臊吗？

达丽娅举目仰望——树梢间烟气缭绕，高空中飘着稀稀落落、笑盈盈的云朵。夕阳西斜，在墓地小树林间铺下一条条的光带，一道道长长的树影看上去似乎变圆了，变硬了。两只鸟儿翘着小尾巴，顺着这样的一道树影，就像顺着倒在地上的一根树干似的，一前一后地蹦蹦跳跳。然而达丽娅不想回到这个有落日余辉闪光、有小鸟蹦蹦跳跳的世界里来，还不到时候呢。她想象着：此后当她离开尘世置身于自己家族之间的时刻，会有许许多多的人——父亲和母亲、祖父、曾祖父，在她之前接踵而去的一切人——来开庭审判。她觉得他们历历在目，排成一个两侧伸开、望不到尽头的楔形队列，个个都摆出一副阴沉、严厉、审问的面孔。而她呢，在这祖祖辈辈的楔形队列的尖端，稍稍出列——好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面向大家孤零零地站着。她听得见他们的话音，而且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尽管那些语句模糊不清。可是她自己却无言对答。她在慌张、惊恐中望着迎面而立的父亲和母亲，以为他们会帮助她，在其余人面前袒护她。但他们却负疚地哑口无言。议论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忍无可忍，怒不可遏……他们询问希望，他们说是她，是达丽娅使他们陷入丧失希望和前途的绝境。她企图后退，可是不许：背后有个男孩的声音要她站在原地答话；她明白，她背后站着的只能是谢尼卡——她那个被原木砸死的儿子……

达丽娅毛骨悚然起来，好不容易才中断了幻想。那些远亲的陌生面孔消失了，但那些声音尽管愈益低弱，却仍在苦苦哀求

着希望。达丽娅慢慢恢复了神智，她朦胧地意识到：“原来在那儿没有希望也不行。在哪儿也不行。原来这样。”可是父亲、母亲以及谢尼卡——她在那儿的贴心人的面孔，则继续浮在眼前，忽而蒙上黑色的面纱离去，忽而又贴近前来。父母漠然而凄然地望着她，仿佛在怜悯她，还记得他们是他们的女儿。在那儿仍是孤儿的谢尼卡，依然在争取着什么。

达丽娅一欠身，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对坟躬身一拜，便朝铺了树影的那边走去。头晕比刚才更甚了，不过谢尼卡的小坟头离这儿不远，约有三十步之隔。她一瘸一拐地走上去，再次坐了下来。“地在拉人哪，地在拉人，”她说。“今天比什么时候都拉得厉害。”她害怕跟儿子谈话：真是遗弃了他，没有到他那儿去，可怜的孩子，跟自己的家族断绝了联系，以后就要在这儿孤单单地受苦了。如今怎么也没办法了。她坐着，瞪着视而不见的两眼紧盯前方，沉痛地、不由自主地、百思不解地想啊，想啊。周围，在可亲的白桦与青松中间，山楂与稠李中间，光秃秃、面目全非的坟墓，有如一堆堆覆满野草的土丘隆起在地面上。几乎每两座中间就有一座埋葬着亲人：兄弟、姐妹、叔父、婶母、祖父、曾祖父等等，等等……一共多少，她刚才朦朦胧胧地看到了，而且这还不是全部。不，还在拉呀，地还在拉人。墓顶上空的树叶哆哆嗦嗦，墓畔愈益苍白的高草摇摇晃晃。高空中的风把一朵轻薄透明的云吹到夕阳面前，尽管没把夕阳遮住，但使它模糊了。阳光淡了，树影消了。凉气袭来了。

达丽娅一个劲儿地向自己发问，也一个劲儿地想要回答：然而答不上来。是啊，谁能，哪一个聪明人能答得上来？一个人来到世上，活上一辈子，等活累了——像如今她达丽娅这样——或者有时还没等活累，就都免不了要回去。在她之前有多少人已经回去，在她之后又有多少人将要回去啊！她此刻正像摇摇

欲坠的一环：死者在其前，生者在其后；她眼看就要坠入地下，就要有新的一环接上来取代她。到底哪边人更多呢——前边还是后边？有谁能解人生的真谛：人为什么活着？就为了生命，为了儿女，让儿女再留下儿女，儿女的儿女再留下儿女，还是另有别的目的？这种运动是永恒的吗？倘若是为了孩子，为了运动，为了这接连不断的坠落，那么，为什么还要到这坟上来呢？瞧，他们犹如浩荡的马焦拉大军，躺在这里默不作声了，为了她达丽娅，也为了像她这样的许多人，他们成百上千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这又产生了什么结果呢？一个人，曾经有世世代代的前人为他而生——他该作何感想呢？他无动于衷。他一窍不通。他处之泰然，仿佛生命是从他才开始，也到他就终止似的。死去的人们哪，你们说说：你们在那边，在黄泉之下，弄清楚全部真理了没有？你们当初一生一世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害怕知道这份真理，况且也无暇过问。那称之为生命的东西是什么？谁需要它？要它有点用处没有？我们的儿女被我们生下来，日后活累了一想，也会问何苦要生他们的。这儿很拥挤。又到处是烟，是焦糊气味。

“我累了，”达丽娅想。“啊，累了，累了。现在最好哪儿也别去了，就趴在地上吧。躲起来，享受渴望已久的安宁。一下弄清全部真理。在拉人哪，地在拉人。地下的人会说：你们真傻呀。你们怎么这样傻呢？还老问个什么？只有你们不清楚，可这儿一五一十都清楚。你们每个人我们都看得见，要对每个人问罪的。要问罪，问罪。你们好像被展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正睁大眼睛看着：谁在干什么，谁记得什么。”

达丽娅已很难相信她还在活着，她仿佛觉得她是刚刚体会到这些话，趁还没来得及禁止她说时，当即说出口来了。神志清醒时才能知道真理。谁没有神志，也就没有生命了。

但是达丽娅明白：这并不是全部真理。她需要站起来，去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看到底，听到底，然后就把所见、所闻、所感都带到地下，去换取全部真理。她吃力地站起来，走了。

右方，在那片松林燃烧的地方，烈火在黄昏中闪光夺目而噼啪作响。天空中繁星闪烁，孤零零、黑黝黝的“树王”轮廓分明、威风凛凛地矗立在牧场上。悲苦的马焦拉只剩最后一些房屋了，它默默无言地躺着，没有一盏灯火，没有一丝声响，仿佛已经被一切人遗弃了。

十九

无论是马焦拉岛，还是马焦拉村，离开牧场上这棵落叶松，都是不可想象的。它高高地耸立着，主宰着周围的一切，就像是一位牧羊人主宰着散布在牧场上的羊群。它的确像是一位肩负着这项古老的守卫职责的牧羊人。但是提起这棵落叶松来，即使是再有学问的人，也不敢称之为“它”。不，是“他”，是“树王”，他是如此永恒地、雄壮而威严地矗立在村外半俄里远的一处高岗上，几乎四面八方都看得见他，人人都熟识他。想必是他高傲过头、力大非分了，所以为了维护普遍的秩序和分寸，上苍决定将他裁短——于是爆发了那场有名的大雷雨，闪电削掉“树王”的头顶，摔在地上。“树王”头顶被削，屈尊了，丧胆了吧，不，没有，他并未失去那雄伟的仪容，好像变得更加威风凛凛了。不知从何时起就有一种迷信：恰恰是他，是“树王”，将这座岛固定在河底，固定在一块共同的土地上了，只要有他在，也就有马焦拉在。就在距今不甚久远之前，每逢盛大热诚的节日，在复活节和三一节，人们便给“树王”上供，供品在树下堆成小山，事后当然

总是被群狗一扫而光；然而认为应当这么办，不然“树王”要怪罪的。这种奉祀在新生活开始以后渐渐就停止了，但是对这主宰一方、权威无上之树的敬畏，老人们却保持下来。这实在是不无缘由的。

“树王”的粗大枝杈，异乎寻常地不是从树干斜着向上，而是平伸横生——仿佛是在旁边长出一棵独立的树似的。其中最低的一杈孤悬在离地约四公尺的上空，很久以来就被称作“帕莎树杈”：从前有位年轻的马焦拉村姑娘帕莎，因为害单相思一时想不开，在树杈上上了吊。高尔察克匪军占领此岛以后，虽然听也没听说过帕莎，却不知怎的知道了“帕莎树杈”，就偏偏在这一杈上吊死了军中的两个士兵。他们犯的什么罪，马焦拉村的人谁也说不清。两具死尸挂在树上全村都看得见，弄得老老少少从来没有过地心惊肉跳了一整天。直到经过几个男人为孩子们去求情，才把尸体从绳套里卸下来。于是，那两个死兵便被再次处以另一种刑罚：从陡峭的岸上抛进了安加拉河。

“树王”之下发生最后一次的、全然无辜的惨死是在战后：一个男孩，维拉·诺萨列娃之子，又从那个“帕莎树杈”上跌下摔死了。直到这以后，男人们才心有所悟，树杈被他们砍了，被孩子们烧了——早该如此嘛。

瞧，各式各样跟“树王”有关的故事有多少啊！

“树王”一生落下那么多松针和松果，以致它四周的地上隆起一座柔软的、一踩就陷的小丘；他那粗大的、一个人搂不过来的树干，就挺立在这座小丘之上。牛靠着它蹭痒，风吹打他，村里的小伙子带着火枪来射击他——打下树干上的松香瘤，回去分赠给姑娘们。于是久而久之树皮脱秃，树叶落光，再也不能迎春吐放翠绿的针叶了。细弱的小枝杈伸展出去，在第五、六节上就折断、坠落。可是剩下的部分却仿佛变得更加牢靠了，永远焊

接在一起似的。树干变白了，僵死了，可那将树根突露出地面的强壮的、巨爪般的树基，却硬骨铮铮，没有一丝腐烂变空的迹象。在这棵落叶松冲着下游的一面，就像是在他的背上，一向有一处微微瘪进、布满疤疖和洞眼儿的宽大凹穴——仅此一处，这棵树此外的一切就仿佛是浑然一体，纯钢铸就似的。

不远处，在二十米以外临近安加拉河的地方，有一棵白桦树，虽在发绿长叶，却已衰老快死了。当初只有它胆敢挺身站在威严的“树王”旁边。“树王”竟宽恕了白桦，没有撵走它。也许是他们的根须在地下交错，相安无事；但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树王”之所以容忍这棵偶然长出、误入禁区的白桦，看来不过是出于宽宏大量、随心所欲的仁慈而已。

终于有一天，两个外来人走到“树王”跟前。这时白昼已尽，黄昏来临，太阳下了山，夜幕正在岛上降落。这两个人是照例干完白天的活儿收工回营的，他们在马焦拉岛上干了足有两个星期了。不管他们干得怎样认真，怎样卖劲儿，时光的脚步却很快，期限日益逼近了。只有快点儿干。这些人的差事有个特点：有时只要把火点好拨旺，火就可以自行燃烧下去了。所以虽然夜已来临，两个因风吹烟熏而面孔黑不溜秋的人，还是离开大路来到树下。

走在前头的那个想试一试“树王”，抡起板斧用斧背猛然一击，斧子被猛烈地弹开了，险些飞出手去，他吃惊地把头一缩。

“哎呀！”那人惊叹道。“好一个畜生！咱要给你这畜生一点厉害尝尝……咱说话算数，好比二二得四。这么刁的倒还没领教过呢。”

另一个年纪大些的手里提着油桶，不住地张望村庄打着哈欠。他脚穿高筒水靴，走起路来烦人地咯吱咯吱地响着。这双水靴被主人穿着干这个差事，显得不三不四，牺牲得毫无意义。

况且那靴中的两脚怎么受得了，也令人莫名其妙。至少穿它们蹚水已经不行，两只靴上都有黑乎乎的漏洞了。

两人绕过树干，在那个布满洞眼儿的凹穴前停了步。原来“树王”不是笔直地耸入上空的，而是微微斜着身在这个凹穴上方一弯腰，而后才挺立上去——恰如为了掩护凹穴免得叫人看见似的。那手持板斧者也曾试图砍些木屑下来，无奈斧头滑溜得出奇，徒然铮铮作响，却不能入木砍伤树基，只在表面上留下一道道斧痕。那人惊慌地用沾满烟炱的一只手套往树上一抹，对着亮处检查一番斧刃，摇了摇头。

“真像铁铸的，”他承认说，并再次插进一句莫名其妙的算术口诀威胁说：“没关系，你跑不了。咱们是五五二十五。”

他把那不中用的板斧扔在一边，将散落在周围的树枝收集起来，用脚踩断，交叉着堆在那个布满微孔的树穴之下。他的伙伴默不作声，依旧哈欠连连地把桶里的汽油泼在树干上，残油则淋在搭好的柴堆上。接着把油桶放在身后，擦着一根火柴。火，立即燃烧起来，蹿上去，包围了树干。

“这就对了，”那个话多的人心满意足地说，一边从地上拾起板斧。“照一照亮吧，不然太黑暗。我们是不喜欢黑暗的。”

于是他们就回村吃晚饭睡觉去了，满以为他们一觉醒来，火就会把树烧光。他们离开时，熊熊烈火将这棵粗大落叶松的下部团团围住，火舌紧紧抱着树干往上蹿，这火势之猛不由使你放心而去。

但是早晨，当他们到岛子靠下游一端去干活儿时，“树王”却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

“你看哪！”又是那个人惊叫起来，“还站着呢！那你就站一站吧，站一站吧……”他是个快活的人，用男低音开口唱道：“你站一站吧，我的美人哟，让我把你看个够。”

然而他也并不打算久看。没过多久，午饭后放火者——他们一伙五个人——结队回到“树王”跟前。他们又围着他绕来绕去，用斧头对他敲敲打打，总想砍掉，却终于又只好作罢：斧头刚刮下树干上燎焦的薄薄一层，就被弹开，像是砍在橡皮上似的。

“瞧这畜生！”那快活的人赞叹地眯起眼睛望着“树王”。“像我们的房东呢，”他指的是鲍戈杜尔。“也是这么挺不正常的。不行，还是乖乖地给烧了吧，别让人费事。反正你得伏输的。咱是六六三十六。”

“去他的吧，”“树王”昨天认识的第二位——穿水靴的——眼睛瞟着队长，犹犹豫豫地提议说。“咱们都给他刮光了又有什么用！”

队长在五个人当中长相最丑，却留着一撇小胡子，他为了显得不像个毛孩子，便仰起头来，说道：

“亏你这棒小伙子，废物！上边不答应。得想办法。”

“得用锯。”

“用锯，你得跟他磨蹭到斋戒日去。这得用钢锯。”

“我是说用油锯。”

“没用。瞧，你要蹭……”接下去的字眼儿不堪入耳。“锯这棵树你用油锯，等于给他挠个痒痒。”

一个昨晚没到树下来过的人，从地上拣起一段烧焦的木片，闻了闻。

“瞎吵个什么？！”他冷笑一声说道。“办法有了！光亮亮的松香。瞧瞧。把火点旺点，就会乖乖儿地烧起来咯。”

“昨天早点过火了。”

“那就是火点得不好。油得多泼上点。”

“咱们再试试。应该烧得着啊。”

穿水靴的人被派到岸边从油桶里汲取汽油，其余的人则动

手去将已倒的栅栏上的木桩抱来劈开，搭成一人高兽栏似的木架，把“树王”围起来，而且围了不只一圈，是两圈。当中塞满了小树杈和桦树皮。那棵白桦被剥个精光。这时汽油早已拿到，便毫不吝惜地绕圈泼满了树干，接着就从底下贴着地面点着了火。火，噼噼啪啪地响起来，烧得桦树皮打卷儿，冒出松焦油的黑烟，突然猛地一喷，顷刻间又憋足一大口气，继而便火舌四蹿、烈焰腾腾地盘旋而上了。人们退避着，用手套遮起脸来。

“二二得四，”是那个快活的人得胜似的呐喊着……

可是他又高兴得太早了。火舌舞动着，舞动着，舔净了汽油，开始衰落下来，离开了树干，活像四周的空气在燃烧似的。“树王”仿佛披着一身可靠的铠甲，依旧安然无恙。十分钟后，火势彻底衰败了，那堆干燥的木桩噼噼啪啪响着烧起来。不过，烧自管烧，火焰却没有去纠缠“树王”，只是给它抹上一层烟炱。

木桩也很快地烧完了。再去抱已经没有意义。外来人不住声地骂着。然而那“树王”却静穆而雄伟地高耸在他们的头顶上，除了自己的威力之外，不承认任何威力。

“明天还是用油锯试一试吧，”队长同意说，刚才他还断定油锯啃不动这么硬的庞然大物呢。

可是又敲起了退堂鼓，而且声音更高了，更坚定不移了：

“把他扔在这儿不就完了吗！叫他戳在这儿，别理他了！碍谁的事儿啦！水都要到哪儿啦？！该收拾村子，可咱在这儿跟这棵树泡上了……”

“人人都不理才行哪！”队长愤愤地说。“不理他谁不会？这用不着教我们。可是等来人验收的时候，你把他藏到哪儿去？拿绒衣蒙起来？难道我们连棵树都弄不倒？”

“这要真的是棵树……”

第三天早晨开始，他们犹如投入一次非同小可的重大战役

一般，带着油锯直奔“树王”而去。队长亲自动手锯了，他侧着身犹犹豫豫地走到树下，再次瞟一眼他那粗壮的身躯，摇了摇头。但终于把锯放下来，贴近树干一压。油锯一抖，险些跳出手去，不过总算锯出了一条浅浅的缺口。队长一见缺口若有所悟，便更加猛劲一按，只听紧张地吱扭一声尖叫——锯被卡住了。锯口下喷出一缕无色的锯末，队长却发现油锯不动了。粗大的树干不允许油锯摇来摇去，只能围着它锯出一圈浅浅的切口而已。这结果恰似将一把锋利危险的剃刀按在一段钢条上，硬要把它切断一样。队长便停了锯。

“是弄不倒的，”他认输了，他此刻已经充分认识到“树王”的价值，便再次从树根到树尖打量了一番。“谁需要你，就叫谁来收拾你这犟种吧！”

他把锯递给站在身旁穿水靴的人，恶狠狠地朝白桦树一摆头，说：

“那就把它撂倒。不准它戳在这儿……树多了碍事，知道吗……”

于是白桦，只因站在强大倔强、不屈服于人的“树王”近旁而获罪的白桦——倒下了，它折断了自己仅存的枝杈，在锯伤和断裂的地方露出了已非白色，变成淡红色的老树的木丝。“树王”面对此情此景毫不动摇。他微微俯身，仿佛是在严肃认真地观察岛子靠下游的一带；那儿曾经布满马焦拉树林，而今不在了。仅在牧场上有的地方，一棵棵白桦孤苦无依地泛着绿色。而在被焚毁的林区，则留下一片烧焦的、黑乎乎的尖木桩。低空里渐渐消散的烟雾飘浮在岛上。被烧光的田埂间的耕地上，禾茬一片黄色，似乎也是烟气腾腾的。一片片的牧场冷清了。跟赤条条、面目全非的马焦拉岛相依相偎的，是同样赤条条、面目全非的波德莫加岛。

唯有挺立不屈的“树王”，继续控制着四周的一切。然而他的四周，已经空空如也了。

二十

没有石灰浆，也没处去拿。达丽娅只好到靠上游的岬角附近的河滩上去拣白石头，然后竭尽全力勉强地用桶提回来，因为所有的袋子都装土豆运到新镇去了。接着又明知“不能”却硬是用原始方法烧炼这些石头。她开始烧时，自己也不相信会有这个能力，可是奇怪：她办到了——石灰烧出来了，石灰浆有了。刷子也有，达丽娅家自己一向有刷子，是用初雪前在树林里割下的那种又高又轻的白草扎成的。

粉刷房子一向被认为是节前大事：每年粉刷两次，秋季修房以后圣母节前一次，入冬生火后复活节前又一次。人们把房屋修饰一新，用大镰刀将地板刮得露出奶渣黄，然后便动手烧饭、熬汤、炒菜。置身于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室内，在炉床抹光、粉刷一新的炉边奔忙不歇，预感到自己教堂的节日即将到来——每当这时，你就觉得那样地身心舒畅，于是一股喜悦的复活之感，事后便久久洋溢于胸怀。

而今她要收拾屋子可不是让它准备过节了，不是的。达丽娅在父母的坟前曾经问过她该做些什么，当时她似乎觉得听到了一个吩咐，她便完全照办了。不给死者洗得干干净净，穿上一身他生前最好的衣裳，是不让他入殓的，这是老规矩。这座祖传的房子——这座从里面抬出了父亲和母亲、祖父和祖母的房子，这座她自己在里面住了将近一辈子的房子，怎么能够不给以像样的装裹就让它死去呢？不，不管别人怎么办，她可不是不懂人

情世故的。她要好生送走它。这房子在这儿站得好好儿的，站了大概有一百五十年了，可现在完了，现在要走了。

这时一个放火人又来了，催促说：

“怎么样，老太太们，”她们，达丽娅、卡捷琳娜和西玛，都站在放火者面前呢。“我们不能等到你们死再动手啊。你们得走。可我们——得把事办完。快点吧，别磨蹭啦。”

达丽娅慌忙起来——要是问也不问就烧可不得了啊。马焦拉村整个靠上游的一头，除了高尔察克营棚以外，都已经清除干净了。靠下游的一头，则还剩有六所抱成一团难舍难分的房子，最好是把它们从两侧同时送走，一个个地往出拽办不到。

卡捷琳娜看到调好的石灰浆，自咎地说道：

“我还没收拾自己的房子呢。”

“你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嘛，”达丽娅想安慰她。

“不知道，”卡捷琳娜并不觉宽慰地重复说。

达丽娅爬上桌子的时候感到头晕，一条条火红闪亮的光带在眼前伸伸缩缩的，觉得两腿发软。她怕跌倒，连忙坐下，双手捧住头。捧了一会儿，等头脑清醒了，镇定了，才又站起身来。先是手足并用——幸好桌子不高也不摇晃，这才两腿直立起来。她将刷子往灰浆里一蘸，单手撑在身边的方凳上，用另一只手在天花板上——一小段一小段地挥动着刷子——本来是应该甩开膀子放手挥刷的。瞧着她那份苦劲儿，西玛要求说：

“我来吧。我年轻点，我不头晕。”

“坐着吧你！”达丽娅心里回答道，对于别人看到她虚弱感到恼火。

不，她要亲自刷好。她即便累断了这口气，也要亲手干，这件事不能委托任何人代劳。双手还远远没有麻木，此刻正需要自己的双手。这就好比母亲下葬时，能够使你感到宽慰的，是自

己的眼泪，而不是借来的眼泪一样。粉刷房子她用不着别人来教，她这辈子刷得多了——灰浆刷得匀净，粉末泛出柔和的蓝色，晾而未干的天花板滴着水珠，冒着潮气。达丽娅一边察看、抹平，一边喃喃自语：“干得挺快呀。它也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也在抓紧时间呢。哦，它猜到了，猜到了，一定是的。”这时她仿佛感到粉刷得惨淡无光，可又不禁相信也就该刷成这个样。

就在她手里攥着刷子站在桌上的时候，又进来一个放火的——看来他们这是在负责轮番催促的。这人诧异地瞪圆了眼睛，说：

“老太太，你发疯了？！打算住下去，还是怎么着？我们明天就要点火烧了，可你还在粉刷呢。你怎么啦？！”

“明天你来烧好了，放火的，”达丽娅站在桌上用严厉的、审判似的口吻止住了他。“天不黑可别来。马上走开，这会儿你管不着。别碍手碍脚的。让你明天来，听见了吗，就是明天来点火的时候，也不许你进屋。你就站在外边点火。不许你给我弄脏了屋子。记住了吗？”

“记住了，”那人目瞪口呆、莫名其妙地点点头说。再次环视了一番，便走开了。

达丽娅慌张起来了，更加慌张起来了。瞧这左催右催的，他们坐不住了，身上发冷了。他们是不会等着的，不，得快点儿。得赶紧收拾好。当天她就连墙也粉刷好，泥平了俄式炉炕上的缝儿，黄昏时西玛还帮她把涂漆的隔扇和窗台擦洗干净。达丽娅的窗帘早就洗好。腿完全走不动了，手抬不起来了，头一阵一阵地隐隐抽痛。然而直到深夜达丽娅也没肯罢休，因为她知道，只消手脚一停，一坐下，那么她就——站不起来了。她动弹着，她自我赞叹不已：她动弹着，她没倒下来——不，这就是说，为了这件事，有一种独立的、特殊的附加力量，输入了她个人那衰弱

的体力。难道为了别的事她能赶出这么多的活儿吗？不，不能，休想。

她呼吸着渐渐晾干的灰浆散发出来的那令人惬意、清爽的气息入睡了。

清晨天刚透亮她就起来了。生着了火炉，烧点热水，用来擦洗地板和窗户。活儿剩得还多着呢，没空儿躺着。达丽娅一想到窗户，就猛然记起百叶窗还没粉刷呢。她满以为粉刷的事完了，可是忘了百叶窗。不，这可不像话。幸好石灰浆昨天没有用光。

“让我来吧，”西玛又自告奋勇了。

达丽娅又拒绝了：

“不，我要亲自动手。土豆就够你们运的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啦。”

西玛和卡捷琳娜正推着小车，往高尔察克营棚里倒腾纳斯塔霞的土豆呢。鲍戈杜尔在给她们帮忙。把土豆收集起来抢运出去，免得今天被烧光，卸到那儿去明天还是得烧光——多半是这个下场。高尔察克营棚也站不了多久了，但土豆是能保一时就保一时，没有法子。等纳斯塔霞回来的指望没有了，然而对粮食和土豆那种古老而神圣的态度，却像对上帝的态度一样依然如故。

达丽娅把临街的第二扇百叶窗粉刷将完的时候，听得身后传来谈话声和脚步声——这是放火者全部人马去上工。他们在达丽娅旁边暂停了脚步。

“你真是发疯了，老太太，”一个人用快活而惊讶的语调说。

另一个声音打断了他：

“别多嘴。”

一个长相不错的人扛着一架小机器走近达丽娅。这是放火

者们第三次围攻“树王”的一天。这人咳嗽一声说道：

“你听清楚，老太太，你们今天还能睡在这儿。今天我们有事干了。明天就不行了……搬家吧。我说的你听清了吧？”

“听清了，”达丽娅头也不回地答道。

他们走后，达丽娅在墙脚土台上坐下来，靠在木房上用背部体味着那磨损了的、粗糙的、但暖人而有生命的木头，放声痛哭起来，把她万般的不幸和委屈一股脑儿哭出来了——那哭是一种令人伤心的干哭：这恩赐下来的最后一天就是如此令人痛苦，又如此令人快乐。说不定在她临死时，也会这样开恩于她：行，你就再活到明天吧——可是这一天该干什么，该把这一天用在什么上头呢？哎——呀，我们个个都是多么善良的人哪，可我们又多么轻率地、故意挑衅似的共同作恶多端哪！

不过这是她最后一次哭了。她哭过之后，就命令自己不准再哭。哪怕人家把她跟房子一起烧，她也要忍住，也要一声不吭。哭，就意味着哀求怜悯，她可不想要人怜悯她，不想要。她在活人面前毫无罪过，要说有，就只是她活得太久了。但是，看来这也是有人需要的，需要她此刻呆在这里，收拾屋子，并按自己的心愿像送别亲人一样把马焦拉送走。

午间，三个老太太、一个男孩和鲍戈杜尔又聚在茶炊边喝茶了。也只有他们至今仍留在马焦拉村，别人都已搬走。马克西姆大叔被接走了，是人家把他搀到河边的，大叔腿脚不灵了。来接走通古斯卡的是她女儿——她面孔酷似母亲，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一只眼的下眼眶上有块明显的青紫斑。她随身带了酒来，通古斯卡因为喝了酒，就在河面上渐渐远去的快艇上，用她那古老难懂的语言，久久不停地高声大叫着什么。柯什金家的大儿子在最后一趟回村时摘下了房上的窗框，并且亲自点火烧了他们那座大房子，窗框则带到新镇去了。就在那同一个星期

内，沃龙措夫也赶来了，他跟放火的人们谈了话；当碰上鲍戈杜尔时，就钉住鲍戈杜尔叫他马上离岛。

“要是无儿无女，无家可归，我就开一份孤苦证明，”沃龙措夫解释说。“由区委会安排。你快一些打点吧。”

“婊——子！”鲍戈杜尔话没多说，如此一声回答，就背过脸去。他听懂对方的话没有呢——你自己琢磨去吧。

但这一切都已经发生，都过去了，最近两天任何人都没再到马焦拉村来。这儿也没事可做了：凡是需要的都已运走，不需要的就不要了。过新生活就该如此嘛，不准把老古董带进去。喝茶时达丽娅说，放火的人们把烧房子推迟到明天去了，接着她便提出要求：

“你们都到大伙儿集合的地方去睡一宿吧。这最后一夜我要一个人睡。那儿有地方躺吗？”

“日本上帝呀！”鲍戈杜尔双手向两侧用力一扬，愤慨地说。“只有硬铺板。”

“明天我也到你们那儿去，”达丽娅许诺说。

午后，她跪着爬着擦洗地板，直恨不能把地板好好儿地刮一刮，刮下表面上薄薄的一层木头和积垢，而后再用笤帚沙沙地扫上一层安加拉河河滩上的细砂，好让太阳在上面闪光。她原本是能够最后完成这么一次的。可是地板却涂过漆了，还是索妮娅轮到自己管擦地板时坚持要涂的，达丽娅当时也不能争辩。当然咯，在漆面上抹一抹是轻松，可这不是办公室呀，在家里就是弯弯腰也不要紧的。这么一涂漆，人们要是不去澡堂洗澡，很快就得把自己也染得满身通红。

这地板经过多少人走，多少人踏呀，好像踏出了一个大大坑，仿佛一条条地板下陷了似的。最后迈步踏过这地板的是她的双脚。

她一边收拾屋子，一边就感到浑身力气正在衰弱、枯竭；事情剩得越少，力气也就剩得越少。这事情和力气仿佛正待同归于尽，这也恰是达丽娅的心愿。把事情做完，往门坎下一躺睡着了——有多好。以后随便怎么样就与她无关了。以后不知是活人还是死人，会发现她不见了，而且会把她找到。她随便到哪儿去都行，活人也罢，死人也罢，她都不会拒绝。

她走进门已敞开、栏杆斜倒在地下的废牛犊栏，在破墙角里找到一把黄锈斑斑的长把大镰刀，割了些草。那草又乱又硬，也是锈迹斑斑的；真不该拿它来铺地举行仪式，可是别的草在这个季节找不到。她把草装进小筐，带回室内，就撒在地板上。草散发出的与其说是青草味，还不如说是干草味和烟味，不过这草倒是也铺不了多久，它这气味也散发不了多久的。不要紧，也凑合啦。谁也不会苛求于她了。

最困难的事情已经做完，剩下的事很少了。达丽娅坐也不肯坐，挂上窗帘和炉帷，把条凳和木床上没用的东西一一拿开，炊具都整整齐齐地放归原位。但她觉得总还缺点什么，漏掉了什么。也难怪会漏掉呢：这事该怎么做，她从没见过，也未必有人见过。需要如何虔诚地送走一个人，她知道，那本事是世世代代的前人遗传给她的。然而此刻，她却只好依靠一种事前模糊不清的、但有谁总在不停地启示给她的嗅觉。没关系，以后别人做起来就容易了。只要有人开了头，就必然会有人继承下去，一定的。

至于还缺点什么呢，这她也被告知了。她望望临门的屋角，看完这一角又看另一角；于是悟出那两处要放上冷杉树枝。窗户顶上也要放。对呀，缺冷杉树枝怎么行呢？然而达丽娅不知道，马焦拉岛上是否还剩有冷杉，因为一切都已备受摧残、遍遭火烧了。得出去找。

天快黑了。这天黄昏温煦而静谧，天空里和沐浴着落日余辉的远林中，都泛起淡蓝的色调。烟味依旧，这烟味始终就没离开马焦拉岛。可是不知怎的，还可以闻到一股有如开垦时大地深处冒出的那种清新凉爽的气息。“这是从哪儿来的？”达丽娅百思不得其解。“是从那儿来的，从地下来的，”她耳有所闻。“还能从哪儿来？”是啊——这股潮湿的地气不是从地下，又能从哪儿来呢？看我们有多聪明——一味仰望天空。

达丽娅走向近处靠上游的一条小河汊，那儿被洗劫得稍轻些。她走起路来轻松得出奇，仿佛并没奔忙一整天，片刻未歇似的，仿佛是什么托着她走似的——她只需双脚轻轻触到小路迈着步子。呼吸起来也感到轻松自在。“这就是说，冷杉树枝的事寻思对了，”她想。于是她便觉得她事事都做得对，甚至拒绝让西玛和卡捷琳娜最后一宿睡在她家也对——这种欣慰恬适的感觉萦绕在她的心田。她这是在什么授意之下，毫无思想准备，当机立断拒绝的吧？！那个放火的也是受了什么怂恿，才把烧房子推迟到明天的——八成也是没经过前思后想就脱口而出的。不，这一切都并不那么简单，都是奥妙的。她此刻正望着一只黄胸脯的小鸟，在忽左忽右一程又一程地飞呢。小鸟时而敛翅，时而腾空，仿佛是在给人指示前进的方向，好似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使者。

她找到了那棵仿佛为她保存下来，而且当即让她看到的冷杉，折了一大抱树枝，摸黑回家了。到家之后才发觉回来了，至于怎样走回来的，一路上想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那股悄悄袭上心头的欢快情绪依然没有离开她，她似乎觉得有人始终注视着她，有人指导着她。直到此刻，夜已来临之际，她仍无倦意，手脚活像插了翅膀，一齐无声地、自由地活动着。

她借着灯光，借着那闪烁不定的昏黄的灯光，站在方凳上把

冷杉树枝挂在屋角里，插在窗顶的砖缝中。那冷杉枝立即飘散出永别的触动人心的香气，脑际浮现出燃烧的蜡烛，耳畔响起柔和凄婉的歌声。于是整个室内显露出一副哀痛弃世的、僵死的面容。“它猜到了，哦，猜到我要把它打扮好送到哪儿去了，”达丽娅想着，一边惊恐而恭顺地环顾四周：还有什么？她把什么漏了，忘了？似乎一切都妥当了。脚下草儿滞涩的沙沙声，令她感到惊扰、烦恼，她熄了灯，爬上了炉炕。

恐怖而空虚的寂静包围了她——没有狗吠，没有石子在任何人脚下作响，没有偶然的人语，沉重的枝叶间风儿杳无声息。恰似周围万物都已死尽灭绝。岛上还有狗呢，三条被主人遗弃听天由命的公狗，一直在岛上东奔西窜，可是今夜它们也默不作声了。听不到一丝声响。达丽娅惊恐不堪，爬下炕来，开始祈祷。

她通宵祷告不止，自咎而恭顺地跟房子告别。她似乎觉得有什么东西对她的话在随声附和，而且还不停地重复着把这些话带向远方。

早晨，她收拾好那只放着她的寿衣的胶合板箱，最后一次对临门的屋角画了十字祝福，在门口梳了梳头，忍住没倒在地板上昏过去。接着她走出屋，随手掩上了门。茶炊早提前端出去了。西玛和卡捷琳娜好像警卫似的站在纳斯塔霞的房前。达丽娅叫她们接过茶炊，便头也不回地朝高尔察克营棚走去。到了那儿，她把自己的箱子放在第一道门廊旁边，走进放火的人所住的第二道门廊。

“好了，”她对他们说。“去烧吧。可不能进屋……”

她走出村去。至于那一整天自己到过什么地方，她不记得了。她只记得自己走啊，走啊，不知哪儿来的力气。身旁总好像跑着一个从前没见过的小动物，老想要看看她的眼睛。

两个老太太找她，喊她，但她没有听见。

傍晚，驾船回来的巴维尔就在近旁，在“树王”附近找到了达丽娅。她当时正席地而坐，目不转睛地朝“树王”那边望着，看那残存的烟气如何从岛上随风飘去。

“站起来吧，妈，”巴维尔搀起她来。“纳斯塔霞大婶来了。”

二十一

纳斯塔霞双手掩面，啜泣着同时不停地前俯后仰着，低声呻吟道：

“叶戈尔……叶戈尔……”

老太太们慌张而抑郁地默不作声，她们不知该不该相信叶戈尔是死了。谁能说得准：纳斯塔霞这些日子在城里，是否精神错乱更厉害了呢。既然当初她在这儿一提起老头，就无中生有地说他仿佛正在哭个不停，血流不止；那么在那边，她这有病的头脑是否更加不可救药了呢？叶戈尔大叔说不定此刻正坐着，正若无其事地点燃着自己的烟斗呢。真是一想就叫人害怕，她会活着就埋他的，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了。想起来可怕，叶戈尔大叔不在了……

鲍戈杜尔的住房像走廊一样窄，而且破败不堪，肮脏得很。老太太们昨日和今天拿到这儿来的什物，使屋子里乱上加乱。在铺着一层干草的板床上，乱放着一些绒衣、被子、一包一包的碎布；一张简陋、未漆、满是裂缝的桌子上，锅碗瓢盆堆积如山。达丽娅那只茶炊放在靠近惟一的一扇小窗旁边地板上，小窗的下部掉了一块玻璃。从这个洞口射进了阳光，阳光里，那块完整无损然而乌黑乌黑、积年累月由苍蝇们施足肥料的玻璃，正在油

汪汪地熔化着。地板上踩下了许多红色的砖末，砖上从前摆过一只铁炉子。如今什么炉子也没有了，而且在整个这间鸡窝似的房子里，一面墙边放着板床，好比供鸡栖身的横木；另一面墙边放着一张长条桌子，有如饮水的木槽——满屋没有一丝住人的气息。

但要想挑一个、找一个更体面的住处也不可能了：到此刻为止，完整无恙的也就只剩这所高尔察克营棚了。牛棚也罢，浴室也罢，都一间也不复存在。村子靠下游的一头，一些敞开的木房还在冒烟，在那炽热的灰烬中，时时都有什么东西不堪炭火灼烫，火药似的爆燃而覆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一座座俄式炉炕，正在死人一般地、可怕地渐渐冷却下来。完了：马焦拉村走了，飞了——愿它升入天堂！这所营棚不算数，它是外人之手所盖，压根儿就是无足轻重的。连放火的人们都没去烧它，薄暮时分他们集合齐了，就坐上预定的一只汽艇走了。临别时，他们当中的两个走进鲍戈杜尔住的半边营棚。西玛和卡捷琳娜正藏在那儿呢，她们害怕得发抖，不忍看房子燃烧的情景。

“哎，老太太们哪，对你们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说。“你们这些老太太真是不开窍，怎么也要把你们轰出去的。难道还让我们再等……等你们！我们最好还是到澡堂去，把在你们这儿弄的这浑身黑烟去洗一洗。既然这样，这座堡垒你们就自己点火烧了吧。”

“你听见了吧，纤夫！”另一个人冲着鲍戈杜尔大喊了一声。“你们走的时候，房子不许留下不烧，不兴这样。火柴有吗？”

“婊——子！”鲍戈杜尔一声怒吼，而西玛早就亦喜亦惧地忙乱起来，便翻译道：

“有，我们有火柴。有。我们自己烧。”

他们走后，他们刚一启程，巴维尔就到了，他把纳斯塔霞带

来了。接着又把母亲从牧场上搀了回来。他茫然失措,不知该怎样安置老太太们:一只小船坐不下,况且还有这个长了青苔的树墩子——鲍戈杜尔。再说他们也不肯说走就走啊。这一层他一见母亲就明白了,不过还是问道:

“要不咱们今天就上路吧?剩下的人我明天再来接……”

达丽娅答也没肯答。

“那好吧,”巴维尔寻思了一下,就顺从了。“既然有纳斯塔霞大婶在这儿就算了。再过两天我开只快艇来。听清了吗,妈:再过两天。明天我上夜班,后天你们就要准备好。麻袋我也要拿来,也许要把你们的土豆运回去。”

巴维尔在那一处处炽热的火场旁边转来转去,转了一会儿就驾船走了。于是他们留在这儿是全然孤苦伶仃了;不过已经不是五个人,添上个纳斯塔霞成了六个。

略微镇静了一些,稍稍平息了一下因重见马焦拉而爆发的痛苦之后,纳斯塔霞讲道:

“就打我们一到那儿住下来,他就哪儿也不去啦,总是闷在家里,闷在家里。我就说:‘叶戈尔,你干吗不出门?为什么不出去见见人?都是些跟我们一样的人哪,都是落汤鸡。’除了从安加拉河上去的人都这么称呼我们……一到晚上,我们就爬下炕来走到门外,人们都在街上转悠呢,我们就一块坐坐,聊——天,聊天……哪儿去的人都有:有个老太太是切列潘诺沃村去的,也有沃罗比约沃村去的,也有沙曼村去的。我们就讲啊,讲过去的旧日子,也讲眼前这个……可他总是闷在家里,总是一个人。他把收音机一开,我们那儿自己有架收音机,就听啊,听啊。我就说:‘走吧,叶戈尔,你去听听大伙儿都在讲什么,那天上的讲话你又有什么好听的?’可是不,他一头扑在收音机上,就怎么也拉不动他。还生我的气呢,怪我找麻烦。他好像变成个灶王爷似

的。他又总是哭啊，哭啊……”

“你来的时候，他也哭了？就在你到这儿来的时候？”达丽娅问道。她屏息不动，对自己想用这番话挖苦、捉弄一下纳斯塔霞感到难为情。

“来的时候？”纳斯塔霞莫名其妙，反问道。“到哪儿来的时候？”

“到这儿来的时候？”

纳斯塔霞的脸抽搐起来，抖动起来了。

“他会哭的……他会哭的，可是他已经……他还怎么哭呢？他后来不哭了，死了——你们这是怎么啦？他躺着，浑身是那么苍——白，苍白，叶戈尔啊……我多心疼他呀，我多心疼……”她再度前俯后仰起来。“他就那么躺——着，躺着，不说话——了，不说话了……”

“有人帮助埋没有？”卡捷琳娜问道。纳斯塔霞像喜欢这么问似的，她的语调变得平静、活泼起来了。

“埋吗，大伙儿帮了大忙。真是没说的：都是好人。是自己人，喝的是一条安加拉河里的水呀。切列潘诺沃村去的阿克西妮娅过来给洗得干干净净的……真没说的：同楼的人都来了。那边把进一个楼梯口的人叫‘同楼的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一口棺材，拉回来，缠好了黑纱，什么事都没用我动手。后来开了一辆汽车来，把棺材抬上去。不过样样都是阿克西妮娅给张罗的，她真是一把好手……别看是个老太太，别看以前生活在那么一个乡村里。我就这样在那儿慢慢住惯了，还算不错。叶戈尔啊，他是怎么也不想住惯了，总是那么愁啊，哭啊……就剩那么一点儿乐趣，那架收音机。一边听一边叹气，一边听一边叹气。我就问：‘叶戈尔，那里头在说什么呀，你这么听个没够！’‘说播种高潮到了。’‘什么播种高潮？什么播种高潮啊！——眼

看秋天都到了，你往窗户外边瞧瞧。你发疯了，还是怎么的？’我就说：‘你呀，叶戈尔，总唠叨什么？老胡诌什么？你呀，老头子，你顶好是哭一会儿吧，别胡思乱想了。’可叶戈尔这个人，你们都记得，他脾气有多犟。他跟我说：‘我唠叨，我胡诌，我说要夺大丰收。’他到临死话说个没完没了。可他因为整天不出门，浑身上下白得透亮，皮薄得像一层纸。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像盏灯似的眼瞅着快要熄灭了。我问：‘哪儿疼啊，叶戈尔？你身上哪块儿疼，什么地方疼啊？’我又不是瞎子，看得见他正像雪一样在融化。他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说句话，至死也是那么别别扭扭的。‘他说，你听，是扔炸弹了吧？’‘这个呀，叶戈尔，不是炸弹，’我跟他说明，‘这是崩地哪：不用人刨了。’我是坐在楼下长凳上，听老太太们说正在崩地呢，我开头听见那么轰隆一声响，差点没给吓死。可他是哪儿也不去，都是我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耳朵里嗡嗡叫，他说，耳朵里嗡嗡叫得难受死了。’他只抱怨过这一样，别的什么也没抱怨过。”

“死得平静吗，没受罪吧？”

“死得很平静。死得没那么平静的了，上帝保佑，让我也这么死去吧。白天他说：‘去，纳斯塔霞，给我打点儿红酒来，我不知为什么浑身麻木。去打点儿来，他说，我要催催血，不然都淤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就去了。我们那儿马路对过有个商店，可这个店里没有红酒，我就又穿过一条马路。那儿满街是汽车，天下的汽车都跑到那儿去了——不住地从身边窜过去，窜过来。我不敢往前走，干脆停了一会儿。我就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一直到汽车都过完了。看来走了好半天。回到家来，叶戈尔两眼那样死死地盯住我。买来啦，我说，叶戈尔，别生气，我可不是会跑街的能耐人。他也就算了。他站起来想靠近桌子，站起来身子摇摇晃晃的。这一摇晃连他自己都害臊了，骂了自己一顿。

等我们坐下来，天就黑了。我们坐了不大一会儿，他用玻璃杯喝了两指的酒。不行，他说，这酒不行，不往下走。就又上了床。我跟他是分开睡的。他睡在我们家那张床上，我睡的是城里那种能像手风琴似的折叠起来的青蛙床。我一躺下，就见他在瞧着我呢。我说：‘怎么，叶戈尔，你也许要什么东西吧？’”纳斯塔霞此刻语气紧张起来，她全身向前一倾，仿佛忍不住探身去要求回答似的。“我问：‘也许，你要什么东西吧？’我看他那眼神不对头，我身子就猛地往后一仰。可他呢，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可是没说，瞧，他怕把我吓坏了。他感觉到，感觉到要死了。”纳斯塔霞再次停了停，点了点头。“他感觉到了，感觉到了。我把灯端走，躺下去，睡着了，真糊涂。睡着了！”纳斯塔霞大叫一声，但随即换了个嗓门儿。“我夜里醒来一听，下小雨呢。心想，这雨是怎么回事，傍晚时一片云彩也没看到啊。这时虽说天黑看不清，可是我还是习惯地看了看。雨下得并不那么凶，不声不响的。哎呀，我想，不好了。我走到窗前，小雨才刚刚下起来，地皮还没湿呢。我记得有一次叶戈尔提起过下雨：好久没下雨了，他说。我就低声说：‘叶戈尔，下雨了。你盼雨有什么用处吗？我又问了一遍——你盼雨有什么用处吗？’他一声不吭。我去拿火儿，顺墙摸呀，摸呀。灯点着了，可是我的叶戈尔，叶戈尔……”

纳斯塔霞哭起来了。

太阳落山了，鸡窝似的营棚里迅速昏暗下来。老太太们沉痛、抑郁地默默无言。西玛的小外孙害怕地一个劲儿揪外祖母的衣袖，外祖母则轻轻地推开他。鲍戈杜尔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他没等老太太们动手烧水，就在一片肃静中把茶炊端到门廊去，咕嘟咕嘟地灌起水来。

“姥姥，姥姥，”柯利卡喊起来。

纳斯塔霞转身发现了他。

“柯利卡一直跟着你吗？”她问西玛。

“跟着我，跟着我，”西玛连忙答道。“他还能跟着谁呢？只要我活着，我还能往哪儿搁他呀？”

“我跟叶戈尔也有过孩子们，”纳斯塔霞说。“达丽娅和卡捷琳娜一定记得。记得吧？”

达丽娅跟卡捷琳娜面面相觑，各自寄希望于对方，终于都没回答。

“这是怎么啦——我在撒谎，还是怎么的？”纳斯塔霞委屈地高声说道。

“上帝保佑你，纳斯塔霞，”达丽娅说，为了安慰她，还伸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背。“上帝保佑你，纳斯塔霞，你怎么啦？！你来了——这就好了，你来了，这就行了。我们等你等得好急呀……你的土豆我们给刨了。”

“什么土豆？”

“你的呀。你的菜园里长的。”

“啊——啊，”纳斯塔霞将手一挥。“我往哪儿搁它？”

“甭管有地方搁没地方搁，总不能叫土豆烂了哇！”

老太太们想起点灯来了，可是没法点：鲍戈杜尔这个家就像个蟑螂窝一样，没灯可点——既没灯，也没蜡。达丽娅那盏灯呢，她留在屋里了，八成已经为火舍身助威了。卡捷琳娜到放火人那半边走了一趟，也是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摸黑坐着了。这么说，是活该如此，闹到这步田地了。这或许反倒更好些：免得这幅破落而无家可归的惨象老是摆在眼前，也就可以不令人为明天提心吊胆了。马焦拉岛已经一扫而光。未来新居较远的人们统统离岛搬走了，光明远去了，而且看来一切都远去了——任何人也不会再来，光明也不会再光临了。而他们，这些抱住马焦

拉岛不放的人们，就要在黑暗中被风吹浪卷而去，就要被风吹浪卷而去——直到最后一并为他们一伙敲响一声丧钟为止。那个男孩仿佛对此有预感似的，他如怨如诉地啜泣起来，西玛开始安慰他。

鲍戈杜尔把滚开的茶炊端进来，又放在地板上，从碗碟堆里摸出茶壶，泡上了茶。各人连板床也没下，就双手捧着发烫的搪瓷茶缸喝起来。谁也没要糖，没要面包——似乎是这一切都再也不兴了。还有茶喝，就算不错了。窗洞里钻进一阵凉气，西玛遮住柯利卡，絮絮叨叨地放他睡觉；柯利卡还在哭诉着呢。没过多久天透亮了，显出了墙壁，鲍戈杜尔报告说：

“茨冈的太阳，婊——子！”

“茶炊你带走了，在那边用过吗？”达丽娅想起来，就问纳斯塔霞。

“一共才用过两回，”纳斯塔霞叹息道。“第一回用，叶戈尔还活着呢，另一回是在他死后。切列潘诺沃村的阿克西妮娅去了，她说，来烧一壶喝。哎呀，那算什么茶呀！那水给弄得什么滋味也没有了，里边撒了药，把安加拉河的味儿去掉了。炭也没有。阿克西妮娅呢，她拣了些松果来，把茶炊灌满水，就提着下楼上了街。还能在哪儿烧水呢？再没别的地方了。我跟她坐在一旁守着，四周人来人往的，都笑。人家阿克西妮娅可泼辣呢，什么也不在乎。我们等得好苦哟——没烟筒，一点也不通风，松果又硬得像石头。总算等到水开了，得提回家呀。我们的房子在四楼，我空着手喘着气凑合能爬上去。迈一磴站一会儿。楼梯陡得要命。阿克西妮娅家在第三层，总算稍微低点吧。那儿每个过道里有四个门，上楼靠左手第一个门是她们家。我们没走到我们家，我心都要蹦出来了，我们拿着我的茶炊到她家去了。跟她住在一起的还有个老太太，身子骨儿很不济，在平平的

地板上迈步都吃力。我们坐下来一喝，茶炊就倒空了。我们知道凉了热一热都很难，所以就喝呀，喝呀。”

“你还回去不？”

“哎呀，不知道哟，达丽娅。眼下什么都不知道。我倒是高兴不回去，那叫我上哪儿去呢？……”

“你大概并不留恋那个地方。”

“不留恋，又有什么办法。躲到哪儿去？谁要我？这可是实话。叶戈尔的坟又在那儿，怎么舍得了呢？看样子我们得分开躺着了，要想躺在一块儿，就得一块儿死。我打听过了。坟地是新开的，一个挨一个地埋，碰上谁就靠着谁。哎呀，我倒也撑不了多久了，也许总归离叶戈尔远不了。不知我活得过冬天活不过……心想我来看看你们，最后再看上一眼马焦拉。完了就只等一死了。我跟叶戈尔住的房子烧掉了么？”

“难道你还没看见？今天刚烧掉。你坐船到的时候还没烧完呢。咱们这片房子昨天还都有呢，一下子就烧光了。你没看见，还是怎么的？”

“我什么也没看见。连我怎么坐船来，又怎么靠的岸，我都没看见。样样都像在做梦。就是那么着急要最后看一眼马焦拉，那么着急……天底下的事别的都没注意。什么都不想要，连口面包都咽不下去。心想不行，我得去，不然就活不下去了。得把纽尼亚，那只小猫，接走。哎呀，”她忽然想起来了。“我的纽尼亚还活着吗？看我都没问问。达丽娅，纽尼亚我是留在你家了吧？……”

“你倒问问我还活着没有啊？光惦记自己的纽尼亚……”

“那纽尼亚，它到底在哪儿啊？我是托你照顾它的。”

“昨天晚上还活着呢。这会儿在哪儿，我不知道。我记得昨天晚上把它轰出屋去了，好让它不致烫死。也许又从气孔里钻

回去啦，也许正在什么地方游荡呢。”

“明天该去找一找，叫一叫它。我怎么能没它呢？哎呀，这往后可叫我怎么活下去呀？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哪？”纳斯塔霞在黑暗中擤起鼻涕来，摇晃起来。

忽然间达丽娅提醒说：

“你把西玛跟小外孙带回去吧。她们也正不知该怎么活下去，该往哪儿投奔呢。要不就带鲍戈杜尔。可你光说纽尼亚……”

“嗨！”鲍戈杜尔一口拒绝。“城——市！”说着就愤愤地唾骂了一声。

“要是西玛她肯去，那当然是再好也没有了，”纳斯塔霞欣然同意说。“那我们就一块儿过。人家阿克西妮娅还说呢，不管怎么样也得给你找个安身之处的。干吗跟外乡人去住在一块儿呢，咱们马焦拉人住在一个门洞里多好啊。真是再好没有了。”

“我不知道，”西玛感到茫然失措了。“八成得经过许可。会不答应的。真能那样倒也好……”

纳斯塔霞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个我可是一窍不通。在那边，阿克西妮娅有时候给我指点指点，要没她呀，我就完了。日子实在不好过。城市，那是城市。面包得买，土豆得买。面包嘛，倒不算贵……这就不说了。阿克西妮娅有一回拉我到菜场去了。坐车走啊，走啊，我简直头都晕了。总算到了。有什么好去的？一饭盒土豆要三个卢布，一头大蒜一个卢布。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哪儿拿这么多卢布去？这纯粹是敲竹杠！我什么也没买就回去了。倒也真开了眼了。这些郊区的人赚钱哪，哎呀，赚钱多得想都不敢想。他们干吗攒那么多钱，往哪儿花呀？！哎呀，怎么说呢！我们过去有卖牛犊的钱，日子还能过，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看样子为叶戈

尔会发抚恤金。不知道。房钱要缴,煤火钱要缴。也许不要紧,我现在吃不了多少了。不需要了。什么都不需要了。有时候忘了,一点儿东西都不往嘴里填,也不想吃。就像成了仙似的。身子软极了。”

鲍戈杜尔在一边靠着门口,开始忙着铺床睡觉,纳斯塔霞也住了口。卡捷琳娜连声叹着气。西玛也罢,小外孙也罢,都不作声了。一片来自远方、来自水底的寒光,在这鸡窝似的营棚上盘旋,在墙壁上、人脸上洒下些轻淡的光点,小窗对面的门显得昏暗起来。老太太们为这一线光明所迷惑,在哑默与哀愁中神思恍惚了。

二十二

巴维尔在黄昏中回到了新镇。整个夏天往来奔驰于河岸与新镇之间的班车停开了。巴维尔锁好小船,跟守夜人——一个外号叫“巨人”的波德沃洛申斯克村的老头儿谈了会儿话。老头儿的外号是当初因为力大出众得来的,而今他却干瘪衰弱得多了。巴维尔跟老头儿谈了会儿话以后,便举步朝十俄里之外的山里走去。可是他出乎意外地交了好运:刚走出不到两俄里,就有一个陌生人驾着摩托赶了上来。那人头带坦克帽,面孔瘦削、严肃,满脸皱纹,没等请求,便自动停住,让巴维尔上了车。问到哪儿去是没有必要的:这条路一拐弯只通新镇,再远再近谁都不走它。巴维尔搭上这辆轻快称心的便车,十分钟就到了。摩托手在新镇镇口车库附近刹住车,对巴维尔的道谢默默地点头作答,然后向左拐去。巴维尔则照直前进,他住的那条街在山上,紧靠着树林。

夕阳西下了，在渐趋清凉的、凝聚的天光下，每个物体都显得形象鲜明，而此刻的新镇则酷似一片养蜂场。一模一样的房屋匀称规则地排列着，整整齐齐地分别向两边展开，一边向左，一边向着安加拉河。这些一模一样的房屋，都围着也一模一样的、虽说不高却很严密的板墙。老实说，左边才是新镇呢，巴维尔爬着坡向上走的这条街，是最靠边的一条了。街的右侧遍处都是生产用房——车库、修理所、加油站、锅炉房，再过去则是澡堂，名为“工人澡堂”。这条街一向是人声喧闹，马达轰鸣，弥漫着汽油、煤炭和铁器的臭味。此刻却是出奇地寂静无人，独有巴维尔靠着坎坷较少的生活区一侧，沿街跨步向前。生活是在那边，在板墙的里边进行着呢——里边传来谈话声，传来叮叮当当声；里边有锁链铿然作响，巴维尔走过时群狗乱吠（沃龙措夫下令给所有的狗都系上锁链，人们照办了——因为在这之前，段长瓦尼亚·苏斯洛夫，一个当过边防军的年轻快活的小伙子，把狗开枪打死了将近一半）。也是在那边，在板墙里边，正在建立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秩序，说不定正在栽种稠李树和白桦树呢。可是在这边呢，在街上呢，像在所有的街上一样，空荡荡、光秃秃的——没有一片花圃，没有一株小树。也许是还没来得及动手，也许是认为：不需要了，没有用了，周围都是树林嘛。

在山下的几条街上，一辆辆的摩托车在突突地响个不停，多半是初学者在来回跑着练车呢。这摩托车可多了，每家院里都有。人们到布拉茨克去买，甚至到伊尔库茨克去买，都那样发了疯似的急着买，抢着买，仿佛是摩托车已经停止生产，就剩这些了。或者又像是在互相摆阔气：似乎在说，咱们也不是草包，咱们也有，咱们也能。对这种急不可待之风巴维尔尽管感到莫名其妙，自己却也常常盘算着开春之前也得置一辆摩托车。在马焦拉村时摩托车用不着，那边样样都在手头。可是在这儿呢，明

天去上班要步行就得一个多小时，夏天要到河边去捕鱼，要到荒野去采蘑菇、摘浆果——不管到哪儿去，光靠两条腿不行……这儿不是马焦拉村。

说得对，说得就是对——这儿不是马焦拉村。马焦拉村不在了——愿它升入天堂，妈妈会画个十字这样说。现在马焦拉村不在了，马焦拉岛也快没有了。今年大概还能划船去转一趟，去推测一下它的位置……奇怪的是，巴维尔把这个情景想象得如此简单明了，仿佛不止一次地体验过似的——一只小船浮在水位提高了的浩淼的水面上，他自己坐在船上，试图凭着遥遥相对的两岸，确定出马焦拉的位置，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黑乎乎、凝然不动的一片汪洋。是否会从那种只有在梦中才能想见的深处发出一个信号呢，是否会从什么地方闪亮一盏灯火呢？没有，既不见信号，也不见灯火。如果是从此岸到彼岸横越水面，倒还可以说：就在这儿呢，因为你总能在什么地方从马焦拉头顶的水面上划过；但假使船是顺着河床划就不行了，那就很难估计马焦拉在哪儿，它是在哪条线上对天发誓的，它长眠到哪儿去了……完了，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同样令人吃惊纳闷的是，巴维尔此刻居然绝无别的感受，只感到一种使人轻松的、终于解脱了的痛苦：好似一颗脓包不停地胀啊，胀啊，终于胀破了。终归要发生的事而今发生了，在劫难逃却又要坐等劫数临头，这比遭劫本身更叫人厌倦和痛苦。够了，够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如今再也不必为马焦拉备受煎熬，再也不必整天左右为难、东跑西颠、忐忑不安、没完没了地揪心了——如今，尽管还在对这新镇里的新生活吹毛求疵，却也只好在这里牢固地安家立业，把全部幸存的根须扎在这片新生活的土壤上了。

巴维尔向左拐弯，顺着一条街斜着走过去——这样走近些——便又上了山。不知从谁家的院里甜丝丝地飘出一缕炊

烟，刚刚从一个多月来遍地浓烟不绝、呼吸困难的地方归来的巴维尔，不由得停住脚步，吸了一口那似乎与旧日的一切密切相关、看来要随着搬家而消亡却并未消亡的香甜的气息。对呀，人们在这里不再烧暖炉炕，烧暖浴室，不再点火冒烟熏蚊子，然而谁的家园里也未曾断过炊烟。巴维尔开始回忆，整个夏天他是否在自家院里出于某种需要点过火——没有点过。堆在一起的垃圾至今还在墙角里发霉呢，上边都钻出了野草。早在春天他就打算把垃圾烧掉，但又想会有人跑过来问：什么烧着了？失火了吗？为什么别人都不烧，只有你们烧？——于是就没理它，扔在那儿，尽管是绝不会有人跑来讲什么话的。人们都还不习惯，好像寄人篱下似的，总是看人脸色行事，干什么都等人发号施令。当巴维尔的思路再度回到马焦拉，回到今天的马焦拉之行上来的时候，他羞愧地忆起他伫立在自己那座行将烧光的屋旁的情景，并且总想唤起，从内心唤起、找到一股强烈的凄凉之感——要知道这烧的不是树墩，而是祖传的家宅呀。可是除了对自己曾经住在这里有一种痛苦、难堪的惊异之感而外，他任何别的感情也未能唤起，未能找到。心狠到这般地步了！巴维尔活像在为自己开脱似的想，他本来就常常不得不回味他是在活着，不得不激发自己的活力：战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就没有清醒过来，而且照他看来，打过仗的人清醒过来的很少。巴维尔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常常糊涂起来。一糊涂，他就管不住自己了，就任自己放纵起来，而且为时甚久；他到过什么地方，飞到哪儿去了，做过什么事——一概不记得。接着猛醒过来，头脑就清楚些，步伐就坚定些，就尽量把自己约束得紧些，留下烙印，留下标记。这样持续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有时更久些，就又糊涂起来，就又像夜游症患者似的，陷入一种精神失常、身不由己的状态：活动是活动，但已经失去知觉，只是凭着惯性了。

突然间响起一片儿童的谈笑声，巴维尔料到这是学校里传出来的，放学了。装有涂成银白色的漂亮雨水管的校舍侧面，从这儿就看得见，令人眼馋。巴维尔不知为什么叹了一口气，随后回头看一眼校舍，惋惜他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不能在这儿读书了。这幢校舍，即使用现代眼光来看，也是建造得很出色的——它喜气洋洋，比周围其他建筑物高出三层，窗户宽大——如果说新镇的确像个蜂箱摆得整齐匀称的养蜂场的话，那么，只有学校、商店、幼儿园、食堂、乃至澡堂这些非居住用房，才破坏了、冲淡了新镇那美丽而凄凉的单调景色。真的，要是家里有人——哪怕不是儿子，哪怕是孙子——在这所学校里读书，而校方邀他去开会，孩子得两分、爱淘气要他负责，那该多好啊。但是，看来这也办不到了。因此，每当他看到学校，并且像刚才这样听到儿童的谈笑声时，就不禁愁肠百结。这么说日子过完了，时候没到就过完了。寻思到这儿，他又一次想起母亲，想起应该设法把她接回来，但仍是不相信她有朝一日竟会跨进这个新镇。有什么东西不让他、不准他相信——你毫无办法！——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他的眼前垂下了一道黑幕。

站在这里，从山上望下去，仿佛觉得亮起来了。盖着石棉瓦的一排排高高的屋顶，有如一层层沉稳的波浪从一条街涌向另一条街。那些摩托车依旧在突突地响着扬起灰尘。左边田野上传来一台拖拉机吃力的吼声。学生们仍在吵吵嚷嚷地四散到条条街巷。谁家院里的奶牛憋足了气，一声接一声不胜痛苦地哞哞叫着。遥望远方，安加拉河滚滚流荡，浮栅之外河的彼岸泛着蓝光。彼岸的上空，陡峭地、近乎垂直地耸立着明净冷寂的天空，天边上仅有的一条轻淡的彩云，像根羽毛似的插在地平线上。就是在这里，在头顶上，苍穹也向着安加拉河那边俯下身去，它冷静下来，昏暗起来了。在这儿——不像在马焦拉村，夕

阳一落当即凉气袭人——周围温暖而干燥，这暖气是白天晒热的地面和屋宇散发出来的。还可以闻到地面和屋宇散出的油漆味儿和汽油味儿。

巴维尔来到他家所在的，一侧是树林一侧是房屋的那条街上，走到院门口停了下来，察看那在灌木丛中游荡、撞得树枝断裂噼啪作响的母牛群中，有没有马伊卡。没有。巴维尔透过板墙缝一看，只见马伊卡在院子里呢。多么聪明的一头母牛啊！即使在这儿，在这个家畜没有牧场、没人照料因而已经变野了，像野兽一般在林子里跑来跑去的地方，它每天也能自动回家。就连这么聪明听话的牛也很快就得杀掉。巴维尔想，这事要请别人代劳，因为他是死也不肯亲自下手的，他甚至要从院里逃出去游逛，直到别人把牛收拾好才回来。别人阉割小猪或者剁掉公鸡头，他都看不下去。这类事索妮娅是敢干的，一见巴维尔竭力要逃时，她就只有无力而反感地挥挥手。他上过战场，各式各样的死亡都亲眼见过，至今还夜夜梦见打仗，梦见跟被打死的人告别呢；可是在这种事情上却控制不住自己，生来就是这样的人。

他有点不想回家……不想，就是不想。黄昏温柔地拂过他的面颊，静悄悄、懒洋洋地浮动，夜幕依然没有降临。偌大新镇里的一切音响、一切喧闹，似乎都渐渐远去了——仿佛是被那威严的时光之流小心翼翼地冲走了似的。对面一棵杨树上飘下一片红叶，刹那间停在半空，打量着该飘向何方。但是气流抓住了它，将它吹到路上，还顺着路面把它掀动了几下。巴维尔恍恍惚惚地点了点头：就得这样。什么就得这样呢，他那深深不安的心境里又冒出了什么念头呢——只好由你去猜想了。大概是到底还应该坚持今天就把母亲接回来。他离开马焦拉岛时并没感到特别不安，当时他已决定真的后天就弄只快艇，一趟就把大伙

儿从岛上都接回来,在这次搬家中不让他们再分离了。但是此刻他突然地不自在起来。倒也并非“突然地”——从他离开他们那一刻起,心里就一直在痛苦,在翻腾;他还以为这痛苦是别的事引起的呢。但是又怎么个坚持法呢?跟母亲用不着多谈,如果她不愿意,她当然就不会离开老太太们到任何地方去。况且即便没有老太太们,即便孤零零只有她一个人,房子被烧了以后,如果她还没有能够在故乡的土地上,在渐渐冷却的灰烬旁边稍稍定一定心,那么,她也多半是不肯立即离去的。

巴维尔仍是不相信,有朝一日母亲竟会跨进这个院门……

巴维尔站了一会儿,无可慰藉地难过了一阵,然后走进屋去——该睡觉了,明天一早就要上班。索妮娅一边等着巴维尔,一边坐在楼下厨房里打毛衣呢,从地板上一口大饭锅里不住地抽出那红色、绿色、黑色的线。自从商店里运来了不知是里加货还是巴黎货的一种罕见的毛线,她就在这新镇里打毛线打上瘾来了。办公室里的女人们无一例外,个个都又争先恐后大团大团地买足了毛线。在马焦拉村时,自家羊毛纺的线索妮娅连一根也没用过,一指厚的袜套和手套都是妈妈来打,那些袜套和手套是穿不破戴不坏的。就是往里倒水,也滴水不漏,不像索妮娅打的这种时髦玩意儿,花边似的净是洞眼儿。

索妮娅站起来要去给巴维尔弄饭,说道:

“咱们那个老乡一个晚上来了两趟,来找你了。”

“是谁呀?”

“彼得鲁哈。他说:‘我妈在哪儿啊?’”

“想起妈来了……”

“我就是说呀:这会儿想起你妈来不早点儿吗,孩子?等大水把她泡起来再去找吧。真不知他是醉了,还是没醉。总是信口胡说。”

彼得鲁哈究竟“信口胡说”了些什么，巴维尔未加细问，这他不感兴趣。然而倒是得见见彼得鲁哈：后天让他帮助把老太太们接回来。而且他突然挂念起来的自己的妈妈，也得让他接走——不过他能把她接到哪儿去呢，接到哪座宫殿、哪片乐园里去呢？那他巴维尔就管不着了。他预感到，他预见到，给西玛和小外孙以及鲍戈杜尔安排个去处，把纳斯塔霞送回来，这些就够他张罗的了。除他以外，谁能帮助他们，谁顾得上他们呢？麻烦事还有，还有……但是令他害怕的到底并不是这个，这个他好歹是对付得了的。最使他害怕，使他放心不下，无法解答，无法稍加预卜的是——母亲的命运将会怎样。推迟一天也无济于事，转瞬间这后天就到，该去接她了，该开船去接了……

巴维尔刚吃过晚饭，还没来得及上楼，门廊里就响起咚咚的皮靴声。凭这故意踏得很响的预告性的咚咚靴声，巴维尔猜到：彼得鲁哈来了。正说他呢，他就到了。但是彼得鲁哈不是只身前来的，出乎意料，跟他一道来的人竟是沃龙措夫。沃龙措夫进了屋，未及说声“您好”，就急忙用他圆而红润的脸上的那两只同样圆而凸出的眼睛，搜遍了各个角落。

“巴维尔·米隆诺维奇，”他迅速而急切地问道，“你们老太太呢？”

“在马焦拉村呢，”巴维尔开始揣摩他的来意，这样答道。

“怎么在马焦拉村？！你今天到那儿去过呀！为什么在马焦拉村？！”

“我倒是去过，可是她没来。”

“咱们是说笑话，还是怎么着？……”沃龙措夫惊愕地责问。“怎么没来？！这没来怎么讲？！”他依然不相信，便四下里张望，甚至还跑到楼梯口往上边瞧了瞧。

“没有，没有，”巴维尔拦住了他，不然他会爬上楼的。“我干

吗要说谎？没回来。还在那边。没住够呢，人家说，留下来再住几天。”

“那么我妈呢？”彼得鲁哈喊道。瞧，他这会儿心疼妈妈简直心都碎了。“也在那边吗？”

“嗯，如果你没把她从那儿接走——就也在那边。”

“哪里有空儿？！”他号叫起来。“我哪里有空儿去接她！我今天才完成任务回来，我执行任务去啦。鲍里斯·安德烈伊奇可以讲讲，”他在求救于沃龙措夫了，说着把那只肮脏的、不知为什么缠满黑色破布的手，在沃龙措夫眼前一晃。看到这恭恭敬敬的一晃，看到那两只冒火的眼睛，听到那声嘶力竭的号叫，巴维尔明白了，彼得鲁哈正醉着呢。

沃龙措夫把嘴一撇。

“任——务！”他被激怒了。“任——任——务！你妈为什么呆在不该呆的地方，你这可恶的醉鬼！你的任务是叫她呆在这儿。不管你叫她呆在哪儿，就是不能呆在那儿。你是干什么吃的？！有指示，人人都得照办！咱们是明白还是……？”

巴维尔明白倒是明白，这一番话，这一阵喊叫，与其说是针对彼得鲁哈的，当然不如说是针对他的。

彼得鲁哈决心要出出这口怨气。

“也许我就是个醉鬼，”他双眉紧锁地环视各位，邀请他们跟他一同体验他这一自白的重要性，“不过说到可恶的——对……对不起，沃龙措夫同志，鲍里斯·安德烈伊奇。这个外号我说什么也不能接受。我没有资格！没有！”他调皮地把头一扬便一动也不动了，仿佛是在体味着自己这番话的力量。“醉鬼……醉鬼又怎么样，”彼得鲁哈继续说。“没有这些醉鬼你们干得了什么？……”

“他们在那边住在什么地方？”彼得鲁哈的话沃龙措夫听也

不听，却再次迅速而焦急地这样问巴维尔。

“在营棚里。”

“在营棚里?! 营棚还在?! 还有营棚?”

“还在。”

“你瞧这事儿! 这事儿……”沃龙措夫甚至哆嗦起来，冲到窗口，他想从那儿看到什么呢——不知道。“可是你，”他跳离窗口，扑向巴维尔，“巴维尔·米隆诺维奇，你还观望什么? 你怎么能这样? 你是个共产党员，不像这位，”他厌恶地点头指彼得鲁哈。“你连妈妈，连个百岁老人都规劝不了! 营棚还在!”他连声叹气。“可明天国家委员会就要来找我。早晨就到。我怎么跟他们交代——我给他们看营棚? 给他们看那些擅自拖延的人? 国家委员会——懂吗你，巴维尔·米隆诺维奇?! 瞧他，去了又回来了。在这儿品茶呢。不闻不问了! 那明天找谁负责?”沃龙措夫问到“明天找谁负责”的时候，紧张起来，于是断然一声令下：“准备出发。别再闹着玩儿了。得认清形势。到了早晨既不准有营棚，也不准有人。你别想溜掉，”他警告彼得鲁哈。“你也去。去执行任——务。跟我一块儿去。巴维尔·米隆诺维奇，你也准备。够了。这是国家大事。鬼知道你们搞的什么名堂!”

巴维尔不愿意去，他累了；况且时候已经行将入夜，而清晨就要上班。这么说，觉一点也睡不成了。但他尤其不愿意马上去惊扰老太太们，把她们撵出老窝，当着她们的面烧掉马焦拉岛上所剩下的最后一样东西——供她们作最后栖身之所的营棚。但是无可奈何，还是得去。他想象着：沃龙措夫会怎样在黑暗中奔忙不歇，对老太太们连声呵斥，催着她们、赶着她们上汽艇；会怎样嘴里不干不净地威胁着她们，骂骂咧咧的，连她们带世界万物一齐咒骂。他想象着母亲，并且想象着母亲会怎样起而制止这种暴行，会怎样地、会以何种追问的目光痛心地注视他

巴维尔……他想象着失魂落魄、吓得发抖的纳斯塔霞，在害怕地频频点头……想象着那个男孩在哭哭啼啼……想象着鲍戈杜尔在垂头丧气而又愤愤不平，可真得管着他点，别让他向沃龙措夫扑过去——他干得出来的！……巴维尔想象到这一切，便向沃龙措夫建议说：

“也许你不必去吧？光我们俩就好歹能对付了。”

“不——”沃龙措夫气势汹汹地说。“不，巴维尔·米隆诺维奇，我再也不能指望您了。够了。您失去了信任。明天我得汇报，我一定要去亲自查明地面确实清理干净了没有；要是再次指望您，您会再次给我误事。要把任务弄清楚。我得负责任。”

他吩咐彼得鲁哈去叫醒汽艇驾驶员，限定在半个小时内备好行装，并且要赶到车库，决定在那儿集合后立即开车上路。沃龙措夫吩咐完毕，跑出屋去。

“可不是吗，”索妮娅说道。“对呀，干吗让人家遭罪呢？他得负责任。”

“让他负去吧，”彼得鲁哈怒气冲冲地说。“让他负去吧，谁也没有不让他负啊。可他也得尊重别人。我可不是他屁股底下的粗木墩子，叫他骑在身上，还给我乱起外号。对不起。我有自尊心。你大吵大叫的！这样的辣货咱见过！”

各人分头去准备行装了。彼得鲁哈去找称作汽艇员的汽艇司机，那是从汽车司机里借来的一位忧郁老人加尔金。彼得鲁哈把他摇醒之后，自己又跑到哪儿去办了点事。如此这般地忙完了，时间用掉已不止半小时，而是一个小时了。他们在黑夜里星光下出发，乘的是那辆每天早晨四处送工人，送他们到远方工地去上班的小型客车。开车的是巴维尔。路是好走的，他们疾速地驱车下山；树林迎面匆匆奔来，随即又在车后朝两侧倾倒着匆匆退去。真奇怪，夜游的飞虫竟能来得及钻进车灯的光束，在

亮处乱纷纷地飞舞着。车轮碾路，卵石发出的均匀柔润的簌簌声不绝于耳。坐在巴维尔身后的人都沉默不语。彼得鲁哈试图开口攀谈，想暗示沃龙措夫该发加班费；可是沃龙措夫甚至都不屑于打断他的话头。彼得鲁哈便住口，不知为什么他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情，锁起了眉头（这是巴维尔从反光镜里看到的）。加尔金老头儿打着盹儿。沃龙措夫正好坐在他们的前头，当汽车颠簸时，他似乎晃也不晃，凝神而气愤地死盯住汽车的前窗。

路走了一半了。这时巴维尔感觉拐弯时一股潮气打在车窗上。不知怎的，树林迎面跑过来，也变得慢吞吞、懒洋洋的了，轮胎的沙沙声也更加低沉了。当他们前进到离河边一公里半远的开阔地带时，只见一团团灰色的飞絮向汽车涌来——这团团灰絮先是稀稀落落，继而越来越大、越浓密，仿佛也是朝着车灯的光束飞过来的。巴维尔一时不解这是雾。坐在巴维尔身后的加尔金老头儿猛然一愣，用又疑又惊的口气问道：

“是雾？”

“是雾，”彼得鲁哈高兴地证实说。“也许这……”他的心愿未敢明说，只是把头向上一挺，往后一仰。“干吗在雾里头瞎转哪？”

对此，沃龙措夫也不认为需要回答。

巴维尔没有掉头，就把车头紧顶在水边停了下来，领先下了车。一条汽艇停泊在右手一排小船的外边，看不见。不过雾还飘在空中，雾下露出一带水面，虽在暗中却也看得相当分明。此刻是一片寂静：没有河水拍溅声，听不到安加拉河上游不远处河湾滩头往常的哗哗水响，也没有鱼儿梦醒时独自偶然发出的咕嘟咕嘟咂嘴声，任何地方也没有发生、没有传来敏感的耳朵有时可以听到的那种悠长而有节奏的水流呼哨声。大地默默无言——周围万物似乎都覆盖着灭绝音响的不可穿透的厚幕。他

们登上了汽艇，连自己的脚步声都没听见。加尔金启动了发动机，但是发动机也不再放声怒吼了，不再像往常那样声闻远近，震耳欲聋，强盗一般地威震四方了；这发动机此刻的响声活像一口一口喘气似的，压低了嗓门而且小心翼翼的，它那突突之声三十步以外恐怕就听不到了。最后跳上汽艇的是彼得鲁哈，他得意地一笑，对巴维尔夸起口来：

“我给‘巨人’把门顶上了。他一动也法动，睡得像条死狗。”

“你还在胡闹？”巴维尔皱了皱眉，说。

“让他睡——吧。值夜班就值夜班嘛，别老睡觉啊，像个土拨鼠似的。等他醒了想出去——没门儿。得爬窗子。爬出来了，可汽艇早被偷走了。让‘巨人’跺脚着急去吧。”

彼得鲁哈一阵哈哈大笑，可是一见巴维尔不怎么欣赏他这套把戏，就走开了，钻进了农民称之为亭子的驾驶室。

他们开船离岸，在水面上一转弯，河岸随即无影无踪了。雾，团团围上前来，而且濛濛飘洒着的竟已不再是潮气，而变成一种灰色发黏、尘埃般细碎的水珠了。巴维尔感到，脸上、衣服上都在聚集着、渗透着可恶的水汽，但又不愿站起来走进驾驶室。他在驾驶室背后一段供人歇腿儿的原木上坐下，抽起烟来，格外惬意而贪婪地把烟吞咽下去，借以驱散寒冷与心焦。然而那心焦却非但不散，反而愈益加剧和加深。他们马上就要到达了——将要发生什么事呢？既无法考虑，也不堪想象将要发生什么事。面对这一问题，他的五脏六腑都噤若寒蝉，避而不答。并且他是那样不愿再前进，宁愿投河。他最感懊悔的是，竟同意了这次突然的夜航——他已经忘记他并无别的出路了。怎么回事，他到底怎么会鬼使神差地同意了呢？然而，既然母亲在那边，既然她的搬家一事不可委托任何别人代办——那样做，母亲是永远也不会饶恕他的——那么，他又怎能拒绝前往呢……

马焦拉岛的位置,从他们离岸的地方看是在下游方向斜对过,距离是两俄里光景。加尔金一离岸就把航向对准了安加拉河,但此刻却是盲目地、摸索着前进呢:启航五分钟后,他们便陷入这茫茫大雾之中,眼前两公尺外就什么也看不清。巴维尔这才想到,起初八成应该哪怕稍微顺流而下一会儿,接着再横穿过去;那样就能不错过马焦拉岛,准能撞在岛上了。然后汽艇环岛而行,需要在哪儿靠岸都可以平平稳稳地靠。可是现在说这话已经晚了,当时就该想到啊。没关系,加尔金整个夏天都在这一带行船,路很熟,他凭着记忆,单靠嗅觉,大概就能开到的。加尔金小心翼翼地低速开着汽艇。巴维尔听见,沃龙措夫一个劲儿地喊他加大油门,但加尔金没有照办,航速依旧:他心里想,如果全速前进,恐怕不一会儿就会搁浅——请你以后再来叽叽咕咕的吧。司机要对汽艇负责。发动机依稀可闻的声响从船体深处传出,听来甚至像从水下发出似的。不过,汽艇冲破雾幕和冲破水面而发出的一片刷刷声,倒因而清晰可闻了。在这片轻柔单调的刷刷声中,巴维尔把焦虑深深地埋进心底,打起盹儿来了。

汽艇在拐弯时一倾一颠,使巴维尔惊慌地哆嗦了一下。他哆嗦了一下,便站起来,想看到加尔金正在靠过去的河岸。可是不管怎样凝神谛视,一点岸的影子也没看到。雾,浓重似壁,汽艇仿佛是在踏步不前,就像车轮打滑似的,无力爬过这面陡壁,徒然一再爬上去,又一再滑下来。巴维尔不记得他什么时候曾遇到过这样的大雾。这雾是如此浓密,以致河水隐约的闪光,好像是从一口黑咕隆咚的深井里吃力地钻出来似的。一片灰色的泥浆映入他的眼帘,因为泥浆太近,两眼不禁眯起来,闭起来。照时间来看应该到了,可是却不像是在靠岸。巴维尔走进驾驶室,看到加尔金正在那样聚精会神、惊慌不安地伸着脖子观察暗处,希望能发现点什么——于是巴维尔知道他们迷航了。是啊,

这早该料到的。这样的迷途,况且是在水上,聪明人显然是不会上路的……可他巴维尔呢,也像个孩子:别人往哪儿领,他就往哪儿走了,连点不同意见都没敢提。现在怎么办,现在只好转悠吧,转到随便撞上哪一处河岸为止。他们想必是终于向上游一偏错过了马焦拉岛,而后不知不觉一拐弯,就顺流而下了。一定是这么回事。果然如此的话,那就该向右拐,设法从另一面,从“自己的安加拉河”一面开向马焦拉岛。巴维尔没有把握、犹疑不决地对加尔金一点头,示意向右;加尔金一看不只他一个人负责把握方向,觉得很高兴,于是就毫不踌躇地拐弯向右了。

“时间太长了,”站在加尔金左手的沃龙措夫感到不妙,警觉起来。“咱们到什么地方了?为什么这么半天?岛子找不到了,还是怎么着?啊?”

“找得到,”加尔金信心不足地回答说。

彼得鲁哈正冷得畏缩成一团(他像在白天一样,穿的还是那件衬衣,衣襟没塞进裤腰),在驾驶室角落里打盹呢;此时听见对话声猛然一惊,往外一探头。

“哎呀,好大的雾!”他惊叫道,砰地一声关上门,开始用手搓胸取暖。“拿把小刀划破了才痛快呢。这么说,是转迷糊啦?转迷糊了,转迷糊了……我早就说过嘛……”彼得鲁哈任何正经话都没有说过,什么都不曾事先警告过。可是怎能放过机会,不暗示一番自己那份哪怕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正确呢——这机会彼得鲁哈当然没有放过。“这么大的雾,得变成一条鱼才能不转迷糊呢。糟——糕!”

汽艇又开了约莫十五分钟,这比打算从“自己的安加拉河”一面撞上马焦拉岛或波得莫加岛所需要的时间加长了一倍。可是什么也没发现:既不见河岸,也不见任何标志或亮光,只有像肉冻一般愈加浓厚的、黏糊糊无边无际的茫茫大雾。加尔金转

脸问巴维尔怎么办？该向哪边拐弯；巴维尔只应声一耸肩，意思是：我不知道。

“停下，”他计上心来，说道。

加尔金站起来，关闭了发动机。巴维尔走到艇边，倾听着刷刷水声在渐渐沉寂，看着雾霭在渐渐消散——水是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他搬起刚才坐的那段原木，往下一扔，听得扑通一声，这说明水还在。接着，他趴下来，探身艇外，用目光搜索抛下去的原木。原木在雾中飘飘悠悠，仿佛是悬在半空，近在眼前，可是不管巴维尔怎样凝视，怎样左猜右想，凭这原木断定河水的流向是不可能的：原木一落水，就紧贴在汽艇上了。此刻已无法弄清，他们刚才是开向何方，又是来自何方的——一切都陷进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乱纷纷的迷魂阵里了。沃龙措夫忍不住了。

“我们还要在这儿折腾好久吗？您怎么啦，懂事还是不懂事？天快亮了，还得办事呢。”

“别喊，”加尔金打断了他的话头。“这儿不是你的会场。”

不管你感到多么奇怪，沃龙措夫居然忍住了，住口了，感到在这儿发号施令确实不顶用。这声“别喊”叫他感到恼火，因为他不习惯别人这样对他讲话；然而这声别喊却推动他做出了另一个决定，他要求彼得鲁哈：

“你喊。”

“喊什么呀？”彼得鲁哈莫名其妙。

“随便喊什么。喊救命也行。附近倒是有活人没有？也许他们听得见。还是你们大伙儿都串通好了？嗯？”

彼得鲁哈没有立即行动，没有贸然行事，先做了个对沃龙措夫的吩咐经过一番考虑才表同意的姿态，而后这才走到船头，喊了起来：

“妈——啊——妈！达丽娅大婶儿——儿——儿！你们在

哪儿啊？嗨——嗨——嗨！”

听不到一点回音。而且指望有人回答，原本就是可笑的：大雾马上便把那喊声就地吸收、吞没了，什么东西也爬不出这大雾的泥潭。

他们又启动发动机继续航行了，仿佛觉得是朝着一处终于猜中的岸边开去的。没有找到，就转而去找另一处岸，接着又去找第三处，可是一处也没能触到。一切都消失在黑茫茫的雾中。时间已是早晨，然而这雾却无意消散，笼罩得那样厚重严密，甚至连雾终将消散的希望也不复存在了。巴维尔泄了气：听天由命吧——于是他不再提醒加尔金该向左向右。加尔金则自行其是地把汽艇朝着一个方向，朝着一个虚无缥缈之境开去。沃龙措夫也泄气了，他耷拉着脑袋坐着，一夜之间发炎变红的两眼呆呆地望着，不过还没忘记时而推醒靠着他打盹儿的彼得鲁哈。彼得鲁哈被惊醒，走到艇边，放声呼唤，那呼唤声自己勉强能听到，总是：

“妈——啊——妈！达丽亚大婶儿——儿——儿！嗨，马焦拉！——啊！”

喊完了就走回去，兄弟般地往沃龙措夫身上一倒，就又睡着了。

加尔金终于失去驶出迷途的希望，关闭了发动机。顿觉一片死寂。周围只有水和雾。除了水和雾，一无所有。

二十三

小外孙从梦中哭醒，哭得惊慌不安，无可慰藉。老太太们也清醒过来了，一面舒展筋骨唉声叹气，一面忙碌起来。她们根本

不曾躺下睡觉，各人黄昏时在哪儿就坐，夜话之后留在哪儿，便坐在哪儿打盹儿了。西玛开始絮絮叨叨地安抚小外孙，小外孙慢慢住了声，只是有时憋不住还低声而压抑地抽抽搭搭的。在鲍戈杜尔那鸡窝似的房中，甚至说黑暗还不够，得说漆黑一团：窗口透进一些雾蒙蒙、湿漉漉、仿佛浸在水下的幽光，幽光里不知什么东西在隐隐约约地蠕动着——似乎是在顺着一股浓厚迟缓的水流漂向何方。

“这是什么——是黑夜？”卡捷琳娜东张西望地问道。

“反正不是白天，”达丽娅应声回答。

“咱们再也过不上白天啦。”

“咱们这是在哪儿啊？咱们还是活人不是？”

“不，不是活人啦。”

“上帝呀！……”

“也就算不错啦。都在一块儿，也就算不错啦。还有什么想头儿呢？”

“就是这个孩子，得想法从这儿推出去。孩子应该活下去。”

西玛惊恐、坚决地说道：

“不，柯利卡我可不放。我跟柯利卡在一块儿。”

“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吧。倒也是，离开咱们他上哪儿去呀？！”

“你在哪儿啊，达丽娅？这是你在说话不是？”

“我挨着你坐着呢。看不见，是吗？是我坐在这儿呢。”

“是你，是吗？”

“是我。”

“可我刚才飞到别处去了，我刚才没在这儿。好像刚刚坐下来。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飞到哪儿去啦——那儿有人没有啊？”

“没看见，不知道。我在暗处飞的，我没到亮处去。”

“这个呢？这边靠着我说的是谁？”

“我吗？我是纳斯塔霞。”

“马焦拉村的？”

“马焦拉村的。你是达丽娅吗？”

“是达丽娅。”

“住在我隔壁的？”

“嗯。”

“我可听出来是你啦，大姐。”

“我早就听出来是你啦。”

“你们这是怎么啦？东拉西扯的干什么？发疯了，是不是？”

两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是发疯了。”

她们沉默不语了，不知是因为对自己刚才那番此呼彼应感到难为情呢，还是因为对自己那片胡言乱语感到局促不安。睡着了的鲍戈杜尔那沙哑的鼾声，划破了令人惊慌而压抑的沉寂。应和着他这鼾声的节拍，老太太们不约而同地前俯后仰地摆动着，借助于运动使自己平静下来。

“窗户外边看得见什么？瞧一瞧吧。随便谁去瞧瞧。”

“不，我害怕。你自己去瞧吧。我害怕。”

朝窗外定睛一看，但见：在经过水洗的暗淡的荧光中，有一团团硕大而蓬松的暗影，犹如团团乌云，凌空奋飞似的疾驰而过。终于醒来的鲍戈杜尔爬下板床，贴进了窗口。别人催他说：

“那儿有什么？我们这到底是在哪儿？说呀——你干吗不说话？！”

“看不见，婊——子！”鲍戈杜尔答道。

老太太们画起十字来，同时口中念念有词，伸出手去互相触

摸。于是她们再度此呼彼应起来，只是语调更加微弱而悲切了：

“这是你吗，达丽娅？”

“是啊，是我。纳斯塔霞在哪儿？纳斯塔霞！”

“我在这儿，在这儿。”

鲍戈杜尔走近门边，把门敞开。雾，仿佛从那敞开的虚无缥缈之境涌出，涌进这敞开的房门。继而听到不远处传来凄厉的嗥叫——那是“岛主”的告别声。这声音似乎当即被流水冲走了。窗外的景象愈加令人眼花缭乱，风的呼啸声愈加清晰可闻。不知从哪儿，仿佛从地下，传来隐隐约约、好似一声声无望的呼唤一般的马达微鸣。接着，那马达的突突之声听得更清楚了，随即又远去了，沉寂了。这时，再次更加尖锐、更加逼近地响起了“岛主”的告别声。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 □□□□□

□□ = 4 5 7

SS□ = 1 1 1 0 3 3 2 0

□□□□ = 1 9 9 9 □ 0 2 □□ 1 □

□	□
□	□
□	□
□	□
□	□
□	□